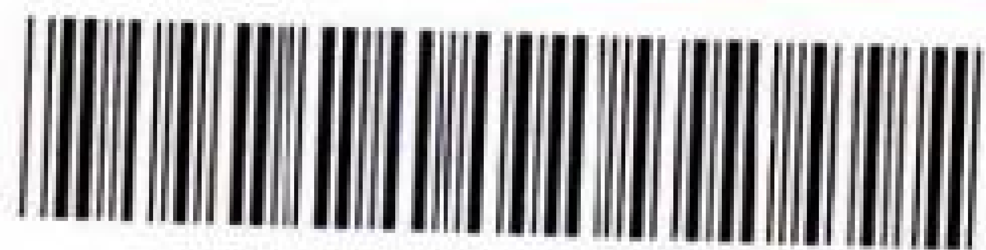

红发姑娘
德·弗里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红发姑娘

德·弗里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Тейн де Фрис

РЫЖЕВОЛОСАЯ ДЕВУШКА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年版译出

红 发 姑 娘

〔荷兰〕特恩·德·弗里斯 著

贝 金 于国畔 姚龙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1.375 插页2 字数 469,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4,800 册
ISBN7-5327-0527-7/I·241
定价：10.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荷兰著名作家德·弗里斯创作的一部反映荷兰人民反法西斯城市游击斗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汉娜本是大学法律系学生，在德寇占领荷兰之后，她放弃学业，自愿加入故乡哈勒姆市的抵抗组织。在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与来自各个阶层的战友一起，为转入地下的人们搞身份证和食品购买券，掩护受迫害的犹太难民，破坏电厂设施，营救被捕战友，运送武器弹药，铲除叛徒内奸，印发地下刊物，鼓动民众抗敌……在希特勒德国灭亡前夕，汉娜在一次运送地下报纸途中，因饥饿和疲劳过度，不幸落入法西斯魔爪。在受尽折磨摧残之后，被法西斯匪徒枪杀，走完短暂和光辉的人生之路。

目　录

第一部　受迫害的人

第二部　保卫者

第三部　制裁的道路

第四部　坚韧披甲

第五部 红发姑娘

第　一　部

受迫害的人

苦闷

战争爆发以来，我大概还从未像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个晚上那样感到孤单。这一天，塔妮娅和露伊莎同别的大学生们一起参加家庭音乐会去了，我独自留在顶楼我们集体宿舍里。平时我放走女友们，心情总是相当平静的，我自己不大有音乐才能，每当我用口哨吹《马赛曲》的时候，她们老是笑我，因为我总是吹走了调……可是这个晚上，我却被一种奇怪的不安所困扰。

问题不光是感到孤单。似乎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折磨着我；在这种模模糊糊的忧虑后边，仿佛隐藏着某种更大的事情——好像发生了些一时还无从解答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也许，是沦陷把我们的神经破坏了。法西斯狗强盗彻底毒化了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要发生几起事件，每天都要颁布一个新措施。一九四一年二月大罢工以后，法西斯匪徒不再微笑了，他们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当然，在这以前，我们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无耻嘴脸，尽管我们装作法西斯匪徒及其帮凶根本不存在的样子。

我看了看摆在我小桌子上的法典和讲义。该做功课了，我决定立即开始。可是一坐到桌子旁边，就觉得思想无法集中。心在胸口沉浊而不安地跳动着。我的心为什么这样激动，它要我干什么啊？我开始在露伊莎的藤躺椅和塔妮娅的书橱之间的彩色地毯上踱来踱去，顺手掸掉有些地方的灰尘。我心不在焉地浏览着在春天落日的暗淡余晖中微微看得出字迹的一些书脊。后来我站在窗口朝下望，街上冷冷清清。可是不用说，立刻就出现了德国兵。在我们国家里有多少德国兵啊——举目望

去，比比皆是！这一起是三个；他们那钉了铁掌的大皮靴发出的咔嚓咔嚓声慢慢地无情地接近了。三个士兵怀着淡淡的敬意，漫不经心地看着我们这个寂静的、不很出名的新南区的一些住宅，主要当然是注意那些华美的建筑物。他们是从哪里跑到这里来的？也许是来自波美兰的某个偏僻地方……他们一边走一边从盒子里拿出糖果咀嚼着。占领已经近两年了，而他们依然狼吞虎咽，似乎我们市民的财富还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征服者！这些灰色的身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离开窗口。我从书橱里取出里尔凯①的诗集，躺在小长沙发上准备看。在四月天清冷的光线下，书页略显淡绿色。可心的诗篇只是增加了神经的紧张和孤寂的感觉。

世界上有个人在哭泣，
那个人在无端地哭泣，
他为我泪流满面。
世界上有个人将死去，
那个人在无端地死去，
他注视着我的脸……

苦闷，苦闷，它怎么也不肯放开我！

我走出屋子，骑上自行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对自由，对那再也不存在的自由的本能渴望驱使着我。对于人们回忆起来感到幸福无比的昔日生活的怀念驱使着我。被风扬起的干燥尘土撒落在我的眼睛、嘴巴上，仿佛在嘲笑我的念头。最好是什么也

① 里尔凯，莱纳·马利亚（1875—1926），奥地利颓废派诗人。

别想。可怜的、无能为力的汉娜啊！然而我可完全是另一个汉娜，是一个还没有人了解的汉娜。我能做到的事情，比你们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莫非，我仅仅是在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骑车行进在整洁的林荫道上，突然对那些在明丽的草木丛中排成长列的华丽住宅感到厌恶。我拐了个弯，向塔妮娅所说的"悲惨的"无产者郊区骑去。我越过几条肮脏的铁路；沿着荒废的运河，在一堆堆废铁和一座座扔下未完工的锈烂小船的废弃小船厂旁边骑行。我绕过充满污水和翻着泡沫的臭水沟，从一些洗衣坊旁边驶过。再向前行，两旁出现一些营房式的房屋，这是不久前刚刚为贫民建造的，可是外墙已经剥落，一副凄凉的样子。这里没有鲜花，也没有草木。

远处草地上隐约可见一些荒芜的果园，草地那边露出一轮血红的太阳。打网球的人个个穿一身雪白，在互相快速击球。就在那旁边，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用枯枝燃起篝火，或者成群结伙，在堤岸上快活地走来走去，寻找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价值的宝贝。有些疲劳的妇女在临街敞开的屋门边眺望，她们脸上显然刻着战时困苦的痕迹……一艘小艇沿着宽阔的运河疾驶而过。一群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结队沿岸行进，他们吹着口哨，给划船的人喊加油，欢笑着……

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到处都是对比！忧郁感又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掉转车头往回走。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似乎我真正的生活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

我回屋照例准备好茶水等待着女友们。姑娘们嘻嘻哈哈喧闹着回来了。她们那股快活劲儿使我感到不痛快。她们认为我的气色非常好，甚至面颊都有点绯红。我沉默了一会。她们又带回来一则关于希特勒的笑话和一些关于官员与大学生义务劳

动制度的荒谬传闻。我不想说话。我躺在沙发上，打算睡一会。我很想打个盹，把一切忘掉。塔妮娅和露伊莎又谈笑了好久，哼着她们从音乐会上听来的曲调。

被抢走的海

北海突然不属于我们了。所有报纸都以占领者所特有的侮辱性的冷酷口气宣布：沿岸地带今后一律禁止通行。自从战争和占领开始以来，我大概总共只到海边去过一两次，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这样爱它。海向来存在，沙滩也从来就有。可现在那里却"禁止"通行，"verboten"①——这是他们最爱用的字眼。

我想起了我在哈勒姆②的父母。我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害怕那敏感的场面和倾心的交谈。有一次，我甚至称父母为伤感者——还是当着外人说的咧！这当然不对。他们惦记我，就像我惦记他们一样。但是我们之间有许多事没有说穿，因此我认为，正是他们脸上露出来的那种无言的执拗的疑问，常常在阻止我回哈勒姆去。双亲好像要竭力盘查出究竟是什么在如此烦扰着我。是不准去海滨的禁令吗？是被抢走的海吗？是那些快要空无一人的高等学校吗？然而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家一趟，于是我乘上了浅蓝色的电车。

我到家了，坐在房间里，室内的一切我都那么熟悉：阳光，阳光透过窗帘照出来的花边图案，沙发上的靠垫以及那把皮面上缺了一枚铜钉的老式椅子；猫悄悄走近放着收音机的壁炉跟前，它不磕不碰，一下扑住了一只越冬的苍蝇。屋子里的一切，仿佛

① 德语："禁止。"
② 荷兰北部的城市，在海牙—阿姆斯特丹铁路线上。

都留着它的主人当年悉心照料的痕迹；然而如今却再也没有这种亲切感了。父亲的双眼透过金边眼镜注视着我。他的头发白多了，人也变得更沉默。我觉得，自从在税务局离职以后，他现在正不知道自己该何所适从。母亲穿着她那件淡灰色的合身外衣，一双灰色眼睛平静地看着我。她去厨房烧了开水回来，几乎是毫无声响地给大家倒上茶；她的这种镇静使我异常惊讶。我和他们并排坐着，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我带着痛苦和懊悔的心情在想："除了我以外，他们生活中已一无所有了。我应当求学。应当成长为一个有能力、有理智的人，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法对他们这样说。我只好站起身，穿过整间屋子奔到楼上，跨进我童年时住的房间。房间里的布置依然同我离家去阿姆斯特丹上大学以前一样：儿童读物，窗台上的花，墙上的扇子以及在散步和游览时拍摄的一些照片。我坐在床边，床单被我压皱了。我抚平那些难看的皱褶，心里想："自从我哥哥死去以后，我长大了多少啊！"那时候，我大概才六七岁。哥哥生了病，躺在房间里，房门临着楼梯的平台，正对着我的卧室。每当我从门外悄悄看他的时候，他就微笑着对我眨眨眼睛："唉，你的陀螺没坏吧？"医生诊断错了。哥哥喉咙里长了个不寻常的脓疮。本该把他送进医院，那里有医生经常照看。可双亲就那么眼睁睁看着我的哥哥死去。我穿着睡衣，浑身直打寒战，坐在楼梯上等着，很想知道关着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父亲和母亲这么久还不出来。他们终于出来把情况告诉我，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时的情形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硬块堵住我的喉咙，绝望的铁钳紧紧钳住我的心，好像永远也不会松开。我站在楼梯平台边上。我下了决心："我马上就往下跳。哥哥死了，世上什么也不存在了。"我还没有跳，父亲就一把

搂住我，把我抱走，他好像猜到了我要干什么。这样汉娜活下来了，也正因为如此，双亲活着只是为了汉娜一个人……

父亲送我上电车。我看见他把双手抄在背后，往回走去。我觉得他的背更驼，脚步也挪动得太慢。我心如刀绞。坐在电车里，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哈勒姆，望着正午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的草地。乘客们在议论不准游览海滨的禁令。我邻座中有个乘客援引沙赫特① 的话说："这可能还要延续四小时，或是四天，或是四个星期，可是不会超过四个月……"大家都笑起来，我可笑不出来。也许人家会把我看作德国人的拥护者，法西斯分子。不过对我反正一样。车到一个站头，上来一些青年女工，把车厢挤得满满的。我觉得她们又粗鲁，又可笑。她们毫无礼貌地把人从车厢门前的小平台上往车厢里挤，他们互相耍笑，还和售票员开玩笑。有个姑娘甚至把售票员的制帽硬绷在自己头上。快乐的姑娘们转移了我的思绪。在通往哈勒姆的路上，一批全副武装的德国兵列队行进。他们光着头，汗流满面，一身尘土，弄得灰扑扑的。青年女工们低低地朝车厢栏杆外面探出身子，高声唱起来：

我怕溺水，下海去我可不愿！
是德国人，干嘛去英国海岸！
可英国人来这里，你说咋办？
不，德国人反对，那他就完蛋！

---

① 黑尔玛·霍拉斯·格利莱·沙赫特博士，在希特勒上台前后曾两度出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对第三帝国之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起过重大作用，被誉为"金融奇才"。

我神经质地大笑，坐在我旁边的人们用责备的目光诧异地看着我。那位引用沙赫特的话的先生从我这边掉转脸去。德国鬼子的神色如何，我已无法看清。售票员已经到车厢另一头去了。

我回到顶楼的集体宿舍，露伊莎正在隔出来的“厨房”里煮东西。塔妮娅还没有回来。我瞧着露伊莎发色深暗的脑袋和她那圆圆的、丰满的肩膀。她唱着歌。她的歌声真叫我生气：她只承认古典作品。她一看见我便嚷了起来，说是有人对她发誓，不久一切就要结束了。盟国正在准备参战。到六月底，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再有一个德国鬼子了。

我问：

“我的天哪，他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呀？”

“说实话，我也弄不清；好多人都这么说。”

“可是你知道吗，露，”我说，“用咖啡渣占卦和假预言家们的预言，对我们比什么都更有害，天真的乐观，对我们的精神状态比什么都更危险？”

她大笑起来，说：

“唉，瞧你说的……你未免说得太严重了，汉娜。让人们享受享受幻想未来的自由吧。他们需要一根救命的稻草啊。”

“这算什么话！”我说道。“抓一根稻草！不，人们需要的是可靠的支柱！”

我把自己的手提包使劲往沙发上一扔。我真的生气了。露伊莎从隔板上面向我投来吃惊的眼色。但是，就在这时候，她烧的东西突然吱吱响起来，露伊莎急忙转过身去照料小煤气炉了。

黄色星标

两天以后，法西斯匪徒又要出了新的卑劣的鬼把戏。我一整天没有离开房间——我终于下了决心，认真温课迎考。露伊莎和塔妮娅把茶杯弄得叮当乱响（我一辈子都觉得奇怪，女人们凑在一起，要喝多少茶啊）。我打开报纸，撇开德军的战报，我看见一个加了边框的通告。我读了一遍。突然感到极端的羞耻和厌恶，全身的血液直冲脑门，而后又涌向心脏。我看了看塔妮娅。她个儿高高的，身子挺得笔直，体态异常匀称美丽——简直是个希腊女人。她有稍长的鼻子，薄薄的嘴唇，还有一对温柔的大眼睛——这是她脸上最漂亮的部分。她那柔丝般的微微鬈曲的深色头发在颈后绞成一个结，就像希腊的塑像那样。她的外貌有一种南方人所特有的异域风采，不大像个犹太人；也许我看惯了，不觉得了。我从坐位上慢腾腾站起来，不知道是否应该把消息告诉她……当然，我必须这样做。我拿着报纸向塔妮娅走去。她朝我笑笑，态度是那样傲慢和难以接近，我不禁停住了脚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说。"我早上在城里就听说了。"

她的声音里含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抗议。露伊莎抬起头，她发觉事情有点不妙，便走到我们面前，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她看见了我手上的晚报和塔妮娅的高傲神色。她夺过我的报纸，没费劲就找到了那条灾难性的通告。我发现她的脸也红了。同我刚刚看到这个通告时一样，她也感到了耻辱。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虽不是犹太人，也当感到羞辱，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佩戴标着‘犹太人’字样的黄色星标！”大感震惊的露伊莎读完了通告。然后她对若无其事地往沙发上坐下去的塔妮娅看了一眼；塔妮娅那漂亮的两腿跷成二郎腿，从手提包里取出带指甲剪的梳妆盒，修起指甲来。

“塔妮娅……你知道这件事了吗？为什么一点也没告诉我们？”

塔妮娅坐着，向前低低地俯着身子，好一会儿我们只能看见她那深栗色的柔发。现在她抬起头来了，于是我们看到她的脸了。她下嘴唇咬得出血了，眼里闪着愤怒的泪花。她扔掉指甲剪，猛一甩头，把头发甩到脑后。

“我不会这么做的，”她冲口而出。“我决不佩戴星标！我可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不是活在中世纪的犹太区！最好让他们抓住我，立刻把我打死吧！……”

露伊莎把展开的报纸挡在自己面前，好像挡箭牌似的。

“别做蠢事，塔妮娅，”她惊慌地恳求道。“他们可是会盯住每一个人的……要知道犹太人理事会知道你……”

她突然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觉得自己说的是完全不应该说的话。

“说不定这对你不至于那么危险，”她急忙补充说，“也许他们会把你作为例外……”

塔妮娅用变调的声音愤怒地喊道：

“我和犹太人理事会毫不相干！我不想成为例外！你们说得倒轻松……反正你们用不着佩戴星标！”

我不顾难堪和窘困，抓住塔妮娅的手腕；眼睛向露伊莎示意：看在老天爷份上，你不要再讲了。

“你听我说，塔妮娅，”我坦率地说。“你不愿佩戴星标，这是

对的……当然，星标也当不了护身符，这连露伊莎也明白……现在只有一条路：离开这个人人都认识你的地方，真正地转入地下！”

塔妮娅用那热泪盈眶的眼睛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看我。我又感到难受极了，我说不下去了。

“我也转入地下，跟你一道，愿意吗？”我很快地说。

“汉娜！”露伊莎带着责备的口气大声说。“抛弃这里的一切吗？我们三个从三八年起就一同住在这个顶间里，现在说走就走了？”

“别说废话了，”我严肃地说。“这完全是迫不得已……我们两个都不孤单：你有未婚夫——一个未来的医生，我有父母。而塔妮娅的父母却被迫躲藏起来了。除了我们，她举目无亲，我们应当帮助她。”

据我看，露伊莎感到愧疚了。她瞧着一边，默默地给我们倒上茶。看样子，她正在思索。她脑子比较迟钝。不过她一旦想清楚了，就会坚持到底的。茶凉了。我们，包括露伊莎，谁也没去碰一碰茶杯。矮桌上的小盘子里，还放着前些时候剩下的饼干。同样谁也没去吃一块。

我们正讨论着新出现的情况，尤迪菲来了。尤迪菲学的是药物学，她住在城里的另一头。她差不多一开始就是大学生辩论会的成员。这个团体是我和露伊莎组织的，因为别的团体没有邀请我们，认为我们是好出风头的人。一看见尤迪菲，我高兴起来了。我感到抱歉：竟没有想到她这个常为塔妮娅的命运操心的人。尤迪菲一向是个亲切可爱、温文尔雅的姑娘，现在她穿着灰色衣服，看起来也还是那么亲切可爱、温文尔雅。近来，她只是有事才到我们这里来，要么她有什么不如意的事，要么在课

业上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地方。她也是独自住在这里：她的家可能在特文特或阿赫特豪克。她这次来访的原因不用问了：她的手提包里也放着一份晚报。

我们四个仿佛在开军事会议。塔妮娅稍微平静些了，甚至有点快活起来了。我们全都感到这个时刻无比庄严，异常重大。我发现露伊莎似乎已经同意放弃我们的集体宿舍。我们正在认真商量到哪里寻找住处，突然尤迪菲像孩子一般天真地说：

“可我们葡萄牙人团体里的犹太人，目前还是可以自由行动的！”

塔妮娅惊讶地默默看着她。这一次，露伊莎突然不顾情面地说开了，使得我们其余的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

“自由？”她痛苦地喊叫着。“你想说什么，尤迪菲？因为你们是西班牙籍侨民，就可以比别的犹太人多自由个把月或者半年吗？……仁慈的上帝啊！还自称是个知识妇女哩！你还相信那些在愚弄你的法西斯匪徒！”

我非常满意。露伊莎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身 份 证

第二天，我出发去往年年初为同学们领取大学生身份证的地方。这座房子位于阿姆斯特尔河旁一家石匠作坊的后面。我把发身份证的人叫N先生，因为写着他名字的小牌子已经从门上拿掉了。我必须通过一条狭窄的甬道，那里有一股石灰浆和碎石头的气味，房檐墙角到处都落满了白色石粉。这种气味及灰扑扑的墙壁，都使我感到亲切。在这个地方，我总觉得充满了信心，意识到我能够给人们以帮助。这是个阴沉的早晨，灰蒙蒙

的天空笼罩着大地；浓烈的气味和石粉呛得人喉咙发痒。我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咳嗽着跑步穿过了甬道。现在这里没有一点令人感到亲切的气氛了，一切都好像是陌生的，甚至含着敌意。我看见一些墓石，大块大块的花岗石和灰泥岩，灰色的黄色的都有；还有通往石头堆栈的生锈的小铁轨，看来，这堆栈已经多年不用了。一派凄凉景象，四处阒无人迹。我甚至有点踌躇：我是不是该回去。可是我立刻想到了塔妮娅和尤迪菲。不，我不能回去。我把自行车靠在柱子上，朝掩藏在石匠作坊后面的房屋走了几步。小屋子的窗口已经用旧护窗板钉得严严实实。窗子上方毫无生气地耷拉着去年的野葡萄藤，活像一绺稀疏的老人头发垂在一只受伤的眼睛上。"有问题！"我想着，犹豫不决地站住了。

就在这时，作坊的遮檐下传来了脚步声。我转过身，看见一个石匠师傅正对我做手势。他好像叫威廉。这个人本身也像块石头——他的脸、围裙、灰色的高统鞋，都像石头做的。他并不看我，嘟哝着说："您不该到这里来。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吓了一跳。我的一只手在风衣口袋里痉挛地握成了拳头，问道："被捕了吗？"

他摇摇头，微微一笑说："没有。暂时还没有。躲起来了。转入地下了……"

我放心了。我还想再问问威廉，可他已经转过身去不理我了。于是我回身慢慢朝自行车走去。我骑车穿过甬道，又来到阿姆斯特尔河边。天上飘下几滴小雨。河上吹来一股寒气；维斯彼耳辛河岸街上一片令人警惕和戒备的沉寂。我加紧踏车，赶快离开。

就这样，我没有搞到身份证，而我离家时曾经轻率地说一定能带回去的。所有其余的事，指印，照片，钢印，我们都好办；这些事我们可以找一个熟识的雕刻匠帮忙，他在市中心有一个堆满了钢板、火漆和小铅字的作坊。我不愿意就此回我们宿舍，我在离家还远的地方又兜了大概半个钟头。我想好了一个主意。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家里。我正上楼梯，塔妮娅和露伊莎已经站在楼梯台上，从栏杆上往下探着身子。很明显，我走得这么慢，我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已经用不着再作什么说明了。我勉强上了楼，她们沮丧地看了看我；我摘下软帽，抖了一下自己火红色的鬈发。我只能以此当作无言的否定回答。塔妮娅和尤迪菲也不再动问。

“没搞到，”我说。“N躲起来了。用知识界的话说，他没有留下地址走了……给我支烟吧！”

塔妮娅挨着我在旧沙发上坐下来。我们默默地抽着烟。露伊莎用手揪着裙子在我们对面坐下来。她向来不吸烟。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坐了几分钟。一想到我们不久就要离开这个房间，我就觉得这个房间有点空荡荡，叫人不舒服，好像我们和它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我看见我右边的塔妮娅的一只小小的高跟鞋在一阵阵地抖动。我含糊地咒骂了一句，从坐位上站起来。

“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说。“我必须搞到身份证。去偷。去骗。能偷就偷……去偷尊贵的荷兰太太们的，她们可以毫不费事再领新的……”

三个姑娘都茫然地看着我，特别是露伊莎。在她脸上又可以看到合乎未来可敬的医生夫人身分的那种恐惧神色。

“汉娜！”她惊惶失措地说。“先到我们搞食物券的地方试试

看，怎么样？……”

我知道那里并不办什么身份证。就是说，办法只有一个了。我摇摇头。塔妮娅断然熄灭自己的香烟。她已经从绝望的熬煎中恢复了常态，她用果断和挑战的口气清晰地说：

“汉娜，我和你一道去！我们需要几十份几百份这样的证件……马上动手。我们来组织一个身份证发放站！”

游 泳 池

现在我已经坐在阿达家里了。战争发生的头一年，她曾是我们大学生联谊会的会员。那以后我就不知道她的下落。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阿姆斯特丹。原来她还在这里。眼前是熟悉的房屋，宽阔的街道，远远延伸过去的街景——被太阳晒得闪亮和发热的电车轨道，箍着铁箍的可怜的小椴树。这是个令人厌恶的日子。我必须搞到身份证，否则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塔妮娅和尤迪菲，我也不能让塔妮娅来干这种游猎把戏。我们成了冒险者，露伊莎一直在暗中生我们的气。我们之间产生了些隔阂：各人都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把东西陆续包装起来。这是我们三个之间断然决裂的前奏。今天这个日子尤其令人憎恶，因为各报都报道了盖世太保的头子希姆莱① 来到我国的消息。和他同来的还有纳粹匪徒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政长官海德里希②。在报上看见他们的名字，我就觉得恶心，觉得心窝里隐隐作痛，觉得好像有大批刽子手军队跟这些坏蛋一起

① 希姆莱(1900—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战犯之一，曾先后担任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头目，是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罪魁，德国战败后，畏罪自杀。

② 海德里希，纳粹党卫军将领，总监。

急速进入我国，这是一支悄悄潜入的讨伐队，他们将要制造出许多新的重大案件来审判我们的同胞。我怀着这种心情走进了阿达的房间。阿达是牧师的女儿，是个外貌平常、非常好静的高个子姑娘。从她的外表上，看不出她是否高兴我的到来，她仿佛十分自然地在对待着一切。她穿着咖啡色的裙子和不合身的高领绒线衫，在我对面坐下来，平静、友好而坦率地注视着我。我原可以把一切都详细讲给她听：我知道她不会泄露出去的。然而我没有讲。我打定主意，应当独自来干这一切；知道我的计策的人越少越好。我想，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很快就要来侦查这个房间以及荷兰的其他成百上千个房间了。我仿佛觉得，他们那阴险的眼睛已经在冷酷地凝视着我的脊梁。我没有好好地同阿达畅谈。几乎一见面我就问她，能不能借件游泳衣给我。难道塔妮娅和露伊莎没有游泳衣吗？她眼睛里刚刚闪现出这种疑问神情，立即又移开了视线。她一点也没问塔妮娅或露伊莎的近况。再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可爱了！她只是点了点头，便起身向五斗橱走去。她从抽屉里取出游泳衣，递给了我。我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

"我一定尽快还给你。"

她这才头一次对我微微一笑，她的脸也几乎变得好看了。

"你尽管拿去用吧，"她说。

我握着她的手，比通常握得紧多了。当时，我略微有点脸红——我怕我又要心软了。阿达平静地低下眼睛，仿佛她已经全都明白了。

我站在台阶上，又想到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春天的太阳高高地升到了街道房屋的上空；树木正沐浴在新芽嫩叶的辛香之中。盖世太保……我又骑上自行车，行驶在阳光耀眼的街道

上。我把游泳衣放在自行车挂包里。我发现广告牌上贴满了用两种文字印成的冗长的新通令。法西斯的鹰徽和法西斯的卐字党徽……我甚至不屑于下车去看看这些通令，当然谁都不会去看的。猛烈的电车铃声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我正在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发楞。我跳下自行车；交通调度员不满地摇摇头，我却报之一笑。当时他耸耸肩，伸手扳转了调度牌。现在牌上写的是"halt"①；原来的"stop"② 英国味儿太浓了。

室内游泳池里太暖和了，四周雾气腾腾，热浪滚滚。孩子们和姑娘们互相嬉闹着，追逐着，掀起一片喧哗。雪白的肩膀划破池中的绿水，激得水花飞溅；戴着橡皮游泳帽的女人们的脸，看上去怪模怪样的。我在更衣室里用手巾扎好头发，穿上阿达的游泳衣向游泳池走去。这件游泳衣我穿着略嫌大了点。我跳进水里，使劲用手划着，一连游了两圈，仿佛这样才能帮我鼓足自己的全部勇气。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回到踏板跟前，差点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一个穿白亚麻布游泳衣的值班员伸出一只手，帮助我爬出了游泳池。

"应该慢一些，小姐！"他说。

我避开值班员的目光，坐在冰凉的石板上，心里咚咚直跳。值班员头顶平平的，脸刮得很光，那只又滑又湿的手冰凉。我正受着良心的责备，感到惊惶不安。孩子们在喊值班员了，我这才高兴起来。我坐着，一直到我的心跳得均匀、平静了。随后我站起身，沿着踏板慢慢走去。我看着姑娘们正把一个鲜红色的大橡皮球扔来扔去；一些上了岁数的太太们在碧绿的池水里游着，鼻子里老是大声呼哧呼哧的，她们动作艰难，笨手笨脚的——

① 德文："停止。"
② 英文："停止。"

活像一群河马！这里所有的景物和所有的人都显得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唯有我感到恼恨。我向更衣室走去。游泳池的值班员正好爬上了瞭望台。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一下闯进了我遇上的头一间更衣室。我不敢把门关严。得先适应一下黑暗，其余的事做起来就不怎么困难了。我一下子就看见了放在内衣上面的手提包。我把它打开来，这时我又喘不过气来了，心直跳。温暖湿润的皮肤上沁出了汗水，而我却浑身直打寒颤。我扎头发的手巾上的水珠，一滴一滴掉进打开的手提包里。手提包里有股香粉和香烟的气味。包内有一个黄色的软皮夹，里面就放着身份证。我赶紧把身份证揣进怀里。

我走出更衣室的时候，值班员还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很快地走过他身旁。我原想解释几句，说我搞错更衣室了，可没这样做。我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我不能再下水了——就这样身份证也已经湿了。必须赶紧，还不算太晚。我躲躲闪闪绕过两个穿条纹浴衣的太太，走进自己的更衣室，随即反手砰一声关上了门。

我穿好衣服，走出更衣室，这才知道最困难的事还在后头。不能就此急匆匆离开这里。必须再逗留一会儿。再看看玩球。也不要想到证件的女主人随时都可能回来。必须冷淡地对待值班员的疑问眼色。当然，我预料他会用疑问的眼色来看我的。可是他好像根本没有朝我这边看。不，他毕竟还是看过一眼的。莫非是我这蓬乱的栗红色头发下的苍白脸色引起他的注意了？也许别的人也在看我吧？我腋下掖着搞到的东西，紧贴栏杆站着。值班员就站在我旁边。

“怎么样，不害怕了吧？”我点点头，笑了。“下次您先要慢一些，别莽莽撞撞往水里跳，”他又补充说。“您的心脏怎么样？正

常吗？"

"非常好，"我答道。他像父亲般地对我摇摇手，这时又有人在叫他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很高兴。于是我哼着小曲，向出口走去。

到了街上，我立刻便置身于一片纷乱的嘈杂声中：人声、风声、铃声、喇叭声。我骑上自行车，往城市西区而去。我在那边转游了整整一小时，直到断定没有人追踪我方才罢休。我完全明白这一点：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到这个游泳池去，即使游泳池附近的地方也不能去了。值班员已经仔细打量过我，下一次他一定认得出我来的。这天上午我还惊吓了一次：在紧靠我们屋子的拐角上，出现了一辆德国刑警队的汽车。这辆汽车嗥叫着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生怕撞着我，一下子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我看见车上有二十来个警察，他们的脸都被绿钢盔的阴影遮住了；冷森森的枪口朝天指着。汽车向远处疾驰而去了。我的膝盖直发抖，再也不能骑上车子，走完到家以前的最后五至十米路了。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上楼的。衣服全沾在身上了。谢天谢地，露伊莎不在家，出去买东西了。塔妮娅站在镜子前面用刷子掘头发。她吃惊地朝我转过身来。

"你到哪儿去了？……天哪，瞧你这是什么脸色！"

我真想大喊大哭一场。好不容易我才控制住了自己。我把身份证往塔妮娅面前的桌子上一扔，身份证还湿着哩。

"喏，看吧，我用巧计战胜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我说。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住了，急忙转过身去，牙齿打着战，奔下楼梯，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

夏天的游猎

在第一次尝试以后，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还会再冒险去偷窃身份证；然而，在一夏一秋两个季节里，我竟弄到了不下四五十份；塔妮娅偷到的大概还要多。

自从我们迁离在城南的顶楼大房间，而露伊莎去霍伊以后，我们的生活根本改变了。我们把尤迪菲安顿在音乐厅大厦背后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坐落在一条古老、阴森然而非常值得尊重的街道上。德国鬼子很少到这里来查看。再说尤迪菲生活简朴，处事谨慎。我和塔妮娅也在市中心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找到了个顶楼房间。这个房间在一座古老的高房子里，下面还有四层。房间里的天花板歪歪斜斜的。逐渐毁坏的房屋，发出一股潮气和霉味；这所房子已经没有人来修理了。你在墙上钉个钉子，灰泥就会落满地板。整幢房屋都已经住得满满的。到处都是人，几乎迈不开步。谁也不去注意邻居，谁也不知道谁姓什么。孩子的哭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有两位摄影师租用我们楼下一个黑暗的房间；楼梯台上的一只白铁面盆已经被化学药剂侵蚀坏了。就在我们近旁的什么地方，不断传来不太响的锤击声，可是过了一星期，这声音没有了。

我们的新房间，同我们和露伊莎一起住过的那个房间比起来，低一些，也小一些。我们用旅行社的游览蓝岸和赫布里底群岛的旅行广告糊在灰泥剥落的墙壁上。塔妮娅在没有窗台的又宽又低的窗子下面放了几盆花。我们还弄到一张旧沙发和一面一人高的镜子。夜里，我们各自躺在这低矮的小房间的角落里，听着尖利刺耳的咆哮声——这是英国机群在轰炸德国的潜艇基

地。高射炮断断续续地、恶狠狠地嗥叫起来，企图阻挡飞机。这是徒劳无益的——飞机飞得很高。我们不由得压低了谈话的声音。飞机的声音是单调的，可对我们的谈话却是动人的伴奏。有时候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德国人民从不表示抗议。对于德国人，这些空袭应该是一种警告：玩火者必自焚。我和塔妮娅谈到海德里希，他从荷兰回到布拉格没多久就被捷克爱国志士打死了。继海德里希之后，一个叫达鲁格的来上任了。他为了给自己的前任报仇，下令枪杀了利迪泽村[1]所有的男人，把村里的妇女和儿童掳走，把村庄夷为平地。我们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塔妮娅悲愤得哭了起来。我发觉，她的想象力异常发达。她总能清晰地想象出这一切：首先是毁灭利迪泽村，然后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来到我国以后归德军指挥的二千名荷兰军官押送到前线，而不久以后，把头一大批荷兰籍犹太人遣送到波兰。有些人认为，把这些人拉去是从事强迫劳动的。另一些人推测，根据法西斯残暴手段的惯例，那里要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当德寇到处肆虐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我深深地感到痛苦。我体验到了从前也曾有过的感情。冰冷的充满苦闷的心灵深处的全部痛苦，好像凝聚成了一团硬块，难以消化的、坚硬的、带刺的硬块。我逐渐变得严肃和沉默了，而塔妮娅常常流泪并用激烈的咒骂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塔妮娅带着不加掩饰的兴奋，倾听英国飞机刺耳的咆哮，嘲笑有时候会把我们的顶间震得发抖的无能为力的高射炮射击。有一次，我谨慎地提醒塔妮娅说，要知道德国也有母亲和儿童哩，她立即冲我喊道：

“你最好还是想想波兰的犹太母亲和儿童，想想乌克兰、利

---

[1] 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二十公里的一个村庄。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被德国法西斯全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以后已经重建。

迪泽的母亲和儿童吧！……想想我们这里所有被德国鬼子杀害了的人吧！就是死掉成百万德国鬼子和卖国贼，也永远抵偿不了他们给全世界造成的灾难！”

这是个动荡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夏天。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恐惧：真正变成残忍野蛮的人已经太多了。俄国人又退却了，虽然冬天他们那里曾首次出现过抵挡和驱逐德寇的实际可能性。纳粹匪徒在克里米亚盘踞下来，他们逼近了伏尔加河。我不再看德军战报。那纯粹是叫嚣。我们不幸的耳朵完全让德国人放肆的吹嘘搞聋了。德国兵厚颜无耻地唱着歌，在大街上列队而过。为了加强大西洋防线的防御，沿海地带出现了一些新来的德国军队。关于盟军参战的传闻又活跃起来了；战争迅速结束的预言越来越显得没有理由和根据了。有时候我在火车站上看见整队整队的党卫军开往东方。那是些荷兰人——敌人的雇佣军。这些叛徒的脸上同时表现出杀人的兽欲和狂妄的贪婪。法西斯匪徒首先把自己的外国雇佣军送去当炮灰，还要嘲弄似地强迫他们戴上缀有“骷髅”帽徽的制帽。我永远不能设想，人，竟然会干出这种阴森可怖而且必受惩罚的罪行。我越来越慎于谈话了，一般情况下我不对塔妮娅提起这些德国雇佣兵。只要一提到纳粹匪徒以及和死亡有关的话题，总会使她过分健谈。

整个夏天和秋天，我和塔妮娅总是在课余挤出时间，设法去猎取身份证。我又到游泳池去过一次。那是另一个游泳池，而且已经是穿着自备的游泳衣了。这次真幸运，一次就从那里搞来了整整两份身份证。这以后，我实在不敢到人太多的室内温水游泳池去了；我觉得随便哪个人都可能认出我来——那时候就免不了算老帐了。现在我们采取了别的办法。我们逛商店，乘

电车和火车，上咖啡馆小吃部、百货商店和车站的公共厕所，凡是人们容易把手提包随手放下不去照管，或是有粗心大意的人随意拎着手提包的地方，我们都常去。我们很少空手回来。使我惊奇的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再全身发抖了，无论是跟踪、告密，以及常常发生的军事警察对乘客的搜查——当然主要是搜查男乘客，我都不害怕了。唯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必须搞到身份证：搞到一张身份证就意味着挽救我们一个同胞——一个犹太人的生命。那剧烈地折磨着人的一团依然堵在我胸口，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用漠不关心的护心镜把自己的心防护起来，那么我们沉着的和充满勇敢精神的"环形防线"就将是不可逾越的了。对塔妮娅来说，这种游猎是一种运动。是一种集复仇与自我肯定、集扒手的灵巧与最神圣庄严的动机于一身的运动。游猎归来，我计算着搞到了多少证件，提也不提在哪里搞到的；我记不得了，我力求忘却我偷过什么人的身份证。塔妮娅却不然，对于被她成功地骗过的人，她竟能令人吃惊地清清楚楚回忆起她们的面貌和风度来：一个是在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间的列车上，正在抱怨食品定量减少的胖太太；后来是一个在一家美国女人开的咖啡馆的盥洗室里，差不多花了刻把钟对着镜子涂脂抹粉的娇生惯养的妙龄女郎；还有两个在百货商店里把手提包扔在一边去跟店员拚命讨价还价的法西斯婆娘。塔妮娅神经质地、洋洋得意地笑着，几乎每一次情况都讲得那么惊人的详细；她的这些讲述动摇着我的信心，甚至使我担心起来。我认为塔妮娅的行动太冒失了。她的心中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燃烧。我不止一次特意平心静气地要说服她，我一个人能够搞到必要的证件。我不让她产生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想法。我竭力向她解释，德国鬼子对犹太人采取了新的、异常残酷的迫害手段，这会使她遭到

更大的危险的。我每一次列举种种理由的时候，总会突然感到窘困、害怕，我生怕伤了她的心，太委屈了她。因此，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每当我沉默不语，这正是我最为她担心的时候。当我坦率向她摆出各种理由的时候，她果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她对于自己的勇气、灵巧手段，对于自己在向占领者报仇，是如此地引为骄傲。她决不容许她的权利受到约束；至于我呢——我已让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行斟酌处理，而每天晚上当我又在我们的顶楼房间里看见她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无限的高兴。

原先一直为我们维妙维肖地仿制身份证的雕刻工失踪了。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他的作坊被严严地钉死了。他是躲起来还是被捕了呢？我独自咽下这丸苦药。使我感到庆幸的是，塔妮娅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位雕刻工，现在也没问起，我们偷来的那些证件，我是交给谁进行涂改的；不管怎么样，我充分保持着独自完成我自愿承担的任务的权利。阿达这个沉静的、不引人注意的姑娘，成了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助手。我把游泳衣送还给她的时候，终于把我借用游泳衣的目的告诉了她。当然，我只是恰如其分地讲了她可以知道的事。她是和一个组织在一起活动的；关于她自己的工作，她就告诉了我这么一点。我猜到了，这是个大学生组织。我们彼此都没有要求对方解释。她知道一些必要的地址，这都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产生了一种信念：那些“身份证”正在完成自己的使命。

塔妮娅戴着白帽子

秋天里，我才发现，塔妮娅总有什么事情。我怀疑她有了男朋友。有时候，她准备上街去，穿戴得特别细心，雅致得有些危

险。我记得她穿的是带白色阔腰带的淡蓝色连衣裙，白鞋，带面纱的白帽子。我头一次看见塔妮娅这身轻佻时髦打扮的时候，不由得吓了一跳。

我一直以为，我们俩——塔妮娅与我的生活和思想都是一致的。男人们，那是另一类人，是与我们不相同的人。这类人也许不是敌对的，然而，无论如何总是我们所完全不了解的另一类人。我们只是在大课堂里和他们有所接触，自从大学停课以后，对我们来说，这一类人就根本不存在了。我们这里有战争，有法西斯匪徒和恐怖，我们正在忙别的事情。有时我曾产生怀疑，我们举止这般审慎和严谨，是不是有些像贞尼①。其实，做到这种审慎在我并不困难。审慎正是我的天性，我的意愿。塔妮娅突然变得爱俏，使我感到不安。我本来想对她当面直说，看来她是喜欢独自行动的，但这可能对我们完成自愿承担的任务带来危害。我要说的责备和训教越多，倒反而越张不开口了。在塔妮娅轻佻地打扮得花枝招展离家而去的那些日子里，我总觉得自己束手无策，孤孤单单。塔妮娅自己没有对我作任何说明。不过，这当中，无疑牵连着一个男人。我几乎对此深信无疑，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塔妮娅突然对我们住所里的一个婴儿发生了兴趣。我们曾多次在楼梯上和孩子的母亲相遇，有一两次，我们曾不声不响帮她把摇篮车抬下楼去。可近来我们在楼梯上遇见抱着婴儿的母亲，塔妮娅却一下子忘掉了我们不应该和同宅住户交往的事。她凑到摇篮车跟前，把自己的手套和头巾给婴儿玩；让那戴着串珠手镯的小手抓她那柔丝般的头发；她还捏着嗓子，咿咿呀呀对孩子说些没有意义的、温存的妇人话。母亲对这种

① 指古罗马供奉贞洁女神维斯达的贞尼，她们立誓坚守贞操，违誓则将被杀害。

宠遇感到很愉快。她们谈起孩子来了。我呆呆地站着，竭力克制住满怀的激动。我不止是很乐意逗孩子玩，我心中还有一种自己也羞于承认的强烈愿望，我真想把小宝宝从小窝里、从襁褓中、从小被子里抱出来，紧紧搂在自己怀里。但我意识到这对我们是不允许的事；这样做无异于跨进了敌人的领域。每当看见塔妮娅和婴儿戏耍，我都不得不克制自己；我独自强装冷漠，不流露对婴儿的任何兴趣，因此，那母亲想必以为我是薄情的化身呢。不知塔妮娅背着我有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形啊?……

在一些没有空袭和炮声的黑夜里，我躺着不能入睡，听着塔妮娅的平静的呼吸，自己脑子里翻腾着遏止不住的滚滚思潮，想呀想呀，一直想到思力衰竭：我哪来的这种严谨和审慎呢，是我的秉性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战时的形势引起的？我甚至在女人当中也不愿意是个女人，那么，也许我对自卫的概念有所误解吧？或者我多少有点羡慕塔妮娅，虽然我自己对任何人也毫无所求。至于像塔妮娅那么轻率地就放纵了的那种感情，我却故意推迟到另外的时间，推迟到十分渺茫的"将来"……

自从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标的命令下达以后，塔妮娅就不再去听课了。她不再经常学习了。九月里，她在教授家里进行预试。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她没有考及格。我说这件事完全不是为了自夸：我自己的学习成绩也远不够光采，这一点不久就得到证明了。我缺乏知识竟到了那么不体面的程度，显然伤了教授的心。教授是个异常认真勤勉的人。我头一次使他失望了。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也欺骗了我自己。教授不时看看我，像是受了侮辱，可同时又含着慈父般的同情。他多半在想："是呀，战争。战争给姑娘们精神上造成了力不胜任的负担。"他终于认为我有一门考试及格，我很好地回答了古荷兰法学方面

的试题，差不多和从前一样好。

后来我对这次考试思考了很久。我既不惭愧，也不灰心。我觉得学习对我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些事情再也触动不了我的虚荣心了。塔妮娅的功名心比我更加淡薄；考试失败一点也没有使她气馁。她盘腿躺在沙发上，吸着烟，吐着烟圈；她已经不止一星期在练习这个技巧，因而我心想：你大概在学谁的样哩。

她忽然说道：

“汉娜，依我看，我该停止学习了……给自己灌了满脑子复杂的法律科学，可是我们周围却充满了白色恐怖和一片无法无天……这简直是活见鬼！”

我吃了一惊。她所说的，正是我隐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疑问。我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站不住脚的：据说，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战后的年月……塔妮娅笑起来了，她猛地一蹬长腿，离开沙发站了起来。

“战后的年月，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到那时候，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那时就该用另一套法典了。”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个儿高高、体态端正的塔妮娅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起来。

“将来是社会主义，”她说。“战后的世界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目前的战争，是反野蛮的战争。目的是争取全人类的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在百年前为着本阶级利益而制定的法律所宣告的那种虚伪的自由……俄国人很快就要起主导作用了。”

“这和俄国人有什么关系？”我问。塔妮娅停住了脚步，似乎要发火，可是她马上又笑了。

"汉娜，你这个可怜的知识分子啊！"她对我说。"你让一些陈腐的观念迷惑到了这种地步，除了以西欧为中心的社会以外，你就想象不出还有别种社会。你等着吧。这个中心要转移的。你且注意看东方。"

我越来越奇怪了：

"你说说，我的老天，你是怎么懂得这一套大道理的？也许有谁在开导你吧？"

我头一次向塔妮娅暗示了可能存在的第三者。她那秀丽的希腊型的面孔仿佛凝住了，可是立即泛起一片红晕。她用她特有的那种傲慢动作把头发往后一甩。

"不，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们沉默了片刻。后来我低着头，照例很不好意思地低声说：

"塔妮娅……你有男朋友了吧？"

她稍一沉默。然后快活地问：

"你看出来了？"

我点点头，仍旧没有朝塔妮娅看。屋里静极了，平常听不见的住宅里的一切声响，好像一下子都涌进了房间。塔妮娅走到壁镜跟前，背朝着我，从镜子里看着我说：

"是的。"

她没有说什么别的话。我不想也不能再细问她了。对于我的简单问题，她回答得也同样简单。现在，是不是对我说得详细一些，那完全是她的事了。我害臊极了，简直想躲得远远的。我听见塔妮娅用梳子在梳理头发。我们隔壁的房间里，又响起了小锤子敲击的轻微声音——这声音中断很久了。

塔妮娅终于开口问道：

“你认为怎么样，我这样做是愚蠢的？错误的？危险的？”

我窘得更加厉害了：

“我不知道……总之，这会儿我什么也没法对你说。”

她一面继续打扮着，一面坦率地说：

“我本该早就老老实实告诉你，不要等什么机会。我真糊涂，我心想，没有你，我自己也能对付……他要我暂时什么也不要告诉你。他是搞……地下工作的。他是个画家。和我们一样，也是大学生。不过他另外有更重要得多的工作……他甚至好多个月都没有拿画笔了。”

其实，这个消息对我已经不是新闻，可是毕竟使我大受震惊。我差点没脱口说出塔妮娅破坏了我们的信约。我想告诉她，即使万不得已要和自己的男朋友约会，外出也不该打扮得那么惹眼。但是我马上就理解到，她是女人，并且愿意做一个女人。我束手无策了，我觉得她和我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远。我看看她的脸，说得准确些，是看着她镜中的面影。塔妮娅转过身来。她那双丝绒般的眼睛，由于满含泪水，看上去几乎全发黑了。她向我走近几步，在我身边跪了下来。于是我做了一个以前从不曾有过的动作：我用双手搂住了她的脖子。

“汉娜，”她低声对我说。“没有他，我觉得这么孤单，孤单得可怕……”

我温存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我想我的眼睛里也噙着泪水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真是孤单的吗？那么我呢，我的友情呢？她是个女人，热爱生活的年轻女人。我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我生气了。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可是你怎么来解释这一点呢？而在此刻，当我感觉到我将失去她的时候，我又必须安慰她。

“要多加小心，”我说。“你不应该沉溺于这种事情，这会妨碍我们达到目的……我们没有权利信赖不熟悉的人。”

然而这都是一些空洞的官腔，我应当说的完全是另外的话。塔妮娅看看我，微笑着从地板上站起来。现在是她在温存地摸着我的头发：

“汉娜，我想，你连在没有幽灵的地方也看见了幽灵……我可是认得出自己人的！……”

“塔妮娅，”我警告说，“你只要记住，我是不会容忍可能妨碍我们工作的任何事情的，一丝一毫也不能容忍……”

她看看我，目光中含着惊讶，也可能是嘲笑。然后她旋动那细细的鞋后跟转过身去，走到镜子跟前，开始结扎头巾。

“我的工作进行得并不比你差，”她说话的声音里含着略微可以察觉的倔强。“你不用为我操心！”

她出去了。剩下我一个人，我明白我犯了个错误。我第一次因为塔妮娅流出了眼泪……

斯大林格勒……

当东线的战事全面展开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塔妮娅说的关于俄国人的话。

纳粹匪徒在斯大林格勒城郊被阻挡住了。

他们向伏尔加河进军，一路上杀气腾腾，战果赫赫。我们楼下人家的收音机，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这件事。我们则充耳不闻。法西斯的卐字旗渐渐接近伏尔加河了。在街道上和商店里，占领者们洋洋得意的脸上都闪耀着骄横的傲气；绿色队伍的脚步声中听得出这种傲慢，涂抹在驶往东方的列车上的刺眼的鲜

武标语中也流露出这种傲气。这种傲气也浮泛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几乎可以感触到，它在嘲笑我们在欧洲遥远的一隅所发起的抵抗，在嘲笑这狭窄的沿海地带，这荷兰人自古以来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子孙孙耕种着的土地。

突然，纳粹的战车不再向东方推进了。不错，它们是在行驶，不过是被俄国人打得往后退。它们再度推进，可又不得不再度掉头往回跑。在那遥远的东方，一股强大的力量升腾成汹涌澎湃的怒涛。德国电台大喊大叫自吹自擂的广播销声匿迹了。

电台在播放希特勒的演说。这一次我们也听了，这是非常稀有的事。给我们分发食物购买证的官吏，郑重邀请我们收听元首的讲演。每个人都好像预感到，我们马上就要知道某种有趣的事情了。我先前也听过希特勒的声音——一种尖细刺耳的、断断续续的、嘶哑而又自负的声音；并且这位元首常犯极其拙劣的语法错误。今天他的讲演却毫无生气，前言不搭后语。通篇讲演毫无说服力。除了为各个战线上的寂然无声而作的可怜的、勉强拼凑起来的辩解以外，就别无其他了。他用愚蠢透顶的谩骂猛烈攻击他的敌人，这些谩骂都消散在太空里了。每当他说出几句庸俗做作的俏皮话，他发表演说所在的大厅里就出现一片压抑的寂静。末了，他带着地方悲剧演员的那种慷慨激昂一口气说道："我们永远不会从伏尔加河后退的！"这个人大概不知道伏尔加河在哪儿流着吧？他的歇斯底里的叫喊湮没在一片乱哄哄的声音里，这是例行的瓦格纳乐曲声，同时伴随着如此狂乱的咆哮，活像一大帮野人的突然嗥叫。

我们的房东关掉了收音机。我们非常得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塔妮娅脸上神采焕发。我又想起了她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俄国人要起决定性作用了。中心正在转移。我似乎明白她是指

什么说的了。我们怀着新的团结友爱的心情动身回家了。

天已傍晚；宁静的寒秋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昏暗的街道上，有些地方起了雾，脚常常在腐烂的树叶上打滑。巡逻飞机高高地在我们头顶上轰鸣着——可是跟我们心中充满希望的欢歌比起来，这种轰鸣显得多么无力和徒劳！

“这不过才开头呢，”塔妮娅说。她又重复了几遍，同时笑得像个小学生似的。“汉娜，你记得斯大林最近说的话吗？”我当然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塔妮娅压低嗓音，像念咒语似地庄重说道：“斯大林说：‘庆祝就要在我们的街道上举行。’① 汉娜，你听清我的话了吗？这就是说，我们这里也会举行庆祝的，在我们的小街上，在荷兰……”

我抓住她的一只手，紧按在自己的心口上；我觉得我似乎又获得了从前的塔妮娅。我们反复阅读只要我们能弄到的所有秘密报纸上的报道。斯大林格勒！先前只是作为地理名称而存在的斯大林格勒，如今却拥有激动人心的效力了。近来我夜里常常睡不着。我们的小顶间里很冷。我们为准备过冬在节省煤炭。这是第三个战时的冬季了。“斯大林格勒”这个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黑暗的窗子的背景上，我用自己心中燃烧起来的火焰组成的字母拼写着这个地名。大批法西斯师团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找到了自己的坟墓，法西斯的狂妄在那里被埋葬了。塔妮娅怎么能睡得那么安详，这常常使我觉得奇怪。黑夜中躺在我们这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蜗居里，我清晰地想象得出，她睡在另一个角落里——双手垫着头，孩子似的放松了肌肉，嘴上带着微笑。她是幸福的，我也是幸福的。然而对于一种伟大转折的预

① 原话见斯大林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译文引自新华书店一九五〇年七月版《斯大林格勒血战记》中译本第一二六页。

夺去了我的平静。我想着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他们在争夺着一幢一幢房屋，一层一层楼，为每一座楼梯、每一个地下室战斗着……德国鬼子每一分钟都遇到障碍，他们自己士兵的尸体到处阻塞着他们的道路。纳粹匪徒只要占住一座建筑物，俄国志愿兵马上就向他们投掷大批手榴弹，把建筑物连同里面所有的一切一起炸飞掉。一队青年女狙击手守卫着一个工厂车间的废墟。她们消灭了数以百计的法西斯匪徒，最后自己也都埋身在废墟之下。塔妮娅不止一次地说过："社会主义的作战方式很快就要证实自己的优越性了。"这对我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但是在近来的一些夜里，我第一次像理解自己的生活一样清楚地理解到，世界上有两种英雄，而战争也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的。推动法西斯匪徒进攻的，是掠夺和破坏的欲望，是对上司应允过的分肥的追求，或者仅仅是慑于他们后面还有其他进攻部队。他们也自称为"英雄"。这些本是纵火者、杀人犯或强盗的人也自命为勇士。可是真正勇敢的却是另一些人：他们保卫着自己的国土，在战斗中有时要牺牲自己最宝贵的一切。他们是按另一种方式思想，按另一种方式生活，并按另一种方式去死的。我意识到了，纳粹匪徒进攻时所具的狂暴，其中包含着极端的胆怯、对人的蔑视以及对人的能力的低估。现在我明白"棍棒纪律"所表示的意义了。一切侵略者都想跨过大量尸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力量却在反对这种"棍棒纪律"的人们这一边，这种人是大多数。他们也在厮杀，因为生活要求他们这样做。我脑子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生为一个俄国人，如果我此刻正在战火炽烈的斯大林格勒，将会怎么样？

土伦[1]这地方也……

几场暴雨过后，降初雪了。这些日子，我们显得很激动，异常激动。实际上，自从那时候起，我们的激动就再也不曾平息过。然而，转折的时候来到了。我们对于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在俄国所有战场上，敌人整团整团被俘，整团整团在那里找到了归宿。

“德国的人民立刻就会明白，不应该欢呼着发动战争的，”有一次塔妮娅说。“德国人摇着旗帜，洋洋得意，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走上战场，到后来才发觉，他们手里拿的是丧幡。”

讨伐队在荷兰横行霸道。首先从沿海地区运走了三万五千居民，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留在原地。卑鄙的强盗行径！把人们赶出久居之地，还硬说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后来往那里派去一列接一列火车，劫运所有被抛下的财产，分发给德国经济遭到破坏的地区。为了在圣诞节能使德国商店塞满商品，荷兰的仓库全被洗劫一空。荷兰各个教堂的钟也都被盗去铸造杀害荷兰人质的子弹。然而，尽管如此，前面已经出现了希望，德国破产的影象已隐约可见了。

十一月初的一天，塔妮娅几乎是跑着上楼来。我正坐着学习；她在楼梯当中就喊了我一声，从她的急促神态上，从她的音调中，我知道她一定带回了好消息。我跑到门口去迎接她。她兴高采烈地一下子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

“第二战场，汉娜！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占领卡萨布兰

---

① 法国南部的城市，在瓦尔省，濒地中海；军港，有兵工厂，制造军舰。

卡① 了！”

乍一听，我还闹不清卡萨布兰卡在哪里；塔妮娅已经摊开秘密报纸。报上详细描述了美国在北非登陆的情况。大概这就是斯大林所要求的第二战场。我记得，当时我和塔妮娅在我们的小房间里跳了很久舞，一直跳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倒在床上才罢休。

德国鬼子发狂了。他们向法国人求援，要求帮助反对美国进攻摩洛哥，可这时候他们自己却占领着整个法国。卖国贼老贝当② 果然对美国表示了抗议。一如常见的那样，小坏蛋受了大坏蛋的骗。希特勒叫嚷着，要把法国舰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水兵们冒着法西斯的轰炸和迫击炮火，在舰上升起三色国旗，在土伦把自己的军舰连同他们自己一起沉没于大海之中，以此回答希特勒的叫嚷。我读完这条消息，不禁惊叹道：

“天哪……多么豪迈的英雄气概啊！”

塔妮娅似乎有点勉强地点了点头，并且带着藐视的神色说：

“英雄气概。不过是枉然。”

我诧异地看了看她。她拿过我手里的报纸，把这条消息又看了一遍，然后说：

“他们远不如在战斗中沉没，而不该演出这个悲剧。就是临死也该再揍敌人一个嘴巴。”

我明白她是在想斯大林格勒。我也明白她是对的。

---

① 摩洛哥西部的大城市，濒大西洋，是该国的商业中心和主要港口。

② 贝当（1856—1951），法国民族的大叛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政府首脑。他主持的政府对希特勒德国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签订了“德法停战协定”。

风　险

我在家里和双亲一起过了新年，元月初便回到了阿姆斯特丹。我勉强走到最后一座楼梯台，从这里再往上，就是通我们顶间的楼梯了。这时，有一个穿工作衫的摄影师正站在有泄水装置的水盆跟前。我本想只含含糊糊打个招呼，就像平时对常碰到的不很熟识的人那样，可是摄影师却挡住了我的路。他看着我，似乎有所期待；这使我有点紧张了。

"我想问问您……"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并朝狭长的走廊里退了一步。"您的那个女朋友……她是犹太人吧？"

我心里一哆嗦，冷淡地审视着他：

"您对这件事感兴趣吗？"

他有点着慌，不大满意地耸了耸肩膀：

"有一点儿……不过我是想预先提醒她和您一声。"

这时候他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了：

"我觉得她太不够谨慎了。昨天我们在咖啡馆里过新年。那里有很多艺人。您的女朋友和一个画家一起也在那里。我们正为这个人担心呢；他们俩的交往可千万别损害了他的工作……"

他没有再说下去，从我肩上看了一下楼梯间。走廊深处的黑暗使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说"我们"……这个"我们"是些什么人呢？我忽然想起咖啡馆，那庸俗的、拥挤不堪的咖啡馆，想到穿绿色和灰色制服的德国鬼子，想起吸引着座上客注意的年轻漂亮的黑眼女郎，还有她那不知名的男朋友，因为这个女郎的关系，他大概也引人注目——不过目光却是异样的……而这就是我的女友，我所信赖的女友！我看

了一眼摄影师，试图把话说得平静些。

"我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出什么事了吗？"

他似乎有点畏怯，犹豫不决地摇摇头：

"没有，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什么事也没出。您的女朋友和画家走得比我们早。不过我注意到，有两只灰老鼠——两个罗圈腿的矮子怀疑地盯着您的女朋友，时间很长。何况她打扮得太漂亮了，这本来就惹人注意。那两个矮子身边还坐着个刑警队的坏蛋。这三个家伙交头接耳，非常注意地盯着他们俩，依我看，简直是太注意了。"

他停了一会儿，有点吃惊地看看我。

"您别以为我过分看重了这件事。您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女朋友。我不过是想预先提醒一下。"

我默默地点点头，朝顶楼房间走去，而他仍旧站在水盆跟前摆弄他的一些小盆子。我已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才觉得我的膝盖在发抖。我坐在塔妮娅的床上，低声说着，好像塔妮娅就躺在床上，能听见我的话似的："塔妮娅……你的行为太冒失了……答应我，你永远不再这么做了。看在上帝面上，你答应我吧……"

大概我就这么坐了很久很久。我又听见这幢挤满了人的房屋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只是没有小锤子的敲击声。我觉得疲惫不堪。我在发抖，一来是由于神经紧张，二来是由于此刻整个顶间冷得就像个冰窖似的。后来我站起身来，决定进城去寻找塔妮娅。可是还没有走到房门口，我就意识到这么做是不明智的，于是我神经质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时候我想到，摄影师会听见我的脚步声。不应该让他们知道我在焦躁不安。关于他们，我知道些什么呢？我在炉子跟前跪下来，机械地往炉子里

填着刨花和纸。我发现手上滴着了眼泪，便猛地把炉子里的火拨得旺旺的。

时近中午，塔妮娅回来了，我一下子激动得脸都发白了。她随身带来了冬天的清新气息。她的双颊绯红，大张双手，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吻了吻我。我闻到了她身上的烟味，她头发里带着的室外的略含咸味的寒气，还有她那狂妄的冒险行为所留下的勉强觉察得出的痕迹。

“新年好，汉娜！”她说。

我也含含糊糊同样说了句照例的祝贺话。天晓得，新年里我对她还有什么没有祝愿到啊：首先愿她保住生命，保住那面临着危险的珍贵的生命。我轻轻地推开她。她笑呵呵地脱下身上的大衣，然后把手伸向燃着的火炉。她眼里闪耀着一种深情的光芒，她的眼神已经比语言说得更明白了。她忽然试探地看看我：

“汉娜，出什么事了吗？你们全家都平安吧？也许……”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来。心脏缩成了一个硬块。我爱塔妮娅，理应对她说实话。我刚一转过脸去，她很快就凑到我面前来。

“给我说说吧，说说！总有点儿什么事情出了毛病吧！”

我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出了毛病。你的事情出了毛病。昨晚上你出去，和你的男朋友一起，逗留过的那个地方，对你有生命危险！……”

她的脸变得阴沉了。她执拗地紧闭着嘴唇，脸绷得像个小孩子。后来她又转身朝着我：

“现在你有私人侦探了吧？就算我到过咖啡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我不去理睬什么侦探不侦探的，又接着说我的。

“我不知道你的男朋友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没有必要知道，也不想知道……可你总该是知道的。你们那算什么行为啊……我的天哪！”

我一口气说了这些话，嗓音压得很低，我吓得要死，生怕我们楼下和隔壁的邻居听见。最后，我又嘶哑地说：

“这也叫地下状态！你是在拿生命当儿戏！从今以后，我不准你再这样！”

塔妮娅皱起眉头，带着受了侮辱的神情望着我。

“这次的事情，我是偶然知道的，”我继续说。“只有天知道你干过多少次这类蠢事……当然，你是在天真地认为，小动物钻在狮子洞里最保险！……”

直到这时候，塔妮娅才完全气馁了，似乎醒悟到了自己的过错。

“汉娜，”她脸色吓得苍白，怯生生地说。“那地方我就只去过这一次。我对你起誓……想在人们面前露露面的欲望，头一次把我们逼到那里去了。他习惯于在人们中间。”

“在人们中间？你把黑市商人、骗子手、德国警察、形形色色的告密者也当做人吗？”

我越说越激动了：

“别再干这种事了，你懂吗？唉，天哪，难道还要我跪下来求你不成？别再干了！我不愿意你被弄到波兰去！”

寂静无声了。我们都感到窘困和无能为力，互相对望着。可是塔妮娅忽然泪如泉涌。她一下子扑到床上，双手捂着脸，抽抽搭搭地说：

“我没法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眼看这已经是战争的第三个冬天了。我日日夜夜都在为他担心害怕……我多么希望我们

能真正过过正常的生活，哪怕是一次也好……就算这是轻率也行！……我恨死了他们，恨死了！”

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我无力为我的女友分忧解愁。后来我用力摇了摇她。她止住了哭泣。我递给她一杯水。她喝着水，牙齿打着战，磕得玻璃杯直响。随后她又躺下，闭上了眼睛——她穿着精致华丽的连衣裙、长统丝袜和漂亮鞋子；浓密的头发披散着，覆盖了半边脸：显得这么文雅、匀称、娇弱。我看着她，我的心抽紧了。我好像觉得，她这是穿着结婚礼服躺在棺材里……

抉　择

孤单的生活是最难过的。这些天来，我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孤单了……

我浑浑噩噩过着日子。遇上了就随便吃点。常常很晚才睡觉。塔妮娅几次告诉我，说我睡得很不安静，有时候还说梦话。我警觉起来，问她我说了些什么。塔妮娅笑了：

“别担心，你那些胡话，只有精神病专家才会认为有意义。”

“可是我不认为精神病专家的话有什么意义，”我说。

我们都笑了，但是我明白，不管怎么说，长期的孤单已经使我的神经系统相当衰弱了。说实在的，只有当我想伸直身子躺在床上并且按照老习惯（熟识我的人们说，这是个坏习惯）“好好想想自己”的时候，我才停止学习。有时候也取过一本塔妮娅的书来浏览。自己的书，除了海涅和里尔凯的作品外，我觉得都很空洞乏味，所以我心安理得地把它们扔在满是灰尘的角落里了。我感兴趣的是塔妮娅书橱里的一些俄国长篇小说译本：《水

泥》、《静静的顿河》、《母亲》……一些新的名字深深地印入我的脑子：肖洛霍夫、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然而事情不仅如此。这些书给我描述了这样的人民，他们奋不顾身地打击希特勒匪帮，保卫着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我需要更多更多地了解他们……我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和小册子，阅读关于集体农庄、民族政策、五年计划和电气化的书籍。我读过的书当中，有许多内容已经忘了，远远不是所有东西都同样使我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人，是摆脱了迷信和愚昧无知的深渊，正在攀登知识高峰的亚洲人民的命运。我感兴趣的是从前受压迫和剥削，而如今忽然显示出自己的艺术才能或研究才能的人们的命运；是终于觉悟到自己的人的尊严，摆脱了奴隶枷锁的妇女的命运。我读的书，有描写五金工人的，他们后来成了红军指挥员。有描写农村小伙子的，他们后来组成了骑兵师。有一个家庭主妇的际遇更值得称道，她在一九一七年以后生平第一次读到朱里·恺撒① 的传记，这时候她才非常吃惊地认识了过去，她开始学习，现在成了莫斯科大学的教授……这些先前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命运吸引了我，革命把他们推向了生活的顶峰，使他们发挥出履行往昔与己无缘的使命的才干和能力。我明白了，或者说得准确些，开始明白了社会主义是什么。

在我们家里也常谈到社会主义。父亲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他对我讲过游行示威、罢工和“红星期二”②，讲

① 朱里·恺撒(前100—前44)，罗马杰出的统帅、政治家和作家。他的作品现存的有《高卢战纪》、《内战纪》。

② “红星期二”——九月的第三个星期二，——议会开幕日。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九一一年在海牙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那次游行示威由荷兰社会民主党组织，要求普及包括妇女在内的选举权。

过他直接认识的特鲁尔斯特拉①和维包特②。他的讲述，在我听起来，总觉得像是对社会主义战士们的颂歌。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斗争的目标和方式已经改变了。父辈们的斗争，如今已经被忘掉了。那种斗争，似乎已被埋葬在剥削者所施舍的一星半点的庸俗安乐之中，而这不过是剥削者在对抗议已不能置之不理的情况下被迫对部分被剥削者做出的施舍。若是我把这些想法对父亲说，他大概也会和我有同感的。不论是父亲或母亲，从不曾对我施加过任何压力。他们给了我走向生活的权利，然而跨越大学的门槛，意义就不同寻常了。他们无言地告诫我：要善于独立思考。我早已经明白，人类肯定将要以不同于我们目前的另一种方式来生活，尽管有许多人认为目前的生活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未来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呢？是怎样的呢？这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也闯进了我的微不足道的生活。

这就是共产主义。

我认识到，共产主义，这是本世纪、是当代、是我们同时代人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也理解，的确，虽然心里暂时还有一些抵触和不满，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到来的，它是建筑在事物本身性质基础之上的，并不因人们，其中也包括我，是否抗拒、憎恨或害怕为转移。我明白，问题在于，我们中间最有头脑的人应该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促进和加速共产主义的到来，还是犹豫不决、动摇怀疑，拖延和推迟共产主义的到来。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的行为必然会使过渡时期本来就存在的各种有害现象和困

---

① 特鲁尔斯特拉，皮帖耳·叶列斯（1860—1930），一八九四年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起初持左派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但过了几年，这个党的领袖们便滚到改良主义方面去了。

② 维包特·弗·莫（1859—1936），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机会主义者，一九二二——一九三五年社会民主工党议会派主席。

难增多……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甚至不用我插手，抉择也已经定了，我能做的，只是表示赞同或拒绝。

然而，正当我们处在反法西斯防卫斗争的紧张时刻，我是不是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反复思考着，直到有所明白为止。无论我试图多少安心读点书，或是无所用心地在城里随便走走，我面前总是一再出现一个仿佛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紧迫问题：你能不能和共产主义步调一致？

在我们祖国，在世界各国，人们都正在为反法西斯而战。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不一定必须是共产党员。法西斯主义正在一无例外地摧毁原有的一切，以便就地建立其恐怖统治。他们回到了中世纪，又用上了皮鞭和拷问架，不过他们更倾向于战争，而且拥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装备。他们把历史倒退到了欧洲最黑暗的荒凉时期。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像已经看见了共产主义明天的人们那样反抗着法西斯。他们是斯大林格勒的女青年狙击手们；用手榴弹打退坦克的红军战士们；用燃烧瓶烧毁德国汽车运输队和铁路列车的游击队员们；把整座整座的工厂转移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而且干得比从前更加努力的男女工人们；发明了使德国鬼子无法招架的武器的技术人员们。还有列宁格勒的妇女，她们的城市正陷于法西斯匪徒的包围之中，大家头顶上爆炸着炸弹，而且正受着饥饿折磨，可她们仍在为保卫城市的丈夫和儿子制造弹药……还有在苏维埃国家及其国土之外——在法国马基[①]队伍里，在挪威和丹麦抵抗运动的队伍里的共产党

① 当时法国反抗希特勒侵略者的一支游击队，因为他们经常隐蔽在叫做马基的常绿灌木丛中而得名。

人。就是在我们荷兰，他们（这连孩子们都知道）也组织了二月大罢工，这是西欧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法西斯行动。

所有这一切思考弄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必须好好深思，了解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了解其中出现的变化。我必须仔细考虑一切，以便最后能不偏不倚地客观地理解这一转变的实质。我深深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我明白，这是面临陌生事物时十分自然的恐惧。这是你站在你一无所知的房间门外，房门尚未打开，你也不知在房间里将会遇到什么人和什么事的时候的那种踌躇。而我，一个所谓有学问的女子，正是在思考着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一切。当我阅读塔妮娅小书橱里大大小小书本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头脑只学会了理解某些特定的事物，而对其他事物则根本不能理解，而自己却无力来克服这种现象。我觉得，我的头脑已习惯于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这个范围里的人眼光狭隘，只能看到极其狭窄方面，因而他们惯于相信，在这个狭隘范围之外不存在任何值得重视的东西……

我一次也没有在塔妮娅面前提过“共产主义”这个词。然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些先前所没有的东西，把我和她联系了起来。这就是感激之情，某种精神上的亲近，共同的认识。

孤单生活的日子渐渐排除了痛苦的忧郁。我身上仿佛出现了一种新的感觉器官，它能把奋战中的遥远东欧发生的事件的真相翻译成我的世界和我的国家的语言。因而，当我思想上已经甘愿接受新事物的时候，那些课程提要和课本对我更是毫无意义了。一行行文字仿佛都在我眼前黯然失色了；我自以为是学问的东西，原来都是旧世界的无用的和形式上的标志……当我开始明白，我必须在正在消亡与已经临近的两者之间作出抉

择的那些深夜，我大概说了从来不曾有过的那么多的梦话。如果说塔妮娅也听见过我自言自语，那么她反正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就像没有那么回事。

危　险

一个沉寂、郁闷的二月的晚上，我从家里出来，正要去我跑熟了的那个地点——我常到那里领取食物证，然后分发给应领的人，这时候，我们小运河的堤岸上聚集着一群人，都在朝对面看。我一眼就看出了危险：那里停着一辆警车；屋子里正在进行搜查。他们在搜寻什么呢？是人？是文件？还是秘密印刷机？屋门口站着个穿绿制服的蛮横无礼的家伙，他张着两只胳膊，大叉着两条腿，朝看热闹的人们直嚷："走开！"我好像冻僵了，缩成一团站了一会。我的心吓得突然跳起来了，这种恐惧我从前还没有体验过。危险逼近我们了。真的，在此之前一直远在他方的危险，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街上。危险暂时还在旁边，可是它只要一跳，就会追上我们，钻进我们的顶间……我的牙齿打起战来。我忽然想起两年前初次发生虐犹暴行时我所看见的犹太人街区：密集的警察包围了街区，他们踏着大皮靴，叫喊着给自己助威，纷纷闯进一幢幢房屋。我记得有几个人在绝望中当即就翻窗朝街上跳。

从那时候起，逮捕和屠杀开始了，可以说一天也没有中断过。我清楚地想象得出，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些最残酷、最黑暗的世纪里，犹太人始终到处遭到无情的驱逐——从巴勒斯坦到巴比伦，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波兰。而现在，今天，犹太人又遭到驱逐——从荷兰，从三百年前就让他们在这里藏身的荷兰驱

逐出去……“塔妮娅！”——我立刻也想到了她。不，他们抓不到塔妮娅！

于是我没有去领食物证。一刻钟以后，我回到了家里。对面的警车已经开走了。家家户户全都显得十分宁静，仿佛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就像我们所住的房屋一样。我跑上楼，连大衣也没有脱，就直奔书架。我一本不漏地把所有的书籍翻了一遍。法西斯匪徒当中，有不少没有文化的、缺乏教养的青年，对于任何书籍都不感兴趣的傻瓜。不过也有一些希特勒喽罗，他们很清楚像高尔基和列宁……这样一些名字意味着什么。我似乎看见，穿绿制服的警察已经在我们的顶间里搜查。我在十分钟内把书籍分好了类。我把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和五本俄国长篇小说塞进小提箱，把小提箱推到我的床底下。

塔妮娅回家（这已是午后）以前，我已经把书送到了阿达那里。她收藏起我的小提箱，还听了我的叙述，她脸上的表情始终是平静和耐心的。她踌躇了一会。

“塔妮娅可以搬到我这里来，”她建议说。“不过最多住一个星期。我预料以后会有一些……别的客人。也许，一个星期内，你们能够给她找到新的住处。找一个最普通、最俭朴、最偏僻的人家。”

“我的阿达多么难得啊！”我想着，踏着自行车，心里觉得又聚积起新的勇气。塔妮娅回家以后，我对她讲了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我看见，她一开始非常恐惧。她带着很听话的样子默默地坐着——可我本来预料会碰到激烈的抗议哩！看来，她终于认清了已经两次紧紧逼近她的危险。因此，我没有怎么费事就说服了她迁离此地。

当天晚上，她就搬到阿达那里。

我暂时留在顶间看守我们那点微薄的财产。我苦思了好久，到哪里给塔妮娅找个住处。我心里逐一考虑着我们的同学。有许多人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甚至连露伊莎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阿达对我说过：必须找一个最普通、最俭朴、最偏僻的人家。就是说，她的想法正和我们那位摄影师的想法完全一样。我一直翻来覆去寻思着，忽然想起了双亲的住宅。可是我立刻又放弃了这个念头。我不能给父亲和母亲招惹麻烦。父亲应当得到休息。母亲有心脏病。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学习，更准确地说，无论如何得完成学业。不行，这个方案根本不适当。

但是后来我又回到这个念头上来了。我的父母也都是爱国者。他们也痛恨纳粹匪徒。他们对我的请求不会表示冷淡或者不满的。可要是提到我今后的学业呢……不久前风闻法西斯匪徒将强迫大学生具结，保证效忠于纳粹政权。这不就是等于说，高等学校的学生都得跑光，学校甚至都要关门了吗？就说我自己……难道我真的还想上学吗？

我又放弃了这个念头，随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念头上来。

……第二天早上，我已经来到双亲身边。母亲在熨衬衣，父亲出去散步了，雨也终于停了。我对母亲申述了自己的理由，所费的时间如果不到整整一小时，也有三刻钟。我仿佛在为一件明知无望的事情进行辩护。我甚至不让母亲有说话的机会。她只是偶尔用她那聪明的灰色眼睛看看我。她从没有见过我这么多话。我说完辩护词以后，心想："多么愚蠢！"我把所有关于塔妮娅的一切一股脑儿全说出来了，要是在别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对自己的父母说的。我默默地掏出一支香烟。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母亲的通情达理的、平静的声音：

“我的孩子，用不着费这么多口舌了……我得告诉你，对于退休之后的晚年，我们本来另有想法，并没有想过要掩护转入地下的犹太姑娘们。是呀，我们没有想到会是我们眼下这种生活。可是阴暗的影子临到我们头上了，那么我们必须互相帮助……如果事情急迫的话，那就让她们搬来吧。”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高兴得不知所措，竟忘了去吻吻妈妈。

“你是说‘转入地下的姑娘们’吗，妈妈？是复数的？”我很惊讶地问道。

母亲关了电熨斗，在椅子上坐下来，把额上的一绺头发撩开，说道：

“当然。尤迪菲情况到底怎么样？难道你们打算让她听天由命不成？”

我满心欢喜，这时父亲回来了。可以听见他在后门口擦鞋底上的泥土。我跑进自己小时候住的房间，好让母亲把事情告诉父亲：有三个女大学生想住到他的家里，而且其中两个将要在这里隐蔽下来。

过了半小时，我下了楼，看得出来，父亲已经全知道了。他亲切地同时又是庄重地迎着我，他对我这样和蔼，这样温存，使我感觉得出：他已经接受了我们在这里住下来的计划。他那关切的神色中，透露出他内心的满足。我明白，父亲很高兴我能够回到双亲的住宅里来，虽然这是因为国家被占领以及恐怖逼出来的。

法制原则

我没费多大的事，就使尤迪菲相信她和塔妮娅必须搬到哈

勒姆去的道理；可是我发觉塔妮娅有点犹豫，甚至还有一点没说出口的不满情绪，不过她很快就克服了。当然，她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这样她就不得不暂时和自己的男朋友分手。

我们很快就搬到了哈勒姆。我又住进了自己儿时的小房间，完全和我上中小学的时候一样。顶楼的大房间腾给了塔妮娅和尤迪菲；父亲吩咐赶紧给她们安排好躲藏的地方。过了不久，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新的生活是正常的，正如我们能够逃出法西斯的魔掌，保持着人身不受侵犯和独立自主的假象，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一样。我又漫步在我故乡城郊宽阔的街道上，骑自行车兜风，遇见熟悉的面孔；我又看见了哈勒姆公园里山毛榉和橡树间的林荫道，看见花园别墅，雷诺广场、市政厅大厦，熟悉的难看的劳伦斯·杨斯佐恩①纪念碑，教堂侧廊旁边小得像玩具似的古董铺；我又能听到阵阵海风淹没不了的教堂的柔和钟声了。所有这一切，我也都觉得似乎是正常的。

然而，我知道这一切绝非正常。再没有什么正常的东西了；现在不能用往日的眼光和往日的感觉来看待任何事物了。塔妮娅老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地看书，弄到烟就不住地吸，她正处在她所不习惯的而且是有害的闲散状况。尤迪菲照旧钻研学术，以此自慰，虽然最后的成果现在离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遥远。我也在学习。一切现状都带有临时的、不稳定的性质。这是一个充满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春季。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袭击荷兰纳粹分子和他们的W．A部队②以及其他卖国贼的事件层出不穷。人们把德国兵扔进水里，趁黄昏时刻在公园里和城外大

① 劳伦斯·杨斯佐恩·考斯脱(十五世纪)——据荷兰学者阿德里阿努斯·尤尼乌斯的考证，是印刷术的发明人。

② 荷语Weerafdeling的缩写，即荷兰法西斯国家社会党的武装。

路上杀死德国兵；刺破德国汽车的轮胎，切断电话线。城里的一个一个街区常为此受到罚款处分。一个干脆姓了个德国姓的，被提升为荷兰党卫军团将军的荷兰军官，也在自己家门口被抵抗运动的勇士打死。阿姆斯特丹的职业介绍所起了火。纳粹匪徒进行了报复，他们残暴地搜捕青年工人和大学生，判处死刑，活活拆散一方为犹太人的夫妻，而且无情地把犹太人遣送到波兰去，加以监禁和折磨。而我们却蹲在自己家里，平平和和，不去招惹任何人；我们窗外的小花园返青了，运河的流水静静地闪着微光；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周围都有狂风骤雨肆虐的小孤岛上。暴风雨阵阵不绝，回声透过了我们家的墙壁；我们不得不掩饰彼此为对方担忧的心情……

我渴望着开始干事。在阿姆斯特丹我曾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自己掌握的一些通讯处告诉别人。回到哈勒姆，在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些为转入地下者提供经费和食物购买证的人。于是我又准备为战俘们做传递工作，虽然这种工作的范围随着食物定量的缩减越来越缩小了。不过这并不是我所神往的那种工作。我仍然在钻研学术，以便有可能通过国家考试。出于对父亲和母亲的责任感，为了不辜负他们原先的种种期望，虽然我心里认为往事已经死亡并已经被埋葬，我还是按照老习惯，像个老学究似的在进行认真准备。所有的大学实际上都已经关闭。德国人要求大学生必须办理保证效忠的具结手续，这无异于锁上了学校的大门。但是教授们仍在暗中主持考试——很像暴风雨中的小蜘蛛，徒劳地试图抢救它们原先结的蛛网。三月初，我到阿姆斯特丹去会晤我那位心地善良的唠唠叨叨的教授。我给他写过一张明信片，说我将带着全部“随身之物”在中央车站等候他。他在头等车候车室对我进行考试；我们一边用小木条搅

着稀薄的热的代用咖啡，一边喝着。这咖啡里掺有带酸味的奶粉。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坐着一些德国军官。他们不时看看我们，显然并不明白两个奇怪的人所进行的奇怪的谈话。我们俩一个是白发蓬松的男人，时常把眼镜摘下又戴上，不断看着自己的笔记簿，在上面做着记号；一个是栗色头发泛着火红光泽的姑娘，一皱眉头，鼻梁上就会出现细小的皱纹，正压低声音在做冗长的说明。我果然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随身之物"：考试合格了。

奥丹教授把自己的文件放进皮包的时候，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我疲倦了，种种矛盾的感情激动着我，不过最强烈的是想哭，哪怕稍微哭一阵也好。我回想起进大学的头一年，我带着狂喜和自豪的心情投向学习，回想起那庄严的讲堂的魔力，我们学术辩论会上诚恳动人的认真态度，回想起当时的同学们——阿达、露伊莎、其他许多我差不多已经忘记的同学们……作为一个十分年轻的大学生，我曾热烈向往着这个伟大的时刻——迈向取得硕士学位的第一步。如今已经完成了这一步。是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完成的。可是荷兰到处都有逮捕和死刑……塔妮娅和尤迪菲早已经被迫割断了和学习的一切联系，而我也只不过到今天才费力地对付过去了。我之所以能如此，不过是因为我作为"阿利安人"①，处于特权地位。我感到痛苦和厌恶。教授看了我一眼，问道：

"怎么样，斯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博士学位考试？"

我尽力不看他的眼睛，不去注意他那勉强装出来的高兴，我说：

"我不学习了。"

他把粘满了混浊沉淀的杯子从自己面前推开，问道：

---

① 种族主义者，尤其是法西斯主义者认为阿利安人是"高等种族"的代表。

“我希望，您不会丧失勇气的吧？”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要我直言不讳，不过我仍然说：

“我有别的事情……”

他惊讶地看了看我，摘下了眼镜。随后他又把眼镜戴到他那窄窄的、特别高的鼻梁上，用平静安详的声音缓慢地说道——他用这种声调说话，显然是在鼓励他自己。

“可这……明智吗？”

我耸耸肩膀。接着，我压低声音回答说：

“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是明智，什么是不明智……斯大林格勒的居民，在自己城市的废墟上进行保卫战的时候，他们可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他慢慢地摇摇头，看样子，我的话使他不愉快。

“斯大林格勒远得很呢，”他说道，声音也像我一样轻。“我们的思维方式可是西方的，斯小姐。俄国人，这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另一种民族。”

这时候，我才头一次愤慨地看了他一眼：

“难道您以为俄国人没有人的感情吗？我们的抵抗运动战士们的感情，我们大家都有的这种人的感情，他们就没有吗？”

教授沉默了。我从来没有责难过他。相反，在他的权威、名望和学识面前，我总多少有些胆怯。

“我不知道什么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我继续说，声音竟意外的响。不过我立刻又把嗓音压低了。“那您怎么给法西斯的思维方式下定义呢？您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所特有的吗？”

教授用阴郁和不信任的眼光看了我一下。

"您成了带侵略性的人了，"他慢腾腾地说，仿佛是在替自己辩护。"如果您也挺身去冒险，我将会感到说不出的伤心：我非常希望，妇女和姑娘们能避免这种危险……"

他的话使我激烈的情绪略微平息了些。可我仍然想要反驳他。其实教授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倒是他讲的一句可悲的陈词滥调激怒了我。我宁愿中止我们的谈话。可是我又不愿意在误会没有说清楚，彼此的激愤都没有消除的时候就这么分手。我使劲地克制着自己，说道：

"教授，您曾教导我要尊重法制原则。可您也该理解，我要捍卫法制原则，不只是在口头上或者在我书房的墙壁上……当事情涉及到祖国的时候，我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问题是不存在的。重要的只有一点：法制能不能维护……"

他有点特别地看了看我。他脸上的表情不明朗，难以捉摸，好像缺乏足够的意志和力量来集中自己的思想。他叹了口气。把一只干枯如纸然而骨骼粗大且相当有劲的手朝我手上按了一下："Fata viam invenient…… 劫数难逃啊。"勉强可以听见他在低声地说。我觉得在这句拉丁成语里隐含着深深的不安和无可奈何的同情。他握握我的手；显然，我所交往的人，我和他的谈话，都太使他感到不安了。我甚至觉得这很使他难堪。他戴上自己褪成红褐色的宽边帽，拿起皮包和手杖。然后又握住我的手说："我的孩子……"

看样子，他还有许多话要说：不知是劝我多加小心，还是表示自己的敬意，或者只是说声"再见"，或者对我表示什么祝愿。然而他很快地转过身子向出口走去了。他那高大的身影显得十分持重，但是四年来我已经熟悉他了，我揣摩得出，这种持重明显地掩藏着他的软弱。

塔妮娅渴望自由

为了庆祝考试的成功，妈妈安排了一次庆祝盛宴，这当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这个举动也体现出，妈妈正力图使大家觉得，一切都过得好像是正常的。父亲居然买到了一只兔子——这是有人在禁区的沙丘上用套索捉到的；这次还有一瓶真正的酒。我们被眼前的家庭舒适、天伦之乐这种假象陶醉了两个来钟头，对笼罩在我们生活之上的惨淡阴影故作不知。连塔妮娅也像从前一样无拘无束，兴致勃勃，笑声不绝，她双颊绯红——可能是喝了酒的关系。

然而，塔妮娅的快乐是短暂的。每到晚上，我们五个人都坐在窗帘拉得严严的客厅里，她总是拿着一本书躲在角落里。可是我发现她很少真在看书。有时候她修修指甲，有时候干脆紧皱着眉头在思考什么；她那消瘦的脸上的两只眼睛总是朝下看——避免和我们的目光相遇。我不安地注意着她。父亲和尤迪非常下棋；每一局都是那么严肃认真，有时候要连续下几个晚上。双方都表现出异常的顽强、机智和善变。我从来没有下棋的耐心！

时值早春。天气温和。我们屋前的草丛里开着些番红花——有白的、黄的和淡紫色的；栗树抽芽绽叶了；太阳显得那么高，那么超脱，好像下决心不理睬人间的丑恶行为似的。在一个这样的金色黄昏，塔妮娅、尤迪菲和我像平常一样到外边散步，塔妮娅沉思地说：

"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季节，从前这里有多好啊？可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春天的甜美和芳香了。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好像已

经灌进了毒气……从前这个时候，我们都开始骑马了。”塔妮娅指着远处一溜沙丘。“就在那里，布隆缅达城外，我们举行真正的steeplechases——越障赛马……”

于是她越发津津有味地对我们讲起这种竞赛来了。我一面听，一面想象着那些无忧无虑的男女骑手，沙丘上的野餐和有钱人的其他种种消遣。可是我觉得，塔妮娅此刻所想的未必是骑马和沙丘上阳光灿烂的那些日子。她惋惜的并不是丧失了的特权，而是失去了的自由。她讲的是布隆缅达城外的沙丘，想的却是阿姆斯特丹，是和男朋友的别离……我心中又微微不安起来了。我不敢说穿她——一说穿就意味着火上浇油。这一点，我甚至对父亲和母亲也只字未提。我正在考虑我能为她做些什么。谁知她却赶在我的前头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平日一样，出去分送食物购买证和钱。母亲到一位她常见面的老同学家去作客了。等我回到家里（这已经是饭后了——我总是随身带着夹心面包，通常就在路上吃），父亲迎到前厅对我说，他躺下打了个盹儿，不料就在这时候，塔妮娅不见了。父亲用歉疚的、几乎是请求原谅的语气告诉我这件事，似乎他玩忽了自己最神圣的职责。我非常吃惊，可是我没有责怪父亲。父亲为自己的疏忽深感痛苦，就那么缩着脑袋站在走廊上，我却心神不安地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去。在那腾出来给她们躲藏的房间里，尤迪菲照常坐在小桌旁边看书。我冲进房间，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看见她这时候还若无其事地在搞自己的事，我不禁冒火了。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把她从椅子上拖起来，搡着，摇着：

“塔妮娅在哪里？”

她默默地看了我一会，最后才明显不乐意地回答说：

“在阿姆斯特丹。”

我又摇了她一下；我甚至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感情在更强烈地支配着我——是愤怒，还是悲伤。

“仁慈的上帝啊！你就不能制止这样的事情吗？”

“怎么制止呢，汉娜？”尤迪菲申辩说。“你也了解塔妮娅，知道她固执、莽撞。我劝她遇事要理智些，劝得够多的了。她连听都不要听。”

“你应该奔到门口去喊父亲回来呀！”我说。“你们一起总可以对付得了她吧。”

尤迪菲没有再说什么，低下头哭起来了。这时候我才放开她，她悄悄地揉着自己的肩膀：我把她的肩膀抓疼了。我也难为情了。我知道，过错全在我身上。应当打的是我自己。难道软弱胆小的尤迪菲能看守得住生性激烈的塔妮娅吗？塔妮娅总是什么样的莽撞事都做得出来的。我嘟哝着说：

“原谅我吧……我对你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我自己再稍微聪明些就好了。”

我下了楼。不久母亲也回来了。父亲把塔妮娅逃走的事对母亲说了。妈妈的惊惧可把我们吓坏了。她用手紧紧捂住自己有病的心口，脸色白得可怕，艰难地落坐在桌旁的椅子上。父亲出门买治心脏病的药去了。我急得不知所措，只是傻等着母亲自己缓过来。母亲这时候表现出了她意志的力量：心脏病的发作不久就过去了。

我赶紧说：

“我上阿姆斯特丹。去找塔妮娅。”

父亲跟在我后面跑到走廊里。我已经从衣架上取下风衣，很快地披在身上。他把那忧虑的、多皱纹的脸稍稍凑近我，问

道：

"你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塔妮娅吗？"

"差不多。"

"你记住，"他接着说，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又令人感动，"我们是不愿意让你去冒险的……"

我什么也没有说，匆匆吻了一下他的前额，便出了家门。无论是人群、街道、小花园里的春色、房屋，我全都没有理会。我正设想着处罚塔妮娅的一个个办法。于是我马上打定主意，只要她能平安无恙地回来，就全都原谅她，

我一出哈勒姆车站就找到了塔妮娅。我一发现她，就迈开大步向她走去。她看见我，笑了。她的笑容是这样开朗，这样能制服人，而她自己看来又是那么幸福，好像什么过错也没有犯，弄得我满腔的愤怒一下子全消失了，让位给了讨厌的难堪。我放慢了脚步。她走到我跟前，装着讨好的样子，把一只手伸到我的胳膊肘下，说：

"汉娜！"

"塔妮娅！"我略微压着嗓子说。接着我别转脸问道："你说说，天哪，你怎么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呢？"

她快活地回答我，并且又带点儿讨好的神气：

"是啊，我知道，我应当请求宽恕……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她亲切而高兴地笑起来。"我这样做，的确不是存心惹你们烦恼或者破坏你们的生活。我不过是要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

"还有和男朋友见见面，"我苦恼地补充说。她的快活越来越激怒了我，我原来的难堪也不知去向了。

塔妮娅点点头。她看看要塞围墙上的嫩草，薄暮中青草正

散发着毁灭不了的潜在生命的气息；看看变幻着的宛如锦缎的碧空，空中正拖着一缕纤细的云丝。忽然间，我自己也看见了塔妮娅眼中的四周情景——我看见了暮色，看见了大自然，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我不再愤怒，不再痛苦，不再胆怯；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奇异的忧虑。塔妮娅握了一下我的手，她大概明白了我的心情。她依然那么爽朗，可是含着严肃的意味对我说：

“汉娜……我向你保证，我还会做个听话的人，就是现在也已经做了好久……”她压低嗓音继续说：“我已经充分地享受了自由。现在我又要蹲到我们的禅房里去了。”

我们在无言的和谐中手挽着手回到家里。父亲、母亲和尤迪菲都坐在桌子跟前。我看见妈妈很想对塔妮娅做一番严正的责备。她当然有权这样做。我一直给妈妈做手势，挤眉头，要她别作声。妈妈果然没有开口，可是她含着责备的神情看着我，并且和其余的人一样对我的态度感到奇怪。我自己也觉得惊讶。他们大概是这样来理解我的举动的：塔妮娅平安归来使我高兴，因此我一切都原谅她了。可是我知道，问题不只是在这一点上。我明白，我自己沉默，并且迫使别人也都沉默，是因为考虑到塔妮娅那短促的冒险的幸福，考虑到她那充满危险的生活。塔妮娅又无力摆脱这种生活。

往日的创伤

在这些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头一次比较详细地和塔妮娅谈了我读过她的一些单行本以后的感想。起初我多少有点犹豫：同平时一样，我碍于自己的羞涩，仿佛我在某种程度上泄露了暂时只关系到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塔妮娅听我讲着，从她

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觉得我的话可笑，虽然她并不想笑我或戏弄我；塔妮娅不过是感到内心满意：在重要问题上从不动摇自己的见解，既继承了祖先智慧，又牢牢掌握了书本知识，一贯显得聪明绝顶的法学家汉娜·斯，如今竟然试图对世人和社会作出新的估计了。我早已知道，我们姑娘们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的出身和教养所造成的结果。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但是，当塔妮娅给我解释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总是感到满足的，虽然我明知塔妮娅在某一方面的判断要比我更正确。令人惊奇的是：我的观点现在有了转变，是多亏了她这个银行家的女儿，社交界的姑娘，况且我还和她在一个房间同住过几年呢。我常常觉得，直到现在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塔妮娅。

我不禁想起，有一次，我曾和塔妮娅争论个性自由的问题。她发言的尖锐程度，使我联想起了她在我们大学生联谊会的辩论会上几次发言的傲慢口吻。

"你要这个个性自由干什么用？"她问我。"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做一个自由的人，你得有时间和金钱……这也就是大多数人所缺少的东西。也许，你所指的自由，正是人家经常对我们宣扬的那种自由吧？那是口头上的自由。没有权利自由地把言词变成事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诡计多端，依仗权势，用尽一切欺诈手段向上爬，以求飞黄腾达——就像所有这类'权威人士'那样；德国人的伟大元首和他的仆从们便是其中最出色的标本！因此，不言而喻，在我们这里，共产党人现在不可能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个性自由！"

看来，塔妮娅又充满了那种情绪，从前每当她规避我们姑娘们的争论时，我常常在她身上发现这种情绪；要不，也许她是想

在我面前用优越的表情来掩盖自己的脆弱吧？现在我已经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她的心情了。

我怯生生地反驳她说，共产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专政总是意味着一部分人不能享受自由。

塔妮娅轻蔑地、甚至有点做作地笑起来了：

"老实说，你是在对什么人表示同情呢，我亲爱的汉娜？同情造枪炮的老板、将军、保皇党人、骗子手、叛徒、大窃贼……或者甚至同情法西斯匪徒吗？不错，共产主义是会压迫他们……而且甚至非常厉害……我以为你的理智足以了解，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专政。制裁人民敌人的专政，是为了人民、为了绝大多数人的专政。这就是你显然感到恐惧的那种专政。是不是因为这种专政正在消灭茅草棚，消灭疾病和贫穷？因为它在扫除文盲？因为它在教导工人和农民读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和海涅的作品？因为它在结束被压迫民族受奴役的地位？因为它确定了要像惩罚犯罪行为一样惩治种族歧视？因为它要把妇女从闺阁和厨房里解放出来，使她们成为工程师、医生和部长？或者是因为……嗯！……"

她的神色突然严肃起来，她沉思着，甚至有些阴沉。这一瞬间，她的心和我贴得这么近，近得使我觉得我已经了解她此刻的心事：这个幸福的现实已经存在，可是离我们很远，在我们的城市和荷兰境外，和我们隔着几天路程的距离，在飘着卐字旗、由疯子和佩戴着"骷髅"的人们统治着的世界的那一边……我在塔妮娅身边斜躺着，我们俩一起躺在下面一张长沙发上。出于不由自主的激动，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她迅速地把那激动的脸朝我转过来，于是我问道：

"难道你是毫不费劲就理解和接受了你对我所讲的这一切

的吗？”

塔妮娅垂下眼睑，双颊涨得通红。

“不，”她说。“你是对的。每当我看见人们那么难于领会一些我认为是极简单的东西，我也太容易生气了……我自己也不是一下子就搞通的。”

沉默了一阵。接着，塔妮娅又说起来了，现在她的声调比较平静和自然：

“我从来不是党员。我只是和几个党员认识。我不过是个普通的人，领会了共产主义的逻辑，了解共产主义，可是未必了解工人……对于这一点还需要不断地思考。”塔妮娅稍微踌躇了一下，又接着说：“是一个德国流亡者使我改变了思想方向的……他在战争前夕就到瑞士去了。他也是犹太人。他早就预料到了现在这场浩劫。”

她比头一次更突然地中断了自己的话。塔妮娅过去的生活现在才开始在我面前有点明朗起来了，这在从前我是想象不到的。她参加了我们大学生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把严肃的姑娘们团结在一起。每当我们的辩论会上有人攻击共产主义的时候，她从没出来辩护；而在我看来，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应该做的。她通常只是对别人的无知生气，并竭力使这些人知道，她认为他们是不学无术的。她成了一个好斗的个人主义者。我也对她说到了这一点，虽说的确是在几经犹豫之后才说出口的。塔妮娅点点头，慢慢说道：

“是呀。的确是这样，我自己也正是这么想。你别奇怪：我知道我所处的地位，但是知道得不够清楚。我的朋友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画家，”塔妮娅赶紧解释说，“他也不是共产党员。不过他有时候和共产党员们一起活动，关心共产主义，就像我一样

……我们了解共产主义，也赞成共产主义，可是我们一只脚还站在垂死的旧世界……”

从塔妮娅的声音里忽然听得出有点哀愁甚至苦闷。

“或许，根本不会有我们的位置——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我们缺乏健全的、纯洁的内在气质……我们是带有双重性的……不过，列宁好像在哪里说过，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人们是带着内心的创伤和往日的毛病走向共产主义的。当然，也许这不是列宁说的……”

“塔妮娅！”我动情地喊了一声。我不知道塔妮娅最后的那句话是感动了我还是仅仅震惊了我。她摇了摇头。然后，她小心地推开我，好像让我明白，她不能再谈下去了，她宁愿独自待一会儿。我只好让她去独自沉思，没有再打扰她。

走向正义的道路

我和塔妮娅的谈话越来越稀少了。我觉得，她的理论已经不怎么使我感兴趣了。我到底想要认识认识工人们。我越来越贪婪地阅读着每一期秘密报纸《真理报》。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共产党员参加抵抗运动的情况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父亲认识哈勒姆的许多居民；其中大概也有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愿意去打扰父亲和母亲，不愿意和他们倾谈占据我胸怀的思想。我必须自己去寻找并找到我所迫切追求的一切，既不依靠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单行本，也不依靠我和塔妮娅的争论，其中有时尤迪菲也参加的争论。我必须自己弄清事情的实质：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我四处打听，试图打听出一点名堂来。我模模糊糊听到些

传说，好像我从前一个女教师的丈夫和抵抗运动有关系。他是个医生，战争前夕结婚的。就在今年春天，占领者企图强迫医生们加入法西斯的医生联合会组织。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医生们断然拒绝参加联合会。然而自从医生们的拒绝成了公开的事情以后，我那女教师的丈夫就失踪了。他的医疗器械，也和其他投奔抵抗运动的医生的一样，遭到了查封，他的银行存款也都被抢走了。我听到这个情况，仿佛看到黑暗中燃起了星星之火——一种希望，一个机会。

我开始打听这位女教师的消息。原来她搬到布隆缅达去了，住在小教堂后面的一条林荫小道上。四月里的一天，我突然去拜访女教师。她看见我，又喜又惊。而我呢，终于坐在她面前的时候，却感到不知该怎么更好地表白我的愿望，怎么说明我要为自己找到更重要的工作的迫切心情。我很高兴，女教师详详细细向我询问各种事情，我也回答了她所有的问题，要不然，我们很快就会无话可谈了。她和我谈到过去的游览、学校的节日和考试，然而丝毫没有涉及她自己或她的丈夫，我真佩服她的沉着和冷静。我谈了我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的候车室里以“地下”方式通过了国家考试。讲到这里我就住口了。

在沉默中，女教师细细地端详着我，现在她似乎产生了某种怀疑。她的前额高凸，头发向后梳得又平又光。我低下了头。鸟儿在窗子附近唧唧啾啾地叫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片年轻人的嘈杂声音；起初我觉得好像是有人在那里吵架。

女教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朝我招招手。我走了过去。我们隐在窗帘后面，眺望着几栋安安静静的半农村式小房子四周的一些庭园。

“真是岂有此理，”我的女教师说。

我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前面有一个庭园，寸草不生，唯有一棵疙疙瘩瘩的老梣树，朝天伸出树皮粗糙的枝桠，法西斯冲锋队的一群乳臭小儿正在操练。一个很高的笨蛋，穿着淡蓝短衫，扎着武装带，登着高筒靴，用雷鸣般的吼声对那些站成横队的小子们喊着操练口令，他们个个噤若寒蝉，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这些家伙显然既害怕又欣赏粗暴的纪律。有个小子不时费劲吹出一种完全莫名其妙的号音。随后他们开步走了——有点仓皇和不自然，像是靴后跟被粘住似的。每有迟延，大高个子出口便骂，并用嘶哑的嗓子喊着口令，强迫他们重来。

“最露骨的法西斯训练！”我的女教师缓慢地说。“你瞧瞧，他们在竭力使这些小家伙一个个都成为野蛮人……这对小家伙们的心灵是多大的凌辱！”

她好像已为自己确证了这一事实。她离开窗边，我也坐回自己的椅子上。我向她瞥了一眼。我不再犹豫了。

“您不能让我和您的先生见见面吗？”我果断地问。

女教师又专注地看了我一会，不过，完全不是我所预料的那么吃惊。

“这么说，你就是为这件事到这里来的罗？”她紧张地沉默了几秒钟以后问道。我感到有了希望，点了点头：

“是的。我放弃学习了。目前我有别的工作。不过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光这样是不够的……眼下这类事情（我朝传来杂乱喊声的庭园方向摆了摆头）正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

“照你的想法，我的丈夫是干什么的呢？”女教师终于问道。

“不知道，”我回答说。“可是我指望，靠他的帮助能使我联系上……我寻找的人。”

她笑了：

“姑娘家做这种事是不相宜的，汉娜。”

我没有作声。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信任你……最近几天，我见到丈夫就和他谈谈。我自己什么也不能答应你。不过我看得出来，你的决心是很坚定的。我喜欢有勇气的年轻人……”

“如果是姑娘呢？”我问。

“那大概就更加喜欢了，”她说。

我们像姐妹似地相视而笑，突然感到了相互的信赖；我们变得更亲密，似乎年龄的差异以及隔在我们之间的其他种种障碍全都消失了。

过了十来天，我和女教师的丈夫见面了。一天晚上，女教师亲自领我去见他。我们是在一道要塞围墙近旁的一所很旧的房子里见面的。进屋必须通过一个小院子。院子中央长着一棵椴树，树枝伸展在一口粗笨的、早已废弃的石井上方。屋子里有很多走廊、小扶梯和小房间；除了通向要塞围墙的一个门以外，这屋子大概还有几个出口。空气里散布着乙醚、消毒剂和药物的气味；不用说我也明白，大夫在这里继续行医。他的妻子让我在一个棕色的皮护壁已经破旧的小房间里等着。这里静得出奇。我觉得，神秘的生活以及错综复杂的神秘的事情所织成的线索，正在我周围越拉越紧。而且这还是在我的故乡城市里呢！

过了几分钟，女教师和她丈夫一起来了。她给我作了介绍，但不是作为她的丈夫，而是直接提名道姓——马丁大夫。马丁大夫穿着普通的医生服装；白罩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气味。他的头发向后梳得很平整，灰绿色的眼睛里含着笑意，嘴巴阔阔的。大夫手上拿着一只熄了火的烟斗，脚上穿的是黄色便鞋。

他审视地端详着我，问道：

“您想和我谈谈吗？”

他那富于表情的眼睛闪着光。我点点头。结识陌生人我总觉得拘谨。可这一次关系重大，要决定非常多的事情。我的女教师和我们告别，打算走了。她问我是否尽可能再去探望她一次，我答应了，虽然我不大明白她在说什么，因为等待即将进行的谈话，已使我的神经十分紧张。她吻了马丁大夫；大夫把她送到门口，就回来接待我。随后他开始往烟斗里装烟；烟草想必是直接装在衣袋里的。看来，他是想给我点时间，好让我的精神集中起来。他终于点燃了烟斗（青烟袅袅的烟斗，给男人们增添了一种能博得人们好感的神态，使人产生信赖，使人安心），对我说：

“不用说，您是允许我吸烟的吧？我刚刚做完一个手术。从肺里取出枪弹。这不是很愉快的事，小姐。对于医生是这样，对于负伤者尤其是这样。”

我懂得，他从动手术的事谈起，这不是偶然的。我没有答话，只是看着他把烟斗里燃烧着的烟草压得越来越实。

“可您呢？……据我了解，您也是在渴望着让自己冒冒危险吧？”

我刚毅地承受住了他那审视的目光。

“大夫，会不会有危险，这对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回答说。“我知道，危险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我能不能做出有益的事情来。直到现在，我还没找到我乐于共事的人。”

“您以为我认识这样的人吗？”他问。

“是的，”我说。“您享有真正的爱国志士的声望。”

“唔……”大夫含糊地应着。“我感谢这种称赞……说实在

的，您的名声也不差……这没有什么可害羞的。您以为怎么样，若是我对您毫无了解，我会在这个地方接待您吗？”

沉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

“看来，您是愿意做个交通员的吧？”

“如果需要的话……”我回答着，竭力克制住窘困。他微微笑了一笑。

“什么都需要，”他说。“不过我看您的愿望似乎是在别的方面……我们什么都需要，”他重复了一句。

我抬起眼睛：

“我可以问问您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吗？”

我的问题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大夫走到圈椅前，舒适地坐下来，把一条腿搁在扶手上。然后，晃着腿，眼睛看着黄色的便鞋，说道：

“斯小姐，您明白……我多少知道一些您做的工作。可您的信仰我却一无所知……也就是说，是什么动机促使您来找我们，来投奔抵抗运动的呢？当然，首先是因为事关您的祖国；对任何一个抵抗运动的战士来说，这都是毋庸争辩的、理所当然的先决条件。您要知道，我们的国家向来就有许多教派和宗教团体。这也对抵抗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L.O.——L.K.P.，M.I.L.，OD.，R.V.V.①——字母表上的字母几乎有一半都被用作各个组织的代号了。您可以对此表示遗憾，不过应当加以考虑……我来简单地给您讲讲，经验教会了我一些什么。抵抗运动中有两种荷兰人，我对他们的评价最高。这就是加尔文宗信徒和共产党人。他们最警惕、最勇敢、最坚定。也许我甚至可以给您解释

① 荷兰各抵抗运动组织的代号。

一下，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在实施每一个反法西斯行动的时候，都遵循着自己的世界观，是他们的世界观在支配着他们。他们明确地懂得，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反对占领者。我不想说其他系统里的人就不是那么可敬、那么勇敢和那么热情的爱国者。然而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有较多的个人的甚至是利己的成份。我熟悉这种情况，因为我是抵抗运动的医生——请注意，是全体抵抗运动战士的医生。我给他们医治创伤，因此我能够窥见到他们的心灵，了解他们的性格……唔！”

大夫用细铁丝在自己的烟斗里搅弄了一阵。

“我和您谈话是很坦率的。对我来说，抵抗运动的伤员就是伤员。我完全一视同仁，不论他们心里是否存在着什么社会隔阂。我甚至设想，参加抵抗运动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女子，他们首先考虑到的也不是隔阂，而是人，是由于有共同信念而变得对他或她更加亲近的人……我冒昧地假定，您的家庭里没有宗教信徒，也没有共产党员……”

我们的谈话——或者，更准确些说，是大夫的独白发生了意外的转变，这使我又惊又喜。原先我不理解的东西，现在变得清楚了。最后，我迟迟疑疑地、像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那样结结巴巴地说：

“我非常高兴，您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对于抵抗运动这方面的情况，我过去知道得很少……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我明白……我自己憎恨一切隔阂……人人都在隔阂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是必须把隔阂加以消除的……如果做得到的话。我知道，人对于祖国的态度也正是这样。祖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的化身。虽然祖国这个概念在多数人看来只是

抽象的……可我们每一个人毕竟都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而且还有自己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我们的未来应当是美好的，美好的未来必定能使所有从事劳动的人都确信自己可以安全和幸福地生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斗争。”

大夫看着我，显然很感兴趣，甚至有点惊讶。我赶紧继续说下去；头脑里的思路非常清晰，窘困也就消失了。

“不过我也明白，每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对自己周围的人们……对于他们灌注于‘祖国’这一概念的那些思想是负有责任的。大夫，我很想和这样的人接触，他们最接近人民，最了解对敌斗争的意义。我指的就是工人。在每一个国家，占领期间这些人遭难最多……也最关心战争的结束……对他们来说，抵抗运动只是走向公正的和平的一个阶段。”

大夫垂下拿烟斗的手，说道：

“我理解您。我不是说已经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认为，上帝也会指出走向正义的道路的。唔！在这一点上可以保留不同的见解……”

“现在这些差别不会起重大作用，”我很快地插进去说。

他笑起来了。

“当然。现在我们是同路人，是同盟者，是战友。现在的任务在于消灭那种反对上帝和反对人的暴行，在于消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一切：背叛祖国、杀害犹太人和恐怖手段。上帝希望的是一片没有杂草的净土。”大夫忽然看了看自己的表。“哎呀！我早该回去看看我的病人了。”

他用那冰凉的、灵巧的医生的手握紧了我的手。

“您走后面的巷子回去吧，”他建议说。“我来给您指路。”

陷　阱

接连发生的许多事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袭来，并暂时推延了我所追求的目标。

四月底，赫里斯祥森将军要求残余的荷兰军队——士兵和下级军官，即农民、工人及其他公民的子女——过些时候即向德寇投降。法西斯分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盟军不能在这里建立光复荷兰的本国的地方军队。

一九四一年二月，工人、职员和店员举行了二月大罢工，以回答空前未有的虐犹暴行。

一九四三年五月，荷兰人举行工农大罢工来回答德国鬼子提出的出卖青年的要求。大企业的工人都停工了。如果赫里斯祥森的命令不撤消，农民便断然拒绝供应牛奶。他们把牛奶倒进运河。农民们既不给德国国防军干酪，也不给奶油。

我们这里听到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消息和传闻。已宣布设立战地军事法庭，要对举行集会、拒绝工作和收藏武器的人实施死刑。工人们正遭到逮捕和处死。农村也在流血。有一个村庄，法西斯匪徒把罢工的农民赶在一起，平白无故地枪杀了其中一部分人。然后把尸体沿路摆开，让每一具尸体旁边都站一个农民。然后他们又提出交纳牛奶、谷物、蔬菜的要求，农民们又拒绝了。于是又枪杀一些人，再提出要求，又拒绝了。拒绝和枪杀一直重复了四次。到后来，负责执行死刑的战地宪兵队，对自己的刽子手角色也感到厌烦了，这才停止了枪杀……

一个送牛奶来的农民把这件事讲给母亲听，母亲又告诉了我们。我们正在吃饭。父亲在悲痛的沉思中把自己的眼镜擦得

发亮。尤迪菲脸色惨白，连东西也吃不进。塔妮娅挺直身子，急促而高傲地把头一扬，把头发甩到后面。妈妈低声地说：

"我的天哪，到处都是可怕的镇压……有时候我问我自己，这些人在许多事情上是不是过分大胆了呢……多少年轻的生命给糟践了啊……"

这时，我头一次忍不住喊了起来：

"妈妈，当你去世的时候，你活了多大年纪，这会有什么意义。问题不在于你在世上活了多久，而在于你是怎么活的，一生中做成了什么事——这才是重要的！"

我不作声了，害怕暴露了自己的意向。开始了长时间的、令人难过的和含意颇深的沉默。塔妮娅脸上露着微笑，这微笑中也透着她刚才甩头发时那种毫不掩饰的高傲。尤迪菲茫然望着，显然被我的激昂吓住了。母亲默默不语，直面逼视着我；她好像已经在我身上发现了她从前不曾怀疑过的某种东西。

五月，这是一个被死刑的鲜血染红了的月份。同时宣布没收所有的收音机。收听"敌方"无线电广播几乎已成为荷兰人的民族习惯，因此，法西斯匪徒终于下令一部不剩地没收所有收音机。父亲从一个电工——我们家女仆的兄弟手上买到一台旧收音机，送去交给了警察局。父亲吩咐这个电工把我们常用的好收音机装在房间的墙壁里。BBC① 在德国特设电台的噼噼啪啪的疯狂干扰中继续广播着最新的消息；德国电台歇斯底里的发作经常在增强着我的希望和期待……每一天都有新的规章，每天都带来悲痛，每天都涌现着英雄。

一天晚上，我到布隆缅达去拜访好久没有音讯的我从前的女教师，塔妮娅竟趁这个机会又跑掉了。

① 英国广播公司的简称。

本来，每天早上妈妈都要打发我们的女仆出去做点事的。女仆一走，大门就关上了，塔娅妮和尤迪菲赶紧下楼来，在楼下逗留十来分钟。那一天，事情全弄乱了。尤迪菲患了流行性感冒，躺在床上没有下楼。父亲被一个熟人请去了；那人居然搞到一口袋小麦，答应分给我们一部分。妈妈和塔妮娅在喝咖啡。景况原是安静如常的。显然，当妈妈把餐具送往厨房的时候，塔妮娅便抓住时机溜出了家门。她干得那么灵巧，一点也没有惊动别人，因此一直到十二点钟，女仆走了以后，楼上静得出奇，妈妈这才怀疑出事了。尤迪菲没敢拦阻塔妮娅。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母亲都坐在房间里，连穿着睡衣嗦嗦发抖的尤迪菲也在，他们显然都是心慌意乱的。我发现他们当中少了塔妮娅，立刻猜到了他们三个人这么忧郁绝望的原因。这一次，我比较镇定。我马上吩咐尤迪菲去睡觉，然后，我连外套也不脱就说要去寻找塔妮娅，把她带回来。父亲提出要陪我去，可是我断然摇摇头。

我向火车站走去，不祥的预感在折磨着我。我的心情如此沉重，我的一切动作甚至连思想活动好像都迟钝了，似乎我全身都绝望得麻木了，像灌上了铅。我大致记得塔妮娅男朋友的地址。来到了阿姆斯特丹，我犹豫不决地徘徊了一阵；有一种感觉在提醒我，为了安全，不应该直接找上门去。连看到阿姆斯特丹都已经够使我难受的了。尽管交通运输似乎正常，但是我觉得城市已经被折磨得更加筋疲力尽，被恐吓得胆战心惊了；电车站上的拥挤，商店门口一队队凄凉的长蛇阵，德国警察和德国兵——所有这一切都向我说明正在暗中准备实行戒严状态。然而，也许只不过是我把充斥于我内心的懦怯和神经过敏转移到外界事物上了。最后，不记得我是怎么胡乱闯进了原来的犹太

人街区。那里笼罩着一片令人苦恼压抑的荒凉气氛，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商店都被紧紧地钉死，玻璃全砸碎了。有些地方，一些撕破了的窗帘，在风中缓慢地飘动着。

到处都是黑黝黝空荡荡的像洞穴一样的房间。"国社运动"分子以及所有其他也以我们的同胞自命的罪犯们，赶紧盗走了无人照管的财产。到处都飘浮着破坏与劫掠后的尘埃。刑警队的警察，三三两两在几乎空无人迹的中心大街上巡逻；战前，我常常漫无目的地高高兴兴在这条大街上漫步。喧闹的城市生活，成百上千彼此紧密团结的人们的活动，拥挤，鱼类和水果的香味，所有这些令人爽心、引人入胜和激动人心的繁忙，曾使我心醉神迷。如今呢，我眼前看见的是两个穿绿制服的背影，耳中听到的是他们那打了铁掌的皮靴踏在长满荒草的马路上的粗重刺耳的声音。我急忙离开那里；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好像我就要做出一些蠢事——一跺脚，攥紧拳头扑向这两个该死的可恨的身影。

在一条通向滑铁卢广场的巷子里，我呆呆地站住了。有一小群人正从旁边走过。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群可怜的犹太人。他们有的躬腰驮着沉重的背囊，有的歪着身子背着铺盖卷，或者抱着箱子在往前走着。我觉得这些不幸的人比我们其他公民更加弱小和可怜。他们中间还有个孩子。孩子看着和他并排行走的男子，好像在执拗地向他问着什么。那个男子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耷拉着大脑袋，有点颓丧而笨拙地牵着孩子的一只手。除了这个小孩以外，所有人的步态都是踉踉跄跄，迟迟疑疑的，互相碰碰撞撞的。在广场的这一端，只有他们和我。我猛然用手捂住了嘴。一种推测贯穿了我全身。这些人是去登记的，然后就要被遣送。他们谁也没有举目环顾。他们正在走向死亡。这

个推测在脑子里如此清晰鲜明，同时所有这一切又显得如此骇人而不可思议，竟使我一下子忘记了自身的危险。我很想奔过去对他们说："你们逃吧，随便在哪里躲起来！不要到那里去！你们显然还不明白带你们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转到地下去吧——就连蹲在污水管里，也比在波兰死亡营里强呀！……"我眼睁睁地望着他们转过弯去看不见了。消失了，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他们这些人似的。我不禁自问，这一切会不会是我的幻觉。我完全陷于混乱之中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挪动了身子。从脚跟直到发梢，我浑身都在颤抖，心中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自责意识和仇恨。我深深地喘了口气。我懂得，必须控制自己，不论遇到什么情形，都要沉着、坚定。我想起了塔妮娅，我是为了她才到这里来的。要知道，塔妮娅也是犹太人，她也会遭到犹太人的命运的……

五分钟以后，我来到一条小街上，走进一所摇摇欲坠的旧房屋，就是从前我和塔妮娅一起住过的地方。我去找摄影师，他正好在家。我敲开他的房门，据实告诉他塔妮娅有生命危险，他必须把塔妮娅男朋友的地址告诉我，摄影师听后非常吃惊。他忧郁地看看我，响亮地吹了一声口哨，我感到我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勇气好像眼看就要丧失殆尽了。

"这里的居民登记总局遭到袭击的事，您自然听说了罗？……"他终于慢慢地说着，随手把一绺垂到眼镜上妨碍他视线的头发撩到后面去。"他，塔妮娅的朋友，也参加了这次袭击。据我们所知，被捕的人当中没有他。不过他的住所已经埋伏下强盗——法西斯匪徒，他们会把任何不知底细去叫门的人都抓起来……若是您的女朋友到那里去，就会撞在他们手上……"

刹那间我头晕目眩了。我费力地慢慢从坐位上站了起来。

我沉重地依靠在他的工作台边上，低声问道：

“是在什么地方？……”

“维斯特马克特广场，”摄影师答道，并说出了门牌号码。

我已经走到门口了。摄影师在后面跑上来，从栏杆上探出身子。我飞奔下楼的时候，还听见他的声音：

“您千万不要接近那幢房子呀！我跟您说……”

“我不是傻瓜！”我对他大声说。

他最后的话毕竟帮助我意识到，我必须再度控制住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冒失的行动。当我接近矗立着维斯特托兰钟楼的教堂所在的广场时，我放慢了脚步。我沿着教堂对面静悄悄的一边走去，寻找着我要找的门牌。这所房屋坐落在一排房屋中间，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危险或变故的迹象。这里一片寂静；有几个孩子在教堂侧厅附近玩耍。窗帘一动不动。我绕着教堂走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如果屋子里埋伏着盖世太保，那么他们已经看见我两次了。而两次——这已经足够有余了。必须离开这里；可是我到底还是没有离开。我顺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从这里可以观察到马路对面的房屋，我躲在窗子旁边，掩在窗帘后面。我喝着清淡无味的冷柠檬水，胃里不舒服地咕噜咕噜直响。我在咖啡馆里坐了很久；我的手提包里有本书，我就看起书来，虽然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我只是注意在适当的时候翻一页书。我偶尔朝广场看上一眼，那里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有时跑过一只狗；教堂钟楼上响起了报时的钟声；嘹亮的青铜的钟声，在我的空胃里引起了颤动的回响。孩子们被叫回家去了。快到晌午了。有两个推手车的人，在广场中间站住，开始了冗长的莫名其妙的谈话。我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做着手势，笑着。我不明白，这两个人怎么会站那么久，那么罗嗦，那么爱笑。我又要了

一客柠檬水，忍着对这种代用饮料的厌恶，小口小口地喝着。不时有人走进咖啡馆来，在柜台前喝点什么就走了。镀锌的柜台里边有个没穿外衣的人，起初只是间或看看我，现在开始注意观察我了；我怕他来找我；这对我毫无必要。我已经开始担心他会怀疑我为什么静静地坐在这里，怀疑我在等待什么；忽然，从教堂背后出现了一个穿便衣的男人，还有一个姑娘。他们穿过广场，正朝市中心的方向走去。男人落后姑娘半步。男人有一次注意地环顾四周，像是在找人。他的右手插在上衣侧袋里。这个人整个瘦削的身躯是一种虚伪、无耻和卑劣的混合体，在我的观念中，这永远是和法西斯密探联系着的。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姑娘。我慢慢从坐位上站起来，艰难地移动脚步，走到柜台跟前，默默地放下了钱。然后我走出咖啡馆。我的腿好像麻木了。我看见，那个男人和低着头的姑娘，横穿过有电车轨道的马路，消失在人群里。我机械地跟着他们，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塔妮娅落到敌人手里了。我知道他们这是到哪里去。盖世太保要把塔妮娅带到“荷兰剧院”去。那是个贮人所，被捕的犹太人，在送往集中营以前，都先赶到那里去。

塔妮娅落到敌人手里了。

带枪的人

我首先奔到阿达那里。我在她那里痛哭了一场，这才稍稍觉得松和些。阿达坚定的沉着和充满友爱的同情，此时此刻，成了一剂良药。她答应我，她将尽力设法，通过犹太人理事会打听塔妮娅的消息。临走之前，我们约定：如果确悉塔妮娅已在“荷

兰剧院”，阿达就寄给我一张写着“包裹收到了”的明信片；如情况并非如此，她就只给我寄一张风景明信片。

我勉强回到家里。塔妮娅落进纳粹的陷阱，这个致命的消息大大震惊了我的双亲和尤迪菲。一连几天，大家都处在极其沉重的情绪之中。原先在我们家门之外肆虐的风暴，如今也临到我们头上了。小小的安乐窝中的团结一致，好像一下子就彻底地破坏掉了。每当谈话突然中止，我们每个人都感触到可怕的孤单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一点。每一次，只要话题涉及逮捕和迫害犹太人，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尽量避免提到塔妮娅的名字。眼看着大家这种沮丧情绪，有时候我甚至会生气。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不进行斗争，我就无法摆脱毫无出路的绝境。

就在这个星期，我拜访了我从前的女教师。我终于在她家里遇见了她。我没有问她以往不在家的原因，她也没有对我作任何解释。然而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纽带把我和她连结在一起了，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看出，她认为我可以知道她的事业，因而她今后将会适当地来对待我。

“你的愿望达到了，我的孩子，”大夫的妻子说。“最近几天我就带你到我丈夫所在的那座房子里去。他会安排你和一个人见面，那个人能比我告诉你更多的事情……”

我焦急不安地等待了几天。在约定的时间，我来到要塞围墙附近的一个小院子后面的旧房子跟前。当我第二次走进气味甜腻得叫人作呕的医院，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福尔马林的时候，我的牙齿打起战来了，膝盖也感到有些发软。给我开门的人我不认识，看样子，他倒像是认识我的。我得先在那个四面蒙着深棕色皮护壁的小房间里等一会儿。过了几分钟，我听见走廊里

有两个男人走过来，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脚步声在房门口停住了，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按住喉咙——喉咙痉挛得要憋住了。

门开了，马丁大夫和另一个人走进了房间。我没敢看后边那个人，只是一直望着大夫，好像我的生命全靠他来搭救似的。我看见大夫和善地微笑着，伸手朝我走过来。

“这次见面，让您比我们预计的多等了几天，”大夫说。“有些事需要先安排好……怎么啦，您有些紧张？这是为什么？”

我听见另外那个人笑起来了。我一直还没有看过他一眼。马丁大夫把他带到我面前介绍说：

“这是弗兰斯。就是您想认识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弗兰斯。就叫弗兰斯，”陌生人说。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了微微的讥讽和一种自满的意味，一想到这一点就使我感到厌恶。弗兰斯从粗呢大衣袖子里向我伸出一只手来。这是一只满覆着黑毛、骨节分明的粗大的男人的手。难道这是工人的手吗？我发现那些方形的指甲都修剪得整洁美观。这只手，我还不能判断它的性质，但是它的外观已经有点使我感到困惑和失望。不过这毕竟只是刹那间的印象。我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伸给我的手掌里，终于朝他脸上看了一眼。

他的颧骨突出，嘴不大，脸刮得很干净。也许正是刮得精光的双颊的神采，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自尊自大的气派。那对黑眼睛，善意地，然而略带嘲笑地看着我。很明显，他已经在关心我，而且好像已经自认为是我的父亲和保护者了。

马丁大夫看看弗兰斯，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着他说：

“好吧。你们可以在这里谈谈。弗兰斯，你走的时候，照老规矩，告诉我一声。斯小姐，您大概吓得一直还没有平静下来哩。其实您用不着怕弗兰斯。”

马丁大夫笑着随手带上了门。弗兰斯也笑了。随后他请我就坐。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弗兰斯解开自己呢大衣的钮扣，架起了一条腿。他极像个小办事员——深棕色方格子的衣服，整整齐齐的领带，活领子上别着精致的扣针。

“喏，咱们开始吧，”他说。“您要抽烟吗?”

我们抽起烟来，他开始问我，是不是为地下工作做过事，是否参加什么组织，例如大学生抵抗运动。他间或温厚、善良地看看我。

“说实在的，您在不在什么党派?”他问我，好像是无意间顺便提起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尽力不看我；显然，他以为这样容易套出我的话来。

“不，”我回答说。“我没有参加什么党派。不过，您当然应该相信我，我是完全自觉地抱定左派观点的。”

“唔，左派观点……好多人都自以为是左派，”他说着，又微含讥讽地笑起来。“可是马丁大夫替您作保，这已经够可以的了，”他沉默了片刻之后继续说。“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信任您。很自然，不是每天都有妇女来要求参加这种工作的。不错，我们有女交通员；可是我听说，您认为这种工作太微不足道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断然回答说。“我对马丁大夫是这样说的，如果需要的话，就连送信的工作我也乐意去执行的！……”

我的激动，似乎使弗兰斯觉得可笑。

“不用说，您更喜欢的是这个，”他说着，把手伸进自己呢大衣的暗袋里，又很快地抽出来，——他的手掌上放着一支手枪。弗兰斯显然想使我大吃一惊；他这个动作就像演熟了的舞台把戏。我看着他的手掌，看着那货真价实的黑色金属制成的武器。

这么近地看见火器，我还是头一次；从前，在国土被占领以前，我只是在军械商店的玻璃橱窗里看见过。那时候这种陌生的玩意儿是属于别人的，显然不是为我准备的。如今呢，手枪在我的心目中已具有截然不同的、极其重要的意义了。

“您真的不害怕吗？”他有点不经意地、带嘲笑地，甚至带点挑衅意味地问道，不过还是相当善意的。

我慢慢地摇摇头。

“我不怕。”我坚定地回答。“不过我应当告诉您，我还从来没有开过枪。您是不是以为，我参加抵抗运动的队伍，只是因为我爱好这种玩意呢？”

他看了我一眼。我的声调，或者是我的言词，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也可能是两者都有。

“我明白，”他简短地说。“您说得对。这完全不是开玩笑……您再好好地看看手枪，好好地考虑一下，您有没有胆量操纵这种‘大炮’？您还可以放弃原先的打算——我们双方也都可以忘掉这里所谈的一切。”

我很高兴他这样对我说。他说得认真、严肃。我们之间不友好的气氛顿时全消失了。

“不，”我答道。“我不放弃。我要工作，而且要尽快地开始。”

他已经把手枪收藏起来了。

“好，”他简短地说。“我们将吸收您参加我们的组织。顺便说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两个姑娘了。您当然会见到她们的。是两个出色的女郎。现在她们不在这里。往后会来的。”

他坐在椅子上，把大衣纽扣全扣上了。

“我将教您射击。如果我告诉您，我们就在城边搞这种教

学，您大概会吃惊的。”他吃吃一笑，我倒觉得这完全不足为奇。“一切的行动我们都已经熟悉了……您知道到赫姆斯特德去的路上那座‘西班牙橡树’大庄园吧？……好极了。”他考虑了一会儿。“下星期一晚上八点以前，您骑自行车到那儿去。我在守林人的小屋里等您，就在房屋大门后面。守林人是我的亲戚。”他朝我使了个眼色，对他这种冒昧的亲昵，我现在也不反感了。“其余的事以后再说……您都记住了吗？”

“一字不漏，”我说。

战斗的洗礼

到星期一还有四五天。我没有停止自己的日常工作。我甚至为隐蔽在地下的人搞到了比从前更多的钱，虽然近来我掌握的是另一份通讯录，通讯录上的公民都很不富裕。募集款项这么容易，使我感到不安。即使现在用了这份通讯录，我也能比别的人多募得几百盾[1]；看来，我的募捐方法，真有点能够使人慷慨解囊的什么奥妙了……我爱自己的工作，还有几分是因为，我骑车在城里到处跑的时候，可以对一切加以深思。现在我正想着塔妮娅，想着我和弗兰斯的会见。关于塔妮娅，我甚至比平时想得更多，因为BBC广播电台在六月的一天广播过一条消息，说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武装暴动反抗德国刽子手。塔妮娅必定会为这奋起反抗纳粹直至壮烈牺牲的四万犹太人——男人、妇女和儿童既感到悲痛又感到自豪的。“就是临死也要再揍敌人一个嘴巴！”这些天来，每当我骑车募款的时候，我仿佛又不止一次

---

① 荷兰货币单位名称，主币。

听见了塔妮娅的这句话。我甚至都不愿想象，此时此刻活着的塔妮娅会发生什么事情。

周末，阿达终于寄来了使我望眼欲穿的消息。明信片上写着："包裹收到了。"其实我并不曾指望有任何别的情况，不过这个消息还是震动了我，虽然我对此原已深信不疑。塔妮娅在"荷兰剧院"大厦里。这是走向死亡的第一阶段，我已亲眼看见过一小群被摧毁了精神的不幸的犹太人，踉踉跄跄地、顺从地朝死亡走去。

收到阿达的明信片以后，我们愁眉不展、愁肠百结地度过了整个星期天。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什么行动，只好等待新的消息，同时我也不得不克服想冒险去阿姆斯特丹的念头。尤迪菲躲在她那冷冷清清的小房间的角落里，哭着，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下楼。唯一能使我稍稍得到慰藉的，便是明天就能够再次和弗兰斯见面。

这个星期一天气热得闷人。德国鬼子正在调动部队，傍晚我骑车去赫姆斯特德的时候，路上仍然有德国载重汽车在奔驰。汽车上坐着热得汗流浃背、满脸不高兴的士兵，他们已经不再唱歌了。由于运输频繁，两边扬起阵阵的尘柱，这些灰尘像浓厚的黄色云雾，纷纷落在一些小花园里，整个空间似乎充满了灰尘。遇上一小块水草地和灌木丛，才有一点凉爽空气，这才叫人觉得炎热酷暑减轻了一些。可以感觉得到暴风雨临近的沉重压力，虽然暴风雨也未必能使沉闷的气氛缓和。

我骑车来到淡黄色的石膏大塑像前（这些塑像我从小就熟悉，它们排列在旧日的大庄园入口不远的地方），我应该在这里和弗兰斯会面。"西班牙橡树"大庄园现在也算是国有财产；这个大庄园坐落在公路一旁，它已经逐渐荒芜了。很久以来庄园

就禁止进入，只有阴暗的林荫道和入口附近的一些不成体统的、巨大的女人塑像，才能使人想起庄园的存在。有一个禁猎看守人和一个守林人在那里驻守，不准任何人到这里任意游乐。其实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就连德国鬼子也没来碰碰这个大庄园。这倒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们本来习惯把仓库设在公园里，把汽车停在树荫下。

我壮着胆子，骑车在塑像之间驶过，来到守林人的小屋近旁。在那些据说还是西班牙统治时代种植的橡树下边，四处静悄悄的，好像屋子也没有人住。柔和宁静的暮色和雷雨前凝然不动的大自然，使我产生了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在守林人的小屋旁下了车。这是一所低矮的小屋，墙头上低垂着瑞士式的屋顶，房屋上还有些拙劣的木雕。我正在犹豫间，冷不防有个男人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把自行车放到木材堆中间，在屋子后面！"

这时候我才发觉，侧窗微微向上开启——只开了有巴掌那么宽的一道缝。遮得严严实实的窗帘没有动。不过窗帘后面显然有人站着，身子就俯在窗台上——大概是弗兰斯。我壮起胆子，迅速绕到屋后。那里果然有几堆木材：显而易见，这些木料是春天清理树林时砍伐的。我把自行车在那些木材堆中间藏起来。这时候我听见我背后的门开了。我转过身来。弗兰斯光着头站在相当低矮的后门口。他仍旧穿着那身深棕色方格子的衣服，脸刮得光光的，黑眼睛里流露着温厚的、略含嘲笑的神情。

"我把你吓坏了吧？"他问。

"没有，"我简短地回答。接着又特别补充说："我不是那么

容易被吓倒的。”

“那更好，”他说。

他到黑暗的小过道里去了一会，我看见他手上拿着一顶帽子，这是一顶旧的深棕色的细毡帽，他不经意地把帽子往头上一扣。接着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跟着他走。我们沿着狭窄的小道从木材堆旁走过；随后又走过跳板，进入树林。我们默默地走着。林中多半是阔叶树。阔叶树发出浓郁苦涩的香气，黄昏的林中飘来阵阵凉意。在这些气息里，混杂着金银花和常春藤的略含辛辣的气味。有些地方，常春藤一直爬到树干的高处。野鸽子在我们头顶上方高处咕咕叫着。隐约可以听见鸟鸫悲愁的鸣声。狭窄的小道突然开阔了，现在两边全是成行的松树；在这里，针叶的气味盖过了阔叶的气味。陈年的松针和松果把干燥的地面铺成了棕色。异乎寻常的寂静，静得有点令人不安，尤其是这一列成双行的松树，就像布景装置，把我们和其余的树林隔开了。在一条僻静的分支小道的尽头，有一条用毛糙的木板钉起来的长凳。

“就在这儿吧，”弗兰斯说。“没有一个坏蛋能在这儿突然发现我们。”

他把一只手伸进自己方格子上衣侧面的口袋，取出沉甸甸的、暗黑无光的手枪，就是他在大夫的屋子里给我看过的那一支。这一次，武器的样子已经不使我吃惊了。

“火器，这是一种任性的东西，”弗兰斯说。“这东西，你起初不大愿意碰它，可是后来它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开始你得先懂得一点和这玩意儿有关的知识，这样你才能安全有效地使用它……”弗兰斯那刮得光光的脸上浮起了笑容；他的整个神情都在要我明白，他什么都懂，而我却是个外行。“喏，注意听着。

看见吗，'F.N.'牌的，比利时造。'F.N.'就是'Fabrique Nationale'①。这只小野兽是赫斯塔尔出的。"

弗兰斯说了两个法国单词，可是发音却完全不像法语，而是带荷兰腔的，于是我立刻想到：弗兰斯呀，你这位仁兄原来不懂法语啊。不知为什么，他不懂法语倒使我感到高兴。我一言不发，注意听着，他详详细细讲述了火器的一般知识：他谈到英国人用降落伞空投过来的旧式大口径瑞明顿式武器；谈到那些忠于我们的警探和稽查——虽说当然为数极少——提供给我们的警用武器；谈到可以根据字母"K.M."②识别出来的海军手枪；他还谈到弹药的供给有多么困难。接着弗兰斯便开始给我讲解"F.N."牌手枪的构造。他做起来得心应手。我发觉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善于适应别人的情况，即使对方对这项事物一点也不了解。他讲得生动、亲切，而且带着罕见的、显然是真实的质朴，看起来，质朴正是他性格上的主要特点之一。我按照他的要求反复分解和结合武器，我觉得我对他的好感也随之不断增加；他在指点我的时候，好像完全忘记了要为自己争取敬意和充当我的保护者的角色。看上去，我们仿佛早就互相了解了。他帮助我又一次结合好手枪，我坐着，把枪握在手里；我看了看弗兰斯忠厚的脸，问道：

"我到底是加入了什么组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他脸上的表情刷的一下就变了。他的一只手支在曲起的膝盖上，身体向我倾过来，用一种低沉和不自然的声调说道：

"汉娜·斯，别幻想了吧。这里的事，你一点也不要讲出去。我根本不是抵抗运动的战士。我是德国侦缉队的人。你搞购

① 法语：国营工厂。

② Koninklijke Marine的缩写，荷语：皇家舰队。

物证和身份证的勾当，早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我现在逮捕你……”

我明明知道，而且处处感觉得到他是在撒谎；他表演得像一个最拙劣的演员。我并不相信他那一套，可我到底还是上了他的当。他那些可恶的话语，我们周围寂然无声、半明不暗的绿莹莹的树林——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神经紧张。我霍地跳起来，朝他举起手枪。他急忙伸手打掉手枪，手枪划了个弧线，落在松针堆里了。

我浑身发抖，大喊一声：“不！”接着撒腿就跑。我的心脏猛烈地跳着。我本想奔回我们来时走过的那条小道，但忙乱中却拐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我周围一片昏暗，似乎树林这会儿变得更稠密了。我听见弗兰斯在对我大喊着：

“汉娜！别使性子啦！”

他的声音里有点惊慌。可是我已经没工夫注意这些了。我不知道，是弗兰斯现在撒谎，还是我一开始就受了他的骗。我奔得更猛了，头也不回。弗兰斯模模糊糊的急促的脚步声离我远了。他又在喊着我的名字：

“见鬼！你在哪儿呀？站住！我是开玩笑呀！”

可是我已经领会不了他的话了。我只知道，我再不愿意和他有任何关系。我只求逃出树林，逃脱弗兰斯。我越过几条小道，斜穿树林，胡乱朝前瞎窜。不一会儿我就听不见弗兰斯的声音了。但是我无法预料我还会碰上什么人。我正在长长的松林小道上奔跑，突然发现有两个男人迎面走来。我顿时觉得浑身战抖，心里想：弗兰斯不是骗我的。“西班牙橡树”大庄园里布满了德国侦探。弗兰斯派出他的喽罗来拦截我了。这个想法简直使我完全丧失了力量，面对两个朝我走来的人，我呆若木鸡地在

小道中央站住了。我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了。可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站在我身边。他们穿着旧的短外衣，有一个人的衬衫领子敞着。

“是汉娜吗？”其中一个人迅速地轻声问道。

“是的，”我回答着，好像他知道我的名字是十分自然的事。另一个人悄悄地骂了一句。

“见鬼，弗兰斯在哪儿呀？不用说，又在耍他那套愚蠢的鬼把戏了！”他说过便朝前走了，头一个人仍留在我身边。“没事了，”他说。“大概弗兰斯又冒充德国侦缉队的人了吧？”

我点点头。我马上觉得，极度的紧张正在消失。工人向我伸出手，我也把自己的手递给他。我对这个举动丝毫也不觉得奇怪。

“咱们走吧，”他对我说。并且又重复了一次：“没事啦。”

他的手粗糙、短壮而且有力，这是一只可信赖的手。我们朝前走去。不多久，我们看见了弗兰斯和那个同志，他们在等待我们。弗兰斯看到我，显然很不好意思，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随后他微笑着走到我面前：“嗯，上当了，是吗？……吓得不轻吧？”

“当然，我是吓着了，”我说。“这么说，你向来是这样对待新同志的罗？”

他无声地、有点难为情地笑了。另外两个同志默默地站着，把视线从我身上转向弗兰斯。

握着我手的人，这时放开了手，慢腾腾地说：

“要知道这是个姑娘啊，弗兰斯。对待她要爱护些才是。”

“没关系，”弗兰斯说。“她应当经受得住打击的。”他又转身面对我继续说：“她知道我是没有恶意的。”

我没有作声。另一个工人激愤地反驳弗兰斯：

“我始终没能学会游泳。这是因为，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父亲有个习惯，常常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小孩子往水里扔。他认为，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学会游泳。可是从那时候起，我连下河洗澡的劲头也没有了。”

他一边说，我们一边往前走；的确，不是如我心里想的朝守林人的小屋子那边去，而是向另外一个地方走。但是这时候弗兰斯站住了，他厉声问道：

“嗯？你的游泳和这有什么关系？”

工人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你好好想想吧……你的方法太离奇了，就跟我父亲那一手一模一样。”

我们继续朝前走。弗兰斯走在前面，我走在两个工人当中。我的恐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我明白，这是多亏来了这两个同志。

“我们这是到哪里去呀？”我问。同伴们的沉默开始使我感到不得劲。

“上指挥所，”弗兰斯简短地回答，连头也没回。

我已经隐约听见运输干道上的喧闹声：汽车喇叭声，电车铃声。在这里，在和海一样哗哗响着的树林里，在柔和地摇动着的林木间，竟能听见这些声音，真是奇怪。

“鲁朗特，你去守林人的屋子那边取她的自行车，”弗兰斯还是那么简短地吩咐着。

起先陪我走的那个工人取自行车去了，我们三个继续走我们的路。

指挥所

“指挥所”一词，使我产生了极其奇怪而且相当混乱的想象，好像是废弃的茅屋、半塌的草棚、守林人的小屋。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我们走过一些已经隐没在暮色中的果园、菜园和篱笆，在一个花园的木栅栏门旁停了下来。弗兰斯用腿一碰，栅栏门就开了。我们踏着沙沙响的砾石路向房屋走去。在我面前，在那炎热黄昏的昏暗的金黄色雾气中，有一幢旧领主宅第——宽大的窗子，木头百叶窗，有遮棚的台阶，爬满了野葡萄藤的柱子。屋顶上，靠近檐沟有一对呢喃的燕子。好一派安宁闲逸的田园风光！

弗兰斯默默地打开遮棚下边的后门，又默默地擦擦脚。我听见擦鞋毯上的沙沙响声，于是我也照弗兰斯那样做了，虽然我的鞋底已经在树林里完全给擦得光溜溜的了。在擦鞋毯上擦擦鞋这个日常的甚至有点庸俗的举动，驱散了我初见房屋时所产生的浪漫的印象。

弗兰斯打开了进走廊的门，接着又开第二道门。我们来到一个房间，这里吊着一盏遮上黑布的灯。我在门口站住了。首先，我发觉房间里满是烟草的烟雾，我差点儿透不过气来。那景象就好像房间的窗子从来没有开过似的。我环顾四周，房间里空落落的，几乎没有家具，四角黑洞洞的。但是房间里却有一种艰难之中的舒适。正中有一张大圆桌，铺着垂得很低的桌布。桌子上摆着报纸和烟灰缸。靠墙放着两张皮沙发。一张沙发上还坐着两个没穿外衣的男人，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弗兰斯走上前去，然后站住用手势邀请我走近些。我走过去。两

个男人从沙发上站起来。

"这是我对你们说过的汉娜，"弗兰斯声音有点嘶哑地说，好像不大自在。"汉娜，这是我们两个小伙子——艾迪和杨。"

艾迪和杨与我握手问好。看样子，他们大约有三十到三十五岁，和我刚才认识的那两个工人差不多。两人有礼貌地朝我笑笑，点点头，又在沙发上坐下来，开始端详着我。大概他们还不习惯在这里看见姑娘哩。可是我对他们的注视却泰然自若。他们当中有一个，用脚将一把椅垫子已破得很厉害的藤圈椅推给我。我坐下来，看了看弗兰斯；我看出他想要再对我说点什么。他脱下上衣，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

"噢，对，"他说道，好像猜到了我在等着他解释。"我们就住在这里。你听说过画家菲利普·莫年吗？"

我说听说过。莫年的名字在哈勒姆是尽人皆知的。我还知道，他在哈勒姆以外也负有盛名。战前，我常在阿姆斯特丹看见举办这位画家的作品展览会的广告。

"这是他的房子，"弗兰斯说。"他自己住楼上。楼下让给我们了。他真是好样的。"

房门开了，又进来一个工人，大家叫他约翰。他看见我便点了点头。杨卷了一支烟递给我，正如他所说的，是"半成品"，只要舔一下卷烟纸，粘上就行了。约翰划着火柴递到我面前。他们的殷勤使我感到快慰。

"上面的灯你拾掇好了吗？"弗兰斯问。从他的声音里可以感觉到，他喜欢哪怕是分神注意一下较琐碎的杂务也好。约翰点点头。大家都沉默了。听得见房间角落里难看的黑色五斗橱上的闹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这里谁是负责人？"我问。"这到底是什么组织？"

弗兰斯终于放大胆子又直视了我一眼：

“我们这儿是抵抗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他答道。“这儿的负责人就是我。”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其余的人都没有作声，很感兴趣地看着我。我等了几秒钟，又问：

“那我干什么工作呢？”

弗兰斯环视了我们所有的人，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房门便开了，鲁朗特走进了房间。直到现在，我才得以仔细打量鲁朗特。在灯光下，我喜欢他并不亚于在他做了我的“救星”的树林里。这是一个宽肩膀、淡黄头发的男子，穿着衬衫，袖子卷起，领子敞开，露着粗壮的脖子。他那宽阔的脸上有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和两片微微突出的丰厚的嘴唇。

“你的自行车在木棚里，”他对我说话的口气，好像是认识我已经整整一年了。我对他报以感激的目光。鲁朗特转眼去看着其余的人，他的嘴角上出现了愠怒的皱纹。

“伙伴们，”他两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终于说道。“非常抱歉，可是我必须说说我们的组长。否则我不能……”

他微微加重了“组长”一词的语气，比别的字眼说得稍生硬一些。弗兰斯很快地扭过脸来望着他。我看见约翰在笑。其余的人则惊奇地凝望着鲁朗特。

“鲁朗特！”弗兰斯拍着桌子喊了一声。他显然想用这种吆喝和动作来警告鲁朗特。

“非常抱歉，”鲁朗特又开始说了。“可是同志们必须知道这件事。弗兰斯，你做的事是不体面的……”

鲁朗特向艾迪和杨那边转过身去。

“弗兰斯在树林里简直把我们这位新同志吓坏了。就像他

当时吓金卡一样。我不知他对汉娜说了些什么。也许他自称是盖世太保，也可能说大庄园周围全是德国人，或许他还发明了些别的什么。总之，弄得汉娜只好逃跑。幸亏我们碰巧遇上了她；现在总算没事了。”

本来在桌子那边面朝鲁朗特坐着的弗兰斯，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他和鲁朗特两个面对面地站在桌子旁边。弗兰斯那忠厚而略带自满的脸变得暗淡了。

“你还想为自己辩护吗？”他阴沉着脸问道。“你就是这样来巩固做组长的威信的吗？”

我看见艾迪和杨显得又紧张、又关切，他们时而看看弗兰斯，时而看看鲁朗特。约翰本来已在角落里坐下了，这时候他一下子站了起来。

“对，”他说。“说得对。我们不应该损害组长的威信，因为他是组长。但是，也有个同志间相互信赖问题，这是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的。鲁朗特做得对，不应该堵他的嘴。趁着汉娜在场，现在说说这件事，这很好。这样的事应当到此为止，以后不能再这样。汉娜是我们组织的一员，而你，弗兰斯，对待她却是非同志式的。问题就在于这件事情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你答应过不再搞这些把戏的。汉娜会对我们怎样想呢？”

弗兰斯放在桌子上的一只手握成了拳头。接着，他假装不经意地笑起来。我明白，他会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的。

“上帝保佑你们吧！”他说。“你们犯得着这么小题大做吗？就算我稍微过分了点，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本来也没事了嘛。汉娜早已恢复常态了。对吗，汉娜？”

我克服了原已笼罩在我心头的窘困，急忙说：

“让我们忘掉这件事吧……我不埋怨弗兰斯……我明白为

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惭愧的只是我这么容易就受骗了。本来应该更加理智才是。”

鲁朗特用他那灰眼睛凝视着我，说道：

“我十分高兴，你对一切都能承受。你的修养很好。”

弗兰斯也看看我；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坦率的感激和友爱。

“汉娜建议把一切都忘掉，”他说。“好吧，好姑娘。那么，我们就忘掉……”

他的声音变了，现在听来挺温和，我绝没料到这一点。后来他终于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的确，有时候我好胡闹……我向你道歉，汉娜，”他费劲地补充说，仿佛这句话哽住了他的喉咙似的。“从一开始我就对你满怀着信任，你听见没有？请你也相信我吧。”

“OK，”我说。

我好像觉得，坐在沙发上的艾迪和杨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鲁朗特外表的镇静也不再紧绷绷的了。鲁朗特走到桌边，在弗兰斯对面坐下来，把香烟罐子挪到自己面前。对事情的转变感到满意的约翰，在角落里暗自微笑。我听见他打开橱门，又听见玻璃餐具的轻轻的碰击声。接着，约翰走到桌边，往桌上放了几瓶啤酒。

我们喝了淡薄如水的战时啤酒。啤酒真的使我感到神清气爽了。一共只有三只玻璃杯。我还从不曾独自坐在五个男人中间，更不曾和男人们共用一个酒杯喝酒。这对我还是件新鲜事，同时又似乎十分自然，它使我很快克服了言谈举止中常常表现出来的羞怯。我看得出来，同志们越来越习惯于和我相处了，我对他们也是这样。

弗兰斯亲自陪我走了一段漆黑的夜路，送我进城。他大概很想补偿自己愚蠢的冒失行为，因而对我竭力表示友好和自然。他对我提出了许多善意的劝告，预先提醒我注意我的自行车轮胎可能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他整整问了我三次，问我是不是愿意再去练练射击。我也含笑郑重地向他保证说，以后再也不会被什么吓唬住了。直到我们接近了城边，弗兰斯才决定往回走。他一只胳膊靠着我的自行车把手，站住了。

“对了，千万别忘记，”他说。“我们必须给你搞一张稳妥可靠的，在你不得不和我们一道去办事时使用的个人身份证。你绝不要把原来的证件放在口袋里！”

“我明白，”我答道。“这种身份证我自己能搞到。这是我的拿手好戏。”

他由衷地笑起来。

“真是这样，”他说。“你是个出色的姑娘……你到我们这儿来，我真高兴！”

这一夜，我又没有睡着。但是情况和以前完全不同。我是幸福的。我思忖着，世上原来有着各种各样的幸福。有无所忧虑的、孩子般的无意识的幸福，有命运突然赐与的幸福，有你的心灵纵情歌唱时的幸福，有纯洁无邪的幸福。同时还有一种充满了深远的重要性的幸福，这种幸福来自令人喜悦的认识，来自自觉的选择，来自为生活树立功勋的志向。我躺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我的心里充满了严肃的、我自己选择的而且是由我自己争取得来的幸福；这是我自己能够和有权获得的唯一的幸福。老实说，甚至不是我的心灵在歌唱，而是我的全身心都充满了这种美好的和欢乐的预感：我将和我已参与他们事业的人们取得新的精神上的一致。

第　二　部

保　卫　者

抵抗运动委员会

七月里，我每星期两个晚上到“西班牙橡树”大庄园去学习射击。有时我经过离公路不远的指挥所到那里去；有时，我穿过哈勒姆公园，再走菜园和果园之间的蜿蜒曲折的小道；有时，我绕个大圈子，经过大塑像旁，由大门进入庄园。我所以能够坚持学习射击，老实说，只是因为这时候始终有一个意念在支配着我：我必须履行自己的天职。我学习射击，多半是由弗兰斯教练，偶尔也由鲁朗特或约翰指教。起初，我害怕枪声太响，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对此似乎毫不在意。

“公路上嘈杂得很，”他们开导我说。“即使有人听见枪响，也以为是守林人在开枪。”

我比自己预期的时间更快地熟悉了射击。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手枪只是我手臂的机械延长，我的手臂好象能直接发现目标似的。每一次学完射击，我们大家就聚集到设在莫年住宅的指挥所里。渐渐地我差不多已和全组队员相识了。莫年本人我也在庭园里看见过几次；这是个高身材的人，秃顶，头顶上凹凸不平，嘴边有很深的皱纹；刚毅的脸上，一对淡蓝色的眼睛显露着沉思的和有点孩子气的神情；莫年步履略现滞缓。他头一次看见我时，眼神中显得有点惊奇；以后几次，他就有礼貌地默默给我让路，好像他倒成了自己家里的客人了。他和他一家人住在二楼，可我常常压根儿忘了这里还有他们住着。

这时候抵抗小组还不怎么大。弗兰斯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组必须改编。大概小组成立以后不久，便有几个人被害被捕；有些人调到别的组里去了，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借出去了”；还

有几个春天参加过袭扰活动的组员，在一个时期内还不能出头露面，因此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组的成员主要是工人。组里有钳工、木匠、菜农、司机、办事员和裁缝。甚至有一个把自己的小店铺撇给了妻子的食品杂货商人。他平时很少说话，但是看得出来，他在这里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显而易见，他的顾客向来主要都是平民。

起初，我还刚刚在学习射击的时候，他们从不当着我的面谈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我来到指挥所，只发现有时这些同志不在，有时那些同志不在。他们出去执行任务，这并不对我保密；只不过他们不说去执行什么任务，而我的性格又不喜欢打听同志们认为不必要让我知道的事情。

每到晚上，指挥所里都要进行长久的交谈。谈得最多的是政治。这些谈话跟我和塔妮娅所交谈的完全不同。对这些人来说，政治并不是可以爱过问就过问、不爱过问就不过问的事情。在这里，政治是现实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必须很好地了解，以便知道前进的方向。组员们常收听广播（收音机藏在那只外表很难看的黑色五斗橱里），阅读和讨论所有的秘密报纸，自已撰写并用胶印器印成传单，这些传单后来就由我在城市里大量散发。真正使我惊愕不已的是，我的同志们几乎总是能够准确地回答，对于我们的重大的事业来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会引起怀疑的。他们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都考虑到了行动的合理性和规模，总是服从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的行动首先要对人民群众有利。大多数同志对盟军的轰炸感到气愤，这些轰炸有时摧毁了荷兰城市整片整片的街区；我也听到了他们的叹息，他们为这一点感到悲痛，不过对于盟军还是原谅的。然而，在谈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北非的战役，谈到隆美尔① 的失

败，以及地中海的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们的语气都是够尖刻的。同志们不客气地嘲笑了我，因为我天真地认为那里已经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就是塔妮娅也和我具有同感的。

“非洲，还不是第二战场，汉娜，”弗兰斯对我说。“只有能从红军面前把敌人的可观兵力吸引过来的出师，那才是第二战场。在东方，仍然还有两百个以上的德国师团……非洲的行动，只不过是在这头法西斯猛兽身上稍微刺激了一下而已；而这头猛兽则必须予以彻底消灭。”

“我们和盟国可走运，”艾迪有一次嘲笑说。“战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是英国保守党人的主要指望和安慰哪！”

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了，英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表现了多少热情和勇敢吗？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而约翰却指出说：

“这一点你说得非常好：英国的人民。英国人民愿意战斗再战斗……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低估。可掌握政权的那些先生们呢？难道他们也是这样情愿作战的吗？”

我明白了，世界上有些事物，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正好像有些事物是我的同志们所完全不知道的一样。比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我懂得的东西要多得多。可是现在我才明白，懂得无关紧要的东西是一回事，懂得真正重要的东西又是一回事；而我最感陌生和最模糊的，正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我看出，他们对人和生活的认识，是直接根据他们生活的环境得来的。弗兰斯年轻时曾在冶金工厂干活。后来他成了工会工作者（所以他会有体面的深棕色衣服、活领子和打得很仔细的领结啊，我多少有点嘲笑地想）。他的妻子患了结核病，躺在希列哥姆的亲戚

① 德寇元帅。

家里。他间或去探望她，每一次回来，总是无精打采、沉默寡言的；要过几天以后，他的话才又多起来。他一心想立功，急于把一些新的计划提交讨论；我每一次都发现，其中有两三个计划纯粹是幻想。鲁朗特做过泥水匠。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是共产党员了。他曾被选为市政会候补议员；他告诉我（当然是在晚一些时候告诉我的），他不敢担任这个工作。他流浪于北荷兰省和南荷兰省，在职业介绍所登过记，做过小买卖，和工人们谈过天，掘过树墩；战时动员的日子里，鲁朗特在鹿特丹①工作，并在那里经历了轰炸。阿姆斯特丹准备二月大罢工时，他曾在哈勒姆各工厂散发号召书；德国侦缉机关搜捕他，他才迅速转入地下。有一天傍晚，鲁朗特代替弗兰斯陪我去练习射击，他对我说，有一次党的教导员到他家里，说要派他参加武装抵抗运动，他差点没发晕。我吃惊了，难道一个看来如此勇敢、自信的人，也会感到害怕吗？他显然看出我在吃惊：他那灰色的眼睛失神了。他揉着自己的方下巴，慢慢地说：

"是呀……以前我从来没有杀害过活物……连鸡都没有杀过，甚至连苍蝇也没有拍死过。可人家突然往你手里塞上这么个'大炮'，对你说：'放吧！朝着人放！……'"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反问道。

"那还用说，法西斯匪徒和卖国贼——一帮早就该死的畜生呗。可你倒试试把子弹射进一个活生生的人，射进一个你从没见过的坏蛋身上看看……你要知道，汉娜，"他赶紧补充说，"如果你落到打过你、折磨过你的人的手里，或者你知道他抓过你的同志并且侮辱过他们，或者你在集中营里蹲过几个月，亲身体验

① 荷兰西南部大城市，全国最大的商港。

过他们是怎么对待人的……那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

“鲁朗特，”我问，“法西斯匪徒是怎样对待人们的，难道就那么难以想象吗？”

他叹了口气，转动着老式手枪的转轮说：

“对，老实说，我就很不容易想象；我每一次都不得不强迫自己追忆那些牺牲的或者被他们处决的人……”

“我却不是这样，”我说。“我很明确我为什么要开枪！”

弗兰斯、鲁朗特，还有大多数组员，从来都不讲他们做的事。约翰，这个哈勒麦尔·麦尔围垦地[1]菜农的儿子，却完全不是这样。战前，他当过各种各样失业工人委员会的委员，领导过各种农业工人运动。他很乐于谈论往事。

“艾迪，你还记得那列货车失火的事吗？鲁朗特，我们袭击阿敦豪特仓库，搞到了足够用半年的弹药，这事你还没忘记吧？还有市立公园里那个党卫军军官，因为远处已经出现了德国鬼子，我们匆忙把他埋掉了，这你也没忘记吧？”

别人通常总是尽力拦着不让他说，有时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有时也相当粗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说说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性格。随着我与他们相处的日益亲近，我越来越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我以为，约翰的这一类回忆有助于他完成任务，正如鲁朗特每一次要杀死强盗的时候，总要让自己回忆强盗们所犯过的残暴罪行。将近夏末，我搞清楚了哪些组员是共产党员。有一些人是自己告诉我的；另一些人没直接说，但是在讨论我们的计划时，他们自己的表白证明了他们是共产党员。其实，组里所有的男人都在生活中经历过同样的一些

[1] 或译“沿海垸田”。荷兰等地滨海的排水耕作地区。这些地区低于海平面，周围筑有堤坝以防淹没，中有许多水渠相通，可供农业、养花业之用。

考验——危机时期，柯林[1]政府的苛政，跑职业介绍所，罢工，找工作，——经历过夺去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期的那些阴暗动荡的岁月；他们常常回忆起一些从来没有对我提到过的人的名字和事迹，大家的反应都很热烈。没有一个人不激动的。他们对所有的谈话做出的结论——而且是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一致同意的——只有一个：战后的生活一定会变样。绝不能让它保留老样子：忧患终身，妇女早衰，对未来没有信心，一切听天由命。未来的生活应该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听见，就连食品杂货商人，这个以寡言出名的人，也是这么说的；使我惊异的是，我发觉他还信教，是一个自己信奉宗教但并不强迫别人信教的人。他总是心平气和、勤勉踏实和深谋远虑，正如我所想象的最好的基督教徒那样。他不知为什么管我叫"人子"[2]，我不知道原因，他常常会想起些古怪的念头。这个称呼，他通常在隆重的场合使用，不过有时候也在一般情况下用用。例如，他说："汉娜这个人子敲得对，找到了为人民复仇的道路。"或者请求说："劳驾，人子，请给我倒杯茶。"

多亏食品杂货商人，我们组里至今还贮存有茶叶和若干食物，这些东西，别的居民只能得到一丁点，或者根本就弄不到……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生活没有激起这些人——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人——的愤怒和仇恨。这些人都有某种根深蒂固的本性，以至于总怀着在我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怀有的那种希望来观察人和事物。偶尔我的同志们也会突然碰到高兴的事，这时我们指挥所里就会兴起一片笑声和歌声。

---

[1] 格·柯林(1869—1941)，荷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首相。

[2] 据《圣经》，耶稣自称"人子"。

我很快就完全明白了，教会这些人如此生活和如此思想的，不仅仅是国土沦亡和抵抗运动，虽然他们现在的生活或许比战前要鲜明和充实。他们原本都是被迫为生活而斗争的；他们始终必须顶着逆风、逆流而进。倘若他们的斗争有一天陡然中断，那他们真该吃惊甚至感到茫然失措了。我思索着自己往日的生活：它过得风平浪静，周围全都有保险的屏障，——从家里到学校，从中学到大学；我觉得，所有这些漫长的年月，我好像都是在生活的最深处度过的，犹如处在无力醒来的睡梦之中。

徒劳往返

阿达突然来函，这次是一张风景明信片。我急急忙忙赶到阿姆斯特丹。阿达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塔妮娅被送到维斯特博克集中营去了。这个消息缓和了长久以来情况不明所造成的紧张，可也引起了新的痛苦和焦虑。

我陷在沉默中，不断地思索着现在能为塔妮娅做些什么。阿达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情，她沮丧地摇摇头。

“是的，汉娜，我知道情况严重。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应该说这是意料中的事……”

我站起身，开始在房间里走动。

“我不能就这么扔下塔妮娅撒手不管呀，”我说。“将来我会无休止地责备自己的……”

阿达担心地问道：

“你想怎么办？搞武装袭击？”

我伤心地摇摇头：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我不能让我的同志们为此去冒生命危险。

“不，”我回答说。“不搞什么袭击……我只是想减轻减轻她的苦痛……如果我这样哪怕多少能对她有点益处也好……你想想看，多么残暴的虐待在威胁着她啊。”

阿达似乎非常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不过她并没有坚持要我告诉她，我究竟打算怎么办。

回到家里，我一说出“维斯特博克”这个名称，大家全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沮丧。维斯特博克原来是个犹太人的劳动营，里面的人也可以出来，可这早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如今“维斯特博克”这个词仿佛已成了地狱之门的标志。尤迪菲一下子全身都缩紧了，好像塔妮娅的消息使她那本来就够脆弱的身体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父亲不断地擦拭着眼镜片。

“到底怎么办呢？”母亲问。她最先回过神来；看来，她已经明白，我不会就此罢休的。

“我到维斯特博克去，”我说。“给她送衣服、肥皂和钱去。她蹲在监狱里，那多半就是滚在泥坑里过日子，饿得虚弱不堪了。”

“可你确信那里准许给囚犯送东西吗？”父亲问。他重新戴上了眼镜，现在他用忧伤和敬佩的眼光看着我了。

“不管怎样得去试一试，”我答道。“必须试一试！”

“如果需要，”父亲说，“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不能拒绝父亲这个要求，我甚至感谢父亲。母亲和尤迪菲对我们的决定毫无异议。我们立刻动手拾掇东西；我们尽自所有，带上能带的一切：毛料衣服，我的还结实可穿的上街的鞋子，节省下来的食物。我给塔妮娅写了一张便条：“愿你刚强、勇敢、坚定。我深信你经受得住一切！”至于我满怀不祥的预感，却只字未提。

我们的旅行成了真正的考验。虽然我们很早就到达车站，但火车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车厢里闷热得很；列车随处停车，一停就是好久，讨厌极了：想必是遇上了空袭警报。每到一站，都有许多热得疲惫不堪的人不顾死活硬往车厢里挤，上车的人比下车的人多得多。我现在甚至想象不出，我们是怎样搭上去德伦特①的汽车的。疯狂的人流拥着我们，我们只得顺从地随着流动。我看见父亲满脸大汗，汗水一直往衬衣领子上淌。我暗中敬佩父亲的顽强。

集中营设在一个岗峦起伏的、几乎是清幽绝俗的地方，周围种着柳树和小橡树，掩蔽着集中营的一部分。近旁生长着庄稼，显出一片和平景象，这是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令人愉快的景象。从这样的背景上，不可能想象得到，在那不可接近的围墙里面，在铁丝网和阴暗的栅栏门背后正在制造的惨剧。父亲累得要命，他坐在路边等我的时候，我跟一个德国哨兵谈了好半天。最后，那个士兵总算去领来一个侦缉队的人。这人穿着便衣，讲的是荷兰话。他劈头就问我们来找谁。他面孔瘦削呆板，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他厚颜无耻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微微笑笑，说道：

“您大概是个莽撞姑娘。不过我倒很喜欢无赖女人，尤其是，如果她们长着像您这样华美的火红色头发。所以我这就到办公室去打听一下。”

我扭过脸去——我再也不能忍受他那对细小如豆的眼睛的逼视，再也不能听他那伪善的腔调。他让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出来了，可他说集中营里没有塔妮娅。我绝望了，结结巴巴地说，大概是搞错了。他立即声明，德国管理人员从来不

① 荷兰东北部省名。

出差错。接着他又伪善轻薄地笑起来。

“我不明白，”他说，“看样子您是个真正的雅利安人，干吗为一个犹太婆娘这么着急哪！”

我意识到了危险，明白应该趁早离开此地。我和父亲勉强背着沉重的包袱，垂头丧气地踏上了归途。等我们走得离那可憎的集中营已经相当远，走出了可恶的密探的视界的时候，我再也支持不住了。我倚着父亲的肩膀，尽情哭诉起自己的要命的疲劳和绝望来：塔妮娅已经被遣送到波兰去了啊！……

我们勉强赶上末班火车。归途的情况，比通常可以想象得到的还要可怕。只不过，像拥挤和炎热，胳膊肘碰了我，箱子撞疼了我，脚被踩着了，这些我在当时都不大感觉得到了。我内心感到钝痛，好像有层厚铠甲紧紧箍着我的身体。

列车到达阿麦斯福特[1]已经天黑了，月台上一片奇怪的紧张和忙乱。这并不是枢纽站上通常出现的人人都拼命向前挤，为自己争夺一个插足之地的那种拥挤。人们在叫嚷着什么，彼此交谈着。起初这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父亲忽然碰碰我的衣袖说：

“你听见了吗，汉娜？”

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他的声音完全变了，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同时又含有欢乐的、勉强抑制住的激动。我开始留意听，并且听出了月台上和车厢里的一声声的叫喊。人们在互相报告消息。这些消息像阵阵急风刮进了我们这列停靠在车站上的列车里；大家纷纷重复着这些新闻：

“……美国人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啦……”“墨索里尼被国王逮捕了！”“意大利全国都在举行反法西斯和反战示威！”

---

① 荷兰中部的一个城市，有铁路通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

我生来第一次听到我父亲提起上帝的名字。他轻轻地说：

"全能的主啊，但愿这是事实！……"

我竟如此疲惫、震惊和沮丧，以致好容易才明白这些喊声的意思。不过我有些忐忑不安，人们高声说着新的消息，竟然全不掩饰自己欢乐的心情。我不由得四下顾盼，担心黑暗中会不会突然闪出一个穿军装的德国鬼子来。然而，看来在人群中不可能找到一个德国鬼子、德国保安警察或者法西斯坏蛋。如果他们在场，不知为什么，他们也没敢哼一声。可我又不知不觉模糊地想到："东战场上仍旧有两百个以上的德国师团……塔妮娅正在遣送波兰的途中！"我绝望地抓住了父亲的手。他轻轻地拍拍我的手。他大概以为，我的眼泪是由于神经的猛然松弛和欢乐而涌出来的。

第一道裂口

第二天我到了指挥所。我们的同志几乎全都到了。他们兴奋得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墨索里尼垮台和解散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事。晚报报道了更多的消息。以巴多里奥元帅① 为首的新政府组成，他声称将继续作战。希特勒已经向他表示愿意派警察部队到意大利去，以便恢复法西斯统治对意大利人民的威慑力量。可是这一措施显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在意大利，全国各地反"轴心"和争取缔结和约的游行示威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对这个消息都深感满足。同志们尽情地对"领袖"② 作了辛辣的讽刺。我终于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象着墨索里尼，这个长

① 巴多里奥（1871—1956），意大利反动军事家和政客。

② 指墨索里尼。

着罗马皇帝那样的颚骨的吹牛大王和暴君，想象着他建立在利帕里群岛[1]的骇人听闻的感化区；他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丧失了儿子，他的儿子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而主要的是，他丧失了自己唯一感兴趣的东西：政权！这简直像古典悲剧，我想。命运和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涅墨西斯[2]惩治了这个罪犯。

等同志们奚落够了垮台的统治者，弗兰斯仿佛发表临葬演说似的，声调庄严地说：

"他们这是活该。任何一个工人阶级叛徒的下场都会是这样的……伙伴们，记住我的话：这个'轴心'就要四处裂口……让这样的打击再多来些吧！"

"并且要再快一些，"艾迪插进来说。"否则英国人和美国人又会误事的，就像他们延误了拯救犹太人那样！……"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眼下是个机会，我就赶忙在弗兰斯旁边坐下来，小心地问道：

"我执行任务的时机该到了吧？"

我这一问，略微有点触犯了他，他惊讶地看看我，仿佛执行任务的权利只属于他一个人。然后他说：

"你暂时可以帮我们印刷和散发《真理报》……不过，请别以为这个工作不怎么重要。"

我轻轻地说：

"那我干吗还要学习射击呢，弗兰斯？"

他这才温厚地但是十分严肃地笑了，他拍了拍我这次出门回来一直还在酸痛的肩膀：

---

① 第勒尼安海中的火山岛群，属意大利，位于西西里岛北面近海区。

② 希腊神话中司报复的女神；据说如有人破坏了神所建立的制度，就要受到她的惩治。

"别担心，会轮到你的……目前我必须节约力量。我们小组现在不像先前那么强大。我不能没有后备力量。"

后来他亲自陪我到秘密油印《真理报》的地方。这是在哈勒姆北区。油印机藏在一所陈旧的工人小屋的顶间里。揭开天窗盖，布上小梯子，才进得了这个顶间。这架油印机，是鲁朗特和杨去年冬天从法西斯职业介绍所的办公室里"带出来"的。

我差不多总是和我们小组的某个组员一起工作的。房东的女儿帮助我们散发报纸。这是一个面颊红润的非常快活的姑娘，比我小一两岁。此外，还有几个年轻人分送报纸，他们带着塞得鼓鼓的挂包，骑上自行车，若无其事地满城跑。他们都是热忱、勇敢的人。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虽然是鼓舞人心的，但也是杂乱的，东战场的消息就好得多。自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以来，红军以往还很少像在顿涅茨克战场上这样沉重和这样顺利地打击过法西斯匪徒，很少像这样迅速地向前推进。红军成万成万地歼灭希特勒军队。我每次到指挥所，都听到说又有满载德国兵的军用列车从我国开往东战场。

"士兵的年龄一次比一次小，"鲁朗特有一次对我说。"今天我在车站上遇见的，看样子最多十六七岁。不管怎么说，我好像总有些可怜他们。多少天真烂漫的孩子要送掉他们年轻的生命，要用自己的肉体去填那无穷无尽的弹坑。沉重的装具压得他们弯腰曲背，都快要跌倒了……"

"不，鲁尔，我看你该去做保姆了，"艾迪无情地说。

我看看鲁朗特；我完全与他有同感，我以为他会立刻冒起火来的。然而他依旧静静地坐着，绞着他那泥水匠的短而有力的手指头。

“我想到，”他没理会艾迪含讥讽的责备，说道，“我的大孩子再过两年就满十六岁了……我看见德国兵，这些孩子，他们稚气的脸上都凝结着对死亡的恐惧。”

“这才好呢，”约翰也加入了谈话，他是我们组里最年轻的组员之一，还没有结婚。“就该这样教训教训他们。我一点也不可怜这些坏蛋。让德国人民也学学意大利人民的榜样，起来拒绝战争。”

“消灭，必须把所有这些混蛋全都消灭！”钳工托姆大声说。

弗兰斯插进来结束这段谈话说：

“有两种情况，朋友们，在德国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一方面是希特勒匪徒和他们的走狗，而另一方面呢，是德国人民。你们知道，斯大林说过：‘……希特勒匪徒来了又去了，而德国人民、德国这个国家却始终存在。’”

我看了看同志们。他们嘟哝了几声，便不作声了。

每当天一黑，便传来了英国飞机刺耳的马达声。高射炮每天夜里都诉苦似的砰砰轰击着；汉堡已经被炸毁了，据报道，城里的居民正大批大批逃奔他乡。看来，柏林的疏散只是时间问题了。墨索里尼的垮台在奥地利也引起了动荡。德国武装部队突然开始怀疑自己队伍中的奥地利士兵，怀疑他们可能成为危害德国的敌人和阴谋者。各处的奥地利连队不时被解散，士兵被分配到各个兵团中去。今年夏天，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抵抗活动的一些国家也发生了骚动；在丹麦，罢工已经习以为常。荷兰已公布禁令，凡非定居在荷兰北部和东部诸省的人，均不得往来于各该地区。据说，法西斯匪徒的境况不妙：袭击配给局、谋杀警察局和宪兵队官员中的卖国贼之类的事件更加频繁了。甚至还有传说，警察局正在整肃其自身的队伍，清除其中的背叛

者，又说纳粹匪徒准备不久就要为荷兰籍的爱国警察建立感化营。此外，尽人皆知，在禁止往来的各个省区，地下工作者已多不胜数；他们经常被搜捕，但是我们听说，这并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这些省区的居民机警地掩护了那些被德国鬼子侦缉的人。

九月初，不出弗兰斯所料，"轴心"崩溃了：意大利宣布投降，意大利舰队已驶进盟国的港口。

我们从德国的广播中听到希特勒的演说，他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那样号叫着，说"堕落的金融寡头政治"永远也不可能勾引德国人民参与类似七月二十五日事件① 那样的阴谋，又说意大利其实从来就是他的绊脚石，还说他现在已经摆脱这些羁绊，他将以更大的信心和热情来进行战争云云。

"直到死亡，到迅速完蛋！……"等我把希特勒的演说词翻译给同志们听了以后，艾迪模仿着歌剧演员高声唱道。这天晚上，我们在自己的指挥所里尽情地笑呀，唱呀，嬉闹呀……

绝望中的勇敢

九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听说，党卫军伞兵把墨索里尼救出监狱，转送到法西斯匪徒的占领区去了。就在这个晚上，有人打电话给我。我拿起听筒：是个女人的声音，有点嘶哑，或许是故意压低嗓音的，起初我听不出是谁。对方连续喊着我的名字："汉娜吗？是汉娜吧?!"

"对，是我……你是谁?"

用不着再问第二遍了，这当口我听出了对方是谁，虽然这是

① 指促使墨索里尼独裁政权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垮台的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运动。

难于置信的。我避开电话听筒，用全屋都听得见的声音喊了一声。

"是塔妮娅！……"

正坐在客厅里的父亲、母亲和尤迪菲，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都慌慌张张围上来。我直发抖。我的手在打颤，声音也变了：

"塔妮娅……你在哪儿？"

"我在天主教医院打电话，"声音嘶哑然而仍是那么熟悉。这声音听起来那么阴沉，仿佛来自阴间。"你能到我这里来吗？"

"我就来，"我急忙答应了，虽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和我通电话的会真是塔妮娅。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过：这是阴谋，是圈套！我忽然想到那长着一对小眼睛、没有血色的呆板的面孔，那是卖身投靠外国人并采用最卑鄙的手段抓人的叛徒的典型特征。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就消失了，让位给了另一种思想：我必须弄清楚塔妮娅的情况；于是我立刻骑上了自行车。

我把上身低俯在车把上，拼命疾驰；快到医院时，我骑得慢了些，也比较当心了。在离长长的医院大楼一百米的地方，我下了车子，开始向四面张望。我忽然看见了塔妮娅。她的样子看上去好像非常奇怪，不过那确实是她。她也发现了我，犹豫不决地举起了一只手。我的心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朝她走过去。脑子里又闪过一个想法：倘若这是一个圈套呢？万一是希特勒的走狗、保安队的法西斯警察把塔妮娅摆出来作为诱饵呢？他们埋伏着，只要我一到场，就把我抓住。我抬手示意，让塔妮妮过来。她踏着略带迟疑、胆怯和疲乏的步子向我走来。我看看医院的大门口。没有人监视塔妮娅。我把自行车靠在房墙上，迎上塔妮娅，默默地抱住了她。她紧紧地偎着我有好几秒钟，像个孩子。

“快，快，”我催促她，“你坐书包架！”

我们以疯狂的速度飞驰回家；我激动得连自行车也骑不稳，曲曲弯弯直打拐。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我们沿着屋后的小路到了家，从栅栏门进入小花园。我一下子把塔妮娅推进房间，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母亲和尤迪菲急忙迎着塔妮娅，看到她的样子不禁忽然一楞，然后又扑过去抱住了她。父亲干咳了一阵，嘟哝了一声，喃喃自语了几句，然后又咳嗽起来。等轮到他向塔妮娅问好时，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久久地握着塔妮娅的手。我站在旁边，看着父亲和塔妮娅。这时候我才把塔妮娅端详了一番。她身上穿着肥大得异样的布连衫裙，上身极长，领口大得露出了肩头，外面披着她自己那件黑色风衣。脚上是黑色的大鞋子和令人生厌的粉红色劣等袜子。塔妮娅往日的优雅仪态已荡然无存。然而并非服装使她变样了，是她的脸变样了。脸消瘦了，眼睛下边出现了青晕，两鬓露出青筋，悲伤地紧闭着的嘴显得特别宽；双眼失去了往日那种温柔的忧郁情调，正饱含着恐惧，流露出阴沉和类似绝望的神情。她环顾四周，看着我们一个个。看来，她自己还不相信她已归来。父亲把椅子推到她面前。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

“你饿了吧？要喝茶吗？”

“我饿得要命，”塔妮娅开口了，声音还是像原先那么嘶哑。

母亲给她拿来了面包、果酱和茶。塔妮娅的吃相看上去真可怕，她贪婪地吞咽着食物，活像一头牲口，连面包块都来不及嚼烂就往肚子里咽。父亲、母亲和尤迪菲退到隔壁房间去了。我也想跟着他们出去，可是塔妮娅做手势留住了我。

“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说。

她把所有的食物吃得精光，茶也喝得点滴不剩。随后就合上眼睛，往椅背上一靠。还没等我醒悟过来，她已经睡着了。

整个晚上和夜里，我们都在听塔妮娅叙述。母亲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收拾成一堆——衣服上满是虱子。塔妮娅洗了澡，换了衣服。现在，她穿着自己旧日的连衫裙，看起来更加消瘦和脆弱。她嘶哑的嗓音后来几天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然而她却不停地、急促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讲着，讲着。神经质的震颤，无缘无故的笑声，过分紧张地说出来的那些话语，都表明，她已重新集中起精神，在绝望中产生了勇敢，似乎塔妮娅心中已酝酿成熟了一个我还未能理解的意图。

塔妮娅开始讲到设在"荷兰剧院"内的监狱，讲到她面对那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和面临种种惨状时的恐惧。德国强盗先开始抢劫：没收被关押人的表、戒指、饰物和钱，装箱运走。然后面带讥笑的希特勒喽罗们来进行搜查；他们把三十个脱光了衣服的妇人和姑娘赶到角落里，不知羞耻地在她们身上乱抓乱摸。最初，被囚禁的人们还怀着徒然的希望，盼着有人来解救，使他们摆脱那恶臭、肮脏、祷告声和痛哭声。可随后人们就完全冷漠了；他们已不再抱怨，紧靠着别人的身体躺在光溜溜的地板上，沉入了睡梦，别的人暂时也都还活着，不过他们只有一个渴望——忘却一切。人们的好奇心日益迟钝；谁已永远地去了，谁又来了，他们全不感兴趣。有些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处境，新来的人不久也就会和先来的人一样变得迟钝起来的。先来的和新来的人之间，时时出现令人肝肠寸断的相逢场面。经过一定时期，他们即被押往集中营，同时遭到比对待畜生还要粗野的分类：儿女和父母亲、兄弟和姐妹、丈夫和妻子都被拆散。她，塔妮娅，也和别的人一起被推上大卡车，开到月台上下来，被辱骂着关进开

往德伦特的火车。

“你果真到维斯特博克去了?”父亲问。

塔妮娅看了他一眼;她这时候才知道我和父亲去过集中营。她嘶哑地笑起来,说:

“我知道我是已经被指定要送到那里去的。有一次甚至点到了我的名字。可是后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又把我留下了。过了两星期,才轮到了我。车厢里坐着个荷兰警察监守我们,他年纪很轻,对这个任务感到非常为难;他不知该怎么对待我们才好。有时候他很客气,而有时候又乱吆喝起来。我们向他提出一些关于集中营的问题。谁知他根本就没有到过那里。两小时以后,他的神态已经成了这副样子,好像他宁愿开枪自杀了。不过我认准了一点:这是我脱险的唯一机会。当我们的火车开过霍赫芬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火车忽然减低了速度。我站起身来对警察说:‘请给我开开门。’

“他天真而慌张地注视着我,好像我出其不意劈脸打了他似的。‘把门打开!’我高声说。同车厢的人们喊道,要是我现在跳下去,一定会粉身碎骨的。我笑了,我说:‘得了吧!反正总是个死,早个把月或是晚个把月,还不是一个样……’警察犹豫不决地站起来,仿佛这里他管不住了,看样子他准备呼救。我立即抓住他的肩膀,又喊了一声:‘把门打开!’我好像还骂了一句。火车开得稍快了点。我试着推推门。可是钥匙在警察身上。他一句话也没说,便把门打开了;他的额上像快死的病人那样渗出了汗水。大家都屏住了呼吸。我纵身跳下去的时候,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我从斜坡上滚下去,一直滚到沟里。火车加速朝前驶去。我摸摸周身:骨头没有摔断。我往上爬去,爬上了沟对面的平地上。连风衣和连衫裙我都没拧一下。这时我突然听到汽

笛声和刹车的可怕的嘎吱声：火车停下了。传来了喊叫声，有德语，也有荷语：'有人跳车了！有人跑啦！'我拔腿就跑。我奔过耕地，穿过灌木林。幸亏天色已经昏暗了。我向前飞奔着，脚下磕磕绊绊的，摔倒了，爬起来又跑。一直还听得见喊叫声。我不记得他们从哪边朝我开的枪，开了几次枪。除了陷进松软的沙土和跌倒以外，我一秒钟也没停留过。在高高的灌木密林里有一条曲折的路，我当即拐上这条路。不久，在绿树篱笆后面出现了一所农家小屋。我敲敲窗子。一个女人给我开了门。她一看见我，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并插上门闩。我出了院子，又来到旷野荒郊。天已经黑得什么都看不清了，望去是一片灰蒙蒙的。我听见，远方好像有机车起动的喷气声。我走上一条相当宽的大路。到处不见人影。月亮升起来了，讨厌的月光照亮了一切。平原上看不见一所房屋，只是听见狗叫。于是我朝狗叫的方向走去。狗叫声有时传来，有时却好久没有声息，我只得估摸着往前走；大约过了几个小时，我才碰到第二所小屋。现在我终于又到了有人的地方；这里有五六个彼此相距很近的畜牧场。我叩了最近一所小屋子的门，这个庄户人家接待了我，还给了我吃的。除了身上已吹干了的风衣之外，我把自己的衣服都留给他们了。女主人把她的连衫裙给了我。我记下了她的地址。我没敢冒险在那里多停留，虽然我很想稍微歇息一下。我必须整夜不停地赶路。这家主人给我指点了一条通过森林的路。我从来没有在夜里进过森林，以前也未必敢这么做。这一次，森林倒成了我真正安全的天堂。第二天清晨，我终于到了梅珀尔。天刚破晓，我就到车站了；那里停着一列往南开的货车；机车正烧好蒸汽待发。我爬到最近的一个制动台上。我当下就睡着了。不过火车一开动，我就醒了。我认出这是维柳维①。

"火车到了阿麦斯福特站，在调车线上停车了。我发现有一群铁路工人在线路上干活。我爬下制动台，向他们走去。他们睁圆了眼睛望着我，像看见了鬼魂似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从载运犹太人的火车上跳下来的，我要到哈勒姆去。工人们互相交换了眼色，其中一个人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没有钱。他们彼此低声说了一阵，都开始摸衣袋了。他们一共凑了九盾钱，全给了我。一个工人领我走过施工区来到月台上；他去售票处，不一会拿了一张到哈勒姆的车票转来；他手上还剩下两盾来钱，也给了我。我必须搭乘火车，即使这个时候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在通缉我。我没有任何证件足以应付车上的检查。幸而我没有遇到检查。在阿姆斯特丹我坐上了浅蓝色的电车。在中间的车厢台上，站着人数不很多的一群女学生。在到哈勒姆的一路上，我一直站在这些女学生中间。现在我已经到了这里，在你们身边了！"

尤迪菲的脸上慢慢淌下了眼泪；塔妮娅猛地向尤迪菲转过身去。

"别哭！"她说。"你活着，我活着，我们大家都活着。我要想办法救自己。"

尤迪菲非常激动，为了竭力掩盖这种情绪，用手帕捂着嘴。我们没讲一句话。塔妮娅话中的意思，我直到好久以后才弄明白。但是，当时我却很钦佩她，不，更准确地说，我是在替她害怕，我意识到，有一种盲目的自卫心情在推动着她。

新认识的人

十月初的一个傍晚，暮色已开始降临城市，我骑着自行车到

① 地名，位于荷兰中部。

指挥所去。今年秋季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太阳比往年此时更加灿烂。然而在这阳光普照的美景背后却潜藏着死亡。九月最后一天，在阿姆斯特丹有十九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杀害了。报上刊载了消息，同时发表了编辑部的荒谬的例行评论，说占领当局实已忍无可忍。连日来，这个可怕的消息一直折磨着我。在我到达莫年住宅里去商量塔妮娅的问题以前，街上已经黑下来了。在暗淡的灯光下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使人觉得更加闷热，更加难受。时常可以看见一条条漆黑的侧巷，仿佛那里就直通地狱。轮廓模糊的末班电车一辆辆从我身边驶过，车上都挤得满满的，连踏板上都是人。车辆在街道的房屋前驶过，活像是些镶上金属爪子和眼缝里闪着磷光的动物化石，在山间峭壁或是什么监狱的无门无窗的牢墙面前爬行。黑暗中传来看不见的行人的脚步声，还有那人们一按开关杆便会燃起幽灵似的蓝色火花的煤气灯——所谓“小发电机”的嗡嗡声。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和虚幻，仿佛我们被抛到了比中世纪还要早的野蛮时期。为塔妮娅而担忧，对十九位被害者的怀念，对已经开始的迫害的忧虑，这一切都萦绕在我的脑际。我还很少如此强烈和深刻地感觉到周围气氛的恐怖。从前我还不曾想到，法西斯主义就像在给人的灵魂灌输鼠疫病毒；可是那天晚上我恰好想到了这一点；我好像觉得，法西斯的传染病毒正在那黑暗中蔓延，感染着还健康的人。我又记起了塔妮娅春天讲过的话：“一切都失去了自己的幽雅和芳香。我们呼吸着的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毒气了……”我在指挥所附近下车的时候，这种感觉越发厉害了，我没敢进屋去，担心马上要呕吐。我开始在花园里来回走动，以图克制自己，压服那少有的恶心。

我在屋后这样走了几分钟，忽然有个人小心地开门走出来，

我迎面走过去。根据又矮又宽的身影判断，这是托姆。他站住了；我听见一个特殊的声音——手枪的保险机打开了。我笑了——我知道没有什么可怕的。安全信号——松树枝插在分隔花园和道路的篱笆上；我骑车来的时候还碰到树枝呢。

“哎，是我呀，我是‘人子’！”我说。

“耶稣啊！”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原来是个毛丫头！”接着这个人压低了声音，强压着好奇心，说：“啊啊，我明白了，您是新来的女组员。”

我毫不见怪陌生人的话，跟着他进了屋子。他显然是这里的客人，不过是这样的客人，他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用说，他也听说我已经加入了抵抗小组。在坐着我们四五个同志的大房间里，我看清了这个陌生人。

他站在房间正中的电灯下，毫不掩饰地注意打量着我。他那宽阔矮壮的身躯，真像托姆，个子只和我一般高；他的侧面看上去甚至是瘦弱的。浅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而在前额和鬓边略现鬈曲。眉毛和睫毛颜色显然深些，也生得浓密些；在灯光下看起来，脸上已给太阳晒成柔和的黄棕色，因此那双蔚蓝色眼睛显得更加刚毅和富于表现力。

他穿着宽大的拉链夹克衫，里面是白衬衫；脚上穿着黑色运动鞋。他的外表像一个从事业余体育活动的工人；他可能是个赛跑运动员或自行车运动员。他似乎很满意自己所作的观察，突然对我笑了一笑，这时他的面容完全开朗了；可是他眼神中的刚毅和自信仍然像原先那样。他向我伸出一只晒黑了的手。

“我叫休果，”他用我十分熟悉的肯涅麦兰特地方口音说道。人们在指挥所里谈到不在场的组员的时候，提到他名字的次数要比别人多得多；这里的人们对休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我叫汉娜，”我说。

“‘人子’，”他重复着，又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细密的白牙。“一个满不错的玩笑。好像我们其余的人全是天使的孩子……”

弗兰斯走到我们面前；他那刮得光光的脸上清楚地显露着洋洋得意的神情。

“汉娜，休果是我们的老同志，”他对我说。“他到别处去了一个短时期……嗯，那里也发生过事变，你知道的，五月罢工。休果当时在发电厂工作。嗯，可自从那里轰隆一响以后，党卫军很想找他谈谈。可是休果认为这个荣誉对他未免太大，于是说了声：‘祝您健康’①！”

最后我们都坐下来。灯光在休果头发上变幻着，加深了他脸上的金黄色调。

“是啊，真是太大的荣誉！”休果重复道。“不得不溜走。我在朗堡的荒野里待了整整一个夏天……就是这样！”他还开玩笑地骂了一句。“对太平年月住别墅的人来说，那可能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是对于休果却不然。没有人可以聊天，只有农民老两口子，还有个天主教神甫有时到我们这里来弄点荤油、植物油和菜豆什么的，顺便再给我指点指点真理的道路。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白天我陪两个老人，夜晚就和一只山羊和一头母牛作伴，什么也不干……只是为了挣点工资，我才到荒地上去干挖土的活儿。穷人挣口饭吃可真不容易啊。”

“怎么，不是给你指点了真理的道路吗？”我问休果。

他笑了，开始卷起纸烟。

“指点个什么呀。我早在战前就找到真理的道路了。可怜我们好心的乡村神甫，他还真是卖力哪！”

① 这通常是告别时的用语，这里暗示跑掉了。

我用不着再问，休果所说的“真理的道路”是指什么。我不由地看了看他的手指：他的双手的每一个动作都很灵巧、完善，而且十分自然和从容不迫；所有的手势都恰到好处。我心想：在我面前的是个工人，一个抵抗运动战士，他绝不会做一个多余的手势。而且，机警和从容不迫，大概是他不可改变的天性。

“休果断定，他去跟纳粹匪徒捣乱的时候又到了，”弗兰斯说。“没关系，我们会应用他的技巧的。我们的人手还不够呢。”

弗兰斯接着压低了嗓音，这声音里，又听得出我所熟悉的那种温厚的自负。

“我有两个适合你的好‘任务’，休果……还是在你的老‘世袭领地’里。”

“噢，弗兰斯，你总是这样，满肚子净是出色的计划！”休果说。我觉察到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善意的嘲弄的笑容。“我不会误事的，伙伴们……只要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弗兰斯好像也发现了休果那一现即逝的微笑以及他话中微微带刺。他缩起了脖子。蜗牛一旦碰上了什么麻烦，就是这样躲进壳里去的。我意识到，休果正在用他那务实的机灵来对抗弗兰斯好作不切实际的计划的倾向。我很高兴洞悉了这一事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西班牙橡树”大庄园里的头一次射击课……我走到弗兰斯面前，把他拉到旧长沙发跟前——沉默太使人难堪了。

“我想和你谈谈，弗兰斯，”我说。“谈一个重要问题。”

别的人还在继续谈话。

我打断了弗兰斯对休果的解说，他起初很不高兴。不过等到我说起塔妮娅，特别是我说到她长期留在我家里，据我看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有妨碍甚至有危险的时候，他越来越注意地听我

说了。弗兰斯对我的话紧张地考虑了一会，最后说道：

"我没遇见过这种类型的姑娘，不过我大致想象得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你就不能再和她住在一起了。汉娜，她必须另外搬个地方。"

"我们不能随便把她安置在别人家里，"我解释道。"应该给她找一个可靠的人，必要的时候能够对她加以约束。可是怎么才办得到呢？"

这个夏季，我们掩护过不止一个转入地下的人。有时候办起来也非常困难；不过和塔妮娅的情况比起来，别的就全都不算难事了。可是现在，弗兰斯明确地告诉我，塔妮娅应当离开我们，这时候，我开始觉得塔妮娅的莽撞，可能使我们大家受到连累，这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我想到了阿达。于是我对弗兰斯说，我有个女朋友在阿姆斯特丹，我大概可以请她出个主意。我补充说，她了解塔妮娅的情况。弗兰斯点头表示同意。我看出他的神情十分严肃：当然，他首先考虑的是我，考虑的是自己战士的安全。

这天晚上，我在指挥所里没多停留。我猜想，弗兰斯正急着要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休果。我站在房门口向他们挥手告别的时候，休果和所有的同志一起快活地对我喊"再见！"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愚蠢的嫉妒，虽然我也明白必须克服这种情绪。这是对休果的微微嫉妒，因为他突然出现在指挥所就要去做我早已向往的事情。我几乎深信不疑：我出来以后，他们所进行的谈话，必将是一种男人们的密谋，是秘密协议，要竭尽所能怜惜我，不给我有危险的任务，只因为我是个姑娘。在那闷热的、象天鹅绒一般乌黑的夜里，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这时我又感到了刚才在指挥所里似乎已经有点忘记了的神经紧张。我一离开人们，紧张便

又以新的力量攫住了我。然而，现在这种紧张已经变成了要投身于行动以证实自己有用的强烈要求。我是姑娘还是男人，还不都一样，我再也不愿意让人家怜惜我了！

一张便条

阿达已经知道塔妮娅脱险归来的事。在阿姆斯特丹有个可靠的老年商人替尤迪菲和塔妮娅保存着钱，我到那里去为尤迪菲和塔妮娅取钱的时候，已经把详细情况都讲给阿达听了。现在我必须再和阿达面谈一次。

我把来意告诉她时，发现她当即变得严肃了，好像她现在才明白，塔妮娅住在我家里，给我造成了多么大的危险。而我早已向阿达暗示过抵抗小组的事，这些暗示已足以使她了解一切。但是，这一次阿达还是抱着素有的谨慎态度，什么也不愿答应我，不过我知道，她不会让我去遭殃，她会竭力帮助我的。我们约定，一有什么消息，阿达就寄一张风景明信片给我。

回家的路上，我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因为我在准备安排塔妮娅的命运，好像是为了我自己的方便，而且不经她同意，我就擅自去安排。我决心把这个问题完全说清楚，这样我才能安心；我要开诚布公地向塔妮娅说明，为什么她不再留在我父母家里对她和对我都比较有利。我好容易转弯抹角步行到家，一路上我心里都在琢磨着要对塔妮娅讲的话，怎样说才能使她不见怪。我跨进前厅的门槛，屋子里显得异常寂静。我快步走进客厅，看见侧面的小房间里有灯光，便向那里奔去……我马上发现塔妮娅不在家。

“她在哪里？”我问。我用不着说明我指的是谁。

父亲从桌子上拿起一小张纸递给我。这是塔妮娅写在惯用的淡蓝色纸上的一张便条。我开始看便条：

我再也不能在这里，在这个法西斯地狱里呼吸了。你们看到这张便条时，我已经在去瑞士的路上了。我对你们说过，我决计要救自己。现在我决心做到这一点。在“荷兰剧院”里，有人对我提到过一些能把我送过比利时和法国的人。从此地逃走——这也许是胆怯或轻率的行为，可是我要活！你们为我已尽了一切努力，甚至超出了努力。我衷心感激你们。战后我们会再相见，那时已经自由了。拥抱你们大家，特别是汉娜。请原谅我。别忘记你们不幸的塔妮娅。

我惊愕万分，心慌意乱地看着便条，当我看到最后几个字时，我忽然觉得双腿发软，直打哆嗦。我觉得正是这几个字里包含着秘密。塔妮娅是不幸的。这时我立刻想到：她是否真的想活着；她自己是否相信到得了瑞士并以此获得拯救……她为什么决定去瑞士呢？为什么不是去英国或者譬如说去瑞典呢？我忽然想起，塔妮娅曾对我说过她在战前认识一个德国籍侨民。他早已到瑞士去了。于是，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事情之间不祥的和令人担忧的联系。塔妮娅不切实际地想恢复当年和平生活，因而出走了。她不仅是不幸的，大概还患有精神病，要不她怎么会认为幻想比现实更实际呢。可我呢，我却无法帮助她！

我看见家里所有的三个人都望着我；他们在等着我说出决定性的话来。我把便条放到桌子上，默默地转身走进餐室，在长

沙发上坐下来；我脑子里忽然想起，以前塔妮娅和我一起坐在这里，对我讲到德国籍侨民的事情。

父亲咳了几声，说道：

“她大概是从德伦特回来以后才想起这么干的；她提到过一些人，她在‘荷兰剧院’听说了这些人的地址……”

“她在拿自己的性命冒险！……”母亲这句话说得十分严厉，然而在她的严厉里面却包含着深切的、真诚的担心。尤迪菲低着头，眼睛盯着地板。莫非她也明白，是塔妮娅信里最后几个字的悲剧意味使我说不出话来的？

“我无法想象，她怎么办得到她所想的事，”父亲又说话了。“如今要越过国境，不花钱是办不到的。可塔妮娅没有那么多钱。”

“她当然会去找和她家有往来的那个老商人的，”母亲说。“要知道她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塔妮娅应得的，老商人不能不给她。她是个有办法的倔强姑娘，只要她看准了那是可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就会尽一切可能利用的……”

父亲朝我这面看看。然后他站起身来，站在两个房间之间的门边。

“不过情况既然是这样，我看也是如此……那么今天她大概还在阿姆斯特丹！在替她存钱的人那里！那就还有挽救她的时间！汉娜，你能来得及赶上她的，”父亲声音异常激动地说。“我们还能为她尽些力的！……”

三个人都望着我。我怀着深深的忧伤，慢慢地摇摇头。

“今天我们什么也办不到。就是明天也办不到。永远都办不到了。无论是我，是爸爸你，还是任何别的人，都办不到。塔妮娅是留不住的了。她给自己选定了我们所不能走的道路。无

论她回到这里来，或者到别的地方去，都一个样。塔妮娅……”

我差一点说出来“塔妮娅完了”……我咽下了最后两个字，紧紧地咬住嘴唇。最可怕的是，我似乎觉得“完了”这两个字洪亮而决断地响彻了房间。这两个字我同样能很容易地说出口来的。从父亲、母亲和尤迪菲的脸上，我看出他们全都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站起来走进自己的房间，在一片黑暗中，我仰身躺在床上。我不能淌出一滴眼泪来，虽然哭一哭也许会轻松些。我躺着，一动不动；心里充满了恐惧，我觉得全身好像都麻木了。

任　务

内心的茫然和冰凉的感觉第二天仍旧没有消除。然而晚上我还是到指挥所去了。在那里我只碰到弗兰斯和威南特。弗兰斯看了我一眼；从他脸上可以看出满意的神情，仿佛他想说：“知道吗，我们的小伙子又想出了一个不坏的小把戏哪！……”可是在他仔细注视了我以后，他立刻忧郁起来。

“你的脸色难看得很，”他对我说。“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吧？”

“对，你的气色是不好，”威南特证实说。“病了吗？”

“一切都正常，”我简短地回答。我不愿意当着威南特的面对弗兰斯谈起塔妮娅，谈我们上次曾为之绞尽脑汁的那个问题终于可悲地了结了。弗兰斯父亲般地朝我点点头。

“嗯，那就好……”他脸上现着温和的神情。“可我有个不大的任务给你……啊哈！现在你脸上又泛红啦！”

根据弗兰斯脸上得意的表情，我明白，这个“任务”与我以前执行过的那些任务有点不同。我迫切地等待着，这时他在沙发上坐下了。

"你大概还记得很清楚，我对你讲到过从前在我们组里工作过的两个姑娘，"弗兰斯终于开始说了。"就是安和金卡。金卡头一次开枪打德国鬼子的时候，不过才十五岁。她们俩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这是两个勇敢的女游击队员，"他笑着补充说，好像他现在一下子想起了安和金卡的所作所为以及对我暂时还是秘密的事。"根据我最近得到的情报，这两个姑娘已经转移到特文特了——她们在恩斯赫德有亲戚。她们不得不隐蔽起来……"接着弗兰斯讲得慢了些，也郑重些了："汉娜，你去看看她们，并转达我给她们的任务：在她们那里组织一个抵抗小组。现在不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我派你到那里去，是因为那一带现在还准许妇女往来。"

我沉默了一会，考虑着他的话。我心里完全没有我原来所想的那样高兴。我明白，又是那种曾不止一次闹出笑话的任性的幻想，促使他想出了这个主意；显然是休果的归来使弗兰斯想起了有那么两个姑娘。不过他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我的组长；我不打算违反纪律，况且威南特似乎完完全全同意他的计划。

"她们的情况，你了解得还不怎么多，"我对弗兰斯说。"她们叫安和金卡，再就是她们在恩斯赫德有亲戚……"

弗兰斯得意地微微一笑，说：

"这姐妹俩在特文特大概改了名字。她们的叔叔是党员，目前这个人想必处在地下，他叫埃海林克，是纺织工人。你就去找他们吧！……我可以再给你一两个党员的旧地址；这大概对你会有帮助的。"

"可这两个姑娘大致是什么模样呢？"我问。

"唔，这个……，"弗兰斯含糊地拉长了声调。他搔了搔耳朵，然后摸摸面颊。"我现在仿佛看见她们就在眼前，可是怎么给你

形容呢？……安，是姐姐，她二十来岁，也许是二十一岁；她的头发是深色的，总之，比金卡的头发颜色深些……金卡，十八岁左右，她是妹妹……看上去甚至比她的年龄还稍年轻点……这叫什么呀，”他突然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作家，没法把一切表达得那么准确。小姐妹俩，一个比另一个高些、黑些。安的脸比金卡的窄些，我能再给你补充的就是这一点了……对啦！金卡脖子上有颗痣！”

“这一切未必对我有帮助，弗兰斯，”我说。他的描述并没有给我多大把握。“另外还有件事：你想想看，我找到了她们，如果我说是从你这里去的，他们会相信吗？”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使人信服的本事了，”弗兰斯回答说。“不过你可以对她们说句暗语：‘弗兰斯问，圣特波特碉堡来的弹药在哪里。’”

“但愿我这么一说她们就会相信，”我嘲笑地说。“也许她们会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个圈套，的确也太像了。好吧，我按照指示去办。我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弗兰斯说。

“那就明天吧，”我说。

弗兰斯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到五斗橱前，从里面拿出一叠二盾半的钞票，递给我。

“喏，这是你的弹药。”

威南特不出声地笑着，看着我。

“万不得已时，你就问她们，还记不记得威南特常带给她们的代芬特尔[①]的小面包，”他说。“这大概比暗语更管用。”

---

① 荷兰地名。

“汉娜，现在说别的吧，”弗兰斯接着说，显然，威南特的插话有点触犯了他。“她们目前当然不会有武器。但是她们十分了解，怎样才能搞到武器，我教过她们一些办法的……所以，安和金卡仍然可能都是有‘玩意儿’的。甚至也可能，她们不会一下子就相信你，会拿手枪对着你的胸膛……我已经说过，她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就会有危险。不过这本来就是你所盼望的嘛。”

弗兰斯和威南特嘻嘻笑起来。我把钱分塞进各个衣袋的时候，用辛辣的语调对他说：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怀。那我的手枪呢？”

弗兰斯立刻严肃起来。

“最好把枪留在家里。不过要注意，你必须随身带好适当的证件。”

“就是说，假证件罗，”我明白了。“那么我就拿我们女仆杨涅捷·德·瓦尔德的证件，到特文特去建立联系。”

弗兰斯从报纸上撕下一小块纸角，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给你地址，”他说。“背熟这个地址，然后把纸条毁掉。”

“知道，”我断然说。“还有什么指示吗，组长同志？”

“我的祝福，”他答道。“再没有什么了。”

“我也为你祝福！”威南特大声说。

我朝房门口走去，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做了个在我们指挥所流行的善意嘲笑的鬼脸，喊了句艾迪最爱说的、当时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口号：“直到淌鼻血①！”

屋子里爆发出笑声，隔着房门都听得见。

---

① 意思是：打到最后；斗争到底。

弹药和代芬特尔小面包

我动身到恩斯赫德去，加上在那里寻找，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弗兰斯歪歪斜斜写在小纸片上的两个地址，我已经背熟了，可是我没敢马上就冒险去找这两位党员同志。我装做要向邻居问事的样子，逐渐接近他们的住宅。我走了很长时间，遇到很多难堪，到末了我觉得就像挨了一路的乱棒。我不得不听着那些支吾搪塞的回答并忍受着怀疑，当人们一心想回避我，却又装出好心的样子回答我的时候，拖长声调的特文特口音，在他们显然是一种自卫的方法。但是我一切都忍受住了；天黑时，我已经打听出，第一个地点已有法西斯匪徒住下（人们对我说是"我们不认识的一些人"），第二个地点仍旧住着原来的房主。这是一位老妇人，她是所有我询问过的人当中头一个热情接待了我的人。谢天谢地，她认识埃海林克家，甚至亲自把我送到那里。

埃海林克夫妇都是中年人，是真正的坚强的无产者。我说明了我是来找安和金卡的（我强调说，她们一定会明白我是代表谁来的），说明安在哈勒姆时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也就没有多问什么。我说完以后，夫妇俩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妻子对我说，安和金卡已经在临时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住在医院里。女主人说，现在去她们那里太晚了。她建议我在她家过夜，还熬小麦粥给我吃；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粥。

第二天早上，埃海林克向我道别；他认为还是不陪我到两个姑娘那里去的好。"这里周围全有眼睛！"他解释说。我十分清楚他话里的意思。他的矮小的妻子一本正经地在我身边小步疾行；我不得不随着她改变我从容的脚步。

临时医院设在别墅区后面一个大花园中间，花园里仍有花草树木，完全称得上是个公园。病房设在一些有露天回廊的明亮的木板房里，我老远就看见一些病人在秋日气候宜人的户外休息。埃海林克婶婶让我在长凳上坐下等一会，她去找安和金卡。我在枝叶繁茂的栗子树下的白色板凳上坐下来，坐得很靠里，两只脚刚刚挨着沙沙响的沙砾地面。我望着埃海林克婶婶的背影，直到她隐没在那些木板房屋之间。我试图想象我和两个陌生姑娘之间的谈话，这时我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我对埃海林克夫妇说过安是我的好朋友；不用说，安本人一定会否认的。必须让她们明白，我这样说，出发点是好的。我毕竟有点不安，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瞧着那些病房。过了一会儿，我终于看见婶婶领着两个侄女穿过花园朝我走来。弗兰斯所说的特征差不多是吻合的：年长的姑娘果然黑一些，也比自己的妹妹高一点。她们穿着护士的白色长罩衫，显得朴素、整洁，甚至有着修女的严肃神态。那是虚假，我心想。两个姑娘的面貌也是这样：朴实同时充满一种不同于常人的严谨。她们渐渐走近了，我逐个打量着这两姐妹；光是根据她们的神态，我预料到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对付的。这姐妹俩不是寻常的姑娘，尽管她们的外貌是质朴的、单纯的；她们已经在抵抗小组里执行过任务，虽说她们当时还非常年轻；她们曾携带武器，惩罚过敌人；她们懂得警惕和纪律是什么；她们那矜持冷淡的表情和探询的眼睛我看得越清楚，心中便越明白，自己面临消除必然会有的怀疑隔阂的任务。我从板凳上站起来，迎着她们走去。较高的、年长些的一个，当然是安——“我最好的朋友”。我好不容易克服了总是妨碍我的习惯性的胆怯，没等她来得及开口，我便抢先向她伸过手去。

“安！亲爱的，我真高兴，终于找到了你！……你这身衣服

多么合身啊！”

她握握我的手；她那晒黑了的机灵聪明的面容，她那灰蓝色的眼睛的表情几乎丝毫没有变化。

“光临得有点意外，”她冷冷地说。“你过得怎么样？”

这听起来是不大对劲，不过还不是拒绝；我嘴边保持着精神十分饱满的微笑，也和金卡握了手。果然，她脖子上有颗痣，这是弗兰斯曾经提到过的；这颗痣正好露在她的护士外衣硬领上面一点点。我暗自惊讶，这个把浅色的辫子高高盘在头上，外貌天真的斯文姑娘，竟会使用手枪，而且枪法大概还不坏。我想象中的弗兰斯的“女游击队员”可有点两样——是风度和言谈都比较豪放的；当然，我是以我们抵抗小组的男组员作标准，来想象姑娘们的形象的。

“你呀，金卡，”我费劲地说道，“你长得多么快呀！”

金卡有点讥讽地看了我一眼，暗示她不打算参加这场戏，她一言不发，十分无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作为对我握手的回答。我偷偷看了看婶婶，发现她的神色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惊讶，如果不说是慌张和不满的话。折磨人的和紧张的沉默延续了几分钟，这种沉寂，我觉得不会预兆任何好结果。

我们四个人谁也想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有婶婶在场，我不愿从弗兰斯开始谈起。看样子婶婶毫无离去的意思；她大概认为有责任保护自己年轻的侄女们，防备这个巧妙地钻进她家里，甚至还在她家里过夜的不知名的狡猾女郎的谋害……

最后，安毅然说道：

“我不知道，斯女士，我们是否值得继续这出喜剧？（她说这话时声调有点做作——结果正是她在演喜剧。）我们在这个医院里工作，是为了糊口，我们很满意自己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您

找我们有什么事。干脆，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我们不认识您。我想，这是个误会……"

她耸耸肩膀，好像暗示说，浪费的口舌已经太多了。婶婶看看这个侄女，又望望那个侄女；金卡带着鄙视的神情轻轻一笑。我看着安那严厉、坚定的眼睛，说道：

"哪能呢，什么误会也没有。我非常清楚，人们如今变得健忘或者简直是小心谨慎了。我想，你们俩的考虑是合情合理的……"说到这里，我把嗓音压低到了耳语的程度。"我到这里来，是要问问你们，圣特波特碉堡来的弹药在哪里。"

安和金卡真是滴水不漏，不动声色。我感到她们已百炼成钢。两人连睫毛都没颤动一下。我只觉得妹妹似乎略一屏气，可她的脸部表情仍然十分平静。我们又这么站了一会儿，互相试探着。突然安原地转过半个身子，用肩膀给我指了指方向：

"跟我走吧。"

我心里松了口气：我已经把这座冷漠的堡垒打开了头一个缺口。她们本来随时都可能把我轰出去的，我深信这一点。我们四个一起向病房走去，婶婶甚至踏着碎步跟在我后面疾行。我偶然发现，躺在回廊里的男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但是这丝毫没使我感到窘困，因为我一心想着：我必须完成交给我的任务。埃海林克婶婶一直带着明显的怀疑和憎恶的神情看着我，好像我无理地辜负了她的信任。我应该在婶婶和侄女们面前证明我自己没错。走到了头一所木板房前，她们让我在玻璃门旁站着。当她们跨进门槛时，我听见安对金卡说："我去问问当家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用会客室。"接着她们便到木板房屋里去了。我大约等了五六分钟；看来姑娘们不得不费些时间说明情况。当我看见安出来时，虽然她脸上的表情没有预示任何好兆头，我还是

很高兴。一个胸部丰满的矮小妇人和她一起走来，这个妇人穿着一身白衣服，鼻梁上架着副眼镜。我自然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医院的“当家人”。她显得那么鲜洁，仿佛刚从冷藏库里取出来的。她隔着玻璃门，极其注意和好奇地用长柄眼镜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回去了。埃海林克婶婶也没有再露面。安谨慎地对我做了个手势；我跨进走廊以后，她打开一扇上了白漆的小门，让我进入房间。

金卡已经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她有一只手插在自己的白罩衫口袋里，始终没有抽出来，我一进门，她便用另一只手扣上了门上的暗锁。我明白，姐妹俩采取了预防措施，这完全和弗兰斯说的一致：姑娘们是不愿冒险的。我想到，眼前这个用天真的眼睛监视着我的金卡，在紧要关头，可能要（大概也是女院长同意了的）像弗兰斯预言过的那样，拿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可我并不感到害怕。我不动声色地在金卡对面坐下来，可是安却站到紧闭着的窗子旁边。

“还有一个问题，斯女士，”安缓慢而字字斟酌地开始说道，“我们很想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圣特波特碉堡的情况。这想必是有趣的。”

“我不知道这是否有趣，”我答道。“也就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碉堡。我只知道一点：弗兰斯委托我问问你们，弹药在哪里。”

安笑起来，伸手解开一颗领扣。她那晒黑了的脖子很有劲；看来她的手也是坚强有力的。

“您说的是哪个弗兰斯？”

我实在忍不住了。

“这算什么，”我说。“即使拿出金卡那么巧妙地藏在口袋里

的'爆竹筒子'来，你们也吓不倒我。你们俩非常清楚，我指的是什么，我是从谁那里来的。弗兰斯委托我寻访你们，这一点我已经办到了。现在言归正传：小组仍然设在靠'西班牙橡树'的菲利普·莫年家，继续在活动。弗兰斯认为，这里也必须恢复工作；他还不知道你们有这么出色的基地呢。他想让你们在这里建立抵抗小组。"

我发现姐妹俩交换了个眼色。我也看出，我真正使她们措手不及了。金卡甚至无意间脱口说道：

"像是弗兰斯那里的！"

她说这话时，口气里有点生气和惊讶，虽然在她那明亮的孩子气的眼睛里，同时闪现着隐隐的快乐和兴趣。我得胜地笑了笑。姐妹俩望着我；安那黝黑的脸变得更暗了。她和我一样，也发觉金卡说走了嘴。

"那好吧，金卡！"我说。"让我们抛掉假面具吧。'像是弗兰斯那里的！'没错！"我又笑起来。"只有认识弗兰斯的人，才可能这么说。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金卡的脸上顿时一片绯红；她咬紧了下嘴唇；可是已经晚了。我看见她瞧着安，像是在默默地请求她原谅。我从椅子上起来，站到姐妹俩中间，不等她们开口，就继续说道：

"我该向你们转达威南特的问候，免得再提碉堡的情况了。威南特托我问问，你们是不是想起过，他经常带给你们的代芬特尔的小面包……"

我忽然忍不住要笑，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我便放声哈哈大笑起来。这两个女青年共产党员，悄悄地用手枪威胁着我，必要时就毫不犹豫地置我于死地（也许已经征得那个事先来看过牺牲者的胖胖的女院长的同意）；我和她们在特文特临时医院的这

番谈话，还有这些弹药和小面包什么的，所有这一切，我觉得都可笑和庸俗得荒唐。这只有乡巴佬才看不出来。姐妹俩先是脸上显出不知是尴尬还是抱歉，接着她们俩几乎同时也哈哈大笑起来。安笑着，再次抓住领口，又解开一颗纽扣，而金卡突然乐得笑弯了腰，她的翘鼻子都碰着膝盖了。我们这么大笑着，只有姑娘们在遇到某种荒唐的话或事时，才会这样笑。我们亲身体验到了笑的良好作用——笑声非常有效地缓和了紧张的空气。

我们正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忽然听见房门口响起了短促不安的叩击声，从走廊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姑娘们！姑娘们……这么吵闹可不行呀！想着点重病人吧！"

显然，这是女院长；我立刻想象到她那小圆嘴撅得像只烟斗，想象到她那红润的面庞由于我们放肆的欢笑都急得有点发白了。我们立即安静下来。和解与充满相互信任的庄严时刻开始了。我们擦干眼泪，擤了鼻涕；我开始往鼻子上扑粉，安和金卡有点扫兴地望着我。我们处在奇异的怡然自得的状态，犹如暴风雨后大自然所常有的那种清新。当我们突然感到彼此息息相通，并感到有一种秘密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变得严肃起来了。虽然我们也笑过一阵，但这是一种非常重大的秘密，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秘密，是我们千千万万同胞生活的秘密，要用语言来表达，这秘密可就太重大了……

我在医院里待了一整天，和护士们一起吃了饭；没有人问过我是什么人，大家都保持着一种近乎诙谐的严肃：仿佛她们也和我们的秘密有关似的。

等到又只剩下我和姐妹俩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对我讲述了圣特波特碉堡的事；这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小碉堡，德国鬼子早

已弃置不用了，于是圣特波特的抵抗运动战士便在那里住下来。弗兰斯不时命令从那里运送弹药给他的小组，而往那里用自行车挂包装运弹药次数最多的，就是安和金卡。有一次她们曾碰上德国巡逻队的三个人；双方终于开火了，结果金卡打死了一个纳粹匪徒；其余两个逃掉了。这是她们最后一次到圣特波特；可是过后很久，我们抵抗小组的同志还是开玩笑地问，圣特波特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到。

我们详细讨论了在这里组建抵抗小组应该着手的工作。安和金卡提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在医院里工作的一个火伕和一个厨师，一些常去安和金卡的叔叔婶婶家的工人。谈话是极端认真的，看得出来，任务非常合姑娘们的心意，大概她们正苦于无所作为……金卡甚至脱口说出她羡慕我，因为我还能回到哈勒姆抵抗小组的同志们那里去。这个小小的感情冲动向我表明，无论是她还是安都不是绝无嫉妒心的人，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其实我只不过是个新兵罢了，她俩呢，却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老战士。我告诉金卡，除了印刷和散发《真理报》以外，我在小组里做的事情很少；我也感到嫉妒……过后，我含含糊糊向院长告了别，安送我去乘夜班火车。

我离开医院的时候，男人们从回廊上笑着向我挥手；他们似乎已经通过一种秘密方法探听到了我这次来的目的。我也激动地向他们挥手作答。这时，我感到安、金卡和我成了真正的朋友。我竟然敢于坦率地把这一点告诉他们，我自己也觉得惊奇：通常总是那么善于自持的我，为什么会向这两个姑娘坦然敞开自己的心扉？我们甚至非常激动地接了吻。这种激动，正像在黑暗中相对而行，片刻相遇，而后又各走各的可怕的夜路的两个夜行人所经历的激动。

当暮色迅速笼罩大地的时候，我已经在旅途上，挤在面貌模糊的、身影依稀可辨的人群中，坐在挤得水泄不通、黑得和深夜一样的车厢里。直到这时，我才记起，我至少已有两昼夜没有想到过塔妮娅了。

运往查安的菜豆

我回到指挥所，把自己出门的情况作了汇报，弗兰斯高兴极了。他当着所有同志的面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我甚至羞得脸红了。我能够那么迅速地找到两个姑娘，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被迫再三叙述了我在恩斯赫德工人住宅区历险的经过。

我开始发现，同志们对我的敬意正在增长。从那天起，他们对我的信任开始与日俱增，他们自己甚至可能还没察觉。我听说，在我这次外出期间，他们在休果和鲁朗特的领导下，搬空了就在法西斯市长本人花园里的一个小仓库的武器。这些武器本来当然是要配发给本地的法西斯匪徒、非正规武装部队或陆军用的。指挥所决定把搞到的武器拨送一部分给查安的抵抗小组，这个组特别需要手枪……在考虑派谁运送武器的时候，有几个同志朝我这边看。我感到如坐针毡，激动得脸都红了，一直到弗兰斯拍板解决了问题。他好像真的听到有人提议似的，宣布说：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交给汉娜。"

我心里冷一阵，热一阵，然而我感到称心如意，虽然我竭力不流露出这一点。我觉得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能够承担责任更加重大的任务了。弗兰斯当即把我叫到一边，对我作了必要

的指示：在运送武器之前，我必须先到克罗缅尼的一家小铺子取情报，弗兰斯把小铺子的地址告诉了我。那里住着年龄很大的老两口，都是热爱祖国的老人家。他们所以维持着这个买卖，只是因为他们把食品杂货铺后面的房间提供给抵抗运动的战士们作为接头地点。我必须去告诉这位老妈妈——大家叫她“德·莫尔妈妈”，据弗兰斯说，她是地下工作者的真正的母亲——弗兰斯打算运两袋菜豆到查安去，请问她，东西该交给谁。德·莫尔妈妈会安排好联系事宜的。

十月里，天气还晴朗暖和，我在维耳曾附近摆渡。我想起树上和花园里正在枯萎的树叶上开始出现的棕褐色和金黄色的斑点，想起自己勉强抑制住的狂喜。我一早就到了克罗缅尼，并且很快找到了开设在一条狭窄街道上的小铺子。木头房子的正面有些简单雕刻和低低的小窗口，房子漆着绿色和白色的油漆。我在街道对面就看见了那磅秤铜托盘的闪光。我走进小铺子以前，先把窗玻璃上的字看了两遍：“经销粮食杂货。赫·德·莫尔”。玻璃上的字大概很旧了，有一半字母已经模糊不清。我注意到，这时小铺子里总共只有一个顾客，而且还是个小孩子。柜台后面站着一位大娘——显然就是德·莫尔妈妈，矮小个儿，脸上满是皱纹，圆圆的小脸颊显得很突出；一双天蓝的风泪眼亲切地望着人；如果不是她那瘪嘴上刻着表明坚决、无畏和远非一般的不屈不挠性格的明显皱纹，她就会给人一种十分天真的印象了。我立刻直觉地感到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经过这样无言的核对以后，我就从女店主身上回过头去环顾四周；她只是粗粗地看了我一眼。如今在我们荷兰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很少，一点可怜的食品也必须凭证购买。这家小铺子唯一可以不凭证供应的商品，是那些和空的瓶瓶罐罐放在一起的存放过久的代食品。

等小姑娘走了，老妈妈朝我转过身来，我向她要一种烤饼干用的代用粉，我看见货架上有这种代用粉。她刚回身到货架上取货，我便漫不经心地问道：

“您这里大概不再有菜豆了吧？”

她塞给我一包用粗纸包着的代用粉，朝我仰起她那晒黑了的聪明面孔，更仔细地把我端详了一番。好像是我跟她开了个可恶的玩笑，她用不满的语调说道：

“菜豆！您倒是生活在什么年月呀？已经一年多了，我连一个菜豆的影子也没见过。”

“我也是这么想，”我回答说。“那么一切都对头。弗兰斯打算在最近派人送两口袋来……”

她那双老年人的风泪眼的目光变得锐利些了。

“原来是这样……”她说。我似乎觉得她的嘴唇上微微露出一丝笑意。“的确，这是个好消息。您明白，它对我们非常有用。”

“是的，”我说。“这弗兰斯已经预料到了。不过他不知道应该把东西交给谁。”

老妈妈一只手从上到下抹了一下鼻子，虽然似乎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我看她是想借此遮掩笑容。她走到小铺子里面的一扇门口，对我说道：

“我想，我们最好换个地方谈谈！”

我走进一个有阳光的小房间，天花板上架着棕色的梁木；一只芙蓉鸟在很漂亮的笼子里响亮的鸣啭；窗台上放着几盆倒挂金钟，花盆外面包着绿色皱纹纸。老妈妈推给我一把椅子，她自己没有坐；她双手交叉在腹部，再一次试探地看了我一眼。

“这么说，是弗兰斯打发您到这儿来的？”她说。

“这您不反对吧？”我一本正经地问。

在她温和的声音里又可以听得出快活了：

“我吗？……小鸽子！我只会高兴！我老是在念叨：干吗不再派女的来呢？女的不像男人那么惹人注意，她们能做到的事情常常要多得多；她们只是还不了解自己的作用……要是我还年轻的话，”她忽然用自己满是皱纹的小拳头朝桌子上一捶，说道，“我就学会开枪了。小姐，您瞧瞧俄国姑娘，她们就知道该做什么！”

我的心头热乎乎的，感激地朝她点点头。她显然十分想念正在战斗着的妇女们。如果不是我打断她的话头，谈起了我受托的任务，她大概还有许多话要对我说。

她踏着碎步穿过房间，向屋后喊了一声：

“德·莫尔！到这儿来一下！”

老妈妈的一切都使人感动：她的果断，她的勇敢，她的慈祥，甚至还有这个非常好的传统习惯——以姓氏称呼自己的丈夫。

德·莫尔来了。他穿着背心，没穿外衣，看上去比他的妻子年岁小些；个子矮矮的，有点迟钝，长着一双肌肉发达的工人的手，好像熏过似的黑脸上生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与其说他像食品杂货商，不如说像个商船船长；大概他从前在海上航行过的。他一面朝我点点头，一面审视着我，然后看看妻子。老妈妈快活地絮絮叨叨说起来：

“德·莫尔，这姑娘是从弗兰斯那儿来的……你知道，是从哈勒姆的弗兰斯那儿来的……她说呀，弗兰斯可能又有一小批存货出让。我已经告诉她，我们正好需要……瞧瞧，这事儿一经咱们妇女接手办理，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吧。”

德·莫尔的握手是庄重的、坚定的和可以信赖的。

"好消息，"他说。"我们的孩子们早就在诉苦了。那么能得到多少呢？"

"大约五十公斤吧，"我答道。"不过我必须亲自和他们商谈交货的方法和地点。"

德·莫尔从椅背上取下绒布短外衣穿上，并拉拉整齐。

"对，"他说。"我这就去。"

"我等着您，"我说。"这事办得越快越好。"

丈夫离去以后，德·莫尔妈妈又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站在我面前，赞赏地瞧着我。

"我看您是熟悉自己的工作的，"她说。"您瞧哇，德·莫尔行动起来也是喜欢坚决果断的！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告诉您……孩子们都乐意上我们这儿来……"

她像母亲一般慈爱地倾身向着我：

"这儿还可以捞点外快哪，明白吗？……您要不要来杯真正的咖啡？"

"真正的？"我反问道。"那可是盛情款待啊！"

德·莫尔妈妈像个善良的魔术师似的，匆匆忙忙进厨房去了。芙蓉鸟在笼子里响亮地唱着。秋天的太阳照得红木椅子闪闪发光。坐在这里休息，深深感到惬意和奇妙的安全。我可以想象到，抵抗运动战士们为什么爱到这里来。神经紧张了一整天以后，这个房间大概就成了他们风平浪静的码头。咖啡端来了。小铺子里的铜铃常常叮当作响。德·莫尔妈妈耐心地、不倦地招待着顾客，没有顾客时，她就来和我坐在一起。我们小口小口地呷着异香扑鼻的咖啡。老妈妈的风泪眼闪着兴奋的光；她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说话。她又一次使我注意到，这里真正是一个宁静的隐身处。大伙儿都叫她妈妈，

在我以前，这把椅子上有许多人坐过，可是其中有好些人已经永远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她用手匆匆擦了一下眼睛，又开始讲起她认识的“孩子们”来。我看得出来，她整个的生命全都贯注在这些“孩子们”身上了。我朝侧面的窗子看了一眼，看见了两个身影；老妈妈也发现了。

“你瞧，德·莫尔已经回来了；可不，我料到是白毛弗洛尔亲自和他一起来的……”

一听说弗洛尔的名字，我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身来，早在我们指挥所的言谈中，我已经知道他是查安抵抗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我看见门开了，德·莫尔让同来的人先进门，那人走进低矮的门框不得不弯一下腰——他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我望着这个年约二十五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的坦率的、略有雀斑的长方脸，他的前额上方竖着一绺不驯服的头发，头发的颜色确实淡极了，几乎是亚麻色的。他立刻走到我跟前，伸出一只手。

“我叫弗洛尔，”他说。“也可以叫我白毛……总之，大伴儿常这么叫我的。你，当然是汉娜，不会是别人了。”

“是汉娜，不会是别人。”我重复道。我大概当即就脸红了，不过，这与其说是害羞，倒不如说是自豪：他也知道我的名字！我已经明白，抵抗运动的各个小组都在谈论我。弗洛尔拍了拍德·莫尔妈妈的肩膀，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来，又开始打量我，现在他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打量自己的战士了。

“对，对，汉娜。”他说，“消息传得很快，特别是在像我们……这样的人中间。”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啊，我非常高兴终于见到你。”他仰起头，用鼻子嗅了一下。“妈妈，我好像闻到了咖啡味儿，我得强调一下：是咖——啡。”

老妈妈两次三番走到弗洛尔跟前，把手放在他肩上，怜惜地

看着他。

“是咖啡，可是你并没冻僵啊。这是为了招待她，”老妈妈朝我这边点点头说。“好吧，既然你已经到这里来了……”

弗洛尔得意地朝我微微一笑：

“你瞧，你在妈妈这儿多么受尊重啊！”

德·莫尔又到屋后去了。老妈妈端来咖啡以后也走了。房间里剩下我和弗洛尔两个人。他开始详细询问我们给他准备了些什么，等我把从仓库里搞到武器的事讲给他听以后，他乐得吹了声口哨。他问到这批武器的型号和口径，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了他。他一直看着我，他的好奇并不使我羞怯，甚至当他寻根究底地问到我本人的情况时，我也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

“我看，”他略加思索地说，“你早就该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一直待在哈勒姆，说实在的，就是为了这两个姑娘的事儿……弗兰斯不是个坏小伙，我决不这么想……你不要把他设想得那么差。这么说，他把你留作后备力量了！不过有这个必要吗？假如由你作主的话，恐怕你早已经去干更有意义的事情了，是吧？”

“如果说弗兰斯把我留作后备力量，”我答道，“那么，我以为，只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我是个姑娘，别的再也不会有什么了……多瞧不起人啊！你会这么做吗？仅仅因为我是个姑娘就怜惜我吗？”

他把调羹在空杯子里搅了一阵，说道：

“这决定于……依我看，应该考虑的是本人愿意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什。这和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毫无关系。”

“对，我拥护这种提法！”我快活地喊了一声，我觉得我不能原谅弗兰斯。弗洛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笑了起来。

“得啦，得啦，姑娘，”他安慰地补充说。“工作有的是，你会

看见，敌人要想尽办法迫使我们更加困难……且等你把那些珍贵的东西运来，那时候我们就能继续斗争了！”

我们具体磋商了我运送武器的方法，这些武器一次是运不完的，即使用几个最大的自行车挂包也不行。据我计算得跑三趟。弗洛尔说，可以两三天来一次，间隔不能太密，不要乘大渡船，在维斯特查安搭小渡船，还要在清晨，尽可能赶早些。头一次我必须见着他弗洛尔，他将站在堤岸上。然后他骑自行车在前面走，我与他保持二百米的距离，这样把我领到阿森德尔弗特的一个地点，以后两次我就得独自完成了。我们议定头一次在十月十四日。所有由我运来的东西，将暂时存放在阿森德尔弗特，查安的同志们自然不会让东西在那儿存放过久的……

弗洛尔离去以后，我又待了约五分钟，接着也动身回去。德·莫尔妈妈一定要我郑重答应，如果我以后到“附近什么地方”，必须再到她这里来。

“你要明白，我的家，就是抵抗运动的家，”她诚心诚意地说。“这个家的门永远为你们大家开着！”

我脑子里装满了今天这些会见的印象，我在阳光下骑着自行车往回走，一路上秋日景物都泛着正在凋萎的金黄色。我深深感到惊讶，一种神秘的兄弟情谊，竟能把在一天以前还互不相识的人们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时我正通过围垦地，心里想念着哈勒姆的同志们，想念着安和金卡，想到恩斯赫德。我想念着那些不知名的人，我与他们之间联结着充满了人类团结一致的力量的无形的、有生命的一条条线索，那是一张秘密的强大的网，我也织在里面的网。

我预计三次能把武器运送完毕，果然是这样。将近十月底，我把最后一批手枪运到了阿森德尔弗特。我一次也没有同检查

人员发生过争吵，到处都有骑自行车的妇女带着挂包往来，她们要从围垦地的农民那里搞些食物。我把自己的头发谨慎地拢在头巾里面，而且每次都更换衣服。每一次我都在衣袋里放着手枪，不过我对谁也没有泄露过。我知道，万一纳粹匪徒或法西斯保安警察截住我，要查看我的自行车挂包，我会遭遇到什么情况。不试图为自己的生命进行抵抗，不叫敌人流血，我是不想落入他们的魔掌的。然而这三次旅行（还有多数其他的旅行），我实在都还幸运，因而我总能高兴地听到同志们和组长的称赞。

十一月七日

十一月份开始了，天气很坏。我们组里的工作明显地松懈了；尽管枪枝弹药充足，弗兰斯对于他应当着手干什么似乎还没有充分把握。也许是，在一批新的死刑判决公布的时候（这是十月底的事），他的精神状态所遭到的打击，比他愿意承认的程度还要大。我们大家也都受到了震动，特别是因为纳粹匪徒想出了发布公告的新办法。如果我们所获悉的来自狱中的消息可靠，那么已有四五十人被杀害了；纳粹匪徒在自己各大报纸上刊载通告，说被处死刑者的名单将分期分批公布，每次公布五六人。

鲁朗特看完报上的通告，当即怒不可遏地把报纸揉成一团，他大声喊道："去他妈的，现在他们连恐怖手段也严格分批了？"

"他们想让那些想要反抗德国人的人始终处于恐惧状态，就是这么回事，"杨怨恨地说。

"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总要继续斗争的，"艾迪说。

弗兰斯什么也没说，大概有什么事正使他不安。他坐着一

声不响，闷闷不乐地咬着手指甲。近来他几乎没有和组员们谈过话；看来，他觉得组员们正对他有所期待，而他却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休果有时一连几天不知去向。我猜想，这个间或到指挥所来，嘴边刻着森严的皱纹，比平时更加缄默的深沉的人，正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我们曾约定，十一月七日晚上大家都到指挥所来收听BBC的广播，这家电台已宣布过要转播莫斯科庆祝革命节的报告。

就在那天傍午，一张来自比利时的风景明信片寄到我家里。这是塔妮娅寄来的；邮戳上的地名是“那慕尔”①，寄出日期为十月十五日。明信片上只有我双亲的地址和塔妮娅的姓。我们轮流着默默地反复翻看明信片，仿佛这张印着风景的不会说话的硬纸片，还能告诉我们一点塔妮娅的不幸似的。然而，我们得到的唯一结论只是：塔妮娅的确已经在国外了。我想说：“不错，比利时她是到了，可是往后又会怎么样呢？……”不过我没有作声，我不想使家里的人沮丧。

我来到指挥所，看见自己的同志们，显然感觉得到一种新的团结一致，这时我的压抑的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休果也在，他和艾迪一起坐在一张破旧的皮沙发上，两人都在擦手枪，当时我们大家都在听广播——已经开始转播莫斯科的报告了。弗兰斯的情绪极好；看来他已经不再那么茫然失措了；他的嘴巴和刮得光光的面颊分明表现着他那惯常的自信。转播结束以后，我们喝啤酒祝贺俄国革命的节日。

休果在弗兰斯背后对我微笑和使眼色。我也不由得笑了一笑。托姆已经在收音机前面跪下来。从那黑色的五斗橱的深处

---

① 比利时城市，省会。

发出喀嚓喀嚓声和怪叫声。我们仿佛有一种默契，都尽量不理睬坐在房间角落里的弗兰斯，而各自卷着纸烟。又过了一会，托姆终于收听到了莫斯科电台。现在正在广播音乐。音乐像波浪一样一阵一阵地传来，仿佛狂风正在我们和遥远的苏维埃国家之间怒吼着，把一切声音都驱逐到空间去。

威南特很熟练地、彬彬有礼地往杯子里斟着啤酒，当时我忽然产生一个怀疑：他真能够始终不渝地追随我们的思想——十月革命的思想吗？他把头一杯送给弗兰斯。我们就这样坐了好久，呷着啤酒，什么事也没做；有时我们之中有人唱起歌，要不然我们就干脆听莫斯科广播的音乐，不住地吸着讨厌的烈性烟草，大家呛得气都喘不过来。这是我生平头一次也是最奇特的一次庆祝十月革命节。休果在旧报纸和小册子里乱翻；他大概终于发现他要寻找的东西了。他坐在地板上，背朝收音机，广播中正在播放一首激情的间奏曲，他突然把收音机关掉了。然后他“嗯”了一声，又是一声……大家都笑起来。发窘的休果开始给我们朗诵。他极易害羞。他像自古以来所有年轻人害怕丢丑那样地羞怯。但是休果几乎立刻就制服了自己的窘困，这使我感到高兴，我不停地望着他，倒不很专心听他朗诵。他的声音逐渐变得沉着了；我深深感受到他所朗诵的这一片断包含着严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思想：

“……我们在几天内就破坏了一个最老大，最强盛，最野蛮和最残暴的君主专制。我们在几个月中就经过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消除小资产阶级幻想的许多阶段，而别的国家走过这些阶段却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就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公开反抗。我们的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个庞大国家中到处都获得了胜利。我们唤起了

那些受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最下层劳动群众，把他们引向了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我们创立并且巩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比最完善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更优越得多、更民主得多的新式国家。”①

休果还继续给我们朗诵了好久。我们大家，就连威南特也在内，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程度在默默地倾听着伟大的言论。没有人伸手去拿啤酒喝，也没有人卷过一根纸烟。同志们甚至连咳嗽也停止了；他们好像正在吸收着每一句话，这样肃静和聚精会神，直到休果停止朗读我才发现。休果合上书本，说道：

“这是列宁……他们那里在一九一七年就是这么干的。”

鲁朗特抬起头来低声说道：

“而且这是在那种时候，当时全世界都在嘲笑共产党人，当时每一个人都预言，共产党人连三个月也支持不住的！”

约翰微笑着得意洋洋地说：

“他们如今却已经坚持了二十六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年月啊！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创造了所有的一切：工厂，机器；现在他们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将军，这些将军，从前也是我们这样的工人……他们一定能打断希特勒恶狗的脊梁骨，叫他们连求饶都来不及！”

房间角落里突然响起了弗兰斯的声音：

“这一点他们一定能做到……我们对他们也有过一点帮助的……同志们！我还没有对你们讲过，我们在特文特的分组已经做了好多事情。昨天我收到安和金卡的来信。那里的工作已经顺利展开。应该在格拉涅尔勃留格附近过国境的头一列运载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5—146页。

草料的火车，突然放起焰火来啦！……”

大家都高声欢呼起来，向来不怕过分喧闹的弗兰斯也不得不加以干预了。

“嗤……”他阻止了我们。

我们都笑眯眯地望着弗兰斯。他的神情已经完全改变了。原先扭曲的脸上表露的痛苦、委屈和绝望，如今已无一丝痕迹了。我看着休果，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谢他想出了给我们朗诵列宁著作的主意。休果垂下了眼睑，可是他嘴唇上却现出了得意的微笑。我很少感到过自己像今天这样幸福。我如此清晰地想到，是什么引导我到这里来的，而我所希望的又是什么。我懂得，我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在地下指挥所里，在被侵占的国家里，在一幢荷兰的房屋里。我还没弄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便忘情地站了起来，举起自己的杯子，大声喊道：

“为了未来！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所有的同志都从自己的坐位上站了起来。我们这些被共同的目标紧密地团结起来的人们，幸福地互相看着，笑着。弗兰斯走到我跟前，用一只胳膊搂着我。我的头只够到他的肩膀。他谨慎地、庄重地吻了吻我的头发。这是个兄弟般的、感人的举动。我忽然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对于我的同志们来说，我仿佛成了我们所进行的斗争的象征。

计　划

这天晚上，等到我动身回家，时间已经很晚了，休果悄悄跟上来与我结伴同行。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估计他是住在维耳曾地区的。鲁朗特有一次对我说过，休果从林堡回来以后，起

初住在双亲家里，就在那里的地下室睡觉。可是过了几星期，和休果一起领导五月罢工的白毛弗洛尔，居然给他找到了别的住处。坦白地说，我有点害怕休果身上所表现的神秘，不过这种害怕里面也含有钦佩的成分。我心想，假定我们的组长是他，而不是弗兰斯，那我们的抵抗小组定会干成许多大事了。我几乎确信：休果在归来以后的五六个星期里所干的工作，比我们所有的人所做的加在一起还要多。他对于哈勒姆和维耳曾之间的地区了若指掌；弗兰斯有一次说过："这是他的老世袭领地。"正好在这个地区，也恰好在这段时间里，德国侦缉机关的两三个危险的奸细和告密者神秘地失踪了。至今仍然在侦缉这些报复行为的主犯。我想我猜得八九不离十，休果是比较熟悉内情的。他没有对我讲过这些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从来不对我谈这些事；或许，弗兰斯听到的要多一些。这天晚上，休果是初次找我结伴同行。在这以前，他从未对我多加留意；诚然，弗兰斯总是摆出一副样子，似乎他具有支配我的特权。正因为如此，当休果骑着自行车与我并肩同行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确切的预感：我马上要听到某种非比寻常的事情了。我们骑着车子，默默无言地在通往哈勒姆的路上行驶了一些时候，休果终于开口了：

"汉娜，自从运送武器以后，难道你只是管管报纸吗？"

"是的，"我答道。

"所以你非常希望干出点特殊的事情，是这样吧？"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一只脚蹭着地面，刹住车子；我也踏慢了些。

"停一下吧，"他说。"我有话对你说。"

我们下了自行车，停在路边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面。天下着小雨；四周的一切全掩在灰蒙蒙亮闪闪的雨雾之中。只看

得见休果的头，在一些摇曳不定的树木的较阴暗的背景上，显现成一个黑点。

“汉娜，我和弗洛尔打算搞一个小活动，”休果说得很轻，我必须十分注意才听得清他的话。“我预先告诉你，这事很危险。其实这种事向来就是危险的。不过现在要说的更是一起重大的行动……”

我的嘴唇颤动起来，心也缩成一团，堵住了喉咙。

“你说吧，休果，是什么事，”我请求道。这时我忽然听见他抑制住的笑声。

“你不害怕吗？”

“不，”我答道。“即使我的牙齿有点儿打战，也不过是因为想到你要对我说的事而有点神经紧张。”

他又笑了起来。

“当然。我相信，汉娜，你能胜任我们这个工作。应当老实告诉你，在拟订行动计划的时候，弗洛尔提到了你的名字。‘这就是敢干此事的人之一’，弗洛尔说。我们需要你，汉娜。”

“休果，”我恳求道，“别折磨我了吧。你说，需要干什么。”

“明天早上，你到印《真理报》的同志们那里去。赫烈切会把你领到我和弗洛尔呆的地方去的。弗洛尔大概也会带人去。其余的事到那里再告诉你。不过，汉娜，这件事对弗兰斯可只字也别提。这是我们私自出击，明白吗？”

他紧紧地抓了一下我的车把，似乎是在警告我。接着，他突然不好意思了，说了声：

“再见吧……”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十点，我到了哈勒姆北区指定的地点。两颊红润的赫烈切已经穿好风衣了。

“怎么，您跟谁约好了的吗?”她问。她整张脸仿佛都在笑。她把我领到了该去的地方，仅仅只隔两三条街道，以前我送报纸也到过那里。弗洛尔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皮靴作坊旁边的一个小厢房里。弗洛尔那前额上面有一绺白发翘起的长方脸上带着开朗的笑容，他做了个年轻人惯用的不拘束的手势，像对待一个老熟人那样地欢迎我。他把正和他谈话的名叫勃拉姆的人给我作了介绍。这是个深色头发的沉默的年轻人，穿着件粗绒线衫。他向我问好：“午安，同志，”往后就再也不开口了。弗洛尔开始详细询问我，问我们正在哈勒姆干些什么以及我们是否庆祝过十月革命节。我把一切都向他报告了，虽然是有点谨慎小心的。弗洛尔笑了，仿佛他所知道的还要多得多。勃拉姆偶尔偷偷看我一眼；他显然难以想象：抵抗运动事业竟也吸引了妇女们。休果一来到，便在弗洛尔和我之间坐下，他马上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说道：

“我们都到齐了。你宣布军事行动计划吧。”

弗洛尔开始叙述行动计划。计划规模之大，使我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个计划显然是休果和弗洛尔共同想出来的；计划要破坏维耳曾一座供应半个省区电力的发电站。我看着休果，弗洛尔把两只有力的大手沉重地压在桌子上，正在介绍煤库的情况。仓库紧靠着外围墙，设有起重装置，仓库和卸煤场之间连接着传送设备。弗洛尔取出纸和铅笔，流利地画出了这个仓库的平面图。如他所说，这是整个发电站的生命中枢。休果的脸依旧凝然不动；只有他那对蓝色的眼睛在闪耀着兴奋的火花。他有一次曾对我说过：“我们本来是互相了解的。”可见他内心对我所怀的信任比表现出来的还要大得多。意识到这一点，我便充满了自豪，因而我决心绝不辜负他的信任。我耳朵在听弗

洛尔讲话，脑子里却尽想着休果。他的沉默的本领，他对于单独行动的爱好，都使我感到惊奇。勃拉姆低头看着图样，我关心自己即将担任的角色，也看了看那张纸。

弗洛尔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向勃拉姆。

“操纵起重机的那个人，最近几天会给我打暗号，”他说。“行动细节已考虑好了，需用的导火线，定时器和炸药，都准备好了……只要日期一确定，我们就动手。你，汉娜，将从休果那里得到最后指示。你将和勃拉姆一起把炸药送到围墙跟前。在你送到以前，我和休果先到那里。我们翻墙进去。勃拉姆和汉娜在外边望风。”

弗洛尔得意地微微笑了笑，但是仍保持着严肃。他继续说道：

“在电站地区有相当强大的警察部队。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的。我预先向你们说明，伙伴们：这个工作是危险的。可是如果干成功了，是有价值的……铁路运输就要完全停顿那么一个时期！”

勃拉姆头一次开口说话了：

“对我来说，危险是不存在的。”

休果看了看我，浓黑的眉宇间出现了忧虑的皱纹，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一个无声的问题：我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我肯定地朝他点了一下头。他微微一笑。

我们迅速分散了。最先走的是休果，随后是勃拉姆。弗洛尔把画着平面图的那张小纸片撕碎，扔进了小炉子。然后他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临别时他拍拍我的肩膀，又一次浮起开朗、温和而愉快的笑容；我被他的笑容所激动，也从屋子里走了出去。

袭　击

已经过去了四五天，发电站的职员还没有送来事先答应提供的情报。我已经开始担心事情会砸锅，休果突然又在指挥所出现了。他避开我的目光，可是却活跃地加入了同志们的谈话；同志们正以尖刻的玩笑奚落德国鬼子的一道法令——如果发现谁家有收音机，将没收其全部家具。

“他们最好还是把半个荷兰一下子全搬走吧，”艾迪挖苦说。“只要按每架秘密收音机付给我四分之一盾，我就要变成富翁罗！”

其实，大部分谈话我都没有听进去；我表面保持着平静，可是内心却充满了不安，不知休果会告诉我什么样的消息。这天晚上，他也是尽力设法和我一起出门的。我们离开指挥所有半公里了，我的不安情绪每一分钟都在增长。休果终于说道：

“汉娜，这件事明天晚上进行。炸药存放在德里海斯的一个地方。勃拉姆在墓地对面的岔道口等你……一切都要记住。你要管好运送的东西，以防我们万一遭到失败……”他轻轻地笑了。“不，我们不会失败的。这种突击从来都是成功的，只要你确信会有好结果。”

我屏息静听着他的话，情绪极度紧张，直到他说完了，我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我感到呼吸困难。休果站住了，在黑暗中朝我弯下身来，问道：

“怎么，你打退堂鼓了吗？”

从他的声音里显然听得出担心的意味。

“当然不会！”我说。“不过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大突击，休果

……你什么也别问了！”

他咳了一声，好像还想说什么，可是没说出来。和上次一样，他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老实说，我甚至觉得高兴：我已完全确信袭击一定能实现，我必须独自呆一会儿，以便思想能适应这个情况。第二天晚上，天没有下雨，也没有月亮。刮着一阵阵的风。接近岔道口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听见了列车的隆隆声。隐约可见向上升起的栏路木的影子。黑暗中有些人影从我身旁经过——这是从火车上下来的人。我站住了，等候他们消失在夜暗中。时间过得慢极了。勃拉姆一直还没有来；我又觉得事情要糟了，忽然树后出现了一个瘦削的人影：

“汉娜吗？”

“是的，”我答应着。

“我是勃拉姆，”他说。

“谢天谢地，你可来了，我还以为……”

勃拉姆有点轻蔑地打牙齿缝里吹了声口哨：

“紧张吗？没必要。一切都是按规定时间进行的……行李就在不远的地方。”

我骑上自行车，以勃拉姆的车胎的沙沙声为目标，在黑得看不见的公路上行驶，只有我那小挂灯的一点小小的亮光在路上跳动着。勃拉姆在一条支路的路口停下来。我下了车子。他低声告诉我，要我看好自行车。我听见他的脚步踏上了石子小路；透过朦胧我隐约看到一幢房屋的屋角和墙壁，随后又看到窗缝里透出的一丝光线。我听见门开了，而后传来压低的说话声。又响起了脚步声——有人在小路上踏着沉重而缓慢的脚步走来，大概是驮着很重的东西。原来是勃拉姆回到我面前了。

“全用皮捆带扎好了，”他对我说。“走近些。你把这个包背

上，像背背包那样……你会吗？”他带着明显的怀疑悄悄问道。

我笑了。

“我常常背着背包跑路呢，”我答道。

“可是这个包沉得很哪，”勃拉姆说。

他把皮带套在我的肩膀上。他说得对，背包甚至比铅块还要沉，一压上我的肩头，隔着衣服就擦破我的皮肤了。勃拉姆又问了一遍：

“怎么样，行吗？你觉得能这样骑自行车跑上半个钟头吗？”

“当然能，”我回答说。

我们都不作声了，只有勃拉姆背上东西时弄出的沉浊的声音打破了寂静。过了大约两分钟，我们动身了。我的同伴又走在前面。车子踏起来非常费劲。包越来越无情地紧压着我。一会儿我从头到脚浑身都热得火辣辣的；衣服沾在背上。要是有一阵风，能把那摇摆不定的树上的清凉水滴吹几滴到我的脸上，那我会多高兴呀。勃拉姆不停地平稳地踏着车子，仿佛这是他的家常便饭；不过他的坚定也给了我以支持。间或我听到他压低的声音：

“你跟上了吗？”

“跟得上，”我答应着。

我已经不再想到危险了；我只知道，尽管手脚全累得麻木了，我也必须跟上勃拉姆，把自己背上的东西送到指定的地点。我几乎没去注意道路；一座座房屋，一个个伸向天空的黑幽幽的孤树林，还有我们经过的一座座路桥，看上去都像是幻影；桥下的流水像黑宝石一样闪着光。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间或有辆汽车驶过。大概是德国鬼子的车。我咬紧牙关，手脚都由疼痛变得麻木了，似乎我的手腕和脚脖子都给紧紧地捆上了。我甚

至好像已经习惯了压在肩上的重负，虽然两只脚踏起车来困难得无法想象，我仍然觉得，还能够这样踏很久很久。我忽然听见了勃拉姆的声音：

"停住！"

我跳下车子，差点儿没连人带物一起摔倒；我觉得两只脚好像踩在针毡上似的。

"累了吧？"勃拉姆问。

"没什么，"我回答说。"我的脚抽筋了。"

"我们歇一会儿吧，"他提议说。

我小心地活动活动两只脚，血液循环很快就恢复正常了。这时我向四面看了看，觉得一切都是陌生的。这里似乎是一个被遗弃的、没有人烟的荒凉地带。电线在风中震荡，在嗡嗡作响，宛如拉紧的琴弦。带咸味的冷风螫咬着我发烫的脸。我们好像来到了天涯海角。

"准备好了吗？"勃拉姆问。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我们走吧；你推着车子和我一起走。就要到了，"他说。

我们推着自行车往前走。我有点走不稳，不断碰到碎石小道两旁高出来的边边上。右方影影绰绰露出有水泥柱子的铁丝网。勃拉姆站住了。

"把自行车放倒，"他说。"喏，这边，草丛里。"

我照着做了。背着重物弯腰可不是容易的。我的自行车一下子脱手；车铃轻轻响了一声，脚镫也碰得喱啷一响。我吃了一惊。

"糟糕，"勃拉姆说。"幸亏风大，又是从发电站那一头刮过来的……"

他止住我，侧耳倾听着。没听见什么别的声音，只有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喧嚣声；仿佛是夜暗本身在咆哮。

“走吧，”勃拉姆说。“不，别忙。我先来把铁丝网剪开。你身边带了手枪吗？……”

在哈勒姆到德里海斯的路上，我大概总有十来次摸过自己的手枪。可是现在我却完全把它忘记了。我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

“OK，”我说。

当勃拉姆在铁丝网跟前跪下的时候，我几乎看不见他了，我只听见铁丝短促地喀吧响了一声，接着是第二声。勃拉姆又侧耳细听着：依然静悄悄的，只有黑夜里常有的声音。只是远处突然射出了一束探照灯光，对着零乱的云团乱扫，云层变得越来越浓了。勃拉姆大概发觉我在朝那里看。

“这没关系，”他简短地说。“他们在找飞机。天上的事儿，跟我们不相干……现在我们动作快点。”

我们从窟窿里爬进铁丝网。勃拉姆拉住我一只手，帮着我爬了过去。一截剪断的铁丝挂住了我的裙子，把下摆撕破了，可是我没去理会它。我们蹚着湿漉漉的深草丛往前走，我的脚一下子全湿透了；后来我们走到一片炉渣上。松松的，直陷住我们的脚。忽然，我们迎面碰上了一堵黑乎乎的笔直的墙。我摸了摸——是砖砌的。勃拉姆放开了我的手。

“顺着墙走，”他说。“哎呀，不对。见鬼！我走错方向了。”

我们回转身，用手摸着墙，往回走去；我只能看见墙顶的一道边，它阴森森地显现在那被探照灯照亮的天空背景上。我又开始感到炸药的沉重了；粗糙的铁箱的下缘磨擦着我的腰部——箱子大概往下滑了。我正想请勃拉姆帮我把背上的东西

往上挪挪，忽然我们碰上了弗洛尔和休果。他们像猫一样静悄悄地走到了我们面前。我一点也没有受惊，因为我马上就听出是休果的声音。

“来得正是时候，好极了……汉娜！你怎么样？”

他的声音里听得出抑制着的喜悦。我感觉到他碰了我一下，把双手在我肩头搭了片刻——这是极富于表现力的无言的祝贺。接着他立刻就动手解皮带。

“这儿来，这儿来，”黑暗中响起了弗洛尔的声音。休果从我背上解下了铅一样沉重的箱子；我又听见轻微的皮带响声——休果已把重家伙背到自己背上。由于不习惯突然的轻松，我的头甚至发晕了，霎时间我感到自己变得飘飘然没有重量了，似乎一阵风马上就能把我刮跑。我身子直打晃，像个醉汉，我急忙伸手扶着墙。休果大概察觉到了，赶紧搀住了我。

“沉着，沉着，”他说，他的声音里含着异乎寻常的关怀。“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我深深地喘了口气；头晕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幸福的、获救的轻松感觉。

“我好好的，没什么，”我急忙说。“只觉得好像一下子轻了千把斤。”

他满意地微微一笑。

“你真行，”他说。“我们走吧，弗洛尔和勃拉姆已经走在前头了。”

我们赶上了同志们，一同转过拐角；弗洛尔大概在寻找做了记号的地方，他和休果得从那里翻过墙去。过了一会，他终于在黑暗中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从墙上垂下的粗绳上拴着的一块金属。我们站住了，几个脑袋一下子紧紧地凑在一起。

“汉娜，你站在拐角上，”弗洛尔说。“你给我们望风，一有危险就发信号；你会吹口哨吗？”

我说会。

“没有我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勃拉姆站在那一头的拐角上；我们就在你们两个监视哨之间翻过墙去……休果，定时器在你那儿吧？……那么开始吧。我先爬。勃拉姆，你帮休果攀上墙头再去站岗……我们的事情要成功，你就一门心思想着这一点，别的什么也别考虑。一定要成功。”

弗洛尔停了一停，接着又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

“等我们回来以后，就各自朝不同方向分散。非这么办不可。如果想活命，就必须小心。由我们支配的时间只有四五分钟。”

弗洛尔在黑暗中摸摸我的脸蛋，随后沉重地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

“汉娜，你一个人行吗？”

“别为我担心吧，”我回答说。

“那么站岗去吧，”他下达了命令。此后他说得很轻，我好不容易才听清他的话：

“伙伴们，为我们的大事努力吧！再见。”

“祝你们成功，”我说。

我又感觉到他的一只手在抚摸我的脸。还有几只手，在黑暗中抱住了我的肩膀……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迅速。我明白他们已不是头一次攀登砖墙了，于是我便向围墙急转弯的地方走去；我挑了个能够同时听到和看见两个方向的位置。同志们所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声响。我靠在坚硬的砖墙上，膝盖略微有点发抖，我一只手紧握着外衣口袋里的手枪。我逐渐平静下来了。

黑暗在咆哮，在颤抖。这时候我方才头一次听见从围墙里面传出来的低沉均匀的喷气声，仿佛一群巨大的怪物搅成一团在那里不安静地睡觉。这是看不见的发电站——厂房、仓库、木棚和变压器，可是在这以前，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似乎我们面前这一堵墙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可那里应该有人，有工人、工程师、警卫人员。警卫人员，我倒没有去想。我正集中想象力，竭力想象着弗洛尔和休果怎样从围墙的另一面下去。我似乎看见他们带着炸药在黑暗中悄悄接近发电站的生命中枢——安有起重装置的煤库。我力图按照弗洛尔要求我们的那样想象着成功，想象着事情的圆满结果。我看见他们发现了煤库附近的起重机——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一个奇形怪状的大箱子；我看见他们跪下去安置导火线；我听见定时器的微弱的滴答声，它正一秒一秒地计数着决定性的时刻。我明白，我们是不会失败的。可是这时候我却吃惊地听见我的牙齿在格格打战，于是我咬紧了牙关。我觉得同志们早该完成任务了，可是直到现在一点也没发现他们在活动的迹象。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忽然间我就像是看到了那遮了一半的汽车头灯像警犬的眼睛一般在邻近的街道上一明一灭地闪着光。有时我又像是听见了脚步声。于是我从衣袋里抽出了手枪。武器已经被紧握得发热了。可是我马上又收起了手枪，生怕有一丝光线照到手枪上。

有人向我走来了。我听出了勃拉姆的声音：

“汉娜！……”

我很快地迎着他走去。他抓住了我的手：

“他们回来了……发电站里边出事啦！”他压低嗓子骂了一句。

“你是想说，”我感到失望，不痛快地问道，“炸药没放成功

吗？”

“他们连仓库都没能靠近，”他愁闷地说。

我们三脚并做两步走到休果和弗洛尔翻越围墙的地方。我看见了他们俩的侧影，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弗洛尔抑制着激动，对我说：

“失败了，汉娜……有人妨碍我们。只好回来了。我想是地方警察。”

“他们发现你们了吗？”我问道，我的心也跳起来了。

“不，不，不，”休果说，“警察绝对不可能发现什么的；他们还没露面我们就趴在煤堆上了。”他朝弗洛尔转过身去。“我告诉你吧，否则他们早就会亮手电筒了。”

弗洛尔不大有把握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明天会好一些，或者……”

“绝对不行，”休果说话如此暴躁，竟使我无法想象他平日能那样冷静、沉默。“我们稍等一会儿，再试一次……他妈的，我在这里，你在这里，一切都像是顺顺当当的……这事必须今天搞成，今天一定能搞成；我想好了，就是我一个人也要干到底。”

“你一个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要么大家一起干，要么谁也别干，”弗洛尔说。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沉着和坚定了。“过一刻钟我们再爬过墙去，非去不可！”他沉默了一会，继续说道：“汉娜，你仍旧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好孩子。还有你，勃拉姆。我和休果还有点事要商量商量。”

这一刻钟我觉得好像有一小时那么长。我站在拐角处，冷得直发抖，我谛听着十一月的风声，听它会不会传来报时的钟声，然而白指望了。我好像又听见了说话声，接着声音又消失了。探照灯熄灭了。天空中风推送着一层看不透的低垂的乌

云。孤单的感觉又悄悄袭上我的心头。围墙里边的发电站依然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闷声闷气的敲击声。

忽然我听见有人急促地朝我这里奔过来。我紧贴在围墙上。跑在前面的是弗洛尔，我根据嗓音听出来是他。

“汉娜，你在哪儿？”

“我在这里，”我应了一声。“怎么样啦？”

“行啦！”他喊了一声。“我们跑吧！”

我的头发晕了，这一次可是高兴得发晕的。弗洛尔摸着了我一只手，拉上我跟着他跑；又有一个人跑近我身边；又有一只手抓住了我；我在休果和弗洛尔中间奔跑着，全然像一个跟自己的哥哥们在一起的小姑娘。勃拉姆很快也赶上了我们。我们先跑过一片炉渣，随后就在草地上跑了。

“你记得你的自行车放在哪里吗？”休果气喘吁吁地轻声问道。

“记得，”我回答说，声音也只勉强听得见。弗洛尔放开了我的手：

“再见，汉娜！祝你平安到家！”他说着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也祝你平安到家！”我应答了一声。

休果一直紧拉着我的手，我仍和他并排往前跑。衣袋里的手枪敲打着我的大腿。休果把我的手都握疼了。

“汉娜，你能跑到家吗？”他顶着风大声喊道。

“能，”我也喊着回答，“你最好当心当心你自己吧，休果！我一个人到得了家！”

他忽然不见了；我凭着惯性，还像和休果在一起时那样快步跑着。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来到栅栏边了。我磕磕绊绊地几乎是爬着往前走的，不久我就摸到了水泥桩子和铁丝网。不久

我听到自行车脚镫的声音。

"这儿，这儿，汉娜!"传来勃拉姆的声音。"就在边上。"

我钻过铁丝网缺口的时候，听见一阵响声，知道勃拉姆已经骑上车走了。我扶起自行车，跨上了车子。我浑身上下都在发抖。自行车直打晃，我竭力控制自己，好容易才算骑稳了车子。

弗洛尔说过"五分钟"的话。我觉得五分钟早已过了。我脚下的马路在轰鸣，在摇晃。我像梦游症患者一样不顾一切地冲过了桥；运河里黑得像墨汁的河水在桥下深处微微闪光。原先我从这一带经过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些花园，现在我闻到了花园里花草树木的淡淡的芳香，泥潭和腐叶的臭味。突然一声爆炸，头上一片红光，就像闪电的反光；接着又是一声。这声音是沉闷、沙哑的，就像高射炮发射后立即被风吹散的隐隐约约的隆隆回声一样。我跳下自行车，朝四面看，火光和响声都消失了，仿佛刚才只是梦中所见。可是不到五秒钟，一片火焰在漆黑的远方冲天而起。

"烧着了，"我低低地自语着。

一声汽笛长鸣，接着第二个汽笛又响起来了。汽笛声尖利刺耳，时弱时强，拖得很长。我听见，离我不远的地方有开启门窗的声音，那里大概有些住宅。人们在大声嚷着。我迅速跳上自行车往前骑。我到达维斯特费尔德岔道口附近的时候，才听见一阵汽车电喇叭的刺耳的尖叫。我躲在墓地上的大树下，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两辆汽车喧嚣着从我附近飞驰而过。这大概是德国警察。我一直等到这两辆汽车远去，不再有车辆了，只有不停息的风在怒号，于是我赶紧回家。一路上仿佛都断绝了人烟。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同志们是否也像我一样顺利地撤回了呢？

德黑兰的消息

我们的袭击没有能取得弗洛尔和休果所预期的效果。就在第二天早上，我在指挥所获悉，发电站发生了爆炸，接着起了火，可是被当地的消防队扑灭了。发电站仍在照常供电，铁路运输也没有受到影响。然而我们的袭击却有着另外的精神上的意义。它使人们增加了勇气，产生了希望。他们深信，国家的潜在力量仍然存在，没有被恐怖力量吓倒。

十二月初，英国电台出乎意料地报道了惊人的消息。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①！这个消息掀起了欢乐的热潮，引起了新的力量的高涨。由于德国电台的干扰，我们简直都要把头钻进收音机了，生怕漏掉一个字。德黑兰正在决定德意志的未来。法西斯主义必须彻底消灭，必须迫使它无条件投降。这一决定的目的在于使德国永远不能再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和侵略国家。但是，那些因为法西斯主义和狂妄念头而把自己的命运和一小撮罪恶匪徒联系起来的德国人民，一旦摆脱法西斯主义和狂妄念头，便能获得重新受教育的机会，在纯朴正直和热爱和平的各个民族之中，也可占有自己的一席合法地位……

我们每天收听无线电广播，兴趣越来越大。

太空里到处都是关于德黑兰的声音。在我们的住宅里，街道上，商店里，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个外国地名。德黑兰突然成了目标和希望。而以前，这个城市，在我听来，就像《一千零一

①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德黑兰召开苏、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

夜》① 当中的一个早已灭迹的、神话中的阿拉伯城市一样……纳粹匪徒被迫也谈起德黑兰来了。我们带着讥讽和无情的冷笑收听他们的广播和报刊评论。广播节目和报刊评论中说，德黑兰充满了惊惶失措、意见分歧和夸夸其谈的空话。他们德国人很早很早就已洞悉，这种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的吹嘘和广泛宣传，正是为了帮助同盟国方面掩盖自己的一个秘密的目的：完全消灭德国人民。还说他们这种骇人听闻的计划当然阻挠不了伟大的阿道尔夫② 将战争继续到完全胜利！……但是，对于德寇为了袭击会议和试图破坏会议而派遣的党卫军空降兵可悲地破产的事，对于在德黑兰甚至没见着空降兵——因为他们事先就被消灭掉了的事，评论员们却聪明地只字未提。脱离"轴心"的意大利对"轴心"宣战的事，他们也避而不谈。从东战场抽回匈牙利部队，德国飞机产量大幅度缩减，对德国构成威胁的土耳其国内准备站到反法西斯这方面来的情绪，他们全都讳莫如深。而对于他们自己在东战场血战中的损失，他们则用什么战线弹性收缩以及隐蔽深入之类的陈词滥调，徒劳地加以掩盖，这些话只能引起我们和全世界的奚落和嘲笑……

背　叛

十二月中旬，弗兰斯把鲁朗特、威南特、约翰和我叫到他那里。他带着神秘和得意的神情向我们宣布，他得到情报，有相当大一批不同国籍的战俘不久前被押送到阿顿豪特附近的集中营。有一个哈勒姆的共产党员，名叫西蒙，他已经了解到战俘们

①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中国又译《天方夜谭》。
② 即阿道尔夫·希特勒。

正渴望着能给抵抗运动以帮助。他们能给哈勒姆人提供弹药，为哈勒姆人绘制沿岸地带的地图以及做许多别的事情。总之，弗兰斯建议和他们联系。弗兰斯还有些别的想法，他没有对我们说，不过，我揣测他正抱着大规模袭击工厂和铁路的想法，这总是猜得八九不离十的。威南特和约翰受命为我们准备与战俘接头的事宜。赫姆斯特德有个名叫阿里的共产党员；他答应把自己的住宅提供给我们作这次接头的地点。这座住宅面临广场，正对着市政会大厦；我们将在晚上到那里碰头。甚至还为战俘们预备便服，万一他们不敢穿着德国军服到那里去时就穿便服。

两天以后，约翰通知说，战俘们已经同意会晤。他们答应派三个人，其中一个会讲点半通不通的德语；他们对于准备便服的想法感到特别称心。看来一切都妥当了。威南特亲自送衣服去阿顿豪特。我不禁被弗兰斯的旺盛精力吸引住了。我看见他为准备这次行动忙碌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每个人都被指派了各自的专门任务。他的想象力看来是异常丰富的。

我们该在赫姆斯特德接头的那个晚上，天气很不好。天空乌云密布，一弯细细的新月几乎没有亮光，跟平常一样，我从屋后花园的木棚里推出自行车就上路了。暮色已经降临，此时各种色彩都融化成了一色，一切物体看上去都是一色的昏暗；这种光线，或者更准确些说，是没有光线，正好合乎我们的需要。我骑在车上，一心想着即将到来的会晤，谁知还没有骑出二百米，自行车的链条忽然断了。这该死的自行车竟在节骨眼上跟我捣乱，我真想踹它一脚！本来不出这个岔子我就要迟到，现在只好乘电车去赫姆斯特德了，这是我极不愿意的，因为我身边带着手枪。我把自行车推回去，从篱笆后门一下把它扔进了花园，便快

步向市中心赶去，这样已白白浪费了十五分钟。我登上电车，站在挤得黑压压的车厢里，一只手握着衣袋里的枪，另一只手拿着不用找零的车钱。我仿佛觉得车站多了好些——那么耽搁时间；每到一站，入口和出口都要出现难以想象的拥挤。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直到售票员终于喊了一声："赫姆斯特德市政会到了！"我向出口挤过去。我在车站上停了几秒钟。上下车的人你推我挤地匆匆忙忙从我身边走过。等到人群走散，我依然犹豫不决地留在车站上，在半明半暗中，我看见车站上还有两个男人。我很奇怪：他们好像根本不打算上车，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竖着大衣领子，帽檐拉得很低。他们正看着我。他们的样子和举动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心里开始有点不安，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插在衣袋里的手把手枪握得更紧了，我明白，这不是好兆头。我在那两个男人的监视之下，谨慎地转过头去，看看附近有没有我的同志。冷丁，黑暗中闯出一个人，朝我扑了过来。他一把将我拉到他胸前，搂着我，装做接吻的样子，并且高声而清晰地说：

"你好，亲爱的！到底来啦！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哪……"

这个拥抱我的男子的敏捷和果断的动作，起初使我楞了一下。但是他一开口说话，我就听出了是鲁朗特。我抓住他的一只手，他就拉着我通过广场。所有这一切当然不能使我平静；恰恰相反，他的巧计和走路的匆忙劲儿都表明已发生了危险。我没有东张西望，虽然我很想知道，这工夫车站上那两个人在干什么。我反正觉得他们没来盯我们的梢。我没有讲话，直到我们离开车站有三四十米远了，我才悄悄问道：

"鲁朗特……到底出什么事啦？"

"全完了，"他说。"广场上布满了便衣特务……你别东张西

望，见鬼！我们走吧！”

“这么说，完全失败啦？”

“大概是。别问了。快点！我们必须立刻离开。”

“可别的同志怎样啦？”我不顾他的嘱咐又问道。

“他们事先得到通知了……”鲁朗特说。“我们正等着你……你为什么搭电车呢？”

“链条断了，”我回答说。

他用一只胳膊紧紧地搂着我，几乎是挟着我通过了整个广场。我深信他说的情况是真的了：我发现人行道上还有几个也是那副样子的男人——衣领子竖着，帽子拉到眼睛上；有一个慢腾腾地在荡来荡去，两个外表上好像是在专心谈话；有两个呆呆地站着，像木偶似的。接近他们的时候，我们走得慢了些。我把脸偎在鲁朗特的肩膀上，紧紧地贴着他；当我们走过那两个木偶身边的时候，鲁朗特甚至轻轻地笑了起来，我却只是有点傻气地嘻嘻一笑。我们已经快到广场旁边的一条街道了，忽然在我们背后的广场上响起了一阵喧哗。我听见有人奔跑的脚步声，便站住了。鲁朗特一把拉着我跟上他。

“鲁朗特！……”我说。“那里出事啦！说不定是我们的人！……”

“跑吧，看在上帝份上，”他催促我。“我的自行车停在这里，很近。”

他末了一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便响起了一声尖利的手枪射击声。这声枪响在广场边许多房屋之间汇成了嗡嗡的回声。我不由地缩紧了身子。奔跑的脚步声靠近了；还听见了慌乱的、受惊的喊声。我觉得他们讲的好像是德语。

“快走，快离开这里！”鲁朗特轻轻地重复道。

我知道应当快跑，但是有一种古怪的感情在拦阻着我。我想知道我们身后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朝谁开枪。就在这时，又响起了一声枪声，接着又是一声。人声更响了。鲁朗特紧紧拉着我一只手，我不得不跟着他一起跑；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赶过了我们，我听见了他沉重的喘息和疲乏的声音：

"你们快逃吧！我把他们甩掉了！"

这是威南特。转眼间他就消失在黑暗中了。鲁朗特没说什么，可是拖着我跑得更快了。他的自行车放在两幢房屋之间的一条小过道里。我们一下子钻进了小过道。那里非常暗。就在这时候，有两个身影飞快从我们身边跑过，我们便紧紧地贴着墙。听得出他们粗重的喘气。鲁朗特用他的一只硬手掌捂住我的嘴，好像怕我喊叫。我推开他的手。我们这样悄悄地站着，默默地等着脚步声远去。又响了一枪，但是我觉得，这一枪可能是为了要激起惊惶，或者是为追捕者自己壮壮胆子。

这一切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发生的，我已经镇静下来了；可是我一想到我们可能被包围，一想到我们的秘密已暴露，我们的整个计划遭到挫折，我不禁颤抖起来了。鲁朗特已经放开我，站在小过道口紧张地倾听着，因此，谢天谢地，他没有发现我在发抖。后来他招呼我说：

"赶快！坐在后面！别出声！……"

他一条腿已经跨过座垫，脚一蹬离开了地面。我坐上书包架，于是鲁朗特踏动了脚镫。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的生命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可是我想的却不是这一点。一个可怕的念头使我无法平静：如果就在这时候德国密探包围了赫姆斯特德那位同志的家，那可怎么办呢……要知道，跟着就会是逮捕……逮捕和判处死刑……

我们在我不认识的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行驶了很久；看来鲁朗特对这里的每一条小道都很熟悉；我记起来了，他是出生在赫姆斯特德的，并且直到如今还住在这里——不过，如果说他现在仍常住在家里，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我听见他朝车把上躬着身子直喘气。直到我已经认出哈勒姆的街道了，他才踏得慢了些，他问道：

"怎么样，汉娜？现在你自己能找到家了吧？"

"能，"我回答说。

他一只脚蹭在地上刹住了车。我从车上跳下来。我们在自行车道边上默默地站了片刻。

"情况好像很糟，汉娜，"最后他说道，"糟极了……骑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是威南特吧？"

"是的，"我说。"你想他能逃脱吗？"

"但愿如此，"他答道。"大概能脱身……他是个机灵人。"

我忽然觉得我又在发抖了，我问：

"鲁朗特……我们被出卖了吗？"

他低下了头。

"很难说，"他喃喃地说，"也许是德国鬼子在监视着他们。你别忘记，德国国防军对他们是不信任的。"

"可万一他们当中有个坏人呢？"我问。

鲁朗特没有立刻回答。他用手擦擦自己脸上的汗。

"是呀，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里的处境就糟了……糟透了。"

他的脚重新迅速而果断地踏上了脚镫。

"你别胡思乱想了。我们暂时还什么也不知道。明天我们会听到消息的。"

我明白，他不过是想安慰安慰我。

“也许你说得对……”我用比较镇定的声音说。“好吧，你现在到安全的地方去吧……哦，谢谢你在电车站上接我。”

“那是弗兰斯吩咐的，”他简单地解释道，突然不好意思起来。“你赶快回家去吧。”

我忧虑的预感不幸被证实了。第二天，我到指挥所，正好碰上弗兰斯、鲁朗特和托姆；他们神情沮丧，默默地并排坐着。弗兰斯避开了我的目光。鲁朗特朝我微微点了点头。我的心沉下去了。我明白，不会听到什么好消息。随后，别的同志也来了。就缺一个威南特。我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好像在守灵似的。弗兰斯显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赫姆斯特德事件的结局作了报告。他用负罪的音调断断续续地说着。他的结论是阴沉暗淡的。阿里和另一个同志，在我们约定接头的那幢房子里措手不及，两个人都被抓住了；威南特的大腿受了伤。幸好他终于脱了身，回到弗兰斯那里，弗兰斯亲自把他送到费斯特街上的房子里，他现在正由马丁大夫照料着；威南特失血很多，不过伤口本身并不怎么严重。显然，战俘叛变了。弗兰斯没费一句话来做解释；这是对自己过失的无言的默认。同志们自然都没有作声；而且大家也无意责备弗兰斯。更重要的是，目前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战俘们对我们的情况掌握了哪些呢？弗兰斯开始询问约翰，他和威南特在同那些外国人联系的时候，关于我们组里的情况都谈了些什么。他们是否知道我们组里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我们在干些什么，我们的指挥所设在哪里。约翰断言，无论是威南特还是他，都没有对战俘们说过这方面的任何情况——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甚至不能想象，那些小伙子当中谁会把我们约定接头的事向希特勒密探告

密。他和威南特与之交谈过的那些人，个个都使他们觉得是可靠的；他们确实急不可耐地渴望着帮助抵抗运动，约翰断定说。可是说不定，他们当中也有不少骗子。而且可以肯定已经有那么一个坏蛋了。

鲁朗特把放在桌上的双手的指头交叉起来做了个习惯动作，弄得关节咯咯响，他说：

“喔，伙伴们，很清楚：我们摔惨了。威南特和约翰目前已经不能在外边露面，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战俘中那些不可靠的人，随时认得出他们来的；要知道，这两位同志已经跟他们见过两次面了。”

沮丧的弗兰斯坐着；看上去，他很难同意鲁朗特的说法，并且更难以放弃使用这两个同志。但是他点了点头；是啊，是啊，大概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约翰的样子看来更沮丧；他显然认为不能到外面去和暂时放弃工作的命令是一种处分（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艾迪坐着，脸微微扭向一旁；在房间里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他的侧影显得严峻而不快；他大概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攻击弗兰斯。弗兰斯用手掌轻轻拍了一下桌子：

“鲁朗特说得对。你听见吗，约翰？情况很严重！我想你的做法是合适的。我们无法预料可能遇到的一切！……”

沉默寡言的杨，抬起自己瘦削、严肃的脸，说道：

“可是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我们大家都必须十分谨慎，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且等骚动好好地平息一下吧。在这次事件以后，依然像往常那样继续我们的工作，那是极端愚蠢的。这一点你们明白吗？……”

有人低声说，他们自己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弗兰斯的视线在大家脸上一个一个地扫过。除了极其痛苦地意识到两个同志

因为我们而被捕以外，我还感到极端地失望，好像有谁残忍地欺骗了我似的。难道说，正是现在，正当工作已经开始顺利进行的时候，正当我们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集体的时候，一次致命的事件就注定要使我们整个活动陷于瘫痪吗？激怒的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我正要开口表示自己的愤慨，可是弗兰斯抢在我前面了：

"你，汉娜，不妨去探望一下威南特，而且越快越好。他躺在哪里，你是知道的。至于杨的建议……这种问题我不能决定。就连小组也不能决定……这我得和抵抗运动的地区领导人以及党的教导员谈一谈……"

他的声音比较轻，而且有点疲乏，我甚至觉得弗兰斯的脸色也有点发白。

"我希望你们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继续说。"这意味着使组织冻结起来……那是大灾难！"

艾迪猛然朝他转过身去，尖刻地说：

"好吧，就算是个大灾难吧！只要往后不再发生更糟的大灾难就好！"

好一阵子，谁也没有打破沉寂。在弗兰斯的结束语以后，尤其是在艾迪的愤怒指摘以后，我自己也不敢说什么了。我的强烈的失望和恼恨情绪仍然没有消失，但是眼看着弗兰斯克制住自己，又一次建议要去向中央派来的同志们征询意见，我们大家——也包括我在内——都同意了这一建议。现在我们小组的命运将由党来决定了。随后，我们大家都怀着沮丧和沉重的心情默默地各自回家了。

《新　　约》

我强打精神驱散苦闷和疑惑，动身到要塞围墙附近的旧房子里去探望威南特。天下着雨，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故意加重我的低落情绪；街上到处都看得见冷得发抖的人，商店门前排着长队，进门见到的走廊黑暗而简陋，甜腻的医院气味令人讨厌，石碳酸和敷料的味道刺着我鼻子。马丁大夫从房屋的黑暗深处钻了出来；他穿着前头已经磨破的便鞋；他一只手捏着个已经熄灭的烟斗，等他认出了我，便把另一只手向我伸过来：

“是您呀？不用说，您是来看威南特的……”

他那对好取笑的灰眼睛在试探地望着我。

“嗯？自从您上次来这里以后，您的情况怎么样啊？您找到您要找的了吧？”

我点点头；今天我一点儿也不想和他讨论抵抗运动的命运的波折。他大概已经猜到我并不是由于日子过得好而来医院探望威南特的。大夫打开了那间我已熟悉的不雅观的房间的门。

“请您在这儿等一会，”他说。“我的女助手正在给威南特处理伤口。”他得意地微微一笑，接着又说：“您瞧，我们这儿有第一流的军医院……我是越来越想设立实验室了！”

显然，他想多少使我高兴些。我感激然而相当颓唐地对他笑笑。

“威南特的情况怎么样？”我问大夫。

他挥了一下手，好像是说这根本不值一谈。

“他怎么样吗？多则不超过两个星期，少则十来天，他又会合乎标准的。他结实得像鞣制过的猪皮……他失血相当多，可

是我们有一种抢救办法。”他温和地微微一笑。“其余的事他自己会告诉您的。您在这儿要待上个把钟头吧？”

我说是的。他走了，我独自沉思着。小桌子上放着几本划船运动和赛车运动的旧杂志，其中还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法西斯杂志《信号》。我开始翻阅这本杂志。使我惊奇的是，我在这上面竟发现了几张从英国报纸上转载过来的德黑兰会议的照片！这说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会议的重要性，因此我的精神一下子振作起来了。我把这些照片仔细研究了好久。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头发斑白的斯大林，态度严肃，非常沉着；罗斯福面带聪明乐观的笑容；肥胖的邱吉尔，手指上夹着雪茄，显出似乎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比不上他机灵的那副神气。我把德寇的评论看了一遍——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它更荒谬可笑的了。戈培尔①的那些唯命是从的奴仆们搞了个重要发明：照片确凿地证明，斯大林身体上有缺陷——一只胳膊比另一只短一些！对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纳粹匪徒们认为只有这一点是必须提到的！他们这个杰作在幼稚和愚蠢方面，超过了战争期间所有的德国的大作。我正对着杂志吃吃地笑着，马丁大夫从房门口探头进来。他的神情带着惊讶，然而又是满意的。

“嗨！……那么好笑吗？”

大夫的视线落到我摊在膝上的杂志上了。“哦，原来是这个呀！……不可思议，对吗？您应当马上把这些情况讲给威南特听……不过得当心点，要不然他会笑得迸开伤口！”

“我可以去看他了吗？”我问。

“我正是来请您的。”

① 戈培尔（1897—1945），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德国战败后，畏罪自杀。

我们沿着没有光亮的长廊走去。福尔马林的气味直刺鼻子。马丁大夫走在前面。他引我进了一个和我刚才在那里等候的那一间相仿的房间。不过这里摆着花，挂着粗花布窗帘；屏风上镶着悦目的花布，四壁装饰着几幅版画。

威南特就在这个房间里，他穿着白粗布睡衣，躺在高高的白色床铺的白被单上；连他那温厚丰满的脸也变白了。我一进屋，他不由得挣扎了一下，想坐起来，可是他的脸当即就疼得变了相。马丁大夫赶忙向他伸出一只手，叫他躺下。

"躺着，躺着，我的朋友!"他吩咐道。"请您别起来!"

威南特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脸上同时现出喜悦、窘困、迟疑的神情。我想掩饰自己的心情，但是我不能一点也不想与威南特有关系的事：我们的失败，同志的被捕，再加上我们小组的活动可能要暂时停止……眼泪涌上了眼眶；病房、躺在床上的威南特、马丁大夫——全都模糊了。大夫向房门口走去，经过我身旁时，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最多半小时，"他说。"我会来告诉您的。"

他随手带上了房门。我在床边坐下来。我已经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望着威南特。我们两个同时微微笑了一笑。

"多好的事情啊，人子，"威南特说。"你快讲讲情况怎么样。大概完全失败了吧?"

我沉吟了片刻没有作答。然而威南特的脸上发着光，显得那么关心和要刨根问底，这使我下决心什么也不对他隐瞒。我想象得到，若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不会满足于一鳞半爪。我讲到法西斯匪徒闯进阿里家，把他和另一个同志抓走的时候，威南特的脸色有点阴沉；他有一阵子避开我的视线；他的手指不住地抓揉着被单边缘。我说得很简单；我老实告诉他，我们现在甚至对

自己能否继续工作都还没有把握，告诉他，他威南特、还有约翰，无论如何必须暂时停止活动，短期内绝对不能露面。讲完以后，我惶恐地环顾四周，我的目光停在威南特床边的小桌子上。那里放着几只苹果——这是极其稀罕的珍品，因为法西斯匪徒死死看守着果园，把所有的水果都劫运走了，连一个小苹果也不剩；桌上还摆着一本揉皱了的书、一本小小的黑封面的福音书和一支红铅笔。

等我再次瞧着威南特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已经恢复常态，不再那么激动了；他的嘴严峻地紧闭着，鼻梁上部横着一道严肃的皱纹。

“事情竟是这样……”他喃喃地说。“大概战俘当中有叛徒吧，汉娜？”

“可能的，”我答道。“你没有讲过能使他们找到我们踪迹的话吧？”

他的严肃神情顿时消失了，他愤慨地大声喊道：

“我们可没对他们讲过什么！他们好像急于要和我们一道工作，可是我们怎么会一见面就乱嚼舌头呢！”

威南特不说话了，沉思地望着，不时深深地叹息一下。沉默使我感到难受，于是我问道：

“你究竟是怎么被他们打伤的？”

他又向我转过头来，说：

“直到现在我还弄不明白……难道你在一片漆黑之中能认得清是什么地方，看得出那里有什么人……我无意中落进了三个纳粹强盗中间，弗兰斯给我打了个溜掉的暗号。我跳上自行车就蹬开飞跑，差不多同时身后就开了枪……当年我经过很好的锻炼……这使我得益非浅。他们嗥叫起来，于是四面八方都

有人赶来帮他们。半路上，我还踢了一个家伙。他们马上朝我开枪——开了两枪。我大腿上觉得一阵疼，要是我胸口没揣着《新约》的话，第二颗子弹就会嵌进我的心脏了……”

威南特朝那本黑封面的小书伸过手去，郑重而爱恋地拿起来，再也不放手。

“结果我得救了。我觉得伤口在流血，但是并不太疼。我朝一条横街一拐，在那儿看见了你和鲁朗特；我很高兴，真的……我好像对你们喊了声什么的……”

“对，你喊了声：‘你们快逃吧！我把他们甩掉了！’”

“对啦，”他笑笑说。“他们又追了我一百来米……我听见他们又开了一枪，可是我已经跑远了……我回到弗兰斯那里，他正等着我。我告诉他，我看见过你和鲁朗特，说你们已经走脱了。他说，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安全了……于是，弗兰斯把我带到了这里……现在我就躺在这里，他们已经把我修理好了，可是我们的事情却糟透了……”

他的脸色又阴郁起来；他若有所思地把那本小书在手上翻过来掉过去。

“这么说，是福音书救了你罗？”我这么问，为的是好歹能岔开他的愁思。

他点点头，略微有点振奋了，他把书递给我。

“你看见这个烧坏的斑点吗？子弹就是从这儿跳开的……荷兰圣经会万岁！他们把圣经装订得这么坚固，简直跟大象的皮一样！……”

我把小书拿在手上，看见麻布封面被枪弹烧焦的痕迹。我打开书：枪弹把前面一些书页燎黑了。我发现，在一面边缘已被烧焦的书页上，威南特在一个段落旁边标了个红色十字。我

不由自主地读起这个段落来了："……**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此处部分原文被烧去)**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①

"正合式吧，啊?"威南特说。"德国鬼子给我留了个纪念。"

我碰上了他那含笑的眼睛里的正直目光。我自己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赶紧把福音书递还给他。我觉得自己窥视别人内心的秘密是不礼貌的，我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

"奇怪，汉娜，"威南特说，"太奇妙了，就是这么随手打开福音书，竟会立刻找到和你本人生活实况一样准确的话……大概正因为这样才称它为上帝的话吧……多么好的书啊!"

我踌躇了一下，问道：

"威南特，那你究竟为什么跟我们在一起呢？跟信仰另一种真理的共产党人，跟几乎与共产党人持同样观点的人们在一起呢?"

他的手轻轻动了一下，仿佛在掂量手上这本书的分量，然后说道：

"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道路……自己特有的道路。所有寻求真理的人，只要他们是正直的人，就一定会相遇的……"说到这里，他咳了一声。"可这本小书……它给了我特殊的帮助，难道不是吗？这东西，我永远也不会丢掉。它将跟着我一起到坟墓里去!……"

我笑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

---

① 见《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12—16节。

“啊，威南特，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你一定还会杀死不止一个坏蛋吧？”

他头一次由衷地笑了，但是突然又缄默了，他的脸疼得变了样。

“相信我吧，”他说。“我的履历表还没有填满哪，我的孩子！”

我们本来还会交谈好久的，可是这时候房门开了，马丁大夫手上拿着表来了。

“哦，我这就走，”我说。

马丁大夫朝威南特俯下身子。

“怎么样，她叫你开心了吧？”

“别提多高兴了！”威南特大声说。“我希望，人子，你再来看我。”

“我会来探望的，”我握着他的手说。“可是同志们也想看看你；所以，在最近几天里，你等着别的客人吧。”

他对我挥挥手，随后，我走到屏风外，看不见他了。马丁大夫送我到后门口。

“这么说来，赫姆斯特德的事情搞得很不好，是吗？逮捕和其他什么的……你够小心谨慎了吗？”他问。

我注意到他不再对我说“您”了。这使我再一次确信：一种巨大的、隐秘的手足情谊正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我是尽量小心谨慎的，”我回答说，“不过这并不总是由我们决定的。”

他严肃地点点头，然后动手把直接倒在罩衫口袋里的烟丝装进烟斗。在他点燃烟斗的时候，他那明达的灰绿色眼睛保持着沉思的神情。

“我知道，”他悠然喷着烟说。“敌人一分钟也不会让我们安静的。我们必须比敌人更有力、更机灵和更顽强。任务很艰巨啊，姑娘……Na, mit Gott.①啊，上帝保佑吧！”

他突然快活地大笑起来，他的眼睛又开始闪光了：

“上帝饶恕吧！你听见吗？我居然也扯起德国话来啦！在占领的有害气氛里，还有一种细菌！作为一个医生，我应当感到羞耻！……”

在我离去的时候，他一直站在门口笑着。

“仁爱赠礼”②

圣诞节之前，一位党的教导员来到我们指挥所。那一天，我们四五个人正坐在指挥所里，忽然间弗兰斯不期而至，他吩咐我们马上散去，有位领导同志来和他进行重要的谈话。弗兰斯脸色苍白，情绪忧郁，说话的声调异常傲慢，因此我们大家立刻就明白了，他正十分焦急。我们慢慢从各自的坐位上站起来，披上上衣和短外衣。纸牌和茶杯摆在桌上也没整理。我们在房门口停留了一下——我们出门时，客人正巧进门。我吃惊地发现，来客竟是个女的。她大概比我大四五岁，身材高大，体格强壮，长着个开朗、美丽、神采奕奕的圆脸。她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男式短外衣，有些地方的皮革磨旧了，头上包着灰色头巾，头巾下露出鬈曲的鬓发。当我经过她身旁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她那深色的敏锐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我向她点点头，她也对我点了点头。有人从后面轻轻地然而决然地把我向门口推了一下。

① 德语，意思同接下去说的一句话。
② 原文是德语。

我们走进黑魆魆的花园，残缺的月亮有时透过暗淡污秽的云层露一下面，我这才看出在背后推我的是鲁朗特。同志们从我们身边走过，隐没在花园之中。我扯扯鲁朗特的衣袖，低声问道：

“这个女人是谁呀，鲁朗特？”

“安妮。党的教导员，”他简短地回答说。“瞧吧，这一下弗兰斯准得倒霉……塔拜①，汉娜！明天我们全会知道的！”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非常好；当然，这种精神上的振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现党的教导员竟是一个女人。这是惊人的，我觉得自己受到了鼓舞。我眼前又出现了那长着智慧的深色眼睛的、年轻的、刚毅的女人的脸。她还向我点了头呢。同志们平时提起她的时候总是说“党的教导员”，他们本来应该称她为“党的女教导员”。我明白了，在他们看来，只要你是个党员，是男是女全没有关系。我暗暗地笑了。在被湿雪映得发灰的讨厌的黑暗中走着的时候，我好像还轻轻吹起口哨，吹起《马赛曲》来了。

第二天，我们获悉决定已作出。决定绝非温和的。我甚至以为这等于降级。弗兰斯受够了责备。他用我从前已经听到过的那种负罪的声调简短地对我们宣布，说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时候大家全都明白他受到了责备。主要的错误，按照他对我们所作的说明，在于他没有征询西蒙和党的意见而擅自与战俘们联系。弗兰斯说，大家也都受到了处分，虽然他意识到一切都该由他一人负责。最近几个星期内，禁止我们再搞偷袭和武装活动。正如我们所料，约翰和威南特暂时停止工作。其余的人只好转运转运武器，这些武器有一部分是由北荷兰省抵抗小组搞

① 马来语的问候语，意思是“午安”或“再见”，在荷兰极为流行。

到的；此外还有英国人空投的。还有一些开小差的党卫军丢弃的制服放在阿尔克马[1]，也需要运到阿姆斯特丹去。决定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本来预料的情况更坏，所以这个处分就显得不那么严厉了。我们各自分散回家；话不投机，弗兰斯也立刻就走了，他好像受不了老战友们目光中表露出来的苦恼和责难的情绪。我心中感到忧郁和委屈，仿佛我被谁欺骗了似的。这一瞬间，我真愿意亲手惩治弗兰斯，虽然理智提醒我，他本来就已经受到很严厉的处罚了。

我的神情如此沮丧，家里的人都很惊讶。母亲和尤迪菲不止一次问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父亲注视着我，他以为我没有觉察。在我周围仿佛出现了一道缄默和隐秘的壁障，而在这无意的疏远后边却隐藏着悲伤，双亲看来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圣诞节前夕，我们收到一个邮包，是从瑞士寄来的！我一眼就从邮票上看出来了。我心里突然燃起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希望：邮包可能是塔妮娅寄来的——那就是说，她脱险了……我们全都围着邮包，辨认着寄件人的名字。原来包裹不是塔妮娅寄的，而是父亲从前的一位同事——犹太人戈利特施泰因寄来的，他早在一九四〇年就侥幸地到瑞士去了。邮包里没有发现任何信件。里面只有两大包巧克力糖和几个盛着干酪的编织的小盒子。我们凝视着这些东西，就像看到来自遥远的过去的神奇礼品；而我却不无痛苦地暗自思忖，在对于希特勒的关系上表现了容忍的瑞士人，至今尚过着富裕的生活。我的双亲当然连想都没想到这一点。他们把摆在桌子上的这些精美的东西，完全当作一个老熟人对他们的关怀而加以接受，并且深受感动。

“好心肠的戈利特施泰因……”父亲说。“亏他想得到！他

---

[1] 北荷兰省的一个城市，有铁路与公路通阿姆斯特丹。

大概是从瑞士报纸上，或者从广播里知道了占领区食物供应情况很糟。”

我一直拿着邮包的包皮站在那里，仔细看着上面的地址，又在想着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塔妮娅。包皮是灰色纸质的，写在上面的钢笔字已经化开了；地址的上方贴着一个有光纸的鲜绿色小枞树枝。上面有一排哥特体的字①。我一下子领悟了。

“他妈的，”我大喊了一声。“这太卑鄙了！”

我把贴着小枞树枝的包皮拿给双亲和尤迪菲看。尤迪菲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大声念道：“‘来自德国的仁爱赠礼’！”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大家同时笑了起来——讽刺地、恼恨地笑着，对于纳粹匪徒这种不可置信的、厚颜无耻的虚情假义，我们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等我们笑够了，并且各人都表示了对于这种德国仁爱的鄙弃以后，母亲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

“汉娜……你刚才那么粗野地骂人。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

我望着母亲，感到她是在想识透我这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壁障。

“妈妈，”我用最快活的声调说，“饱经了四年德国占领的耻辱，你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了。”

妈妈没有说话，她叹了口气，从自己面前推开了“仁爱赠礼”……

尽管有巧克力糖和干酪，我们的圣诞节却过得很凄凉。也许这瑞士寄来的邮包，也使我家里的人想起了塔妮娅，想到她至

① 哥特体文字是拉丁字体的特殊写法，其式样首见于十世纪的意大利。在德国流行甚广。

今仍毫无消息。不过谁也没有提起她的名字。母亲用家磨小麦粉和二百克菜油烘烤了传统的圣诞节“8”字形甜面包；这些原料，是占领者作为德国“社会主义”方面仁慈的新礼物而仁慈地分配给每一个荷兰家庭的。在德国国防军的家庭里和军官饭店里，当然是根本不用一点菜油的。他们炸鹅烤鸭都是用的真正的黄油。圣诞节的头一天，我整天在哈勒姆街头没有目的地徘徊。凡是有德国鬼子的地方，都竖着巨大的圣诞树；往来行驶的一些汽车上，装载着包包袋袋，当然都是来自各个被占领国家的东西；载重汽车成箱成箱地分送着酒类，酒瓶上分明地贴着法文的、意大利文的和西班牙文的商标。到处可以听见条顿人①的圣诞歌曲和宗教音乐，士兵们正伴随着这音乐和谐地唱着悲天悯人的调子。这种把戏实在令人憎恶，因为人们早就知道，一到傍晚就会变成较少基督教色彩的消遣，更何况这些虔诚的歌手当天还明目张胆地干着侵害我们和千千万万人民的罪恶勾当呢。我愤怒地转身回家了。圣诞节的第二天，心情丝毫没有好转。天又下起湿漉漉的大雪，狂风一阵猛似一阵；云层低低地笼罩着大地，仿佛老天正在竭力避免看见大地和大地上所发生的丑恶罪行……城里到处都在谈论德国兵互相打架的事。午后，我拿了一本海涅的作品，指望他那辛辣的讽刺能消除我的苦闷，驱走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可是当我重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时候，我发现海涅并非那么强烈地憎恨德国人，虽然他自己也曾受到他们的迫害。想想都可怕！诗人所诅咒的那个德国，在过了一百来年之后，竟然又复活了，而且现在以更加可怕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把书放回原处，开始一边做家务，一边想心事，就这么度过了这一天的剩余时间。

① 日耳曼民族之一。

是克桑提帕[1]还是发电机？

天气由雪转雨，气温明显地上升了，快到新年时，风雨才停歇。一月份的日子真难挨，天天寂寞无聊，毫无乐趣。纳粹匪徒刻意制造出来的圣诞节节日气氛早已化为乌有；他们在圣诞节前释放了几个人质以后，现在又露出了本来面目。在莱顿，因为抵抗运动战士干掉了德国职业介绍所所长（他曾使无数荷兰人沦为德国奴隶），法西斯强盗拘捕了五十个市民，怀疑他们"赞同谋杀"（其实这还有谁会不赞同！）；其中有三个人因"企图逃跑"而遭枪杀。这还是新年以前发生的事。新年以后，搜查和逮捕仍在继续，主要是在我国北部，看来那里又开始了强烈的骚动；这我们是从一些传到这里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中获悉的。

我们小组已经开始在运送武器；圣诞节以后，艾迪、杨和我把党卫军制服送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们打算袭击拘留所，营救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员，并尽可能再从监狱里救出几个政治犯来，结果没有成功：我们从德国鬼子那里偷来一辆大卡车，藏在一个车库里，准备用来运载抵抗运动战士，但是在发动袭击前半小时，德国巡逻队发现那里有灯光，便占领了那个车库。这件事我是在指挥所里听说的。弗洛尔和休果都在指挥所，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海里特·杨，他也是抵抗运动战士，近来我们越来越经常听见他的名字。这次袭击可悲地失败了；唯一聊以自慰的是所有参加袭击的人都及时隐蔽起来了。然而失败的苦味依然存在，当一月初又有十三个共产党员惨遭枪杀的时候，痛苦就更加

[1] 克桑提帕原是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妻子，据说这个女人为人刻薄泼辣，后来欧洲习惯上即以其名作为悍妇或泼辣女子的代词。

剧烈了。

我经常提醒自己，广阔战线上的斗争，正在给纳粹匪徒以越来越沉重打击。莫斯科时常在鸣放礼炮，庆祝各个城市和省份的光复。红军部队已经进入波兰。这是那些日子里最喜人的消息。甚至流传开了歌颂这一事件的秘密诗歌。希特勒在长期缄默以后，又发表演说了，德国电台转播了这次演说。在这些个难熬的阴郁的星期里，充满了不幸和灾难，而希特勒的演说倒多少给我们带来了点安慰：显然，德国法西斯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不远了。元首在他以往的演说里，一贯是恫吓、发怒、立誓要报仇；在这一九四四年的第一次演说里，他所能奉献以安慰自己士兵和同胞的，只不过是些故作聪明和庸俗的空话："即使最猛烈的暴风雨也总要过去的……乌云后面正闪耀着阳光……全能的上帝只支持善于坚持的人民……"这个大狂人从来还不曾这么沮丧过哩。

一月底，我们获悉德国鬼子公布了分别指明相貌特征的地下工作者名单。其中有很多是我们的人。工作停顿得更多了。情绪是忧郁的，然而却毫不沮丧，大家好像都变得特别沉着了，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可是这期间所形成的局面却惹我生气。我再不能忍受这种毫无作为和等待的局面了。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越来越牢固地掌握了我的整个身心。我有时把它驱开，有时又回到了它上面；我想得越多，越是深信我应该有胆量实现自己的愿望。

二月初的一个无风的阴天，我又乘上了去维耳曾的渡船。围垦地的灰褐色土地和白茫茫的天空连成一片；有三两架水磨在转动着翼子板；地平线上工厂的烟囱冒着缕缕细烟。这种宁静温和的冬日，在我们的生活中何止上千。这和平的景象刺痛

了我，我觉得一切——包括大自然，甚至也包括人的劳动成果——都有意要掩盖我们正饱受着的暴虐。我一大早就来到克罗缅尼。德·莫尔妈妈认出来是我，高兴得拍了一巴掌。我也很开心，因为这位矮小的老妈妈居然还记得我，而且看到我很高兴。她挪着碎步赶忙从柜台里走出来迎接我，把我领进铺子里边的小房间。

"来吧，让我瞧瞧！身体结实吧？一切都顺利吧？事情都在照常进行吧？"我们刚一面对面停下来，她就问开了。

"不，德·莫尔妈妈，不十分好，"我回答说。"我到这里来，是想找弗洛尔谈谈。"

屋后有人在干活——在劈柴。我环顾房间。它和我上次来时一模一样；闪着柔和亮光的红木家具，在高高的花枝上开着的花，关在笼子里的芙蓉鸟以及天花板上闪亮的棕色雕梁，都和去年十月间我坐在这里的时候一样，给人以惬意和朦胧的舒适感。所不同的是现在看不见在阳光里飞舞的尘埃了。老妈妈把那只因为患风湿症而畸形的小手搭在我肩上，快活地絮絮叨叨说起来：

"是啊，你们八成儿也是不轻松的，可是好日子会来的。眼下一定要挺住！你，看起来，不是那种垂头丧气的人……我就请德·莫尔去通知弗洛尔。当然，我不知道弗洛尔在哪儿。这些小伙子不会安安静静待着的，不会，不会的！"

她又莞尔一笑，因此她的嘴巴完全瘪了进去，而那发亮的圆脸颊更加突出了。

"你大概不会拒绝喝点咖啡吧？"

她把头伸到房门外，招呼了自己的丈夫一声——照例是喊姓。斧头的响声停止了，德·莫尔走进房来。他的态度十分自

然，就好像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里似的。

“啊，是您……”他说。他那熏黑了的面孔上掠过一丝微笑。“弗兰斯还有菜豆运来吗？”

“只要办得到，”我回答道。

“她要找弗洛尔，”德·莫尔妈妈连忙插进来说。

“我就去，”他说。

随后的一切，就跟我们初次会见时的情况一样。德·莫尔披上自己的绒布短外衣出去了，老妈妈一会跑进厨房，一会儿跑进房间或是店堂，而我呢，啜饮着咖啡，在房间里等候着。这个房间里的陈设，遗留下天知道多少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痕迹。德·莫尔妈妈拿出个老式的小盆子在我对面坐下来，开始削马铃薯。

“中午我们总是吃点热的，”她作着说明。

我有生以来也许只削过三两次马铃薯，可是这时候我忽然很想为老妈妈做点事，于是，我说，我来帮她削。她在一旁看着我把小盆子搁在膝上坐下，用笨拙的手指头转动着不听话的马铃薯，使着小薄刀削马铃薯。大概我削掉的薯皮，厚得足以使善于过日子的主妇心疼得浑身都不舒服。不过德·莫尔妈妈倒没有这样。她微微笑了；她整个脸上都布满了有趣的细小皱纹。

“你大概一向是在办公室里做事的吧，”她说。

“差得远，”我说。“我是个大学生。学法律的。”

“原来是这样！虽说律师当然也需要……不过我觉得，医生更有用些。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我也知道，妈妈，如果只有律师和法官，而人们的权利只是写在纸上，那是不够的，”我说道。“这还必须有一种东西——活的力量。最低限度是这样的力量，它能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的

人，而不是那种可以容许一些人往别人脖子上套枷锁的力量。"

我的话是这样合乎她的心意，她甚至暗暗笑了一下。

"这儿得有公道，"她拍着自己瘦小干瘪的老太婆的胸脯说。"要不然，那就等于说你完全是个堕落的人。侮辱我们出卖我们的，就是这一号人。他们都丧尽了天良……我明白，我的孩子，当周围正发生着这么多混账事的时候，你连书本子都不愿意再看了。我有一次问过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多厚厚的法规。这些东西编写得太复杂了，一个普通的人是弄不明白的。"

我点点头，猛劲削着马铃薯。老妈妈显然一点儿也没有抱怨，尽管看到那削了皮的马铃薯简直不像削净的薯块，倒很像孩子们玩的积木。

"您说得对，妈妈，"我说。"应该编制这样的法律，让最普通的人都能一下子理解，并且相信这些法律对他们是有利的。我们将来就要这样做。在法西斯匪徒遭到致命的打击以后，我们的工作不会停止的。"

德·莫尔妈妈专注而且激动地看着我；她的眼睛由于时时涌上的泪水而闪着光。

"可以跟你说，"她说。"我真想有个知书达理的女儿啊。女人处处听任人们支配。可我总是说：若是女人多掌些权，那就连战争也不会有了……唉，天哪！店堂里又在响铃啦！"

"您有孩子吗，德·莫尔妈妈？"等她从店堂回来，我小心地问道。我看清楚了窗户之间小橱上方的墙上有几张不同年龄的男孩子的照片——从裹着白色毛皮的乳婴到小学生的照片，还有一张穿着荷兰军装的士兵的照片。德·莫尔妈妈瞟了我一眼，仿佛我提出的问题侮辱了她似的。

"可你说呢？当然有孩子。两个男孩。"

她挪着碎步走到小橱跟前，拿过两张照片，放在桌子上，用她那长着老茧的手指点说：

“凯斯和约翰。你听到过这两个荷兰常见的名字吗？”

她对着士兵的肖像看了几秒钟；健谈的老太太陷入了忧虑的沉思；我觉得她在自言自语。

“只是不知道他们流浪在何方……凯斯跟着一群曾经在比利时和敦刻尔克① 附近进行过残酷战斗的荷兰士兵走了……也许，现在做了俘虏。要不就在英国。约翰在船上工作。日本人在新加坡放火的时候，他正在那儿……要是能听到一点他们的消息多好啊……眼下我每天晚上都坐着收听英国广播——可全都是白费。嗯！没关系。还得稍微忍一忍……”

说到这里，她好像才看见有我在场；她温存地向我伸过满是皱纹的手掌，从上到下抚摸着我的头发。她的脸上立刻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愉快的皱纹。

“不过，就是没有他们，我的孩子也够多的了，你懂吗？我的儿子多着哪，大大小小的都有，而现在，真的，我觉得也有个女儿了！”

我刚把削好的马铃薯送进厨房，老妈妈就在灶边忙开了。不久德·莫尔回来了，他吃惊地默默注视着盛有被我弄得残缺不全的马铃薯的绿色小盆子。最后他望着我说：

“这是您整的吧？”

德·莫尔妈妈连忙把小盆子端过去，避开他吃惊的目光远一些，一下子把马铃薯倒进盛着水的水盆里。

“对，是她，”老妈妈尖刻地回了一句，及时袒护我。

---

① 法国北部的城市和港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地曾发生激战，遭到严重破坏。

德·莫尔转过身去;我看见他笑了。他脱下绒布短外衣,挂到钩子上,放下卷起的蓝布衬衫袖子,说道:

"好吧,那您就得吃掉它……弗洛尔暂时不在。他要过一会儿才能来。"

他到院子里去了,很快又传来斧头的响声。德·莫尔妈妈在灶旁忙着。我在一边看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她问。

"汉娜,"我回答。

她把拨火棍往灶上一敲,失声叫道:

"汉娜!正好跟我过世的妹妹同名!……"

我的名字好像是根魔杖,使得她的话又滔滔不绝地涌了出来。我从头到尾听完了一部查安居民的家庭编年史,那是一部包罗婚姻、子女、船长船工们的生活,种种病态现象和一场遗产纷争的历史,而且我一点没感到枯燥乏味。我甚至没有特别留心去听老妈妈那么流畅地叙述的事情,我简直是在欣赏她本人。我连表也忘了看一看,忘了我是在等待一个要在此时此刻来决定我整个未来的人。

我和两位老人一同进餐。我看出了德·莫尔和他的老伴方才对待马铃薯的态度是多么有趣,于是,我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煮熟了的马铃薯,样子比较好看了些。弗洛尔来的时候,我和老妈妈已经在洗餐具;老妈妈拿走了我手里的杂色洗碗布,把弗洛尔和我赶进了那间放着花和芙蓉鸟的房间。

弗洛尔那张有雀斑的脸是坦率的,他那灰蓝色的眼睛正看着我,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考虑着我该怎样对他说明我的想法。

只有黄鸟儿在冬天发出的低微颤音打破这沉寂。"有困难

吗？"沉默了好久，他才问道。

"是有一些，"我回答道。"不过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你就从头说起吧，"他建议。

于是我开始说了。他听着我对他讲述我们哈勒姆的次次失败，有时也点点头：不用说，他早已全知道了。在我激烈反对弗兰斯、反对我们组里工作停顿的时候，他没有打断过我的话。只有一两次，他皱起他那有雀斑的前额，扬起了眉毛。

我讲完以后，便一声不响地望着弗洛尔旁边的窗子外面，其实那里除了邻宅红褐色的墙壁以外，什么也没有。

"嗯……还有什么？"弗洛尔终于问道。"你再没有要说的了？仅仅是抱怨抱怨弗兰斯就完了吗？"

我摇摇头：

"不，不，可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弗洛尔。我不能这样活着，而且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在我周围肆无忌惮地干着他们的残暴勾当！"

"这也在激怒着我们所有的人，"他谨慎地指出。

我感到习惯的胆怯几乎又要征服我了，于是赶忙冲口说道：

"休果知道他要干什么，而且他按照他的理解，在履行着自己的天职！他是不会容许工作停顿的！"

弗洛尔用一只手摸摸粗糙的面颊。

"你这样想吗？"他谨慎得惹人生气地问道。

"当然，"我回答说。"我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指挥所里，谈论过消灭敌人的当前任务。休果往往一两个星期不知去向。直到今天，这件事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弗洛尔，你当然不会以为我的脑袋全是填着木屑的。"

"不像，"弗洛尔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他那温厚的笑容消失

了。他甚至不再看着我了。他在用自己宽大的手掌抿展那长毛绒的台布的时候，我直感到浑身不舒服。我问道：

“难道我弄错了吗，弗洛尔？也许，休果就在这里，在本区，建立着我们连猜都猜不到的功勋哩。他参加过我们对发电站的袭击，也参加过试图在新年晚上营救阿姆斯特丹监狱里的杨·普的活动。也许，天知道他另外还做出了些什么成绩！这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告诉我。”

“就算是吧，”弗洛尔同意了。“你到底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弗洛尔，你应该把我派到休果那里去，”我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我要和休果一起或者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要开枪。我要消灭玷辱我们人民的霉菌。请你记住，我后一步再去收拾德国强盗。当我看见我们中间的叛徒或卑鄙下流的招募者的时候，我简直要绝望了。这哪算荷兰人！他们把正直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的公民出卖给刽子手。这种人没有权利活在世界上。你要知道，我有一次读到过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句话：‘我以为，就拿传染伤寒的虱子来跟叛徒打比，也羞辱了虱子。’我要做的，就是休果所做的：彻底消灭这些败类。”

弗洛尔笑起来了。他的整个面色好像变得温和了——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弗洛尔这个样子。

“这的确是真话，汉娜！”他最后说。“谁都会被你说服的，千真万确……”

他又一次快活地喷了下鼻子。

“应当老实承认，你对休果的猜测还真不差。我确实可以告诉你一些消息：最近有一天，我们在维耳曾渡口附近守候过一个凶手，这帮凶手在那一带横行霸道，而这个凶手是残害犹太人的最凶恶的刽子手……”

“……是的，我知道。是帕尔德曼斯。就是到哪里都带着狗的那个坏蛋。难道休果也到那里去了吗？”

弗洛尔点点头。接着，他便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好像回忆不久前的事件使他自己心向神往。

“我们——休果，我，还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带去了一辆汽车，我们站在一条巷子里。我们穿的是党卫军的制服。就是你们小组新年在阿姆斯特丹用过的那几套。休果那一枪开得真漂亮。帕尔德曼斯乘渡船过河的时间，赫烈切预先通知了我们。她在那里至少等了一小时。她站在大街上，一直到坏蛋死去，然后才到这里来把消息告诉我们。”

“赫烈切？”我问道。

“你也认识赫烈切的！”他说。“你本来每个星期都和她在一起印报纸呢。”

于是我想起了那个面颊红润的快乐的姑娘，我曾不止一个晚上和她待在油印机旁边……我和她搞得多么熟啊！就是她，被选中参与惩罚行动，可是我呢，见鬼，正是这个时候让弗兰斯把我留作了“后备”，我气得简直都要发疯了。

“弗洛尔，我真羡慕她，”我说，我的感情如此激动，使得弗洛尔又笑起来。这样，他就没能把帕尔德曼斯的事讲完，总之是什么话也没有再说。我的心情是不可能瞒得住他的；我心中正炽燃着抑制不住的急躁情绪，我要着手干真正的工作。

“你帮帮我吧，弗洛尔，”我说。

他那显得年轻的脸上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了。

“我不知道弗兰斯会有什么意见，也不知道休果本人是怎么考虑的……”他谨慎地说道，无意之中驳回了我的非同一般的请求；也许他以为这甚至有点违反纪律。“不过我是理解你的……

老实说，我也觉察到伙伴们都有这种情绪……他们根本不愿意闲着。"

"只不过我是个女的，"我怒不可遏地大声说道。"是长着爪子和鸟嘴的哈耳皮埃①，对吗？但要知道，我是生长在肯瑙②生活过的城市里的。肯瑙懂得，为什么必须用滚油去浇西班牙人的嘴脸。随你对我怎么想吧——我反正不在乎。只要你帮助我！"

弗洛尔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他被我的感情冲动弄得为难了；他明白，他的话大大伤了我的心。我知道他这样说是无意的，但是我一想到，就连他这样一个曾经对我说过，参加抵抗运动斗争是男是女并不重要的人，心里竟也持着这种陈腐的观点，我就感到痛心。

"你听着，汉娜，"弗洛尔忽然决断地说。"你是在要求采取根本的措施，并且想要我来做到这一点。关于男人或女人，哈耳皮埃和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的废话，在这里全用不着。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这就派你到休果那儿去。行了吧！嗯，可往后的事，就得由你自己去斗争，去争取了。"

我差点没有拥抱他。他站在我面前，装着严厉的样子；因而我的心又软了，对他抱着无限的喜爱。他大概已经预料到，他做出这种决定以后，定会引起我的激动，因而他急忙看看自己的表，想借此保护自己，防止我对他做出忘情的动作来。

"三点了，"他说。"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我回答说，我正被抑制不住的急切心情弄得浑身颤

① 希腊神话中司暴风的有翅膀的女怪。

② 肯瑙，西蒙丝·哈谢拉(1526—1588)，一五七二——一五七三年哈勒姆城受西班牙军队围攻时，她是英勇捍卫该城的女市民领袖。

抖。

“那好，”他说。“我们必须骑自行车顶风跑上个把钟头，不过我们反正来得及碰上休果的。”

“我骑车总是碰上顶风的，”我说。“这我好像早就习惯了——似乎还是我的脚第一次够得着脚镫的时候……”

“我的天哪！”他大声说。“你呀，简直不是人，而是一台真正的发电机，你身上有多大的能量啊！”

对于女人来说，如果把她与机器相比，是不会叫她感到得意的，大概还远不如把她与克桑提帕相提并论。可是这次把我比作机器，我倒没有感到屈辱。我笑了起来，奔出了房间。德·莫尔不知到哪里去了。我托他的老伴代我向他致意，我拥抱了矮小善良的老妈妈，遍吻着她的双颊；而正在往身上披短外衣的弗洛尔，则带着男人的傻笑在瞧着我们。

第 三 部

制裁的道路

藏在麦秸里的人

我们骑着自行车，沿乡间道路朝西北方行进。对于方向无须怀疑，我根据荷兰惯常的风向感觉到这一点；其实，在荷兰，风总是朝脸上吹的。在我们右面，沿查安河，天空清晰地衬托出绵延的村镇，而在左面，靠近埃特海斯特出现了铁路线。我久已不到此地来了。我只认得出个别几条自行车小道，可是弗洛尔却十分不可思议地能在许许多多冷僻和曲折的村道中判定方位。我觉得我们正在卡斯特里库姆附近的什么地方。时近冬末了，和煦的阳光普照着，空气里可以闻得到凋落的橡树叶以及松树的辛香；一行行细小的兔子足迹伸向荒地和沙滩。这里房屋稀少。直到此刻，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德国鬼子。我问弗洛尔，这里平日有没有德国鬼子。

“什么地方没有他们呢？”他含糊地回答说。“这里是布满了赫尔曼·戈林师团的坏蛋们的肯涅麦尔区域。你要特别留神。的确，他们对于这些小道，是很头痛的。”

“这些小道像打游击的小路。这里隐蔽是很方便的，”我说。

弗洛尔从旁边看了我一眼，但是没有答腔。

沙丘后退了。在赤杨和白桦之间，出现了一片不大的菜园，这是一小块精耕细作的极好的土地，是无价之宝。远处温室的玻璃窗微微反射着阳光；隐约可见一些方方正正的菜畦，就像棋盘一样。我们拐进了小树林，林内枝桠纵横交错，异常茂密。夏天，想必头顶上荫覆如盖。一座相当矮的刷着白色灰泥的房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那屋子有狭小的简陋凉台和门，门上闪耀着红蓝玻璃。再远一些，在房屋背后，立着一个用涂了焦油的淡褐

色圆木垒成的低矮木棚，开着些可以放下的小窗子。这个木棚，大概是小贮藏室，用来关关鸡，放放晾晒葱头蒜头用的晒架。所有这一切，都呈现出如此和平、清白的光景，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任何战争，不存在连日不断的残杀和战争灾难似的。

我情不自禁地跳下自行车。弗洛尔用脚刹住车子，也轻悄悄地下了车，和我并排站着，望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隅荷兰土地。我一直觉得，在那些遥遥可见的沙丘和被那一排排灌木林遮住却可以想象得出的阿尔克马湖之间的这一隅土地，仿佛是整个荷兰的化身。我朝弗洛尔看了一眼；我已经猜到，我们要找的人一定是在这里。

“我要等候一下吧？”我问。

他挽起我的手臂。

“不，不，我们一起去。我们要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如果他在这里的话。”

我们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朝小屋慢慢走去。屋里传来一种奇怪的木头的咕咚咕咚和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以前也听到过这种声音，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呀？”我问。

“你猜不出吗？这是木马呀！”弗洛尔说着，笑了起来。他把我推进厨房。顺着石墙有一个长长的矮木柜，里面安装着从水井接过来的铜管子。厨房大圆桌上放着个装了汤匙和餐叉的篮子。桌子旁边果然有个两岁的胖小子，骑在木马上，使劲地摇着，发出嘎吱嘎吱和咕咚咕咚的响声。孩子一看见我们出现在门口，便停住木马，睁圆眼睛看着我。弗洛尔走到孩子跟前，在他身边跪下来。

“喂，你呀，海斯！瞧瞧，我给你领来了一个多好的阿姨！你

认识我吗？”

海斯微微点点头；他的小脸蛋那么胖，连小嘴都不容易看清了。

“我是谁呀？”

“白毛，”海斯回答。

弗洛尔哈哈大笑。他用双手握着孩子的一只小手，相形之下，他的手显得更大了。

“真见鬼，海斯，”他说，“你的记性就像个扑满①。妈妈呢？”

我走到孩子面前，也把一只手伸给他。他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动也不动。我不知道怎么对待他才好，我本来就不习惯跟孩子们相处。我总以为，孩子们是生活在一个与成人生活毫无关系的特殊小天地里的。弗洛尔呢，他显然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个天地迅速转入另一个天地。“妈妈在哪儿呀？”他又问道。

还是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屋子里响起了来人的脚步声。房门开了。弗洛尔已经准备好用军礼来向女主人致敬，因为这无疑是女主人了：一个身材中等，体格强壮，双颊红润，头发淡褐色，约三十来岁的妇女——通常人们想象中的荷兰农妇就是这样的。还没开口，她那带绿色的深棕色眼睛便先审慎地盯着我的脸了，仿佛她想立刻断定我是什么人。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的嘴边和眼角出现了细小的皱纹，露出怀疑的神色。弗洛尔快活地说道：

“看见你身体健康，我很高兴，卡琳……杨过得还好吧？跟往常一样，是顺风把我吹来的。有个姑娘和我同来，她很想会会我们的朋友。如果他在这儿……”

---

① 即储蓄钱币用的匣子。此处取其只进不出之意，借以夸奖孩子的记忆力。

农妇——菜园主的妻子终于向我伸出了手。我要不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呢？她的名字，虽然是间接的，但已经说出来了。我生怕表现得过于热情或是太冷淡。我尽可能有礼貌地含含糊糊说了些什么。海斯一直注视着我们大人。

“会会我们的朋友……对，他在这儿，”卡琳说。

知道弗洛尔和我的来意后，看来她已经放心了。

“弗洛尔，你自己到他那儿去吧，也许他会接见你的……”

卡琳的眼睛流露出温和的幽默神情。弗洛尔微微笑了一笑。我也跟着笑笑，只不过我笑得比较矜持。弗洛尔弯下身子，伸手摸了摸海斯蓬乱的金黄色软发。走出厨房的时候，我朝卡琳点点头，我感觉到她用疑惑的眼光目送我们。我和弗洛尔刚走出屋子，木马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弗洛尔穿过院子，朝那用整齐合适的圆木垒成的木棚走去。我跟在他后面。我们进了木棚，头顶上方低低地横着一根根木梁，各种各样的气味混在一起：一动不动地站在铁丝网里面的鸡的气味，焦油护木剂的气味，新锯开的薄木板的气味，麦秸的气味。木棚被分隔成若干小间。弗洛尔先随手闩上进来的门，然后毫不犹豫地向第二扇门走去。我们来到了一个隔成四方形的小室。木梁上成行地挂着一束束灰扑扑的豌豆和菜豆。地上有一层厚厚的麦秸，至少有半米厚。这里空气闷人，静寂无声，有点什么怪气味，不过并不那么太难闻。

“出来吧，朋友，”弗洛尔用做作的低音说，“你落网了。”

这是种令人厌恶的玩笑，我那些男同志们常爱这么互相闹着玩；危险经常使神经处于紧张状态，因而有时也需要轻松轻松。自从我初参加抵抗小组时，弗兰斯在“西班牙橡树”大庄园捉弄我以后，我就受不了这种“娱乐”（我的同志们就是这样称呼

的)。麦秸忽然刷地一响，从里面伸出一只手，手里握着“瑞明顿”牌大号手枪，照直瞄准了弗洛尔。大概弗洛尔还是吓着了的，我心想：他这是自作自受。可是弗洛尔立刻微微一笑：

“这个破玩意儿未必有子弹吧；最后一次送弹药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看见麦秸迅速地动起来，转眼间从里面钻出了休果的金栗色的脑袋，头发上沾满了麦秸屑。他那蔚蓝色的眼睛，显得异常的蓝而且严厉，他的视线一下子就停在我身上了。我觉得他的脸色突然发白了，不过我看不大清楚，那个可开可放的窗子开得太高了。

“休果！”我说。

休果的蔚蓝眼睛质问地凝视着弗洛尔，弗洛尔正尴尬地用手捂着嘴巴。我等待着，比他更加尴尬。休果恶狠狠地瞥了我一眼，看来他真恨不得叫我马上滚蛋。

“你好哇，”弗洛尔不慌不忙地说。

“你好，”休果回答着，从麦秸里爬了出来。

当休果慢慢抖掉身上的麦秸屑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作声。最后，休果望着我们问道：

“怎么回事？”

弗洛尔咳了一声。“有点新消息，休果……他们把战俘转移到别处去了。”

休果扬起一边眉毛，轻蔑地说：

“这我早在上星期就听说了。”

他把弗洛尔往旁边一推，走出了木棚。弗洛尔让休果走在前面，并且对我做了个跟上的手势。我觉得自己太倒霉了，懊悔我怎么会想到找弗洛尔帮忙。我们来到院子里，我恶狠狠地一

脚把一块小石子踢了开去，真糟糕，小石子不偏不倚，正巧碰到休果脚上。我发现他又穿着运动鞋了。他当即转过身来，气呼呼地问道：

“这又是什么愚蠢的鬼把戏？”

“对不起，是我……”

休果朝我跨了一步。弗洛尔也向前跨出一步。休果站住了。我莫名其妙。好像站在我面前的完全是另一个休果。我急忙奔到他跟前，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在这个勇敢的游击队员面前，我再也不胆怯了。我忽然想要做一个这样的人：绝不逊色于杀死过帕尔德曼斯和其他人民公敌的卓越的人民复仇者。我也是有自尊心的。

“我赶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不能再袖手待在哈勒姆了！”我冲口说道。“我们那里所有的活动都停顿了！这个发脾气，那个找碴儿，另一个幻想着炸飞德国鬼子的火车，反正是什么也没干！我要工作，休果！因此我死缠着弗洛尔，要求了好久，最后他才同意带我到你这里来！……”

这时轮到休果从头到脚打量我了。我突然感到浑身发热，我更加冒火了。

“你这么大声嚷嚷，”他说，“这附近的每一个德国鬼子或是他们的狗腿子都会听得见你……”

在末了一句话上，他咽下了一个对所有的女性都含侮辱性的词儿，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我心想：“连他也是这样！……”我抓住他的袖子摇晃起来。

“你简直是个过于自信的蠢货，”我大动肝火，感觉到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难道只有你一个人会开枪还是怎么的？全国只有你一个人会拿手枪，是不是？那么你好好地听着，蠢东西，

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要乞求你，而是要对你有点贡献！我要给你帮忙，你可以回答我‘行’或者‘不行’。如果行，我就准备执行你所吩咐的一切，要是不行……我就去给自己另外找个领导人。请你注意，我不打算因为你骄傲自大而在你面前卑躬屈膝！我要在平等的原则上，作为你的同志，和你一起战斗！”

我们两个大概是在敌对地互相对望着。我发现休果的脸色在改变：涨红了，发慌了。我忽然听到身后好像有止不住的吃吃的笑声。我回头一看：弗洛尔正在撒满沙子的地上打滚，捧着肚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条腿还直抽动，似乎他对我们的争吵再也听不下去了。我直视着休果。他的嘴唇微微抖动了一下。他大概也想笑，可是我看得出来，我的义正词严的话语已经打动了他的心。而这颗心是很不平常的。这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我了解这颗心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了解休果怎样在和突然涌上心头的种种感情进行斗争。

“汉娜……”他说着。他的严厉、刚强、傲慢顿时全消失了。“你应当承认，你的攻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这是在组里学会的，”我断然回答。

他好像不敢正视我了。而我自己呢，说实在的，不顾一切地发了这一通火以后，真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忍住了——我知道这会把事情全弄糟的。

休果望着一边；我看见他的侧面，看见他刚毅、漂亮的紧闭的嘴巴和晒黑了的高高的前额。见鬼，我心想，他倒还是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男子哩。此刻他正站在面前沉思着……弗洛尔依旧坐在地上：他在爆发狂笑以后一直还没有能平静下来。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卡琳正站在门口注意观察着我们。我没敢回头看。

最后，休果咳嗽了一声，有点不自然地说：

"嗯，你明白吗，汉娜……我决没说过你的枪法不好。这一点我简直想都没想过。"

他的发愁的目光在央求弗洛尔援助，可弗洛尔却把双手交叉在膝盖上，开心地望着我们。

"无论如何，休果，你别拒绝她，让她试试吧，"弗洛尔说话的语气非常严肃，尽管其中可以感觉得到轻微的玩笑意味。休果沉重地叹了口气。接着又看看我。天晓得在这对蔚蓝色的眼睛里表现的是什么：疑惑，懊恼，同情，克制……不过我已经看得出来，回答将是肯定的。

"好吧……"他说。"你说得对……无所作为，这就是死亡。要知道，荷兰是不能等待的。"

"这是不是说，你接收我做你的助手了？"我问道。

他忧郁地点了点头。

"是的，当然是这样……待会儿我们就一同研究我们的计划，等这个该死的白毛奸细（他说着恶狠狠地朝弗洛尔那边点点头）从这里滚开……"

弗洛尔已经站起来了。他们目不转睛地对望着，好像马上要进行搏斗。现在轮到我笑了，高大、魁梧、温厚的弗洛尔，对抗矮小、漂亮、盛怒的休果……这真是喜剧影片的镜头。

"你是说'奸细'吗，啊？"弗洛尔威胁着，同时亮出了两个铁锤般的拳头。

"我说了：'该死的白毛奸细'，"休果挑衅地一字一顿地说着，同时向前跨了一步。

我看得出，他们两个正像我一样，也在以这场喜剧作乐。可是卡琳大概真的以为他们要互相扭打了。她从屋子里奔出来，站

到两个男子汉中间。然后瞧着我，仿佛我是引起这场争执的祸首。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友谊呀！”她大喊了一声，眼睛仍旧瞧着我。“嘿，好汉们！到树林里去吧，在那里，哪怕你们彼此往死里打也行。没出息！”

弗洛尔和休果注视着卡琳。我忍不住扑哧一笑。我用手捂住嘴，从温室和那一棵棵卷心的甘蓝旁边跑过去，躲在高高的粪堆后面，哈哈大笑起来。

等到我最后觉得可以在人前露面的时候，休果和弗洛尔已经作为一对最亲密的朋友，坐在小凉台下的长凳上，在给自己卷纸烟了。屋子里传来小海斯那木马欢乐的嘎吱嘎吱声。至于卡琳对我有些什么想法，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狗死掉了”

弗洛尔骑上车子朝阿尔克马那个方向驰去的时候，天已晚了，这时休果也出来送我；我想取道马凯特回家，在别维尔魏克附近乘船摆渡。休果更加沉默了，他咬着一根干草茎，大概在专注地思索着什么。最后，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车把上。

“你好好听着，汉娜……我想我接受你做伙伴不是冒冒失失决定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可是在这条路上，会遇到一些必须再三考虑的事……老实说，对于你，我了解得太少。你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吧？”

我点点头。他放开我的自行车，叹了口气。

“是啊，”他说。“这就是一个困难。你要知道，我和你想要干的事，德国鬼子认为是真正的恐怖行动。而他们要残酷地对

待所有与恐怖分子有关的一切：房子、亲人、孩子、家庭，——就是说，一旦德国鬼子抓住了我们……"

"什么叫'抓住了我们'？"我不服气地问道。

休果那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我开了个不适当的玩笑。

"我指的是最坏的情况……我的意思，汉娜，你明白还是不明白？"

我点点头，这一次比较驯服了。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应当单独居住，不要和亲人们在一起，是这样吗？"

"对，完全单独，"他确认说。

我知道休果是对的。在我们家里，不仅住着父亲和母亲，尤迪菲也住在那里。我的心顿时一沉：我想象着，德国鬼子将会怎样对待父亲或是母亲，或是无依无靠的尤迪菲，或是他们三个全部。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有人掩护过犹太人，后来发觉了，就一起被送进死亡营。

"我住在哪里好呢，休果？"我问。

休果向菜园主的屋子那个方向转过身去：

"我去跟杨和卡琳商量商量，也许，在他们那儿能给你找块地方……这房子的顶楼上有个小房间空着。"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休果颧骨上的肌肉神经质地抽搐着，我把一只脚踏在自行车的脚镫上。

"我跟你说，汉娜，"休果忽然很快地低声说起来。"明天晚上我在哈勒姆，在斯霍特辛格尔街。那儿有个小烟铺，招牌是'烟桶'，门牌号码我忘了，不过就这样你也能找到……我在那幢房子的楼上。你先按电铃，有人给你开门，你就对他说：'狗死掉了'。"

"狗死掉了，"我低声重复着。

“在那儿我会把我和你要做的事告诉你的，”休果决定了。“今天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塔拜！”

于是他转身回去了。像做梦似的，我骑上自行车向南而去。天快黑了，松林里的小道显得阴森可怖。我力求想些别的事情，可是我头脑里的思绪杂乱无章。当然，风又是迎面吹来的。

到家已经天黑了。吃饭的时候，母亲问我为什么老是不言不语。我规避回答，含含糊糊说了些不明不白的话，母亲也就不作声了。可是后来，当厨房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的时候，我却问道：

“妈妈……要是我走了，你会很伤心吧？”

她故作镇静地瞅了我一眼：

“你要走？怎么回事？”

“我要离开家里……”我解释说。

母亲默默地把胳膊肘支在炉台边上。随后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道：

“你已经卷进去这么深了吗？”

“什么叫‘卷进去’呀？”我反问道。

“卷到抵抗运动里面呀，我的孩子，”母亲回答着，又瞅了我一眼。

我垂下了眼睑，说：

“妈妈，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往后的事，你们最好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能不这样，妈妈。最近……”

她轻轻摸了摸我的脸：

“好吧，既然你必须这样……你父亲会惊慌的。不过他也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有些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你就去干你认为需要干的事吧……别为我们担心！”

虽然我想紧紧拥抱母亲，但我只是温存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便把背朝着她，用心地洗起餐具来……看来，双亲多半早就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比搞身份证、购买证和给病人递送东西更重要。他们可一点也没有对我提起过。这是“头等的”人，正如我们的伙伴们所说的。头等的……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我看不见我在洗着的盘子了。我必须离开这里到同志们那里去……毫无办法。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面前的道路，并且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这条道路的。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收拾自己的房间，清理文件，把其中的一些付之一炬，因为它们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还清理了书籍，把一些衣服放进衣箱。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且竭力不看我，为的是不让我看见他多么伤心；可是我发觉他的嘴唇在颤动——这都是出于痛苦、恐惧和担忧。我们四个人当中，看来唯有尤迪菲什么也没有察觉。我心想，这样更好。

当天晚上，我动身到斯霍特辛格尔街上去寻找“烟桶”小铺子，没怎么费事就找到了。我握着短外衣口袋里的手枪，按了按门铃。上面漆黑的楼梯间的门打开了。我轻轻地说了声：“狗死掉了”。听见了脚步声，有人下楼来到我跟前，拉住我一只手就带我进去了。我来到一个小小的顶楼房间，不用说，一房间都是烟，烟雾浓密得能憋死人。一盏没有罩子的小煤油灯，燃着暗淡的蓝色小火苗。花架上的倒挂金钟凋谢了，花架旁边放着一张黑帆布面的椅子。领我上楼的人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根据手掌判断，那是个女人。我正疑惑地四面张望，休果突然走进了房间。他搂住我的肩膀，关切地让我坐在椅子上。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钥匙，锁上了房门，又回到我身边来。他站在我面前，一只手支在墙上，微微向我俯着身子。我看见他那对长着黑睫毛

的眼睛又带着安详的表情了，他的嘴巴，跟往常一样，紧紧地闭着。

“汉娜，”他开口说话了。“你的决心没有改变吧？”说着他一下子笑了起来——大概我脸上现出了怒容。“好吧，”他继续说道。“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谈。门有人守卫着。整幢房子都是地下军官，他们都有极好的手枪……”他做了个特有的手势。“汉娜！如果你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在费利缅的那个小房间里住下来。”

“尽可能快些，”我说。

“我也这样想，”休果说。“并不是我心急，而是我想好一个小计划了。”

他更低地朝我弯下身子。他的脸是安详的，眼睛看起来几乎是黑的。他对我说了他的“小计划”。

大约一小时以后，当我浑身烟气离开“烟桶”的时候，一个思想突然贯穿了我的心胸：在我以后重返双亲身边以前，今天将是我最后一次在家里过夜了。“我还能不能回来呢？”我心里想着。“也许，这真的就是最后一夜了？”——“要等战争结束以后了，”我内心的声音回答着。现在战争不会持续很久了。于是我的低落情绪和内心斗争转变成了激动：我忽然看见了休果刚才在我面前描绘的前景：“狗一定会死掉，”我低声说着，听见自己的话，我吓了一跳。

射击课

第二天早上，我离开双亲住宅的时候，完全不像我所预料的那么难过。我提起自己的衣箱下了楼，这时候尤迪菲还没有醒，

她现在又住在楼上了。我给自行车轮胎特地打足了气。父亲和母亲装出一副神态，好像我只是出门去做个把星期的客似的。父亲甚至取笑我：我幼年有时候也出门到别人家里去做客，不过多半在当天傍晚就要回家……我们笑着，带着淡淡的悲愁回忆着我儿时的趣事。随后我来到屋前的小庭园里，把我的衣箱绑在自行车书包架上。父亲说，他要去花园里干点活，就没有再露面。母亲在走廊里拥抱了我。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女仆就在厨房里忙着。一切都似乎有点枯燥乏味，这和令人厌倦的二月的日子倒是十分协调的。我们住宅对面的街心花园，经过夜雨之后，显得惨淡凄凉。我看了一眼我们的住宅和那排列着砖瓦房的小街，竭力把这一切深深地铭记在心头。

渡船上有很多德国的车辆，一些灰色的汽车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我发现码头上有法西斯保安警察守卫着。我凭着渡船栏杆，漫不经心地眺望着前方——望着河岸和运河。傍午，我在菜园附近上了岸，看见休果正在一块地里干活。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工作服，后脑勺上扣着顶小得可笑的软帽。休果看见我，便直起身子，迎着我走来，接过我的自行车。

卡琳·费利缅把我领进了顶楼的小房间。这一次她好像待我比较亲热和殷勤了。我明白，休果已经对她讲过我的情况了——天晓得他净胡吹了些什么。小房间的天花板是倾斜着的；洗刷过的地板上发出一股肥皂味。房间里摆着一个放洗脸盆和水罐的架子；红色的床上铺着一条很漂亮的床单。我问卡琳，这床单是不是她自己织的，卡琳点点头，仿佛这不过是世上最平常的东西。

“真比不上您啊，”我怀着敬意对她说。

“您喜欢编织活儿吗？”她问着，一面顺手敏捷地在房间里整

理整理这样，拾掇拾掇那样。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大概不喜欢。有一次，我试着编织过短袜子。结果我总共才织成一只，可倒忙上了三个月。”

我们相对一笑，算是找到了妇女们共同的话题。

过了半小时，我在餐桌上认识了卡琳的丈夫。杨·费利缅是个瘦高个，典型的北荷兰出生的人；他的工作服很合身。小海斯蓬松的金黄色头发是父亲遗传给他的。杨不怎么健谈，这正好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海斯攀在自己那油漆鲜艳的童椅背上，一个劲儿地注视着我。每当我朝他看一眼，他立刻就转过脸去了。

饭后，休果溜掉了，不久就穿着我所熟悉的他那套经常穿着的衣服回来了；他穿着带拉链的短外衣、绒布裤子和运动鞋。显然，这些东西是藏在木棚里麦秸下面的某个地方的。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正坐在屋檐下面的板凳上。

“我们去熟悉熟悉地形吧，汉娜，”他说。“你的手枪带着吗？”

我上楼去取手枪：我已经在屋顶一根木梁后面找到了一个适合藏枪的地方。我下楼的时候，休果已经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跑，耍着些罕见的把戏，活像个真正的杂技演员。

“你大概进行过很久体操锻炼吧？”我走到他身后问他。

因为没提防，他差点没从车上摔下来，不过终于巧妙地保持住了平衡。

“在十岁到二十岁的时候，”他沉着地回答说。“这对我大有好处。”

我们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大约骑了一刻钟光景；休果指点了方向。在满是灌木丛的沙丘间的一条偏僻荒凉的小路上，休

果叫我停车。我不大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吩咐我扶着车子，他却把自己的车子靠在一棵树上。

“来吧，”他说，“汉娜，现在我们来试试，把你也训练成一个杂技演员。你的手枪呢？”

我听见了乌鸦的聒噪和海燕的啾鸣，可见这里离沿海禁区不远了。我一只手扶着自行车，看着休果，他用一把相当大的小刀削下一根接骨木的枝子。

“汉娜，你知道这是什么？”他把树枝插进地里，问道。

“我有点猜到了，”我微笑着回答。“和‘埃捷耳’① 谐韵的……”

“你真机灵……那么这是蒯捷耳。他就是我们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也许，还可以随便叫个什么别的名字。譬如叫普列克尔，就是临时的哈勒姆市长大人。或者，如果你走运的话，就是个叫安东·缪塞尔特的人。也是临时的。”

“一句话，最坏的一帮恶棍，”我说。

“对，”休果说着，神情即刻变得严肃了，“是那些脑门或心窝该挨子弹的人。因为这些人脑子里净是卑鄙的念头，心地恶毒狡诈。你要永远记住这一点，汉娜。这样，就能打中脑门或是心窝。”

“你的教导绝不会落空的，”我仍旧微笑着说，但是也和他一样地严肃。

休果站在小道边插着的树枝近旁。

“喏，开始吧，”他说。“你骑车子过来。你看见的是蒯捷耳，或者是普列克尔，要不就是这帮匪徒当中其他某个人。到距离

① 荷语：霜、薄冰。

他十米的地方，你从右面向后一转。但是在转弯的时候你先要开枪。而且必须命中，你记住这一点。不然我就要开除你。”

“一下子就要命中目标呀？”我担心地问，虽然，老实说，我的担心稍微有点做作。

可是休果仍然像几分钟以前那么严肃。他做了个短促的命令手势。

“汉娜，过来。开始练习。你骑上车子，拐弯并且开枪。你的手枪在哪儿？把枪给我，我来给它装上空包弹。它们只会啪啪响。”

我从他手上接过装了空包弹的手枪，插进短外衣口袋，骑上自行车向前走，然后折回来。等到我接近树枝，休果喊了一声：“开枪！”我从小道上一拐弯，谁知在这当口我的车子打了一下滑，不过我还是开了枪。我扔开自行车，车子倒了，我跑到休果跟前。他摇摇头。

“弹着点过头了，”他说。“你至少过了两米。”

“我打了一下滑，”我说。

“不应该打滑，”他反驳道。

我重新扶起车子，注视着休果。

“你总是这样不讲情面的吗？”

“不讲情面，像石头一样，”休果回答说。他的目光真的是恶狠狠的。我骑上车子向前去了。然后折回来。我从小道上一拐。瞄准了树枝。休果摇摇头。我又蹬车往前走。折回来。开枪。可是我又打了一下滑。休果第二次给我的手枪装上子弹。我再次骑上自行车。从小道上一拐，开枪。

“准确命中！”休果说。“这就是说，普列克尔完蛋了。虽然应该说，在这种场合下，他在一刻钟以前已经穿过马路，你打的

是另一个你毫不相识的人，命中了他的脑袋，直达脑髓。总之，值得称赞！”

这时候我们头一次笑了。胳膊和手掌的肌肉都练疼了。可是这些练习把我吸引住了，我好不容易才强迫自己停下来。原来休果极有耐心。我射击了三十次，命中三次。

“作为新生，还算不错，”休果说。

“新生”这个词使我感到委屈。我碰了碰他的肩膀。

“那么你来显显你的身手吧，”我挑战地提议。

他用微微眯着的眼睛看看我，一只手摸摸短短的鬈发，说：

“来就来……把手枪给我。”

他把我的手枪放进自己短外衣侧面的口袋，骑上自行车，向前去了。然后慢慢地一调头，转回来，他调头的时候非常漂亮地保持着平衡。他柔软灵活得像块橡皮。他那双紧脚的尖头运动鞋踏在脚镫上，看上去就像女人穿的小鞋。看他表演简直是一种享受。在他从小道上拐弯和开枪以前，我已经知道他会准确命中目标的。结果正是这样。他把手枪还给了我，而我却叹了口气，摇摇头，说：

“休果，你真了不起。”

他毫不难为情地接受了我的称赞。

“干我们这一行，不这样是不行的……”他答道。

第二天早上，天下着愁人的蒙蒙细雨。我下楼来的时候，休果正苦着脸站在窗口，他转身问我：

“喂，汉娜，你说……这种天气我们要继续练习吗？”

我朝门外看了一眼：灌木丛、屋檐、田地和温室都被雨淋得闪闪发亮，雨水直往下淌。

“在困难的环境中操练，向来认为对士兵非常有益，”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你不打算待在家里——我跟着你。”

休果带着点儿敬意看看我。

“可要是你又打滑了摔在烂泥里怎么办呢？”

“翻身爬起来呗，”我回答。

我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这一次不是往滨海地区那个方向去的，而是到卡斯特里库姆和埃特海斯特之间的地带，到一条位于一些粗大的、腐烂的柳树桩之间的一条村道上。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而过了两个来小时以后，等我们回到家里，身上简直可以挤出水来了。卡琳的厨房成了真正的天堂，炉子生着火，橡树劈柴烧得哔哔剥剥响。我们的衣服上冒出了蒸汽，而喝下一杯用接骨木煎的热汤之后，身上热起来了。可是更使我感到热烘烘的，还是休果在饭后回到他木棚里去的时候对我的称赞：

“你学会射击真是快极了。”

第三天和第四天，又都是晴燥天气。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各处练习骑车射击。我已经能够像猫一样稳稳地坐在车垫上，不顾肌肉疼痛和身体疲劳不停地骑呀，骑呀。我一直在想，我和我的自行车已经合成一个整体了。在休果的照料下，经过四天的骑车和射击训练，我明白，还有不少更高级的技巧，我还需要学习再学习……

沙丘间洼地里的傍晚是静悄悄的，天也黑得早，我感到非常寂寞。我说过，我也许得回家一趟，取些书来。卡琳总是在缝补或者编织东西；这种事情是吸引不了我的。休果和杨则坐着下跳棋。到了规定的时间，我们便收听英国的广播。晚上还不到十点钟，大家都上床了，所以睡眠的时间倒是绰绰有余的。因而

我想得很多。我想到我生活中发生的转折。想到我走上了一条由我完全自觉地选定的新的道路，并且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达到我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我已经和我亲近的人们——双亲以及哈勒姆的同志们——断绝了往来。可是弗洛尔是赞同我这样做的——要知道他是党员，是党的一部分。我知道，今后我再也不会没有征得党的同意去做任何事情，虽然我有时候也会忘记党的秘密的、无声的存在。然而我的党反正是存在的，党屹立在岗位上。党存在于我们这些深受占领之苦的人们所生活的国土上。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的领导者们，常骑着自行车往来于海尔德兰和乌得勒支的林间小路上，和各个秘密营地保持着联系，派遣自己的使者从一个大城市到另一个大城市。党的地下领导一有可能就常在一些最难以想象的地方聚会：在费赫特河桥边的岗棚里，在老埃谢尔附近的一位农业工人的小屋子里，在奥斯特别克的别墅里……领导的周围都是忠诚可靠的人，我们往往忘了领导的存在，忘了领导正注视着我们，忘了领导正在远处给我们指示着道路，鼓舞着我们，唤起我们的警觉、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勇气……

我也是党的一部分，就像党是荷兰的一部分一样。在荷兰，每一个正直的人都憎恨德国强盗；在这里，有人给地下报纸写文章，有人把它们印出来，另一些人再把它们散发出去；在这里，一些无名诗人写出的诗篇在人们中间传诵，给人们带来希望，使人们对敌人更加仇恨。人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斗争。成千上万的居民把爱国志士掩护在自己家里，有时甚至不止掩护一个。人们给地下工作者提供经费，供给他们食品购买券和伪造的证件。抵抗运动的战士几乎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户人家，并且在那里得到帮助。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活组织的经纬线，这

个活组织的名字就是祖国。这一点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得到。我仔细听着英国机群的空袭，空袭的范围与威力好像每星期都在扩大和加强；这些机群时而出现在这里，时而又出现在那里，甚至在晴朗的白昼也出现，似乎在嘲笑结结巴巴的德寇高射炮……现在真是万众一心，戮力打击，力争消灭人类的敌人。苏联红军正在进攻，把法西斯匪帮赶出克里米亚；广播里报道着敖德萨附近游击队的英雄业绩——显然，到春天，法西斯匪帮也将被迫放弃敖德萨……在这些寂静的夜晚，我清晰地给自己描绘着这一切，仿佛我面前就悬挂着一幅展开的欧洲地图；这幅地图上的一切都活起来了：一个个城市在燃烧，在冒烟，成战斗队形的军队正昂首阔步行进，俄国游击队——我的同志们的炮群齐声轰鸣，清除着俄国土地上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法西斯匪徒，清除着乌克兰辽阔的黑土原野上的侵略者。贼寇们指望，这些土地将由荷兰卖国贼轻易加以开发利用，这些卖国贼建立了"东方公司"，并因此自命为"东方农民"。现在他们不得不赶紧卷铺盖了。这个有名无实的"东方公司"原是要实现一帮冒险家和财迷们的理想的。晚了，太晚了，我想。世界将要在我们的反法西斯洪炉中加以改造和提炼。而我自己，当年的法学系大学生汉娜·斯，一个荷兰姑娘，不管我是多么渺小和无足轻重，也应当去肃清自己周围的一小块土地上的敌人——只要我的手枪火力所能达到。消灭掉这些人类的渣滓，他们根本没有权利生存。理解这些最普通的人类思想的真理，我既用不着去翻查士丁尼法典①，也用不着拿破仑法典。我有自己的法律观念，并且有手枪。

---

① 公元六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编纂的罗马法典。

第一枪

我迁居以后恰满一个星期，早晨，我和休果骑自行车到艾梅登[①]去。这天仍旧没下雨，新鲜空气刺得脸上微微发痛，水塘里结着一层灰白的冰；夜来的微寒给沙丘覆上了一层霜。就在这个时候，从路边以及我们所经过的一些寂静的旧花园里的野草的气味中，已经感觉得到令人精神焕发的春天气息，我们心里的希望和信心增加了。休果异常沉默，不愿开口。显然，头一天，星期日，他已经去作过侦察。他的眼睛旁边新添了皱纹，他紧闭着嘴，一言也不发，看得出来，他心里正在筹划着既定的行动。不过我自己也并没感到有多说话的必要。我是沉着的，也许甚至过于沉着了。我正在想我们预定要收拾掉的头一个人——海尔特·蒯捷耳。休果告诉我，这是个二流子，是个毫无用处的人；他出了学校以后，一贯游手好闲，靠父母供养，长到三十三岁，他一下子穿上了拉帕德党的褐色制服。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这套制服，因为纳粹匪徒和法西斯保安警察的黑衫能使他获得更多的利益……真是个狗彘不如的小流氓！出了这个家伙，搭乘艾梅登和哈勒姆之间的火车一年到头都有危险。他老是混在这些列车上打转，特别是在拥挤的车厢里，但是他不穿军服，而是戴着鸭舌帽，穿件普通上衣，活像一个穷光蛋。休果对我讲过这个家伙的伎俩。他与人们闲谈，明白吗？他发表反对德国鬼子、反对刑罚、反对配给制、反对整个万恶制度的言论。结果每次至少总有两三个人要上当；总是有些缺少心眼的人对他随声附和，轻信他，把这个下流坯当做志同道合的人……等到列车在哈勒姆一

① 荷兰西部城市；是首都阿姆斯特丹在北海上的外港。

停，蒯捷耳马上就把“造反者”指点给值班的法西斯警察……他用这种方法不知把多少人送进了盖世太保的虎口。

我们将在艾梅登-奥斯特市寻找这个坏蛋，休果已经查明，他住在这里，并在一个裁缝的寡妇家搭伙。这里早上人不多。晴空万里，柔和而明亮的阳光照耀着街道两旁一幢幢红砖房屋，屋前都有剪得非常齐整的草地和细心修剪过的小树，使得一切更具荷兰特有的整洁甚至宁静的风貌。一家小面包铺门前站着几个妇女。我们骑车从旁边经过，听不清楚她们在说什么，可是根据她们脸上的表情和语调，我们知道这绝非心平气和的闲谈。学校里传出拖长的读书声——这是孩子们在齐声朗读。玻璃窗幻映着阳光的虹彩。

蒯捷耳住的这条街，跟头一条一模一样；我们穿过一座装饰着浅浮雕的高大拱门，就到了这条街上；这条街道很像个广场，因为中间有一片椭圆形的花圃。

休果在拱门旁下了自行车，背朝着这条街，给自己卷起纸烟来。

“如果你从我左肩上看过去，你会看见一幢房子，”他说。“要是你的眼力好，也许连门牌号码也看得清的……四十五。是个不带‘零头’的数目①……”

“什么？”我问道，同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个门牌号码，可到底也没有看清楚。

“带‘零头’的数目……是好运气，”休果轻轻地但是恶狠狠地回答说。“汉娜，我们必须努力设法使这个号码在今天——就是今天——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说到这里休果不作声了，仿佛就这样他也已经说得太多了。

① 欧洲人习惯以逢五、逢十为整数，民间有许多利用整数、奇数占卜的习俗。

我们骑上自行车，休果用右手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好像一对情人，双双从一排排房子面前驶过。现在我看清楚那幢房屋的门牌号码了。这幢临街的房屋，跟艾梅登-奥斯特这座城市及其居民，跟整个独具风格的荷兰很协调；唯独跟住在这屋子里的卖国贼，把自己的同胞——比他好的人们出卖给盖世太保的卖国贼不协调。街尾也有那么一座拱门，和街头的一样，我们穿过了这座拱门。

休果说：

“时间快到十二点了。他上午睡大觉，要到傍午宿醉醒后才爬出自己的巢穴。出来买买烟，或是买买面包，或是买别的东西。当然，他的购物券是足够的。你站在这座拱门旁边，我站到那座旁边，我们两个开始监视这所屋子。如果人在你这头出现，那就由你干掉他。要是在那一头，就归我下手。”

“休果，”我说。“我还不知道他什么模样呢。”

休果把烟头扔进了排水沟。

“他比我稍微高一点。他的脑袋格外小。他穿着法西斯军装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全身都套在大皮靴里。要是他穿便服，那就像柱子顶上的一粒豌豆。你不会把他和任何人搞混的。”

我目送着休果；他到街道那一头去，得绕上一个大圈子。我就留在拱门附近。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注意，我走到一家布店面前，布店的橱窗上清晰地反映出整座拱门。透过这个透明的影像，我看见橱窗里有一些原先大概是装手帕用的寒酸的硬纸盒，有一顶想必是用来给橱窗增添华美风貌的已经泛黄的花边童帽，还有若干像地板抹布似的毛巾，每一条上都别着写有“十五分”的标签。有谁要买这些毛巾呢，我无法想象。这些毛巾肯定是粗纱织成的……我又一次凝神看了看拱门的影像。附近响起

了钟声。十二点了……随着钟声，同时响起了一些工厂的汽笛声，学校也都放学了。几秒钟间，四周空中都充满了孩子们骚动的和狂热的叫喊声。然而这没有延续多久。缺乏为真正的、长时间的欢乐和嬉戏所必需的热量和维生素啊。等到孩子们出现在我所在的街上时，他们都已经是老老实实的了。他们三三两两地通过拱门。我装出在观察他们的样子，暗中又朝四十五号房屋那边瞥了一眼，确信那里仍然没有动静。

后来我骑上自行车兜了一个小圈子，注意观察有没有出现"柱子顶上的豌豆"。大概这家伙尚宿醉未醒，或许星期一要睡上一整天，坏蛋要到傍晚才会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待在这些僻静的地方太久，就会引起人们注意。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好这一点。正当我在一条小横街上行驶，想看看拱门近旁有没有新的情况，这时候在通向卡捷姆勃罗特斯特拉特车站的路上出现了几个人。他们不一会儿便朝不同的方向走开了，只有一个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他提着一只小皮箱，胳膊上搭着件雨衣。这个人的脑袋是我所见过的最小的脑袋了；从远处看去，他的脑袋好像全埋在帽子里了。

我赶紧隐蔽起来，不让他看见。我蹬车到了拱门，放好车子，望望休果在不在。街道那一头没见有休果；他大概也是暂时躲开一会儿。有些放学回家的孩子在街上玩耍。他们用一只脚跳着，在玩跳房子，或者是在天真地聊天，交谈他们的感想。我等待着，这时一个拿小皮箱和雨衣的人来到这条街上。我必须在他走近拱门以前，准确断定，他是否确实是海尔特·蒯捷耳。坏蛋蒯捷耳，我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过他。我差不多已经确信，走过来的正是他：这是在抵抗小组工作期间大大敏锐了的侦察员的特殊本能暗示我的。我和休果搞错了，我们原以为蒯捷

耳狂饮以后星期一会蹲在家里的。而现在他从车站走来。这就是说，他出门到什么地方去过了，大概又是到哈勒姆去的。他又搭过那挤得满满的列车，待在车厢里，那里站着数以十计的人，他们正准备一有机会便要发泄自己对德国鬼子的憎恨。在我和休果骑自行车来艾梅登这段时间里，这个坏蛋又可能犯下了多少罪行啊？一想到这一点，真叫我无法忍受。我断定"柱子顶上的豌豆"确已转过拐角，正朝我这边走过来，我便在自行车旁边跪下来。我解开鞋带，然后一面从膝盖和胳膊肘之间的空隙中留神观察着，一面极慢地系起鞋带来。我看见小脑袋的人穿过了马路。现在他已经走到拱门跟前了。他那张隐藏在帽檐下的面孔满是皱纹，好像在厨房里的搁板上放了一两天的切开的柠檬。他的脸皮暗黑，从鼻翼到嘴角有两道很深的皱纹，仿佛谁用炭画下的线，活像给凶犯烙上的记号。我站起来，扶着自行车。孩子们仍然在街上玩耍，但是他们并不注意我。现在我骑在车上迎着蒯捷耳驶去，有几个带手提包的妇女（她们大概是从面包房回来的）也匆匆忙忙朝那边走去。我骑得慢了些，到坏蛋紧跟前时，我朝边上猛一拐，好像因意外的相遇而感到惊讶似的，客气地说：

"啊——，是蒯捷耳先生！……"

他似乎想要回答，但是没有作声；他非常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也养成了一种敏锐的嗅觉，并显然已经意识到祸事临头。此刻我看清楚了他的眼睛。这双眼睛藏在帽檐的阴影下，正在贼溜溜地乱转。他突然仓皇地把手提箱和雨衣换到另一只手上。好一个大笨蛋！我暗自冷笑：蠢透了的笨蛋——他的右手拿上家伙了。我迅速掉转车头，从他身边驶过。然而就在转身的时候，我掏出手枪（我和休果早已给手枪装上了子

弹)，开了一枪，按照休果的建议，是对准坏蛋的脑袋打的。子弹正好命中脑袋，蒯捷耳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好像他想忍住哼叫。这声音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不过手提箱摔在马路上的低沉的声音可能在稍远处也听得见。我没有停留，也没有下车，藏好了手枪。我几乎是轻盈优美地（我这样感觉）在干燥的不平整的石子路面上打了个急转弯。我向那有拱门的街上瞥了一眼。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发觉。我更用劲地踏着脚镫，飞快地拐过了街角。我最后看见的是几个手上拿着面包的女人。她们站住了，正目瞪口呆地瞧着那躺在地上像个揉皱了的纸袋的人。

我来到第二座拱门，看见休果也骑上车子走了，他在我前面。我沿着旁边一条平行的道路驰去。在一座不大的旱桥前面，靠近一块光秃秃的花圃，我看见一群工人。这是换班的冶炼工人。真是再好没有了。我蹬着车子径直朝人群中间驶去，一个面孔晒得黑黑的年轻工人对我快乐而冒失地喊了声什么，我对他伸伸舌头作为回答。我回头看了一眼，心想，这一小群穿着短外衣和大衣而里面露出工作服的人，会踩掉我的车辙的。我发现休果正从一条小横道上驰来，我又高兴起来了。转瞬间他便来到旁边，朝我挥了挥手，意思是说：别停车。过了一会儿，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了。

“你都看见了吧？”我开始和他交谈起来。

“嗯，”他回答。“从拱门外看见的；我去兜了个小圈子，刚刚回到那里。你的转弯动作做得真漂亮，汉娜。是一枪就打死的吧？”

“打在脑袋上，”我说。

他满意地微微一笑，没说什么。他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的紧张程度比我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休果却表现出非凡的能

使人感到温暖的平静。他的神经看来是铁铸的，他镇定自若、头也不回地踏着车子。只是到了运河对面，他才开始有点着忙。可是就在这种时候他也丝毫不露声色——不论是说句话，还是朝从我们旁边经过的德国鬼子那面戒备地看上一眼。我从来不曾遇见过一个这么沉着、这么自信和这么临危不惧的人。当然罗，我想，要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啊。

艾梅登的爆炸

日子过得很慢。开始还有薄冰，很快就融化了，最后又下了一次小雪——杨·费利缅说是"极地的雪"。可以设想，他到过极地。不久又出现了几乎是风和日丽的春暖天气，因而，这周围的万物，我都感到如此亲切和富有家乡味，似乎我已在这里居住了多年。

有一次我到家里去了一趟——说得准确些，是到我双亲的家里。我最多只待了五分钟。我从书橱里取了几本高尔基和海涅的作品。里尔凯的作品仍放在架上，我没拿；如今我比以往更加渴望听见勇敢者的心声。同时我还带上了那本我从前在指挥所里拿到的，而指挥所又是从一位哈勒姆同志那里得到的书：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①。我反复阅读高尔基写的《母亲》和《密探》。《密探》描写了一个丧尽一切道德基础，心中没有祖国的人。我觉得这是一本特别富有教育意义的书。我曾经看到过，这本书的俄文本书名为《没用人的一生》。这个书名更合

① 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共产党员作家。《震撼世界的十天》是第一部向全世界介绍十月革命真实情况的著作。

适。高尔基借助这个貌似人类的"伤寒虱子"，揭露了这一类人所特有的彻底的道德堕落。按照休果的意见，坏蛋蒯捷耳就属于这一类；那些最坏最坏的卖国贼和间谍正是从这种人当中收罗来的。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海涅的诗篇，这些诗篇，柔和得像天鹅绒，锐利得像匕首。诗人在一百年前就说明，正直的人应当捍卫怎样的信念。约翰·里德，这位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的目击者，给我讲述了他当年所见的十月革命这一伟大的变革。去年我曾第一次和同志们以及全世界千百万人共同庆祝过它的二十六周年纪念日。我明白，俄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些转变已经在实现了。然而，我，我们大家已经经历过的日子也将震撼世界。在荷兰，有些人认为，等到恢复了以前的时代，一切又都会很好的。这使我联想到了一八一三年的情况。在历史课程中，我十分熟悉范·霍根朵尔卜① 的宣言，当时我觉得它非常愚蠢。有一天晚上，在同费利缅夫妇和休果闲谈时，我讲给他们听，在拿破仑占领我国几年以后，当局曾颁布一个公告……"一些最著名的人士参加了政府……正在为人民安排筵宴……"

休果和杨·费利缅讥讽地笑起来，卡琳耸耸肩膀；作为讲求实际的女人，她立刻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好像从那时候以来有什么改变似的！"

休果作了个否定的手势，而杨·费利缅撇起了他的薄嘴唇：

"你们不用怀疑！等到人民喝光了这乌七八糟的烂稀粥，赤手空拳从火里取出栗子以后，要人们又该来发号施令了。不过这一次，是不会让老爷们再用人民的筵宴来敷衍了事。"

二月的下半月几乎全是晴天。休果有时候不作任何说明，一

① 范·霍根朵尔卜(1762—1834)，荷兰国务活动家，一八一三年曾呼吁由奥兰治王朝统一荷兰。

出去就是一整天；只要在家里，他便帮杨·费利缅收拾龙须菜地。我看见他们运来暗黑色的肥沃的腐植土，在菜园一头铺了厚厚的一大片。那片土地上同时栽种着三种不同品种的龙须菜。两个男人在餐桌上谈起这些东西的时候，那神情就好像在相互托付我们女人难以理解的秘密。休果又戴上了他那顶可笑的小软帽，穿着黄色的木底鞋。他使我惊讶同时也使我钦佩：他这样善于从一桩事情转到另一桩事情上去。我自己也帮助卡琳做做家务，可是她不愿意让我去洗洗涮涮。我跟海斯相互熟悉了。我和孩子之间产生友谊，得力于我那漂亮的香粉盒子。每当他看见我从手提包里取出香粉盒子，便举起他那双胖乎乎的小手嚷着：

"海斯也要抹个白鼻子！……"

有一次，我曾试着给他讲故事，可是讲着讲着，他却摇开木马了。他对于地精和林中仙女这些虚幻之物完全不感兴趣。

我为之而到休果这里来的事业并未完全停顿。有时候我们也和弗洛尔见面，例如我们得到哈勒姆的消息，又需要往查安运莱豆，还有一次，弗洛尔亲自来找我们帮忙：必须把一包三硝基甲苯[1]调拨到北荷兰省去，偏偏正好要经过赫尔曼·戈林师团横行的地区。然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消灭犯罪分子——休果已经把他们登记在他那"已判决的"卖国贼名单或者休果自己称之为"脏衬衣清单"上。他的举止令人惊叹。每一次行动他都沉着无畏，充满信心，在惩奸活动中不心慈手软，这一切不仅仅使我钦佩，而且还促使我去仿效。我大概是个不坏的学生。追踪和消灭告密者与叛徒们，总使我联想起是在追逐一些成了精的老鼠。突击得手之后回到家里，每次我都觉得，接触过法西斯败

① 一种烈性炸药。

类，把我身上都弄肮脏了。因此我每一次总是找卡琳要一锅热水，到楼上我那个小房间里，从头到脚洗个干净。

我和卡琳之间，开始形成了和谐的、真诚亲近的关系。卡琳不是好奇多问的人。但是我发觉她很想多知道些我的情况。她总认为我有些方面使她很难理解。一个在大学里上学，研究各种高深学问，阅读外文书籍的年纪轻轻的姑娘，却宁愿放弃这一切而参加抵抗运动，和一个当过冶炼工的普通工人并肩战斗……我感觉到，就是这一点，引起了卡琳对我的好感，同时也引起了她的诧异。有一天早上，我们两个正在厨房里忙着，她红着脸忍不住问我：

"也许，"她开口说，"你会认为我问的是句蠢话，你拿枪打死过几个人，是真的吗？"

我微微一笑。

"不，不是人，卡琳……是卖国贼。他们不过外表像人罢了。"

"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她反驳着，似乎要摆脱我的坚定自信的影响。"依我看，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死去，是很可怕的，哪怕他是个坏蛋。你白天黑夜是不是也想到这一点？"

我用手指搓揉着自己的红色鬈发，回答说：

"我白天黑夜是在想……但无论如何不会想这些渣滓。我想的是，我们的国家必须重新成为自由的国家……我们必须打败德国鬼子和他们在我们国内的走狗，我们必须对他们作出判决……我不过是尽自己的力量，在减轻我们将来军事法庭的工作而已，卡琳。每当我看见一个这样的坏蛋倒下去，我就感到称心如意，心满意足。因为这样，我就解救了许许多多正直的爱国志士，使他们免遭逮捕或流放德国。"

卡琳把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慢慢点点头。

“嗯，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这需要勇气，这样的勇气……”

“……女人是没有的，你是想这样说吧？”

她有点羞怯地看看我，赶紧说：

“我觉得，就是男人，这也不是容易的，而对于一个姑娘来说，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你把我们女性估计得太低了，卡琳，”我说。“只要她们愿意，妇女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还在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上前进，我自己就不怀疑这一点。”

她怀着尊敬与惊异交集的感情看了我一眼。她丈夫的到来，结束了我们的谈话，这使我很高兴；因为卡琳好像正要把我称赞一番，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哩。

我们开始注意到，德国鬼子越来越焦躁不安了。没什么可奇怪的，杨·费利缅说，要知道，俄国人正带着要命的“卡秋莎”在追赶他们。然而问题还不仅仅是“卡秋莎”。德国间谍们探听到，同盟国大概正在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德国鬼子三番五次地驱逐我们沿海地带的居民，他们用“疏散”这个含糊词儿来掩饰。这些居民的房屋，或者被德国国防军的人员占据，或者干脆夷为平地。这个春季疏散人口和劫掠都达到了可怕的规模。三月中旬，我们头一次听到德寇要炸毁半个艾梅登的残酷计划……休果是艾梅登出生的人，他紧闭着嘴唇，老是在杨的院子里和菜地的畦垄间走来走去。

“这里面有鬼，”他说，“准是在搞什么名堂……德国鬼子要干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艾梅登？因为那里是合用的港口吗？这是鬼话，说英国人想在这个地方登陆，就连小海斯也不会

相信的……唯一的可能，是占领者想狠狠地吓唬我们一下。这是恐吓！就是这么回事。毫无理性的破坏。因为他们的‘东方公司’破产了。因为俄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打得德寇胆战心惊，我们这里的占领者也因此受到了震惊。”

第二天早上，休果不见了。卡琳和杨不爱多说话，我也不是个饶舌的人。傍晚，休果回来了，我们都竭力不去想艾梅登。但是，吃过饭以后，当天空惨淡的金黄色晚霞消失的时候，休果要我跟他出去走走……这是惯常的先兆，他需要和我单独谈谈了。

“这是确实的，汉娜，”当我们出来走上了一条附近的小道时，他开口说。“成百的艾梅登居民已经被驱逐到弗里斯兰①和格罗宁根②……警察局里——我有几个老相识在里面（说到这里，休果嘲弄地笑了笑）——有人告诉我，德国鬼子预料英国人有可能登陆。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艾梅登整个濒海地带……都要完蛋。见鬼，我到现在也不相信英国人会登陆。纯粹是纳粹匪徒又在耍无赖！”

休果紧握拳头，和我并肩走着。

“英国人为什么不采取一点行动呢？俄国人坚持要盟国开辟第二战场，已经好几个月了，可是盟国不愿意。尽在南意大利磨蹭。生怕损失了一个人。而俄国人却在洒着鲜血……我们也在流血。所有被占领地区都在流血……我的天哪，汉娜，这一切为什么拖延得这么久啊？”

他稍稍在我前面一点走着，不时用拳头压压太阳穴。我从来还没见过他这样激动，他从来不曾如此公开显露过自己的感

① 省名，位于荷兰西北部。
② 省名，位于荷兰北部；与弗里斯兰省毗邻。

情。我没有作声，内心感到很不安，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通常有人当着我的面猛烈倾吐自己的感情时，我总是这样。我喃喃地说：

“我想，是你错怪了英国人……他们是出于谨慎，当然，这样……”

“他们自以为在自己的孤岛上完全保险！”休果冲口说道。现在他双手深深地插在裤子口袋里，沿着小道在我前面走着。“他们最初的困难日子早已过去了……谨慎！天哪！难道别人也能让自己这么谨慎！”

“红军司令部里大概也在考虑局势吧，”我说。

“对，”休果忧郁地说。“他们自己也有成千的被破坏的城市……他们不知道艾梅登在哪里……可是我们是知道的。我这里感觉得到——就是这里！”

他说着用手掌拍拍自己的胸口。我没有作声。我们想的未必两样。然而我觉得，我是不会表现出自己的暴怒和愤慨的。不过，他能够在我面前发泄自己的感情，对他也许会好一些。

我们一同回家。休果和我并排走着，挽住我的手臂，一句话也没说。我更加不好意思，这下真的感到自己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休果抓住我，像个寻找支持和慰藉的人。我尽力集聚起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哪怕传递一小部分给他也好。他也的确平静下来了，因此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功劳。直到家门口了，他才放开我的胳膊。他的脸色是沉思和忧郁的，像个孩子一样。我突然非常想温存地摸摸休果的头发。我觉得，我所有的动作，都变得笨拙、生硬了。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好独自待一会儿。

三月底，我们听见了爆炸声。这是从艾梅登和大海那个方

向传来的。德国鬼子果真在残忍地炸毁城里的房屋和港口的建筑了。这些混蛋搞的爆炸，整天把空气震得直发颤。休果躲在自己的木棚里，钻在麦秸堆里。杨·费利缅在菜园里干活；我看见他间或伸直身子，忧虑地倾听着爆炸声。卡琳的脸色异常苍白。

“人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啊！”她说。

我严厉得出乎自己意料地回答她说：

“我本来就对你说过，卡琳，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只是外表上，而且只有远远地看上去，才像人……”

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海斯一个人，听着远处的这些爆炸声，好像不觉得可怕。他在院子里起劲地玩着些木板子，用小铲子挖着土，十分得意。吃过饭以后，我把他安置在小床上；一到这时候，就不得不给他的小鼻子上扑点粉。我看着他入睡；他刚刚还坐着大声地说个没完，忽然间，一眨眼就已经睡着了。幸福的孩子啊，我想。最可恼的是，我们国家里还有一些人，当一座座城市正在变成一片片废墟的时候，他们宁愿和海斯一样，闭上眼睛睡大觉。可是这些人又无法用自己是儿童，是少年来为自己辩护。

当休果重新回到屋子里的时候，我默默地注意观察着他。不过，他没让我注视多久：他不见了，一连几天不知去向。我明白，他是该承担一点责任，所以他独自去执行自己所承担的事情。他没有叫我同去，对此我甚至不能表露出不满情绪来。

流行性腮腺炎

休果回来的时候，他又完全控制住自己了，总之，他的态度

要比在艾梅登遭到破坏的那些日子自然些了。我思想上已经作好准备，想着很快就要跟他去进行新的突击。眼看敌人连一秒钟也不放过，而我们在这种时候却让日子白白地过去，我心里实在忍不住了。

不料小海斯突然病倒了。他的体温增高，什么也不想吃。第二天，他的面颊、脖子和腮腺肿胀得很厉害。流行性腮腺炎……孩子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他的脸一下子肿得很大，几乎连眼睛、鼻子和嘴巴都看不出来了；他吞咽困难，睡眠不安，常常叫喊着惊醒过来，而后又沉沉睡去。我们都在为他忙着，不断去看看他，在房门口朝他打个手势。可他只是用那无神的眼睛冷漠地望望我们，一声也不响。

杨·费利缅到卡斯特里库姆请大夫，大夫很快就来了，给了些药，因此海斯的病情减轻了些。医生在屋里的时候，我和休果都谨慎地回避了。但是就在当天以及随后的几天里，我曾多次轻率地走进小家伙躺着的房间，随身带着香粉盒子，给他的小鼻子搽上带玫瑰香味的粉。海斯无力地笑了。

在孩子生病的第三天，我们在餐桌上谈起了我们当中谁曾经得过流行性腮腺炎。原来我是唯一没有得过这种病的。杨·费利缅和休果马上就说开笑话了：

"那你当心着点。弄不好你的脸也会和海斯一个样的！"

"我不知道腮腺炎会传染，"我说。

"那还用说，"大伙儿都惊奇地叫道。

卡琳说：

"我以为你早已经结束所有这些童年的麻烦了呢。"

我们又就流行性腮腺炎这个话题说笑了好一阵；我们谁也没有真正想到我会传染上。然而，到傍晚，我已经出现了初期的

症状。我感到吞咽和咀嚼困难。耳朵旁边肿起来了。我经历了一个讨厌的夜晚，高热烧得我直发抖。第二天，病痛完全发作了。我躺在床上，头沉重得像个罐子。

"天哪！"卡琳早晨走进我房间的时候惊叫了一声。"瞧你成了什么模样啦！"

我受窘了，尽我当时所有的气力发了脾气。我骂人了，这使得卡琳大吃一惊，甚至使她难堪了。

她尽管同情我，可到底也没能忍住笑。

"杨，休果！"她喊道。"来呀，你们来瞧瞧汉娜吧！……"

我又骂了一句，一下把头蒙在被子里。

"你怎么啦，卡琳，真的发疯啦？"我生气了。"在这该死的腮腺炎没好以前，我不让他们看见我！"

"你们下去吧！"卡琳对显然已经走上楼梯的两个男人大声说。"她不愿意！……"

我感到害臊，我发了脾气，由于这一不合时宜的意外变故妨碍我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气得要发狂了。我的情况大体上和海斯一样：昏睡，有时候在睡梦里喊叫起来，只不过谁都没看见也没听见，我一直发着高烧，因而我觉得自己很可怜，仿佛我受了深深的委屈。可是在这段时间，海斯复元得相当快，仅仅一星期，他就已经在炉子烧得暖烘烘的厨房里，骑在自己的木马上使劲摇晃了，汉娜·斯却依然躺在楼上。我恢复健康要慢得多，因为不能请医生来给我看病。

卡琳服侍着我，像姐妹，像母亲，因而我也尽力不暴露自己的盛怒和恼恨。有时我勉强起床照照镜子。肿胀开始渐渐消退了。不过我觉得自己完全给整垮了，我的眼睛下边出现了青痕，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好像受过十来次在船底下来回拖的酷刑似

的……休果每天晚上上楼来。在他答应不看我的条件下，我让他站在房门口，听他给我讲述新闻。最重大的消息总是来自东方。俄国人在四月中旬又收复了克里米亚。敖德萨已经在他们的包围之中，很快就要攻克了。莫斯科礼炮齐鸣。而在西方，只听到英国机群的轰鸣。我听到这些消息，觉得我们好像正被一把巨大的铁钳紧紧地钳着。在这钳子中，我们多少还可以活动活动，我们在战斗，并给敌人以打击，然而钳子还是钳子。我知道，我的沮丧情绪，是因为害病和身体衰弱，所以我尽量不告诉休果。我已在康复中，只是还十分虚弱无力。有一天休果来了，他双手捧着一个咖啡色纸包，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竟忘记了不该让休果看见我肿胀的脸。他走到床前，从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了，他很兴奋，是有事来的。赶他出去已经太晚了，我脸上直发烧，赶紧深深地钻进被窝。

“我没准许你进来……”我害臊地低声说着。

他拘谨地笑起来，平静地回答说：

“我知道……不过我有件你很感兴趣的东西。你猜猜，汉娜，这是什么？”

我从被子里伸出半个头来，注视着现在已放在休果膝上的咖啡色纸包。

“得啦，你自己说吧……”

他打开纸包，举起里面的一件东西，这是一本已经给手捏脏了的墨绿色麻布硬面精装的厚簿子。封面上端印着一只显眼的狮子——荷兰国徽，下面一点，有两个深深烫在麻布封面上的缩写字母：“R.P.”。“‘Rijkspolitie’——国家警察，”我机械地说；我是从我们那些出色的手枪上熟悉这两个字母的。

“对啦，”休果微笑着说道。“喏，请看吧。警事登记簿。你闲

着的时候，可以看看它，毫无疑问，这样的闲空你是有的。这是从艾梅登我的几个老朋友那里暂借的。”

我忘记了我的面容，——忘记了所有的一切。我已经坐在床上，伸手去拿这本绿色封面的登记簿。休果把大簿子递给了我。

“潜伏在地下的人，还有警察局正在侦缉的人，全登记在上面，”他说。“这正是你的一桩好差使：在最近几天里，把所有的名字都抄下来。”

“休果！……”我欢喜得叫了一声。“了不起，你这是怎么搞到的呀？”

“没什么，”休果谦逊地回答说，“我已经对你说过：多亏我的几个老朋友。就是从前在失业工人游行示威和我们分送报纸的时候监视过我们的那些人。现在呢，和我一样，因为我们的港口给残酷地破坏了，他们也恨不得亲手撕碎德国强盗哩，所以，就变得比较听话了……”

我紧紧抱着登记簿，就像个守财奴抱着钱袋似的。

“你出去吧，休果，”我断然说道。“我现在要起床。我已经好多了。我马上就动手干。”

他顺从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伸着个食指说：

“你干吧。不过得注意，晚上这本簿子要跟我一起钻进麦秸堆的。”

我开始抄写名字了。晚上，簿子真的和休果一起在木棚里过夜，到了早上，我又继续工作。我的病还没有全好，我穿着件肥大的长袍，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坐在顶楼的斗室里，抄写着大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名字——弗兰斯和鲁朗特，弗洛尔和托姆，当然，还有休果。只有在停止抄写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自己的病

体；这时候，我的太阳穴直跳，腰部酸疼，头发晕，心里直想呕吐。但是我感到自豪、快乐和内心的满足，因为，尽管有病，我也在干着危害占领者的工作。

自从休果给我带来警事登记簿，已经过了三天。抄写名字的纸张，慢慢在我的小台子上积起了一叠。已经快抄完了，这使我更加勤奋。我紧张地干着，甚至连屋子里和外面院子里的各种声音都听不见了。午后，非常静，可是我照样不会注意这种寂静。直到听见楼下有人说话，我才留心起来。我觉得好像讲的是德国话。我急忙站起来，我的双腿打颤了……然而这不光是因为病后的衰弱。我听见厨房门打开了。接着听见了卡琳的声音。我绝望地看了看自己那些纸张，赶紧把它们夹进登记簿里，我掀起上面铺着非常漂亮的床单的褥垫，把警事登记簿塞到褥垫下面。我把头巾扎在自己头上，便于脆穿着长袍钻进了被窝。楼下，厨房里，传来德国鬼子们刺耳的说话声和笑声；这是他们典型的夹杂着粗野的装门面的快乐。

“Was ist da oben?”①

我听见卡琳胆怯地说：

“一个女病人……Krank②。”

有人在楼下猛地拉开了通顶间的楼梯门。大皮靴踏在楼梯上的响声，在我可怜的脑子里引起了疼痛的反应；我浑身都冒汗了。

有人大概用脚踢我的门，门开了。我看见了钢盔。毫无疑问，这是赫尔曼·戈林师团的人！检查，检查……这么看来，他们就连菜农的小屋子也要检查了。我看见房门口出现了一个德

---

① 德语："那上面是什么？"

② 德语：病人。

国鬼子；在他身后低几级的楼梯上还站着一个。自动枪，防毒面具，勋绶——一应俱全。我躺着一动没动。

这个德国鬼子站在原地不动，用冷酷锐利的目光打量着我。

“Krank?”①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懂德语。

“我有病……”我哑着嗓子说。

“Was hat sie?”② 站在楼梯上的那个坏蛋喊着。“Bekommt sie ein kind oder was?”③

他为自己的玩笑傻笑起来。

“Was haben sie?”④ 站在房门口的德国鬼子问。

我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来，指了指自己发肿的面颊。然后吃力地低声含糊地敷衍，好像张不开嘴似的。德国鬼子大概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Mumps…Ziegenpeter!”⑤他对自己身后的人说。

就在这时候，又有第三个声音在下面大贼：

“Wo bleibt ihr? Was gibt's dort?”⑥

楼梯上的两个坏蛋同时回答说：

“Krankes Mädel…Mumps hat sie…”⑦

那个粗嗓门在下面怒冲冲地迅速说道：

“Mumps? …Aber das ist ja ansteckend! Verdammt noch mal! kommt hinunter, Tölpel! Die steckt uns die

① 德语：“病人吗？”
② 德语：“她怎么啦？”
③ 德语：“要生孩子还是怎么的？”
④ 德语：“您怎么了？”
⑤ 德语：“腮腺炎……流行性腮腺炎！”
⑥ 德语：“你们在哪里？那里怎么啦？”
⑦ 德语：“一个生病的姑娘……她得了腮腺炎……”

ganze Rotte an! Dalli, dalli! Heraus aus'm Unglückshaus!"①

楼梯上的人做了个从右向后转的动作。他们的大皮靴的响声以及狂乱的吼叫简直像一群穴居野人出去打熊一样，搞得我脑袋疼痛难忍……德国鬼子的到来而使我产生的麻木和致命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浑身颤抖，抖得我连牙齿都合不拢了；直到此刻我才忽然想到，我的风衣，正挂在被奔上楼的德国鬼子一脚踢开的房门对面的挂钩上，而我的手枪就在风衣的口袋里。万一德国鬼子走到床前，要看我是不是装病，那我就拿不到武器了。我终于用意志力量控制住了自己。

可是我真不知道自己是该笑还是该哭；幸好，过了三五分钟，卡琳便上楼来看我了，她的脸色仍然白得可怕。

"他们走了……"她说着，跌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谢天谢地。他们骑上自行车像发疯一样滚了。可他们对着杨——他正在菜园里干活——乱嚷了一通……我的天哪，这里倒是出了什么事啊？"

"我正想问你呢，"我说着，感觉到了身子下边那本像石头一样硬梆梆的警事登记簿。"休果呢？"

"一大早就到查安去了，"卡琳回答说。

"谢天谢地，"我松了一口气。"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呢？"

"完全没料到。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过院子，直到厨房的窗子跟前下车……"卡琳解释说。"我连关照你一声都来不及，可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就溜走了。"

---

① 德语："腮腺炎……这可是传染病啊！呸，你这该死的！你下来吧，蠢货！她也许会传染给我们全连的！快，快！快离开这个倒霉的人家！"

我把经过情况告诉了她。她瞪圆了眼睛不相信地看着我。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是他们害怕传染病，这倒救了我们?"

"正是这样，"我证实说。

"我们真走运！……"卡琳说着，轻松地长长舒了口气。

"的确是这样，"我说。"我们真走运！"

袭击没有成功

春天已经降临这沙丘地带。我一直坐在自己的顶楼房间里，抄写警事登记簿，直到抄完最后一个姓名，所以起初几乎没有注意到春天的到来。躬腰曲背坐在屋子里，是不大有利我恢复健康的，可我到底还是好起来了。休果得悉德寇光顾了我们的屋子，起初很担心，而且大概还暗中骂过我们是傻瓜和蠢货，可是后来他想到德寇害怕传染病，便放心了。

"的确，"他说。"这是常常听说的。他们怕传染，像怕火一样……对，完全可能，现在他们一时半会是不会再到这儿来了。"

可我们毕竟很快就发现，休果的举止变得谨慎多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木棚里，如果和我们一起在屋子里坐坐，那他从来也不把手枪留在木棚里。我也学他的样，把手枪带在身边，不过我对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事。

大约在四月中旬，休果又用咖啡色破纸把警事登记簿包好，绑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看上去像一双旧皮鞋，带回艾梅登去了。就在这一天，我头一次到屋外走动。我的抄写工作完成了！我终于看见了户外的春天；地面上那一片片原先光秃秃的、没有草木的褐色泥土，仿佛全给抹掉了，一层浅淡的青绿暂且还看不

见光泽，但它即将唤来生机盎然的景象。杨的一块块整齐的菜地变得黑油油的；当红日高照，温室的玻璃上阳光闪耀的时候，我甚至好像看见龙须菜那嫩白的幼芽，正在漆黑的地下膨大、生长、抽芽。

晚上，刚要吃晚饭的时候，休果回来了，从他的脸色上，我一下子就看出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也许是西尔伯坦涅的讨伐队又在什么地方横行起来了；近来，狂热地渴望报复的德寇，更加残忍了，特别是在我们地区。我的思想飞驰到了远方……谁知道德国侦缉机关是不是发现了我……万一他们对我的父母、对尤迪菲采取什么行动……没法知道啊。休果那蔚蓝眼睛的严峻目光一下子打断了我的滚滚思绪。他对我点头示意，要我跟他到小道上去。

“快告诉我吧，休果，出了什么事啦？”等到我们走得看不见屋子了，我问他。

“他们在渡船上抓走了托姆、杨和艾迪，”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身体还十分虚弱。我感到两腿再也支持不住了。我的牙齿在打战；大概我的脸色雪白，因为休果吓坏了。他赶忙伸手紧紧扶住我，我这才站稳。

“天哪，这是怎么啦？”他手足失措地喊道。“你头晕啦，汉娜？”

“太出人意外了，”我喃喃地说。“不要紧……会过去的……你把情况全告诉我吧。”

休果又一次负疚地看了看我，开始讲述了。我觉得他讲得十分谨慎。原来哈勒姆的抵抗小组又开始进行复仇行动了。那里的同志们长期毫无活动，这确实不高明，休果说；党的教导员的决定使他们大家都很高兴。弗兰斯拟订了袭击中央发电站的新

计划。这期间，托姆、杨和艾迪从卡特费尔德市政会大厦窃得一整包食物购买证和空白证件，打算把这些东西带给肯涅麦兰特的抵抗小组。但是，在他们搭乘的渡船上有德国巡逻队。艾迪想把装着证件的手提箱扔到河里去，可是有个渡船乘客，一个穿便衣的坏蛋，报告了德国侦缉队。两分钟不到，三个人都戴上手铐坐在警车里了。艾迪曾经开枪，可是他的手枪瞎火了；托姆和杨则慌了手脚。

“他们三个的名字，警事登记簿上全有，”我说。

我们在已经绽出了饱满的、有粘性的嫩芽的灌木丛间默默地信步踱了很久。

“该怎么办呢？……”我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软弱，问道。

休果把双手深深地插在短外衣口袋里。

“他们蹲在阿姆斯特丹的维帖林赫斯汉斯监狱里……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搞袭击？”我问。“我们能成功吗？”

显然，这工夫，他正回忆着我所回忆的事情：那一次，新年的早晨，一队抵抗运动的战士，穿着德国保安警察制服，徒劳地企图从维帖林赫斯汉斯监狱营救几位被监禁的同志……休果看了我一眼，然后凝视着前方，他的颧骨突露得分外明显，他的神情是坚定的。

“这一次，一定要成功，”他说。

我们听见了杨·费利缅的口哨声，这意思是，卡琳摆好饭了。我们回头慢慢往家走。我的胃口本来就不好，和休果谈话以后，更没有食欲了。休果也只是勉强吃了点，并且更加沉默了。杨和卡琳没有劝我们再多吃点，虽然他们向来都是好心人，特别是自从我生病以来，对我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就连海斯好

像也觉察到了大人们的心情，因而只是轻轻地摆弄着叉子和勺子。我想象中又回到了我们哈勒姆的指挥所。好像我又坐在那昏暗的、充满烟味的大房间里，那里摆着几张破旧的沙发，收音机在喀啦喀啦响。那边坐着托姆，再过去是杨，那边是艾迪……他们在笑，在唱，在为墨索里尼的垮台喝着啤酒……我的双颊上淌着眼泪。最使我伤心的是，我不能够也不允许参加袭击，我的身体还太虚弱，更不消说，即使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我的力量也够不上：参加袭击，比起骑在车上开枪，所需要的力量可大得多。

晚饭后，我和休果又出去散步了一次。看来，他想要尽可能地安慰安慰我，因此他对我十分坦率。抵抗运动委员会已宣布，决定营救被捕的几位战士，而且还要营救其他的人。已经与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取得了联系，休果说，领导上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应该组织协同突击。而且不仅仅是为了托姆、杨和艾迪；如果可能的话，这次袭击应当从监狱里救出所有被囚禁的人……

我没有打断休果的话；我看出，他已经全神贯注于新的行动上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们如何打得开维帖林赫斯汉斯监狱的门，假如同志们能够从死囚牢房里抢救出一些人来，我当然会很高兴的。我生怕表示异议会给休果的激情泼了冷水（他本来已在竭力克制这种激情了）。我心中有异议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我的病况。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想要做的和敢于去做的事情就要多得多，我们对一切也能更好地理解，能取得的成果也更大……此时此刻，我真羡慕休果有健康的身体，有坚韧不拔的意志，羡慕他肩膀和手臂的力量。

不久我就完全康复了——我非常希望康复。不出我所料，休

果这几天一出去就是好久。有时候，他告诉我点什么，可是更多的时候，回家来却沉默得出奇。嘴边明显的皱纹正泄露着他内心深处的愤怒。不过，我还是从他嘴里打听到，参加此次行动的将有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海里特·杨、弗洛尔和托尼，还有七八个来自查安和北荷兰省的人；哈勒姆指派了鲁朗特、休果和一个新参加组织的人；此外，共产党要从阿姆斯特丹调来十个人。他们已经考虑到给那个到时候故意不锁牢门的监狱看守安排隐藏的地方……

四月份日子过得慢极了。晴朗的白天长得叫人无聊；晚上更显得没有尽头。白天，我给卡琳帮帮忙，尽管我依旧不能自夸操作家务方面的进步：我削出来的马铃薯，还不如说像骰子，仍和过去我帮德·莫尔妈妈削的一样。休果不在的时候，我觉得日子加倍的长。我没法强迫自己看书。不知不觉，我的思想就开小差了，我仿佛看到墙壁、走廊、铁门、奔跑的人们。我似乎又在经历着我们所有的行动，然而，我脑海中再现的这些景象，却唤起了我忧虑的预感。卡琳老是用审视的目光看我，有一次她说：

“你的气色还是很不好啊。”

我支支吾吾回答她。卡琳这样对我说，这总是件好事，她提醒了我。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强迫自己散步，进食，休息。我不愿意让休果过于操心，何况我已发现他的神经越来越紧张——他常常使劲慢慢握紧拳头。

将近四月底，休果的情绪有了好转，他不再那么紧张了。他和杨说说笑笑，和小海斯逗着玩。恰巧这时候BBC电台报道说，英国已停止运送旅客出国，一切送交英国的外交文件均将由检查机关加以检查。

我们极端注意地听着。休果朝我点点头。

"见鬼，汉娜，看来你对于英国人的看法还是对的。如果说这些预防措施不是预示着大规模的行动，那我就一点儿也弄不明白了！"

显然某种事件即将酝酿成熟了，这已经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不到一昼夜，继之而来的其他消息已使我们确信，如今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还相信德国强盗的人了：西班牙已停止向纳粹提供钨，土耳其人也宣布了他们不再向希特勒出售铬的决定。

"老鼠要逃离正在下沉的海船了，"杨·费利缅意味深长地说；休果和我像是两个老战友，激动地默默相对伸出了手……

四月的最后一天，休果走了。

五月一日，我比平时更加烦躁。宁静的心情紊乱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成功地积聚起来的所有精力，一下子全没有了。我出去散步，但是，我突然觉得走不动了，不得不在路边坐下来。我回到家里，浑身是汗；我爬上顶楼，钻进我的小房间，像个迷信的小学生，用手指头占起卦来。我给手枪装上子弹，立下誓愿，只要听到袭击没有成功，抵抗运动的战士们被逮捕，我就亲手把子弹射进卖国贼拉格斯的脑门。我躺在床上直打颤，因为恐惧掌握住了我。这是难以忍受的。我一下从床上跳起来，站在小镜子面前，冷酷而充满轻蔑地严厉指责自己："你呀，这个神经脆弱的蠢东西，哭鼻子啦，发抖啦；难道这就是你，自尊高傲不怕打击的汉娜·斯吗？"

一个脸上有些红斑点、长着一头浓密的栗色鬈发的姑娘，从镜子里愤怒地望着我。

"要是他突然走进来，看见你这副样子，会对你怎么想呢？"镜子里的姑娘对我说。她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我离开镜子，洗

了个脸，又在床上躺下来，把双手枕在头下。现在我平静了，我感到惭愧。我愧对休果。

我发觉，我这工夫想着的只是休果……这一夜，虽然休果没有回来，我本来很可能因此而悲观失望、怀疑担忧，可是我没有激动，过得很平静。第二天早上，只知道休果有“事”去了的杨和卡琳，都回避着我的目光。休果外出行动当晚没有回来，这种情况以前还不曾有过。

快吃午饭时，我终于看见了休果；他骑着自行车进了院子。我眼前一阵发黑。卡琳正站在我身旁的水盆边，在洗孩子的衣服。她用湿淋淋的双手抱住我，把我扶住，要不然我会摔倒在地上。

“该死！……”我喃喃地说。我咬了一下牙关——我恨极了。我走到门口。休果正好已把自行车放在墙边。我看见他的背、他的短皮外衣、穿着运动鞋的一双小小的脚。他很清楚地知道我就站在门口，这我感觉得到。我也明白，他不愿意接触我的目光，看到我目光中的疑问。他毫无必要地把自行车摆弄了好久，最后才朝我转过身来。我害怕了。我向他奔了过去。他脸色苍白，没刮脸，并且有点消瘦。

“休果！”我喊了一声。“没成功吗？”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目光是忧郁的，其中流露出失望，自尊心受到伤害后的屈辱，还有无声的愤怒。毫无疑问，袭击没有成功！休果站在我面前，仍旧活着，平安无恙，然而却成了个痛苦和懊丧的化身。个人的失败是不会使他如此狼狈的。我了解他。我多么想尽可能安慰安慰自己的同志，他正为我们所遭到的失败而深受煎熬。我扑到他身上，一把抱住了他。他在无言的惊讶中凝视着我，他那瘦削的脸更加苍白了。我张皇失措

了，立刻责备起自己这个越礼的举动。休果拉开我的双手，慢慢把它们从自己肩上放下来。

"是的……"他说得很吃力，好像直到此刻他才能够回答我的喊叫。"没有成功。而且是多么大的挫折啊！"

我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然后拉着他向我们凉台下的那张旧长凳走去。窗口出现了卡琳的脸，这是表示叫我们吃饭——似乎这是现在顶重要的事！我不耐烦地朝她挥挥手。休果坐着，双手托着低垂的头。我也坐下来，等待着。

我们很久没有作声。后来他开口了。在轻轻的、单调的盘子和刀叉的碰撞声中，在海斯的笑声和叫声中，我听着休果那可怕的断断续续的讲述：他们是怎样执行任务，怎样对监狱进行袭击的。

艾迪仍旧没有烟抽

……四月三十日晚上，抵抗运动的战士们聚集在萨尔法季斯特拉特的一幢房屋里，海里特·杨和他的参谋人员正在一幅平铺着的监狱平面图前，对大家作着指示。同志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则坐着吸烟，一直到钟楼上敲了四点——宵禁结束。所有的人，都一组跟着一组出动了。休果带领一个小组打头；弗洛尔在队伍的末尾；弗洛尔的任务是收拾被抓住的敌人。监狱大门未上锁。提供这个重要帮助的监狱看守，当时就隐蔽到抵抗运动委员会在阿姆斯特丹为他找好的秘密住宅里去了。大家都知道，监狱中驻有约三十名党卫军；同志们毫无阻碍地潜入内院，从这里通过有石阶的入口，便到了宽大的监狱走廊的交叉中心。在院子里，全体抵抗运动战士都在皮鞋外面套上了厚毛袜，只有

休果例外，他和平日一样，穿着运动鞋（“穿着运动鞋走路，比猫还轻呢，汉娜！”）。直到此刻，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所有走廊里都不见一个人影。在一间牢房里，有个人喑哑地咳嗽了好久。参加袭击的人开始戴上面具。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戴好，走廊上一扇灰暗房门的门口，出现了一个荷兰看守。他一见突然来了许多人，便站住脚，张开嘴巴要喊，但是休果已经抓住他的衣领，一只手捂紧他的嘴，另一只手拿枪朝他的心窝一击。抵抗运动的战士们，像递木偶似的，三传两递，一直把看守传递到弗洛尔那里，弗洛尔把他绑起来，塞住他的嘴……依旧是寂静，然而这寂静是令人警惕的，十分不可捉摸的……走廊两边粉白的墙壁影影绰绰，令人心惊……海里特·杨和休果在刚才看守出来的那个门前站住了；他们互相对看了一眼，海里特·杨一脚把门踢开了。天花板上垂下一盏小灯，微弱的灯光照着房间。在蓝幽幽的昏暗中，隐约显出几个男人的身影；其中有一个一下跳了起来。休果很快逼到他们面前，低声说：“举起手来！不许声张！”他们全都乖乖地举起了手。海里特·杨挥挥手，下了命令：“出去！……”这些家伙很快被押解到弗洛尔和查安地区的同志们那里——被可靠地控制起来……又是静悄悄的了，只有衣服的轻微的窸窣声，套着毛袜走路的隐隐约约的脚步声，人们正沿着走廊向下一个门口走去……这扇门上半截是玻璃，里面遮着花边幔子。这个房间里可能有什么呢？海里特·杨朝里面张望了几秒种……好像没有人；总之是没有一个党卫军……为了保险，托尼和鲁朗特就留在这个门口监视，其余的人继续向邻近的一条走廊走去。海里特·杨站住了，抬手把休果和一个他自己的人叫到身边。一道光线从一扇开着的门里射出来。这大概不是牢房。他们悄悄地向房门接近了一点。毫无动静，只听到一阵阵

喘气声，像是动物在喘息。休果和海里特·杨同时向房里窥探：办公桌旁的皮沙发上睡着个党卫军。

同志们略作商议。也许，这个党卫军手上有死囚牢房的钥匙吧？必须活捉他。要是打死，就得开枪，而开枪是不行的：这将是失败的信号，意味着大家必须撤离……他们找来了弗洛尔。弗洛尔说："我来拧下他的脑袋。"（"你是知道的，汉娜，弗洛尔的那双手劲儿有多大！……"）弗洛尔潜进了党卫军的房间。他还没走上两步，办公桌下边就有个东西动起来，出现了个毛蓬蓬的影子……一声吼叫……一个狗头冲了出来——不知是丹麦猛犬还是牧羊犬，总之是一只用血和肉喂大的狗。狗眼闪着绿光，然而更可怕的是它那张斜长着白牙的大嘴……弗洛尔向后一跳。那狗令人惊心动魄地吼叫着朝他扑了上来。海里特·杨开了一枪，那可怕的动物倒下了。党卫军的身子动了。海里特·杨调转了自己的"炮"，朝德寇连发三枪。那家伙瘫在沙发上，就像一只装着骸骨的皮口袋……警报传遍了监狱。房间里听得见各条走廊传来的纷乱的咚咚声，就像人们在敲门，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一片叫喊声。急促的难忍的混乱……海里特·杨催促自己的战士们向内院撤退："快跑！他们朝这儿来了……"我们的人持枪向出口奔去，正在这时候，横走廊拐角后面传来了警报……接着是惯常的谩骂、诅咒、皮靴的声音；整帮的德寇从卫兵室冲了出来……头一排自动步枪子弹朝抵抗运动战士们猛烈地射来。同志们被阻在原地了。后来，同志们开始还击。党卫军后退了。抵抗运动战士们迅速打开通内院的门。院子里站着那些被绑着和口里塞着东西的监狱看守。弗洛尔把他们推到我们的人和追击我们的党卫军之间的一条走廊里。党卫军射出了第二排自动枪弹。有几个人负伤了。可是谁也没躺下，全都站了起来。

看守们形成的掩体，起了缓冲作用。缓冲是短暂的，然而是可贵的。党卫军往前挤着，拼命奔跑，这时候我们的人已经在翻越牢墙。法西斯匪徒打了第三排子弹。弗洛尔和托尼就在休果身边倒了下去。休果把他们扶起来，搀到墙边，大家帮他们翻了过去。休果又一次往四下里看了看。他看见有个同志躺在地上没起来，便一面射击，一面往回走。和他一同射击的还有三四个人——共产党员和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休果迅速向倒在地上的同志俯下身去。这是海里特·杨。他活着，正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休果向同志们喊道："再把敌人顶住一分钟……半分钟！"他把海里特·杨拖到墙脚跟前。又过了一二十秒钟。担任掩护的同志们抬起海里特·杨，一同翻过墙去。休果继续射击着。另外还有个人在他身边射击，在破晓前的黑暗中，他看不清那人究竟是谁。党卫军又在进攻了。他们已经进入内院。休果和那位认不出来的同志奔跑着，翻过墙头……街上，看不见人……有一个人正骑着自行车往前行，他俯着身子，两条腿艰难地蹬着脚镫。休果一眼就认出那是海里特·杨。那位认不出来的同志点了点头便不见了。休果急忙隐蔽到莱顿区的小巷子里……钟楼上的钟敲了五下。袭击监狱失败了。

托姆、杨和艾迪依然蹲在死囚牢房里。

那天早上，休果躲在一个木匠的小院子里的一堆水泥袋和木板当中，等着街上的行人多起来，好混出去；这时他发觉自己衣袋里的一包好香烟，这是他为烟瘾很大的艾迪保存的。这天白天，他留在阿姆斯特丹，晚上动身去查安地区。他在德·莫尔妈妈那里获悉，弗洛尔和托尼这两个伤员，已经隐蔽到秘密地点，弗洛尔的股骨被打穿，托尼被打穿了肩膀。休果在食品杂货铺的顶楼上过了一夜。

现在他又在这里了。他平安无恙，然而正受着失望、盛怒和复仇心的痛苦折磨。而那包给艾迪准备的香烟依然原封不动地放在他的大衣里，在他放手枪的皮制暗口袋里。

狐狸习性

休果很快就克服了精神上的慌乱和软弱。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工作。尽管还有轻微的头晕，我觉得我能够完成任何任务了。我非常高兴，因为几天之后休果终于对我说：

“我们到哈勒姆指挥所去吧。那儿正在准备行动。”

五月这些日子，常常刮风下雨，仿佛大自然也和我们一样，被德寇占领下的欧洲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激怒了。我无法表达时时激动着我的感情：我觉得，世界上找不到足以烧尽纳粹败类的烈火。

我们裹着风衣，骑自行车到“西班牙橡树”大庄园那座古老的领主宅第去。我在风衣里面穿着件厚绒线衫，休果风衣里面穿的是件旧的冬大衣。他这件大衣上有个放手枪的皮制暗口袋。我却在自己的风衣里面缝了个双层粗麻布的暗袋，为此我大概使尽了自己全部的缝纫才能。倘若妈妈看见我缝制的这个暗袋，她准会摇头的。可是暗袋终于缝上了，而这是主要的。

潮湿的道路闪闪发光，大气似乎把它的全部重量都悬垂在大地之上，若不是有鲜嫩的新绿，有新生树叶的微带苦味的馨香，那就会以为这是十月天了。我全身直哆嗦……

我们骑车进了围墙，放好自行车，沿着花园小径慢慢走去……我哆嗦得越来越厉害了。我心里乱得很。这里是木栅栏门，推开栅栏门的时候仍然是那种特有的声音……然后是掩藏在由

野葡萄藤爬成的带浪漫色彩的遮棚下边的后门……接着就是我们的房间……

休果轻轻把我朝前推了一下。房间里一片昏暗，外面，天空乌云密布，树枝悬垂窗前，房间里的一切物体都被烟草的烟雾蒙住了。然而我一眼就认出了威南特，他的身影在窗子衬托下，显现得相当清晰；他当时就朝我们回过头来了。弗兰斯也在那边，他身后，在那勉强看得出的暗处，一张旧沙发上坐着鲁朗特，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男人。

现在我们彼此面对面站着，互相紧握着手，含糊地说着常说的问候话："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想到那三位不在这里的同志，可是谁也没提一个字。

眼睛逐渐习惯了微弱的光亮。弗兰斯神情忧郁，他把我介绍给两个新参加的人：长着金黄长发的小伙子奥托，还有个其貌不扬的名叫威贺尔的人；威贺尔唯有一对好问的灰色眼睛比较出色。休果和他相见，像是老熟人，因此我猜想，威贺尔参加过五月一日的袭击。

六个男人和一个姑娘。目前，他们就是哈勒姆的抵抗运动委员会，总之，是它的核心，是它的战斗部队。况且，休果和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行动还是半独立自主的。

这次聚会，总有点悲愁，有点叫人难过的气氛，仿佛我们是在参加追忆晚会，参加追悼会；看来，不仅我一个人体验到了这种情绪。鲁朗特以探索的目光观察着我，他以为我没有发觉。他似乎根据我的外貌就能判断出，在这期间我干了些什么以及我是怎么过日子的。看得出来，他的忧虑和阴郁并不亚于弗兰斯。我高兴的是，两个新来的人至少给我们这次聚会带来了某种生气。我想，他们大概不认识我们被捕的同志。

在这个我如此熟悉的房间里，我感觉到自己现在较为成熟了，而主要的是，经验比较丰富了。我明白，我旧日的同志们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奥托给每个人都摆上了一份美其名为咖啡的饮料。这饮料虽然没有任何香味，可它是热的，是甜的，因而毕竟略略驱散了一点笼罩在我们心头的愁闷和寒气……

谈话进行得不顺畅；使谈话变得炽热起来的，还是因为弗兰斯对我和休果说：

“你们知道不知道，在维耳曾的渡船上把托姆、杨和艾迪出卖给德国鬼子的，是一个穿便衣的坏蛋？”

我没有回答，休果点了一下头。

“现在我们知道是谁了，”弗兰斯补充说。他的话音里听得出新的声调，有一种坚定意味，这比在此以前他和我们说话所用的那种怯懦的、缺乏信心的调子要使我高兴得多。

“他妈的，是谁？”休果忙不迭地问。“我认识他吗？”

“甚至非常熟悉，你会感到吃惊的，”弗兰斯回答说。“是福斯兰德。”

休果果然惊讶地直盯着弗兰斯，而我却莫名其妙，因为福斯兰德这个名字我从来也没听到过。

“不是那个格尔曼·福斯兰德吧……别维尔魏克的？”休果不相信地问。

弗兰斯、鲁朗特和新参加的威贺尔，三个人全都点点头。

“我们‘党内的同志’福斯兰德，”鲁朗特说完站了起来；看来，他坐不住了。

我亲身感觉到了休果满怀的激动。我几乎准确地知道，此刻他脑子里正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叫他死无葬身之地……”他说着，无力地落坐在椅子上。

“你们的消息准确可靠吗？”

弗兰斯富于表情地点了几下头：

“对。这个人的话是没有理由怀疑的。这是西蒙说的。自从和战俘联系的事件之后，西蒙以仆人的身份跟过福斯兰德。你们也知道，西蒙是个多么善于观察的人——他具有工人的明达而冷静的头脑。”

休果摇摇头。

“真糟糕，”他说。“福斯兰德的表现有点奇怪……譬如，他的浮华习气……所有这一切，我总认为是由于他在经商，不得不与资产阶级交往……没想到他在追求这样的目的！……”

“福斯兰德‘同志’！”鲁朗特又苦恼地揶揄。“‘联络员’福斯兰德！……”

休果突然站起来，走到弗兰斯跟前，抓住他的肩膀摇了摇。

“当时在阿珀尔多伦①，企图把地下党组织出卖给德国侦缉机关的，大概就是他吧？”

“对！”弗兰斯证实说。“就是他。他已经部分得逞了！洛乌·伊和杨·德没有来得及迅速隐蔽，离开那儿不远就被捕了……”

休果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情绪感染了我们大家。同志们继续谈论着福斯兰德；人人都讲着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我不仅不认识他，而且连听都没听说过。然而，就是我现在已经听说的，也足以激起我的憎恨和强烈的报仇的欲望。格尔曼·福斯兰德……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一个不得志的、但是显然确信自己具有非凡的经商才能的市侩；他从阿姆斯特丹迁移到别维尔魏克，在那里搞日用商品投机……年轻的时候，他在共产党内就有熟人。在共产党人面前，他冒充是共产党员。他那

① 荷兰中部的城市。

庸俗的派头很引人注目：他欢喜穿鲜艳花哨的衣服，酷爱戴黄色的手套，常在各种咖啡馆里鬼混，还是小店主和桥牌爱好者俱乐部的一分子。当党缺乏刊登公告的经费时，他有时资助一下党组织，他向支援西班牙委员会定期捐助数目不大的款项，并给国际工人救济会以赞助……就连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追求的是什么。他不能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出现，而且也不愿意。这会损害他在资产阶级主顾们眼中的形象。只是从被占领的时刻起，他才好像最后选定了自己的阵地：立即隐入地下。他没有引起怀疑。他的交际手腕非常有利于交往：二月大罢工以后，德国鬼子开始胡乱抓人，阿姆斯特丹的共产党人屡次派遣他带着特别任务到海尔德兰去找隐蔽在地下的共产党领导……这些任务他也执行得十分令人满意。

"太信任他了，"弗兰斯说，好像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人是叛徒似的。"无论如何，我们过分信赖他了……在去年秋天以前，一切情况好像都还好……可后来突然就发生了这件事。"

休果又坐下了：看来，他的脑海里正在再次追忆叛徒的整个生涯。

"后来他被捕了，"鲁朗特喃喃地说，"一切也就由此开始了……"

"就是嘛，"弗兰斯应声说。"你记得吗，休果？去年秋天福斯兰德突然被抓走……"

"可不久他就回来了……活得好好的，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休果郁闷地说道。

"就是嘛，"弗兰斯重复道。"这是多么糊涂啊！当时我们为什么不问问自己，他怎么能够安然无恙地脱身，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却办不到？他们为什么注定要被处死，而福斯兰德却在尼

古拉节①前又不知不觉出现在肯涅麦兰特，恢复了自由？”

休果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脑门子：

“福斯兰德……对！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去监视他。那时候我们正忙着对维帖林赫斯汉斯监狱进行头一次袭击的事嘛。”

我什么话也没说，可是我心里在想：“这么说，休果也参加了这次袭击。可他对我只字未提。”

“那时候我们太忙了，”我听见弗兰斯说。“可他那时候就在干自己的勾当了。很明显，既然只有他一个人回来，那就是说，他已经完完全全卖身投靠敌人了……”

“谁先想到的？”休果简短地问道。

“我刚才说过：西蒙，”弗兰斯说。“应当承认他很敏感，在这方面，我们对他只有羡慕的份儿……还在和战俘谋取联系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彻底考察一下福斯兰德了。这是个冒险的计谋。他准备了一封阿姆斯特丹党组织的同志们写来的信，他们在信里要求福斯兰德把西蒙作为仆人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否则，信中说，西蒙就要被遣往德国去服劳役。福斯兰德中计了。从二月份起，西蒙便机警地盯上了他。而福斯兰德则挖空心思竭力同时为两方面工作：这正是西蒙早就预料到的……”

“所以占领毕竟教会了我们一点东西！”休果痛苦地说。“射击、袭击……逢场作戏……”

大家沉默了片刻。随后弗兰斯结束了他对于刁狐狸②的讲述；就是这只刁狐狸，曾经混在我们的队伍里，怀着唯一的目的

---

① 每年五月二十二日和十二月六日为尼古拉节，是时农民均到教堂礼拜据说能消灾灭病的尼古拉神。

② 福斯兰德这个姓的开头一个音节“vos”在荷语中就是“狐狸”的意思。

——尽可能巧妙地出卖我们。弗兰斯最后说：

"……西蒙早在一个来月以前就已经能够肯定说，福斯兰德每一次'因事'去阿姆斯特丹或是哈勒姆，都要到德寇侦缉机关去……毫无疑问，他是去出卖我们的人。当然罗，就为了这个缘故，德国鬼子才留给他一条命……西蒙跟踪过他三次。最后一次福斯兰德乘的是维耳曾的渡船；而就在那天晚上，西蒙听说渡船上有三个哈勒姆的'恐怖分子'被捕了……"

我们又沉默了一阵。

"事情原来是这样……"休果轻轻地说。"可肯涅麦兰特的同志们……他们没采取什么措施吗？"

弗兰斯带着讥讽的微笑说：

"大概他们也想过的……不过现在已经晚了，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但是在那以前，西蒙怎么也没有能说服他们相信福斯兰德是真正的叛徒。因为仅在一个月以前，福斯兰德还为地下工作者提供了一大捆食物购买证呢……而在西蒙去找一个枪法非常好的人的时候，那个人干脆拒绝消灭福斯兰德，还当面嘲笑了西蒙的建议。"

"既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你为什么说已经太晚了呢？"休果急躁地问。

"因为从那时起福斯兰德就失踪了，"弗兰斯回答说。"他搬到阿姆斯特丹去了，正如西蒙说的……成了捉不着的人。"

"捉不着的人？"休果激怒地和不相信地问道。"失踪了？"

"跑到外地去了。失踪了，"鲁朗特和弗兰斯证实说。

休果大概还想问点什么，但是没有问。我看得出来，他稍稍冷静点了。

"西蒙认为，福斯兰德在出卖了托姆、杨和艾迪以后，感觉到

自己不太有把握了，”弗兰斯回答说。“大概有不少人都认识他了……我们的狐狸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多半给自己找到了更保险的地方。”

“你这样认为吗？……”休果沉思着问。

“当然……”弗兰斯说。“我们错过机会了，休果。我们只好等到彻底解放……等到人民法庭来弥补我们的疏忽。”

休果依然在沉思中点了点头。嘴边出现了勉强看得出的一些细微皱纹——这是他头脑里某种决定已经成熟的可靠的标志。他没有再插话，虽然大家开始在详细讨论袭击中央发电站的新计划。

我和休果回家的时候，他仍然不言不语地久久沉思着。直到乘上渡船，他才向四周看了看，悄悄地对我说：

“这么说来，汉娜，这个告密者——狗崽子，就是在这里干下他最后一次害人的勾当！”

“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吗？”我和休果一样，在渡船栏杆上探出身子，同样悄悄地问他。

他抓住我的胳膊说：

“我正等着你提出这个问题哪，汉娜。当然，我们要采取行动的，虽然弗兰斯说这个坏蛋捉不着了。捉不着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要着手追捕他。”

猎　狐

在等待休果拟订行动计划的日子里，我真是度日如年，然而我并不感到寂寞。现在我又能看书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就要有事情做了。我看着休果手持铁叉或鹤嘴锄在菜园里干活；他的

额上堆着皱纹，双手平稳而坚定地整着菜地。我仿佛看见一个个计划在他脑子里产生、掂量，而又一个个被放弃，直到最终形成一个最恰当的计划。

我看书，收听英国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军队已经接近原先的边境。铁木辛哥元帅①率领的百万大军正在波罗的海沿岸，准备在西线发动强大的攻势。我模模糊糊地想象着这样的战线是个什么场面。我似乎觉得这是一种正在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前推进的钢铁堡垒……

可我们的战场却是这么狭窄，这么小，这么不显眼；它只在荷兰的几条河流和围垦地之间、在沙丘和村庄的背后展开。两千来个荷兰人，隐藏在秘密隐蔽所里，和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占领者进行着斗争。而在东方，强大的火与铁的力量正在积聚，一场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降服希特勒主义的暴风骤雨即将爆发……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职责，直到纳粹匪帮被粉碎。可是即使在我们荷兰，纳粹匪徒也不愿意投降，正在竭力挣扎。他们突然发布了恫吓和警告的公告，倘若盟军在我们的海岸登陆，有人敢于帮助盟军，他们便将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来加以对付。

"好像英国人已经驻扎在彼坦②和赞德堡③之间似的！"就在我们看到报上登载德国鬼子公告的那个晚上，休果嘲笑说。他斜视着我，问道："汉娜，英国人会不会在我们这里登陆，你大概要清楚得多吧？"

我微微冷笑了一下。

---

① 铁木辛哥(1895—1970)，苏联元帅；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任西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司令。

②③ 荷兰中部沿海城镇。

“这并不决定于我……你自己也明白，德国鬼子害怕了；要知道他们不是平白无故采取这一切措施的……”

“一点不错，”杨·费利缅应声说，他正在用刀子把烟头弄碎，拿这种乱七八糟的碎末装填自己的烟斗。“他们的处境可不怎么妙哪，休果！他们意识到不可避免的结局临近了……”

“这就连我的木底鞋子也感觉到了，”休果仍旧笑着说。

天气依然阴冷多雨。起初我以为休果要等待晴天；我知道，我们要用的时间不会只是一昼夜。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

“我们明天动身，汉娜。不过你要估计到，我们这次行动需要个把星期……”

他把食物券和钱拿给我看：

“我们会有点困难的……总之不很容易。不过我知道你能坚持得住。”

“你认为他在什么地方？”我问，声音几乎像耳语。

“明天就会明白的，”休果耸耸肩膀。

第二天，我们骑上了自行车，我还丝毫也不了解要往哪里去，直到阿苏姆堡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了，我才吃惊地发觉我们正在向西行进。

“休果，”我问，“我们是去别维尔魏克吗？”

“我正是打算去那儿，”他回答道。

“可是坏蛋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刚说出口，但是他那嘲弄的微笑立刻使我住了口。

“他是走了。可他的妻子没走。”

我的脑子里开始有点明白了。

“噢……这么说，你是要从那儿着手追寻！”

休果不慌不忙的。他几乎连脑袋都缩进了自己的冬大衣，只

有踏自行车的两只脚不时在大衣下面露出来。他的蓝色软帽低低地压在前额上，嘴角叼着根熄了的香烟。我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然不知道。我又裹着我的风衣，里面穿着厚绒线衫。很难想象得出有比我和休果更平常、更不惹人注意的这么一对了。没有一个人朝我们看一眼。就连站在交叉路口怀疑地监视着所有行人的法西斯保安队的岗警，也没有对我们赐以青睐。

福斯兰德住在一条小街上，这是别维尔魏克一条很长的中心街道的支路。休果吩咐我沿街兜一圈，好好记住福斯兰德家的位置。这是一所很不错的城里人的住宅，上面的突出部分镶着玻璃，窗帘背后有些花盆，擦得闪亮的大门旁边有块小铜牌："格·福斯兰德，经售百货五金"。没有一点危险或意外的迹象。房间里点着酒精灯。房屋有一面临着一条窄巷子。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扇严严实实的灰色的门。

我的心均匀地跳动着，重大时刻总是这样。我们在离福斯兰德家不远的地方放好自己的自行车，便慢慢地在昏暗的支路上溜达，尽力不引人注意，一边等待着估计福斯兰德的妻子吃过晚饭并且安置好孩子睡觉的时刻。到时候，我们就在临巷子的那一面从不上锁的边门进去找她：在荷兰，临巷子的边门通常是不上锁的。

我们戴上休果头一天刚做的面具。屋子里寂静无声。边门没有锁。我们溜进了屋子。房屋的结构和荷兰同类所有住宅一模一样：先是走廊，然后是厨房，厨房旁边便是通往各个房间的过道。这是荷兰小市民千篇一律的优裕的生活方式，它永远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

我们在走廊里停住了。这里照例有一盏用黑色遮光板遮暗了的小灯。房间里有脚步声——声音那么柔软，好像有人只穿

了一层袜子或软底鞋在里面走动。

“你站在这里望风，”休果对我耳语了一句，便把我轻轻推到黑暗的角落里。“我一吹口哨，你就到我这儿来。”

隔壁房间里这个人的听觉非常敏锐，这个女人对我们叫喊起来：

“那是谁呀？……”

休果当即把房门一推，让门开着，于是房里的灯光便照到了走廊上。我退避到一边，房间里的情况看不见了，不过我什么都听得见。

“啊，福斯兰德太太，”休果单刀直入。“别动。也别嚷……要不我就开枪。”

我听见了压低的哼哼声音，好像我看不见的那个女人强忍着才没喊出声来。

“您您您……是是谁？……”

“什么也别问！坐下吧！不许动……就这样，”那是休果的声音，如果了解他的性格，那么这声音着实不算怎么冷漠了……“我只问您一个问题，您要老老实实回答。您的丈夫——格尔曼·福斯兰德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偷偷朝房间里看了一眼。我看见休果大衣的边边，随后又看见一些家具：橡木框的镜子，蒙着一块像是花花绿绿的印花布的圈椅，还有冒充波斯货的地毯，——这全是庸俗的、难看的排场。那女人大概一直还没有恢复常态，只是发出一些听不清楚的喉音。

“他在什么地方，您知道还是不知道？”休果问。他终于显得不耐烦了。

“不不不……”女人结结巴巴地说。“我一点儿也不不不知

道……”

休果吹了一声口哨。我立刻握着手枪走进房间。我看见一个女人，样子怪不自然地僵坐在另一把印花布面的圈椅上，年纪比我大四五岁，穿着蓝色短内衣和深灰裙子。她的样子是可鄙的，无可奈何的，头发蓬乱，淡蓝色的眼睛带着点愚蠢和迟钝的惊异凝视着我：她面前突然出现了个头戴面具手持火器的女人。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只愚蠢和驯服的典型的母鹅。我很讨厌这种家伙。在她身后，黑洞洞的窗前，摆着一张写字台和一把跟它配套的椅子，她的左面，放着个家常的餐具橱，橱门上的磨花玻璃闪闪发亮；橱的左右两面是木雕——一串串的葡萄……我听见休果嘲弄地说：

“太太什么也不知道……你看住她！只要她稍微动一动，就朝脑门子上开枪。我们一定要准确查明这个骗子在什么地方。”

他朝我使了个眼色，女人的脸一下子吓呆了。我瞄准好，就地逼住了她，这时候，休果在检查写字台。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图。桌面擦得闪亮，桌上摆得整整齐齐，在未必用得着的青铜墨水壶和吸墨器之间，有一只装着些信件的筐子。休果把筐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用枪口把信件拨散，摊在桌子上。

那女人没去看休果在干什么，一直带着那种被逼而无可奈何的神色呆望着我。我很高兴，我已经用大头巾把自己发红的栗色头发全遮盖住了，要知道就连最蠢的女人也很容易记住这一类特征的……

休果大概找到了有用的东西。他站在女人背后，把一张明信片默默地对我扬了一下，放进了里面的衣袋。还朝我点点头，显然对搞到的东西很满意。接着他离开写字台，站到黑亮黑亮的壁炉旁边。

“您还是肯定一点儿也不知道吗?”休果说。

女人把视线转移到休果身上。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用沮丧的音调说着,似乎就要嚎啕大哭起来。

休果斜眼看了看摆在壁炉板上的一些照片,他用手枪点点三个孩子的照片。

“我看得出来,您是有孩子的,”他说。“所以我不要您的命——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你们的电话在什么地方?”

女人胆怯地用手指了指走廊。休果出了房间;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忙着,我猜到了:他在切断电话线。后来他又回到房间里。

“现在到角落里去吧,太太……就是这样。脸朝墙。在您数到五百以前,不准离开这里。要不然,一颗手榴弹就会飞进这个安乐窝。”

女人顺从地走到指定的角落。休果扯扯我的袖子。我们出来到了走廊里,休果随手砰一声把门关上。我们原路从巷子里走到街上。天色已经全黑了,我们撞着了一个人。“瞧着点嘛,傻瓜!”那人悻悻地抱怨着,急忙闪到一旁。我们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放自行车的地方。两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在濛濛细雨中沿着大道迎风疾驰了。

我们及时到达了烟铺楼上的住所。休果把我们的自行车搬到楼上。在长长的过道里还放着几辆自行车。大房间里有四五个男人和一个上了点岁数的妇人——她像母亲一样慈祥,同时举止又是果断的。室内烟雾腾腾,这情景使我想起了哈勒姆抵抗运动的指挥所。人们立刻把我和休果让到炉子旁边坐下;我们一边烘衣服,一边烤火,直到全身暖和舒适。没有人问我们,也没有人给谁介绍。妇人出去了,随后又捧着个托盘进来,托盘

上放着两盆面上撒了厚厚一层砂糖的小麦粥；我心想，既然这里的供给这么丰美，这家店铺一定会在所有的地下工作者当中享有盛誉的。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我还很少饿到这种地步。

“我这儿只有一张她睡的床铺，”妇人说；她在我们身边坐下来，显然愉快地看着我们大口大口地吃粥。

“您也知道，我已经在两把椅子上睡过不止一次了，”休果有点见怪和腼腆地说。“不过我们需要单独谈一会儿。”

我们已经坐在摆着开得稀稀拉拉的倒挂金钟和几把黑帆布面椅子的小房间里了。这个小房间，因为我以前来过，我是熟悉的。我问休果：

“你在福斯兰德的写字台上找到什么了？”

休果把手伸进里面的衣袋，然后洋洋得意地掏出一张明信片递给我。明信片上的日期是四月二十七日，邮戳上的地名为乌得勒支。我故意不看寄件人的地址，而匆匆浏览了写在背面的内容。

亲爱的朋友福！

你可以祝贺我了。多亏斯和范·德尔·贝的美言，我已获得稽查职位。因此我提请你注意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如果你需要待遇优厚的工作，那么我当然会试一试，找个合适的。总之你要设法尽快和我会面。尽可能为我带上两个优质电子管，这里的全糟透了。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你的……

签名我无法辨认，我看了一眼寄件人的地址。写的是：“乌

得勒支，布尔果米斯特耳·韦尔特斯路303号，国家警察局稽查皮·巴别洛”。

“好极了，”我在把明信片还给休果的时候说。

“你知道，汉娜，那个女人当然没有看见我拿了这张明信片。但是如果她有头脑的话，立刻就会明白一切的。倘若她非常非常聪明，她就一定会检查装信件的筐子，看看信件是不是少了。不过她的头脑大概还想不到这一点。她认为避免了一场祸事。只不过弄坏了电话而已。”

“可是她会写信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丈夫的，”我说。

“可能的。无论如何，明天我们就到安东·缪塞尔特①所在的城市去。可以说是到狮子窝里去。巴别洛，警察局的稽查……你想都想不出比这更妙、更干脆的了。”

我又想到了明信片。“巴别洛写的‘多亏斯’，指的是什么呢？至于‘范·德尔·贝’，无疑是个法西斯分子的名字。”

“其实这个斯也没什么疑难，”休果说。“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训练这些为德国鬼子效劳的荷兰刽子手，你知道吗？”

“真笨，我就没想到这一点。嗯，那当然是在斯哈耳克哈尔。”

“挺好的一伙，对吧，啊？”休果说。“一群告密者和猎奴者。在这封‘书信’里，只差在下边附上一句‘海尔希特勒’②了……完全可能，他们很快就要开始互相用这个祝词了。”

“这个坏蛋也真是蠢透了——在明信片上竟写着乌得勒支的电子管完全不中用，”我说。“因为这种‘Greuelmärchen’③，

---

① 安东·缪塞尔特(1894—1946)，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九四六年被法庭判处死刑。

② 纳粹分子用来作为问候、祝贺、致意的口号，意为“希特勒万岁”。

③ 德语：恶劣行为。

新上任的国家警察局稽查很可能要蹲监狱的……”

大概这个玩笑很中休果的意。不过我们没有谈多久。我愉快地听从了休果的吩咐，提早上床就寝了。他自己大概也早已躺在那两把椅子上了，如果不是为了要睡觉，那就是为了要在心里默默思考一个个新的计划。我渐渐进入梦乡，仿佛慢慢沉入了黑糊糊的、美好的、像丝绵一样柔软的水中。

早上，我们把自行车寄放在哈勒姆的一个停车处，便动身去乌得勒支。旅途是够麻烦的。为了避免无休无止的检查，我们没有乘火车。我们搭浅蓝色的电车到了阿姆斯特丹，然后坐上经过费赫特地区的汽车。电车倒走得还正常；可是汽车时常抛锚，一停就是好久——烧木柴的发动机常常发生故障。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女人说，这是常事。过了三刻钟，开来一辆备用车。车里的前排坐位上坐着几个穿黑军服的法西斯保安警察，从他们的外表看，真会以为是希姆莱的前任侍卫。然而这几个小子的精神比我们还要差得多。等到我们在乌得勒支下车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高兴——我们安然无恙！

自从战争一开始，我就没有来过乌得勒支。我先前一直认为，这是个阴暗的城市：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保守和衰落的化身。这个印象现在更加强烈了。也许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司令部设在这里的缘故。从那些想必住满污秽和赤贫的人们的破旧房屋和弯弯曲曲的凄凉冷落的大街小巷里，隐隐袭来一股令人抑郁的荒凉的寒气，我的肌肤几乎感觉到了这种寒气。可是问题不仅仅在于占领和有几十个穿军服的坏蛋。这里的一些普通人，走在路上活像是挨了打的狗，至少也像是生怕挨打的狗。浆得梆硬的窗帘后面装扮着体面，庸人们拉长的脸上也硬绷着体面。只有在这个丑恶庸俗的泥潭里，也只有像缪塞尔特这样的败类

才会想出仿效德国纳粹匪徒的念头。在阿姆斯特丹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这一类情况。当我们为了探明巴别洛的住处而在白天进城的时候，我心里是空虚和冰冷的，我几乎没有力气了。一路上，我们只遇见两个可以歇息的独特的地方：一处是周围有壕沟的市立大教堂，它真像一座棱堡，像掩藏在一片大树中间的天文台；另一处是马利班——高尔夫球场，在正常时期，这里的景色准会使我产生良好情绪。我身上在打颤。休果发现了，便问道：

"冷吗？"

我否定地摇摇头：

"全都是这个可恶的城市之过。我的天哪，我若是在这儿过上半年准得死！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行。"

休果惊愕地望着我，好像我是用外国人的口气在说话，我不由地笑起来：这样的话休果是绝对不会感兴趣的。难道说他不对吗？他当然是对的。我忽然想到，艾梅登也不是什么美丽的城市。正相反，依我看来，艾梅登的那些单调的、笔直的街道，更突出了它的粗陋的面貌：那不过是一个在上一世纪胡乱建造起来的讨人厌的、丧失了自然风貌的人工港湾。但是，当艾梅登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大家全都咬牙切齿，对于它的被毁，休果精神上的痛苦比任何人都要厉害。

一切都决定于一个人对于面前的房屋、街道、城市有什么样的感情。也许我对于乌得勒支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多么想，哪怕是稍稍看一眼这位巴别洛先生，"休果低声说。"这里的布尔果米斯特耳·韦尔特斯路在哪里呢？"

我们找到了一家书店。我进去买了一张城市详图。我们在公园里把地图细细查看了一番；尽管天气不好，公园里也已经开

始显露青绿了。我们必须越过一条市内旧运河到对岸去，那条在黄色地图上用红色数字标出的街道有公共汽车经过。

“我们先乘这一路公共汽车，”休果说。

我们很快找到了公共汽车站，坐上车子，一直乘到终点站。巴别洛住的那条街很长，可是说不上它是新的还是旧的，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它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街道罢了。依我看，这是乌得勒支一条典型的仿佛笼罩着保守主义寒雾的街道。303号房屋在街道的尽头。街道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不大的广场，它同样是没有特色、死气沉沉的；这里仅有的新建筑是一所邮局和一家澡堂。

我们在终点站下了车，站在那处于好多条石铺街道交叉中心的街心花园里商量了一会。花园里面几乎没有花草树木，地面上只是立着一些干枯的小树条，当然，它们在近几百年内是应当长成真正的大树的；因此，现在已经给这个地区起了个“绿色小城”的外号。

“喂，”我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先要弄清楚这个人的长相，”休果说。“办这事儿，最适当的时间是傍晚，也就是巴别洛这个坏蛋应当从局里回家的时候。当然，这是说，如果他下班以后不去忙别的事的话。譬如，半夜以后，他要到无辜的人们家里叫门，把人们直接从床上抓去审问……”

“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休果，你不用老来开导我了，我的思想早就完全集中在这件事上面了。”

休果只是微微一笑。这一整天，我们都在城郊的小路上徘徊，在一些枯燥乏味和没有行人的新建街道上溜达。这些街道上有汽车房和篱笆围起来的庭园，庭园里只有一些东零西散好

不容易才顶破灰黑色地皮而长出来的孤单得可怜的番红花……使人厌烦的细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决定到一家为汽车司机服务的咖啡馆去，想让身上稍稍干一干。咖啡馆里温暖舒适，虽然这里供应的饮料恶劣透顶，称它为咖啡，仿佛是在开玩笑。墙上挂着“禁谈政治”的牌子，可是我们周围所有小桌子旁的人们都在谈政治。显然，我们的样子不像卖国贼，因此司机们瞥了我们一眼，仍旧继续打纸牌，下跳棋，尖刻地评论着国内政治制度。

将近黄昏，我们又回到新任稽查巴别洛居住的地方。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待在邮局附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303号房屋那不宽的小回廊。房子里很久没有人出来，我们已经觉得站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大舒服了，这时屋子的大门突然开了。休果赶紧用双手遮住脸，开始点燃纸烟，一面从手指缝里瞧着。一个穿警察制服的骨瘦如柴的男人推着自行车出来了；他的黑色风衣里面还露着白围巾。这个人的神色不大高兴。他一条腿跨过坐垫，恶狠狠地一蹬便离了地；他的情绪显然比冰点还要低。休果悄悄在我背上推了一下。

“应该去叫门，找巴别洛，”他说。“那样我们就能准确知道这是不是他了。”

休果从巷子里向邮局走去，而我悄悄沿着房屋的外墙走进了303号房屋的拱门，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个少女；根据她的样子判断，这是个女仆或是外地来的亲戚。

“我可以和稽查谈谈吗？”我尽量用最文雅的上流社会的口气问道。

姑娘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似乎觉得我说这句话的口气与我的外貌很不相称，她朝警察骑自行车走了的那个方向点点头说：

“他刚刚上班去了！”

“噢，那么我到那儿可以碰着他了，”我说过便向她告别，向前朝第二条巷子走去，再从那里绕道到邮局不开门窗的那一面墙边，休果就站在那里，假装埋头看报。

“那是他，”我走到休果跟前说道。

“你看清他的面貌了吗？”休果一边问，一边把报纸叠起来。

“那还用说！他的特征我全都说得上来：笔直的鼻子，希特勒式的小胡子，低前额，深色的眼睛，嘴巴非常阔（他在斯哈耳克哈尔大喊大叫得太多了）；总之是这么一副嘴脸，就连哈勒姆公园里的努尔克斯① 和他比起来，也成为美丽可爱的太阳了。”

“竟是这样啊！”困惑的休果尖叫道。“你在讲主日学校的神话吧？这努尔克斯是什么呀？”

我笑了。

“你不要为这个伤脑筋了，休果。你知道吧，我们的巴别洛已经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清清楚楚的印象……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他搓了搓自己的面颊，似乎想断定一下，他两天没刮脸，面颊是否柔软了些。

“已经六点了。我们随便去什么地方吃点炒菜，然后尽快隐蔽起来。”

我们在一个地方吃了点炒菜，就战争时期和战时价格来说，这炒菜根本不算贵。我们吃完之后，便往城的另一端去了。

我们挽着胳膊走着，这样不致引起人们过分的怀疑，然而那些穿褐色、绿色和灰色军装的敌人对我们仍是一种危险。我感觉到休果的手枪碰着了我的肋骨；我自己则握着侧面衣袋里的武器，防备有人碰上我们，问休果要证件：要享受“义务劳动”的

① 荷兰著名作家希尔德布兰德（1814—1903）所著《暗箱》一书中的人物。

豁免权，休果的样子当然还太年轻也太健壮了。将近八点钟，我们不慌不忙地来到城郊，来到一条狭窄的运河边，沿河绵亘着破旧低矮的小屋和木棚，运河里的水在草地旁边白白地流走了。现在我们的视界里终于看不见穿军装的人了。雨住了，但是刮着潮湿的冷风；因此我愿意休果靠在我身边。这样总要稍微暖和些；他穿着冬大衣，觉得很舒服。

休果在一座小桥边站住了；桥那边是块灰白的空地，空地四周零零落落立着些木棚和敞棚。一块给雨水淋得褪了色的木板上，隐约现着字迹："范×吉尼水泥制×厂"。我正竭力猜测着，是什么样的意大利移民会在此地制造水泥。也许是些烟囱清扫工或者修炉匠的后代吧？休果悄悄对我说：

"这就是我们的旅馆。"

他扶我过了小桥。在离我们几百米以外，有两个孩子飞快地朝进城的方向奔跑着，更远一些，紧靠城边，有个人正骑着自行车火速飞驰着。戒严时间快到了。我随着休果走进了废弃的敞棚。范×吉尼制造厂完全荒废了；大概是德寇在意大利脱离"轴心"的时候封闭了这个制造厂的；他们经常在寻找机会，要从别人身上捞一把，以满足自己报复的欲望。在荷兰的无人保护的意大利人正好成了合适的牺牲品。

休果摸索到了一个小木棚的门。门上用铁丝缠得紧紧的。休果用他那肌肉发达的小手扭着半锈的铁丝，直到把它扭断。他打开木棚的门。木棚里半暗不明，满是灰尘、破桶、烂木板，脚下尽是碎砖……休果挑选的宿营地绝说不上豪华，然而我们总算有个藏身之地，而且用不着交验假证件。休果居然能巧妙地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真叫人吃惊。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昏暗，于是我看清了休果，他手指着一个小间，那里面有水管滴

水的声音。

“这是浴室，小姐，”他说。“您愿意现在就用，还是明天早晨用？”

尽管嘴里在开玩笑，我毕竟也明白，休果心里正在犯愁，他在想别的事。我在察看住处的时候，碰上了一个粗大的木槽，显然是盛水泥浆用的；我们几乎没有响声地把它翻过来，成了一条长凳。水管旁边有一扇又高又宽大的窗子；长期以来落在窗上的灰尘，厚得像抹了一层水泥。休果在木槽背后把石头和木板堆起来，最后伸直双腿深深地舒了口气。

“可惜床铺租出去了，酒吧间关了门，暖气总门也关掉了。至于其余的嘛，我们可已经够舒适的了……”

“你是个坚强的乐观主义者，休果，”我说。“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东西能使你动摇一下呢？”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略微有点做作地回答。

“这个问题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说。“每一个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连你本来也不是那种容许自己茫然失措的人呀，”他匆匆补充说。

“你这样认为吗？”我问。“这么说，你对我是满意的？”

“要是我不信任你，难道我会让你参加这个工作吗？”这一次，他回答得倒很快。

我在昏暗中笑了笑说：

“我认为你说的是恭维话，休果。”

他的回答里又可以听出受窘的意味：

“瞧你说的……我们在这里，可不是为了互相恭维。我们的任务是侦察出福斯兰德在什么地方……现在睡觉吧，汉娜……你暖和了吗？也许你要我的大衣吧？”

不接受吧，这个提议可实在太投合人的心意了。说老实话，我的确非常冷——我的风衣还没全干，寒气透过了衣服。休果拘谨地把自己的大衣裹在我身上，便从木槽边站起来。他在越来越浓的黑暗里寻找着什么，这时天已很黑，只有高高的窗子显得有点灰白，过了一会，他抱着一堆旧袋子来了。

"忘了铺弹簧垫子了，"他说着，把一些袋子铺在木槽旁边的地上；他在袋子上躺下来，把其余的盖在身上。

过了五分钟，他已经睡着了。我裹着休果的冬大衣，一直坐在木槽上，打着呵欠，打着盹。过了一会，我也躺下了，连头都蒙在大衣里，和我的战友一样睡着了。

……雄鸡啼明的时候，天还很早。我好像从昏昏沉沉的恶梦中醒了过来。我感到头痛。雄鸡……起初我还以为自己是在费利缅家里。我惊异地望着在微弱的晨光中显现出来的胡乱堆放着的木板，望着我周围的灰尘和荒废景象，最后我才记起了一切……我看看表。六点一刻。我从我那不舒服的"眠床"上朝长凳旁边的地上看了一眼。躺在袋子上的休果，正睡得安详而自然，就像婴儿在睡觉。头发垂在他的前额上。他的双手垫在头下面，一条腿微微向上曲着。在那些满是尘土肮脏不堪的灰白的袋子上，我看见了"范塔吉尼·乌得勒支"的红色字样。

雄鸡不啼了，外面一片寂静。我碰了碰休果的肩膀。他睁开眼睛，闭上，又睁开来，奇怪地朝四周看看，猛一下坐起来。他慢慢地舔了舔嘴唇，说：

"鬼晓得我嘴里是股什么怪味道！"

"卫生设备还管用呢，"我说。

他勉强笑笑，显然他想起了自己说过的俏皮话。他站起来了，浑身上下满是泥灰。

“见鬼，”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活见鬼！这算怎么回事。”

我也站起来。我们一起动手拍打他衣服上的水泥。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最后总算把这身衣服弄得像个样子。我打了个喷嚏，休果立刻用手捂住我的嘴。

半小时以后，我们又动身进城。我们在路上买了点面包和一小包人造黄油，便朝要塞围墙旁边的一条宽阔的旧式街道走去，在那里喝了一种当做咖啡出卖的渣滓，算是吃了早饭。休果到理发店去了，我在咖啡馆里等他。后来我们又开始监视巴别洛家所在的街区。我们没有看见警察本人。屋子里出来一个相当邋遢的姑娘，提着篮子，这就是头一天我和她在屋门口谈过话的那个姑娘。我急忙拉着休果进了邮局，我们从自动售票机上取出一枚又一枚二分的邮票，直到用完我们所有的小硬币。一辆市区公共汽车靠站后，又继续向前开去。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离开这个街区比较稳妥；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太像流浪者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懊丧过，我没带着自己的自行车。

我们又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家廉价小吃店里吃了午饭，饭后又继续溜达，到后来，我觉得好像已经在乌得勒支游荡了个把月。休果一直保持着毫不动摇的镇静。这一整天，他说了不到十句话。但是到了傍晚，他显得有点烦躁了。

“我们必须下决心了，汉娜……”他喃喃地说。“我们没有自行车，因此我们那一套在车上转身射击的老把戏今天是要不成了……”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们正手挽手走着。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装在车上带走，”他解释说。“或者，像美国佬说的叫绑架。”

“你怎么啦，疯了吗，休果？”我说。“要达到这个目的，起码

得有一辆小汽车才行。”

他严肃地同时带着挑战意味地看看我。

“难道我在高炉上白当了六年司机吗？”他悄悄地说。“至于汽车么……到处都有。”

我看了他一眼，明白了他的打算，我说：

“这样会有双倍的危险，休果。绑架一个人，还盗窃一辆汽车。”

“我并不是靠我一个人，”他回答得使我很感动。

“我接受这个提议，”我表示同意了。“现在你说吧，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采取这个行动？”

“现在几点啦？”他问。

“四点四十四分，”我看了看表回答。

“好极了，”休果说。“你仔细听着。如果这位先生今天去上班，也是在昨天那个时间的话，那他应该在六点差十分走出自己家门。这样，我们还有个把钟头可以用来进行准备工作……时间已经不怎么多了……汽车只有在比较富裕的街区才能找到。而且还必须选择一条便于我脱身的街道。”

“在火车站背后的河岸街上吧，”我建议说。“我记得，那里停着许多汽车。同时那边也有拐弯的路。”

“懂了。我们就这么干吧。”

我们向卡塔列伊涅辛格尔（大运河和我所说的河岸街的名称）走去。半路上，我问休果：

“你知道从那里到巴别洛家怎么走吗？”

“我干脆绕着这个要塞围墙跑，”他回答说。“我只要一到马利班，就找得到路了。”

在卡塔列伊涅辛格尔，起初遇上的尽是些德国鬼子的办事

处，时而是“Verwaltung”①，时而是“Zentrallstelle”②。在围墙附近或入口处停着些德国汽车，活像一些灰色的棺材，我们尽量离得远些，绕过去。但是在铁路局大楼附近的街心花园旁边，我们碰到了好机会。那里停着四辆小汽车。休果一眼就看中了一辆蓝色汽车。他站住，点燃了纸烟。

“你看见那边一辆蓝色车吗？”他问。“车上没有气体发生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引擎用的是人造汽油。什么人能得到人造汽油呢？是那些完全丧尽了天良的人……因此我们这个办法将会使我得到双倍的快乐。不过还有一点要先弄清楚才好：车门有没有上锁。”

我向那辆汽车走去。休果莫名其妙地盯着我。

“你干吗？”

“你避开一下。我的袜子滑下来了。”

我躲在蓝色汽车背后，装做拉袜子的样子，试着拉了一下车门。然后我回到休果跟前，他正顺从地转过脸站在那里，虽然我明知道，他早已不止一次看见过我脚上有没有穿袜子。

“没锁，”我对他说。

他那么用劲地捏了一下我的手，疼得我一声尖叫。一个骑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的铁路职工，吃惊地、甚至有点愤慨地瞪了休果一眼。

“现在你走吧，汉娜，”休果说。“你到集市餐厅旁边的人行道上等着。如果我的计谋成功了，我会开车从那里经过，接你上车。”

我脑子里突然想到，自从我和休果开始合作以来，今天头一

① 德语：管理处。
② 德语：总局。

次为了这个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预料其结果的冒险行动，我要远远地离开他。要知道，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十分钟或一刻钟以后，在乌得勒支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休果可能被发觉、逮住并带走，而这时我却不在场。我不由地看了看河岸街，看了看那险恶地排列着几辆灰色的德国汽车的地方，情不自禁地想到，一旦车主发觉自己不在的时候有人把车子开走了，就会发出警报。要知道，所有这些德国鬼子的办事处和管理局里，都会跑出全副武装的敌人来的！我已经准备要抓住休果的手，拉着他跟我走，强迫他尽快逃离此地……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克制住这个想法。休果瞧着我，他大概看出了我眼睛里的恐惧神情。

"你害怕了？"他轻声问道。

"没有，"我牙齿打着战说。

休果苦笑了：

"那你就走吧！走吧，我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的。这用不了多久。"

我朝集市餐厅的方向走了。我的脚步完全是机械的，从那些德国汽车旁边走过的时候，我竟没有注意到汽车。我经过餐厅和弗列堡街上的一些涂了焦油的木头建筑，到了桥畔。我背对着桥，站在报刊亭旁边，开始阅览《鹰》、《帝国》、《信号》和其他一些天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诽谤性的小报。我焦急地等待着，似乎我身后立刻就要响起凄厉的警笛和自动枪的射击声。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明白休果正指望着我的协助，要不然我立刻就会晕倒的。宽阔的人行道已经在我脚下摇晃了，这时我听见汽车轮胎的沙沙响声，一辆汽车在我身边停住了。我回头一看——车门已经打开。汽车里伸出一只手在招呼我。我立刻认出了这只手；我的心里仿佛有一座堤坝一下子决了口……我

几乎毫无知觉地跌坐在休果身旁的灰皮座位上。直到汽车开过不止一条街道，我才恢复知觉。休果的一只胳膊正紧紧搂着我。

“汉娜，”他说。“清醒清醒吧，亲爱的。要有理智。控制住自己。”

我害臊了。我克制住自己。我首先想起我衣袋里还放着手枪。我摸摸武器；沉甸甸的手枪使我感到有力量和信心，当然，主要是休果帮助我重新获得了自尊心……

过了五六分钟，我们已经到了我们所熟悉的街区。时间是五点半。休果先把车开到所谓“绿色小城”旁边，停在天主教堂对面。

“汉娜，只有一件可惜的事，是我没预料到的，”他微笑着说。“你瞧瞧油量表吧。剩下的汽油非常少了。”

“可我们多要它干吗，休果？”我问。

他说明了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打算，并对我作了几点具体指示。

“但愿，”他一改往日那种严肃和自信的口吻补充说，“追捕偷汽车的人还没有开始……如果在我们行动期间，我们不得不把车子还给原主，那就非常糟糕了。”

尽管我的神经非常紧张，我也笑了。瞧这个休果！这种时候还开玩笑！

六点差一刻，深蓝色汽车已停在邮局和浴室附近的街心花园旁边了，这里是布尔果米斯特耳·韦尔特斯路的尽头。我下了汽车，沿街向市中心的方向走去。我的心情已经平静了，我把双手插在外衣两边的口袋里，一只手紧握着手枪，慢慢走着。我留心听着每一辆越过我向前驶去的汽车的响声。一辆市区公共汽车从旁边开过，在离开我二十米的地方停下来。有三个人下

了车，横穿过街道。从街道的那一头，有个男孩骑着儿童自行车过来了。公共汽车开走了，而孩子却离我更近了。一家商店门前，有两个男人站在那里说话；看样子，这是两个不事劳动的小食利者。我匆匆一瞥手表：六点差十分。如果稽查巴别洛惯于遵守时间，那他应该已经在我身后了。那么，我马上就会听到休果的汽车声音了。

不到一分钟，就传来了汽车声。我站住脚，转过身去，同时向街面扫了一眼：骑儿童自行车的孩子已经转弯看不见了，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乘客还在人行道上行走，两个老头儿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聊着。长着长鼻子、留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制服里面围着白围巾的人，骑着自行车从邮局里出来了；这个稽查今天不像昨天那样怒气冲冲了。蓝色汽车紧跟在他身后。我看见休果在挡风玻璃后面朝我挥了挥手。汽车突然作了个疾速的、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前冲；汽车和稽查之间的本来很短的距离一下缩近到了极点，汽车前保险杠撞上了自行车后轮。

稽查被撞倒了。我转眼已经来到他的身旁。他倒在一边，自行车从他身下滑出去了。稽查咒骂着爬起来。他的右裤腿弄脏了，我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即发现了这一点。我看见深蓝色汽车停在巴别洛的另一边。这个坏蛋刚一站起身，我便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

“不许喊！”我对他说。“转过身去。上汽车。”

那张长鼻子和低前额的脸呆呆地望着我——他的智力发展程度显然不高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我推了稽查一把，低声喝道：

“快。上汽车。要不我就开枪了。”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反应迟钝得连个小孩都不如。但是，看起来，他那腐朽的脑子到底还是明白了，他已经落进什么样的罗

网。休果已经打开了车门。

“进去，”我第三次低声喝道。

稽查这才迟钝地服从了；可是他那呆板的眼睛里却闪了一下狂怒的、抗拒的凶光。他还来不及说一句话，我已经钻进汽车坐在他身后，用手枪顶着他的脊背了。休果开动车子。我们飞速冲出了这条街道；整个事件，尽管吓坏了的稽查动作迟钝，所费时间也十分短促，以至于一直站在商店附近谈话的两个人丝毫也没有发觉近在咫尺发生的事。

当我缴下稽查身上武器的时候，他坐着一声没响；我只听见他的粗重的呼吸。但是，看来他终于明白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了。如果说他起初是被突然的袭击弄得晕头转向，那么现在他已经完全泄气了。我不断地用手枪顶顶他的背，让他一秒钟也别忘记，他是不能耍任何花招的。

他忽然开口了。我们还是头一次听见他的声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发出的正是那种典型的德军卫队长的声调。

“流氓，”他说；我觉得他是在咬牙切齿。

“啊哈，”休果说。他的视线一刻也没离开街道，他把车开上了通往希尔弗瑟姆的大路。“稽查先生开始明白了……这很好。那么可以和他谈谈了。”

“我不和恐怖分子谈话，”巴别洛忽然尖叫了一声。“头一着你们占了先。下一步可该我了。只要一遇到德国汽车，我就喊……”

我用枪筒重重地戳了一下稽查的脊背。他住口了，刚才他还因为自己的威吓而精神一度稍稍振作，现在又有点软化了。休果冷冷一笑：

“你背后坐着的是射击冠军。她准确地知道你心脏的位置。

只要你不愿意让子弹射进头颅……”

“……也就是说，”我补充道，“射进正常的人盛脑髓的那个脑壳，那最好还是谈谈吧，皮捷尔·巴别洛先生。”

可是他再也没说什么。我稍往旁边一偏，朝挡风玻璃上方的反射境看了看，想从坏蛋的嘴脸上看出点名堂来。显然，这是个知识有限、心肠恶毒的人。看来，他正在紧张地思索着。

“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情报，”休果说。“你当然知道你的朋友格尔曼·福斯兰德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啊？别维尔魏克的福斯兰德！”

我们经过铁路道口，绕过赫鲁涅坎要塞。有支德国警备队正在一些德国大卡车旁边走着。我发觉巴别洛悄悄地抬起了头。我知道他就要叫喊了。我赶紧掉转手枪，用沉甸甸的钢枪柄朝巴别洛的后脑勺使劲砸去。

“我的妈呀，”休果惊讶地瞥了一眼垂下了头的巴别洛，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想喊，”我回答说。“喊那帮德国鬼子。”

巴别洛整个身子瘫下去，靠在了车门上。

“最好让他靠在我的肩上，汉娜，”休果说，“要是有人看见一个稽查面无血色趴在车窗上，准会感到奇怪。”

我们嘲弄了一阵，然后我竭力扳起被砸昏了的法西斯坏蛋，让他靠在休果肩上。

“文雅的社交人物，”我说。“我们的汽油怎么样啦？”

“差不多用完啦，”休果回答道。“等前面一有我看中的林间小道，我就开进去。”

他加快了车速。我检查了巴别洛的手枪。手枪备弹充足，小口径，要是装在我做的衣袋里可正合适。休果咳嗽了一声。我

朝路上看了一眼，一辆德国小汽车正从希尔韦瑟姆的方向开过来。我觉得那些戴着高帽子的人(我看过去他们是模模糊糊的)正注意地望着我们；但愿他们看我们及我们的俘虏也是模模糊糊的，同我们看过去一样。经过了惊惶的几秒钟，载着德国鬼子的汽车从旁边开过去了。休果说：

"哎哟……真的，该离开大路了……那边就是村 道。依 我看，这些地方居民不会很多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休果把车开离大路，拐上了路旁的一条林中道路。这条道路旁边还有一条路——是一条蜿蜒在果园和草地之间的柳树林荫小道，不过它的宽度还可以通行小汽车。这里的确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立即感到已经远远离开公路了。休果停住车，我们周围一片寂静。新任稽查还没有恢复知觉。休果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照着他的耳门子狠狠地揍了一下。

稽查开始眨眼了。上唇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阔嘴巴无可奈何地抖动着，发出听不清楚的声音。

"我我我……呜呜呜……"

巴别洛清醒过来了。他的脑袋不再摇摆了，而且强硬地挺得笔直，显然，他能够思考了。这一次，休果让稽查靠在车门上，又朝我使了个眼色，让我拿枪逼住他；然后，休果转身对他说：

"嗯，现在你清醒了，对吗？我再问一遍，福斯兰德在什么地方？"

我看得见巴别洛的侧面。他不再眨眼了，开始抽动着颚骨，仿佛在咀嚼。然后他简短地回答：

"我不认识什么福斯兰德。"

我和休果不约而同地笑了。休果伸手到衣袋里掏出明信片，

因为长时间的磨损，这张明信片，跟休果在别维尔魏克从福斯兰德的信件筐里拿到的时候比起来，已经有点变样了。

“好好看看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地址吧，巴别洛先生，”休果说。“这会唤起您的记忆的。”

显然，没有人教过巴别洛怎样尽可能巧妙地规避回答困难的问题。

“我不认识什么福斯兰德，”他重复说。可又率直地补了一句：“就算我现在认识，我也不同下流的恐怖分子谈话……”

“不是‘就算我现在认识’，是‘就算我过去认识’，”我纠正稽查的话。“‘人民与祖国’协会里的人，说荷兰话大概是很费劲吧。”

他奇怪而敌视地看看我。

“还是个毛丫头呢，”他沉默了片刻之后说。“也来过问政治，你怎么不害臊……哼……我可明白！”

他用那么卑劣和猥亵的眼色瞟了我一下，这引起了休果的干涉。休果照着稽查脸上打了一拳。

“只问你一个问题，下流坯，”他压制着嗓音说。“福斯兰德在什么地方？”

稽查喘起来了，血从他的鼻子里流了出来。

“恐怖分子，”他说着，又吸了一下鼻子。“可别以为你们逃得了惩罚。我还要亲手宰了你们……而且不止你们两个。”

“这一点我不怀疑，”休果回答说。“不过还是得谢谢你的自供。我的问题还是那一个：福斯兰德在什么地方？……给你十秒钟时间。”

稽查用手背擦去鼻血。休果那青铜色的脸似乎凝然不动了，他仍然在控制着自己，但是我听出他的声音在发颤，我明白他快

要忍耐不住了。

“十秒钟，”他重复说。“我开始数了。”

于是他开始清晰地数着数目。稽查沉默着。当休果数到七的时候，巴别洛企图作殊死挣扎了。他从座位上往起一窜，脑袋差点撞在车顶上，接着便从前座的靠背上面向我扑过来，要夺我的手枪。瞬间，我脸上感觉到了他的气息，他好像一只狂怒的大猫；从他那丑恶的嘴巴里喷出了一股血腥气。他的一只青筋暴露的长手不顾死活地来夺我右手上的武器。自然，这是决不能让他得逞的。我迅速抬起左胳膊肘，推开稽查的大脑袋；他发出呼哧呼哧的怪声。休果照巴别洛的脸上又揍了两拳。巴别洛长长的上半身在座位上晃了晃，便朝前倒了下去，于是他的头颅顶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了。

“该死的蠢货，”休果骂了一句。“他把你碰疼了吧，汉娜？”

“没到这地步，”我回答说。

休果的眼睛忽然热情地看了我一下。他没说什么，又向被打倒的敌人转过身去。

“巴别洛，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他问。那个低垂着的脑袋正在呻吟。“福斯兰德在什么地方？”

“比尔特霍文……”卫队长式的男低音出声了，虽然这声音现在几乎完全走了腔。可稽查显然还是不能摆脱他那强盗习气；盲目的、顽固的复仇欲望主宰了这个纳粹分子的肉体。我们还来不及醒悟过来，巴别洛已经握紧他的大拳头直起身来……我看见休果弯了一下腰。我几乎是本能地迅速采取了行动。我把手枪对准巴别洛的头部连开两枪。在狭小的车厢里，枪声听起来短促而喑哑。巴别洛的阔嘴巴张开了。他向休果那面倒了下去，休果抱住他，随手把他放倒在座位上。

“这家伙再也不会说话了，”休果望着被打死的稽查说。

“是呀，”我沉重地喘息着回答，把手枪藏进了口袋。“他再也不会说话了。而且也不会告诉我们福斯兰德的地址了。”

“比尔特霍文，”休果说。

“你以为这可靠吗？”我问道；我仍在为匆忙开枪的结果担心。

“这个我们很快就能查对的，”休果答道。他朝稽查的尸体弯下身去，在尸体上搜索。他从制服胸前的口袋里搜出一个皮面的小笔记本。他把笔记本拿给我看。在他翻阅小本子的时候，我也在他的肩膀后边看着。那是一些公务指令，一些谈话记录，但是没有注明是和什么人谈的，还有一些帐目数字，最后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通讯录。

“你看看‘福’字开头的部分吧，休果！”我建议说。

他查看了一下，但是在“福”字部没有一个姓福斯兰德的。休果搔了搔耳朵。我默默地坐着，竭力要想出个办法来。

“我这样想，”我说。“如果福斯兰德真的在比尔特霍文，那么大概就是在他和巴别洛都认识的一个朋友那里。你再看看，本子上有没有住在比尔特霍文的人。”

我们翻阅了全部通讯录。结果发现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住在比尔特霍文的人。休果从巴别洛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把这几个姓全抄了下来，这些姓本身并没有给我们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它们旁边没有任何附注。休果皱着额头又把抄录的小纸片看了一遍。

“嗯，”他说。“谁能说，这里记着的全是这个混蛋的熟人或朋友的名字呢？谁能说，这些人不是他正想要消灭的那些人呢？”

我耸耸肩膀。“我们只有到比尔特霍文才能弄清楚，休果。我们应该今天就去……况且，我已经讨厌这个混蛋了，正如你说的。干掉一个害人的鹰犬，这是令人愉快的场面，但是如果被消灭的家伙就躺在身边，就像这个坏蛋这样，那么，说实在的，同这号人靠得这么近你是忍受不了多久的。”

休果仰起头无声地笑了。

“好极了，”他终于说道。“嗯，我就像在听弗洛尔或托尼讲话似的……不过你说得对。我们到比尔特霍文去，那地方也许离这里不远。”

从前，我曾和双亲一起在比尔特霍文度过一个夏天，现在还能想起那些狭窄的林间小径，浓密的林荫道，花园，丘陵起伏、遍生石南的荒野。自从那时以来，大概有了许多变化；城郊地区早在战前就扩展得很大了。

“一点也不远，”我说。“但是戒严时间快到了。我们又该隐蔽起来了，休果。”

休果已经从车窗里观察了四周的情况。我们周围依然是太太平平的，静悄悄的。公路上一些德国大卡车在轰响；我听着汽车的低沉的隆隆响声。笨重的汽车在向东方开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我们下了汽车，并且竭力不出声地关紧车门。我们的左方有一只狗叫起来。休果看了我一眼：“我们不能朝那边走。”他环顾四周。“见鬼的白天这么长！交通很快就要断绝了，可你一直还没个躲处，谁都可能看见你。”

他跳过一道水沟。“我们从这些园子里穿过去。总能找到个合适的藏身之所的。”

我也跳过去了，不过是他扶着我拉了一把才跳过去的，我跳

不了那么远。我们在一块块耕地和贫瘠的草地之间步履艰难地走着，寻找可以躲藏过夜的地方。

我心想，休果真像个猎人——他那么无声无息地向前走着。他整个身体如此精干，像是一直在敏锐警惕地倾听着。奇怪的是，在这个出生于海港城市、曾在高炉上工作并在驾驶室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身上，竟保持着这么多天赋的真正的美。在我们并肩行走的时候，我时常观察他。他是我的指挥员。我记起了弗洛尔带我去找休果的那一天……当时我曾坚持只能在平等的原则上和他一起工作……他一直遵守这个条件；然而我早已有了这样的感觉，没有休果，老实说我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此刻，他身上似乎体现了我所珍爱的一切：友谊，对占领者的仇恨，党，抵抗运动的斗争，我的生活目的……他大概揣测到了我时时向他投去的眼光的意味，揣测到了我在想些什么。他看了我几次，有时含着微笑，有时又有点儿发窘。

但是他马上又专心地研究地形了——我们的右方和左方都是小农牧场，光景相当荒芜，至少在阴暗潮湿的傍晚看起来是这样。

“那边有个小木棚，”休果说。“在红顶小房子旁边。如果那里没有狗，我们就钻到那里去。”

也许那里本来有狗的，不过我们没有发现狗。小木棚是个类似储藏室的地方：里面放着些农具、手推车、农民们夏天放牧时常用的牲畜喂水器，还堆着些麦秸。我们走进木棚，休果把两个喂水器叠起来，堵住了门。木棚里散发着一股畜粪和泥污的气味，而当我们最后摊手摊脚躺在麦秸上的时候，有两三只田鼠窸窣窸窣在我们身边跑过。我感到累得要命；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你暖和吗？”在昏暗中听见了休果的声音；这里的昏暗，比前一天在乌得勒支另一端的范塔吉尼水泥制造厂的更浓，——那水泥厂，现在似乎已经相隔很远很远了……

“好极了……”我瞌睡沉沉地说；疲劳和麦秸的闷人的温暖已经起作用了。

“我觉得好像在家里似的，”休果说；我知道他是在想念着费利缅家的木棚。

“你说说，他们找到巴别洛和汽车了吗？”我用梦呓般的声音问道；我闭着的眼睛前面又一次闪过了我们今天游猎的情景。

“当然没有，”休果回答说。“在报上你经常可以看到：‘某地农民某某，清晨在其粪堆旁之水沟中发现中弹尸体一具……’等等，等等。”

“‘此乃恐怖分子所为’，”我接着说。“‘为反对占领当局而采取此等流血行动，系对建立法律秩序之无耻破坏’。”

我们躺着，悄悄地笑着；我浑身都感到温暖，像盖上了一床看不见的大被子；我觉得我的神志也被迷雾蒙住了。

“将来，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时期，汉娜，我们会怎样想呢？”休果问道；他的声调使得我的睡意顿时消失了。

“我们将会想到，至少我们已经做了些给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造成损失的事情，”我回答说。“这是我们的人民和所有正派的人所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指的不是这个，”休果说。“我在想，我们的子孙后代未必会相信我们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走路的时候，口袋里装着手榴弹，我们使用手枪，就像装配工使用螺丝扳子似的；我们爱好和平的公民们，会进攻监狱，盗窃汽车，睡牲口棚，跟踪追寻卖国贼……”

“休果，后代甚至无法想象，曾经有过卖国贼这样一种人，”我说。“他们将根本无法想象这一切：恐怖手段，追缉搜捕，迫害犹太人，把人流放到德国去服劳役，集中营……”

“……还有那些年轻的女狙击手，她们本该继续求学的，”休果插嘴说，他的热情的话语又使我深受感动。“想想那些为了参加抵抗运动队伍的战斗而自愿离开双亲的儿女们……”

“还有那些工人，十几年来他们每个周末老老实实领取一个装着工资的封包，”我说，“那些原先默默无闻，而现在忽然成了游击队员和人民英雄的人们……”

“说这个干什么，”休果沉默了一会以后开口说。“到公元两千年，人们会怎样想象我，反正无所谓。只要他们幸福，只要他们永远不再受到饥饿、战争的威胁就行了。依我说，即使他们永远都想不到我们也行……”

我沉默了。我不能像休果一样说得这么朴实，说得这么好。事实上，我也很少关心，在公元两千年，人们是否会想到休果和我，想到我们为反对奴役我们的万恶制度而进行的一切斗争。我知道，将来人们确实会是自由和幸福的，人们不会再担惊受怕。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握着手枪躺在这里，而在另一个地方扔着一个受到了制裁的、被我打死的强盗。这种制裁，是由成百上千个地下战士与我一起执行的。制裁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我非常担心我们在比尔特霍文能不能找到福斯兰德，”我说。

“明天吧，明天吧，”休果简短地回答。“你先休息，从你的声音里，我听得出你累了。”

我忽然间感到自己是弱小的、受屈的、被所有的人抛弃了

的。于是我向休果伸去一只手。我在麦秸上徒劳地摸索了一会儿。后来我摸到了休果伸给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碰在一起了；休果是非常有礼貌的。他谨慎地、怜爱地握握我的手。

“你在我心目中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啊，”他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

最初我曾想要把手抽回来，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反而把身子更挪近了些。我很想在黑暗中找到他的脸。我终于找到了。我用手抚摸着他的面颊。我突然发觉他一声不出，连呼吸也屏住了。我在他面颊上温存地抚摸了几次，后来又去抚摸他的头发……这是我很早很早以前就想要做的。先前我没能做和没敢做的事，眼下在这里，在这满是灰尘的昏暗中，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农家的木棚里，已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事了。我听见了休果的低语：

“汉娜，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爱你，”我回答说。

我突然想到，我们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以各种方式互相表达爱慕之情了。然而现在，当我袒露自己的心声时，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我发觉我的心跳得十分剧烈。我不知道休果的心情怎样。他比我年长些。也许他已经爱过某个女人，甚至还可能是几个。我只知道，他的事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很快抽回手来，翻了个身。

寂静无声了。我听到的只是休果的呼吸——不均匀的和沉重的呼吸。最后他说话了：

“我不大理解……”

我把发烧的脸埋在麦秸里回答：

“我多么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可是在战争没有结束，我们

没有获得自由之前，我不愿意再谈这些事……”

又是寂静无声。我又听见休果沉重的呼吸。经过长久的沉默之后，又听到他压低了的声音：

“我对你的理解正确吗，汉娜？”

“是的，你对我的理解完全正确……你永远记住这一点吧，休果。可是，只要荷兰国土上还有一个德国强盗或者卖国贼，你就不要再提这件事。”

麦秸在他身子下面沙沙响了好久；我好像看见他在激动，看见他在艰难地克制自己。

“晚安，汉娜……”

“晚安，我亲爱的，”我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个都醒得很早。休果尽量不看我。他撤掉了挡门的东西，把门稍微打开一点……一道金黄色的、柔和的阳光从门缝里射进来。一股浓烈的泥土香气扑鼻而来，因而我觉得，这种熟悉的气息对我是一个美好的预兆。

“到底是春天了，”休果说，他还是没看我。我从麦秸里爬起来，把衣服拍打干净，用小梳子梳了梳头发。

我们把门打开，走出木棚，越过草地。好像没有人注意我们。雄鸡在啼，狗在叫，一头看不见的母牛隔着绿篱在哞哞叫。太阳在晴朗的天空照耀着。和风吹来，透进了衣衫。笼罩着树木和灌木丛的青色薄雾似乎变浓了。清晨的空气使人神清气爽。

“我想吃点东西，休果，”我说。

“商店还没开门，”他回答道。

村道上是宁静的。我们遇见几个过路人——一个送牛奶的，随后是一个坐在粪车上的农民和两个孩子，在这些人眼前，我们

沉着地慢慢走着。看来，在他们眼中我们既不奇怪，也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大概我们的模样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变得很像真正的流浪者了，不过这丝毫也不会给我们对穿军装的奴役者进行的斗争增添什么特殊好处。

“我真想洗个澡，休果。从头到脚洗个痛快！”我说。“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

“我也这么想，”休果附和说。“还有——刮刮脸。”

我们找到一家咖啡馆，它的样子很像从前的关卡。除了人所共知的咖啡代用品，——在所有各处的小咖啡馆里，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尝过多少内容相同而名称各异的代用咖啡，——这里还凭券供应面包，我们俩一人一片。休果问他们要点小吃，并且亮出钱来，他们才又给了我们一点家制的干酪。几天以来，这是我们头一次名副其实的早餐了。咖啡馆的老板看样子是个农妇，她好奇地瞧着我和休果，不过什么也没问；占领已经持续得够久的了，人们已经习惯于约束好奇心和保持缄默。大家只是谈谈天气，谈谈盼望已久而终于到来的春天。

当大多数人开始一天的工作的时候(不论这有多么奇怪，生活大体上还是在延续着，而且看来还平平稳稳——这正是后代人未必能理解的)，我和休果已走在一条自行车小道上 这条小道是沿着林边和沿着比尔特霍文正在建造房屋的城郊延伸的。一块画着白色自行车的天蓝色牌子又使我想起了我的自行车，它与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是那样密不可分。我怎么能没有它呢！一个邮差骑车从旁边过去了。附近大概有所学校；我们听见了孩子们的歌声。小道边有一条用几乎没刨的连皮松木板做的长凳。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晒太阳取暖。休果不敢把大衣解开——大衣的暗袋里放着手枪。我看见他的脸已经晒 红 了。他 在 喘

气。

“这种鬼天气……”他埋怨说。“昨天受阴雨天和不顺手的罪，今天又热得烤人……”

“可你还得捍卫我们享受这种天气的权利呢，”我说。

休果茫然地看了我一眼，而后他笑着摇摇头——他显然不知道该怎样答复我这个尖刻的责备。他取出从巴别洛的小笔记本上撕下的那张纸，上面有他抄下的住在比尔特霍文的人名，摇头晃脑看了一遍又一遍。

“什么线索也没有。我们怎么办呢，汉娜？”

他问我要主意，这可是少有。

“首先要弄到人名地址簿，查明这是些什么人，”我说。“也许，我们可以利用邮局里的电话簿吧？”

休果赞同地点点头。我们尽可能沿着盖起了房屋的城郊行走。我发现我记忆中的比尔特霍文大大地扩展了，它的四周新辟了不少林荫道，新造了不少房屋。我们不能绕过铁路道口，不得不从那里走过。在我看来，我们遇上的穿军装的人太多了。这是很自然的——苏斯特堡机场、阿麦斯福特兵营……整个地区满是占领者。我发觉一个武装德国鬼子朝我看了很久，我又挽住了休果的胳膊。我很高兴，铁路道口并没有关闭。我们仍旧小心谨慎，慢慢穿过小广场，朝邮局方向走去。邮局旁边有一家挂着松糕广告的咖啡点心店。这次我先争取主动，我让休果到咖啡馆去买好茶和松糕（他身上有面包购买券），自己便到邮局去了。邮局设在一座亮堂而凉爽的新楼房里，那儿有几个电话间。我走进迎面头一个电话间，看见里面确实有当地的电话簿，我便关上了门。我翻开电话簿，先查看抄在我手中纸片上的人有没有电话。五个人之中，三个人有电话。除此之外，我又发

现了几条有用的线索。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叫做范·德尔·贝尔先生的电话号码，此人是乌得勒支商业银行的经理。在此以前，我和休果都没有留意这个人的情况。我想起了巴别洛信中的"范·德·贝"几个字。第二个发现也很有用。有个姓梅克林克的，我在一本封面上注明一九四〇年印行的电话簿里找到了他的地址，他是国家警察局的伍长。稽查巴别洛和警察伍长梅克林克！……第三个电话用户是个姓汤谢特的鞋店老板。他就住在附近的多尔普斯特拉特街。

记在巴别洛小本子里的人，全是些纳粹分子，这大概是无可怀疑的了。不错，还有两个人，一九四〇年的电话簿里没有列入。可是我认为，既然查明纸上抄着的其余两位先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的今天已经有电话，那么对于他们的政治罪行同样也是不会有怀疑的余地了。我走出电话间，向钢框镶玻璃的办公室走去，那里坐着一个电话问讯小姐。

"我要找两个人，你们的电话簿里没有，"我说。"他们姓缪尔霍弗和斯内特斯。我想给他们打电话。"

小窗口里边有一个面色苍白戴眼镜的姑娘，她和气地对我笑了笑。

"缪尔霍弗和斯内特斯……对，现在他们已经装上电话了，"她几乎立刻就作了答复。"您注意到没有，我们的电话簿是一九四〇年印行的，所以您找不到他们。"

"噢，"我假装莫名其妙的样子说。"您的意思是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参加运动① 吧？"

姑娘有点尴尬地笑笑，好像承认她过于信任我，因而无意中泄露了秘密。

① 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法西斯党）。

“也可以这么说，”她答道。接着很快又补了一句：“您要和他们中间的哪一位通电话？”

“我想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我仍然用那种平静沉着的声调说道。

她全给我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我不慌不忙地向出口走去，在一块公告牌前站了一会儿。牌上贴着“党卫军”和其他组织招募“勇敢的”荷兰青年的传单，只有那些失意者和无赖（他们甚至不配称为荷兰人）才去参加这类组织。然后，我才缓步走过广场，进了咖啡馆，在一个暗角里找到了休果，帮着他对付了三块淀粉味非常重的松糕，接着我又喝了点茶，那茶叶绝不是出自爪哇的。我顺便把我查询到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

“好极了，”他说。“一定也都是那一伙的。如果我们的推测是准确的，那就是说，福斯兰德就躲在其中一个人的家里。”

我们继续待了一会儿，默默地吃完了松糕，喝完了茶，随后付了钱，便出来在阳光下行走了。

此刻，天气突然放晴，休果身上的冬大衣看起来自然是可笑的。行人都不穿大衣了。有些上了点岁数的有钱的男子，大概是决意要隆重庆祝春天的到来，已经惹眼地穿上了淡色法兰绒裤子。休果稍稍放慢了脚步，斜瞟着一个铁路道口，这个道口设在一条宽阔的公路上，它也许是个陷阱。我朝另一边看了看。

“那边好象还有一条小道，它的尽头有个弹簧栅栏门，”我说着，模模糊糊回忆着……“我们去看看吧。我也不大高兴走这个道口。”

我们找了一会儿，找到了栅栏门。附近没有别的人，只有一个铁路工人在线路上干活。我们越过铁路线，到了城边。

在这里，我们立刻就发现，那些美丽的、看上去那么纯洁的

林荫道上，满是穿灰色、绿色和黑色军装的敌人。他们占据着的房屋，像是些办事处；一些传令兵在里面跑来跑去，皮鞋后跟碰得咔咔响，听得见打字机的嗒嗒声和穿军装的老爷们的吼叫声。有些别墅——从它们的外观上判断，很可能是从前的孤儿院或疗养院——的阳台上，躺着一些军官，他们没有穿制服，可是穿着靴子。我们首先找到了斯内特斯住的地方。他住在一所盖着田园式芦苇房顶的新建郊区小房子里，旁边是个伪装成农家茅屋的汽车房；我们看了看门边的牌子，知道他的社会职业是建筑材料商。

"我明白了，"休果低声说着，躲进了沿着长长的林荫道生长着的松树后面。"斯内特斯这个坏蛋，给自己挑选了能够大把捞钱的政党和职业。赚钱是不成问题的了！"

我们谨慎地退到松树后边。

后来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地点，这是我已经开始称之为"范·德·贝"先生的乌得勒支商业银行经理的住址。这位先生的公馆前面有铁栅栏围墙，里面有荷花池、针叶树、假山和白色长凳；他住在一幢古老的领主大宅第里，那里的法国式窗子关得紧紧的；房子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已经有好多日子没有人进出了。我们从容不迫地从这幢豪华的住宅旁边走过。休果一边走，一边卷纸烟。

"怎么样？"他问道。"现在你还说法西斯使我们的人民破产了的话吗？"

"没错，是使人民破产了。然而不是使那位先生，"我回答道。

休果舔了一下纸，粘上纸烟，在身上摸索火柴。

"要是把这一大片全浇上煤油，从四面点上火烧起来，我才

痛快哪，”他说。“连爸爸、妈妈和所有的家人都一起烧掉。”

“爸爸、妈妈和家人，我们的确可以惩罚惩罚，”我说。“不过烧掉房子未免太可惜了，休果。战后它也许会成为富丽堂皇的病弱儿童疗养院的……”

“你对病弱儿童的贡献会是很合适的，”休果讽刺说。“你也考虑考虑，这为什么不能做抵抗运动战士的休养所呢？专门供那些为追逐卖国贼而弄得头昏脑胀精神失常的战士们享受。”

我一听就忍不住笑起来。休果异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还不知道‘范·德·贝’是不是卖国贼呢，”我说，“可你已经在考虑怎么惩罚他了。”

“但是那两个人……他们姓什么来着？斯内特斯和缪尔霍弗，我们一定会证实他们是卖国贼的。要知道他们都是巴别洛的熟人。你别忘记这一点，汉娜。”

我们在比尔特霍文浓郁的林荫道上转游了一整天。其余三个地点我们没有找到，它们大概是在铁路线的那一边。我们穿过栅栏门，第二次横越了铁路线。我们很快就在多尔普斯特拉特找到了鞋商汤谢特住的地方。我们走进一家面包房买面包的时候，顺便打听了缪尔霍弗住的那条林荫道，原来这是个煤炭商，他就住在泽伊斯特——乌得勒支公路边。梅克林克住的街道，在铁路那一边，也就是在城市的中心区。这是一条沙石林荫道，蜿蜒通过遍生蕨类植物的树林；在林荫道的一边和马路平行建有房屋。自行车道几乎紧靠房屋的窗子。

我们来到了绿荫如盖的、幽静的、盖着小别墅的林荫道的路口，互相对视了一眼。

“我们还要回到这里来的，”休果说着就往回走了。我们又朝火车站走去。一些德国汽车来来往往喧嚣着。商店里有很多

军人。决不能说，我们在这个小小的住宅区会感到很舒适。

“喂，休果，你认为福斯兰德会躲藏在什么地方？”

休果慢慢地摇了摇头：

“我想，在这座大住宅里不会有希望……即使‘范·德·贝’先生也是纳粹分子，他也不会容忍像福斯兰德这样的坏蛋踩上豪华的摩洛哥地毯，更不会让他睡在满是绸缎的床铺上……”

“这也许是对的，”我说，同时微微一笑。“‘人民之友’常常是各种各样的。”

我们第三次通过栅栏门。我们想吃东西，可是戒严时间就要到了。我们离开了建有别墅的林荫道，走进树林深处。太阳已经西沉了，但还是很暖和。最后我们走到了一道又像水沟又像沙坑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松树的香气。休果诅咒着天热，把大衣脱下来铺在地上。我也把风衣铺开来；我穿着厚绒线衣正好。我们仰面躺下来，瞧着天空——空中几乎没有云彩，只有些细长的银色云丝飘浮着，它们忽然变成了红色的，然后飘散开来，最后消失在逐渐变暗的碧空里了。

我看见休果睡着了。一只苍蝇在他头上嗡嗡地飞着。我捡起一根干树枝，把苍蝇赶开。可是苍蝇又飞了回来，于是我又赶开它。这样重复了好几次，直到睡意控制了我。我看了看表。天已经开始黑下来，八点多了。星光越来越清晰明亮。列车在轨道上隆隆行驶，在调动德国国防军的士兵，运走掠夺来的财物，输送军事装备。看来另一种生活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了！然而一切都要改变……总有一天……一切都将成为另一种样子。我们人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过另一种生活。我的生活也要变的。我看了看休果，虽然我的眼睛已经困得睁不开了。昨天我曾向他道过晚安，甚至还说了“我亲爱的”。此刻我只能

在心里这么说了。他呼吸均匀，甚至在睡梦中还微笑——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我非常想把面颊紧贴在他的面颊上。可是我没挪动地方。我最后看见的是休果的脸。

第二天，我们一整天都在寻找铁路线那边的两个地点。“范·德·贝”那开着阴森森的窗子的大宅第四周围着接连不断的墙，看来是难以潜入的。我情愿打个赌，福斯兰德不会躲藏在那里面。然而休果认为，在房屋后面，花园的深处，可能有园丁的小屋子。我们从那一面侦察了花园，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小屋子。

“‘范·德·贝’先生一定在休假，”休果说。“我以为，他在贝希特斯加顿[1]……很多发了财的王八羔子，常常到那里去接受任务……或是领取勋章。”

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筑材料商斯内特斯的住宅上了，——这家伙，仅仅几年时间，就从一个甚至连电话都没有的默默无闻的微末小人，一变而成为拥有郊区房屋的暴发户了。在这里，在这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要慢腾腾地游逛着而不惹人注意，确实要困难得多了。这里花园一个紧接一个，中间没有荒地或林带相隔；站在一幢房子旁边便可以看清邻近的房屋。早上，我们看见一位太太坐一辆灰色汽车从汽车房里出去，中午前后便回来了。这以后，又有一个矮胖子拿着手杖和雪茄从屋里走出来——他显然竭力想给自己增添些贵族气派。他朝铁路道口去了，大约一小时以后回来，手上的雪茄已经没有了，但是腋下挟着一叠信札。

后来我们看见太太和矮胖子坐在凉台上喝茶。就他们两个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人躲藏在他们那里。可是我总以为，

---

① 德国城市。

如果坏蛋知道有卖国贼的庇护，他就用不着这么拼命躲藏了。

白天要过去了。我去张罗食物——买面包和人造黄油。傍晚，我们又向树林漫步走去，不过是在公路的另一边。

“不走运，”休果说。“我告诉你，福斯兰德不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越过铁路路基，汉娜。到危险地带去。”

休果那晒黑了的双颊，两天来已经长满了胡子。而我也够脏的了，看着衣服和手，自己都不能不难为情。这天晚上，我们又一次大着胆子出现在人们眼前：住宅区边缘有一家不大的饭店。我们进去，坐在回廊下喝了一种冒充柠檬水的酸味饮料，我当场就觉得胃痛了。我在厕所里洗了手和脸，可是我精神上并没有因此感到多大的满足。等我们又潜入了树林，休果有点担心地看看我，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不舒服？”

“有一点儿，”我随便地说。“要知道，我们有三四天没脱过衣服……不过最糟的还不是这个。你想想：我们搞错了，巴别洛撒了谎，福斯兰德根本没住在比尔特霍文。”

“这我们明天就会弄清楚的，”他气冲冲地说，好像他知道得比我多！

裹着大衣睡在露天地里是寒冷的，但是痛快。早晨起来腰酸背痛，不过我稍微活动一下，疼痛就消失了。我们在比尔特霍文的第三天，和以前两天一样，仍然没有结果。我们又越过了铁路。我们没敢公开在多尔普斯特拉特露面，只是谨慎地在附近徘徊。我们弄得疲惫不堪，汗流浃背，为事情没有成效而懊丧。我们仍在树林里休息，不过已经另外换了个地方。我们竭力互相掩饰着自己的情绪，虽然我们风尘扑扑的满是汗水的脸上已经相当明显地流露出各自的心情。我们的饭食是面包，几个干

瘪得可怜的苹果（好水果全都整列整列火车地运到德国去了），还有一小包我在一条林荫小道上的小铺子里买到的干酪。买这点干酪的时候，老板还阴沉地凝视了我好久，因为我是个碰巧了的顾客……我们在缪尔霍弗的别墅附近徘徊了几个小时，这座别墅面对煤栈。然而在进出这幢房屋的人中间并没有福斯兰德。多尔普斯特拉特的情况丝毫也没有变得对我们有利一点。我们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对鞋商的店铺监视了一些时候，但是一发现有两个穿当地法西斯军装的青年走进咖啡馆，我们便只好悄悄地溜了出来。他们向摆在离我们刚才的坐位不远的弹子台走了过去。我们在工人住宅区徘徊了一会儿，这个住宅区在铁路线外边，盖的全是一式的方形小屋；和那花园和别墅环绕的浓郁的林荫道比起来，这个工人住宅区给人一种枯燥、甚至是无精打采的印象。然而在所有这种平凡里，可以感觉出某种可以信赖的——虽然只能意会的和谐与亲切。这使人感到了安慰。

“晚上我们能在这些小屋子里过夜就好了，”我无意中说出了心中的愿望。休果惊异地看看我；看来，他脑子里也闪现了类似的想法。

“他们的日子不会过得怎么好的，”他没看着我，缓慢地说起来。“多少父亲和儿子被弄到德国去了；有些是受了骗，有些是被强拉走的……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参加了抵抗运动……”

“本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我一样参加抵抗运动的，”我回答说。“他们各有各的做法。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强烈仇恨德国强盗。他们有的散发报纸，有的在自己家里搞掩护，从而支持了大家的信心……”

“可他们知道信赖的是什么吗？”休果唠叨着说。

“看你今天的情绪低沉到了什么地步！当然是信赖整顿得比较好的社会罗。信赖美好的、更加完美的世界。共产党人有责任向他们指出，应该怎样来建设这个新世界。”

休果点点头：“对，对。我常常努力在想象，该怎么来达到这一切，汉娜。那些代表旧世界的人，是狡猾卑鄙老于世故的。他们只知道欺骗人民……你回忆一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吧。当时的问题是这样：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得！那时每一个帮助红色政权的人都了解，那是关系到他们生活和幸福的事业。可这里呢？……我们昨天的老板们甚至到现在还在欺骗自己的工人。他们乐于利用纳粹的劳动条例，好把工人握在掌心里，要不就是帮着把工人们弄到德国去。这工夫还口口声声对工人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们好。我们是尊重你们的利益的……他们的卑鄙计谋就在于：用虚伪的诺言引诱工人，剥掉他们三层皮，付给一点少得可怜的钱……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扫除这一片国土上的垃圾，正如你自己说过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荷兰。而跟资本家们在一起，你永远也不用想建立得了更加完美的世界秩序。对资本家来说，战争以及与战争有关的一切，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做生意……是迅速而且大量赚钱的机会……这正是应该把他们淘汰的又一个理由！”

休果从来不曾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我只是坚决地点头表示同意。

“这一切说得都对，”我说。“可是你也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一切打算，随时都可能被推翻……被创造历史的人们所推翻……被我们转入地下的青年们，被那些或是独自作战、或是召集人们从事护航的‘自由海员’们所推翻；被敢于组织两次反对德国强盗的大罢工的工人和农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很

快就要回家、已经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人们所推翻。光复以后，他们将会说荷兰应当成为怎样的荷兰。其余的一切全都是胡说八道！”

休果轻轻吹了一下口哨。

“其余的一切全都是胡说八道，”他重复道。“有意思！我很想知道，汉娜，你过去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我笑了：“当然不能。那时我只会想出许许多多各种各样非常复杂和故弄玄虚令人费解的空话，来论证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生活教会了我，休果……一切事物，谈起来，是可以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达的；况且，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做。人，是最复杂的创造物，然而人的最高深的思想，也和雨或者阳光一样，是自然现象。如果你一手拿着法典，一手拿着逻辑学教科书，来论证某人应该做一个诚实的、正直的、正派的和大公无私的人，那么你就糟了。正派，这是人固有的本性。这是人所必需的，犹如需要空气一样。因此，当我们身旁出现一个纳粹分子或卖国贼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觉得空气被毒化了。”

“这是对的，”休果半嘲笑、半称赞地望着我说。我被他看得脸红了。

“是这样嘛，”我生气地说。“你完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扶着木栅栏的手上。

“我明白了，”他说。“我十分吃惊，你把问题的本质解释得这样透彻。”

我很热，他的目光、他的握手的动作、他的语气都使我生气——我觉得这一切使我变得温顺和软弱无力了。

“可今天的问题在于，”我断然说道，“要抓住告密者，休果。

你看，我们在这里闲待着。而在这同时，那个早就该躺在一米深的地层里的坏蛋，却在这个地区逍遥自在。”

休果持重地笑了笑：

“他会躺到地层里去的。你说得对，汉娜。咱们走吧。”

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小道上，横穿过多尔普斯特拉特街，重新在阳光照耀下的不宽的林荫道上行走了，这些林荫道的背后，有一幢我们还没有侦察过的房屋，它是属于警察伍长梅克林克的。

我们试图接近一条邻近的林荫道，从那里可以望见盖起了别墅的带田园色彩的近郊地区的风景；警察梅克林克就住在其中的一幢别墅里。可是他房子前面的林带很宽阔，我们无法看见进出这幢别墅的人。下半天，我们往回走了，热得难受，事情的不顺手也叫人懊丧，我们又跨进了咖啡点心店的门槛，那里窗前依然挂着那块牌子：“松糕”。真可笑！招待我们的姑娘穿着整洁的黑色外衣，系着白围裙；几个盛装的太太在自由自在地喝着咖啡，仿佛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没有战争似的，而这场战争与以往的一切战争相比，以往的战争好像全都成了天真的玩笑……在这个咖啡馆的角落里，坐着浑身肮脏、满脸尘土、外衣里面怀着火器的休果和我，而和我们近在咫尺的街对面悬着卐字旗的“司令部”里却有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些荒唐和罪恶的矛盾，忽然使我感到怪异非常，于是我把茶和松糕推到了一边。

当周围开始了意味着人已归家、畜已入舍的寂静时，我们正躺在长满蕨类植物的树林里。我们必须悄然无声地躺着，因为周围都是人家。我产生了也许是愚蠢的忧虑：如果有人拿着望远镜站在窗口或是阳台上，在柔和的夜色中观察树林，那就会毫不费力地发现我们。幸而没有一个人想到拿望远镜站在窗口。

柔和的夜色笼罩着大地，逐渐逐渐把我们完全吞没了。

“我该走了，汉娜，”等到静得就连小甲虫在干松针下面的地上爬动的沙沙声也听得见的时候，休果说。

“你能找到我吗？”我问。

他拍拍我的肩头说：

“当然。你注意听着我的声音。我一吹口哨，你就来帮忙。”

天差不多完全黑了。松树的树冠遮住了天空，在我头上形成了毛茸茸的、不住喧嚣着的帷幕。我集中视力，试图透过更黑暗的、低矮的蕨类植物丛去注视休果。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躺着，等待着，暗暗钦佩休果能如此轻捷。我多么希望他吹一声口哨，好赶紧去帮助他。我知道，如果没有他和我在一起，我是忍受不了的。同时我还希望知道，他是不是也对我怀着同样的感情。

好一阵子，周围一片静悄悄，虽然静寂本身并不那么使人精神振作。我终于听见了休果走过覆满松针的地上悄悄归来，我又是高兴又有点失望。

“怎么样？”我抓住他的手问道。他在我身边躺了下来。

“什么结果也没有，”他说。“屋子里有好些人。我至少听到有两个男人的声音。可是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这可能是警察；要知道这些坏蛋是有通宵通行证的。”

“什么也看不见吗？”我问。

“窗子全遮得严严实实的，”休果回答说，“正如元首的忠实奴仆的住宅所应有的那样。”

“我们去等着，看看屋子里有什么人出来，”我提议说。

我们向林边爬去，来到梅克林克住宅对面。

“为了找他家的门牌号码，我至少花了十分钟，”休果说。

“然而那确实是他，门上的牌子明明白白写着：‘地方警察局长’。这就是说，他，我们这位伍长，爬到了多么高的位置。”

“这位先生在冒险”我说。“这种称号是会直接招来游击队的枪子儿的。”

我们躺着，守候着。天空开始微微发亮了，空中好像弥漫着灰蒙蒙的雾。梅克林克家里寂静无声了，和其他所有人家一样。休果推了我一下说：

“还是毫无结果……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隐蔽起来。现在回去吧，回老地方去。”

我想睡觉了。我们刚刚重新在又高又密的蕨类植物丛中躺下来，我几乎立刻就昏昏沉沉的了。我一觉醒来，已是红日高照了。休果谨慎地拉拉我：

“该离开这儿了。”

又一天开始了。列车在行进。德国国防军的大卡车喧嚣而过。孩子们正忙着去上学。鸟儿在花园里歌唱。生活仍然一如往常地在流逝，然而我感到这是残忍……这是在被占领国家里的一天！而且看起来，一切似乎都极为正常。这新的一天包含着新的可憎恨的阴谋，包含着新的暗地里的叛卖。

我们经过了比尔特霍文的一些林荫道。我垂头丧气慢吞吞地走着。忽然我感觉到休果在用审视的目光看我。

“要是你累了，汉娜……”他犹豫不决地说，“那就让我一个人来干这事……你回家去吧。我不愿意让你过分疲劳……”

我为“过分疲劳”的说法感到可笑，但是我心里却被他的关怀感动了。

“见鬼，谁说要回家？”我提出了异议，并且重新振作起来。“要么我们一起干，要么谁也别干。你叫我待在家里，让你孤零

零一个人在这里东奔西跑，这我可不同意。”

“好极了，好极了，”休果忙不迭地说。“好吧，既然你愿意这样……”

这一天，我们轮流监视斯内特斯和缪尔霍弗的住宅。我们顺便又去“范·德·贝”先生的古老宅第看了看。几处都没有福斯兰德的踪迹。傍晚，我们缓步向多尔杰尔走去；敏感的本能提醒我们，有时候必须避一避：休果浑身是汗却穿着冬大衣，我衣服上也尽是尘土而且揉得很皱，——不用说，我们的模样一定会引起人家注意的。我们再也不感到精神饱满了。但是我知道（这多少是由于在指挥所的时候，大家对我描述过休果的关系），他办事是不习惯于半途而废的，而我也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我们走着的这条路上，车辆和行人都比较少。在那些彼此相距越来越远的郊区小屋和别墅的后面，已经是比尔特霍文的郊外了。我们时而遇见一些散步的人。后来我们迎面遇上了一个上了点岁数的男人，上唇留着剪短了的白胡子，穿着细方格灰色衣服，胳膊上挂着根手杖。等他走得离我们很近了，我看见他手上拿着一支没点火的纸烟。

使我吃惊的是，他在我们身边站住了，看着休果，问我们身边有没有火。休果匆匆瞥了我一眼，他的表情好像是说，这个人及其请求都使他不高兴；我尽量不显眼地耸了耸肩头。休果从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给穿灰衣服的人点了纸烟。陌生人喷出了头一口烟，把目光从休果身上转到了我身上；他的眼睛有点奇怪地——不知是嘲笑还是同情地闪了一下。他的几乎是父亲般的同情立刻感动了我。

“希望你们不要见怪我和你们攀谈……”陌生人请求说。“最

近几天里，我好几次看见你们在这里徘徊。你们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吧。”

看见休果紧闭着嘴唇，我明白他不喜欢老人的话，宁愿回避他并尽快走开。我却产生了好奇心。因此我不知为什么——我平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这一次几乎没有产生怀疑。

“我们在找人，”我不加犹豫地回答道。

休果在旁边推了我一下，好像我是抵抗运动中最多嘴的喜鹊。老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一直带着那种关注的神情。

“我的家离这儿不远，”他用温和的声调说。“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或者如果你们因为露宿，身上弄脏了……什么时候想好好洗洗澡的话……欢迎随时光临舍下。而且越快越好。”

他把手伸进自己灰上装的侧面口袋，摸出一张名片递给休果。然后，他在我们面前脱了脱帽，便转过身去顺着道路走了，连头也没回。

松林里铺满松针的地面上跳动着一个个太阳光斑，现在我们看清了名片。名片上只有姓氏和地址。他是弗·雅·利文斯硕士。这个名字没有给我们说明任何问题。

休果看了我一眼，用问话的形式说：

“是阴谋吧，啊，汉娜？……”

我看着名片，思索着。我暂时还看不出任何眉目。

“我不明白，”休果接着说。“如果他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是说，如果他猜到我们是抵抗运动战士，那么他早就可以向警察局，甚至直接向纳粹匪徒去告发了。他用不着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在那里设圈套。”

“在家里设圈套总比在外面搞袭击可靠些，”我说。“在外面你可以自卫，甚至逃掉。而在家里几乎总是死路一条。”

休果躺下来，把双手垫在头下。

“不，我不明白……说不定他是个好人吧？……”

“他的外貌是诚实的，”我说。“他的目光是和蔼的。如果初次印象可以信赖的话，那么他是想要为我们做点什么。”

“这个人有点特别，”休果沉思着说。“我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利文斯硕士。看来，他知道我们在露宿，这是他自己说的。我想，汉娜，我们应当在这个地区留一夜，设法弄清这位先生是什么人。”

这天晚上，我们躲藏在利文斯家附近。这所房子离建筑材料商斯内特斯住的那条林荫道不远。这里有一片树林，不大，然而我们正好可以隐蔽在里面。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是有时候从林荫道上传来德国鬼子的歌声。我们悄悄地在窗子、回廊、大门旁边仔细听着。里面不知什么地方透出一点微光，由此可见，屋子里无疑住着人；但是我们没有听到说话的声音，只是有时听见脚步声、开关房门和挪动椅子的声音。我们悄悄地潜回了树林。

“现在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穿军装的朋友到他家里做客，”休果说。

我们等了很久很久，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露面。我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因为我知道身边有个忠实可靠的朋友。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时钟报了时，接着屋子里的钟也敲过了。依然是一片寂静，外面没有一个人。

“我们来冒冒险吧，汉娜？”休果突然说。

“你想去敲门？”我问。

“对……拿着枪，”他说。“应当老实向你承认，这位庄重的老人大大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那支没点着的奇怪的纸烟……”我提醒说。

我们又爬到房子跟前。敲敲厨房门，但是敲得非常轻，休果不得不又敲了一次。在黑暗的门洞里出现了一个难以辨认的灰色人影。

“谁呀？”他轻轻地、然而决不是胆怯地问。

“您这儿有没有火借我们用用？”休果请求说。

黑暗中听见了笑声。

“哦……是你们。请进，快进来。”

我们进去了，他随手关上门。我们紧握手枪站在黑暗中。我仍然不觉得害怕。我想，就连休果内心深处也确信老人是诚恳的——要不然他决不会拿我的生命来冒险。

“请跟我来吧，”老人邀请道。

他用摩电筒给我们照着路。淡青色的小光柱沿着门、楼梯、厚地毯、走廊里的小桌子的螺旋形桌脚一路晃动着。然后主人打开了房门。我们走进房间，房里陈设着几把皮面圈椅，一个书橱，壁炉前铺着一张虎皮，书桌上方挂着一幅高得看不清楚的图画和几帧嵌在银色镜框里的照片。壁炉旁边摆着个电炉，上面坐着一把茶壶，水在沸腾着。这个混杂了褐色、蓝色和红色的房间，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印象——当我们在比尔特霍文的树林中露宿了几个寒冷和不舒服的夜晚以后，我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房间是如此的安逸、美妙和好客，竟使我瞬间忘掉了战争、占领和追捕卖国贼。

“坐吧，”主人让着我们说。现在，他没戴帽子，他的斑白头发在柔和的灯光下闪着微光。我在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休果仍然默默地站着。

“喝点茶吧？”主人问过我们，就走到靠墙放着的一张下面安

了轮子的小茶几跟前。平静和殷勤的口吻足以造成这样的印象，仿佛我们是来作最高尚的社交拜访似的。

“很高兴，”我回答着，看了看休果，他站在老人背后，正对我打手势，好像在问该怎么办。我耸了耸肩膀。利文斯把茶几推到房间中央；茶几上放着三杯热气腾腾的茶和一盘家制饼干。休果用阴沉的几乎是严厉的目光瞧着老人。他的一只手插在大衣襟里，始终放在皮暗袋旁边。

“是不是圈套？……”在利文斯指指椅子让他就坐的时候，他终于问道。

穿灰衣服的白发主人短促地笑了笑：

“当然，你们是不信任我吧？你们以为，我这里满屋子都是法西斯坏蛋或者保安警察，只等时机一到，他们就来抓住你们，是吗？”

“可能的，”休果还是用那么阴沉的、不信任的口气回答。

“你们想错了，”利文斯说。“我是荷兰人。和你们一样。我没有看错人。我们用不着问来问去。不过我有些话必须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退休人员，在比尔特霍文这样的地方度晚年，而且常常步行，那么散步就成了他们消磨时间最喜爱的办法。况且这也有好处。常常走路的人，看见的事情也就多了。学会了注意观察一切，也注意到不寻常的事情。几天以前，当你们在这个住宅区的几个出名的法西斯走狗住宅附近转来转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们了。我一天一天观察着，——请原谅我——你们每天早晨出现，身上的衣服越来越脏，揉得越来越皱。于是我心中就有数了。‘猎手’，我心里想。随便说说，我只拥护这种游猎。因而我准备尽我所能来帮助这样的游猎……不过必须提醒你们。请不要误会了一个谨慎老人主动提出的劝告。你们今

后不应该再这样露面。你们的确会引起人家注意的。我们这里的警察部门内部有几个是正直的、早就在这里服务的老警察，然而也有一些年轻的坏蛋。警察局长梅克林克，就是因为残酷迫害犹太人和爱国志士而在这一带弄得声名狼藉的。”

我和休果交换了一下眼色。

“你们必须有一个便于展开行动的基地，”利文斯用匙子搅着茶说。“我不能漠不关心地看着你们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说不定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因此我向你们建议，在你们认为需要的时候，把我的家作为掩护所。你们当然可以拒绝我的建议。虽然这样我会感到遗憾的……喏，请喝茶吧，趁热。”

休果直到现在才把手从怀里抽出来。我发现这只手是多么肮脏和粗糙。我也偷偷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手。指甲缝里都是黑垢。我真想把手藏起来，可是不知藏在哪里才好。

“利文斯先生，”休果轻轻问道，“您怎么向我证明这里没有圈套呢？”

老人耸了耸肩，拆开一盒纸烟。“我怎么向你们证明呢？我没有办法。我对你们说的，全是一番真心话。你们听说过二十二人案件吗？”

“大学生们……”休果喃喃地说。“去年年初被枪杀的。”

老人点点头，茫然望着前方说道：

“我的儿子是他们的领导人之一。一个工程师。刚结婚。他的前程是远大的。他为祖国的幸福牺牲了。”

休果默然了。利文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取下一张嵌在银色镜框里的不大的照片，送到我们面前。一个穿翻领上衣的非常年轻和聪明的人正看着我们，他面孔瘦削，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和一头深色蓬松的头发。利文斯没有再说一句话。我和休果也没

开口。这时候利文斯走到墙跟前，那里挂着一幅不大的图画。他把画翻过来。反面是一帧威廉明娜女王① 的画像和一条褪色的红白蓝三色带子。老人望着画像，晃着头。我觉得他想用这个姿势来表示敬意。

“一位伟大的妇女，”他最后说。“依我看，她是所有旅居伦敦的人们中间唯一了解这里情况的人……你们听过她的广播演说吗？”

休果点点头，低头凑到杯子上慢慢地喝茶。利文斯又把画像翻了过去，在我们旁边坐下来。他向我们敬烟。我们贪婪地吸起来。

“好吧，”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彼此都不必多问。我们大家都只是爱国者。我们的愿望也只有一个……我很想知道，你们接受不接受我的建议。”

休果默然沉思了很久，一条不安的皱纹横在他那两道浓眉之间。我和他也有同感，我信任我们的主人，也意识到我们所冒的危险。

“利文斯先生，”休果终于说。“我决定接受。应当决定……我的同伴早就对我说过，她信任您。我希望我们不会受骗。如果您欺骗了我们，那么毁灭的将不只是我们两个。这是我对您的诺言。”

利文斯的嘴唇上又出现了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

“我熟知这条不成文的法律，”他说。“我很高兴能帮助你们。”

---

① 荷兰女王(1890—1948)。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从伦敦通过无线电广播使自己成为荷兰人对德国占领进行抵抗的象征。一九四五年她从伦敦回国，受到热烈欢迎。

我和休果到现在才真正感触到了诱人的力量——我想说的是这屋子里的温暖和老人的殷勤款待。利文斯打开了浴室，水龙头淌着的真是热水。他为休果准备了刮脸用具，给我们两个每人一件睡衣。当我用肥皂（显然是战前生产的）擦洗的时候，主人好像悄悄地在向休果探问，我们有没有结过婚。等我指甲已经干干净净，穿着主人的旧长袍走出浴室的时候，我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似的；我把浴盆让给休果去用了。这时候，利文斯指指侧面的小房间说：

"您可以睡在那里。不过有个条件：您明天要早点起床，八点以前离开我家。您的同事也一样，我也向他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八点半有个妇人到我这里来收拾屋子和准备午饭。十二点半她就走了。在这段时间内我不能让你们留在我这里。您的朋友将睡在楼下长沙发上。您必须让房间和床铺始终保持像没有人到这里来过的样子。"

"您是位魔法师，利文斯先生，"我说。"是守护神。"

他深沉忧郁地看看我。

"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受侮辱和受迫害的爱国者。您所从事的事业，是我儿子的事业，若是我年轻三十岁，我也愿意协助的。您在继续着我儿子未完成的事业。所以我爱您，虽然我连您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我微微一笑："利文斯先生，我可以告诉您的只有一点：我曾经有过一个唯一的沽名钓誉的愿望——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上个法学硕士的学位。"

老人扬起了他那微微弯曲的细眉毛。

"一位大学生！"他说。"请别生我的气，如果我仍然不知分寸的话。我认为您的同事是位工人……"

“您没看错，”我回答说。“他是工人。可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若是在另一个国家，在另一个环境里，他大概已经在指挥整整一个集团军呢。”

“铁木辛哥，”利文斯喃喃地说。“伏罗希洛夫或者还有那位大胡子，他叫什么来着？”

“布琼尼，”我含笑答道。“红军骑兵。”

“对，您对他们比我熟悉，”老人说。“对。新型的人们。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要学习许多东西，我们要学习用新的方法判断从前人们给我们描述的像谜一样的事情。”

“谜？……不，不如说描述成邪恶，”我痛苦地说。“而现在，俄国人在作自我牺牲，在不遗余力地牺牲和战斗，现在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伟大的盟友！我们英雄的战友！”

利文斯转动着戴在细长的无名指上的图章戒指。“世界要发生变化，将来会彻底改观的。可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请您别问。这个我不知道，”他说。

我抖一抖洗干净的头发，笑了起来。“我也不会问，”我说。“我只能告诉您：我猜得到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一直等到休果刮好脸，脸上干干净净、红扑扑的，下楼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休果手里拿着那张上面抄着五个姓氏的小纸片——为了寻找这五个人的住址，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利文斯先生，您能比较详细地把这几个人的情况告诉我们吗？”休果问。“顺便说说，这不是私人方面的问题。”

利文斯把一副深黑色镜架里嵌着亮晶晶镜片的眼镜架在他那细长的鼻子上。

“范·德尔·贝尔，乌得勒支商业银行，”他读道。“本地区

的头号坏蛋。他想当市长。'东方公司'最大的股东……"

"……被红军无偿清算了的公司，"休果补充说。

"公司倒是被清算了，"利文斯说，"但是股东们，可惜还没清算。不过应该相信，他们会遭到同样命运的。他们每个人都理应遭到清算。然而你们眼下在此地是找不到这位先生的。他和'赫尔曼·戈林'康采恩有关系。不过他也在搞各种各样德国股票投机。先前他曾经把一些乌克兰姑娘贩卖给纳粹分子的老婆——这些婆娘要弄些家奴。目前，据我所知，他又到德国去作短期盘桓了，以便进一步巩固和他的朋友克虏伯的联系。"

"是个下一次远征惩罚对象的候选人，"我说。

利文斯看了我一眼，笑着说：

"我不十分熟悉抵抗运动的语言。不过应当说，我是喜欢这种语言的……你们的名单上还有谁？噢，梅克林克这个人的情况，我已经对你们讲过……其余三人，都是普通的投机分子。他们不是刑事犯，只不过是些没有德行的小人，他们投靠纳粹匪徒，成了德国国防军、德国侦缉机关及其有关组织的供给者。因此他们也就像气球一样青云直上了。"

"等着吧，这些气球很快就要被刺破的，"休果喃喃地说。

我们继续谈着。我的视线落在书桌上摊开的一张晚报上了。我看见报上又用粗体字刊登着被处决的抵抗运动战士和人质的名单。利文斯注意到我的视线，便把报纸递给了我。

"昨天报道了七个人，"他说。"我不放过任何一份名单。总之，凡是他们为了恫吓我们而在报上公布的所有名单。这里已经有整整一卷了。"

他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抽屉里放着一本不大的帐册。他翻开帐册递给我。

帐册里记录着许多判决书和所有被纳粹匪徒逮捕和处决的荷兰人的名字。我默默地翻看了帐册，把它递给休果，可是他没接，于是我把帐册还给利文斯。

"罪行！"主人握着拳头说。"任何惩罚都难以抵偿的罪行。"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奇异的一星期，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妙的一星期。每天早上不到八点钟，我们已经到户外去了；晚上我们回到好客的住处。我们的衣服和身体终于又干干净净的了。我们的肚子忘记了饥饿。由于这一切，我们的情绪明显地高涨了。休果把自己的手枪藏在利文斯家里，出去也不再穿冬大衣。他换上了一身主人的蓝制服；虽然衣服宽大了点，但是这对我们非常实用，因为我们可以在腋下缝一个亚麻布小口袋，休果现在就把我从巴别洛身上缴来的小口径手枪放在这个口袋里。我们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在乌得勒支和马坦斯得克之间发现一辆被盗的小汽车，汽油已经用尽，车内有一具警察局稽查的尸体。据说，尚未断定是政治谋杀还是一般刑事犯罪。稽查的自行车已经在乌得勒支他家附近发现，但是没有人看见巴别洛被汽车掳走的经过。目前警察局正在进行多方调查。

"巴别洛、福斯兰德、梅克林克，"休果对我说。"这是应该千刀万剐的三个恶棍！"

可是我们至今没能发现福斯兰德。一个又一个晚上，我们在徒劳的出外查访之后回到利文斯家里。他什么也不问我们。有时候我闪出这样的念头：他或许愿意参加我们的侦察吧。我甚至把这个想法对休果提过。起初他笑了：

"他吗——瞧你怎么想的！老人能够对我们提供帮助，在他已经非常满足了。不过我应该说，他对我们的帮助已经是奇迹。可是参加……怎么参加呢？"

“就是这样：顺便留留神。他不是经常出去散步吗，”我说。“他就是这样发现我们的。”

休果认真考虑了一会，终于同意了：

“对，这是个主意。汉娜。”

过了这个星期以后，晚上，我们坐在利文斯的大房间里喝茶（这在我们已经成了习惯），谈到利文斯能不能和我们一道进行监视活动。利文斯对我们的建议非常重视，如果不说是兴奋的话。看来，他很感谢我们吸收他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对他简单讲述了事情的要点。说明我们打算根据巴别洛小本子里的地址找到福斯兰德。利文斯说，我们现在最好分一下工。休果把福斯兰德的特征告诉了他，老人复诵了几遍，全记住了。

将近五月底了。一个个花园，鲜花盛开，草木繁茂。风送来了新绿的小白桦、风信子和开花山楂的香气。利文斯的秘密收音机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军队突破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军阵地，正向东普鲁士疾进。就连在意大利的盟军也行动起来了，迫近了罗马，虽然和一日千里的俄国人比起来，不是太迅速……而在我们国家，却每天都在抓人。报纸上不断在渲染捕获了“恐怖分子、骚乱的罪魁、人民的敌人和犹太人的包庇者”；不断有人被处死，因而利文斯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把这一切记入他的帐册……

我无法抑制我心中产生的焦急。休果变得非常沉默、孤僻、难以理解，好像躲在甲壳里似的。他还相信不相信我们能捉住福斯兰德呢？在此地，在比尔特霍文？我有时候对此是怀疑的。在我们监视的四个法西斯分子那里，往来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具有福斯兰德的特征。利文斯也没有获得什么成绩。而范·德尔·贝尔大概一直还在德国。

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有一天傍晚，利文斯告诉我们，警察局长家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地方法西斯——或者说法西斯保安警察的制服，另一个穿便衣。穿制服的随身牵着一只样子怪吓人的狗——牧羊犬。休果抓住利文斯的袖子急忙问道：

“那个穿便衣的是什么模样？”

“难说，”老人回答道。“他戴着黑镜片的风镜……看上去既像三十来岁，也像五十来岁……他一直靠近带狗的警察，好像那个警察和那只狗是给他保镖的。总之，他穿戴得相当雅致。”

“雅致？”休果反问了一句；他原先听着利文斯的讲述有点失望，现在却一下子活跃起来：“‘雅致’是什么意思？是浮华吗？”

“对，也许正是‘浮华’，”利文斯说。“他是个真正的花花公子。他戴的手套竟是亮黄色的……”

我和休果不约而同霍地从坐位上站起来。

“亮黄色手套，”休果重复说，看了我一眼。“是他，汉娜。利文斯先生，一定是他，”他对主人说。“黄手套——这是他的特殊嗜好！我的天哪！这就是说，他在此地……他害怕了……行动要带狗的警察保镖。哈哈！”

我理解休果的心情。然而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严肃和忧虑的表情似乎凝结在他脸上了。他看了看我；我已经拿起了风衣。休果紧紧地握着利文斯的手。

“我们得走了，利文斯先生。我不能再对您多说什么了。如果今天戒严以前我们还没回来，那就是说，事情成功了，我们溜掉了。那么，您必须把汉娜和我留在这里的一切，也包括我的冬大衣，统统烧掉或者藏好，应当把一切可能连累到您的痕迹清除掉。”

利文斯慈父般地、担心地拍了拍休果的肩头，但是再也没有说什么。我和休果离开了他家。我们又来到大路上，越过了铁路线；从我们已经走熟了的僻静的小林荫道进入有蕨类植物的树林，来到警察局长住宅的对面。我们隐蔽在树林里，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监视着住宅。

过了些时候，从屋里走出一个穿地方法西斯低级警官制服的人；他身边有一只狗——用链子拴着的毛蓬蓬的怪物，这就是利文斯说过的那只狗。那人牵着狗出来散步，顺着林荫道走着。那只狗朝我们这边伸着鼻子直呼哧，可是主人不松开链子，狗也没法扑到我们这里来。法西斯分子沿林荫道来回走了一遭，又进屋去了，——狗完成了应该做的事。

"福斯兰德的私人警卫！"休果低声含糊地说。"你想想看吧，这个坏蛋蹲在屋子里哪！要是我们有自行车，汉娜，我们就可以大显一下身手了！把他们三个都收拾掉！……"

"可往哪儿逃呢？"我问。

"最好是笔直穿过花园，越过铁路线——钻树林。不过，慢着……不，这不行。必须等待时机，等福斯兰德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完事以后搭上公共汽车就'再见'了！"

休果说得平静而沉着，但是我看得出来，他那股猎人的激情并没有减退。而我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又一个寂寞无聊而又得默默忍耐的钟点。

结果，我的预感这一次得到证实了。七点钟左右，从屋里走出三个男人。一个是那牵着狗的法西斯分子，另一个是穿军装的高个子红脸大汉，这大概就是梅克林克，他身边走着个穿戴打扮很考究的瘦子，戴一副太阳眼镜，虽然太阳就要下山了。休果默默地站在我旁边，他全身都绷紧了，像一张拉紧的弓。

“福斯兰德，”他说。“哼，你这个该死的！是他，这个坏蛋！你把他仔细看看清楚，汉娜。”

三个男人沿着林荫道走着。两个穿军装的看来倒没什么不放心，可福斯兰德时不时东张西望。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在两个身材魁梧的警卫保护下的福斯兰德的脸和干瘦仓皇的身姿。他们转弯走上了通向铁路道口的大路，不久就看不见了。这就是告发和出卖我同志的败类！

“休果，”我说，“你看怎么样？如果他们没有范·德尔·贝尔家门上的钥匙，那他们是送他到斯内特斯那里去的……”

休果的脸一下子变了色。他一把拉住我跟着他向栅栏门走去。

“不久以前，你还想说服我，”我对休果说，“你说类似‘范·德·贝’这样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波斯地毯和缎子床单让给像福斯兰德这种家伙享用的……我们根据这一点来推断吧。如果不存在第三或第四种可能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准是到斯内特斯那里去的。”

我们经过一些浓密的、弯弯曲曲的林荫道，来到建筑材料商的近郊房屋所在地。这里一切都是安静的。我们伏在稠密的松林里，留心听着，一直到戒严时间快要开始的时候……时间是够长的——在这段时间里，沿公路走的那三位先生，应该到达斯内特斯的田园式茅屋了。然而他们没有出现。

“应该回我们的基地去了，休果，”我说。“要不然我们自己会有落网的危险……他们把这个告密者送到别的巢穴里去了。”

我们在戒严以前回到了利文斯家里。我们否定地摇摇头，老人什么也没说。他到厨房里去给我们做热食去了。

“怎么样，没有遇见你们那个家伙？”他在邀请我们吃东西的

时候才问道。

“遇倒是遇见了……”休果回答说。“不过他有得力的警卫。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去了，只有鬼才知道。”

利文斯要我们简单讲讲我们所见到的情况。

“他们是沿去苏斯得克的公路走的吗？”他问。“那里有一个法西斯打手俱乐部。在岔路口上的一家小饭店后面……不用说，这个家伙躲在那里了。”

“这么说来，他老婆事先通知过他了，”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休果对我说。“他不敢再冒险了。特别是在巴别洛出事以后……”

这时候他忽然像年轻人那样由衷地笑了，他的面容一下子变得温和了。

“瞧，他到底害怕啦！这多痛快，他害怕啦！恐惧本身已经是惩罚了！”

荷兰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设在一座瑞士风格的大别墅里，屋上飘着一面带三角图形的缪塞尔特的旗子。大门上方照例也挂着一块经理姓氏的牌子，还有一个告示，声明他有权经营酒类……要是没有这个告示，德国鬼子就未必会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常客了。二楼有一条长走廊，沿走廊有许多小房间。

“这么说来，他们是把他藏到那里去了……”在我们谨慎地出去侦察的时候，休果沉思着说。

我们竭力不放松对这幢房屋的监视。那里进进出出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军人、资敌分子。其中却没有福斯兰德。中午前后，有一辆坐着两个德国国防军军官的小汽车开到俱乐部，在围墙里面停下来。过了两个来钟头，我们看见那辆汽车喧嚣着疾驶回去了。

“难道我们这个坏蛋从来也不出来透透空气吗?”我问休果;这时候,我们正在树林里的监视哨上,俱乐部前面的公路也可以一览无遗。

“相信我吧,他已经吓坏了,”休果说。“也许他根本不会再露面了。”

可我们到底还是猜错了。叛徒突然在俱乐部前面的花园里出现了。然而他又不是一个人;有两个法西斯彪形大汉伴随着他;其中一个还牵着狗。我们向树林里退进去了些。他们没有朝住宅区那面去,而拐进了林中的道路。过了几分钟,他们又走出我们的视界了。休果骂了一句。

“他妈的!我们连那一带的地形都不知道!”休果感叹地说。“要是我知道逃遁的方法和去处,我就冒一次险,收拾掉三个坏蛋和那只狗。”

“我们去侦察一下那里的地形怎么样?”我建议说。

我们谨慎地朝福斯兰德和他的保镖走的那个方向走去。那里是一些相当荒凉的林荫小路,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所小屋。这些林荫小路一直通到树林边上,这树林大概是从比尔特霍文一直延伸到拉贺·弗尤尔斯的。这里不通公共汽车,只有自行车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必须尽力忍耐,休果,”我说。

他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天几乎和头一天一样。我们极其小心谨慎地在俱乐部的楼房附近转游。

直到晌午了,福斯兰德才从屋里出来。他仍然戴着太阳眼镜和亮黄色手套,照旧带着保镖;这一次由警卫队长亲自牵着狗。

“他们这是到哪儿去呀？”当福斯兰德和他的同伴拐向住宅区中心的时候，休果觉得奇怪了。“我们跟上他们，汉娜！”

福斯兰德有东张西望的习惯，所以他时不时回过头来。这样，我们跟踪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两个坏蛋是靠公路右边走的，和我们一样，这样福斯兰德就可能认出休果来。而我们又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后面。休果抓住我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搂着我的肩膀。这是每当我们装作两个情意绵绵的年轻人时所用的老办法，看来这一次又奏效了：在我们前面沿着石砌人行道走着的两个家伙，虽然看见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却似乎丝毫也没有怀疑。

我忽然恍然大悟。

“你看怎么样，休果，”我急忙说。“坏蛋不会回来了。——他是到火车站去的。”

“他身边没有带行李嘛，”休果反驳说。

“你注意看着吧，”我说。

真的，很快就应该有一次列车到站。我们早已把火车时刻表背熟了：哪几次车在此地停站，哪几次是过站而不停的，我们都记得一清二楚。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列车不久就该到站了。休果激动得一下把我的手捏得生疼。

“轻点，休果，”我说，“否则到明天我浑身都是青伤了！”

“哼，骗子！”休果叹了一声，没注意到我的话。“如果这里来往的汽车稍微少一些，行人稀一点……”

“要是他上火车，我们怎么办？”我问。

他又沉重地叹了口气。

“你敢搭上火车，看看他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单独出来吗？”

“只要和你在一起，”我说。

“车上时常要检查证件的。”

“危险随时随地都会有的。但是如果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坏蛋，那我们总能把他消灭的。”

“All right①，”休果说。

我们看见福斯兰德和他的保镖果然一起在月台上走着的时候，道口的栏路木已经放下了。我们急忙赶上他们。休果悄悄塞给我一些钱，我便到售票处去买票。等我站到售票窗口的时候，福斯兰德朝我转过脸来——他已经买好车票了。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看清了那张皮包骨头的没有血色的脸，松弛的嘴巴和奇短的下巴，接着我们便彼此漠不关心地走开了。一个念头忽然在我脑子里一闪：如果转过身去，从外衣里掏出手枪来开一枪怎么样？这倒是收拾败类最有效的办法。休果也会立即领会并动手干掉另一个法西斯匪徒的。然而我不知道在月台上的是些什么人。不知道车站上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信赖，他们是放走我们还是把我们扣留在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法西斯匪徒坐在紧靠铁路的咖啡馆里；我和休果曾经在这个咖啡馆里监视过纳粹分子汤谢特的鞋铺……一瞬间的冲动消逝了。福斯兰德又和他的保镖凑在一起了，我也找到了休果；休果正站在早已过时的广告牌后面，尽量遮住脸，不让戴太阳眼镜的人看见。

“你没有听到他们去哪里吗？”休果问道；这时候我已经把车票交给了他……

“我到售票窗口已经太晚了，”我回答说。

休果又搂住了我的腰。列车开近了，已经在离我们的栅栏

① 英语：对；好；行。

门不远的转弯处轰隆轰隆响着。

“你难道不能在这里，在月台上，趁他们上车的时候开枪吗?”我急忙问道。

“这我已经想过,”休果低声说道。“可是这个车站是个真正的陷阱。这里根本没有退路……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在乌得勒支。到那里我们可以逃得无影无踪,而在这里却不行。”

灰色的柴油列车,像条滑溜溜的大蛇,沿着月台爬过。我们仔细看着福斯兰德，看他往哪里去。他和警卫队长连狗一道跳上了二等车厢。我们也放心地上了三等车厢。

旅程很短,总共只有六分钟左右,——全线数这里的站间距离最短。柴油列车在轨道上疾驶，一个个的念头也在我的脑子里掠过。和往常一样，车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拥挤的车厢里,竭力用胳膊肘撑开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的乘客:不能让他们发觉我们衣袋里有手枪。在月台上我还想过，我们总能够从车厢中挤过去，钻进那两个法西斯匪徒乘坐的包房。现在我却担心到了乌得勒支我们无法迅速下车。

“应该离车门近些,休果,”我悄悄对自己的同伴说。

我们推着乘客,赔着笑脸，向车门挤去。休果仍然搂着我,微笑着,可是在这种假装的微笑里,我揣摩到，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的心情异常沉着。我自己也因而镇静下来。

等到列车已经在乌得勒支车站侧面月台边上滑行的时候，我和休果推开车门，首先跳下了车。但是我们没有立即朝前边的二等车厢跑去,而是混在人群里,急忙向出口冲去。我看见前面法西斯匪徒的黑色制帽,但没有看见狗,不过狗一直在叫。休果一直搂着我的腰。戴太阳眼镜的人，曾经把他那张咧着嘴的没有血色的脸朝我们这边转了一下。

“现在就下手，要不就永远没机会了，汉娜，”休果说。

我们已经走到出口处了。告密者和护送他的法西斯分子穿过钢框玻璃隔成的小过道出去了。等我们通过检票口，他们已经越过车站前的人行道了。有那么一瞬间，告密者的周围完全没有人。我看见休果在摸腋下的手枪。我也把手伸进风衣口袋。没料到突然有两个小孩跑过我们身边，年轻的妈妈笑着跟在他们后面奔跑——看来她对付自己的两个孩子不那么容易。我发现休果忍住了，手没有从衣袋里抽出来。我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你真罪该万死！”休果从牙缝里诅咒着。

这时候他忽然拉住我。我们站住了，眼看着福斯兰德和法西斯分子一起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在高大的白色旅馆前的停车处旁边，停着一辆德国人的汽车。

“侦缉队，”休果低声说。

我仔细地看，看见车子里连司机共坐着三个穿灰绿色军装的人。车门已经打开。福斯兰德钻进汽车，在司机旁边坐下。法西斯警卫队长高喊着“海尔希特勒”，敬了个礼。汽车开动了。警卫目送着汽车，直到车子转过弯去。然后他牵着狗转身慢慢走去，穿过了车站广场。

我和休果始终站在原地没动。我觉得我在打颤，浑身软绵绵的，站不住了，好像这已经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不认识的汉娜。休果嘶哑的、恶狠狠的咒骂也没使我介意。坏蛋逃掉了！我不敢朝休果看一眼，不敢看他的眼睛和让他看见我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也情愿戴上一副太阳眼镜。

“我们走吧，汉娜，”他最后说。

我们乘电车到比尔特，然后步行回比尔特霍文。

“假如命运赐给我们一个此刻遇见梅克林克的机会，”休果庄严可畏地说，这时候，我们像一对已经闲逛得厌烦了的休假者，在公路上缓步而行，“那么这至少也能补偿补偿我们今天遭到的那个损失……”

“我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枪，”我说。

但是这样的机会没有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不得不强压憎恨和激愤，忍气吞声。我在跨进利文斯家门槛的时候，感到从未有过的疲乏。我独自关在房间里，用痛哭发泄愤怒和失望。不一会，我听见楼下传来玻璃餐具的响声。我几乎确信这是休果弄出来的声音；他没有像我一样哭泣，可是他也烦恼得把我们主人的陈杜松子酒直往肚子里灌。第二天，我们竭力排除忧郁，又继续侦察，昨天，忧郁逼得我们早早就上床睡觉。利文斯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安详和端庄。他耐心地等待着，在我们出门以前，休果对他有什么托付。休果建议他继续监视警察局长的住宅；我们则准备在车站和法西斯俱乐部之间来回巡视……我们又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动，等候着至今尚未获得的幸运。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幸运是不会有的了。

“休果，”傍晚，在回利文斯家的路上我问。“我们值不值得在这里耽搁下去？”

“也许坏蛋还会回到这里，”休果回答说。“这是无法预料的。”

然而他回避着我的目光，而我也并不相信他自己真的相信福斯兰德会回来。我们的主人从梅克林克家所在的那个地区侦察回来，结果也是那么令人悲观，和我们一样。我们在难堪的沉默中吃过饭。喝茶以前，休果在浏览报纸（我甚至已经懒得费神去看报了）；我看见他正在看一篇报道，他紧闭着嘴唇，突然猛地

把报纸扔到一边。我把报纸拾起来，重新整整齐齐叠好，开始寻找究竟是什么使休果这样激动。我没有去看关于英国人空袭罗森达尔的冗长的和别有用心的报道，我看完了一则消息，说有一帮"不负责任的恐怖分子"曾几度企图潜入阿姆斯特丹的维帖林赫斯汉斯监狱，劫出囚禁在那里的政治犯。几乎所有参加袭击的人——被警觉的侦缉队所饷的子弹打伤而没有死在医院里的人——都已经逮捕和处决。

我看看休果。他默默地坐着，略微朝前躬着身子，双手指头交叉着紧紧握在一起。

"是谁呢？……"我问。"莫非我们的人又参加袭击了？"

"我不清楚，"休果说；但是我感觉到他所受的刺激并不小于我。"这么说，他们又作了一次尝试……"

他用手一抹自己的短发，头发一下子全蓬乱了。

"也许报纸又在撒谎，"我说。"也许……"

"不，"休果打断了我的话。"我熟悉他们的手法。要是袭击成功了，他们是不会声张的。如果袭击失败了，他们就敢于描写真相了。即使他们有点夸大……狗杂种！"

末了一句他说得勉强听得见，因为利文斯已经拿着茶进来了。我曾多次提出，要老人把煨茶和斟茶的事交给我来办，可是他非要亲自动手。他看见我和休果像两个木偶一样面对面地坐着，于是也没讲一句话。整个喝茶时间，大家几乎都没有说话，显得垂头丧气的，而且，我觉得时间长得要命。

"休果，"在我和他互道晚安的时候，我问。"是不是已经耽搁够了？"

他无目标地凝视着，那神情好像是有一种隐痛在折磨他；我知道，眼睁睁看着一头法西斯野兽溜走，他是多么难以容忍

啊。

“够了，”他回答道。“的确……可是我多么希望，我们多少能有点东西向指挥所报告啊！你明白吗？”

这我太清楚了。我用双手捧着休果的脸，虽然我许过愿，在我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之前，决不再允许自己表示任何柔情和爱怜，我吻吻他的鼻梁和他那双眉之间的阴沉忧虑的皱纹。接着我立刻奔上楼梯进了自己的小房间。我可怜休果，但是最痛苦的还是意识到我们不得不放弃现在显然已难以实现的愿望。

第二天，我们照例又在那魔上飘着缪塞尔特旗子的俱乐部附近守了一整天，可是我们没有看见福斯兰德。

傍晚，我们又装作随随便便的休假者，缓步向利文斯家走去。我们正沿着德寇军官游乐场所在的林荫道行走的时候，我发觉游乐场门外汽车非常多。而当我们越过公路的时候，我注意到，公路上占领者的汽车分明也比平时多得多。就连行人好像也增加了。所有的人显然都很激动，气氛有点异样和难以理解，有些人脸上可以看出惊惶，另一些人脸上又可以看出明显的喜悦。

“休果，”我抓过他的手紧握着说。“出什么事了。从气氛上也感觉得出来。”

他耸着肩膀埋怨：

“哪能感觉得出什么来？说英国空军吧，还太早，而德国鬼子是再也不敢飞行的了……”

“不是，不是，”我反驳说，“根本不是那个，你也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是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是十分不寻常的事……”

他耸了下肩膀，随后我们便回家去了、我们还没进屋，利文

斯已经容光焕发地出来迎接我们了。他大张着胳膊，像是要把我们两个都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我的朋友……孩子们……”他说着，他的话时断时续。“我祝贺你们……现在这种状况很快就要结束了……今天清早，英国人在诺曼底①登陆了…… ‘D日’②——广播里说。这是‘大西洋防线’③的一个缺口！连此地的报纸也都刊载这个消息了！”

我落坐在一把皮面圈椅上。休果抓住了我们须发斑白的主人的双肩，看来是准备好好摇上一阵。可是他当即又放开了，非常兴奋地挥起双手。

“您在说什么？这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吧？”

利文斯去拿报纸了。

“不，”他大声说，“不是我想出来的！德国强盗正在撤退！BBC按时在广播我们盟军向前推进的消息。当然，德国强盗到今天还硬说他们顶住了登陆，正在消灭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他们说的句句都是谎话！”

休果朝我俯下身子。他把我一下子从圈椅上举了起来，就像大人抱小孩似的。这个身材不高的人身上的出人意料的体力使我感到吃惊，我笑着把双手撑在休果的肩上。

“汉娜！”他大声喊道。“你说得对！就连对英国人的说法你也是对的……欧洲——第二战场！”

---

①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远征军通过英吉利海峡在此登陆。

② D日，即Doomsday，原意为宗教上所说的“末审日”、“世界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预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子的隐语。

③ 法西斯德国于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沿丹麦至西班牙欧洲海岸线修筑的永备工事体系（未完工）。

第二战场

我们反复翻阅着那些卑劣的报纸，占领者的可鄙的应声虫；就连纳粹匪徒自己也已经无法隐瞒盟军参战的事实了。我们收听BBC的广播，除了最近的新闻，该台每小时都播送关于突破“大西洋防线”的最新消息。我们仿佛亲眼看见四千艘装备复杂精良的舰船，正在横渡英吉利海峡，驶向冈市[①]北面的海岸；舰队上空覆盖着特殊的保护伞——一万一千架飞机；舰队将负责向大西洋防线运送盟军，盟军部队已经攻占了布满德寇尸体的桥头堡。

这些新闻甚至也对休果起了作用。就是这个休果，他惯于带着阴郁的神情，用最绝的言词咒骂盟军在西欧的一切作为：他说他们逼使俄国人作战，而自己却怎么也不肯插手，他们不慌不忙，自有他们将来的打算……

“既然英国人真的插手了，”休果说，“那就是说，他们已确信战争不会延续多久了！也好！晚动手总比不动手强。”

“我本来就对你们说过，我们用不着等多久的，”利文斯说。“不过你们也有几分说得对……英国人是讲究准确的。他们当然精细地拟订了自己的参战计划……”

我高兴得有点糊涂了。我眼前正闪现着一幅幅幸福的将来的美景，我美好的理想都将变为现实。我们这里的德国强盗不久就得逃跑，就像他们在卡累利阿地峡、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②]溃逃一样。我们的街道上将彩旗飘扬。我们终将开始审判

---

① 法国西北部的城市，加尔瓦多斯省的行政中心。

② 均系苏联地名。

罪犯……我感觉到自己热泪盈眶了。利文斯发现了，他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把手放到我的头发上。

“你还来得及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的，我的孩子，”他说。接着他从胸前衣袋里抽出一块柔软的丝织白手帕递给我，老人的关切使我顿时泪如泉涌……我想到哈勒姆，想到了父亲和母亲，想到了所有的同志……

“休果，”我说着，像个小学生似的，又是擤鼻涕，又是擦眼泪，“我们明天回家去吧。”

休果有点尴尬同时又含着嘲弄地点点头；他倒好，他可以用男人们微微的憨笑来掩饰自己的激动。

利文斯到地窖里去拿来一瓶酒；瓶子的深绿颜色就像林中池塘里的死水，瓶颈上却贴着金箔。他吹掉瓶上的灰尘，把瓶子高高地举了起来。瓶塞上卡着坚固的螺旋铁丝扣，活像一个精巧的小炸弹。我们的主人把瓶子拿到灯前。深绿色的玻璃瓶内泛着金黄色的泡沫。

“这是香槟，”他说，“我原想保存到我们国家光复的时候。但是我不能再等了。光复已经为期不远。再说到那个时刻，我能够同谁共饮这珍贵的美酒呢？现在我要和你们一起痛饮！”

他在桌子上摆了三只磨花的高脚玻璃杯。休果脸上依然流露着那种有点尴尬又含着嘲弄的微笑，两眼炯炯发光。我又流泪了：真的，在这个时刻，每一个具有同感的表示，似乎都会使我深受感动。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就在这个时刻，所有被占领的地区，千百万家庭都在庆祝令人欢乐的事件；我激动得难以自制了。对了，也许就连成百上千的监狱和集中营里也正在庆祝呢，我们常常听说，消息传到那些地方是很快的。我哆嗦了一下，接着就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我听见一声枪响

——原来瓶塞击中了天花板，我们的主人把香槟酒打开了。“向英国人致敬的礼炮！……”我心里想。他们上星期攻克了罗马，现在轮到巴黎了……我又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举杯吧！”利文斯大声说。“为了胜利！”

我们举起了玻璃杯。沁凉的、泛着泡沫的金黄色液体，咝咝响着溢出了杯口；飞沫溅到手上和外衣上。我们为胜利干了杯。香槟酒在我的血液里歌唱。我听见了休果粗重的呼吸。

“我是头一次喝这种酒，”他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喜爱它。”

“这是节日喝的酒，”我解释道。“我也是初次尝到，你用不着害臊。”

“难道我害臊了吗？”他感到很惊奇。他脸上那条阴郁的皱纹完全消失了；他容光焕发，他那刚毅的嘴微笑着，那对蔚蓝的眼睛开朗地看着我。我同样热情地朝他点头作答。我感到很幸福，并且在心里自问，他能从我眼睛里看出这幸福感来吗？我好像觉得，香槟帮助我看到了自由的将来，再也没有纳粹匪徒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我们向利文斯告别了。老人很早就到花园里去了，他摘了些茉莉花，甚至还剪了几枝水仙和郁金香。他亲自把新鲜的、带着夜露的花束放到我手里。我真想连吻老人几下，可是因为难为情没敢这么做。我们局促地握握他的手。他用一个决断的手势打消了我们想对他道谢的意图。他很感动，而且不打算掩饰这一点。

“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再来吧，”他说。“也许你们还到这里来办事……许多事都靠你们了。你们在支持着我们人民的信心。你们也在使别人变得坚强起来。我很高兴我能够多少为你

们做了点事情。”

重新穿上了冬大衣的休果，不好意思地微微笑了笑。

“抱歉，利文斯先生，我们没能给您留点什么来纪念抵抗运动……”

“下次你们随身带上自行车，”老人说，他的眼睛闪着泪光。

……我们深受感动，而且有点伤感。我们沿着清晨静静的林荫道，向公路走去，去搭乘公共汽车，离开比尔特霍文……我捧着花，显得很别扭。休果穿着他的厚大衣，慢腾腾地走着。斯内特斯的住宅仍在我们左方，但是我们必须经过前“东方公司”的“蒙兀儿大帝”①范·德尔·贝尔的古老领主宅第。有扇铁栅栏门开着。我们钻进花园，躲藏在浓密的女贞树丛植成的绿篱笆后面，对屋子观察了一些时候。那些高大的法国式窗子已经不是关得严严的了；其中有几扇窗子上的窗帘在晨风中微微飘动。屋旁停着一辆长车身的、漆着深色油漆的汽车，有个没穿上装、系着黑围裙的人，正在用花园的水龙带冲洗车子。我和休果对看了一眼。

“欢迎返回荷兰……”休果透过牙缝低声说。“公共汽车不得不稍微等我们一下了，汉娜！”

我们隐蔽在离房屋不远的树林里。在这里看不见从栅栏门里走出去的人，但是因为司机一直还在收拾汽车，我们可以假定，乌得勒支商业银行经理，出卖东方工人去充奴役的投机分子，克虏伯股票的拥有者，暂时还不打算离开自己的豪华住宅。我们两个，总有一个，多数是我，有时走到房屋那边去观察一下——林荫道上行人多起来了，休果穿着他那件冬大衣，会特别引

① 亦译“莫卧儿大帝”，一五二六——一八五八年统治印度的蒙兀儿（莫卧儿）王朝君主之一。此处系借喻。

起人们注意的；有人可能会想起来，不久前有个穿冬大衣的人在这里寻找过什么的……德国鬼子还是那么焦躁不安，一辆辆车子来回奔忙于自己的办事处和“休养所”之间。所有的荷兰人，都和昨天晚上一样，得意洋洋，他们重新获得了自尊心。自然，没有一个人会不知道，BBC暗示过多次的“D日”终于来到了……“‘D日，末审日’，”我重复说着，这时候我们正伏在树林里等待着范·德尔·贝尔先生会不会乘着他的轿式汽车上街去；我还对休果解释，英国人心目中的这个“末审日”——世界末日的含义……休果的情绪很好，他嚼着草茎，笑了。

“‘世界末日’和‘末审日’——说得好，汉娜，”他说。“只要这确实是他们的真正的末日。”

但是，就在这一天，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的坚韧性又经受了一次考验。头一天，我们确信自己的一切努力完全白费了，我们在这里徘徊的时候，是满怀着沉重的沮丧心情的，而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情绪了。我们受到了“末审日”这一概念的鼓舞，闷热、干渴和饥饿都能忍受。我去看过四五次房屋，每一次都看见汽车仍然停在那里。歇晌以后，司机搬出了藤椅和遮阳伞，摆在池塘边的露台上，准备在那儿侍候喝茶，我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骨瘦如柴的女人，挺直身子，像吞了根棍子似的，显然是竭力要装出年轻二十岁的样子；她的头发染成了鲜艳的火红色。我还看见一个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双下巴，粗脖子，——可是看来他对于自己的肥胖丝毫不感到可耻。他在池塘边的遮阳伞下坐下，把巴拿马草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这时便露出了光秃闪亮的、晒黑了的头颅。这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喋喋不休的、典型的靠战争发财的骗子手和投机商……我回到休果身边，告诉他说，范·德·贝先生终于露面了。

休果立即全神贯注，变得更紧张，但是更沉着。我非常熟悉他的眼睛和嘴巴的这种表情，它明显地表达出猎手的激情。他要我看着他的大衣，他自己到花园之间的一条小道上去侦察了。

“是个极好的目标，”他回来说。“对于谁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汉娜，如果考虑到这位先生的所作所为，那就更是这样。”

“你不可怜这个娇滴滴的寡妇吗?”我问。

休果回报我以那种特有的、纯粹是男人们表示厌恶的动作，使我笑得跌倒在松针堆上。

过了些时候，如果范·德·贝还是打算乘车出去的话，那么可以预料，他不久就该动身了。我们搂抱着，好像一对觉得除了自己以外便什么也不存在的恋人，又漫步向领主宅第走去。休果又穿上了自己的大衣，而我已经不捧花束了。

“怪可惜的，”休果说，“不过这会成为多余的标志，就让花留在这儿吧……”

我们互相紧紧地偎依着，在领主宅第前的高高的绿篱笆旁边站了一会。我们终于看见了期待已久的事。汽车开动了。露台上再也看不见范·德·贝，而他的妻子懒洋洋地仰卧在躺椅上，现在连小孩子也猜得到，纳粹的走狗独自乘车出去了。

休果推了我一下，因为汽车已经灵巧地绕过草坪，向我们开过来了。我们往四下里看了一下。不能说周围渺无人迹。有辆汽车正开过附近的一条林荫道，虽然不是德国鬼子的。在离我们不很远的几个花园里，坐着些人——看书报的，喝茶的，休息的。但是我们必须碰碰运气。我们的手枪已经安上了消音器。我们走近围墙。深色长车身汽车减低速度，开近了铁栅栏大门。我和休果紧紧拥抱着，站在车道中间。司机对我们直按喇叭。

我们假装受惊，分开跳到两边。我在司机的一边。休果在坏蛋一边，那坏蛋正仰靠在亮光光的皮靠垫上坐着——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他的巴拿马草帽。

等汽车一开出围墙，我们几乎同时开了枪。我开了两枪，休果开了三枪。我不知道休果是怎么想的，可是我心里说："这是你杀害乌克兰和波兰农民，出卖他们的妻子儿女去当奴隶的下场！……"汽车从我们中间开过去，突然来了个急转弯，这和司机有意识拐弯完全不同。无人驾驶的汽车往旁边一拐，撞到了树上。我们对汽车监视了几秒钟。车子里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也毫无声响。只有发动机在喑哑地嗡嗡响着。

我们挽住手，回转身去，沿着花园之间的便道走了。迎面遇上两位步履艰难的先生，大概是退休的。我们迅速地从他们旁边溜了过去。他们并没有注意。我们走到一条林荫道上，道边有一些小别墅，每个别墅前边都长着一棵橡树和一棵栗树。休果发现有一辆自行车靠在树上。他向周围望了望。住宅区里直到此刻还没有人惊动。炎热的太阳静静地照耀着花坛、树木和房屋。休果抓过自行车，一条腿飞快地像杂技演员那样灵巧地跨过了坐垫。

"坐在后面，汉娜，"他说过就蹬开了车子。我跳上书包架，坐稳了。休果开头骑得很沉着，我们就这样经过了林荫道。我好像觉得后边有人喊了一声，不过这可能是花园里的孩子们喊的。休果越踏越快。这时候已经用极快的速度拐上了公路，那里有用石板铺得平平整整的自行车道。在一个岔路口，那里有家小饭店，休果拐到了一边；有一辆德国国防军的灰色汽车从我们旁边疾驰过去。我一直没有作声，免得打扰休果，他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五分钟以后，我们已经上了通往马坦斯得克的公路，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根据站牌上的说明，这是开往乌得勒支的车。休果从木栅栏上边把自行车扔进草地上的深草丛里。这样，自行车一时是不会被发现的。我们至少等了一刻钟，道路转弯的地方才出现了一辆噗哧噗哧响的公共汽车，车后喷出一条黑烟尾巴。跟往常一样，车上挤得满满的。我们总算挤进了坐满乘客的坐位之间。乘客们暗暗笑起来，我明白他们是在取笑休果的冬大衣。

“你害怕天要上冻吗？”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汉子问道，这个人腿上搁着个藤包。有人还在暗暗笑着。我也跟着傻笑，而休果却说：

“从早上起我就拿定主意穿得暖和些……其实，你也绝不会知道，今天老天会给我们送来什么。”

看来，不管怎么着他也是快活的。总之，他不值得去冒险，我心里想。他对于盟军登陆的暗示取得了非凡的效果。我从车头的反射镜里看见了驾驶员的笑脸；乘客们谈笑着，再也没有人想到大衣了。

车子到了乌得勒支，我们又体会到了上下车时极端拥挤和混乱所必然带来的遂愿和安全的感觉。我和休果尽一切可能不让挤过我们身边的乘客碰到我们身上的手枪；我们歪歪扭扭地竭力摆着最粗野的姿态，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被当作两个平常人，没有任何人怀疑我们。

在乌得勒支，我们转乘沿着费赫特河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公共汽车。快六点了。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可以在戒严以前到达哈勒姆。离开乌得勒支的时候，我很高兴，这一次我们占到了坐位，虽然还是那么闷人和拥挤。休果脸上淌着汗珠。我们在

上车前买了一份报纸。德寇报道，他们仍在强有力地反击着在诺曼底登陆的同盟国军队。我们也看到了一条令人悲伤的消息。登陆那一天晚上，在赫托亨博斯有二十四位爱国志士因为破坏和捣毁布拉邦特[1]的德寇交通线而被枪杀。休果默默地把这条消息指给我看。我看过消息，并且从牺牲者的名单背后看到了占领者的残忍、虚弱和狂暴，他们想不出别的任何办法，只能残杀无辜的人来为自己在主战场上的惨败报仇。我心想，在比尔特霍文大概已经发现了“东方公司”的头面人物及其奴才，德寇的笨脑袋也许会醒悟到，就连在我们这个小战场上，他们也遭到反击……利文斯硕士现在大概也知道这桩事了，他一想到休果和我，定会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们依然很走运。虽说烧木柴的发动机不止一次发生故障，我们的公共汽车还是在七点钟到达了阿姆斯特丹。我们决定乘浅蓝色的电车去哈勒姆。我们急于在戒严开始以前赶到目的地，电车沿着古老的运河疾驶，快到哈勒姆了。我觉得，一切都和从前我跟随父母出国旅行归来时一样，掠过我眼前的，首先是荷兰柳，故乡河流的水。而这就是我心爱的阿姆斯特丹的大门，柔和的金黄色的落日的余晖把它映成了红褐色……若是我屈服于感情的冲动，那我就会向双亲的住宅奔去。来到故乡城市，我真是激动得不能自已。然而理智占了上风。我默默地向费斯特要塞围墙致敬，向静静的堤岸致敬，向圣保罗大教堂的高耸的塔尖致敬，向布满湿斑的绿幽幽的光荣的劳伦斯·杨斯左恩纪念碑致敬，向……

我们在斯霍特辛格尔街上敲“烟囱”的门的时候，已经敲过八点了。给我们开门的是女主人本人——抵抗运动战士的守护

[1] 荷兰南部的一个省；赫托亨博斯即本省行政中心。

神。我们相对而笑，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吃饱了小麦粥，疲乏得要命，在沉入梦乡以前，我想到，我们没有找到刁狐狸，只是在半路上顺便收拾了两只鬣狗，因而我又想起了我和休果刚刚结束的出征……

谴　　责

第二天早上，我和休果取出我们寄存的自行车，骑上车子，又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了，我们兴致勃勃地向指挥所，向"西班牙橡树"大庄园驶去。但是，在路上，一想到我们必须做麻烦的解释，就有些败兴。我偷偷看看休果，我真想知道他这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可是他不动声色。

我们好歹鼓起勇气跨过了指挥所的门槛，就好像昨天我们还到过这里似的。我们走进大房间，休果在前，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神气——好像在说：谁敢责备我。这时所有同志的视线都集中到我们身上了；我们看出了这些目光中的疑问、责难、惊异和困惑；因此我立刻茫然失措了。所有的同志都在场。大家纷纷叫喊起来：

"喏，这不是他们吗！迟来总比不来好啊！"

"又浮上来啦，浪荡子们？"

"你们还活着呀？"

"一定是待在英国吧，啊？等到登陆了，就回来啦！"

我环视了同志们的面容……在那边站着的弗兰斯显然准备要挖苦一通；鲁朗特的眼睛里凝聚着痛苦的责难神情；新组员奥托和威贺尔正惊异地凝视着我们；威南特虽然也在摇头，可是看得出，他见到我们是高兴的；还有弗洛尔，他那刚毅的眼睛也

正严厉地注视着我们。穿着冬大衣的休果和我并排站在房间中央。房间里又热又闷，围在四周的同志们，都脱掉了上衣，相形之下，休果的样子显得很奇特。我朝鲁朗特和威南特微笑了一下，他们两个的目光，比其余的同志友爱些；休果的头在慢慢转动，我明白他是在依次审视每一个同志。寒暄之后，房间里再也没有人说话了，这叫人局促得难受。休果的目光停留在弗洛尔身上了。他们谁也不说话，面对面地站立了漫长的、像铅一样沉重的几秒钟。我越来越不安了。

"嗯？"休果终于冲口而出。"说话呀！"

弗洛尔迎着他走了几步。我发觉弗洛尔的脚有点瘸，我立刻想起，五月一日在试图解救维帖林赫斯汉斯监狱的囚犯时，他的大腿受过伤。

"嗯，说吧！"休果重复道。

弗洛尔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这么说，你也觉得自己错了，是吗？"他说。"好在你还能感觉到这一点……失踪了三个星期，一点消息也不透，扔下自己的同志们，天知道在哪里浪荡，而且还带走了一个战士！"

弗洛尔刚刚看了我一眼，我便站到了休果身边。

"难道我是那种能让谁把我带走的人吗？"我激烈地抗议道。"我是自愿和他一起去的，弗洛尔。"

弗洛尔抬起一只手，好像在拒绝听我作任何说明和辩解。

"多么好的一对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就会受到严厉惩罚的。如果党要停止我们的工作一两个月，我不会觉得奇怪。"

我跑到弗洛尔跟前，抓住他长长的大手一抖。

"不，不，你们不要这么想！"

我环顾周围的同志们，一甩头发，昂起头来挑战地说：

“你们想到哪儿去啦？我们是去休息去消遣的吗？……不，我们是去打猎的！”

一直出奇地保持沉着的弗兰斯走上前来说道：

“打猎？打什么人？”

“福斯兰德，”我断然答道，这时候我却开始感到尴尬了，因为休果正负屈地而且甚至好像是驯服地沉默着。

“啊，果然是，”鲁朗特说。“我也这么猜想。自从我们告诉他俩是谁出卖了托姆、艾迪和杨以后，他们两个就突然不见了。”

“你们逮住他了吗？”弗兰斯很固执地问道；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要比对我们违犯党纪的事关心得多。

休果脱掉身上的冬大衣，把它扔到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

“没有，”他转过身去，背朝弗兰斯回答。

“我们发现了他的踪迹，”我说。“可是给他保镖的力量太强了，有法西斯喽罗，狗，德国侦探。他们竭尽全力，把他当作一个宝贝保护着。”

但是弗洛尔仍然没有改变态度。这一次他看着我了：

“难道这就要花你们三个星期的时间吗？白白浪费三个星期？”

“不完全是这样，”我回答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收拾了一个斯哈耳克哈尔的稽查和一个征集奴隶的家伙——‘东方公司’的股东。”

“这还算多少干了点事，”弗兰斯说。

“这都很好，”弗洛尔愤怒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们钻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这种事先不征得抵抗运动委员会同意的擅自行动，只能是最后一次！你为什么不讲话，休果？”

休果坐在椅子上卷着纸烟，眼睛一直看着烟丝盒子和卷烟纸。

“汉娜已经全都说了，”他回答道。

弗洛尔朝他转过身子，瘸着腿跨上一步：

“我指的不是这个，”他大声喊道，“你自己也知道说的不是这个……违犯纪律的事，你连提都不提！也许你已经把纪律这个词的意义全忘光了吧？”

休果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又看见高大的弗洛尔和矮小的休果彼此面对面站着，正像上次弗洛尔领我到隐蔽着休果的费利缅家里去的时候一样。那一次他们是闹着玩的，而现在的情况却严重了。我明白，如果我们不加以干涉，他们立刻就会厮打起来的。

“弗洛尔，”我急忙站到他们中间说。“关于违犯纪律的问题，你说得对……可是我们也有对的地方：若是我们消灭了福斯兰德，那么你们大家都会为此而感到高兴……我们遭到了挫折，真的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太不走运了。”

弗洛尔朝我转过身来，抱怨说：

“你总找得到借口。好吧。我什么也不说了。”

房间里长时间保持着不愉快的紧张气氛，尽管威南特不知侥幸在哪儿弄到了啤酒，竭力设法缓和我们这儿的气氛。我们拿着杯子默默地坐着，谁也没有开口，虽然我觉得有好多事情正需要在这时候谈谈。

“托尼怎么样？”我终于望着弗洛尔问道。

“肩膀负了伤，”弗洛尔简短地回答；他显然还是不愿意改用和善的口气。“骨头打碎了。折磨人的事……不过很快就会复原的……”

“我明白，”我说；虽然我竭力想把话说得自然些，希望驱散笼罩在房间里的少有的令人难堪的情绪，可我的声音还是发颤了。“你们没参加最近一次对维帖林赫斯汉斯的袭击吧？”

弗兰斯和鲁朗特同时挥了一下手；这是可以随便怎么理解的。弗洛尔看了我一眼，缓缓地摇摇头。威南特说：

“那是‘忠诚’抵抗小组……约翰涅斯·波斯特领导的。你们听说过他的名字吧……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只知道他们几乎全都给逮住了。”

“而且后来全被处决了，”鲁朗特补充说。“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托姆、艾迪和杨怎么样了？”我低声问。

“还蹲在监狱里，”弗兰斯回答说。

“有什么希望吗？”

没有人回答我。只有弗兰斯耸了耸肩。

“德国强盗越来越恶毒了，”他说。“你们知道海里特·杨也落在他们手里了吗？”

“阿姆斯特丹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休果没有把握地问。“五月一日袭击末了，我亲眼看见他骑着自行车逃掉的嘛！……”

“对，那时他背上中弹了，”弗洛尔交叉着自己的一双大手说。“这你们是不会知道的……他平安地挣扎到了他在普林森格拉赫特的秘密住所。住宅的女主人为他去请医生。可等他们赶来，发现海里特·杨已经瘫痪了。下半身和两条腿都失去了知觉。子弹卡在脊髓里。”

在这以前，我原觉得自己受了屈，身上怪热的。可是这时候我一下子感到冷了，好像有一阵寒风刮到我身上。我坐着，仍旧凝视着弗洛尔。

"……他就这样躺了两个星期，"弗洛尔继续说。"他的朋友们当然明白，他必须离开那里隐蔽起来。他们多次劝他转移。这原可以用救护车来办到的。可是他不愿意。结果被德国侦缉机关发现了。"

"他们用医院的担架把他抬去审讯，"弗洛尔一说完，弗兰斯就接着说。"他当时就坦率地向他们说出了他对他们的一切想法。"

"怎么，逮捕和审问一个瘫痪了的人？"我大声喊道。

"那你以为怎么呢？"弗兰斯说。"难道你是头一次听说纳粹匪徒和他们的习性吗……他们还会判处他死刑呢，你瞧着吧。"

我看了看休果。他一直坐着，低着头，手指上捻着还没点燃的纸烟；被捻得粉碎的烟丝纷纷落到地上。

"听我说吧！"他突然说话了。他的嗓音听起来发哑而且有点犹豫；他显然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他决定要说的话来的。

"这是实话。我的行为像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是我的错……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总以为，如果我计划要做一件事，那就一定要把它完成。这一次，我在追捕福斯兰德的时候，也是这样……即使我已使汉娜冒着危险了，我也没有停止……汉娜的行动是好样儿的……可是现在，我听完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情况，我明白我没有权利离开，尤其是带着汉娜一道……你们给我个机会吧，弗洛尔，还有你，弗兰斯，让我补偿我的过失……"

当我听见休果用悔恨的语调说到自己也说到我的时候，我脸上便火辣辣地烧起来。我心疼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失，然而我同时也为他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是多么困难。我没敢看他一眼，但是我觉得，在休果终于认错的

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是很激动的。

弗洛尔首先发言。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完全变了，有点嘶哑。

“好，休果……你证明了你并没有忘记纪律……我想，我们大家对他的发言都会满意的……”

他干咳了一声。

“可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呢？……”我问。“我是赞同休果这个观点的：逮住福斯兰德是有好处的……”

“嗯、嗯，”弗洛尔拖着腔在找话头。“本来不想肯定说你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你和休果有个共同点：你们两个都固执、任性。在这方面你像个男子。”

我撇撇嘴。

“这算什么，是恭维话吗？”我问。“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我的想法和休果一样。我实在懊悔，我们事先没有得到你们的同意，就在一个人身上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更懊悔的，是他逃脱了我们的手心。现在，我只希望一点：给我一个什么任务。顶好是最最困难的。否则，我会始终受到良心谴责的，而这是我绝不愿意的。”

威南特、鲁朗特和新参加的威贺尔都微微地笑了。弗洛尔吃惊地望着我，不住地抚摸着他那长满硬毛的面颊，可是没说什么。

我和休果骑车回费利缅家去。休果把大衣打成包，放在书包架上。我们骑车行经哈勒姆的街道的时候，一些互相矛盾的念头一直折磨着我。我终于忍不住在区邮局附近下了车，请休果等等我。我在邮局里买了一张明信片，用生了锈的钢笔蘸着劣质的公用墨水，潦潦草草写了两句话：**羊拉的小车仍在行进。驾车的小姑娘平安无事。**

我在明信片上写了我双亲的地址。虽然我写的寄件人的名字是假的，他们一看就会明白这是谁寄的。自从我小时候在上艾塞尔① 度假，乘这种小车跌进干水沟以后，“羊拉的”这个说法就成了我们家里最爱用来开玩笑的话。让父亲和母亲知道，我一切都好。是该给他们一点点我的消息的时候了。

继续游猎

杨和卡琳·费利缅十分高兴地迎接我们，对我们格外热情，我明白了，他们曾为我们两个非常担忧……在我们出征期间，我看出休果也暂时排除了对费利缅夫妇的思念，我则几乎没有想起过他们。卡琳当天就急忙用淀粉和珍藏在小口袋里的筛得很细的小麦粉烘了个大蛋糕，而杨则腼腆地微笑着递给我一束春天的花；他整个的小菜园已围上了一圈宽阔的、青绿的、茂盛的灌木丛；远处沙丘上的野麦草徐徐摇动，闪着银光；蔬菜出芽情况极好。唯有海斯好容易才认出了我们。三个星期，这在小孩子的生活里是个很长的时间。他起初疑惑胆怯地望着我们，当我在他面前取出香粉盒子，像往常那样咔嗒一声打开盖子的时候，他也微笑了。看上去，他脸上好像放光了；他欢欣地望着我，朝我伸着两只胳膊，张着手，快活地喊叫起来：

“给海斯也抹个白鼻子！……”

我把他抱在怀里，按他坐在我的膝盖上。香粉从他漂亮的小脸上洒落下来。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不能取得海斯的信任，那我就会感到自己是不幸的人了。

不久，休果和我被召往哈勒姆：我们指挥所接到了党的新指

① 荷兰北部的一个省。

示。自从受到谴责以后，我们的心情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我们动身前往指挥所，在那里遇见了弗洛尔。最初他像是斜视了我们一眼，不过他大体上保持着这样的态度：绝不能使人猜疑到，似乎他对待我们两个比对其余的同志差些。显而易见，抵抗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已决定撤销弗洛尔对我们的谴责。为此，我无限感激老同志们。

弗洛尔和我们组的全体成员坐在桌子周围。弗洛尔带着北荷兰人所固有的认真劲开始说明我们面临的任务。现在，第二战场事实上已经开辟，盟军无疑即将突入法国。而这就是说，军事行动将迅速转到北方，因为继法国之后，必定要从德寇手中夺取作为海上要塞的比利时和荷兰，首先是荷兰。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弗洛尔着重指出，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瘫痪德国战争机器的神经中枢——交通线。如果我们，也就是正试图挣断锁链的被奴役的各国人民幸运，而且如果我们能给英国人以帮助，那么光复大概就在不远的将来……当然，弗洛尔依次看着我们大家说，不应该只想到眼下就要光复，而必须把它作为自己最终的目标。不可去冒不必要的危险。各抵抗小组应当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在即将到来的艰巨斗争中，哈勒姆抵抗运动委员会得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在哈勒姆周围地区，特别是哈勒麦尔·麦尔围垦地征集粮食。地下工作需要的物资很多，然而主要是粮食。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互相对看了一眼，大家都感到有点不解和失望。弗兰斯搔搔后脑勺，仿佛他希望听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休果有点神秘地微笑着。弗洛尔仍然不动声色地讲着，因而我们无法知道他自己对这个指示的看法。总之，他显然是在准确地完成交给他的使命。他宣布，弗兰斯和鲁朗特将负责领

导粮食采购工作，接着他似乎想要安慰安慰我们似地补充说，在目前，这项工作对抵抗运动极端重要。这一工作将为准备更大规模的行动提供可能性……

看起来，同志们都逐渐迁就了这样的情势。弗洛尔很快结束了自己的报告。忽然，他朝我和休果转过身来，凝望着我们，这目光好像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他说，他要和我们两个谈谈。同志们顺从地走出了烟雾弥漫的房间，我们和弗洛尔面对面坐着，忽然觉得同他在一起有点局促和不习惯。

他默默地仔细看着我们，然后点了点头。休果十分平静，我却心慌意乱；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发觉了。弗洛尔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瞧瞧你这副愁眉不展的面容，汉娜！"他说。"心里一直还在苦恼吗？别再想它了吧。我们有别的事。"

我不自觉地向弗洛尔挪近了些。休果一动也不动，只是更注意地看着他。弗洛尔把一双有力的大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交叉起来。

"你们好好听着，"他说。"你们已经知道你们小组当前要做的工作。我有个特殊任务交给你们两个，应当说，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比起责骂你们来，我要高兴得多。任务是危险的。"

休果抓住了卷烟纸——这是表明他在克制自己激动的惯有动作。他微微笑了笑，那晒黑了的面颊变成了圆的。我看得出，他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弗洛尔最后一句话使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我又一次确信，休果的一切思想和举动反正总是会在我的意识里得到反映的。

"你们要交办的究竟是……"休果说。

我郑重地点头，表示支持休果的话。

“你们不在此地，这里发生的事你们连一半都不知道，”弗洛尔说。“例如，近一个月内，德国鬼子已经在千方百计加强他们的警察机构……这显然与对抗盟军登陆的措施有关……任命了一个新的警察局长，他叫赫列包特。莱顿人。占领初期就是纳粹分子，狂热的告密者和反犹分子。他特别喜欢鼓吹到东战场去，而自己却留在此地，好对无力自卫的居民采取恐怖手段，把他们廉价出卖给德国鬼子……”

“够了，弗洛尔，”我说。听了对新任警察局长的介绍，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不是头一次遇上这种家伙，可是我对他们的仇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

“他在什么地方？”休果问。

弗洛尔轻轻地笑着说：

“这得由你们去调查。我能告诉你们的只有一点：除了赫列包特以外，在各个重要职位上，还委派了好些坏蛋。占领者当然明白，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把警察机器的螺帽拧得更紧，为此委任了一批丧尽天良和极端残忍的出名的恶棍……明白对你们的期望了吗？”

“明白了，”我回答说，“你记得的名字多得很，而不仅仅是谈到的赫列包特一个。”

弗洛尔站起身来，笑着对我说：

“可能是。你们暂且就从这位先生着手吧。弗兰斯知道这个任务……现在我得走了：我还有事。祝你们成功！”

告别是简短的，然而是友爱的。白毛弗洛尔的脚步声已经到花园里了，我和休果一直还坐着，面对面地看着。休果赞叹地说：

“多好的一条汉子！……”

不久我们也离开了指挥所。我们的情绪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好极了。

我们说呀，笑呀，忍不住真想闹一闹。这种快活是被我们的归来、新的任务和非常好的天气引起来的。我们在哈勒姆公园里一个卖冰淇淋的售货亭旁边站住，我们买到的是代用品——奶油方糕，况且奶油还是奶粉做的，用自行车打气筒打起泡沫来的；方糕在嘴里留下一股木屑的味道。我们一只手推车，另一只手拿着小点心，在公园的小径上走着。

"我们这儿的日子毕竟过得太好了，"休果说。"戈培尔亲自指出了这一事实，不久以前，当他逗留在阿姆斯特丹'亚美利加'饭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你给我讲讲吧，"我请求说。

休果开始讲了，但是，我突然停住脚，轻轻惊叫了一声，他就没讲下去。小径上迎面走来一个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没戴帽子，风摆弄着垂在他额上的一绺银发；他抄在背后的手上拿着根手杖。他的神色是安详和沉思的。一股热血涌到了我脸上，我突然感到浑身发热了。可是残酷的现实立刻吓走了意外相逢的短促的欢乐：我的父亲和我是不应该在这哈勒姆的街上见面的。

"快，休果，"我说。"迎面来的这个人，不能让他看见我。你挡住我。"

我不知道休果是怎么把他的自行车迅速而灵巧地推到我面前的，他用这个办法遮住了我，挡住了对面来人的视线。而我则朝自己的自行车弯下腰，好像在挂包里寻找东西，虽然包里除了一块破布以外什么也没有，——挂包从来就是空的。在阳光照耀下的灰石板上，我看见了走过我身边的父亲的脚，——我多么

熟悉他的脚步啊！我小心翼翼地伸直身子，目送着父亲。他的步子还是那么均匀，既没有表示兴趣，也没有露出惊异，——他没有看见我。

等到我重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我浑身都在颤抖。休果什么也没有问。他大概全都明白了。

我们上报纸了

收拾赫列包特的经过是漫长的和枯燥乏味的。看来，他根本不打算让我们有机会来结束他的罪恶生涯。休果已经打听清楚，他居住在赫姆斯特德的一个犹太工厂主的住宅里，那个犹太人大概就是由他亲自下令流放的。坏蛋去他哈勒姆的办事处总是坐小汽车的。我们在路上，在那些比较容易袭击他的地方守候着。他反对开慢车。有时，我们甚至到赫列包特的私人花园里等候他；可是他似乎感觉到有危险，一连几天回家都很晚……晚到我们必须撤离的时候。

最后，我们到底把他截住了；他的汽车大概出了毛病，所以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去哈勒姆。我们一直追到丘陵上的运动场，才赶上了他。路上交通繁忙，我们在密集的汽车中间熟练地转了个弯，在恩敦豪特附近一下子冲上去截住了坏蛋的去路，于是他陷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了；我们开了枪，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这是一次闪电般的、大胆的和成功的刺杀。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那里，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一辆电车也停了下来。我们连一秒钟也没有停留，骑着自行车，穿过公园朝斯帕尔涅方向驰去，经过东城郊，在费斯特堡垒旁边回头，又到了哈勒姆。大街上已经在谈论赫列包特被杀的事。可见我们没有白白

浪费子弹。

我和休果平安回到了位于沙丘后面的费利缅的庄院，这儿是恬静舒适的。休果又开始和杨一起在菜园里干活；这可以帮助他恢复精神镇定。而我却照常独自散步。枝叶繁茂的灌木丛，小橡树发出的香气中微含着的苦甜的白桦的气息，远处不规则的沙丘的褐色波状轮廓，——那沙丘上空只有风在闲荡和海鸟在鸣叫，这一切都使我心旷神怡。我漫步于狭窄的小径，可是更常常躺在青草地上，双手垫着头，望着长风横扫夏日天空的薄云，什么也不想。也许是我自以为没有想。或许在我心灵深处隐藏着忧伤。或者是某种回忆、某人的形象萦绕在我的心头……一个沉思着的中年人的形象，没戴帽子，额上有一绺银发；他抄在背后的双手握着根手杖……这个人现在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在哈勒姆公园里他从我身边走过而没有认出我来……不，不是那样：这个人，是我不得不躲着他的，我没有权利和他来往……

有时候，在最不适当的时刻，我的眼泪会突然涌上眼眶，而我却对自己毫无办法。卡琳当然是看见的，不过她什么也没有说；我希望，无论是杨还是休果都不会发觉。

在袭击赫列包特以后，过了三四天，我们这里来了个客人。他是白毛弗洛尔。一看到这个诚恳的、一向沉静的人，我就感到心情舒畅了。从休果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来，他对弗洛尔的到来也感到很高兴。看来，弗洛尔自己的情绪也好极了；他的眼睛里闪着笑意，嘴上挂着微笑。一等外人离去，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便说道：

"报纸上提到你们了。"

"没什么了不起！"休果带着老剑客的神气轻蔑地说。"这又

不是头一次！……”

弗洛尔伸手到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哈勒姆新闻》报。

“可是像这样绝妙的评述，你们大概从来没有看到过哩。”他说。“喏，请看吧……这里说到你们。”

在菜园外面，我们在通往沙丘的道路边坐下来，这里草木葱茏，海风轻拂，一片寂静。休果打开报纸，我靠在他肩上。起初我甚至弄不懂，弗洛尔为什么要让我们看一篇几乎占了一整栏的题为《世风日下》的评论。但是才看过开头几行，就全都明白了：

> 昨日在距哈勒姆不远处发生十分残酷之凶杀暴行一起。方受任不久之地方警察局长，正自赫姆斯特德安然骑自行车赴办公处所，在交通繁忙处为青年男女二人追及，该二人冷酷一如野蛮人，竟以手枪对之连发数弹。伤势极为严重，虽有医家急赴救治，但已属无效。

“这么说，我们净赢了个一比零……”低声读着评论的休果说。“可是这和‘世风日下’有什么关系呢？”

“你往下看吧，野蛮人，”我建议说。“法西斯的道德经马上就要跟着来啦！”

接着，这位法西斯化了的撰稿人不厌其烦地恶毒地咒骂抵抗运动组织。他说我们的人民在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独裁者影响下已充满了兽性，而抵抗运动组织正是这种兽性的策源地。

文章末尾断言，黑红二色的法西斯旗帜仍将在荷兰上空飘扬，说狂人的子弹固然能把人消灭，但是理想永远也消灭不了。这时候，我也和着休果的男高音和弗洛尔的男低音哈哈大笑起

来。

"这个卖身投靠敌人的帮闲文人谈到世风日下，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等我们稍稍平静下来了，休果终于说道。"他们还不如谈谈大批屠杀犹太儿童的那些人的兽性吧……"

"或者谈谈集中营里的世风，谈谈在西尔伯坦涅的屠杀和大规模的掠夺，"我补充说。

弗洛尔一直在微笑着，不过含着点讥讽。

"你们未免过于看重这些专事造谣的耍笔杆子的家伙了！……"他说。"要知道，真正的爱国者是不屑和这种流氓争论的。就连像你们现在这样在背地里议论也不会。"

休果把报纸叠好，塞进了衣袋，我立即问道：

"你说说，弗洛尔，既然你到这里来了，那么你总是有事来找我们的吧？下一个靶子是谁？"

"汉娜就是这样称呼我通常称之为强盗的那些人的，"休果补充说。

弗洛尔把视线从休果身上转移到我身上，他严肃地说：

"按照抵抗运动委员会开的名单，下一个该轮到赫列包特在赞丹的同行了，因而委托我们从路上把他清除掉。"

"正对劲，"我同意了。休果称心如意地点了一下头。

"可他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他随后问道。"也是个一朝得志爬上去的小人、败类吗？"

"他原先一直在警察局里干着卑微的差事，"弗洛尔回答说。"只是在学会了喊'万岁'和'海尔希特勒'以后，才一下子显赫起来的。在那以前，他在仕途上不曾有过任何升迁……"

"庸碌之徒，"我说。"正是靠了自己的庸碌无能才飞黄腾达的。"

“也许是这样，”弗洛尔赞同说。“去年他当上了赞丹的警察局长，他对居民们了如指掌；他几乎说得出每个居民在战前加入过什么党派；他特别注意反法西斯战士，靠贩卖人口积攒了一笔很不小的财产。这还没有把他因为抓住了地下工作者和犹太人而得到的赏金算在里面呢。”

“可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赏给他子弹？”听了弗洛尔对这个纳粹分子所作的描述，我越来越激动，我大喊了一声。

弗洛尔耸了耸肩：

“我们过去不清楚他的罪恶有多大。你们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活动分子；他们害怕暴露自己的‘功绩’。他们的诈骗行为都是偷偷摸摸搞的。可是现在警察局里有人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于是，这个坏蛋的累累罪行便都大致清楚了。这个坏蛋叫杰恩·德鲁特。”

“看来，这第二个警察也是把好手——在盟军登陆以后转到我们这边来了！”休果挖苦说。

“当然，”弗洛尔同意了。“总之，他的消息与我们早已预料到的相符……随着在诺曼底登陆的英国人的桥头堡向巴黎方面扩大，我们的情报将会越来越充分。不过，还有一个情况，使得查安的抵抗运动委员会不愿对这个德鲁特下手：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区出头露面，因为随便哪个坏蛋都能在大街上认出我们来——他们都有关于我们相貌特征的记录。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冒险。”

“所以收拾这个德鲁特的荣誉就落到我们身上了，”休果说。

我沉默了一会。弗洛尔最后的话突然勾起了我在这以前本已从脑子里排除的念头。我感到惊愕和慌张，仍旧站在原地没动。

弗洛尔和休果吃惊地对我看了一会。我碰了一下弗洛尔的肩膀。

“弗洛尔，”我说，“你说到特征……你看，哈勒姆的坏蛋手中也有我们的特征吗？报纸上提到了两个青年男女。总之，已经有人看见过我们……”

弗洛尔看了看我；他鼻子旁边的青筋不安地跳动着。

“有人看见过，是呀……不过这无所谓。步行和骑自行车来来往往的青年男女多着呢！”

“哈勒姆也有一些人认识我，”我不同意地说。“可我连这些人是好是坏都不了解……”

“汉娜，”休果说，“你这会儿是怎么啦？”

“弗洛尔提醒了我，”我回答说。“问题是，千万别因为这一点把警察引进我双亲的家里。”

“你以为到处都有恐怖存在，这是错觉，”休果埋怨说。“我已经在这一带做过多少工作，可我的特征他们到底还是没弄到手……要不然，我母亲在艾梅登早就有所觉察了。关键是行动快，隐蔽快……”

我机械地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完全同意休果的说法。我眼前好像又出现了父亲和母亲在我们家厨房里的情景（为什么我一想起来就总是想到厨房，后来我才明白），而在父亲和母亲身后，出现了尤迪菲那张衬着深色发辫的沉静、温顺的脸……

“不，”我短促而果断地说。“我必须到哈勒姆去。今天就去。我应该弄清那里的情况。”

“我今天刚从那里来！”弗洛尔说。“如果你父母出了什么事，我们小组总该知道的。”

“我一定要去，”我坚持说。“在我没有弄清楚家里是否安全

以前，我不去赞丹。”

休果和弗洛尔发愁地对望了一眼，男人们遇上女人的执拗脾气，通常总是这样的。休果嘟哝了一句什么，用鞋尖对着一个土块使劲一踢，弗洛尔则伸手去摸面颊。

“你听着，汉娜，”弗洛尔忽然说。“我马上就要到肯涅麦兰特去，不过我也可以经过哈勒姆……我答应你，一定向你报告你双亲的情况。如果他们平安无事，我就给海斯·费利缅寄张明信片来，写上一句：‘衷心祝贺’。”

我摇摇头。

“不，问题不是这样。父亲和母亲必须马上采取一些措施。如果你愿意经过哈勒姆，我从心里感激你。不过你得给我带个便条去。而且要亲手交到。”

“好，好！”

我朝住处走去，两个同志默默地跟着我；看来我的行为很使他们吃惊。我钻进自己的小房间，拿起纸笔匆匆写道：

> “亲爱的爸、妈：尤迪菲必须立刻离开你们。请尽可能为她做到一切。我过得好极了。拥抱你们大家。且再稍事忍耐。胜利在望。汉。”

我把短简装进一只空白信封，拿了去交给弗洛尔；他正顺从地坐在他自行车旁边的石阶上等着我。他把信收藏好了。

“放心吧，汉娜，”他说。“信在这里丢不了的。”

我目送着他。他立刻骑上自行车沉着坚定地沿着小路走了，阳光照得他的头发闪着金光。我的紧张心情平息下来了。我独自站在车道上，我又感觉到了身边存在着一支由朋友们组成的庞大的秘密队伍，我与他们心心相连，息息相关。等我回到一直还在原地徘徊的休果身边的时候，我已经能够微笑了。

踪迹忽断

第二天和第三天，弗洛尔没有到我们这里来，因而我放心了。如果我的双亲受到了什么危险的威胁，他一定会来通知我的。第三天来了一张色彩鲜艳的明信片，是寄给小海斯的；明信片上用奇妙的笔法写着："衷心祝贺"。我看见卡琳站在门口，把明信片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着，这时候邮差早已骑上自行车走远了。

"真是荒唐，"她低声含糊地说。"海斯的生日明明在十月。可这是谁寄来的呢？哪儿来的这个维特·德·维特①。这是怎么回事啊？"

她抬起头来，因为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说，弗洛尔履行了诺言，因为他说过："如果他们平安无事，我就给海斯寄张明信片……"

"别为这张明信片伤脑筋了吧，卡琳，"我说着，心情轻松地把抓着我裙子的海斯高高举了起来。"这不过是我正等着的一个通知……喏，海斯，这张好看的小画片给你。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吧，把它撕碎也不要紧……"

我确信我的信已经送到了，我家里没有遭到任何危险的威胁，这使我心情非常振奋。我本来竭力不去想我们即将在查安地区着手的行动，因为我心里对它还没有精神准备；而现在我却感到浑身是劲，似乎完全可以对付十个德鲁特之类的坏蛋了。休果正在草莓垄上松土，我去叫他放下活儿的时候，他有点犹豫地看看我。

① 荷语Wit的谐音，可作"白毛"解。

“休果，”我对他说。“该去侦察了。”

他顺从地直起身来，在旧工装裤上擦擦手，同样顺从地到木棚里换衣服去了。杨·费利缅拿起休果扔下的鹤嘴锄，含着狡猾的微笑摇摇头说：

“多好的帮手……这么一来，又把活儿全扔给我了。”

“找我们在伦敦的政府赔偿损失去吧，”我建议说。“政府正渴望着要给我们受屈辱的人民效力哩。”

“不过是嘴上一套罢了。”

一刻钟以后，休果穿着皮大衣和运动鞋从木棚里走出来。他检查了自己的自行车轮胎，随后又检查了我的，这才扬起眉毛看了我一眼；我对他点点头，意思是说，全准备好了。

“那么，走吧……”他低声说。

我们的赞丹征战开始了。

我说过，该去进行侦察了，于是我们也就从侦察入手。我一向以为自己是很熟悉赞丹的；然而，等到为我们的行动进行准备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这种熟悉是十分肤浅的。初步观察表明，我们应当在火车站所在的那部分城区行事。河湾很多的查安河有可能妨碍我们撤离，除非是乘小渡船，走铁路线上的天桥或者绕远路走大桥。周围全是水，哪儿也过不去。火车站旁边有个警察分局；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城市的这个地区兜了几圈，切实熟悉了区内情况，摸清了这里的大街小巷，以及许许多多穿过庭园和后院的狭窄通道。现在我们是用另一种眼光在看待城市。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并不是作为艺术家来观赏市容的，可是我们仍然发现它很美丽，虽说它显然有一点不足：港湾里没有装载木材的船只往来。堆木场几乎全是空的，河上也看不见高高的船桅。

“这些坏蛋给一切都打上了死亡的烙印，”我们在察看港区

的时候，休果说。

我们特地观光了立有彼得大帝塑像的小广场，彼得大帝曾为建造海船在这里忘我地劳动过，我们崇敬地瞻仰了刻在台座上的俄文题词。我们觉得，这题词——当然决不是它的内容——好像使我们和正在东欧毫不留情地打击我们共同仇敌的那些人亲近起来了。

"无论如何，他关心过赞丹建筑木材的供给问题，"休果说。"不过，同他和睦相处是不容易的……或许我说错了？"

"不，你没错，"我回答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有他们应有的执政者。他大概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使得自己的国家奋起前进了……而你，顺便说说，注意到荷兰和俄国之间从来没有进行过战争吗？"

"我不大精通历史，"休果笑了一笑，"不过既然你这么说，我也乐于同意，我甚至很高兴听你说。"

我们骑着车子慢慢往前走，以便熟悉警察分局和城郊公路之间那些街道的位置。

"休果，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说。"我们的国家向来都不关心同英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建立良好关系，这可是自作自受……对他们有利的，过去和将来，对我们也都是有利的……我要说，我们一些尊贵的东方邻居，无论从前和现在，所作所为都只有一桩：并吞我们的国家，强占我们的河流和港口，劫掠我们的航海船队……"

"甚至可以说，"休果冷笑着补充道，"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包括人和牲口在内。"

"我们必须指靠英国人，"我说。

"嗨，你总是离不了你那英国人，"休果挥了一下手。"我们

还是来考虑考虑怎样尽快发现德鲁特的踪迹吧。这是根绝我们尊贵的东邻侵略意图的最好办法。”

我们每一次“游猎”，都袭用一套相同的程序：最初几天总是侦察，识别我们关心的人物，对他进行摸底观察，以致跟踪到他家。我们从弗洛尔那儿听到的关于德鲁特的特征只是中年人，中等身材，极其普通的头发，灰褐色的眼睛……

“全一个样：中等、普通，”休果抱怨说。“赞丹几万居民都有这种特征。”

“除此以外，他还穿着军装咧，”我开玩笑地提醒说。

“还有凶犯印记哪，”休果尖刻地补了一句，“可是这印记你一下子是发现不了的……但愿我们能够在他的嘴脸上烙上这个印记。”

“那么我们应当努力先弄清楚，这副嘴脸的模样，它安在什么样的躯干上，”我回答说。

于是我们开始打听了。我们装作一对恋人，在警察分局前前后后散步，常常停在维斯特杰德的一些商店的橱窗跟前，虽然陈列的商品已越来越少。起初是根据推测，随后便老实向桥上站岗的或者清道夫探询，这样我们终于相当准确地弄清楚了，我们要对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弗洛尔的描述完全被证实了：这个纳粹走狗果然一切都是“中等、普通”的；如果他穿上便服，那看上去就会十分平常，毫无惹人注目之处。

他的眼神明显地表现着胆怯的敌意；这一点也许别人注意不到。我们几次看见他进出警察分局，每次总有人和他在一起。他身穿藏青色军装，似乎有点不相称，迟迟疑疑地，仿佛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所有这一切金银饰绦和奖章真是属于他的。他那几达二十五年的公务生涯全是在石板马路上度过的……一

个微不足道的岗警，被意外的幸运冲昏了头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为了捞钱，继续在犯着严重罪行。

“真的，他简直是一副可怜相，”当我们终于确信这个家伙正是那个德鲁特以后，我说。

“怎么，你可怜他吗？”休果嘲笑道。“因为他怎么也摆不出和那身制服相称的风度吗？最好还是想想凶犯的印记吧！”

“这个呀，我也许想得比你还多呢，”我被他的教训口吻惹恼了，断然答道。“让我先开枪，明白吗？”

休果看了我一眼，微笑着把自己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你看怎么样，我们还是照上次那么干？”他问。“一个人一边。”

“我们到时候是不是见机行事？”我提议说。

我们又发现双方的意见完全一致，于是我们开怀大笑起来。面对着警察分局，我们已经开始谋划，竭力设想着消灭卖国贼的一切细节：我们怎样接近他，事后怎样隐蔽，怎样消除自己留下的痕迹……我们就这么设想着，守候了敌人两三天。每天傍晚，我们都不得不急急忙忙赶回卡斯特里库姆郊外的菜园去，就这样一直毫无结果。我看见休果越来越沉默。他的脸色是严峻的和难以捉摸的，双目似乎凝聚着紧张思索的神色。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大概也有点相仿；当我见到费利缅夫妇时，从他们投来的目光中觉察到了这一点。

第三天，我们又到赞丹去了，我们停在维斯特杰德的一家书店门前，那里张贴着一张最新的报纸。我看了第一版上的一条消息，不由得一下抓住了休果的手。

“你看见吗？……”我用失去控制的声音问道，浑身沉重地靠在休果身上；我心脏的跳动慢了，似乎血液不再流进心房了。

“他们枪杀了海里特·杨，还有另外三个没有指出名字的人……”

休果两眼盯住了圈着黑色边框的那条小消息。他的脸仍旧是铁板板的，但是晒黑的皮肤里忽然泛白了。

“‘破坏并武装袭击……’”他小声念着。“这么说，他们终于把他杀死了，虽然他已经瘫痪……”

我抓着他的胳膊，这才没有倒下去，我深深地嘘了一口气。

“还有三个哪，没有指名的，”我说。“还有三个啊……”

休果看了我一眼。我们两个都大吃一惊。如果说起初休果脸色煞白，那么现在他的脸突然颤动了一下，由于充血而变暗了。

“决不会的，汉娜，”他低声说。

“这些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什么都干得出，”我说。愤怒代替了惊惧，我不再感到虚弱，已经从半昏厥状态中清醒过来。“你明白吗？……这是托姆、杨和艾迪。”

“决不会的……”休果重复说。他的嘴唇还在颤动，他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我们走吧，”我说过就拉着他走了。我们从一些房屋面前走过，经过一所学校，朝一个不大的码头走去，那里有只小渡船来回摆渡。我觉得，应该让休果离警察分局远一些；震惊之后，他可能会狂怒，那时，他很可能会轻举妄动的——谁知道呢，也许休果真会这么干的。

我们渡过了查安河。对岸是静悄悄的、安宁的；那里，在一些高大的工厂和废弃的仓库的阴影中，分布着相当简陋的工人住宅。我们沿着一些花园和设有高架小桥的运河慢慢走去；昨天和前天，我还曾睁大眼睛观赏过这些美丽如画的地方；而今

天，我却觉得一切——石头、墙壁和种着植物的土地——都是死气沉沉的；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人，也都好像幻影，没有真实感。我没让休果离开我；我们在鹅卵石路上，在用碎砖铺成的讨厌的小道上，推着作为活动掩体的自行车走着，休果的腿通常总是那么漂亮、轻巧和富有弹性，现在挪动起来却像灌了铅似的。我们在一个街心花圃的长凳旁边停住了，花圃里种着些稀疏的小树，没有经过修剪的青草长得乱蓬蓬的。我们把自行车靠在花圃的铁栅栏上，在长凳上坐下来。从两幢住房中间，可以看见像一条宽阔的闪光带似的查安河，隐约可见几只旧船在河上徐徐飘动，还有一艘蒸汽渡轮闷声闷气地突突驶过。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又紧紧偎依着休果，这一次不是为了通过这种接触来汲取力量，而是为了安慰他，向他表露我的温存和忠诚。他茫然地望着，样子怪可怜的；他的一只手摸到了我的手——好像有点笨拙并略带犹豫，他似乎在为自己的软弱感到惭愧。他用手指轻轻拍着我的手，后来猛地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过了一阵，我才感到他内心的紧张逐渐缓和了。他终于开口了，眼睛没看我。他遥望着在夏日的辽阔天地间闪闪发光的查安河，用一种勉强发出来的声音说：

“这一次可不白饶了他们，汉娜……他们一定要受到惩罚。而且甚至是很快的。”

我坐着，把头靠在休果肩上。我真想痛哭一场，可是周围的一切不允许我哭：我们坐在这里的街心花圃，晴朗的六月天，我身边的同志，战争……我咬紧了牙关，稍过了一会，我问：

“你在想什么，休果？”

“今天就干，”他愤怒地说。他突然放开我的手，站了起来，不自觉地把我往旁边一推。

"现在几点了，汉娜……十一点半吗？那么，我们今天还有相当多的时间。我们用不着像在比尔特霍文那样，老在这里兜圈子。不能再等了。周围发生的灾难太多了。"

看来，说出了这一番激烈的、充满激情的话，他已经轻松些了。直到这时候，他才看了我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他对我的巨大的爱情以及他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你能肯定，"我问，"你已经足够镇静了？"

他张开手指，把双手向前平伸着。它们一点也没有颤动。

"你看，我镇静了，汉娜，"他说。"绝对镇静……"

突然有一股柔情又涌上我的心头，我抓住他的一只手吻了吻。

"我亲爱的，你多好啊！"

他的脸色又阴沉下来了；然而，尽管如此，他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和腼腆。他从我手里抽出自己的手。

"汉娜，你这是在做什么？最好说说你自己的感觉……让我来看看你的手吧。"

我也把双手向前平伸。我的手不大稳定，虽然我每一条筋脉都在使劲，想让我的手能够毫不打颤。

休果站到我和邻近房屋的窗子之间。然后，他微微向前俯下身子，用右手抓起我的双手，贴在他的面颊上。

"我亲爱的，"他轻声说。

我们骑上自行车往前走；在这荷兰的夏天的上午，只有我和他两个人；而我是甘愿永远与休果同行的，哪怕走到海角天涯。

"听我说，汉娜！"他开始说话了。"现在这个刽子手就要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回家去了。要么今天下手，要么就永远也别想了。我们要紧跟着他，看准机会就下手。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过

河，我们必须使向西的退路畅通无阻……你先开枪。”

休果微微一笑，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也对他微微一笑。

“不，你先开枪，”我说。

“不，你先开枪，”他重复道。

“只等你发信号，”我说。

我们在警察分局对面的拐角处下了自行车，各自靠着自己的车子，面对面站着——一对典型的荷兰恋人：姑娘正在撒娇地接受自己的崇拜者所献的殷勤。这等和平情景，显得如此平常，如此自然，就连那个岗警，他刚刚还在死死地监视着两个骑自行车由此经过的男人，这时似乎也完全没注意我们，径自懒洋洋地向警察分局走去了。

我们所扮演的爱情生活片断，差不多一直延续到正午。十二点差五分，警察分局里走出了两个穿军装的人，从官阶标志看——是股长或是稽查。他们看了看天。大概他们也在为好天气高兴，也可能是害怕英国飞机。他们还没走进存放自行车的木棚，大门口的台阶上就出现了德鲁特，他满身都是饰绦和星徽，神色慌张。大概我情不自禁地做了个动作。

休果的一只手温和然而果断地碰了一下我的手。现在我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等待着。

等德鲁特进了木棚的门，两个股长已经骑上自行车走了。

“把自行车掉个头，汉娜，”休果在我耳边低声说。

我们调转了车头，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跨上车动身了。我一直笑着，休果也在笑，好像我们只是完全沉浸在愉快欢乐的意境里。就在这时候，我们所追逐的人的藏青色身影，在离我们十米处一闪而过。我情不自禁又动了一下，休果又沉着坚定地制止了我。

“不要太匆忙，汉娜……”他说。“我们来数到五或者六。这对我们有个小小的好处：我们不会引起坏蛋的注意……好啦，现在你可以上车了。”

藏青色的背影远远出现在我们前面。警察局长的簇新闪亮的自行车，甚至他的皮靴、皮带和皮枪套，都反射着闪闪的阳光。皮靴一上一下闪动着，快得那么刺激人。我们不得不加紧踏着脚镫：这个德鲁特，看来是个急性子。我看了休果一眼。他默默地骑行着。我只看到他的膝盖飞快地上下移动，和我一样。我看见了他踏在脚镫上的狭小而灵活的脚掌。休果还是没出声，因而我更加着急了。我们几乎来到彼得大帝纪念碑跟前了。这里没有人。这时候传来了报时的钟声；远处响起了尖细的汽笛声。正午了，街上开始了午间的繁忙。我又看了一眼德鲁特；他正准备在纪念碑旁边转弯，却丝毫也不减低速度。

“该动手了！”休果对我说了一句。他无意中碰了一下我的车把，我的自行车晃了一下，可是转瞬间我就稳住了。我急忙从衣袋里抽出手。我感觉到手上已握着手枪，我这才增强了信心。我又朝前面穿藏青衣服的骑车人看了一眼，我明白必须赶紧下手了。于是我开了枪，我甚至不知道开了几枪，是四枪还是五枪。

我搞不清楚我在哪方面失算了。事情总有点不对头。我原指望看见，穿藏青制服的坏蛋会翻身倒下，在地上打滚，然后就不动弹了——以往多次都是这样。可这个德鲁特，只是从车上跳下来。我蹬车往前去了，甚至没有减低车速。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我没有击中他吗？我仓猝中瞥了一眼休果。他和我一样骑在车上，不过是在另一边，这样，警察就夹在我们两人之间。我看见休果吃惊地张着嘴，他也和我一样，不能

相信一个人中了那么些枪弹还能活着；休果显然也想象不到我没有打中，想象不到这个德鲁特，竟在我们前面笨手笨脚急急忙忙下了自行车。我大概大喊了一声，我不知道是骂人还是警告。我忽然看见——这一切都是在极短暂的瞬间发生的——德鲁特扔开车子，抓住了皮枪套。可是他的动作毕竟不太利索，大概有什么妨碍了他。我朝他那边半侧着身子，飞驶过他的身旁。这时，我听见一声枪响，便用一条腿蹭地去刹车子，因为我车上的刹车不灵。我想德鲁特未必来得及开枪吧。"谢天谢地，"我心想，"这该是休果干的吧。"我把一条腿蹬在人行道上，终于停住了，我回头望着。

在离开我五六米的那一边，休果握着手枪站在那里。德鲁特蜷缩着身子躺在自己的自行车旁。我心里一阵狂喜。眼看休果立刻就要跳上自行车，按照我和他的约定，沿波登马克斯特拉特大街疾驰而去了。

可是休果没有上车。我的狂喜顷刻就化为乌有了。德鲁特还活着。这可以从他肩膀和手的抽搐看得出来。接着，我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个强盗用左手在地上撑起身子。他右手握着手枪。我看见了他那副在闪亮的警察帽檐下的阴沉平庸的嘴脸。那张由于极度的恐惧和仇恨而歪扭着的脸正对着休果。他那只握枪的手举了起来。德鲁特毫无阻碍地对我的同志开了枪。他活像一只已感到死亡危险的老鼠，对着用鼠笼逮住了它的人在龇牙咧嘴。

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只见人们从四处奔向德鲁特。大概总共过了不到半分钟。可是我却感到时间长得叫人难以忍受；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事情竟发生了多得难以想象的变化。我先是疑惑，再是喜悦，接着是惊愕，而后是满怀信心，人的感情似乎

能象闪电一样对事情作出急速的反应。在德鲁特开枪以后，我懵里懵懂地呆了片刻，我仍旧站着，一只脚踏在脚镫上，向后半转过身子，这时候，我猛然想到，按照和休果的约定，我必须立刻离开此地。我使劲一蹬人行道，踏着车子走了，我身后有些汽车停车了，有个女人在尖声惊叫，所有这些声音汇在一起，造成了混乱轰动的印象……

这一切很快就落在后面了，我急忙折上省际公路。我想象，这工夫，休果正同往常一样，大胆地挤过围着倒毙的警察局长的人群；想象他已经骑着车子，按照我们的约定，沿着一条平行的街道，经过火车站，向会合地点前进。我甚至想象到，灵巧敏捷的休果，到达那里会比我早得多，而当我一折离公路，就会看见他已经走在我前头了。于是，我更加用力地蹬着车子。

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来到省际公路，竟没看见休果。我暗自好笑，凭什么我偏要以为休果一定会赶在我前头呢。我到了火车站。那里一片寂静，并不怎么热闹。但是我下了自行车，装做感兴趣的样子，观看装运货筐，仿佛我从来没有见过似的，同时我却不时偷偷看看车站的大钟。秒针轻声响着走动了几圈；过了一分钟又一分钟。这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我朝车站后面立着“维斯特查安”路标的那段公路上望了一眼，我和休果约好在那里会合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迟迟不来，我骑上车子回头走了一段，想要证实他是不是记错了我们会合的地点，虽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路上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但是没有休果。

我开始焦急不安了，浑身直打冷战，牙齿咯咯响，额上冒出了冷汗。我咬紧下嘴唇，竭力抑制莫名的颤抖。我绝不愿向自己承认我已经被恐惧攫住了。我果断地拨转车头，向着我最后一次看见休果的地方驶去。

那里的情况完全变了。周围罕见地聚集着那么多的人。刺杀事件不仅吸引了邻近的居民。还吸引了很多工厂的工人，铁路工人和学生——因为事情恰好发生在正午；人们挤在马路上和两旁人行道上。有几个老警察——正直的爱国者——正在设法让人们散去；可是他们在这里驱散了人群，人们马上又在那里聚集起来——人群就像在口袋两头任意滚来滚去的马铃薯。我睁大眼睛寻找休果，然而哪里都不见他，正像也看不见那个曾躺在自行车旁边向他开过枪的警察……我费劲地挤过了人群。我的牙齿又磕打起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原来没有过的想法：要知道，这只可鄙的、胆怯的、受了伤的老鼠，在垂死的时候会咬人，甚至会把人咬死的。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没有怀疑他的枪没有打中目标……

我和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姑娘攀谈起来。她戴着红色软帽，帽下拖着浅色的鬈发，身上披着和我一样的风衣。我装出非常天真的样子问她：

“这里出了什么事呀？”

一对水汪汪的浅蓝色眼睛注视着我，她严肃而且毫不踌躇地说：

“地下工作者撂倒了一个警察，一个法西斯分子。”

看来，我的纯朴神情赢得了她的信任，我点点头又问：“警察死了吗？”

她笑着回答说：“死了。”

“那个行刺的人呢？”我问。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姑娘答道。

我又一次向她点点头，迅速走开了。我既没有感到满足，也没有感到自豪，虽然现在确实知道德鲁特已经死了。忽然间一

个警察拦住了我：

“喂，小姐，推着自行车不能走人行道……天哪，这些人怎么搞的，快走吧！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我把自行车推到马路上，盯着警察问道：

“这里到底出什么事啦？”

他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埋怨道：

“谋杀……又一个无谓的牺牲者……”

“你们逮住行刺的人了吗？”

“不知道，”警察回答说，他已经转过身去背朝着我了。“这种事与您有什么相干？规矩人都会远远避开这类事情的……”

这么说来，不要紧……人们还一无所知……也许，有人看见过休果？他在哪里呢？我骑上车子尽快地向约定的会合地点驶去，一边安慰着自己：我白白担惊受怕了，休果已经在那里，正急不可耐地等着呢，说不定还因为我耽搁了这么久而生气呢……就算德鲁特开了枪，也不会打中休果的。一定打不中的。

我又走上了省际公路，再次来到车站附近。一列火车到站了。有几个人下了车。我经过车站，向十字路口驶去，在这以前，我本来是避免朝那里看的。那里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个推小车的老太婆。

到处，到处都找不到休果的踪迹。

我推着自行车走了一会；由于莫名其妙的虚弱，我身子直打晃，头发晕。我决定在林中池塘对面的一条干水渠边坐几分钟；池塘边孩子们在放自造的小船。我呆呆地望着孩子们，然而眼前的事物却视而不见。我在试图想象休果，想象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样子。他骑在自行车上，他的脸色是严峻的，紧张的；随后，或者几乎就是同时，我看见他握着手枪站在自行车旁边。我

曾经注意到，当德鲁特向他开枪还击的时候，他的脸色带着疑惑……我眼前正闪现着回忆中的休果的情景，忽然又想起了报纸上那个加黑框的公告："枪决四名抵抗运动战士"。海里特·杨和三个没提到名字的……我从满是尘土的草地上一下跳了起来。

不会的！不会的！我好像听见了休果说这些话的声音。

半小时以后，我在德·莫尔妈妈的杂货铺旁边下了车。我的身体好像失去了感觉，我似乎从里到外浑身都麻痹了；我疲乏得要命，唯有脑子还令人难堪地清醒着——证明我仍然活着；我的太阳穴咚咚直跳，头疼得越来越厉害。我把自行车往木栅栏上一摔，推开了边门，从小过道走进小房间，我心想，——虽然明知道是在欺骗自己——休果可能，不，一定会坐在小房间里……

房间里静静的，空空的；铜餐具和瓷餐具在闪着光，芙蓉鸟发问似地叫了一声。

我胸中不由得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德·莫尔妈妈走进房间的时候，我正坐在桌子旁边，把头埋在双手里。我甚至没有听见她的脚步声；直到她那因患风湿症成了畸形的小手碰到了我的头发，我才发现她在我身边；老妈妈小心地抚摸着我的头，一直摸到后脑勺，然后又把手放在我头顶上——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束手无策的抚爱。

过了好久，我才敢看老妈妈一眼。

她站在我的身边；和往常相比，她显得满脸皱纹，更加柔弱，更加忧心忡忡了。她喃喃地说着一些鼓励和安慰人的话，犹如大人在哄哭叫的孩子。我双手搂住她的脖子，把头埋在她那老年人的胸脯上。她不住温存地抚摸着我，柔声细语地对我说着宽慰的话。

她什么也没问。我不知该对她说什么才好。说休果被逮捕——我没这个勇气。我更不能对她说休果死了。我害怕说不吉利的话会招来灾祸。因而我一个劲儿地哭。而她，这位好心的老妈妈，却装着什么都已经明白的样子。

只是那越来越急的门铃声才逼得德·莫尔妈妈离开了我。等老妈妈一走，我便悄悄从边门溜出了屋子。我骑上自行车，尽快地走了，我生怕老妈妈又把我叫回去或是在街上遇见她丈夫。我又来到省际公路上，孤孤单单地独自一人，唯有些灰色的德国汽车赶上了我，从一旁疾驰而过。我甚至觉得，我根本没有到过德·莫尔妈妈的小房间。

蔚蓝的天空仿佛变暗了，在我看来，就连太阳好像也变得死气沉沉，软弱无力，暗淡无光，完全不像早晨我和休果读了报上那个加框消息以后坐在赞丹公园时的太阳了。

这一瞬间，我心里突然燃起了一丝微弱的、怯生生的希望。我甚至感到我又恢复了力量，我把车子踏得更快了。风刺入骨，迟钝和麻木的感觉全消失了。

嗯，一定是这样，我心里想。在我骑车往回走，回我们袭击德鲁特的那个广场的时候，休果已经到达约定的地点了。他在那里等我，没等着。于是他索性骑上车子回家，回到费利缅夫妇那里去了。现在他正坐在那里等着我，在牵挂着我，就像我牵挂着他一样。

草地、运河、花园和树木全都落在后面了。模模糊糊的、隆起的沙丘离得很近很近了。我来到一些绿荫如盖的小道上了。闻到了晒热的帚石南、野麦、桦树皮的气味……眼前已经是最先见到的流沙了。

等到我一绕过莱园拐角，看见院子的时候，我差点没哭出声

来。

小海斯正在院子深处，在一个装着沙子的木箱旁边玩得起劲，而在我蹬车进院子的时候，卡琳·费利缅提着一篮衣服从屋里走出来。

我几乎是从车上摔下来的。我站直了身子，朝她走去，她站着，望着我。从她的表情上，我猜想到，我的神色是很可怕的。我试着笑了笑。卡琳一直僵立着没动，直至我走到她紧跟前。我的脚一步比一步沉重，步子越走越慢了。

我终于听见了她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难道休果没和你在一起？"

我站住了：她在问我什么……是问休果……这么说，休果没有回来……

我向前伸出一只手，不是向卡琳，也不是向窗台，只不过想随便找个什么依靠。可是我扑空了……于是我摔倒了，我感到世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永恒中的点

大概是杨和卡琳把我抬进屋子的。等我清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躺在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晚饭后，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房间里一起坐着闲谈的。

卡琳坐在我身边，往我额上敷着冷毛巾，她问："怎么样，现在好些吗？"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我丝毫也没有觉得好些，倒是更坏了些。就像在德·莫尔妈妈的小房间里一样，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正在撕裂我心肝的那种凄楚来。

整个漫长的一天，我都躺着，冷漠地望着一直在房顶梁木上闪动的阳光斑点。

后来，将近傍晚了，我听见有人进来。他们给我盖了条毛毯，虽然我感觉不出冷暖；我从毛毯下微微抬起身子，这时候卡琳刚好从门外探进头来。

“是弗洛尔，”她说。

房门开了。我看见了弗洛尔。他站在明亮的长方形门框中，在夕阳光线的衬托下，他的轮廓看上去格外清晰，好像雕刻出来的。虽说我看见的只是他身影的轮廓，然而，当他小心翼翼地跨进门槛，我凭着第六感觉就准确无误地猜到，一切都完了。

“弗洛尔！”我把毛毯抓到一边，大喊了一声。我从沙发上跳起来；我的腿发软，头又沉重又空虚，眼前金星乱舞。

“哎哎哎……”弗洛尔担心地说。他的一双大手抓住了我，像抓孩子似的，让我坐在沙发上，笨手笨脚地给我裹上毛毯。“哎哎哎！”

“弗洛尔，”我郑重地说，“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吧，我挺得住的。别再老说你那‘哎’了。我要知道真实情况。只要听真实情况！”

弗洛尔挪过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他的一绺白头发胡乱地向前伸着，垂在晒成了红铜色的前额上。他的一双手也是那么胡乱和不知所措地搁在膝盖上。我预料他会伸手到面颊上去搓搓颧骨的。可是他的手一直那么搁着，一动也没动。看来他怎么也想不出该从哪里说起。

“你知道一点吗？”他终于问道，两眼直盯着我的脸，好像倒是应该由我来讲发生的事情。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回答说。我真想狠狠地摇他一阵，摇

掉他这种磨蹭和不必要的谨慎。“一点也不知道！”

“德鲁特打中了休果，”弗洛尔终于说了出来；我看得出，他报告这个简单的消息是费了很大的劲的。

我咽了几次唾沫，才说出话来：

“死了吗？……”

弗洛尔竭力不看我，耸了耸肩：

“还不清楚，”他喃喃地说。“你知道的，那个警察，就是向我们提供有关德鲁特情报的……他今天白天到我们一个伙伴那里，讲了……”

“你说吧，看在上帝份上，弗洛尔，到底怎么回事？”

弗洛尔似乎终于摆脱了极度的紧张，搓了搓颧骨。

“德鲁特死了，这你已经知道，”他说。“他身上中了好多你们的子弹。”

“这是休果打的，”我说。“我都没打中，弗洛尔。这是休果打的。”

弗洛尔惊讶地扬起一道发白的眉毛。

“原来是这样……”他停顿了一会儿以后说。“这我不知道，汉娜。我以为……不过这没关系，德鲁特已经不再活着了。”

“可是他在临死以前，还开了枪的，”我提醒说。“这是我看见的最后的情况，弗洛尔。”

“对，他打中了休果，”弗洛尔说。“腹部中了三颗子弹。”

我合上了眼睛：眼前又出现了飞舞的金星，耳朵里嗡嗡直响，好像什么地方在淌水。我咬紧牙关，总算没有晕厥。

“说下去吧！”我请求道。

“休果总共只走了几百米，”弗洛尔回答说。“他拐到了波登马克斯特拉特大街。”

“……这是我和他约定的，”我低声说。

“在那里，他大概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他淌着血，好不容易勉强挣扎到一户人家……结果徒劳了……可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他指望得到居民们的帮助，然而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是什么意思？”我问。“遇到叛徒了吗？”

弗洛尔耸耸肩膀：“两个糊涂老婆子，当负伤的休果走进她们的房间，一下子扑倒在桌子上的时候，她们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休果从衣袋里掏出手枪放在身旁……那两个蠢老婆子一看见血和武器，吓得直哆嗦，马上就跑到警察局去了……”

“不！……”我大声喊道，跟着又咒骂了一句。

弗洛尔点点头，愤慨地说：

“是啊。糟透了，在一九四四年，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大家一无例外地在竭力打击敌人的时候，竟然还有这样一些看来脑子依然稀里糊涂的人……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喏，不用说，警察欢天喜地地来了。起初只来了个稽查。刺杀发生以后一小时，一些法西斯特务和一辆救护车赶到了这两个老蠢货的门口。”

“他们把休果弄到哪里去了？”停了一会，我问弗洛尔。

“起先是警察分局……”弗洛尔赶紧补充说，我骤然一怔。“他们找来一个医生，给他作了检查，胃部射进了三颗子弹。包扎以后，休果就在森严的警卫下被押到阿姆斯特丹，进了W.G.①，说得更准确些，是W.G.‘空军’医院。”

“他活着吗？还活着吗？”我叫喊着。

“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一点，那个警察不知道，”弗洛尔回答说。他又有点负疚地低下了头；他的整个神态表明，他深为这整

---

① W.G.——荷语Wilhelmine Gasthuis 的缩写，以威廉明娜女王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个事件忧伤。

“我的天哪，弗洛尔！应该采取行动才是！”我说。“如果休果在医院里，那我们是容易把他救出来的！……”

“现在吗？”他问，他的声音里含有顺从和失望的意味。“解救一个受了重伤的人？”

“难道伤势那么重吗？”我问，我的嘴唇又像个小学生似地哆嗦起来。

“甚至非常重，至少……我是这样听说的。除了我听说的以外，汉娜，我再没有什么能告诉你的了。‘保安处’的军官们，在这里，在赞丹就已经开始审讯了。自然是毫无结果。”

我静静地躺着，试图设想休果的形象，他负了重伤，扎着绷带，孤立无援，正受着身披我所深恶痛绝的军装的人们审讯。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情景。

“自然，”我重复说，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恐惧，惊骇，一切都毫无意义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低声问。“现在怎么办呢，弗洛尔？”

他站了起来。我早就明白，他坐在这里，就好像坐在烧红的炭上，他来看望我，只是出于铁一般的责任感和同志的感情，并且我还明白，他是愿意或者甚至是宁肯自己代替休果中弹的。

“汉娜，”他说，“今天我不能到阿姆斯特丹去了，太阳快下山了。明天我一清早就去。然后我再到这里来，把休果的情况告诉你。”

“好吧，”我同意了。

弗洛尔到了房门口又回转身，走到我跟前，拿起我的一只手握了握，又轻轻拍拍我的面颊说：

“要挺住，姑娘！”

我机械地向他点点头。

我无情无绪，裹着毛毯，躺在洁净的小房间里，我看见白天逐渐消逝；灰暗的暮色浓重了，黑夜来临了，阴影和光斑在神秘无声地摇曳，我无法理解其中之意。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注意着一切动静。我听见杨和卡琳走过来，走过去，他们在留神倾听。夫妇俩大概在为我担忧；我一句话也没说，不吃，也不喝。

无情无绪……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睡着。昏昏沉沉的酣睡，好像昏迷一般；我醒来时，头疼，太阳穴直跳。睡眠对我起了一个作用：使我暂时忘记了一切。然而现在，当我在这阳光灿烂的六月天醒来的时候，头一天发生的一切，又清晰无情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力图不放弃希望，欺骗着自己。我内心深处明知道希望是不会有的了。

我等待着弗洛尔，因为他一定会把休果的遭遇告诉我的。

卡琳又来了，给我送来了吃的东西：水果、家制的白面包和牛奶。

我把所有的东西全吃了，喝了，虽然我几乎感觉不出食物的滋味；就连多汁的草莓甜味我也没有体会到。

我等待着……

天色已近黄昏，弗洛尔终于来了。他小心地进了房间，房间里还没有点灯。这一次他像一个模模糊糊的幻影，一个偶然从房间里其他阴影旁滑过来的影子。他低沉、含糊地问道：

"汉娜……你没睡着吗？"

"没有，"我回答说。

我的嗓音是嘶哑的，好像我叫喊了一整天似的；其实我一直

无声无息地躺着，活像一个丧失了说话能力的重病患者。

弗洛尔把椅子朝我挪近了些，椅子的腿被地毯挂住了；弗洛尔终于坐了下来。他的动作是那么迟缓和谨慎，这使我明白过来了。

"休果死了，是吗？"我问，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沉寂了。

停了一下，他才拘谨地回答：

"是的……他死了。"

胡扯，我心想。弗洛尔说休果死了。然而这是胡扯。休果正在笑，或者正骑着自行车，或者正躺在什么地方，隐蔽着，手里握着枪。他正埋伏着守候叛徒，或者正在沙丘间跋涉着往家赶。今天晚上他大概就会到家的。弗洛尔所说的休果，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我认识的休果，是一个机警、活跃、强壮的抵抗运动战士，他不会让任何人愚弄住的。这个人那样充满了活力和热爱生活，因而弗洛尔的断言不过是在开玩笑。我的休果没有死。也许，死去的是那个在赞丹被逮住的负了重伤、淌着血的……

突然间，我意识中的这两个形象猛然撞在一起了——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撞击的声音。活着的休果——我所认识的，我头一天还看见过的，吻过我手的，我依偎过他肩膀的休果，和死去的休果——弗洛尔所说的休果，互相融合成了一个形象。

"汉娜！"我听见了弗洛尔的声音。"你要干什么？"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条腿给毛毯缠住了，绊了一下。接着我便朝房门口走去。我听见弗洛尔跳起来跟在后面喊：

"汉娜！"

我打开房门，穿过走廊，来到了厨房里。深色的窗帘全放下了。桌子上方唯一的一盏小电灯亮着。杨和卡琳带着海斯一起

围着餐桌吃饭。我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我——我踉踉跄跄，像喝醉了酒一样。杨把勺子搁在桌上，他正在喂儿子吃粥。我发觉卡琳瞪着恐惧的双眼注视我。

“弗洛尔刚刚告诉我，”我仍然用那种急剧嘶哑的嗓音说，“休果死了……被德国强盗的走狗杀死了……你们明白吗？休果不再活着了！休果是应当做我丈夫的。我和他要在战后举行婚礼。这是我爱过而且要爱一辈子的唯一的人。他被杀死了……”

桌子在我眼前浮动起来；杨、卡琳和海斯的脸一下子隐入昏暗的迷雾之中了。电灯缩小了，变成了纤细的、垂灭的灯丝。我的耳朵里又响起来，好像有水从厨房顶上倾泻下来。我第二次失去了知觉。

……我还是躺在那张长沙发上。我似乎听见了海在咆哮，虽然海离开这里非常遥远；我能够听到的，更多的是在海岸上呼啸的风声。鸟儿在屋檐下沙沙地拍着翅膀。桌上点着支蜡烛。卡琳躬着身子坐在她的一把长毛绒面圈椅上，身上裹着被子。我看见她睡着了。起初我还不明白，她干吗坐在这里，我怎么会躺在沙发上。

我现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没有哭。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是冷漠的。我感到自己对于生活，对于已经发生和可能还要发生的一切都无法自卫了。一个个单纯、清楚、明白的想法，在缓缓流逝。

我第一次想象着死去的休果：他躺在担架上，一动也不动，双手叠放在胸前。我甚至看见了他的脸，他脸上既不再表现仇恨，也不再表现爱情，而只是安详。我所竭力想象的休果正是这样，我认为自己也必须放弃仇恨或爱情。我逐渐地、十分缓慢地

真正接受了这个现实。

我盖着毛毯，静静地躺着，把头转向正在熟睡的卡琳那一面。

我头一次明白了许多事物，像成年人一样看待这些事物。我意识到我的少女时期已经过去。如今，在休果死去以后，我必须作为一个成年妇女来对待生活。

人的生命可怕地短暂……永恒在我们身上只表现为短促的燃烧：每一个人，只是永恒中的一个点。

而这个熊熊燃烧的点，这个在永恒中表现为星星之火的现象，便是生命的主宰和生命的创造者。然而这只是指人本身给生命注入了内容的时候。否则，人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的思维不能包罗太阳系无数星球的存在。我只要一想这样做，便会丧失摆脱困境的道路，丧失立足点。可是当我想到地球，考虑到怎样改造这个小小的地球，使它成为自己以及自己亲近的人们有益的和富裕的生存天地的时候，我就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

地球，是我们生活的场所。不，地球是宇宙的一分子；把地球给了我们，就要求我们在自己消亡的时候，已经使它的面貌有所改变，使它更加完美，更加合乎人道。

人类活动的特点和价值也就在于此。人，如果他的所作所为不考虑公众的利益，妨碍和侵犯这种利益，那么他就不配生存。唯有真正的生活才是生活。唯有为了公众利益而燃烧的人，才能突破"自我"和先天局限的可怕的桎梏。但是，人如果至死还不能打碎这种桎梏，那么我想，这充其量不过是一颗卑微的、毫无价值的火星而已。

休果打碎了这种桎梏。他像为数不多的人那样度过了自己

的一生。他的燃烧拯救了别人的生命。我现在领悟到，对于死亡的萦绕不去的思想，就连对于休果的可怕的死亡的哀思，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一刻也不忘记，应当想到的，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的生。

我不应当为休果的死而哭；如果哭了，那么这是对我自己的怜悯。对于休果，现在任何怜悯都毫无意义。对于自己，我不希望并且也不应当怜悯。

我必须做一个绝不悲叹人生短促渺小的自由人。

我要燃烧。如果不可能长久，那就让它燃烧得短暂些吧，然而一定要比休果燃烧得更灿烂。

我不爱也不恨地思考着这一切，就像在思索着不可能逃避的真理。我心里开始平静下来，平静得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躺着，空空地凝望着，直到窗外出现曙光。这时候，我头一次宽慰地入睡了。

的一生。他的燃烧拯救了别人的生命。我[illegible]死

亡的萦绕不去的思想，[illegible]对于休果[illegible]

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一刻也不忘记，应当[illegible]而

是他的生。

我不应当为休果的死而哭；如果[illegible]自己的

怜悯。对于休果，现在任何怜悯都[illegible]义。对于[illegible]

望并且也不应当怜悯。

我必须做一个绝不悲叹人生短促的小[illegible]人。

我要燃烧。如果不可能长久，那[illegible]

而一定要比休果燃烧得更灿烂。

我不要也不很愿思考着这一切。[illegible]

的真理。我心里开始平静下来。[illegible]

我躺着，空空地凝望着，直到窗外出现曙光。这时候，[illegible]

宽慰地入睡了。

第　四　部

坚如披甲

相　片

第二天早晨，我像往常那样起了床，也在平时那个时候去吃早饭。昨晚弗洛尔没能走。他面对我坐在桌旁。杨·费利缅在菜园干活，而卡琳——她仍然担心地望着我，显得有点胆怯和拘谨——极力设法和海斯一起避开。屋里只剩下我和弗洛尔两个人。

我觉得，这不很合他的意。我发现，他不时偷偷地、胆怯地望望我，然后又把目光移到桌上的油布和窗外绿油油的景色上。我尽量保持镇静，打算与弗洛尔谈谈。我还是应该打听一下休果的所有情况。

“弗洛尔，”我开始说，“现在……你可以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吧。”

他那双明亮的灰色眼睛同时流露出惶恐不安和审视的神色。

“我不知道，汉娜，你能否……”

“我能否挺得住？能的，弗洛尔……我保证不使你难堪，我不叫，也不哭……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弗洛尔。现在我知道，这一天从一开始就不顺利……结果是必然的。我向德鲁特开枪，一颗子弹也没打中目标，这时我就预感到这一点了。我把这种预感压在心底。但正是那时决定了失败。”

弗洛尔默不作声。他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地喝完了一杯牛奶。

“每个人都可能失败，”我继续说。“我不想过多地责备自己，也不想用悔恨来折磨自己。但是，要是我枪打得准些……”

弗洛尔动作迅速地把茶杯放在桌上，说：

“不，汉娜，问题不在这里……我甚至不想听到你说这种话。失败这不必说了。我一点也不奇怪……你和休果两人够幸运的了。”

我没作声，他最后几句话使我大为震惊，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和我当时想象的完全不同。我转过脸，不去看弗洛尔。但是，他显然立刻感觉到，他关于我和休果“幸运”这句话产生了什么作用。他咳嗽了一下，然后迅速地把茶杯放在嘴边，尽管茶杯是空的。

“我钦佩你，汉娜，”他说。“像你那样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能够挺得住的人是不多的。你向我打听休果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况。我当然应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不可置信的疑惑：

“难道他……”

弗洛尔摆摆手。

“你以为休果……你以为他们能迫使他开口说话吗？汉娜！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们只是从他嘴里知道他是谁……”

“这么说，他当时神志清醒着？”我害怕地问道。

“他们在空军医院立刻给他做了手术，”弗洛尔答道。“他们猜测，他们面前的人与众不同。这些傻瓜确实指望把他治好后能够让他说话……”

“也许是为了审判他……”我补充说。“就像他们对待海里特·杨那样。”

“不管怎么样，”弗洛尔继续说，“他们在这里打错了主意。休果失血过多。德国医生当时就说，他必死无疑。”

“所有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弗洛尔？”

他耸耸肩膀说：

“从赞丹的警察和W.G.的看护兵那儿得知的，他们和抵抗委员会保持着联系。我向你保证，这一切都是事实。”

“他们究竟怎么对付他的？”我问。

“保安部直到最后时刻也不让他安宁，”弗洛尔说。“他们给他注射，他偶尔也清醒过来。匪徒们寸步不离他的病床。只要有一会儿工夫他睁开眼睛，他们就纷纷向他提问题……他没有回答。给他注射的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他苏醒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他一声也没吭。他们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弗洛尔，要知道像休果那样的人很少……对吗？”我问。

“像休果那样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休果自己……”弗洛尔回答，接着便讷讷起来。“我不知道，汉娜，我是否能像他那样，至死都一声不吭。”

我们静静地坐在饭桌旁，直到早晨的阳光撒落在蓝色的陶瓷碗碟、牛奶壶、茶杯和餐刀上。我的思绪现在停留在遥远的医院，停留在白色的房间。由于那些身穿绿色警服的人在场，这个房间已被玷污，声誉也败坏了。我看到，这些奸细坐在那里，几乎就在他们旁边——我就是这么想象的，——我的朋友向后仰着头，一动也不动。他没有吭声，微笑着。

“休果又活了很久吗？”长时间的沉默后，我问弗洛尔。

“几乎到太阳下山，”他回答。

“难道医院里没有好人吗？”我问了一句。

“有一个医生，还有几个卫生员，我已经对你说过，他们和我们保持联系……根据奸细的举止，他们明白送进医院的是一名著名的抵抗战士……我们的朋友秘密商量，只要能够把他转移出去，就送他到很远的地方去。显然德国人不想让人知道，他们

抓获的是什么人。安放休果遗体的棺材放在单间房子里，休果胳膊上系着一块写有‘英国飞行员’的牌子。”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弗洛尔为我们两人卷好纸烟。我们默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盘旋着在一束照亮厨房的阳光里向上升去。我注视着烟雾，而弗洛尔死盯着草编的地毯。最后，他在烟灰缸里把烟头掐灭，然后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如果你不反对，汉娜，我想现在就走……我还有一些事情……近日我还会来。”

这时我第一次看他的眼睛，说：

“那我怎么办？现在我干什么？”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

“没关系……在太阳下散散步，安下心，恢复一下身体。”

我把手伸给他，忧郁地笑笑。

我不知道，第二个星期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照弗洛尔的建议做了。我在阳光下散步，坐在树荫下的草地上休息。我努力恢复体力。尽量吃，喝，睡。所有的时间只想一件事：站着穿绿军装的可恶敌人的房间，浑身皆白的休果躺着的那张白床铺；当敌人询问他的时候，他默不作声，微笑着，摇摇头。“英国飞行员”——小牌子上写着。甚至死后敌人也不让他有自己的真正身分。直到最后时刻，敌人也不放过他，弗洛尔说的。因此直到最后时刻，休果仍是个抵抗战士，我想。

当我漫步在沙丘上，处在绚丽多彩鲜花盛开然而又无补于事的大自然当中的时候，突然一个难以忍受的念头刺痛我的心灵：那个我如此想念的，心里时时与之交谈的人是我的休果啊。是我永远也见不到的我所爱的人啊。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是对他的思念、回忆、想象，无穷无尽的回忆和想象……所有这一切是

多么痛苦，多么难以置信！

我和杨、卡琳·费利缅坐在桌子旁，我们谈论各种事情，但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它报道了盟军在所有战线，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继续向前推进，并连连获胜的消息。我对杨和卡琳微笑着，心里仍在想那一件事。想那将作为英国飞行员而被埋葬的休果……但是究竟埋葬在哪儿呢？

我确实已习惯思索休果牺牲的事。我毕竟懂得，世上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一天中午，当我像往常那样准备去散步时，看到远处弗洛尔骑在自行车上。他骑得很快，满脸通红，蓬乱的头发迎风摆动。我迎面走去；当他骑近，我能看清他时，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异乎寻常。

"弗洛尔！"我远远地对他喊道。"你带来了坏消息吗？"

他从自行车上下来，用手擦擦汗淋淋的面孔。"哎！"他说。"见鬼，这是因为我赶得太急了……"

他，据我看来，在企图拖延时间；因此我只好忍耐，尽管我急得要命，充满了不安、害怕和好奇的心情。他推着自行车，默默地走在我身旁，开始我没去打搅他，但最终还是忍不住了：

"说吧，弗洛尔……我现在坚如披甲。"

他停下脚步，朝四周望望，沉重地靠在自行车上说：

"汉娜……上次我没有把休果的情况全告诉你……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全部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弗洛尔？"我大声说。

他摇摇头，把自行车靠在松树上，然后又开始擦脸。

"我又和我们查安的联络员们谈了……"他费力地说，仿佛在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休果牺牲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汉娜……

当时给他治疗的是一个赞丹的医生。医院的卫生员们并没认为他是个坏人，因为当时他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的事，然而他正是个不可靠的人……”

“不可靠？”我反问，并且感到自己面色苍白。

“是个不可靠的伪君子，法西斯的一条走狗，”弗洛尔简短地、并且有点胆怯地回答说。“这个医生也想探听出点什么。但是与别的奸细不同，他俯身向着休果，假装是个爱国者，问休果说：‘我能不能为你做些什么，小伙子？’于是休果告诉他，在皮大衣夹里的口袋里放着一张相片，请他务必把相片转交给它的主人。”

我心里产生一种可怕的猜测。

“什么相片？”我小声问道。

弗洛尔把视线集中在我身上，灰色的眼睛里仍然流露出那种畏怯的神色。

“你没有猜到吗？”他带着悲伤的神态问道。“你身分证上的相片。相片的反面写着你的名字和地址。”

“我不明白……”我说。我确实不明白，我的相片怎么会在休果那儿。他大概直接从我的手提包里拿走的，也许天知道从什么别的地方拿到的，或许在费利缅那里，或许在比尔特霍文游猎时……我头脑里的念头一个紧接一个。我十分清楚，这会引起多么可怕的后果。

“这么说，因为这个医生，警察局得到这张相片啦？”我勉强地说。

“相片落到了哈勒姆的保安部手里，”弗洛尔声音很轻地说。“于是那些人采取了某些措施。”

我干脆抓住了弗洛尔的衣袖，他用自己有力的大手推开了

我。

“什么？什么措施？”我大声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弗洛尔，别拖了。照直说吧！”

“他们抓走了你的父母，”他紧紧扶住我的肩膀回答。“沉住气，汉娜，沉住气！还没到没救的地步！他们是被捕……”

“把他们被捕的事告诉我吧！”我恳求说。“你为什么说‘还没到没救的地步’……一切、一切也许都完了……弗洛尔！你是否知道，他们在我们家发现了一个犹太姑娘？”

弗洛尔第一次奇怪地看着我说：

“关于这个我什么都不知道。哈勒姆的抵抗委员会得到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可靠的。你们家的左邻右舍看到，他们带走了你的父母……奸细从屋后跳过栅栏钻到你家。邻居们听到他们用枪敲凉台的门，后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过了不大一会儿，一辆有篷的警车开来了。他们把你的父母亲推上了车。”

我开始感到迷迷糊糊，头晕得很厉害，周围的一切可怕地旋转起来。我紧紧抓住弗洛尔的手。

“这么说，尤迪菲没有危险……”我说。“这么说，总还算走运……”

弗洛尔惊慌起来，关切地扶住我。

“好了，你平静下来了吗，汉娜？”他问。“咬紧牙关……”

我牙齿直打战，尽管我双腿发软，额头直冒冷汗，但我还是点点头。

“每个人……光要求……我……咬紧牙关……”我喃喃地说。“有时这……是对的，但做不到。”

我挣脱了弗洛尔，撒腿朝灌木丛跑去，在那里呕吐了一阵，浑身直发抖。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甚至也希望立刻死

去……但是还没等喘过气来，我就意识到，我不应该死，不能死，也不想去死。我应该完成自己的任务。

……弗洛尔扶着我，一直走到篱笆旁，把我交给卡琳。她让我躺下，给我一杯凉水和一片阿司匹林，然后坐在我床铺边，握着我的手。过了五分钟，我让她回去，我很快就睡着了，后来我突然醒过来，似乎有人推了我一下。我再也躺不住了。死去的人在叫我，关在牢里的人在叫我。我从床上跳起来，穿好衣服，把手枪塞进风衣里，匆匆又来到厨房，大家都惊奇地望着我。

“弗洛尔，帮我检查一下自行车车胎，”我请求说。“我要去哈勒姆。”

弗洛尔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我和门中间，他那高大强壮的身体摆出一副相当可怕的架势。

“汉娜！”他说。“你绝不能干蠢事，明白吗？”

我摇摇头。

“我要去指挥所，弗洛尔。我必须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我和你一块儿去。”

“我一个人去。弗洛尔，”我郑重地说。“我的特征已为人所知。你考虑过这一点吗？”

他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走出屋子。

“汉娜……我不阻拦你。但是我想知道，你能否做到善于斗争呢？再也不能白白牺牲了。”

我握紧拳头，愤怒地回答：

“我可是对你说过，我身如披甲，意坚似钢。”

他垂下眼睛，向木棚走去，去检查我的自行车。

老 朋 友

弗洛尔说过，再也不能白白牺牲。

我数了数，包括我父母在内，已经牺牲六人了。这是我熟悉的六个人。但是，谢天谢地，恕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这个小小国家的土地上，有多少人被追捕、被出卖、被逮捕和被杀害。

我心急火燎地往前骑。我再也不去注意美丽的自然景色，感觉不到夏天的暑气。我身子俯向自行车把，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快向前骑。我骑过一条条大路，一条条自行车小道，越过一座座桥梁，不能坐渡船过河，那会惹出麻烦。我眼前只有石头、沥青、混凝土。我似乎觉得，整个世界十分坚硬，就像是用石头和混凝土垒成的。

我想到将要在指挥所见到的同志，心里就感到害怕。我怕看见他们的愁容，怕他们怜悯同情我。怕他们对我谈起休果的事，说起托姆、艾迪和杨的事。说起我父母被捕的事……

有时人们由于同情也会沉默不语，我心想；最关切的话也会是多余的。

我走近指挥所，仔细地向四周观察，看是否有人跟踪我，这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来回骑了两次，没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然后我拐进花园，把自己的自行车停在花匠那间废弃了的小房子里，然后朝屋子走去，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我在走廊上就听到收音机的声音：同志们看来在拨找电台，准备收听最新消息：一天结束了，这时我们一般都要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我仍然不敢迈进房间的门坎，心里像有一团东西涌上喉咙。

我首先看到了弗兰斯，他坐在门的右边，就在收音机旁。他一看见我，咔嚓一声关掉了收音机，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我环视了一下房间，房间里总共三人：弗兰斯、威南特和新来的年轻人奥托。三个人都惊恐地凝视着我。

我真想变成隐身人。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我第一次见到休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在这里我内心产生了对他的钦佩，以后这种钦佩又变成了对他的爱。在这里我听过他说话，看到他默默地坐在旧沙发里或迈着自己那双优美的细腿在房间里走动。现在他的腿被白被单盖住了，而胳膊上系着一块小牌子——"英国飞行员"。如果他还没有被埋葬……

我站在原地迈不开步，满怀着绝望和束手无策的心情。所有一切比我想的还要严重。威南特最先理解了我的心情。他从房间的那头朝我走来，抓过我的手，用双手握着。他毫不尴尬，毫不怜悯地看着我，像老朋友一样，脸上流露出善意的笑容。他的友情使我摆脱了麻木状态，但同时我更感到自己的不幸。我晃晃悠悠走到桌边，放平手，把自己的脸埋在手中。刹那间，我甚至想跑出房间，躲进花园，躲进茂密的醋栗灌木丛中，在那里痛哭一场，发泄自己内心的悲伤。我以巨大的意志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坚如披甲，"我对弗洛尔说过。我可怜的，被悲痛撕裂的心啊，你的铠甲究竟在哪里？……

我看到同志们窘迫地望着我。弗兰斯焦急地用手指扯着领带，尽管这条领带打得很整齐。他显然想不出从哪儿谈起好。

"你们看，"我尽可能坚定然而却又阴沉地说。"我又在这里……你们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与你们商量一件事。我们不要再去想牺牲了的人……至少现在……"

我想到躺在医院病床上死去的休果，便结结巴巴的说不下

去了。最后我还是控制住自己，尽管我尽了极大的努力。

“休果……”我开始说，我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怪刺耳的，“休果不光是好同志，而且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我觉得又说不下去了。我嘴唇哆嗦着，可是说不出一个字来。为了不让嘴唇哆嗦，我用双手按住了嘴唇。突然我看到弗兰斯上衣的下摆出现在我身旁。他的手坚定镇静地放在我的肩膀上，他的声音也很镇静和持重：

“我们都知道了，汉娜……我们大家都为此痛心，无论现在在这儿的和不在这儿的。你说得对，休果不仅是个好同志。”他是我们一位最优秀的同志，像那三位和海里特·杨一起被德国人杀害的同志一样。这个不幸是我们大家的。然而我应该说，我们最难过的是，最近你忍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大家都敬重你。你还是那么坚强，这更令人敬佩。”

我朝弗兰斯抬起满是泪水的脸。

“你用不着敬重我，”我对弗兰斯说。“我不比你们中的谁强……我没有打中德鲁特，所以才发生了这一切！”

“这叫什么话？”弗兰斯打断了我的话。我看他确实感到惊奇了。“你怎么，想独自来承担所有的罪过吗？”

威南特从另一边走到我跟前。我望着他那张圆圆的和善的脸。

“别瞎说，汉娜，”他说。“干任何事都有危险性。不是我们这些人都能控制的。在绳子的另一端也有人握着手枪在活动。”

我有点呆板和疲倦地点了一下头。“是的，你说得对，”我说。“不过我还是应该射得准些……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我觉得，那天我真的事事都不顺手……”

弗兰斯赶忙用手捂住我的嘴。

“不，汉娜，不能违反你自己提出的规定：别再提这件事了。总之不要毫无意义地自寻烦恼。”

我又点了一下头。我知道，他和威南特都是对的；但是痛苦和自责使我感到在这个房间里无地自容：我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而损失实际上又是我造成的。此外，最近的几件事很使我担心。我逐一打量着同志们；坐在离我们远一点的年轻的奥托沉默不语，不引人注目，当我朝他看了一眼的时候，他窘迫地垂下了眼睛。

“还有一件事，”我说。“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他们抓走了我的父母亲……”

三个同志都不作声了；弗兰斯紧紧闭着嘴唇。

“是不是，”我说，“他们只带走了我的父母亲？犹太姑娘没有一起带走吗？”

屋角的奥托从自己的位子上跳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他赶忙说，可能是因为年轻，也许是因为难为情。“我们一知道相片的事，立即就去找你父母亲的邻居……你们的左邻右舍证实，奸细只把你的父亲和母亲关进汽车里……我想如果抓走第三个人，邻居马上会看到的，大概不会不说的。”

“当然，”威南特证实说。“这你是清楚的，汉娜！”

“这事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我问。

弗兰斯点点头：

“奥别·斯哈弗和另外四个像他一样的坏蛋。当时没有一个德国鬼子在场……德国鬼子只从他们手中接收被抓住的人。”

“这个奥别·斯哈弗是什么人？”

弗兰斯仿佛想证实自己的话，两手一摊说：

"哎，对啦，"他说。"你当然不会知道他……他是吕伐登人，在法西斯保安部干事，他十分卖力地追捕弗里斯兰的地下工作者，结果他在我国北方再也不敢露面。现在他来到这里，而且已经有了坏名声：他得到了提升——获得了中士或者与中士相当的军衔，虽然他罪行累累，但是他似乎觉得自己还比较安全。"

"奥别·斯哈弗，"我说，"我记住这个名字……你们是否知道，现在我的父母亲在什么地方？"

弗兰斯看看奥托。奥托又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说：

"在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斯特尔芬谢维赫。至少有这个说法。"

我慢慢地站起身，头脑里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仿佛一切都已经说尽了，而且一切都已经虚化了。可是，现在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突然产生和坚定了一个决心，而且这仿佛是我唯一的出路。在这个痛苦的时刻，这个决心给我带来某种轻松感，虽然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再笑，永远陷于冷漠和麻木的心境。

"你想干什么，汉娜？"当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威南特问。房间里顿时是一片紧张的寂静。同志们一起靠近我，连奥托也站起来，带着一种不安的好奇心看着我的脸。

"我去……我想……去向保安部自首，"我说。"我的父母亲应该得到自由。我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父亲在他们那臭不可闻的牢房里肯定也会得病的！"

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我听到弗兰斯那怀疑的笑声。

"汉娜！这样不行，你可不是那种愚蠢的人……难道你认为，他们会随便让你来换你的父母亲吗？"

"汉娜，"威南特开始说。"别发疯了……那样就会有三个人同时落入他们的魔掌了……而且其中一个是抵抗战士，一个向

祖国的叛徒开枪射击的人，——她的相片是在一个最危险的恐怖分子那儿找到的。”

我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桌子上了。

“我应该，应该这么做……”我说，一种难言的悲观绝望束缚住我的心，而且使我的思考变得迟钝。“我不能让我的父母亲……”

弗兰斯突然走到我跟前。他双手抓住我的肩膀，并用力让我坐下。

“汉娜，”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是你的领导？”

“是的，”我回答。

“那么听我说。”他的声音变得严厉、冷淡和有力了。“不是因为我需要你完成新任务……不是因为我只是命令你别干出任何就像你现在想出来的蠢事。但是，见鬼，究竟谁，什么时候听到过抵抗战士自己投入警察的手心？即使为了成千上万个父母亲，汉娜？在抵抗组织内这种事是不允许的。这也许是残忍的，或者是不寻常的，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残酷的，不同寻常的。在这里我们过的不是正常的生活。你想想，你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情况就是这样，不论多么可怕。”

在他尖锐而平静的声音里可以感觉到一种坚定的语气，而且这种声音深入到我受尽折磨的内心深处。

“弗兰斯说得对，”威南特等了不大一会儿说道。“他说得完全对，汉娜。情况很严重，但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应该想到未来。”

“是的，”我同意说。“这是对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未来。你们说得对。”

我仍然没有摆脱悲观情绪，然而同志们那些坚定和冷静的

话语发挥了作用，使我信服了。我想：弗兰斯提醒我，说他是我的领导，他做得多好。现在我必须有一个领导。可他究竟对我说了什么呢？

“你刚刚提到什么新任务？”我终于向弗兰斯转过身去，怯生生地问。

他仍然站在我身旁。他点了一下头，说：

“是的。有任务。但是今天我们不谈。明天等全组同志到齐了再谈。”

这时他像对大病初愈刚刚睁开眼睛的孩子那样对我微微一笑。

“你会感到惊奇，汉娜；盟军登陆后不久，你的老朋友就回来了。现在他们已经埋头于我们的事业……”

“老朋友？”我问道。“哪儿来的老朋友？”

“猜猜吧！”弗兰斯说。“你得向我保证，不再干蠢事了。抵抗运动需要你；你要知道，斗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我知道，”我回答，“我不再干蠢事了……我现在就到‘烟桶’去，那里也许能过夜。”

弗兰斯把手伸给我，异乎寻常地长时间握着我的手。我明白，他希望我履行自己的诺言。不过我也没有打算食言。

第二天早晨，我最早一个来到“西班牙橡树”这座老式的领主宅第。在那里我碰到了弗兰斯和鲁朗特；鲁朗特和我打招呼时流露出一种胆怯和友好混杂在一起的神情，与头天我看到的其他同志一样。我们没谈几句话，只讨论了从前线来的最新消息。德军在诺曼底仍连连退却，俄国人占领了卡累利地峡，而在前线的其他地段，他们正向着波兰边界挺进。

“德国人现在准备跟我们玩别的花招了……”鲁朗特开始说

道。"一列列满载德军士兵的火车从这里开走了，代之而来的是一车车教堂职员和穿着肮脏的深灰色制服的退伍军人……只要在火车站呆上一个小时，那么你所获得的关于目前局势的印象，要比收听BBC广播电台海阔天空的述评要深刻得多。"

"是的，"弗兰斯证实说，"他们兵员不足……他们只差把党卫军分子和警察匪徒派往前线；正是这些最坏的家伙在欺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鲁朗特用折叠小刀在赤杨木棍上刻上白色的螺纹。他头也不抬地说道：

"德国青年正在学着怎么去死！为他们的元首去死！我不理解这些年轻人。或者说得正确些，我不理解，怎么能够强迫年轻人做出那样的行为，要知道，他们确实很珍惜生命和未来！"

"我不能想象，他们真会出于本人的愿望而上前线的，"我说。"鲁朗特说得对，年轻人只能考虑未来。我不相信，年轻的德国人会有别的愿望。他们是在暴力、最无情的暴力的威逼下，被赶进地狱的！……"

人越来越多了；我听到他们在走廊里交谈。我很奇怪，因为我听到了妇女的说话声。弗兰斯说的是怎么一回事？"老朋友"？……门开了，我真的看到两个姑娘走进房间。最初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认识她们。弗兰斯说得对，这是安和金卡，两个哈勒姆姑娘，一年前，我在恩斯赫德到处寻找她们呢；她们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组织袭扰和怠工的小组。我们面对面站着，激动地微笑着，同时互相伸出手来；但是接下来那些痛苦的回忆使我们的相会充满了忧伤的色彩——我发现姐妹俩的眼睛里流露出悲哀的神色；她们害怕引起我的痛苦，可能还在恩斯赫德她们就知道，我遭到了多大的不幸。

“你好吗？……”姑娘只是这样问道。我朝她们点点头，也同样说道：

“你们近来好吗？……”

房间里的男人们仿佛比我们更感到尴尬。我根据一切迹象，几乎也像昨天那样敏锐地感到这点。眼看着大家那种不知所措的状态有可能还要严重，这时威南特、威贺尔和奥托突然来到这里。大家互相问好，拘谨地笑着——因为我在场，同志们都感到拘束；大家的目光凝视着威南特，此刻他正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个神秘的纸包。同志们围在他周围，都为转变气氛的机会突然出现而高兴；弗兰斯把威南特庄重地放在桌上的纸包捧起来，闻了闻。

“我的天哪！”弗兰斯喊道。“恕我冒昧，威南特……我好像闻到咖啡的气味！”

大家依次闻纸包。令人神爽的独特的咖啡的香味含有神奇的魔力；这间破旧的屋子仿佛突然变得宽敞了，使人感到胸襟开阔，心情舒畅了；大家的情绪高涨了。我看了看两个姑娘。安几乎没变，金卡显得更成熟更庄重，也许更勇敢了。我们第一次笑起来，当然彼此间还有点羞怯。

“谁去磨咖啡豆？”我问。

“我去！”金卡大声说。

“我去！”年轻的奥托说，不知是出于客气，还是出于别的想法。

“这么说，你可以得到加倍的享受罗：磨咖啡时，你就能闻香味，煮咖啡时还可以享受一次。”安说。接着她慈母般地拍了一下他的腰。“让他去磨吧，金卡。那么你去搞水。”

“你们年轻人老是性急，”鲁朗特说。“也没看到，威南特放

在桌子上的还有什么。”

我们又冲到我们这位食品商面前；他从灰色的纸包里掏出两个硬铁罐头。

“原来是这玩意啊！”弗兰斯惊叹道，他的两眼闪闪发亮了。这时他很像一个中学教师，看到自己的学生正确无误地解开了一道道习题。“决不会吧！炼乳！”

我们虔敬地望着昔日荷兰遗留下来的这点可怜的奢侈品，用手掂量着，仔细地看着鲜艳的商标，商标上画着一群牧放在草地上的奶牛。

“你这个走私贩子，在哪儿搞到这些东西的？”鲁朗特问。

“任何时候也不要问与你不相干的事，”威南特毫不客气地说。“我不是也没问你，你是怎么搞到食品的吗？——你恐怕已经知道，汉娜，”他微笑着说，“鲁朗特显示过一个粮秣采购员的巨大天才吧？”

“好像听说过，”我回答。

“这是他们两人，鲁朗特和奥托干的！”弗兰斯解释说。“他们搜遍了哈勒麦尔·麦尔整个围垦区。所以现在养老院的教堂里垛着七十包粮食。小麦、豌豆和菜豆。”

鲁朗特挥了一下手说：

“别说了！记得吗，奥托，搞运粮许可证我们费了多大劲？”

“……我们还亲自动手伪造许可证呢，”奥托毫不犹豫地说。“对，还伪造了许可证！我们还请了多少人帮助……卡车司机、磨坊工人！我们雇用了多少板车、带行李架的三轮车、手推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漂亮仗，”弗兰斯说。“喂，金卡，去吧，去做你姐姐吩咐你的事，去搞水！奥托，那你就去磨咖

啡!”

这个活跃的场面，使我想起第一次进指挥所时的情景。但是今天这种活跃不太真实，是故意装出来的；而当我想到那次在这里遇到的那些人，我仿佛觉得，一片阴影降临了，并且笼罩着整个房间。在不长的时间内，同志们仍保持一种恬静快活的样子；我坐在一旁，几乎没有参加交谈。

我们细细地品尝着加了真正的罐头牛奶的咖啡，闭上眼睛慢慢地喝着；我多么想知道，我的同志们，每一个同志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弗兰斯像往常一样高傲和自满；我看得出，他又感到自己是这支小小的，但经历过战斗考验的队伍的领袖。

“听着，”他终于说道，“在盟军登陆之后，今天我们大家作为一个抵抗小组第一次在这里集中。我们应该认清当前的形势，以及自从……我们遭到伤亡后，这种形势对我们的影响……盟军在全面向前挺进。德国人正从各个占领区撤出自己最后一点精锐部队，而派到这里来的是一些老头兵……但是这里仍留有警察局和保安部，真像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样。他们当然会使用严厉的警察压制手段，以致任何人都无法喘气……至少他们的企图是这样。我们小组应当估计到，我们必然还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们弹药不足。我们没有像样的自行车。我们的左轮手枪过时了……这一切我都同党组织的领导谈过。我们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搞到所有必需品……”

“怎么干？”威南特问。

“你很善于搞咖啡和牛奶，”弗兰斯说，“难道就不能搞两辆好的自行车吗？德国巡逻队骑着最好的自行车到处跑……”

“这算什么，任务？”威南特拉着耳朵问。

“你可以这么认为，”弗兰斯说。“你和威贺尔、奥托搞几辆

合适的自行车；从谁那儿搞，自己决定：从叛徒那儿、从德国人那儿、从警察那儿——从谁那儿搞都无关紧要；我们这里必需有两辆备用的自行车。”

“顺便为我搞一辆好的女式车，”金卡说。“我的车子很像报废的缝纫机，每次我从车上跳下来时都累得半死不活的……我自己把它重新漆成另一种颜色。”

“对我来说，一辆新自行车也不是多余的享受，”我插嘴说。

“我们记下来，同志们，”威南特说。“两辆女式自行车。”

“鲁朗特和我要去阿姆斯特丹干一件事，”弗兰斯说，“那里的事情够我们忙两三个星期的……这里留三个姑娘。”

“那我们究竟干什么？”安甩了一下蓬松的头发问。

弗兰斯微微一笑：

“等你们有了自行车，你们就去为抵抗委员会搞一些武器和弹药。我们领导手中有地址，知道哪些地方有这些东西，哪些地方能搞到这些东西。”

“我们也会得到自己的一份吗？”奥托问。

“当然，别担心，”弗兰斯回答。“但是目前我们必须节省每一颗子弹，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大量的储存呢？……”我问。

“那时我们就开始战斗了，”弗兰斯一边把自己袖子上的皱褶抚平，一边说。“我已经预料到，谁是我们的第一号，而你，汉娜，大概也知道这个。”

“在弗里斯兰，地下工作者没成功的事，在这里哈勒姆应该成功，”我想。但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我们喝了第二碗真正的咖啡，虽然味道已变淡了。同志们渐渐离去了。我们姑娘们在指挥所的时间比别人长。我试图向

小姐妹们打听有关别动小组在特文特遭到不幸的情况，但是姑娘们的回答不太热情。我明白了，这个别动小组经历了一连串小小的失败，因而姑娘们终于决定回到她们过去活动的地区。她们回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

黑发的汉娜

令人忧郁的几星期慢慢过去了。就像过去我在这里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一样，那时我们小组被迫谨慎地行动，我们大家只好坐在指挥所里，由于无事可做而感到苦闷。这次我们由于没有作好战斗准备也不得不闲坐着。

搞自行车的事不顺利。两个星期内，我们三位接受此项任务的同志只搞到一辆男式车和一辆女式车。我们三个姑娘给这两辆车子涂上了绿油漆和灰油漆，并且拆掉金卡的笨重的旧车，把可用的零件藏在花匠的小屋子里。

鲁朗特和弗兰斯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一直保持沉默。

三个星期内，安、金卡和我为了搞武器，一共出去过两次。两位姑娘表现得机智勇敢；其实对她们的勇敢自从在特文特相识以来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她们把手枪和子弹盒放在自己自行车的挂包里，仿佛这是面包。即使路上遇到德国巡逻队，即使法西斯保安警察站在桥旁或者十字路口，并且来嗅猎物，她们也不会张皇失措。有一次，在维耳曾附近的渡船上，金卡镇静地把自己的自行车靠在德国人的汽车上，和两个德寇军官快活地闲谈，应付他们不很有礼貌的玩笑。

在我们第二次去搞武器的时候——从埃特海斯特去维耳曾

——我们又遇到了一桩明显证明我的新朋友遇事沉着的事情，尽管我本来就相信她们能沉着冷静。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自行车的挂包里装满了像铅一样沉重的货物，在进别维尔魏克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交通阻塞，只得停下来；德国人的几辆卡车在距离我们一百米的地方相撞，阻塞了道路。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像被赶进闸门的鱼似的从一条窄窄的空道挤过去。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可能挂包里的东西太沉，安的自行车突然向一旁一斜，她做了一个动作没有成功，自行车翻了，她也跌倒了。

装得满满的自行车挂包滑向一旁。不知什么东西裂开了——大概皮带不很结实。一群可敬而又朴实的荷兰人看到了我们海军和警察用的手枪、子弹盒和零散的子弹在路面石头上滚动，就像马路中央有一个杂乱无章的弹药库。

我们立刻站到安的自行车旁。但是我们的武器弹药已引人注意了。一个身穿深灰大衣的姑娘——从外表上看，她似乎一辈子也没说过一句脏话或粗话，——刺耳地尖叫起来：

“耶稣，玛利亚！……”几个工人喊着提醒我们，而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小伙子看到滚到他前轮下的子弹，脸刷地一下白了；他极端恐惧，赶紧掉转车头。转瞬间只有我们三个人站在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各自逃散了。

金卡把自己的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而我仍然扶着自己的车子站着。我朝一百米开外的两辆德国卡车的方向望了一眼；几个身穿绿制服的小伙子朝我们走来，一边叫喊着什么，但是我没听清他们的话。安跪在散落下来的手枪和子弹中间，迅速地收拢起来，重新塞进挂包里。金卡跑过去帮忙，而我扶住她的自行车。一切都那么快地过去了，我们表现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

以致我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金卡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安；安也忍不住大笑起来。金卡那张机灵的小脸荡漾着真正发自内心的毫不畏惧的笑容——我们笑得完全像一群天真的小姑娘。我们笑了足有十秒钟。就像有一次我们大家在恩斯赫德的医院里哈哈大笑一样。然后我们扶起安的自行车，把包紧紧地捆在自行车上，满不在乎地又上路了。卡车上的德国鬼子转过脸去忙自己的事了。一个军士用德语朝我们大声叫喊："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而我像往常一样用荷兰话大声回答："没什么……只是一个妇女摔倒了。"我们从敌人身旁走过。一小时后我们把武器弹药送到了指定的地方。只是那时候我们又大声笑起来；现在我们有许多时间了。在指挥所我们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已把头发染成了黑色。我是按照安的建议染了头发的，因为弗兰斯带来了准确的消息：我的照片和特征已经出现在警察局的报表上了。

"红头发"——其中的一条特征指出。我考虑得对：由于我的头发颜色鲜艳，敌人会轻而易举地抓住我。我顺便到药房去，药房的地址是威南特从马丁医生那儿得到的。在那儿他们为我配了难闻的，但很有效的药剂。我在杨和卡琳的房间里把头发染了，自从回到指挥所我仍住在那里，有时在"烟桶"过夜。我照了照镜子，勉强认出自己那张有点雀斑、苍白的脸，这张脸仿佛嵌在无光泽的黑色的木框里。我感到害怕，同时心想，卡琳也会害怕的，但是她早有准备，初次看到我这头黑色的，不是红色的鬈发后，只是说：

"真有点怪，汉娜……我只得重新习惯了。"

染了头发后，我所感到的不快使我多少有点减轻了内心的

巨大痛苦。我不应该谈起染发的事，甚至想都不应该去想……这个念头使我感到非常苦恼：实际上是否不应该呢？既然我面临的只有一个目标——消灭敌人，那么外表怎么样，对我来说反正无所谓了……我在内心深处知道，头发的颜色现在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那个人——在他面前我以自己的红发为自豪——再也看不到我的红发了。

安、金卡和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任务。每天早晨我们都准时来到指挥所。弗兰斯通常都在那儿，有时他也不在。有一次，安带来一把吉他。她和金卡很有音乐天赋，比我强得多；我甚至很难记起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儿歌，我只会用口哨吹《马赛曲》，在"染血的军旗升起来了"一句的两个地方老是走调，尽管我在心里努力地重复这句歌词。安和金卡教我唱俄罗斯游击队的歌曲、加泰罗尼亚[①]割麦人唱的歌曲和《华沙工人歌》；她们还知道意大利歌曲《红旗》的歌词，知道一九三六年埃里希·魏纳特[②]在马德里郊外的战壕里写的歌曲，即以台尔曼[③]命名的部队的队歌；这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意大利共产党员又能在空余时间唱自己的歌了，而关在布痕瓦尔德的台尔曼也许已经被党卫军分子杀害了……我学会了低声唱所有这些歌，安和金卡在响亮颤抖的吉他的伴奏下毫不拘束地放声歌唱，因为领主宅第离公路相当远，公路上听不到我们的歌声。

过了几天，我已确信，我再也不能留在杨和卡琳这儿了。我不想留在那儿。他们对我来说比兄弟姐妹还亲。他们与我同吃

---

① 西班牙东北部一个三角形地带，包括巴塞罗那等四省。

② 魏纳特(1890—1953)，德国诗人。一九二九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统治时期流亡国外，曾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③ 台尔曼(1886—1944)，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曾任德共主席。

同喝，我和休果给他们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未必能补偿我们吃掉的食品，那时钱几乎不值什么。费利缅家的人提供我们避难的地方，这是不容易的。他们什么也不问，只是猜测他们所掩护的是些什么人。即使这样，我还是应该离开他们。我把小海斯抱在膝头上，和他们一块儿坐在厨房里，对他们说，我为他们担心，因为我接受了新任务，而且我的照片又落到了警察局手里。他们点点头说，他们很清楚，这个理由的确重要，还说，我当然是对的；然而我们三人自然都知道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更重要的原因：我不能一个人长时间地留在这里。一天早晨，我发觉自己起床后，从自己小房间的一扇狭小的窗子往外看，以前我经常这样，看看休果是否在菜园里干活。另外一次，我想象着自己朝休果走去，要告诉他一件事，我从一长排鸡笼旁走过，在放豌豆和菜豆的棚子前停下。但是现在休果已经不在了，永远也不在了……

我的手提箱很快就收拾好了——我的行李不多。杨和卡琳没多说话。我同他们告别时，霎时间又感到痛苦和胆怯。我不知如何是好，该说些什么。所以当卡琳首先摆脱了窘境，拥抱住我时，我很高兴。

他们三人站在院子里，朝我挥手；卡琳抱着海斯，海斯大声喊道："再见，姑姑！"——而杨慢慢地挥动着铲子，直到我消失在沙土路的拐弯处。

这天，当我骑着自行车去哈勒姆时，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是一个在自然力的控制下盲目的无能为力的人……一个失去了立足点，并且无法给自己找到新的立足点的人。

安熟悉哈勒姆的一个女护士，安说，这个女护士房间上面有一个小阁楼，那儿能放一张床。以后我就住在那儿。要是女护

士不在家，那我就可以坐在她的房间里，如果想为自己做点什么吃的，那么也可以使用煤气炉和炊具。

我好容易才习惯自己的新住处。我听见，女护士每天早晨从家出去——多半是很早就出去了，但是我无法鼓足勇气，占用她的房间。我收拾完自己的床铺——这张床是抵抗小组为我在马丁医生那儿借的——就去指挥所。有一次我看了看新主人书架里的书。那是一些医学专业书籍，另有几本是为姑娘们写的——显然这些书能引起姑娘的回忆，还有二三卷诗集；我翻阅了这些书，然而流畅漂亮的词句根本不能打动我的心。

在这炎热的夏天，我彻夜难眠。我的铁皮房顶的"卧室"白天被烤得火热，夜里充满了闷人的焦油气味。屋梁下，许多无忧无虑的麻雀就像在古城所有的老房子里一样吱吱地叫着。我毫无睡意地久久地躺着，睁着大大的眼睛死盯着铅色的黑暗。有时我有那样一种感觉，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了，除了空空的，无知觉的躯壳。过去的我，我曾做过的事，把我同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所有这一切都从我这儿失去了，挣脱了，割断了。我就生活在我父母生活的，我出生的这个城市，但是这也丝毫无补于事。我被迫隐藏起来，自己嘲笑自己，披着那难看的、染过的头发走在人们中间，他们不应该认出我来，就像我不能去认他们……我实际上不存在了。"斯·汉娜"是名字，是从记忆中抹去了的惯用语。我不得不同自己，同痛苦的感情抗争，因为我总觉得我至今所做的一切仿佛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我的生活太不顺利了。

我知道，这不完全对，但是我无法控制，我使小组的同志们十分清楚地察觉到自己那急躁的心情和不满的情绪。当然我看得出，弗兰斯不喜欢这样，对此感到恼火，然而我又无法约束自

己。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行动。为几辆自行车所进行的小小出击不算什么行动；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子弹；弗兰斯强调了很久的"储存"已经完成了。我看到，同志们同意我的意见。弗兰斯本人也应该感觉得到他这样迟迟不动是毫无理由的。他用埋怨的口气说：

"就听你的吧……明天我们详细谈谈。"

然而他又拖了三天，大概在这段时间内，他与安妮和别的什么人碰过头；这时候他才通知我们，我们可以开始惩罚奥别·斯哈弗的行动。

从学校传来的枪声

六月底七月初，安、金卡和我几次出去侦察，试图发现斯哈弗的踪影。据弗兰斯说，这个坏蛋显然感到自己在哈勒姆很安全，不过他避免经常在大庭广众下露面。我们只有他的一张旧照片，这是从某张报纸上剪下来的，那么脏，那么皱，显然这张照片在皮夹子或者内衣口袋里放了很久，凭这张照片要认出他来是不可能的。

我把奥托拉到一旁，对他说：

"你经常到各处去……那么，睁大眼睛留神着。如果发现奥别·斯哈弗的踪影，赶紧来告诉我们……不过你别向他开枪，听到了吗？"

"这么说，你们要亲手杀死他，对吗？"小伙子温和地笑起来。"好，我一定留神。"

我很喜欢奥托。他非常谦恭稳重，大部分时间都站在一旁。他出生不是一般的普通家庭，不是像另一个新来的人威贺尔一

梓出生在工人家庭。奥托的父亲是莱顿和哈勒姆之间某地一所乡村中学校长。奥托来投奔我们的时候还是中学高年级的学生。有一次他和我谈起自己的计划：

“学化学？不，现在不行。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看课本了……尽管这有很大的诱惑力，你也知道。但是首先应该彻底清算坏蛋。那时我又能开始新生活了。”

我问他关于化学的问题。他微笑着摇摇头：

“不必自寻烦恼，汉娜……因为你也抛弃了学业，你知道什么事最重要。”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是的……但是我抛弃学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不再认为这门学科有什么好处……它太脱离实际了。这不是法律，而是一些法律形式……尽管化学也有许多公式，但你永远不能说化学只是一种形式。化学永远是实在的科学。”

“它当然也像法律一样在改变，”奥托说。“不过是按另一种形式改变，变得更适应生活……不，我们别谈这个问题了。一想到实验室和所有与其有关的一切，就像酒力冲到我的头上，我站都站不稳了。”

“现在，主要的是奥别·斯哈弗，”我说。

“还有自行车，”奥托接着说。

安和金卡住在布隆缅达姑姑那儿，她们每天步行来指挥所，都要经过“保安部”所在的警察局宿舍。尽管她们天生机灵和敏感，姐妹俩还是没有能认出那里究竟谁是奥别·斯哈弗。

“在这里闲逛的各种坏蛋太多了，”在指挥所金卡站在剥蚀的镜子前一边编着辫子，一边埋怨说。“好像，这个坏蛋只是在夜间行动。”

“谁知道，也许他坐在汽车里，而你多次从他身边走过呢，”我说。

“简直是可恨得要命，”安说。

“也许，奥托会走运，”我说。

“我不嫉妒这种运气，”金卡不假思索地说，声音那么大，使得我们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觉得无聊。我把书带到指挥所——决定认真地，从头到尾把《资本论》读完。我开始读书，但思想集中不起来。尽管我不去想父母被捕的事，但是头脑中的其他念头也远不是令人快乐的。我老是觉得，时间在白白地流逝，而我们在毫无把握地等待……没有比这种处境更糟的了。有时我整天整天在城里转悠，归根到底哈勒姆不是世界的首都！我想，斯哈弗弯曲的生命线最终应该在某个地方与我的生命线发生冲突。但是我还没找到这条生命线。我来到指挥所，等待安和金卡带来好消息。在漫长的白天我经常独自一人用手托着头坐着，试图集中注意力，理解“商品”复杂的实质；我作了笔记，自己也感到奇怪，我还真记住了不少，因此当求知若渴的安和金卡有时向我提问题时，我还能说出个道道来。安弹了好长时间的吉他，我们一言不发地听音乐。不然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那种味道越来越差，越来越难咽的啤酒，一边听两姐妹唱歌。

鲁朗特第一个带来了斯哈弗的消息。在一个漫长的阳光明媚的夏日，当我们极其烦闷，坐在塌陷下去的沙发上无精打采地慢吞吞地一个字一个字费力地说话的时候，鲁朗特走进房间，并且得意洋洋地说：

“我知道，斯哈弗在哪儿。”

我们马上活跃起来了，由于好奇和羡慕，大家急不可耐地围

住他，并且纷纷向他提出问题。在回答我们之前，他不慌不忙地在沙发上稳稳地坐定。

“据我内弟科尔的邻居说，”鲁朗特最终说道：“在赫姆斯特德与哈勒姆交界的霍伊瓦汗斯特拉特，住着一个女人，她好长时间以来与‘保安部’的一个人有着密切的来往。那人一星期去她家一两次，只要她的丈夫出门不在家。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最近两天科尔碰巧从他的一个邻居那儿听说，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奥别·斯哈弗。”

“好极了！”我喊道。“你的内弟不会搞错吧，鲁朗特？”

“搞错？说这个话的人原先住在吕伐登附近一个村子里，在学校时他和奥别坐一张课桌呢。”

“好极了！”我又说了一声。“浪荡汉奥别的末日快到了。”

“我们马上把这个妓女抓起来吧？”金卡建议说。

我们情绪高涨，活跃起来了。我们让鲁朗特详细告诉我们，他的内弟住在哪儿，接着马上就出发去侦察。他住在战前不久开始建筑的一个新街区，由于德国鬼子的侵占，建筑工程中断了。几栋新房子座落在满是沙土的房场上，一簇簇野草钻出了沙土地面。唯有一架小桥和排水渠将这个地区与城市第一条宽阔的大街连接。水渠两边还保存了一些较老式的房子，这些房子之间是一块块尚未动工的施工区的荒地和无人问津的花园。靠近小桥的地方是稀疏的赤杨树林和柳树林，如果行动相当灵活的话，那儿也许可以作为隐蔽之地。在两排房子的对面是一幢学校大楼，学校后面是一片用篱笆围上的小草地。所有这一切赋予城郊以突出的特征——旧和新的混杂；类似的景象往往会引起一种隐隐的忧愁和对未来寄予某些希望的复杂情绪。

整整一星期，我、安和金卡在这个街区进行观察。这里没有

出现过任何一个"保安部"的侦探。好几次我们在大白天看到一个身穿便服的令人讨厌的人走进一所住宅；尽管安发现那个家伙的脸那么丑恶，好像在这张脸上直接写着"卖国贼"，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奥别·斯哈弗。

每天同志们都问我们，事情进行得怎么样，而我们似乎觉得，他们在幸灾乐祸，讥笑我们没有什么进展；他们善意地取笑我们，我简直气得脸都发青了，一次只有奥托和我在房间里，他对我说的话才使我高兴起来。他说：

"我认为，我的枪法不大准……你能不能教我几次？"

我马上回想起我初次到指挥所和在"西班牙橡树"庄园两排松树之间学习射击的那些日子。我想起弗兰斯和我开的第一个可怕的玩笑，当时他领我到树林，突然自称是德国间谍。我同意教奥托射击。

此后我们每天在茂密得能淹没声音的松林里练习射击。有时安和金卡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不过她们不用练习射击；她们的枪法很准，奥托没有射中时，她们还嘲笑他；他射击不像我预料的那么稳。

"你的手太紧张，"金卡对他说，

"瞄准时应该镇静，"安补充说。"当你按扳机时，立刻要想到，子弹已经射中目标。"

"来吧，奥托，"我说。"我们再来一次。要稳一些。"

白天，我们观察斯哈弗情妇所住的街区，因为鲁朗特和他的内弟的话应是可信的，鲁朗特得到的情报应是准确的。然而我们不走运。我们在街上徘徊，因为无事可做而感到极端苦闷。我们面前隐约显出砖房和学校的墙壁，水渠深蓝色的水，一小块一小块绿草和堆在新建筑工地上的沙土；这种景象看上去单调得令

人烦恼……现在我们闭着眼都能摸到道路了。

“大概，奥别在其他什么地方忙着，”我推测。

“派到东面战线去了吧……或者去法国了，”安说。

“这才好呢！”金卡大声喊道。“他在那里肯定要完蛋了。遗憾的是，他可以躲过我们的手枪子弹。”

“不，不，”我说。“弗兰斯说得对。德国军队从这里撤走了，而德国人把警察留在这儿。他们需要警察，作为恐吓工具。警察的任务就是严密控制被侵占的国家。”

“我以一盾钱打赌，这个卑鄙的家伙仍然在这儿，”安说。

“我再添上一盾，甚至两盾；这些钱反正什么也不值，”金卡响应说。

我们在谈话后的第二天证实，这个卑鄙的家伙实际上还在这里来回跑，但是不是步行，而是骑自行车。我们已经准备离开徘徊了将近两小时的街区，突然看到“保安部”的两个侦探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出来，朝小桥那儿骑去。安第一个看到他们；她抓住我的手，于是我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金卡在我们后面“啊”的一声，倒吸了一口气。

“我的天啊！”安大声喊道。“一下子两个。”

“金卡，”我吩咐说。“你跟在他们后面，我们留在这里。注意他们是否去霍伊瓦汗斯特拉特。”

在拐向另一个方向，沿着排水渠骑去前，我和安注视着这两个穿军装的坏蛋。其中一个人是淡黄头发，相当胖，长着一对红色的大耳朵，蓄着几乎发白的小胡子；另一个是黑头发瘦削的人。我似乎觉得这个淡黄头发的人不很聪明，而且是个相当善良的人，尽管善良与他肮脏的职业毫不相干。我想淡黄头发可能是弗里斯兰人，这个黑头发是个更危险的人物，一定是奥别·

斯哈弗。金卡跟在他们后面急驰起来，但是当她上桥时，他们拐过房角不见了。

我们等了十来分钟，金卡又回到我们这儿。她带着年轻人特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神情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跟前。我们一起隐藏在水渠旁边的柳树和赤杨树丛后面。

“喂，怎么样？”我们问金卡，“你了解到什么了吗？”

金卡耸耸瘦削的肩膀：“很少。黑头发走进霍伊瓦汗斯特拉特大街十一号房子。淡黄头发的胖子站在外面望风。”

我们互相望望。

“一下子两个——好像，多了一点，”安喃喃地说。“虽然我并不害怕……”

“很清楚，没什么可怕的，”金卡说。“你怎么想的，汉娜？”

“如果我们把他们两个都打死，那么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坚信，其中一个定是奥别，”我回答说。“但是这不是开玩笑……两个狡猾的坏家伙自然枪法很准……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明确：奥别远不像弗兰斯断言的那样自信。这个坏蛋为自己安排了保镖。”

我们犹豫不决地站在原地，默默地互相望着。

“如果这是奥别……”安开始说。

“我发誓，没错，”金卡说。“一切都相符。地址。白天登门……”

“难道这个胖子老是站在门口吗？”我问。突然我把话缩了回去，因为这时淡黄头发、白胡子的胖子又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骑上自行车，离开了小树林；我们一直骑到第一条新建巷子上才停下来。

“哎哟！”我累得叹了口气。“只是给我们添了个麻烦……奥

别打发自己的保镖回去一两个小时，记住我的话吧。”

我们怀着已成为习惯和第二天性的耐心等着事情发展。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耐心了。经过几天毫无消息和失望的折磨之后，我们面临着第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傍晚时分，安发现胖胖的淡黄头发的侦探又真的出现了，他朝霍伊瓦汗斯特拉特骑去，显然是回来接自己的同伙和长官。

“就是说，我的推测是对的，”我说。“黑发丑脸的瘦子是奥别·斯哈弗。问题在于他是不是老带着保镖？”

安机警地环顾四周。

“这里只有水渠一条退路，”她对我说……“在这个地方要撂倒个把人也不容易。”

“个把人？如果情况没什么变化，那么我们得打死两个，”我反驳说。

“好吧，我不怕，”金卡说。

“当然！任何了解你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安说。“你能做到这点。大概我也能，汉娜也能。但是我们的行动应该万无一失……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都能回到基地。还有许多事在等待着我们。”

我没有注意听两姐妹的玩笑话和心里话。我也像安一样朝四周看看。她说得对，从新街区和学校的方向是不可能撤离的；那里的沙土空地已变成了牧场，当然有水沟和篱笆；如果我们的意图没有成功，而不得不撤离的话，那么这些水沟和篱笆就成了障碍。两岸很陡的水渠也不是合适的退路。

“应该从汽车上射击，”我说。

“就像休果，当他在渡船上抓住一个警察局的密探……”金卡说着马上又不作声了。我看见安用胳膊肘赶忙捅了她一下，尽

管姐妹俩以为我没发现。

“这需要整整一组的人，”她赶紧应付说。

我沉思地点点头。

“也许，是这样，”我说。“应该认真地把情况搞清楚，姑娘们。画一个地形略图吧。”

在指挥所我们大家一起分析了我粗粗画成的略图：水渠、桥和新街区。鲁朗特在我的图上作了一点补充，他画上了通往城里的最近的几条路。的确是有困难，只有一条退路——过桥；如果我们打算在霍伊瓦汗斯特拉特刺杀斯哈弗，那么就像我开始想的，朝其他方向撤退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

“要是他们总是两人同行，那怎么办？”我问。

“那就应该全组一起行动，”威南特说。

“危险就在这里，在这个角，”弗兰斯俯身看着地图，低声含糊地说。“依我看，姑娘们得观察一下，奥别会不会一个人来。”

“可到那时候，七月份过去了……”我埋怨说。

“我负不了责任，”弗兰斯反对说，“特别是现在。德国人正在逃跑……也许到秋天一切都要解决了。那时我们就会抓住奥别。”

“弗兰斯，你相信，战争那么快就能结束吗？”我屏住气问道。我突然感到内心剧烈地疼痛，我意识到休果和我们其他的同志，数十名战友，我们的同胞，牺牲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牺牲在新生活的大门已经打开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已经出现的曙光。同时，我知道应该高兴的是，新生活的大门打开了，一切都快结束——这是对活着的人来说的。

“我不是预言家，也不会瞎猜……”弗兰斯有些严厉地说。“我要为你们负责。我们消灭奥别，应该尽可能不冒险。”

我们又开始坚持不懈的，需要耐心的侦察。三天内，“保安部”的坏蛋没来新街区。时间越长，引起别人注意的危险就越大。就在这时候长着一副狡猾的嘴脸，黑发、黑皮肤的坏蛋又出现了；现在他换了一个保镖，是矮个子的小伙子，他鼻子旁有一颗胎痣，长着一双几乎分不清的眯缝眼。

“我跟着他们，看看他们干什么，”我说。

毫无疑问，这个瘦瘦的黑发人是我们要寻找的坏蛋，他抓走了我的父母，我们正要处决他。不过护送者换了。不一会儿奥别就消失在霍伊瓦汗斯特拉特大街十一号房子里。眯缝眼的矮个小伙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望了我一眼，当他确信街上没有什么危险，便转回城里去了。傍晚时分他又出现了，来接那个坏蛋。坏蛋不慌不忙地打着哈欠，离开那所显然已经在里边寻欢作乐够了的房子。

“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这个坏蛋是奥别。”安说。

“哎，我们怎么来智取他呢？”金卡叹了一口气说。

我们在指挥所里一边研究大街的略图，一边讨论这个问题。

“最好是躲藏在学校里，”安提议。“从阁楼的小窗里开枪射击。奥别离开那个女人时，孩子们已经放学了。”

“主要的是，要有把握，枪法要准，”弗兰斯说，“要不然你们就跑不掉了。”

“只要能找到神枪手，那一切都会成功。”我说。

那个与鲁朗特和奥托一起搞自行车，平时沉默寡言的新来的威贺尔听了我最后一句话，轻轻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我问威贺尔。

“如果你要找神枪手，那威贺尔当然知道，”威南特说；他也笑了起来。接着弗兰斯和鲁朗特也笑起来。我们知道他们在笑

我们。"一九四〇年五月[1]威贺尔在盖列别别尔克附近开枪射击……"威南特继续说。"他从来都是百发百中，是吗，威贺尔？"

威贺尔那双老是流露出安详神色的灰色眼睛一下子发亮了。

"'从来'，这说得太过分了……我只知道，还在战前，无论在靶场，在集市我都讨人恨。我老是中头奖。"

"太好了，"我喊了起来。

"如果远距离呢？"安用一种怀疑的语气问。

"对一个真正的神枪手来说，五十米的差距没什么影响，"弗兰斯说，显然他也很感兴趣。"是不是这样，威贺尔？"

"应该实地看一看，"威贺尔慎重地回答。

第二天早晨我便和威贺尔两人一起出发了。现在我已经不敢冒险过小桥，而是派威贺尔一人去观察地形。大约过了五分钟，他回来了。

"距离倒不是主要问题，"他说。"从学校小窗口的正面射击，大街还在射界之内。那里大概是个厕所。"

"那么接下来呢？"他那合理的推论使我感到鼓舞，我急不可耐地问。

"那究竟怎么样钻进学校呢？"他说。"要知道那里有孩子们。要是我们开枪的话，也不能使他们遭到危险。"

我们面对面站着，紧张地思索。我突然想到：

"威贺尔！过几天孩子们都不在学校了！快放假了！七月十五日以后，学校将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他望望我，他的嘴角翘了起来，眼睛又放光了。他轻轻地，

---

[1]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希特勒军队侵占了荷兰，盖列别别尔克附近（海尔德兰省）发生了一场大战。为了纪念这场战斗，在那里建立了纪念碑。

仿佛暗自笑了起来。

“好！”他大声喊道。“我没想到这点……啊，现在……”

“现在奥别要完蛋了，对吗？”我问，极力抑制着内心的欢乐。

“差不多，”威贺尔回答。

我们又和小组的同志讨论了我们的计划。鲁朗特亲自去察看环境，后来弗兰斯和威贺尔也去了。安、金卡和我在那里呆了半天。威南特和奥托千方百计为我们搞到两辆最好的自行车；他们也去看了，想为威贺尔在霍伊瓦汗斯特拉特对面选择一个最好的位置。我们大家情绪好极了。

时间慢慢地流逝。正如我们确信，任何战争和侵占都不能阻止的那一天最终来临了；七月十五日到了，学校开始放假了。

“我们还是等等，”安建议说。“也许，学校马上要大扫除，那时我们立刻就会被发现。”

我们又连续观察了两天。学校照旧空无一人。

“他们在八月底前不会大扫除，”鲁朗特说。“一般在学期开始前，所有的课桌板凳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那么我们现在占领学校，”弗兰斯决定说。他显然想亲自领导这次行动，而且毫无疑问，他有权这样做。威贺尔的任务是每天守在这里，直到出现有利的时机。

“那我们呢？”金卡急不可耐地，并有点抱怨地问。“要知道，我们最先接到处决奥别的任务！”

“情况起了变化，”弗兰斯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在小桥附近掩护退路。只有在别人遇到危急情况时，你们才能开枪射击。”

“如果发生了情况，你大概不会跑开，对吧，金卡？”威南特说，并且拉了一下小妹妹的辫子。她拿起放在桌上的苍蝇拍就

打，他迅速地躲到我身后。

奥托不知去向了，我们甚至没有发觉。

“我担保，今天他会骑来一辆盼望已久的好自行车，”鲁朗特带着慈父般的自豪口气说。“为了增加威贺尔平安归来的希望。”

“我暂时还用自己的加重车，”威贺尔说。

傍晚，威南特他们不知出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穿上蓝色的、膝盖和屁股上打补钉的连衫裤，随身带着一包用报纸裹好、卷得长长的东西和一个麻袋。麻袋里放着许多东西：糊墙纸、钳工管道工的工具（尽管在荷兰未必能看到哪怕一条没有被德国人征用的管道），还有米突尺。也许里面还有狙击用的卡宾枪。此外，在威南特自行车的把手上挂着一个用破布缠上的装着柏油的小木桶。我发现我的两个同志外表很像老实巴交的工人……而且已经不那么年轻了，在路上不会被抓去服劳役。

傍晚，威南特回来了。威贺尔和长长的一包东西都留在学校；只有那个装柏油的木桶挂在威南特的车把上。我们围住他，纷纷提出问题。

“威贺尔已经在学校里闲坐着，”威南特说。“我想他在玩拼字积木，借以消磨时间……”

“一切都顺利吗？”弗兰斯问。

“再好没有了。当我们走进校园时，没有人感到奇怪。我们绕过大楼，学校后面没有住人的房舍。因为没有绿肥皂，我用柏油抹在玻璃上，贴上一张纸条。因此玻璃没有发出响声。”

“那你没忘取锁印吧？”鲁朗特问。

“搞好了，”威南特回答。“明天钥匙就配好。”

第二天，威南特穿着连衫裤又去学校。他给威贺尔带去一盒备用的食品和一把钥匙，好让威贺尔能够出来。

这天早上，奥托没有到指挥所来。我们几个姑娘一清早就出发去小桥地带。我们老远就看到学校阁楼的一扇小窗打开着。总之，学校的大楼看上去完全被人遗忘了，而且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这天，奥别·斯哈弗没有去自己的情妇家。快六点了，已经很清楚，没什么可等了，我们朝学校和半敞开的小窗看了最后一眼，便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聚集在指挥所时，弗兰斯问：

"你们谁看到过奥托，或者听到过他什么消息？"

"他会来的，不会失踪的，"威南特不耐烦地说。"他在伺机搞一辆自行车。"

"一般来说，他不会不通知一下就这么久不来的，"鲁朗特说。"要是我不知道，他很机灵和谨慎的话……"

"不用为他担心，"安说。

在这点上我没有把握；我心里产生一种模糊的、令人心烦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使我产生错觉。也许我的神经过敏的状态是因为我们面临一次行动。我没有时间考虑奥托为什么不来。应该去霍伊瓦汗斯特拉特了。

我们来到排水渠附近，半天来我们装出好像很快活的样子，嘻嘻哈哈，来回闲逛着。末了我们仿佛觉得，连鹅卵石也在看我们的热闹。我打了几个哈欠；我心里没有把握了，真希望这事最终结束。

三点半左右，奥别突然出现了。又是那个我认为是弗里斯兰人的，淡黄头发、小胡子的胖子陪同。他们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朝我们驰来，我们刚刚来得及躲起来。

当身穿军装的胖子返回城里时，我们又占领了桥附近我们

的阵地，不过稍远些，那里稀疏的小树林勉勉强强能把我们掩蔽起来。时间无聊地和令人苦闷地流逝着，每一分钟仿佛拖得很长，赫姆斯特德钟楼上的钟声相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有时我们中的某个人跑出小树林，看看学校附近发生什么事。

小窗照旧敞开着。

威贺尔是否看到"保安部"的坏蛋来了？

我们在占领的阵地上踏步，心里焦急不安。

将近五点钟，胖子回来了。我感到我的心沉重而又缓慢地跳动着，它的跳动在我喉咙里发出了回声。我几乎不看自己的朋友——我照例很担心，如果看见她们激动的样子，那我自己就更着急了。我只是说："胖子来了！"

"对，"安胆怯地证实说。"十分钟内一切都应该解决……"

淡黄头发的人拐上霍伊瓦汗斯特拉特大街，消失在拐弯处。安、金卡和我纹丝不动地站在小桥附近，滚烫的汗津津的手握着手枪，目不转睛地望着学校的小窗子。

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了，我内心也数着秒数。数着数着我就糊涂了，于是又重新开始数：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一分钟又过去了。

我看看自己的表，想知道我们在这里站了多少时间，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声。

我们愣住了，金卡紧紧抓住了安的袖子。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声。我紧张地望着学校的小窗子。那儿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后来我看到窗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时间过得慢极了，慢得使人难以忍受。我以为，我将会看到，人们来回奔跑，会听到叫喊声。但是周围异常宁静。

有人走出了校园——一个身穿蓝衣服，肩上扛着一包东西

的人；这个人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女人尖叫起来。安、金卡和我互相对视了一眼。用不着说，这是谁的声音。奸细的情妇在惊叫。

威贺尔蓝色的身影刹那间消失在大街拐角处突出的房子后面。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出现了，并从我们身边经过。他没朝我们望一下，不过他的声音传到了我们这儿：

“那个女人在那里跑……挡住她。”

我们没有吭声，立刻跳上自行车，飞快地朝那个张开双手，在大街中央奔跑的女人迎上去。

“抓凶手！……抓凶手！”

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这是个粗俗肥胖的女人，披着一头鬈发，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大概刚才她就是穿着睡衣往窗外张望，看到她的情夫和随从翻倒在地。这个女人大声喊叫着，一只手挥动着，另外一只手拉住飘动不定的睡衣下摆。人们从房子的窗子里伸出头来，少数人走出大门；这个时候这里人不多，大多数男人都上班去了——暂时还是全天工作。

我朝另一边看：在离我们五十米远的地方，学校正对面的大街上横躺竖卧着一堆穿绿衣服的躯体。我看到了脚、靴子和向一旁伸出的一条胳膊。

这两个人那么安静，一动不动地躺着，很清楚，彻底报销了。我又朝那个女人看了一眼。她越来越近，又张开嘴，她的舌头有点奇怪地摆动着，像一只粉红色的小蟹，接着她又喊了起来：

“杀人啦！……凶手逃跑了！”

我们三人几乎同时跳下自行车，仿佛出于一时糊涂，把自行车横着摆开来，几乎把路隔断了。

“出什么事啦？”安竭力装出天真的口气问；我早就发现，如果安想装的话，能够比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女演员更逼真地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来。

女人有气无力地朝后挥动一只手。她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的自行车挡住了她的路。

“那里……”她气喘吁吁地说；看来她由于飞快的奔跑和震惊而完全无力了。“你们自己看……有个小伙子……朝他们开枪……”

“但是他们好像是德国人，”金卡像她姐姐一样也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说。“他们真的死了吗？……”

女人挨个儿看看我们，仍然气喘吁吁，并且用一只手抽搐地紧抓住睡衣的前胸。

“谁也没想到……谁也没有，”她呼喊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青天白日杀人！……”

“快去找电话，挂警察局！……”我建议说。

“我替您去打，”安赶紧说。“您回家去吧……我们去给医院打电话，给急救队打，再给警察局打……您放心回去吧……如果他们两人死了，那您大喊大叫总归也不能使他们起死回生了，”她毫不怜悯地补充说。女人看看她，不知该怎么办，是朝安发火还是感谢她。

“去打电话吧……对，去打电话吧……天哪，天哪！”她最终含糊不清地说。突然她回头一路小跑，朝躺在地上的两个人跑去。

“相信我们吧！”安大声说。我们又一次望望打死的奸细，骑上自行车，飞速地上路了。在小桥附近我又回头望了望，确信人们依然从窗上朝外张望；但是谁也不敢走到死人跟前，除了那个

穿粉红色睡衣的女人。

骑过小桥，我们把脸贴在自行车把手上哈哈大笑。紧张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似乎一切都进行得太容易，太顺利了。简直有点离奇！

“去打电话吧……”金卡模仿那个穿粉红色睡衣的女人的样子尖声说道。“我们把她骗得好苦啊！”

“不知道这两个坏蛋会在那里暴尸多久？”安说，她笑得声音都变了。

“不管怎么样，那个钳工总来得及跑掉的，”我回答说。“真是好枪法！”

我们绕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不知不觉又来到了指挥所。威贺尔已经在那里了。他已脱掉连衫裤，卡宾枪也看不到了。弗兰斯和鲁朗特也在房间里。我觉得他们异常沉默，这样成功的行动之后出现这种状况令人奇怪。

“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同志们！”我一进房间就喊道。“这是奥别的情妇……”

我的话到了嘴边没有说出来。我的目光从这个同志的身上移到另外一个同志身上。他们的样子有点尴尬。甚至连威贺尔——我本以为在他的脸上会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也回避着不看我们。安和金卡也立刻发现他们矜持的态度，便踌躇地看了看我。

“发生了什么事？”安问。

鲁朗特转过脸去，弗兰斯激动地把手伸向领结，然后又把手插进侧面的衣袋里。

“失败和成功同时来……”他说，“糟糕的事情！威南特刚刚得知，前天奥托在邮局附近被抓住了，正在他准备骑上新自行车

的时候。”

“奥托?”我浑身发冷，大声说。“他在哪儿?他们为什么抓他?”

“问题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弗兰斯回答。“威南特已经去打听情况了……奥托肯定随身带着手枪……要是德国人发现了武器,那就不是偷自行车的问题了……”

我的双腿发抖。安和金卡那苍白的脸上现出恐慌的神情。我们三人都坐下来,我坐到身边的椅子上,而她们姐妹俩坐在沙发上。

“他去搞一辆自行车……”安开始说。“为了让威贺尔能轻易地逃脱,去搞一辆好车子。而现在威贺尔就坐在这里,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而奥托却被抓住了……奥托，他没有打过一枪!”

安垂下了头。我发现,一颗豆大的泪珠掉在她手上。

营救没有成功

我们默默地坐在一起,等待威南特归来。将近过了两小时,他回来了。

“奥托关在费斯特的警察分局里,”他说。“他们断定，今天晚上用封闭式警车送他去阿姆斯特丹。”

“谁断定?”弗兰斯问。

“老警长,我试探过他,”威南特回答。“至少他对我说了,一发现随身带武器的人,几乎立刻就押到埃特彼斯特拉特。”

“还有一丝微小的希望……也许他没带手枪……”我怯生生地说。

其他人都默默无言地摇头。我看出，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威南特坐到椅子上，擦去额头上的汗珠。似乎现在他才明白，威贺尔和我们几个姑娘已经回来了。我理解地朝他点点头。

“对，对，威南特，”我说。“我们都在这里。很顺利，安然无恙。至少这是成功的……打死两个……”

“斯哈弗以及同伙吗？”他问，微微表示出不想承认我们光是失败者，不愿灰心丧气的神情。

“好极了！威贺尔，你这是怎么成功的？你开了几枪？”

“两枪，”威贺尔回答，他没有改变姿势和脸上的表情。

安开始述说我们用什么方法挡住奥别的情妇，然后怎么打发她回去，向她保证我们肯定会给警察局和医院打电话！

“大概她还守候在自己亲爱的死者身旁，”她补充说。威南特勉强地微微一笑，其他人点点头，算是表示赞同。这天谁也高兴不起来。我们神枪手的辉煌胜利被奥托被捕的事冲淡了。

弗兰斯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那个样子似乎在自我证明，自我争辩。我好奇地注视着他。突然他用手掌往桌子上一击。

“别的可能性没有了，”他说话的口气，似乎说明他被迫作出不愉快的决定。“只得去找O.D.①的同志们。他们有自动手枪。他们可以组织进攻，而我们不能。”

今年我们初次听说有自动手枪，似乎这种手枪比德国的冲锋枪火力更猛更准。弗洛尔给我们描绘过这种玩意儿；他在北荷兰省北部地区L.O.—K.P.②的一个抵抗小组看到过这种自动手枪；这个小组的战士们得到了英国人空投的武器。我

①② 抵抗组织的名称的缩写。

们和国外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没有类似的武器；我们使用的是比利时和法国造的老式手枪，如果我们走运的话，也能补充几支性能良好的雷明顿式手枪，这也是飞机空投的。

“进攻？”鲁朗特不很坚定地，怀着一种胆怯的希望反问。“你想说，弗兰斯，他们能够试试……”

“……救出奥托。为什么不能？”弗兰斯说。“因为我们都是抵抗委员会的人，我们收拾了奥别·斯哈弗及其同伙，真像威南特说的，也是**为了他们**……”

“显然，这倒不错，”威贺尔支持他说。“此外，在盟军登陆以后，我们和他们交换过意见……”

“弗里茨还在那里吗？”安问。“他从来不怕合作……而且需要的时候，他也是不怕开枪射击的。”

“安说得对，”威南特说。“我们应该去一个人，和弗里茨商量商量……当然最好你去，弗兰斯。”

弗兰斯走出指挥所，出发去“烟桶”的时候，明显快活起来。

我们大家仍然郁郁寡欢，垂头丧气地继续坐着。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担心，要是奥托今晚真的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去的话，那我们准备营救的时间就太少了。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我们一支接一支地卷着劣等烟卷，整个房间烟雾腾腾。当弗兰斯回来时，他用手捂住嘴，呛得直咳嗽。

“我的天哪……仁慈的上帝，”他喃喃说。“你们怎么……在这种臭气里……竟然还活着！”

威南特打开上面的半扇窗，弗兰斯脱去短外衣。我们都全神贯注地望着他。

“他们答应了，”弗兰斯说，“他们决定不要我们帮忙。弗里茨正在设法派三个人，——他的人不很多，正像他说的……关于

自动手枪的建议他认为好极了。他们将在阿姆斯特丹关卡外的捷维努姆小酒馆旁等候汽车；那里便于撤退。弗里茨断言，只要他们开枪射击，把汽车轮胎打个洞，就能轻易地救出奥托。”

能稍微分分心，这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详细讨论各种进攻计划。这以后我们各自回家了。我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的阁楼。那里像往常那样又热又闷，尽管那个极小的窗子日夜都开着。我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是否有希望……我头脑里有一种使人痛苦和不安的空虚。突然我又想象到我和安、金卡走在新铺的清洁的硬碴马路上，那里有两个被打死的奸细；不知从哪里浮现出大声呼喊“抓凶手！”的女人的面影。然后仿佛遥远的、模糊的梦幻，隐约现出我教奥托射击的情景，每当奥托没有击中目标，安和金卡就责备他，并且毫无恶意地取笑他……他只是为一辆自行车，为一样没有灵魂的东西受苦。我们需要自行车就像非洲或者阿拉伯居民需要马或骆驼。我有点迷迷糊糊了，突然又惊醒了：我似乎看到奥托一会儿处在警察的包围之中，一会儿在囚房里……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到窗前倾听，在黑夜死一般的寂静中是否响起枪声、齐射的哒哒声、解救的齐射声……周围一片寂静。海滨方向射来的探照灯的光束缓缓地在天空搜寻。没有听到英国飞机的轰鸣声——对它们来说，时间还没到。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我们的日子天天依旧。一切进行得顺利……夺取巴黎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记得小时候，我和父母一起去过巴黎。我记得那里有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有钟楼的高大的建筑，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有许多雕塑，有急转而去的狭窄小路，房子的墙上全是肮脏的霉斑点，就像奥别·斯哈弗的保镖的脸上的痣……巴黎……难道巴黎也像考文垂和鹿特丹一样彻底毁灭，变成一堆废墟吗？……开枪，快开枪，当我

面前出现了奸细那张长着痣和一双眯缝眼的面孔时，我尖叫起来；喂，快开枪，威贺尔，他们要烧毁巴黎……多少次我吓得惊醒了，浑身直冒冷汗，我害怕，我再也不能解除疲劳了。威贺尔毕竟开枪射击过，我想。奥别已不在人世了。谢天谢地，奥别已经完蛋了……这时我看到那个丑恶的、脸上有颗痣的矮个子警察，他腋下夹着冲锋枪，冷笑着坐进汽车里，我父母已经坐在车子里面了，而坐在他们正对面的是奥托，未来的化学家。他被抓是因为他设法为抵抗战士搞自行车。

黎明前，疲惫不堪和衰弱无力的我终于睡着了。没有人叫醒我，在此以前我总是能自己醒来的，因为我有个从不改变的感觉和想法：不能浪费时间。我感到不好意思了，偏偏今天我睡过头了。

当我跑到指挥所时，大家已经到齐了。同志们对我的迟到没说什么。他们的样子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比前一夜更加沮丧。

“没有结果吗？”我用嘶哑的轻微的声音问。“有自动手枪也不管用吗？”

“不走运，很不走运，”弗兰斯说。他的话很刻薄。“弗里茨的伙伴们开枪打的完全是另一辆汽车……我们也不知道，奥托是否还在这里，也许他们从另一条路把他押到埃特彼斯特拉特。”

我筋疲力尽，粗鲁地骂了一句。我的担忧，我那不吉利的预感应验了。

“见鬼……究竟谁错了？”

弗兰斯耸耸肩膀说：

“难以肯定……大概准备的时间太少了……不管怎样，O.D.

小组做了可能做的事。”

“失败就是失败，”鲁朗特急不可耐地说。“喂，汉娜……最好马上把一切都搞清楚。还有一个消息。”

他把放在桌上的一张报纸推到我面前，并用方方的大手指指着一篇文章。

《阿道夫·希特勒免遭罪恶的谋杀——元首声明，上帝在保护他》。

“怎么回事?”我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读读吧!”从沙发上传来安的声音。

我读起来了。报道冗长，混乱不清，塞进大量的疯狂的纳粹主义的攻击性语言，以致我不能马上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终于明白了一切。七月二十日，德军几个高级军官把炸弹放在希特勒的大本营，企图炸死他。谋杀没有成功，爆炸时希特勒远离出事地点，只有元首几名最亲近的助手由于爆炸而遭难。希特勒公开演讲，声明对他的任何一种谋杀都不可能得逞；他确信，上帝在保护他……

“见鬼，见鬼!”我连连说道。

我在房间里再也坐不住了。我从房子里跑出来，经过花园走到菜畦和醋栗丛之间的小径上，而后拐入一条林间小路。我筋疲力尽了，心突突直跳，但是我仍然往前奔跑；现在我谁也不能见，甚至是我的同志们。最后我躺在两行黑压压的松树后面的去年的枯叶和褐色的针叶上，好在无情的大地上哭诉自己的愤怒、恐慌和痛苦。

动荡的夏天

七月在激烈的矛盾中过去了。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德军部分高级军官反对希特勒的详细情况。这些消息在英国传播，实质上都带有反法西斯意味的，但是我们在指挥所越是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我就越是明白，希特勒的将军们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法西斯信徒。他们情愿不依靠施克尔格鲁勃[①]进行战争，情愿与西方缔结和约，可能他们甚至愿意暂时屈服于东方。他们想打仗，想报复，但是要在另外的时候——他们觉得合适的时候。鲁朗特、弗兰斯和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尽管别人认为，我们把一切看得太悲观了。也许像威贺尔所说的，大概是太乐观了。安声明，她“不相信任何一个现在穿着军装的德国人，即使是最好的德国人也是死得越早越好”。

几天来一直没有得到奥托的一点消息。后来我们打听到，他在维帖林赫斯汉斯监狱里关了几天，七月底同一大群囚犯一起被押送到阿麦斯福特的集中营。这是个坏消息；我们大家知道，敌人可能将更残酷地对待他们，这正是我们担心的。

八月来临了，我开始留意起战报来了。以前我一直不相信，战争能很快结束，尽管我的同志们多次说过很有希望。现在我常常觉得，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即将来临：过去一直是不可战胜的法西斯匪帮溜出了法国；在波罗的海沿岸，苏联军队切断了他们的道路，正在歼灭他们；东普鲁士的居民已经被赶到边界挖战壕，修筑防线。巴尔干地区纳粹政权面临垮台；游击队掌握了整个地区，南斯拉夫像猛狮一样战斗着。甚至在那些当局和希特勒

① 希特勒原来的姓。

缔结过公约的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人民也在奋力抵抗。法西斯御用文人在大大小小报刊上叫嚣，希特勒的“理想的欧洲”按上帝的旨意正在获得胜利。他们越是提到“欧洲”一词，摆脱德国统治的地区就越多。缪塞尔特甚至亲自抓起笔杆，庄严声明说，战争前景很使人怀疑，但是上帝，正像我们已多次深信的那样，是站在阿道夫·希特勒一边。胜利只能属于一人。而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谁也未能想到要嘲笑缪塞尔特的文章，因为很清楚，这显然是胡言乱语。敌人和他的帮凶完全丧失了理智，变成了凶恶的野兽。他们没有一天不杀人。刑事警察局和“保安部”在鹿特丹的沙丘上枪杀荷兰人，他们在大街上朝人们开枪射击，从简易木房里抓走人质，并且强迫他们为纳粹分子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遭到的失败而付出代价。

我觉得，我们似乎生活在充满硝烟和炽热的铅弹的空气之中，这个夏天被弄得乌烟瘴气的，强烈的痛恨就像热病似的折磨我。我勉强忍着听同志们议论，他们久久地考虑和研究了整个形势，决定了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制定了详细计划，确定了我们集体或者分组行动的方案，我们将去摧毁军用列车，切断电线，用手榴弹炸毁准备启航的运输船。但是我总觉得，我们这是用大头针刺大象的皮肤，安、金卡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用胶版印《真理报》，分发《真理报》，像过去一样也为地下工作者募集经费和食物购买证。如果我不得不蒙上眼睛去反对也蒙着眼睛的敌人，那我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不幸的。然而我是不幸的，尽管几乎每天都传来鼓舞人心的消息。获悉德国国内采取了冒险措施来防止德国人民制造不可避免的致命的危险，我们是那样评论的：“无论你们怎么挖空心思，反正你们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但是甚至这一点也没有使我像同志们那样感到高兴。我经常毫

无睡意地躺着。现在夜晚不是宁静的。德国人企图利用黑夜的掩护发往东方的运输船(他们每年如此)，现在经常遭到盟军飞行员的攻击和扫射。我倾听远处飞机上机枪零星的哒哒声；沿海的高射炮就像年老体衰的老人在沉重地喘息和嘟哝着，他们无力抵抗盟军的优势力量，看来盟军已经视德军的空防为乌有了。甚至在白天，英国飞机也出现在荷兰上空，向火车和正在行进的德国军队扫射。他们更多的是向发射场扫射，不久前德国人开始从这些发射场向伦敦发射新式飞弹。他们称这些飞弹为"V-1"，并且从荷兰沿海一带、从海牙地区向英国发射。在海滨沙丘的上空常常进行激烈的空战，我们听到，并且也看到这些空战，每次双方都有燃烧的飞机坠落在地。纳粹分子的报刊对"英国人杀害荷兰人的生命，摧毁荷兰人的住宅"，大发慈悲。我们对待这种宣传仍旧是不感兴趣。英国人的行动的确不是一直有理智的；有时错误的情报迷惑了他们，而我们却为此付出了人的生命和大片城市。当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荷兰人都不会当真接受德国的假慈悲，我们对待敌人是毫不留情的。因为敌人使我们陷入了不幸之中；谁也不会忘记，是谁使我们洒下第一滴血；不能忘记这一点。

就在希姆莱在德国把暗中往希特勒大本营放炸弹的将军和高级军官送上绞刑架的同一天，在荷兰，刑警又枪杀了一批爱国者，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武器。我们在同一张报纸上读到这两条消息。我似乎被推进一条沸腾的黑河，而且我必须游到阳光明媚、绿油油的对岸。我没有退路，只好竭尽全力向自由的彼岸游去。但是对岸很远，很远，许多人淹死在我的两旁，而我强忍疲倦和厌恶情绪，在那条不断上涨和波涛汹涌的黑河里绝望地挣扎，在这同时，空气中更刺鼻地发出血腥味和火药味。

“国内抵抗部队”

大约在八月中旬，一支兵力可观的美国和加拿大军队突入法国，他们绕过巴黎向北挺进。他们摧垮了德国人的抵抗，而且就在其他登陆部队准备解放巴黎的时候到达了比利时边界。

“他们到比利时边界了！”鲁朗特喊道。“伙计们，真不可思议，但是这是真的……”

我们又朝指挥所唯一的一本旧中学生地图册俯下身子，计算最近的解放部队离我们大约还有多少公里。

“大概还有二百公里，”威南特说。

“如果他们正在比利时境内推进，那么也许只有一百五十公里了，”弗兰斯说。

“要是他们就像现在这样顺着沿海走，”安说，“那么一个星期内就能到达泽兰佛兰德平原了。”

我们互相望望。难以置信，像北法兰西、比利时、泽兰佛兰德等地理名称竟在战报上出现了。我发现，金卡拧了一下自己的胳膊。于是我也准备拧自己一下。被不共戴天的仇敌包围的我们经常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行动受拘束，我们生活在污浊的环境之中：死刑，关满抵抗战士的监狱，维斯特博克的犹太人集中营，阿麦斯福特和菲赫特的政治犯集中营……难道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和巴尔干人民被迫经受的所有灾祸，现在要由我们、欧洲这个微小的角落（我们在此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一隅粘土沙土地上的居民来经受吗？……

“我从来不想处在法西斯的地位，”威贺尔天真地说。“嘿，现在啊，他们倒霉了……”

"他们会感到热了，"鲁朗特得意地哈哈大笑，仿佛对这种热他倒是满不在乎的。

"热得很呢，"威南特补充说。

我们开着玩笑，同时感到心里产生了一种信心。甚至我也和同志们一起笑起来，尽管我从来不敢作任何预言，不敢对美好的未来抱最小希望。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无忧无虑的笑。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想把自己内心的一切担忧的事、一切痛苦的回忆抛开；但是它们还在我内心，因而我无法遏制住泪水。

每天都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的法国抵抗游击队马基①弟兄们——我们经常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报道中听到把他们作为坚定、勇敢和机智的榜样——已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在德国人仍顽固坚守着的法国中部和南部，马基开始了空前的游击战。他们仅仅带着火枪和机枪朝西驱赶装备精良的纳粹部队……我们寸步不离收音机，害怕放过我们的法国弟兄们反法西斯的战绩。他们肃清了法国比利牛斯山脉整个地区的敌人，然后又消灭了残留于巴黎南面的纳粹的老巢。

巴黎变成了前线。

我又看到了巴黎，仍像我回忆中的样子。弗兰斯也去过巴黎，鲁朗特在西班牙国内战争期间为了执行任务，也在巴黎呆过不长时间。我们大家都在想巴黎。我们很想向那些不了解巴黎的同志描述巴黎，尽管他们没到过那里，但是对他们来说，"巴黎"这个词儿听起来比西欧任何一个其他地名更带劲。

就在八月底，BBC广播电台报道说，巴黎的战斗打响了。还没有一个盟国战士进城，巴黎的工人、爱国者、姑娘和妇女已筑

① 法国反抗希特勒侵略者的游击队。

起了街垒，并用最简陋的武器向侵略者扫射。

法兰西，玛丽安娜！……巴黎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切发生在几昼夜内。

我们几乎在收音机旁坐了整整一天，贪婪地捕捉有关法国解放的每条新闻。我们姑娘们不停地擤鼻涕，而男人们不断地骂人和大发议论，我们大家高兴得都快大声吼叫起来。

巴黎的解放是那么突然，就像瓶塞突然砰地一声迸了出来似的。任何东西也不能堵住酒液往外溢。纳粹军队狼狈地拚命溃逃。盟军几乎没机会交战。

我们天天坐在我们那台旧收音机旁，希望听到新的令人高兴的消息。弗洛尔带着最新指示来了，正碰到我们在听收音机。

“任务仍旧……捕捉最危险的警察，首先是附敌分子。末日临近了，虽然他们仍然企图杀害我们中的许多人……然而，他们会受到地下工作者作出的各种不同的判决。他们在我们心目中再也不能算是活人……除掉奥别·斯哈弗就是最好的一次战役！”

他朝威贺尔那面点点头，威贺尔默默无声，静静地坐在背光的地方，在鲁朗特的身后。

“现在我还有事要通知你们，”弗洛尔给自己卷了一支劣等烟，喝了我们一杯淡啤酒，然后说。“目前各抵抗组织相互支援比过去更多了。这些组织的领导成员经常一起商量工作。现在已拟定了一个新计划。我希望我们不久也像法国人那样组织起自己的国内部队……依我看，斗争转入了最后阶段，也许我什么也不了解。”

我们满意地听取了关于建立自己国内部队的通知。

“这是否说明，我们将参加这场战斗？”我们的教导员问。

弗洛尔笑起来："难道我们本来没有参加战斗？不过很快斗争也许变成另一种性质了……而伦敦那边①希望建立国内抵抗部队。而这个部队的首脑将是一个亲王。他们大体上在德国人真的准备离开我们国家时开始行动。

"看来他们在北海对岸发挥积极性，"弗兰斯说。

鲁朗特嘲笑地补充说："晚干比不干强嘛。"

弗洛尔笑起来，并且转身对我、安和金卡——我们互相搂着坐在他对面——说：

"对你们三人我有特别重要的事。只要国内抵抗部队一建立，战士们手臂上就得戴上绣着'国内抵抗部队'字母的蓝色臂章。你们目前能不能准备二百个这种臂章？我会给你们搞布的。"

"白字蓝布臂章？"金卡又问了一遍。"就是说，我们要做针线活了，是不是这样？"

弗洛尔奇怪地看看她，就连大家，除了我和安，也都奇怪地看着她。我十分清楚金卡的心情。

"金卡说得对，"我闷闷不乐地说。"我也不知道，这种针线活我是不是会做。我好久好久没拿过针了，就是过去，我最多也只是偶尔被迫钉个扯掉了的钮扣……"

弗洛尔哈哈大笑起来，同志们也笑了。我生气了。天知道，这些男人自以为是，他们老是放肆地嘲笑我们姑娘。真是莫名其妙的高兴劲儿！当弗洛尔用手指骨敲敲桌子，制止住笑——尽管他自己也笑——的时候，我才高兴起来。

"金卡和汉娜，你们刚才说的话，"他说，"有点破坏部队纪律的味道。我刚才客气地问你们，是否会缝臂章，但现在我向你们

① 此处指逃亡伦敦的威廉明娜女王及其王室与内阁。

宣布，这是命令，明白吗？"

金卡迅速用手捂住嘴。安用舌头打了个响。我则看看弗洛尔。他嘴上严厉，但是他的眼睛里仍然闪动着快乐。

"好，"我说。"我们服从命令。只是劳驾一下，给我们布和线。"

"我们不是好惹的，"安说。"许多事我们能做得比你们强：无论是使用手枪，还是做针线活。"

逃 跑 者

我们又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讨论如何更好地完成"老任务"。弗兰斯认为，应该分配给我们别的任务。他说，奥别·斯哈弗的情妇当面看到我们三个姑娘，如果她不是很傻的话，那她对这次暗杀会认真地考虑的，她就会怀疑我们。此外，警察局已知道我们了。所以他建议我们再也不要一起出去，如果谁有战斗行动必须出去，那每个人都得有一个男同志陪同。

"这算什么，又不相信我们的能力啦？"我嘲笑地说，而当看到弗兰斯脸红了，我便感到心满意足。

"我为你们的安全着想，"他生气地回答。

我们又稍微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威贺尔和安一起行动，去消灭赫列包特的副手。这个坏蛋姓皮特斯，这在荷兰是一个最普通的，相当体面的姓，当然这个姓他不配。威南特和金卡的任务是杀死脸上有颗胎痣的小个子警察局密探。我们顺利地打听到，他姓皮宾哈，来自北方。被我们判处死刑的三个人中的第三个就由我和鲁朗特来执行；这是W．A．[①]部队的一名少校，他

① 荷兰法西斯党"国家社会运动"的军事化的部队。

逃避开往东线的志愿兵的登记，半年来他在国内一直残酷迫害爱国者，以此为自己赎罪。这个姓卡勒格拉弗的人有个特点，这个特点使我们的任务有些复杂化：他讨厌军装，而且上街不穿军装。对付另外两个坏蛋就没有这个困难。

对我们来说，神经高度紧张的那种忐忑不安的日子来临了。有时我们分别出去侦察，有时我们两人一起去。偶然我们在某处突然发现我们的"目标"，但是环境对我们很不利，要不然就是太危险，因此我们不敢贸然动手干掉这些坏蛋。

这时候，一包蓝布和白线送到了指挥所。我们马上开始裁剪和缝制臂章。威南特用粉笔在每块臂章上写上漂亮的字，接着我们就把字绣好。我们收听收音机的消息，或者听同志们的评论，他们对盟军将在比利时边境采取什么措施作了各种各样的推测。这发生在大家精神振奋的日子，这种日子与我们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那个和平和安宁的时期多么不同！……

八月底巴尔干地区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反对德国侵略者的运动。苏联军队强渡了普鲁特河，直奔罗马尼亚。一部分苏联军队已经突入特兰西瓦尼亚①，而另一部分向贝尔格莱德挺进。九月份继续带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芬兰人终于讨厌同法西斯分子合作，并且放下武器投降了。德国军队从法国被赶了出去，并且集结在卢森堡、艾费尔②和阿登③地区……我们跟踪侦察我们的坏蛋，在公园和林荫道寻找他们。要不我们就绣字母和给臂章滚边；我们拚命努力，但是字母总是绣得歪歪斜斜的。芬兰人投降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盟军进入了比利时领土。

---

① 罗马尼亚北部地区。
② 德国一个高原。
③ 比利时和法国交界的高原。

弗兰斯和鲁朗特在房间里跳起舞来。跳得旧地板咯咯响。我咬断白线并且把我缝的臂章扔过去老远。

"今天够了，"我说。"我要走了！就让白毛弗洛尔喊他十次纪律吧……离我们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而我却像傻瓜似的坐在这里，笨拙地做着针线活……"

"但是要知道这是说定了的……"对我这种越轨的举动感到吃惊的弗兰斯说。

"你们男人也来换换花样代替我们干干吧，"金卡建议说。"我不想造反，弗兰斯，但是绣这些潦草字母使我腻透了……特别是现在这种时候！"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鲁朗特问。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说。

"还有，随我们的便，"安说，她也放下针线活。"我在这里，这么个地方要憋死了……"

男人们感到不好意思，流露出明显的窘迫的神情，互相望望。弗兰斯搔了一下喉结。

"嗨，是的……"他说。"你们好像是对的……总之，这里不是服装社，你们也不是雇佣工人……你们自己走吧。转变时节也该轻松一下！"

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把自行车放在寄存站，然后我们拿着月台票登上了楼梯。火车靠近了月台。这时候有两个人踩着沉重的脚步，推挤着赶过了我们。这是一男一女，他们背着东西，由于用力过度，脸涨得通红；他们两人左右手都拿着背包和皮箱。那个女人绊了一下，摔倒了，男人把自己的箱子放在地上，似乎不高兴地骂了几句，然后帮助女人站起来。

"你总是这样……快，快。你老是出岔！"

我们跟在这对夫妇后面。这列火车和所有的火车一样挤满了人。像我们前面那对夫妇这样带着许许多多行李的现象并非个别；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夫妇和单身汉，也带着沉重的行李，他们试图挤入水泄不通的车厢。有个妇女为了搞一个座位，招呼宪兵帮忙；她在他面前挥动一张小纸片，那个宪兵甚至看也不看；根据他回答这位太太的神情，我们看出，他对她的命运毫不关心。

"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头，"安说。"看来他们要赶在暴风雨降临头上之前赶回家去。"

"而这个德国宪兵毫不关心，他们是否能回到祖国，"金卡补充说。

我紧紧抓住两个朋友的手。

"你们知道其中奥妙吗？"我克制着激动的心情问。"他们持有法西斯组织或者某个强盗集团的保护证书，而这个德国人瞧不起我们这里的法西斯分子。"

我们继续望着火车，它终于开动了。

"嘿，这些人去白担风险，"安说。"你看好了，在德国日子也不那么好过。到处是轰炸。在死刑的威逼下服劳役。"

"也许马上就要搞队列勤务……"金卡说。"在东面战线就是这样，德国人把老太太们赶出养老院，逼她们去挡俄国人的坦克。"

"既然法西斯敢这么干，那么他们的处境肯定不妙了……"我低声含糊地说。

"我们再等一列火车，"安提议说。"也许我们能看到什么有趣的事。"

我们呆在火车站，坐在候车室，喝代用饮料。即使插在玻璃

杯里的麦秆儿也比这饮料有滋味。我们不太说话；角落里坐着两个德国人，他们身穿蓝上衣，头戴红色的铁路制帽；他们仔细地打量着所有的人。

下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南方的火车快到的时候，车站里又来了三个人；他们的样子很忧虑，身上到处都挂着行李。当火车终于驶近时，他们大声嚷嚷起来，摇晃着证件；但是无论是戴红色铁路制帽的德国人，还是宪兵们，都没有理睬他们，没有帮助他们上车。

"当其他猪猡都从占领区回去之后，他们只得在家喝稀溜溜的泔水了，"我说。

安和金卡嘿嘿笑了。

在我们确信坏蛋们开始溃逃后，我们便离开了火车站。我们穿过街道，准备去寄放站取回我们的自行车，这时有个人猛地撞了我一下，然后赶过了我们。

"你怎么啦，无赖，眼瞎了？"我喊，更正确地说，我想喊，但是没来得及。又有两个人从我们身旁一闪而过，他们在追赶第一个人。这两个人是刑警。他们凶狠地推开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们，威胁地吼叫道：

"Stehenbleiben, du Hundsfott!"①

我的手摸了一下风衣口袋。口袋里放着一支手枪。我看到安和金卡几乎同时做出和我一样的动作。我们跟在刑警后面冲去。跑在他们前面的人光着头。我们立刻断定，被追赶的人是抵抗战士，或者是遭到不幸的同胞。他身穿咖啡色上衣，凸纹绒布裤，脚穿工作皮鞋，脖子上晃动着一条淡色的围巾。我们已经追上他们；警察继续在喃喃说道：

① 德语："站住，坏蛋！"

"Stehenbleiben, dich Kriegen wir doch!"①

被追赶的那人快要跑到大街的转弯处；警察加快了脚步；我们也跑得更快了。这时转弯处出现了一伙人，约有四五个。那年轻人撞在他们身上，于是他们无意地，自己也不希望地堵住了他的路。追赶者和逃跑者之间的距离刹那间缩短到了极点。我发现，其中的一个警察拔出手枪。

"Du Schwein von Deserteur! …"②

我差一点也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枪。但是警察的喊声说明了一切。我不知道，安和金卡是否明白德国人喊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向她们伸出一只手，制止了她们。枪声响了，紧接着第二个警察也开了一枪。逃跑者叫喊了一声，扑倒在地。警察向他俯下身子。人们开始围拢过来。

"走，姑娘们，"我对自己的朋友说。"这是个逃兵。警察刚才说得分明。让他们跟他算账吧。"

我们稍微朝一旁退了退，开始观察。逃兵的伤势看来不重。警察让他站起来，架着他的胳膊把他带走了。

"毕竟……"金卡说。"如果他是逃兵，那就是说，他不是敌人。"

"他不过是害怕对他的惩罚，"安反驳说。

"我也那么想，"我说。"做贼心虚的人开始想到逃跑了。"

"小伙子的那身衣服是从哪儿搞来的？"金卡问。

"可能他在路上守候到一个工人，于是统统都抢来了，"我说。

我们朝警察和走在他们中间的逃兵看了一会儿。他一瘸一

---

① 德语："站住，我们终究要把你抓住！"

② 德语："啊哈，你这猪猡，逃兵！……"

拐地走着，脸色苍白。我们转回去，从寄放站推回自己的自行车。寄放站的主人，一个身穿破旧连衫裤的男人轻声地问：

“怎么，那里又抓人了？”

“一个逃兵，”我说。“他们打穿了他的腿。”

“遗憾，子弹没打中他的心脏，”他仍然轻声地说；显然他没有想到我们可能会出卖他。“这不是第一次了。最近几天看到和听到的这种事多了……他们还经常到我这儿来呢。白天他们穿着军装来寄存自行车，第二天早晨已经穿着便服来取自行车了。我什么也不说。但愿他们离开这里。”

“让所有的人都逃跑才好呢……”安说。

当我们回指挥所时，我们看到广告栏上到处贴满了新的Bekanntmachungen①。

我们停了下来。有一个通告号召所有那些害怕被俘而躲藏起来的荷兰军人作出声明，声明他们自愿去其中一个德国战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进一步的追究。

“多么厚颜无耻，”安愤怒地说，“自己也在逃跑呢！”

“只有纳粹分子才能想得出，”金卡说。第二个通告罗列了一大堆针对帮助敌人，掩护遇险飞行员，私藏武器和秘密印刷品等等行为的严厉的惩处措施。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我说。“我们走吧，孩子们，回家吧……否则，爸爸和叔叔们要担心的。”

我们骑车回到指挥所，向同志们报告我们顺利了解到的情况。我们情绪那么高涨，那么激动，像这种九月的日子是不太有的。甚至连我也不再怀疑，战争马上要结束了。

---

① 德语：通告。

疯狂的星期二

日子在流逝，有时是以星期计算，有时是以天计算。而现在它是以小时，甚至是以半小时半小时来计算了。发生的事件太多了。

我们仍在寻找我们的野兽，同时还缝制臂章。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每次来指挥所都带来法西斯主义开始崩溃的确凿证据。

"在赫姆斯特德维赫，法西斯分子的全家——父亲、母亲和儿子都自杀了，"鲁朗特说。"我的内弟科尔看到，'G.G.D.'① 把他们运走了。"

"在斯巴尔涅附近的海湾一具尸体被冲到岸边，"威南特说。"这些人不想等待尘世的审判。"

威南特的话很平静，不带一点幽默感，于是我又一次确信，他绝对相信另一种审判。

"你们要特别留神，别疏忽大意，"弗兰斯说。"否则皮宾哈、皮特斯和卡勒格拉弗也会在什么地方游泳……"

"也许，他们夜里已经躲起来了，"威贺尔说。

"那可就带劲啦！"金卡叫了一声。

不安、着急和恐惧的气氛一点不比高兴的气氛淡。人们在街上公开谈论战争。有时他们甚至隔着马路同熟人大声交谈有关盟军向前推进的最新消息。顽皮的孩子老是跟着那些愤怒地回头看他们，并且不断埋怨的过路人，自由自在地唱起歌谣：

一个倒霉的法西斯，

① 城市医疗队。

戳在那个拐角处……

在哈勒姆市郊街区的林荫道上一辆辆带篷汽车载满货物。夜里可以听到路上马达轰鸣。听说，专门有一列火车将把祖国的叛徒送往安全的地方去。

九月四日，那些过去偷偷地、小心翼翼地溜的叛徒们，现在丧魂落魄地逃窜了。白天收音机广播说，布鲁塞尔解放了，盟军迅速地向荷兰边境推进。

"啊，真想在园子里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金卡欣喜地喊道。

"最好想法抓住我们那个坏蛋，"威南特嘟囔说。

一清早公路上就开始熙来攘往。鲁朗特、弗兰斯和我留心观察着。安和威贺尔手握武器，整天在"保安部"所在地守候"胎痣"。现在公路上难得能看到小汽车；而且十辆汽车中至少有两辆车是运送德国军官的。

我一想到布鲁塞尔的解放，就感到头晕。盟军出现在林荫道上，盟军的旗子升起在中心广场。人们情绪激动，欢天喜地，围着身穿保护色军服的军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只消坐几小时的火车就到了……近在咫尺啊！

远处，在沿岸一带又响起了枪声。空战的齐射打破了白天的宁静。但是这种声音我已不觉得可怕了，它听起来更像解放的音乐。这是一种令人眩晕的兴奋的情绪，这时所发生的一切好似梦幻一般，这种情绪仍旧支配着我。我有时不得不强迫自己，在走路或骑自行车外出的时候，不要完全耽于幻想。我有任务。要跟踪侦察卡勒格拉弗。

当我同弗兰斯和鲁朗特去市中心时，我们在哈斯特休斯费

斯特桥上听到，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喊道：

"英国人在瓦尔赫林岛登陆了！"

过路人从四面八方向他奔去。

"谁说的？这些消息从哪儿来的？"

"当然是英国广播公司！"

"而我听了法国无线电广播……"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小心地，但并非不公开地说。"广播一点也没谈到布鲁塞尔北路的战役。"

"法国人总是落在伦敦后面！"

"主要的是，一切都结束了……过两三天我们都要解放了！"

"报仇的一天到了！报仇的一天到了！"两个少年大声唱道。

突然桥上的人群四散跑开了。

一辆德国警车从市中心急驶而来。警察们甚至没看我们一眼。显然他们去抓逃兵。两个顽皮的孩子继续在后面朝他们喊道：

"报仇的一天到了！报仇的一天到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些狭窄的旧街道从来没有那么拥挤过。仿佛人们急着去至少享受一下无线电广播给他们带来的希望和快乐。

"这些热心人很危险，"弗兰斯说。"德国人会记住他们，并且会残酷地迫害他们。大批人将要牺牲。"

在市政厅大楼和圣巴沃教堂前聚集了许多少年。他们吵吵嚷嚷，似乎这里来了整整几个年级的中学生——小男孩和小女孩。偶尔有人唱起奥兰王朝的歌。然而笑声和唿哨声压倒了其他所有的声音。"布鲁塞尔"和"盟军"这些字眼像明亮的火焰照亮了汹涌澎湃的声音的海洋。

深灰色的德军汽车拼命地按喇叭，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过去。当一辆豪华的大汽车开到广场时，孩子们急忙逃跑了；这辆汽车显然不是德国制造的，但是车上坐着德国军人；仓猝中能看清制帽、灰军装和单眼镜。司机旁边坐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

"这些德国人，如果需要的话，会强行冲过去的，"鲁朗特说。

周围好像弥漫着麻醉剂，人们被一种无端的浮躁，带有危险性的兴奋心情所控制。我们自己也仿佛喝醉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被卷进了共同预享即将获得的自由的热潮中。我们与自由那么陌生，以致现在我们醉心于自由，就像醉心于酒似的。我对解放的想象有些不同，那是比较隆重庄严的事情，但也是比较平静的事情，不需要疯狂的吵吵嚷嚷的欢乐，不必像半大的孩子们那样轻举妄动，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喊新闻……人们的谈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

"英国人已经在泽兰佛兰德了！"

"听我说！他们已经在瓦尔赫林啦！"

"德国人正沿着乡间土路从南荷兰逃跑呢。"

"布雷达拿下来了！"

"国内抵抗部队已在祖国的南方行动啦。"

"国内部队……这又是怎么回事？"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诞生总共才四十八小时……这是抵抗战士的联合力量。"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不在这里打击德国人？"

"嗬，他们还没有睡醒……"

我和鲁朗特交换了一下眼色。弗兰斯像平时那样神秘地笑笑。他喃喃地说，人们不应当白白给自己增加危险。说真的，当

警察走过来，驱散吵吵嚷嚷的人群时，我们大家松了口气；因为我也和弗兰斯一样担心德国人会像被捣毁蜂巢的黄蜂一样发怒，他们会开枪射击。

我们回到了指挥所，威南特和金卡已经先到了，他们喜形于色，我立刻猜到，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

“皮宾哈完蛋了！”我们刚走进屋子，金卡就说。“他穿着便服，朝南面走去……但是他的胎痣把他暴露了！”

“祝贺你们，”我们几乎同时说道。

“你们在哪儿截住他的？”弗兰斯边问，边拔出啤酒瓶塞。

“在‘老学者’咖啡馆近旁，”威南特说，“我们本来很难跟踪他，街上人很多，很拥挤……人们简直发疯了，他们到处走，乱说一气，仿佛在我国再也没有纳粹分子了……”

鲁朗特看了我一眼说：“我们该怎么办……”

弗兰斯又开始旋转收音机调谐旋钮，我们听到一段音乐，其中夹杂着像漱口一样的咕噜声，还有某些谈话的只言片语的声音。威贺尔和安回来了。

“没成功，”安一边解下头巾，一边说。“任何地方都不见皮特斯的踪影。还有，市政府秘书一大早就逃跑了。”

“你们看到所有这些德国高级官员是怎么逃跑的吗？”鲁朗特问。

我们交换了我们今天的印象，突然弗兰斯又收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透过干扰声和猫叫声，评论员报道，解放荷兰是当务之急。

“我没听错吧？”金卡大声说。

“他说：‘解放荷兰是当务之急！’”弗兰斯兴奋地喊道。

“再听听详细内容！”我要求说。

我们继续收听。无线电干扰台仿佛发疯了；我们留心细听伦敦电台，但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字句，而我们无法合乎逻辑地把这些字句连接起来。

“要是知道现在盟军在哪儿就好了！”安叹气说。

“大概，他们那儿有许多荷兰侨民，”威贺尔说。

“南方的抵抗组织也在帮助他们，”弗兰斯提醒我们说。

我想象着，此时此刻德国人逃离罗森达尔、蒂尔堡、艾恩德霍芬的情景……

难以置信，布鲁塞尔解放了。但是更难想象的是，我们自己的城市，塔楼上的红白蓝三色旗，布拉邦特集市广场上手舞足蹈的孩子们，荷兰出生的士兵，以及在乡间小道上取代了可恨的深灰色的纳粹战车和车上凶残的士兵的美国坦克。

“我们的解放者滞留在哪儿，在哪儿呢？”我叹气道。

“今天我们大家都留在指挥所过夜，”弗兰斯决定。“我们应该在一起；我本能地感到，我们面临重大的事件！”

“你说什么呀！”威南特温和地笑了笑。“你觉察出什么了？”

喜悦、欢欣和狂喜的心情以刻薄的玩笑、无足轻重的话语表现出来；但是事情完全不在于嘴上怎么说，不在于话语的意思；不过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说一说与战争造成的损失和苦恼，与杀人和追捕无关的事情……是啊，我们已忘掉什么是喜悦了。

天黑了，我们依次在旧沙发上打个盹。如果除了我们已毫不在意的高射炮的炮击，或者海上偶尔的空战，一般来说，夜晚总是宁静的。然而今夜我们听到许多各种各样的声音——汽车驶离时的不太响的声音，某种嘈杂声和隐隐约约的轰隆声。我们房间里的遮光窗帘已经放下来，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房间热

得难以忍受。我们中有一半同志都睡了，其余的互相凝视着。

“见鬼，我似乎听到士兵们列队行进的脚步声，”弗兰斯说。

“英国兵！”鲁朗特补充说。

“我的天哪，别说俏皮话了！”我插话，“你们的笑话使我烦恼。”

“不过，弗兰斯说得对，”鲁朗特说。“士兵们确实在行进。”

“走，伙计们！”弗兰斯说……“我们悄悄地穿过园子到路上去。我要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不难猜到，”蜷曲着身子，躺在两把椅子上的威贺尔平静和冷淡地说。

我们出去观察。道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在路上轻轻地摇晃着，移动着，汽车的轰鸣声偶尔打破了宁静。这是轿车和卡车在行驶。前灯那一道道蓝色的强烈光束在道路上搜索，惊动令人不安的夏夜，并且使空间变得狭窄。仿佛一条有节动物正从我们身旁爬过去。

“他们在悄悄地溜，”鲁朗特轻声说。“他们也听了BBC的广播。”

“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推说是犹太人说谎……”我低声含糊地说。

“嘘……”弗兰斯制止我们。“他们又过来了。”

我们死盯着黑暗。一列长长的黑压压的纵队从我们旁边爬了过去。我们听到皮靴的轧轧声和鞋底特有的沙沙声。黑暗使我们看不清他们的面孔，看不见远去士兵的姿势，但是激动人心的想象给我们描绘了在阳光下才能看到的一切。

“是的，这是德国军队，见鬼！”鲁朗特高兴地低声说。

“安静！……”弗兰斯重复说，我听到他碰了一下鲁朗特的

腰。"他们还会打死我们所有的人……让他们滚吧!"

我们一直等到他们走过去。士兵纵队的后面跟着又出现了鸣着低沉的喇叭声的轿车、卡车,还有自行车和一些摩托车。

"他们正好去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回到指挥所时,我说;我们叫醒了睡觉的那些人,让他们也去看看那壮丽的夜景。"要知道,盟军也在那一边行进。"

"大概,德国人从莱顿向东面运动,"威南特推测,"然后穿过登海尔德谷地继续向东。他们显然想保证自己有一条撤退回德国的畅通无阻的道路……"

"要是国内抵抗部队抢在他们前面,我该多么高兴啊!"金卡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巧妙地炸掉哪怕几座桥梁呢?要知道,德国人一定要过那几条大河的。"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个夜晚,有时走到外面,留心细听,仔细观察狼狈溃逃的军队的模模糊糊的影子——他们在夏夜的昏暗中不停地走啊走啊。

早晨来临了。谁也不想睡了。谁也不感觉饿,我们急不可待地想尽快上街。

宵禁一结束,我和鲁朗特就上路了。

"要是卡勒格拉弗和别人一起跑了,那怎么办?"我的同伴低声含糊地说。

"也许,我们还会遇到某个该吃子弹的坏蛋。"我回答。

我们来到公路,一眼就看到,敌人在继续溃逃。各种颜色的汽车在行驶,旧汽车和新汽车上都装满箱子、口袋和包袱。看来德国人洗劫了肯涅麦兰特和整个北荷兰。法西斯坏蛋竭尽最后的力量企图挽救自己的生命。我们停下脚步,开始观察;我甚至轻声数起他们的人数。

"最后五分钟内有二十三人，"我说。"好极了！"

我们昨天看到那辆满城乱跑的警车又出现在市立公园附近。它怒吼着驶入一条林荫道，显然要检查是否有身穿便服的德国人躲在什么地方。大街上人山人海，虽然一天刚刚开始。很多人跑出来看侵略者溃逃。

"普列克尔① 恐怕已经坐在希特勒的阁楼上了，"我听到那些去工厂的姑娘中有一个大声说道。

"一旦没有普列克尔，我们可怎么对付呀！"一个老工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过她们，接口说。

"鲁朗特，我简直不知道，我这是在做梦，还是真看到的，"我说。"我明白，我骑着自行车，看到了你，但这已经不是哈勒姆了……这是某个疯人院！"

"是的，这是精神错乱，而且这种状态应该开始了……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们那个坏蛋，因为这个肮脏的法西斯猴舍换了地方。"

"我们到火车站去找，"我建议说。

火车站附近比旅游高峰季节还拥挤。

在车站前的广场上我们看到，站台旁停着一列准备发出的火车。它显然是用来送那些"同事"及其"女伴"的，他们没有私人汽车，因此恳求用火车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们继续从广场上观察，堆满包裹行李的车站里聚集了叛徒及其家属——妻子和孩子。头一天我和金卡、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现在的情形更是野蛮。逃跑者吵吵嚷嚷，推开那些显然是在维持车站秩序的德国士兵；他们几乎把手伸到别人的头上，使劲挥动胳膊和拳头，为自己开道。

① 哈勒姆市代理市长。

“这就是新欧洲的团结，”鲁朗特冷笑地说。

站台上响起了汽笛声。扛着行李、仍然聚集在车站大门口的逃跑者听到这汽笛声，绝望地号叫起来。周围更加拥挤了。一个几乎被逃跑者打倒在地的宪兵拔出自己的短军刀，平着朝人拍打，一边粗野的叫骂；我们没听清他的话，只听到他凶狠的、充满仇恨的喊叫声。站台上响起第二次汽笛声。我和鲁朗特站在那儿，仿佛看见突然遇到暴风雨的牲口。眼前的场面使我内心感到恐惧：我已经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和满足。这种奔忙，这种斗殴，逃跑者为在火车上争夺一小块地方而进行的这种可鄙的争斗，实在令人厌恶。

“伟大的上帝啊，”我叹息道，“多么可悲的败类！”

“他们终于得到了为自己的元首而去死的机会，”鲁朗特说，“眼下只好逃跑了。”

“多么狼狈的逃跑！”我说。“走，鲁朗特，看到这些人类的渣滓我都恶心。”

我们回到了市中心。我惊奇的是，有几个人竟在阁楼的小窗子上挂出了一面荷兰国旗。

在下边的大街上站着一个警察，他盛怒地挥动着一只手：

“Verdammt noch mal…Die fahne weg!”①

阁楼上的人们不见了，旗仍然悬挂着。警察掏出手枪，朝旗幅开了几枪。行人们停下脚步，嘲笑起来。警察气得满脸绯红，朝他们转过身子，然后匆匆跑掉了。我们刚骑到公园前，三架飞机从南面迅速朝城里飞来。我们停了下来。许多人手搭凉棚，凝视着天空。

“上帝……这是英国人！”一个孩子喊起来。

---

① 德语：“该死……收起旗子！”

我们紧盯着飞机。我们认出了机尾上的符号，尽管它们飞得相当高。我们的背后和旁边响起了欢呼声。

“小伙子说得对！”有个人在我们身旁喊道。“盟军来了！”

我看到几辆汽车急忙离开大路，躲进柞树林的树荫下。这时我又听到人们兴奋和不连贯地倾吐和交换意见、传闻、猜测、些微的欢乐及毫无根据的希望，他们无论在侵略者面前，还是在他们的走狗面前再也无所畏惧了。

飞机消失在房后了。我们继续骑自行车前行，但是许多人仍旧站立着，显然希望飞机再次出现。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声。

“火车开动了！”我说。“我想知道，他们还有多少人留在那里。”

鲁朗特耸耸肩膀。

“你干吗为这些坏蛋操心？最好我们还是去找那个卡勒格拉弗，他不应该不受惩罚而溜之大吉。”

“他本来就不应该走，”我纠正鲁朗特的话。

我们仍旧骑着自行车，边骑边注视着每一辆迎面开来的汽车。最令人惊讶的是，法西斯的逃跑没有打破正常的生活进程。法西斯坏蛋和德国人在逃走，但是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仍和他们一起同坐电车和公共汽车；沿着公路站着许多人，到处都挂着旗帜，而且没人提出抗议，为了表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工厂拉响了汽笛。

当我们再次往城里骑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三架从北面飞回来的飞机。它们又飞得很高。我似乎觉得它们沿着哈勒姆——阿姆斯丹特的铁路线飞行。突然它们往下俯冲，飞得那么低，以致被房屋遮住看不见了。机关枪哒哒哒地响起来了。

我们跳下自行车，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仔细地倾听。其

他人也和我们一起听。

“这不是德国人在射击……”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说，看外表他过去是个军官。

“我开始有些明白了……”鲁朗特说。

他还没有完全想明白，飞机第三次出现了，它们像出膛的炮弹直插天空，接着拐了个弯，又朝下俯冲，用致命的弹雨为自己划出了航线。

“它们在扫射刚刚开动的火车，”鲁朗特说。“请相信我的话。”

“装法西斯坏蛋的火车吗？”我问。

“准是。”

“上帝呀，我想，你说得对……正义终将胜利，鲁朗特。”

“我们走，”他边说，边骑上车。“我们不能耽搁了……我宁愿少活一个星期也要打听到卡勒格拉弗现在的下落。”

“他们有时混在普通的难民中，认为这样能够避免危险，”我说，“也许他已经吃到子弹了。英国人的子弹。”

鲁朗特幸灾乐祸地冷笑了一下：“他从我这儿也能吃到英国人的子弹。”

我们去法西斯军人俱乐部。那里所有的门都紧紧地关着。底层的窗子上都挂着黄窗帘。而楼上好像从来就没有人。我们已经多少次窝了一肚子火，扫兴地往回走了。

我们刚想走的时候，一扇深灰色的小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这扇小门面对一条偏僻的小巷，旁边是一幢楼房。一个身穿朴素的灰色运动服，头戴灰色运动帽的男人推着自行车出来，然后又关上门。

“呸，你这鬼东西，”我低声对鲁朗特说。“这是不是卡勒格

拉弗呢？……”

“希望你没有弄错，”他回答：“喂，老爷子，让我们好好看看你的嘴脸……”

穿运动服的人故意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我们。街上人比较少，我们不能跟踪他。他一走到比较宽阔和热闹的大街上，我们就动身了。我们看到，灰衣服的人回头张望了好几次。

“他可会装成一般的公民，”鲁朗特说。“我差点要发誓，这是无罪的市民。”

“说不定，那条偏僻的小巷根本不属法西斯军人俱乐部的范围呢？”我问。

“哼，”鲁朗特生气地说，“看来，坏蛋完全使你精神不安了，既然你已开始怀疑……”

“等他走进兹维伊赫尔林荫道，那我们肯定可以知道，这是不是他，”我说。“他住在那里。”

“谁对你说，他要回自己家？”鲁朗特说，“也许，他的汽车停在什么地方，他想乘车去兜风。”

我们不作声了，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灰衣服的人。他灵活和平稳地在大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之间穿行，我们看到，他不向任何人点头致意，任何人也不向他点头致意。他已经来到市郊，并且不慌不忙地经过了弗洛拉公园。从阿姆斯特丹开来的天蓝色的电车有半分钟挡住了我们的路。电车过去了，我们使劲蹬自行车；然而进了公园后，我们确信，那人不知去向了，他消失了。

鲁朗特粗鲁地骂了一句。我们停在公园里，朝四周张望。鲁朗特又大声骂了一句。

“鲁朗特，”我说。“我们到兹维伊赫尔林荫道试试，在那里

是不是能发现这个坏蛋的踪影。”

大约过了四分钟，我们在林荫道的一头停下来。我们细细地察看园子和篱笆；在一所房子旁停着一辆自行车，靠在水蜡树篱笆上。我们前后徘徊，仔细地环顾四周，突然篱笆后面出现那个穿灰色运动服的人。他抱着一只箱子。后面跟着一个衣着入时，焦急不安的女人，她也提着一只箱子。

“嗯，我猜中了吧？”

“见鬼，好像，他在逃跑……”鲁朗特喃喃地说。

穿灰色运动服的人腾出一只手扶着自行车，他的妻子低着头跟在后面。他们不说一句话。他们出了林荫道，便向公园方向走去。我们迅速地走到房子跟前，发现写着姓的门牌被摘掉了。

“这是他，”鲁朗特说。“不管有没有门牌。”

“他为自己准备的汽车究竟停在哪儿呢？”我问。

“你太挑剔了……”鲁朗特说。“最好看看，这个滑头鬼打算干什么。”

这对夫妇沿着鹿的保护区走过小道，朝公路而去。然后他们走到电车站。丈夫把自行车停靠在树上，便走近妻子；她靠在候车棚的墙上，看得出一副惊慌失措、郁郁不乐的样子。他俩并排站着，看着从旁边飞驶而去的德国汽车和别的汽车；与此同时我们坐在离这对夫妇二十五米远的长凳上，观察他们。

“要是能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真舍得出钱，”鲁朗特说。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在说什么，”我补充说。

去赫姆斯特德的电车靠站了，夫妻俩走出棚子。电车停了。

我们看到灰色衣服的人帮助妻子上了电车。他把两只箱子放在电车后部的乘降台上。电车开走了。灰色衣服的人笨拙地举起一只手，他极力装出样子，似乎这是最平常的告别。他妻子

的举止如何，我们不可能看到或听到了。电车把她带走了。

灰衣服的人回到了他自行车停靠的那个地方。他打开了锁，把自行车掉了个头，朝哈勒姆骑去。

“见鬼，他又进城了，”鲁朗特说。“大概忘了取银行里的活期存款了。”

“好了，现在他跑不出我们的手心了。”我说。

“现在还难说……”鲁朗特不同意地说。

我们沿着自行车道跟在灰衣服的人后面。他骑着车，依然保持那种令人厌恶的、不自然的镇静。

“应该断定，这是他，”我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在我们与穿灰色衣服的中间还有两三个人。从赫姆斯特德开来的电车在我们后面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在很远的前方，在捷姆彼里尔斯特拉特大街附近，另一辆开往阿姆斯特丹的电车叮叮当当地响着。这时候我发现灰衣服的人骑车横穿过了轨道，他的动作比我预料的还快，显然他这是故意的。可能，他发现我们了？他是不是故意在这电车、汽车和自行车塞满道路的地方拐弯呢？

“卡勒格拉弗先生！”我在后面冲他喊道。“卡勒格拉弗先生！”

他听到自己的姓，转过身来，目瞪口呆的。这是我想出来的好主意，他不能不回头，就像任何一个听到喊自己名字的人一样。要知道他想悄悄溜走；蒯捷耳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鲁朗特，”我喊道，“这是他！”

我们已经离开了自行车道。我看到灰色的脊背更低地俯在自行车把上，两脚蹬得更快了。我一只手握着车把手，在电车轨道中间骑着。另一只手伸到口袋里掏手枪。我看了一眼鲁朗特——他骑在我旁边，也像我一样尽量避开追上我们，又叮叮当当

响起来了的电车。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公路左边两条电车道的中间。卡勒格拉弗已经在马路对面骑行了。

“我开枪了！”鲁朗特用嘶哑的声音说。

“不，我来！我来！”我对鲁朗特大声说。

就在灰衣服的人从公路拐到岔路上的时候，一辆电车追上了我和鲁朗特，发出刺耳的叮当声，从我们旁边驶了过去。

我甚至没意识到，天蓝色的车厢离我很近，电车的隆隆声只是刹那间使我大为吃惊。当灰色的背影又映入我眼帘时，我瞄准他开了一枪。就在这时，我觉得不带劲；自行车的后轮被什么东西挂住了，失去了控制，自行车摇晃起来。我又开了一枪。接着看到前面卡勒格拉弗的自行车开始左右乱拐了。我觉得鲁朗特用自己有力的手扶住了我，帮我离开了电车轨道……我们骑到对面，进了卡勒格拉弗从自行车摔下来的那条林荫道。

“小心些！”我听到鲁朗特的声音。我飞快地往前骑去，依然用一只手握住车把手，准备开第三枪，突然我看到，卡勒格拉弗勉强站起来。他奇怪地转了几下（我立刻想起，纳粹奸细受过这种方式的训练），摇摇晃晃地过了马路，然后走近大树，停下来。他一只手扶着树干，双眼望着我，同时从口袋里抽出另一只手。他面孔抽搐，满脸鲜血。接着他用左轮手枪朝我射击。在我们后面一二十米的地方德国汽车正在飞驶。前面一二十米的地方，人们正在行走；我看到，他们停下脚步，朝我们这边转过身来，然后撤退就跑。这时我感到一条大腿钻心地疼痛，接着另一条大腿也疼痛了。但是这是一种片刻的剧痛。糟糕的是，剧痛之后紧接着便是麻木，两腿软弱无力了。突然我再也不能用力蹬车了。刹那间我像喝醉酒似的在车座上摇晃起来。眼前冒出一团团黑影，耳内像醉后一样嗡嗡作响，我快要昏倒了。

鲁朗特究竟在哪儿？我不知喊了些什么，至少我是那么感觉的。黑影、耳鸣和身上的躁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更厉害地折磨我。我感到我马上要倒下去。

……有个人晃了晃我，把一只手伸向我的肩胛骨，接着我看到俯向我的那张脸。我眨了眨眼。眼皮动一下我都感到痛。我微微动弹了一下。又感到一阵疼痛。那张脸更低地俯向我；这张脸我是认识的。我痛苦地使劲才弄清这是鲁朗特。我已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不记得，我开过枪。

"你能骑车吗？看在上帝的份上，汉娜，"鲁朗特用担心的声音轻轻问道。"你能骑车吗？"

我动弹了一下。整个身体沉重得仿佛灌满了铅。大腿上仿佛有一片黑乎乎的、温暖而潮湿的、粘糊糊的东西。我用手在上面摸了一下，好像能把它擦掉。我触到一种奇怪的东西……是血吗？

我开始眼花缭乱。我回想起发生的事。有个人用手枪朝我开了一枪。卡勒格拉弗……这发生在什么时候？

"鲁朗特！"我抓住他的双手说道。"我们能走得脱吗？"

"如果你能骑自行车的话……"他回答。

"帮帮我，"我说。我虚弱地颤抖着，血仍在流淌，双腿支持不住了。昏迷状态一阵阵向我袭来。我感到我的连衫裙粘住了我的腿。鲁朗特那双稳健的手具有救命的神奇力量。他把我托起来，让我坐在车座上，一只手一直紧紧地扶住我，直到我们走了较远的一段路。我用力踏脚镫，但是双腿依然没有任何知觉。我不知道，我怎样骑动自行车的，然而前面出现一排排房子、一行行树木、一个个绿色的花坛，后来又全消失了。

"鲁朗特，"我说，上下颌剧烈地格格发抖，似乎把我的一句

话咬成两半了，“卡勒格拉弗在哪儿？”

“别为他担心，”鲁朗特回答说。“他回自己的姥姥家啦。他等不到荷兰解放了。”

“就是说……原来……没白干，”我说。

我看到了他那惊惶的神色。大概他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在这几乎要晕倒的一刹那，我极其清晰地看清了我灵魂深处隐藏的东西：在袭击德鲁特后休果也就是这样走的。他受了伤，流淌着鲜血。就这样来到一所房屋……我的双腿仍然用力踏着脚镫。不知是谁的手扶住了我的脊背。休果痛得失去了知觉，摔倒在别人的房间里……我会摔倒在哪里？别的我什么也不明白了，只知道，我骑在自行车上，血从我的两腿滴下来，而且我觉得，在这解放的日子里，我只能不停地往前骑，为的是死在我的同志们中间。

结　局

我没有死。在这一天，在这个疯狂的星期二，荷兰也没有解放。

这一天我是在昏昏沉沉，半麻痹的状态中度过的，只有一阵阵的剧痛才能使我从这一状态中清醒，这一天我似乎在这里，又不在这里……

我躺在一个小房间里，我立刻认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鲁朗特的家。我没有想到危险。每次情绪激奋我就会昏厥过去。我偶然碰碰自己的大腿。腿被一块粗布裹住了。我勉强能动弹一下，我怕看自己的大腿，怕看到自己的血。我听到从大街上传来欢呼声，偶尔还听到枪声。我想：“报仇的日子……这是报仇

的日子吗？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呢？”

我叫喊，我要喝水。我似乎在喊休果。我似乎觉得，我在赞丹，我中了纳粹分子的枪弹，摔倒在大街上，倒在休果的身旁。我想和休果一起死。但是休果不在了。

后来我又明白了，我躺在鲁朗特的房间里，一道道细细的阳光透过拉上帘子的窗户，射了进来。我看了看，看到床边坐着一个人。这是安。

“情况怎么样？”我问。“解放了吗？”

“躺着！”她说，同时给我润湿了嘴唇。“医生马上来……他会帮助你的。”

“盟军来了吗？”我抓住她的手问。

“听说是的，”安回答。“人们手捧鲜花站在路旁。”

“他们用机枪扫射法西斯坏蛋的火车了吗？”

“是的。有一半幸存者穿过草地逃跑了。但是他们不允许我和你谈这些。你根本不能说话。”

我没理她，而是继续说：

“安，你听我说，金卡和威南特在‘老学者’附近把皮宾哈打死了……我和鲁朗特在斯豪切萨拉打死了卡勒格拉弗。”

“我和威贺尔打死了皮特斯，”安说。“今天早上他正好坐汽车。我们同时开枪了。弗里茨那个小组在乡间土路上干得真棒……”这时，显然安已想到，我们的谈话涉及了不允许的内容。“我们不能谈啦，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没关系，”我不同意。“谢天谢地，我知道得够多的了。”

突然马丁医生走进房间，由于疼痛和疲倦我又感到一阵阵的虚弱。医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检查了我的伤口。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烟草和福尔马林的气味，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关切和

仔细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一下子要这么多子弹，”他说。“是的，汉娜，我在这里无法为你做手术。你得去我的诊所。”

“那我们怎么送她到那里呢，医生？”我听到了安的说话声。

马丁离开我，走到一旁。我看到他和安在嘀咕什么。我的眼睛又模糊起来；由于疼痛和虚弱我又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觉得身子底下有东西在晃动，在撞击。我躺在小车里，是手推车，还是脚踏三轮车，我不清楚，我明白了，朋友们在送我去医院，于是我安安稳稳地躺着。

就在这天晚上，马丁医生取出了子弹。我嘴里咬着一块破布躺着。咬住破布能减低叫喊声。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么疼痛过。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初次有一种轻松感，一种舒适的凉快的感觉。我明白了，子弹已取出，伤口包扎好了。

一连好几个小时我都处于时睡时醒，时而头脑清楚时而完全失去知觉的状态。这种情况已经不错了。但是，无论是疼痛，还是思想模糊的半昏迷状态，丝毫都不能减轻我心中的担忧；发生什么事了？同志们在干什么？荷兰处在什么状况中？

房间里一片昏暗；远处城里传来的嘈杂声，勉强能听到。我盼望有同志来。我睡着了，也许总共只睡了几分钟又醒过来了。我失去了时间概念。我试图细听钟声。但数数就数不下去了。时间已经很晚了——也许已是半夜了——马丁医生来了。我听出是他的声音。

“你睡了？”

“我没睡，”我回答，“那里情况怎么样？”

“很好，”他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别担心。让我们来量量体温。”

我量了体温：近四十度。医生用尖头电筒照着，仔细看了看体温表。

"躺着，安静地躺着，"他说。"你的床边放着果汁。这几天多喝一些。"

"医生，"我问他，"'一切都好'是什么意思？盟军已经进入荷兰国土了吗？"

"你必须暂时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他含糊地回答。

"就是说，没有进入，"我推论说。

"听到的消息十分混乱，"医生说。"英国人有点着急，他们曾声称快要解放了……不过一切都很好，真的。"

"是的，那是在巴尔干地区，"我痛苦地回答。

"不，不仅仅是在巴尔干地区。德国军队丧魂落魄了。大批大批的人开小差逃跑……有些人换上便服，跑到南面投降当俘虏……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你根本不应该想那些事，自然更不能说话了。"

"可谁能做到不想这些事呢？"我问。

"我明白，"医生说。"现在你需要睡觉。睡觉！明天我老老实实把发生的事都告诉你。"

他走后，我开始侧耳细听。我感到我的血液在一阵阵发热，就像拍岸的海浪一样，时高时低。有片刻工夫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

后来我脑子里又出现了幻觉，我似乎在指挥所，聚精会神地倾听德国人正从我们这儿逃跑的脚步声。我听到，远处某地正在开枪射击；大概是纳粹分子遇上了国内抵抗部队……国内抵抗部队的战士们胳膊上戴着绣有白字的蓝臂章。我也在开枪，但是我的自行车卡在电车轨道里；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人扮着鬼

脸，用手枪对准我。

第二天，马丁医生脸上带着一种不自然的活跃的表情走进屋来，我立刻猜到，情况不妙！他腋下夹着一包东西。

“早上好，早上好，”他说。“喂，英雄，今天自我感觉如何？你的朋友们给你送来几个水果罐头……这对你有好处。”

“医生，有什么消息？”我问。

“对，对，”他重复说，“究竟给你说些什么呢？昨天晚上我已经说过，BBC广播电台有些着急……”

我仿佛觉得自己连同床铺一起落进了深渊。“这么说……我们……没有解放？”

马丁医生笑起来，故意装出快乐的样子说：

“如果现在没解放，下次一定会解放的！这一次，比利时人比我们幸运。当然，他们离诺曼底近得多，是吧？……别担心，真的，会轮到我们的。大江大河——这自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克服的障碍……”

“医生，昨天人们手捧鲜花站在路旁迎接盟军，对不对？”

他挥了一下手说：“是的，站着几个怪人……噢，当然总会有一些热心人……让我给你按按脉。晦，还有一点不均匀……有热度吗？”

“三十八度四，”我回答。

“好！”医生大声说。“这说明，一切正常，体温下降了……还痛吗？”

我点点头。我早已明白，他借询问我的身体状况，使我忘掉刚才的话题。而我却要大哭起来了。

“这么说，昨天不是解放日，”我说，同时觉得我的嘴唇在颤抖，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

“不，不是，”医生回答，他的声音不是不友好，而是有点生硬，仿佛他已经讨厌听我说话。“我们已经等了四年……难道就不能再等几天吗？”

我不作声了，把脸转向墙壁。

“安静地躺着，”马丁医生说。“我们应该尽快使你恢复健康。等盟军真的来时，你能手捧鲜花站在路旁。”

我什么也没回答。我很想同志们，想安妮，想弗洛尔，想昨天在大街上那成千上万欣喜欲狂的人们；想学校的孩子们；想医院里的人，他们与世隔绝，盼望着解放的信号——钟声和国歌声。我想到监狱和集中营里的男人和妇女们；想到躲藏起来的犹太人和渴望得救的地下工作者。在前一天，他们大家都曾接触到自由那轻盈的翅膀。但是什么也没改变，一切照旧。

热泪滚落枕头上。热度时高时低。我的身体在抵抗它，理智在尽力帮助，然而绝望的情绪妨碍我恢复健康。我全身发热，虚弱无力，心里又气又委屈；体温升高了，在我发热的头脑里出现了种种阴森的幻影。

同志们来了，而且带来许多好吃的：苹果、梨，甚至还有精心保存了很久的长条巧克力糖。我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他们告诉说，荷兰军队驻在坎彭，随时准备攻入荷兰；德国人已经放弃了芬兰和保加利亚，贝尔格莱德马上要解放了，苏联军队越过了波兰和德国的边界。

“别尽跟她瞎扯，”马丁医生把同志们领到我跟前，然后开玩笑地对他们说。“要不然，汉娜马上会梦见她在元首的大本营了！”

这种玩笑更激怒了我。只有当安和金卡来告诉说盟军已经到达德国边境时，我这才高兴起来。

“最近几天，张皇失措的状况有所缓和了，”安说。“路上甚至看不到络绎不绝的‘难民’……但是现在他们更害怕了……普通正直的荷兰人不再乘天蓝色的电车；‘难民’需要电车，好坐上它们离去……他们见什么抢什么——自行车、汽车轮胎、铜丝……”

我的热病已有好转。我感到自己筋疲力尽了，而且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体重减轻了至少十英磅——大概如此；然而每天得到的消息一直在催促我，我想起床，披上衣服，飞速去“西班牙橡树”，去指挥所……我们荷兰军队已逼近艾恩德霍芬。

英国人确实在瓦尔赫林岛作战。

在泽兰他们俘获了一支支德寇的护送队；德国人自己迎着敌人奔去。他们饥寒交迫，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套在军服外；许多人宁愿光着脚跑，也不愿穿着皮靴而跑不快。

第一批盟军攻入德国东部的领土。我恳求马丁医生给我搞一张欧洲地图。有一天，他给我带来一本学生地图册。

“现在这个旧玩意儿还有用，”他说。“看，汉娜，这里还有奥匈帝国和日耳曼帝国；印这张地图的时候，俄国还有沙皇……”

“但是北海和阿尔卑斯山，顿河和多瑙河还是原样，”我反驳说。

我们看了看地图；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沿着林堡边界朝武珀和莱茵河方向推进。

“法西斯分子还要在我们这儿待多久？”我大声问。“盟军为什么磨磨蹭蹭？”

医生摇摇头。他的一只手按老习惯插进白大褂的衣袋里拿烟丝，但他马上又从空衣袋里抽出来。

“情况不妙，”他说。“劳特正在大肆威胁。‘保安部’正在进

行从未有过的那种围剿搜捕……所有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人都必须去构筑岸防工事。”

“我们的男人们？”我问。“在我们的河岸？”

“可不是吗？德国人显然想把荷兰变成要塞。而我们得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不受我们弟兄们的进攻。”

“他们能得逞吗？……”我担心地问。

“他们招集来的人中有一半夜里都逃跑了，”医生回答说。“正像当时德国人为建筑机场征召和绑架来的那些人……”

“没跑成的人就消极怠工，”我说。

“可能，”他说。“不管怎么样，现在坏蛋们的日子终于很不好过……他们已经在节约煤气，每天只有固定的时间才供气。而从今天起口粮减少了。似乎以前的定量高得很！”

我急于养好伤。然而我的伤口根本不想理解我心急火燎的心情；它们需要正常的日期。有时我等帮助马丁医生工作的护士走后，试着站在自己的床边，但是可恨的虚弱立刻使我摔倒在地。我责怪自己无能，并且因内心焦急而感到苦恼。安和金卡给我带来了肖洛霍夫、杰克·伦敦和本·特拉文的书，但是我太激动，不能好好地读这些书。

按劳特的命令被抓的人们不是在荷兰修筑岸防工事，而是派到更远的地方——敌人把他们当作奴隶转送到德国的劳改营，好让最后一批愿为当局效劳的德国人能手握武器急急赶到前线。我听到这个情况，意识到自己又无能为力，不禁哭了起来。

“难道不能拦截火车吗？”我问鲁朗特，是他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此时他带着可怜的、不知所措的神色看着我伤心地痛哭。“英国人到底在哪儿呢？难道国内抵抗部队不能把桥梁炸毁

吗？”

“你无法想象，德国人狂怒到什么程度，”鲁朗特终于说。“他们因为一些小事向人们开枪射击。他们明目张胆地直接从别人手里抢夺自行车……他们从各处带来了高年级的学生……也是要送往他们的劳改营。”

“可我躺在这里……”我说。“本来这时候我应该开枪射击！……”

鲁朗特试图安慰我：“稍微忍耐一下……德国人自己也不再相信什么，除了自己的失败。”

“可是他们每天仍然给我们带来多少灾难呀！”我激动地说。“上帝呀，整个欧洲很快连审判他们的法官也不够了！……”

我开始能拖着双腿，拄着拐杖在房间里走动，这时传来消息说，盟军的伞兵降落在莱克河、莱茵河河畔和阿纳姆附近的德军防地。盟军冲入奈梅亨。城市解放了，但是真像电台报道的，半个城市被毁坏了。不久，住在这些河流北部的荷兰人再次对肆无忌惮的占领者表示鄙夷：铁路职工不再工作，让车站上的机车车辆听天由命。火车停开了。铁路运输停止了。

我拄着拐杖在房间里溜达。有时马丁医生抽出点时间来看我，有时同志们来看望我。来自外界的消息时好时坏，矛盾离奇：荷兰的情况很糟糕，所有的储备食品快完了，煤烧完了，煤气只允许晚上用，发电量减少了一半。然而即使这种糟糕的情况也应该表示欢迎，因为其中包含着希望……它是加快德国崩溃的保证。对他们来说情况越糟糕，那对我们就越好。

英国人在轰炸德国边境城市，而加拿大人和荷兰人正在清除泽兰的德国人。我根据地图判定，德国人盘踞在毫无希望的一小块领土上。但是这小块领土是靠海的，便于登陆，急需的时

候，它能作为德国人的军事基地；德国人不想放弃这小块土地。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在他们垮台的时候，把我们也拖垮……

德国人又开始炸艾梅登和维耳曾的工厂和房屋。野蛮的爆炸声传到我隐蔽的住所。我握紧拳头直挺挺躺在床上，我想起休果，当艾梅登第一次响起隆隆的爆炸声的时候，他愤怒得脸色煞白。自那时起又过去一年多了。

但是德国人没有满足对艾梅登的破坏。他们简直发狂了。有时我听着报道感到，法西斯复仇心理仿佛一片浓雾笼罩着我们。

艾梅登被炸后的两个星期，德国人又炸毁了阿姆斯特丹的港口设备。我试图想象这是一副什么情景：整个港湾成了一片废墟，空荡荡的，到处竖着折断的铁屋架——一片渺无人迹，深受凌辱的土地。一想到阿姆斯特丹或者艾梅登，我的脑海中总出现辽阔的水面，水面上许多拖船来回行驶，远洋轮船从容不迫地顺着航向驶去，平稳的渡船在噗噗地喷气，一团团浓烟盘旋而升，同时还传来金属的叮当声——那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我想出去，”我勉强走到马丁医生的办公室，对他说。看来，他又在为自己掏烟叶——他抽起烟来。

“你帮我解决了困难……”他说。我看到他在躲避我的目光，而且显得难以启齿。“昨天晚上我们接收了一个抵抗战士……我们的一位同志；他身上满是弹孔。只要一能搬动，我们就把他安顿在你现在住的房间里……我可怜你，汉娜，但是同那个人相比，你够壮实了……”

“我是壮实了……”我回答。

“不过，别担心，我不会把你扔到街上的，”医生说，他试图开开玩笑，然而和往常一样，没有成功。“城里有一户人家，你可以

马上到那里去，在那里使身体完全康复。”

就在当天我搬走了。医生说的那户人家是由一对上了年纪的父母，和一个未婚的、岁数已不小的女儿组成。他们待我异常热忱：特地为我腾出了一间玻璃凉台，因为我不能爬楼梯。在这个家，或者准确些说，在这个屋里只有一样东西我不习惯。主人们喜欢养狗，他们养了爱尔兰的塞特狗和高大的毛茸茸的英国牧羊狗。我一跨进房屋门坎，就看到这些狗。不仅是这些狗的疯狂和可怕的犬声证明这里有四足动物；到处——走廊上，每个房间里，甚至在我的玻璃凉台里——都可以闻到狗腥味儿，似乎地毯、家具和糊墙纸都吸进了这种狗腥味儿。我不敢把这个告诉主人；但是我也无法忍受狗的气味。而现在无论躺着，还是行走，我总是在呼吸这种空气。我的女主人不明白我为什么吃不好睡不好，虽然伙食和床铺都很好；她的丈夫和女儿给我拿来甜食和水果，只要我愿意，他们就让我随便翻阅他们的书。我处处感到的只是狗的存在。狗在屋里，我闻得到它。即使丈夫、妻子和女儿带着狗外出散步，我也闻到这股气味。我大敞开凉台上的玻璃窗，这稍微起些作用，我呼吸着来自附近花园里晴和的初秋那种酸涩的空气。但是每次我不得不重新淹入这个充满狗腥味儿的好客人家的空气中。

“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离开这儿，”我对安说，她是在我住进这幢有狗的房子后一个星期来我这儿的。“我会被这种气味熏死的。他们又善良又客气，但是那么喜欢自己的狗，甚至没感觉到他们身上也散发出狗气味……”

“天哪，你究竟想上哪儿？”安不安地问，并且又同情地望着我。她也无法忍受狗腥味。

“我不能再搬回自己的阁楼去吗？”我问。

狗的主人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决定离开他们，但是他们没有阻拦我。

安和金卡把我送回阁楼。护士起先似乎没有料到我是谁，她不想让我再住在阁楼上。

“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您，”她对我说。“您目前还没好。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但是您要值夜班，”我不同意说。

“那么您白天就让我作个伴吧，”她回答。“我尽量不在家，少给您增添麻烦。”

她用沙发又铺了一张床。于是无论早上、白天还是晚上我都躺在上面。我渐渐恢复了健康。有时还会发热病，感到疼痛。我觉得，我无疑是过早地离开了马丁大夫，但这点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走动，起先紧靠着橱柜、桌子和墙壁。后来我试着不拄拐棍走走。

我开始按摩自己的双腿。伤口就像麻木的脚趾恢复血液流通以后那样阵阵刺痛。我甚至想出了一种简单的健身操。有一次我试图做几个下蹲的动作，却摔倒在地板上，正在这时我的女主人突然进来了。

“您太不当心了！”她惊慌地大声说。“您用力过度了！”

我让她把我弄到床上，然后微笑着摇摇头。尽管我由于虚弱无力而浑身是汗，但我还是感到幸运，因为我觉得我又有了控制自己双腿的力量。

同志们和过去一样经常来看望我。给我带来秘密的《真理报》，并且告诉我，我们战线发生的事。终于出现了我们的战线！

夺取阿纳姆的战斗正在进行。英国和波兰登陆部队本该解放这个城市。然而出了差错。他们没有注意，此时党卫军的一

支部队正沿着莱克河向东面行进。

这支部队参加了战斗。它阻止了解放者，把他们逼在奥斯特别克附近一块狭窄的沿河地带。然后它自己却渡过了河，驻扎在贝秋维地区。英国空军无能为力——在最近两昼夜内，最初出现的浓重的秋雾低垂在该地上空。

“天哪，难道就毫无办法吗？”当威南特来看我，并对我说，解放阿纳姆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问道。“为什么上帝不给那儿哪怕一道太阳光呢？……”

他默默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说：“你不能要求上帝老是设法解决人类自己破坏的事情……”

“威南特！”我大声说。“你是否愿意说出，是谁故意破坏了我们的解放事业？”

“我没这么说，”他不同意地说。“也许所有的事情以前就坏了……也许在战前很久，在他们推崇希特勒，而不去合力压制他的时候。他们把萨尔、梅梅尔、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给希特勒，只是让他看在上帝份上去东方……而现在要上帝来设法纠正一切愚蠢的行为和消除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灾难吗？不，汉娜，这不合适。基督教不是那种普通的东西……”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弗兰斯来我这儿，告诉我一个消息，我们失去了阿纳姆。尽管夺回暂时落到德国人手中的贝秋维一块土地，有了一切先决条件，然而阿纳姆又成了德国人的前方城市。传说，党卫军分子已经动手洗劫那些在城市争夺战的日子里离家的居民的家产。

我躲在窗帘后边，能看到狭窄的运河。树上的叶子很快发黄了。第一批枯叶落在地上。我望了望房屋上空——天空暗淡的，蔚蓝色的，仿佛像瓷器，一碰就会破碎。夏天过去了。

九月末的一天，报纸上满是轰炸登海尔德城的消息，德国人在那儿准备了一些舰船，以便乘着军舰逃跑，这一天安和金卡来我这儿。她们还在楼梯上，笑声就传到了我的耳朵；她们叽叽喳喳，十分快活。当她们走进房间，我看到她们甚至给我带来了鲜花。

“上帝啊！”我大声说。“好像我过生日似的。”

“不管怎么样，今天是过节！……”金卡说。“你永远猜不到，谁被释放了！……”

“释放？现在吗？”我反问说。

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我难以相信，纳粹分子还会放人；报刊上报道的只有德国人的横暴和捕人入狱的消息。

“告诉我，这究竟是谁……奥托吗？”

安摇摇头，同时把花插入花瓶。“不，不是他。你的父母亲回家来了。”

“从监狱回来？”我往上一跳，喊了起来，甚至没有感到大腿平时的那种刺痛。

“从菲赫特，”安和金卡同时说。而金卡又补充说：“真的，真的。你不用怀疑……一听到消息，我和安亲自去看了，我们看到了他们。”

“说说他们的相貌，”我要求她，我想哭，但好容易才克制住。

姑娘们讲述了我父母的外貌。一切都很相符，我不得不相信了，尽管难以置信。我笑了，而且几乎没哭出来。我焦急得浑身发抖。两个姑娘的到来，她们关于强盗抢劫，俄国人冲入匈牙利的述说，以及关于希特勒的最新趣闻只能引起我的愤懑：我勉强地笑了，而且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说实话，当我两个朋友最终走后，我心里感到高兴。我想一个人呆着，享受这消息带来

的极大欢乐……我要做好准备，重新投入战斗。

敌人还在国内。

乌云密布

我第一次上街的那一天，纳粹分子又犯下了一桩野蛮的暴行：他们炸毁鹿特丹的港口建筑物。就在这一天，我初次亲眼看到了法西斯保安警察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需要自行车（我想如果盟军仍然顺利地冲过来，他们就要逃跑）。被征用的自行车主人恐惧万分，站在自行车旁胆怯地缩紧身子；他们只能得到一张收据，然后被迫离去。德国人朝那些试图骑自行车逃跑的人开枪射击。我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逃跑了；德国人开枪打穿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腿，把她拖到小铺子里，并且抢走了自行车。

我一瘸一拐地在街上行走。我仿佛觉得城市完全变了样。德国人的汽车又来回行驶；显然德国人在九月五日企图逃跑后又回到这儿来。载重汽车上装着车床、发电机、齿轮。又一个工厂被拆除了。再往前，隔着几个街区，德国士兵正往载重汽车上装童车和玩具自行车，大概这些东西是他们事先搁在仓库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旧的，显然是从年轻的父母和幼儿那里偷来的。

我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来到了父母家所在的区。从费利缅家回来后，我不敢在这里露面。但是这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心灵深处对安和金卡给我带来的消息疑惑不定。我应当亲眼去证实一下。

我有点一瘸一拐地沿着同我们那条大街和我家房子毗邻的小花园走去。现在我连想都不愿去想我的名字天晓得在警察局的通告上提到过多少次。我不愿去想世上还有这样一些人：他

们在守候着我，并将有幸得到酬金；或者他们对每个荷兰人都怀着不可理解的盲目的仇恨，将得意洋洋地向"保安部"出卖爱国者。我只想一件事：匆匆一睹双亲身影。也许，母亲会把窗子打开一些，抖抖桌布，也许父亲会走到台阶上——谁知道，可能他想去散散步。

我在周围徘徊了一小时，也许更长一些，直到我感觉到在这里不能继续呆下去为止。我正想回市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他出现在园子后面的小路上。

我立刻害怕了。我两腿一瘸一拐，晃晃悠悠地赶紧朝最近的商店走去。这是个牛奶铺，那里既看不到一只奶桶，也看不到一个顾客。我恳求老天，让我能在这个空荡荡的商店里躲上一会儿，我透过橱窗玻璃往大街上看。我看到父亲在对面走着。他更瘦了，领口看上去很大。一绺稀疏的头发仍旧垂在他的额头，走起路来就飘摆不定；他和平时一样没戴帽子。他的手杖轻轻碰到了人行道的边沿。当商人的妻子走进商店时，我感到我的喉咙哽住了。

"来……一瓶……牛奶，"我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这个女人惊奇和怀疑地望着我。我想，这人没有认出我。

"您有婴儿食品供应证吗？"她已经把手伸向我，问道。

"婴儿食品供应证？……"我冷淡地反问道。

"那当然！"她严厉地说，脸上流露出一种神色，仿佛我拿她当傻瓜似的。"只有孩子能买牛奶。"

我跑出商店，朝与父亲相反的方向走去。

第二天，我试着骑自行车。我坐在车座上，一阵极端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万一我一下子陷入那个即将开始大搜捕的地方怎么办？那时我就走不脱了，这点我是清楚的。别指望自行

车。要是有人认出我怎么办？他们会搜查我……从这天起，每次出门我都随身带着手枪。手枪成了我的必需品，就像成了第二个“我”。我需要感觉到我忠实的武器沉重地碰在胯股上。它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成了我在这几天过的那种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小巷子里和远处的林荫道上小心地骑着自行车。但是我骑得没有把握，当我回到家锁上自行车时，我的双腿累得酸痛不止，并且感到一阵阵刺痛，这种刺痛我受够了。

一星期后情况有所好转。我决定不再犹豫。我不能再考虑疲劳和疼痛。我能骑自行车了。就是说，一切正常了。我离开家去指挥所。我已经多少天没见到同志们啦！

指挥所的一切似乎变了样。有些东西收起来了，仿佛同志们想把房子腾出来。我在那里只碰到威贺尔和威南特。他们，包括那个通常少言寡语的小神枪手都热情和激动地欢迎我。他们告诉我，党的指导员安妮前几天来过这儿，弗兰斯从她那儿接受了任务，到北海运河对岸，到肯涅麦兰特接收一部分国内抵抗部队。鲁朗特成了我们小组的领导。已经商定，我们将以自己的力量组织破坏活动。现在，铁路运输没有全面恢复——只有几列火车运行，因为操纵这些火车的工作人员是从德国来的——应该比任何时候都要积极破坏和切断德国汽车运输。

我听了只是点点头。目前我还不很清楚，在新形势下我应该做些什么。搞破坏活动我从来不是内行；其实，自从我和休果、弗洛尔试图破坏德国人的发电站那次行动之后，我就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如果需要我们干……我也愿意。我一直是愿意的。

我一直等到鲁朗特和两个姑娘回来。他们也友好和高兴地欢迎我。但是当我问到他们打算让我干什么时，他们大家有点

为难。鲁朗特显然担心委屈了我，犹犹豫豫地说，暂时我不必参加袭击活动，因为撤退需要腿脚利索。我看了看安和金卡。鲁朗特发觉了我的目光。

“我们去战斗时，金卡和安帮助我们转移德国哨兵的注意力……”他解释说。

我低下头说：“噢，那种事对我不适合。”

大家这种局促不安的状况显然拖得太长了。我打破了这种状况，问道，我能不能在《真理报》工作。

“你已经能骑自行车了吗？……”鲁朗特问。

“是的，”我回答。“给我一些事情干吧，鲁朗特，否则我会死的。”

“好吧，”鲁朗特说。“我们正好从O.D.小组借来一部非常好的手摇油印机。他们是在德国人的‘劳动服务社’搞到的。他们那里的东西好多呀！……《真理报》的版面可要阔气起来了！”

于是我开始了过去我偶尔干过的工作——油印和分送《真理报》。稿子我是在唐克尔斯帕尔涅一家卖瓷盆、瓦罐、煎锅和农用陶器的小铺里拿到的。是谁把稿子送到那里，没人知道。油印机放在两颊绯红的赫烈切父母的阁楼上。有时在哈勒姆我看到过赫烈切，她装作不认识我。我印好报纸，并把它们一捆捆分送给北面街区的工人，赫姆斯特德的工人，豪特法尔特街区的老师和一位旋工（他把报纸随身带到各个高炉边给工人看），还送给一位在一家百货商店工作的姑娘……有时我把一份报纸塞进我那位护士的大衣口袋里；和她从不提及这件事，但是她大概把这张小报送到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所有的新闻我都亲手打印——我的手指老是沾污上紫颜色。现在造成了一种印象，占领者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在自己的旅途中掠夺和消灭

一切。他们赶走了阿纳姆的居民——长长的队伍沿着维柳维丘陵缓缓前进，分散到全国各地。阿纳姆人不得不放弃的所有财产都被一群纳粹饿狼带走了，吞没了，而那些不可能带走的东西干脆打碎砸烂了。在阿纳姆城外，他们横行霸道，手段比以前更为毒辣。他们摧毁了市政府大楼、桥梁、板棚、农民的饲养场，烧毁了整座整座的村庄。因为一个游击队员的功勋，他们惩处了皮尤津村，其手段之残忍使我不由得想起利迪泽村捷克人的悲惨命运。他们把抓到的男人像赶牲口那样赶进了阿麦斯福特的集中营，强迫他们的妻儿老少搬迁，把房屋烧掉。清晨他们在集中营凶残地杀害了所有的领导人。把剩下的人都送到德国。遣送已是家常便饭。纳粹分子把男人和青年从维柳维和特文特、乌得勒支和鹿特丹押送到维斯特法利亚和鲁尔。有时我们会遇上一位这种可怕的长途迁徙的目睹者，向我们述说详细的情况。德国人的一个个讨伐队好像自发地在全国到处搜捕，但是这些袭击看来是有规律的，这些迫害无论出现在哪里都只有一个目的：造成一种极端的恐怖，建立可怕的独裁。《真理报》和其他报纸提醒铁路职工，建议他们转入地下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这样做了。这以后不久，“保安部”开始逮捕九月份不上班的人。人们从我们这儿知道了德国人在荷兰收集盟军的军装。他们料到加拿大人就要突破。我的小报写上了，他们准备在荷兰领土上进行游击战。

所有的新闻都要经过我的手。我那被墨水沾污的双手握着关于敌人在我国肆虐的材料。但是我也收到关于红军向前推进的消息，红军已到达梅梅尔，他们已逼近布达佩斯，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迫使喀尔巴阡山和南斯拉夫境内的德国人退却。希特勒用欺骗手段招募来的匈牙利军队在十月中旬大批跑到对

方去了。英国人已攻克了博洛尼亚，并开始把纳粹强盗从意大利的北面赶回奥地利。争夺亚琛的坦克大战激烈起来了。

安和金卡做着一件更重要的事：几个星期以来她们忙于为男人们报名参加国内抵抗军队。她们认识许多工人，此外她们从弗兰斯和鲁朗特那儿得到整整一本通讯地址，姑娘们经常补充通讯地址。大多数男人都同意去当兵，只要纳粹军队一离开荷兰领土。许多人甚至拿上武器回家，至少带回绣着“国内抵抗部队”的臂章……一些人显然喜欢人们去找他，而且他们也加入了我们的小组。同志们一有机会就尽力去打击我们可恶的敌人。有时他们同O.D.和K.P.小组的成员共同进行袭击。有一次他们在哈勒姆和霍弗特多尔普之间袭击了一个运输土豆的车队，而另一次他们巧妙地炸毁了维耳曾附近一段铁路路基，当时德国人企图把最后一批未加工的钢铁运到东部。这些事是有益的，但是这种事不多。

印完和送完报纸我一般就去指挥所。那里总有一个同志值班。安弹吉他，而我们轻声地唱起了游击队之歌……花园和树林里的树叶凋落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呈现出一片灰黄色，而且气候潮湿。阴雨绵绵，沿海地带大雾弥漫。空中越来越平静了。现在海上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偶尔遇到一个晴天或者至少是阴天，英国人就轰炸“V-1”发射场。伦敦广播电台仍用充满激情的语气报道盟军在布拉邦特和林堡推进的消息。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切干得不太坚决，不太起劲，南面的德国人甚至还能进攻布雷达和洗劫整个城市。伦敦广播电台号召罢工的铁路工人坚持住。但是工人们未必需要这种号召。他们早就隐藏起来了；“保安部”大搜捕的结果不很理想。于是“保安部”进行全面报复；他们继续对全城居民实行恐怖手段，他们抓人并把抓来的

人赶到河岸挖工事。疲惫不堪的人们拿着小手提箱和包袱排成长长的纵队沿着南荷兰、海尔德兰和上艾塞尔的道路，拖着步子吃力地走着。强迫招募来的部分荷兰人在某地起来反抗，拒绝继续往前走，党卫军分子就用冲锋枪朝队伍中扫了一梭子，打死了二十来个人。没有任何选择，只有骂娘和诅咒。

尸体不允许埋葬，横七竖八地倒在大路上；妇女和孩子们从旁边通过。敌人留下尸体是想威胁下一批人。

纳粹分子采用了新花招。要是他们觉得有人在路上说了反对他们的话，或者干出不合他们心意的事，他们就开枪射击。在荷兰所有大路上都躺有尸体。这是不经侦讯审判就被剥夺了生命的荷兰公民，他们被外来侵略者杀害了。这些侵略者是那么野蛮、残忍，仿佛他们才是我们大路的主人。尸体放在大路上，直到别的荷兰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抬走为止。

全国一片寂静，唯有德国杀人凶手的枪声打破这种寂静。

德国人把瓦尔赫林岛的堤坝炸毁了。岛被水淹没了。我觉得水正在淹没我们，越涨越高，我们眼看就要呛水了。

初　冬

下雨了。寒气沿着潮湿的大地无情地漫流，从围垦地、水渠、树林徐徐逼来。冬天来得很早。沿海地带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乌鸦和海鸥。它们在挨饿，人们也在挨饿，在受冻。煤没有了。在被侵占的前几年我们还是能搞到一些煤，尽管数量不多。德国人把保存下来的煤留给了自己。供电停止了。白天早已没有煤气了。

“盟军该开始突破了，”我们在指挥所说。

“英国人究竟在哪儿呢？”人们在商店里、街道上，在他们相遇的各个地方互相探问。

晚上天气变得潮湿而又寒冷；我似乎觉得从来也没有过这样泥泞和恶劣的秋天。我爬上放着手摇油印机的阁楼，随手拉上梯子，然后把老虎窗关上。我的手冻僵了。油印机上的铁器渐渐变得更冷了。我在开始工作之前只得久久地朝冻僵的手指头哈热气。寒气从每个角落和缝隙里朝我逼来，同时还有饥饿。每天只有两块手指厚的面包和几个土豆。每过一星期口粮都要减少。

一次在指挥所鲁朗特对我们说：

“不，这个我已经厌烦了……到现在为止，我不曾想动我和奥托六月份在哈勒姆围垦地征集来的粮食，然而我家里几个孩子饿得嗷嗷直叫唤……我想你们家里的情况也不会好些。”

“他们现在打算搞公共食堂呢，”威贺尔说。

我们突然苦笑起来。

“每天都有丰富的午饭……”威南特补充说。“丰富的荷兰饭菜：汤、蔬菜、肉、土豆、布丁甜点心，此外还有小薄饼……”

“这怎么样呢？”鲁朗特问。“今后我们是否应当保存一些小麦和豌豆？”

“给谁？”金卡反对道。她消瘦不堪，而且不知为什么脸色发黑，眼眶下出现了黑圈。我们默默不语，但是与她的想法一样。

鲁朗特看了看我，显然疑虑使他苦恼。

“你们没什么说的了吗？……好吧，那我来作决定。我想，我有这个权利……”

“你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我斩钉截铁地说，“至少如果这对帮助抵抗战士有用。”

看来大家听了我的话都感到轻松了。我们规定了口粮：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领取一星期的食品。鲁朗特仔细地按定量把食品分给大家。我明白，他考虑到漫长艰难的冬天。他说，将我父母每星期的口粮寄到家中，尽管我对这甚至没有提过一个字。对此，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在指挥所我们在鲁朗特和威贺尔用铁皮做的简易小炉子上烙小麦饼。这只炉子煮东西很适用。它不散发暖气。男人们到“西班牙橡树”庄园附近的树林去砍树，把砍下的树用童车运到花匠的小房子里。我们姑娘们把木头锯成圆木段，男人们再把它们劈成木柴。锯木头是件开心事：我们全身暖和起来了。大多数人家都没有劈柴了。有关寒流的消息很快从一些大城市传到了我们这儿。饥饿比寒冷容易熬一些。不过奇怪的是，人们竟然会找到一些吃的东西——仿佛每个人身上都产生了原始野兽的本能，然而，这些本能只是部分地保证了对食物的需求量。抗寒只有一种东西：燃料。可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生火了。人们早早就躺下睡觉。我们也同样。某人还剩下煤油或者蜡烛，但是到了十月底，也就用完了。在仓库里有时能找到煤和焦炭，但是被侵略者们攫夺了。随着夜幕的降临，大人和孩子们偷偷来到仓库，在严密的木板围墙上凿个洞，或者拨开铁丝网，从洞里钻进去，爬到煤堆前，使劲往口袋里多扒进一些煤块。在这里德国看守也会毫不留情地开枪。在阿姆斯特丹利特兰登大街上他们打死了一个想在炉渣堆里寻找无烟煤的小男孩。沿着荒芜的铁路路基一群群妇女和老头蹒跚而行，他们用尖尖的木棍翻动钢轨间褐色的煤渣。

“怎么理解这些德国人呢？”当我们聚在一起研究战报时，威南特抱怨说。“他们被四面包围。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在西面。

俄国人在南面和东面。德国空军再也不会出现。要是英国人开始轰炸，那么德国飞机一架也不能飞上天空……他们再也不能动员出一个作战分队。德军医院和小客栈的人都空了，他们都被调去组成民兵……德国人究竟还想干什么呢？"

"把我们大家拖进深渊，"鲁朗特回答。

掠夺杀人。杀人掠夺。德国人命令赶尽沿海一带村中的居民，并且把空无一人的房屋中的财产掠夺精光。有时他们甚至不等居民撤走就动手。仿佛过去的德国军队只剩下一伙下贱的掠夺兵。他们把那些未能当即交出自己自行车、暖靴的人就地打死。现在他们又要居民们交出被子和冬天穿的毛衣。有些人因怕死把自己的衣服送到了德国人的Sammelstellen①。

然而大多数人没有亲手送去。

"在这里，反正没有那么多的德国人挨家挨户去抢财产。"我们说。"尽管他们不反对……挨家挨户去抢。还在行驶的最后几列火车都装满了抢劫来的财产。"

"德国人把住在比尔特霍文的男人们赶出家门，强迫他们修复乌得勒支和阿姆斯特丹之间毁坏的铁路，"我告诉说。我总是知道最新消息。我知道有关没收财产的最新情况。在没收了冬天穿的毛衣后，德国人又要没收真空吸尘器了。海牙要提供七万件贴身内衣。纳粹分子不得不离开贝秋维，但是，在离去的时候，他们从牲口棚里抢走了最后一批牲畜。党卫军部队赶走了我们的牲口群——马、羊、猪。在乌得勒支侵略者组织了一个屠宰公司。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无家可归的亲人提供荷兰的猪油和灌肠。

"脂油，脂油，脂油，"我们反复地说。"他们可以没有房子，

① 德语：接收站。

没有衣服，没有炉子，就是不能没有脂油。"

"我们的农民开始自己把牲口杀死，埋入地下，"我说。

"我们不会屈从的。"同志们说。

"永远也不会，"其他人都赞同说。

有些地方的德国居民也表现出一种执拗的性格。在莱茵州，居民们拒绝执行纳粹分子关于迁移的命令。

"元首大本营里的人现在想些什么?"鲁朗特挖苦地说。

"是不是想，他们被迫逃跑时不带行李，而把老百姓带走呢?"

"在德国的德国人只是等待着解放，"威南特肯定地说道。

"那得他们自己的罪孽不那么深重才行，"我反驳说。"你以为，他们在国内都是那么清白吗?"

荷兰人得悉逃离我们荷兰的法西斯喽罗大批被派到吕讷堡荒地干活之后，心里感到有点满足。在那里纳粹分子开始修筑新的防线。

"像以前那样的弹性防线，"我们每个人心里想。

我们的法西斯喽罗在德国被迫为自己的主子挖土，就像我国的男人们迫于侵略者的命令在这里，荷兰的土地上挖土一样。整整一天他们得到的只是两小片面包，一盘飘浮着几片菜叶的清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试图逃跑。有些人跑成了。这些醒悟的人们的述说对于我们苦难生活总算是一种慰藉。

荷兰在流血。由于比利时的解放，大群的佛拉芒党卫军分子跑往北面。劳特在维柳维为他们提供活动场地。他们害怕受到惩罚，他们比德国人掠夺得更厉害。他们盗去了最后一批存放在仓库里的布匹。他们强迫人们去服劳役。他们枪杀那些为讨伐队的受害者送过一块面包和一碗水的居民。

报纸太小，刊登不下所有的消息：荷兰境外取得的胜利和国内发生的暴行；抵抗运动各小组的袭扰活动和会议消息；还有背叛、暗杀、破坏等等。

我在自己的阁楼上浑身抖动着，手摇油印机吱吱地发出响声，并且很听使唤地印出一个接一个的消息，然后我骑着自行车把报纸分送到哈勒姆各处。我知道，在遥远的地方——匈牙利、阿尔萨斯、德国波兰边界、马斯河流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而我们这里穿军装的凶手的子弹仍在呼啸，而回报他们的只有抵抗战士的枪声。平静无风的雾天已被秋天狂风暴雨雪子冰雹的恶劣天气所代替。

"在这种天气，打仗很艰难啊，"我们大家聚集在指挥所，叹声说道……指挥所是唯一相当温暖的地方！

德国人开始把阿麦斯福特和斯海维宁根集中营的囚犯一批批送往德国。因此我们想起了奥托。德国人炸毁了海斯登的旧市政厅大厦。炸死一百多人。在鹿特丹德国人要求所有十七至四十岁的男性居民集合在指定地点。结果来了三万人。

"德国人担心鹿特丹变成靠近前线的城市……"我们说。"但是，见鬼，鹿特丹人为什么那么顺从听话呢？"

继鹿特丹之后不久，侵略者命令把海牙的男人赶到德国，但是海牙人没来，于是挨家挨户的大搜捕开始了。自身行走也困难的德国士兵竟然想出办法把一万三千名青少年和男子汉赶到一起。

偶然也报道一些可怕的事件。在战前这些可怕事件会使我们好多天不能平静下来。然而它们没使我害怕。各家的电话被拆去了。德国人征用了红十字会的财产。德国士兵潜入铸币厂，拿走放在那里的银子，把银子装上驳船运走了。掠夺还是最小

的灾难。即使对于每天的屠杀，我们仿佛也有点无动于衷了。一种隐痛揪住了我的心。我干着自己的事，分送《真理报》，同人们交谈，为参加国内抵抗军队的新兵登记……我经常感到，我仿佛裹着一层冰甲。我与这种寒冷，这种迟钝的感情作斗争，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用以抵抗残酷的世界向我猛烈冲击的内在屏障。那是向我和成千上万我的亲人袭来的猛烈冲击。我看到我的同志们表现出一种冷淡和镇静。他们变得深沉了。安也不再弹吉他了。当接到命令要进行一次指导性谈话时，我感到高兴。我们聚集在哈勒姆，时而在这个党员家，时而在另一个党员家；西蒙也是指导员之一。我们又得努力思考，开动脑筋，唤起自己的精神力量，以便搞清楚掠夺和恐怖手段包含着什么样的社会作用。掠夺和恐怖手段是可怕的，但是当我们试图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时，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因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使那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按另一种方式安排的世界尽快到来……我们党的存在使我感到高兴。她唤起我的理智，我的思维，她教会我昂首挺胸。她悄悄地敲着我的心灵说："别发窘，未来不属于罪犯，而是属于自由的人们，也属于你……"不是所有的人精神都像我和我的同志们那样坚强的。

十一月，警察局抓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拿着武器在哈勒姆围垦地追逐农民，企图抢夺粮食。这两个人原来是我们吸收进"国内抵抗部队"的人，是根据我们的介绍才发给武器的。他们使用武器是因为饥饿。他们打伤了一个拒绝交出粮食的农民。在警察局他们招认武器是从地下工作者那儿得到的。就在那个星期，安和金卡的相貌特征出现在警察局的名单上。

"我甚至不能生他们的气，"当我们俯身看着通过一定渠道传到我们手中的警察局通报时，安说。"这两个人饿极了……不

应该给他们武器！”

我不同意她的说法；我不赞成她对他们的同情，尽管我也知道，这两个人有妻室儿女。

“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我说。“但是不能朝同胞开枪，即使他们拒绝给你吃的。爱国者应该是有觉悟的人……如果他们缺乏觉悟……这就是说，他们不会比叛徒和罪犯强。你也看到，这引起了什么后果。现在警察局通报上登上了你们的名字。”

“你真厉害呀！”安埋怨说。

“我们反对罪恶的世界，”我回答说。

“出　　借”

十一月底，我们过去的领导来到哈勒姆指挥所。弗兰斯现在给我们的印象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从我的眼光看，他更加狂妄自大。我想，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是肯涅麦兰特抵抗小组的领导。弗兰斯不是一个人来的，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身穿皮夹克、三十五岁左右的强壮的男人。我似乎觉得，在一次我们两个组协同战斗期间，或者在“烟桶”，我曾见到过他。他亲切地握握我们大家的手。

“我叫阿连德，”他说。“我从维耳曾的抵抗小组到你们这儿来。我们听到你们许多事迹，哈勒姆抵抗委员会杰出的女神枪手！”

我们早不习惯上流社会那种彬彬有礼的待人的态度，只是含糊地说了句什么，作为回答。毫无疑问，阿连德属于上流社会——他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有知识分子的风度；他的手和指甲异

常漂亮(我偷偷地把目光投向我指甲里的污垢)；但是他绝不使我感到讨厌。

我们坐在桌旁互相交谈，直到我们终于明白原来是怎么回事。维耳曾小组，据阿连德说，被整整一支"讨伐队"牵制住了，因此需要补充和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阿连德淡蓝色的眼睛转向我们，显然他决定施展男人的魅力。安、金卡和我互相轻轻地推了推——我们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图。

"阿连德打算，"弗兰斯高傲地，同时又窘迫地说，"暂时'借用'你们……"

"正是这样!"阿连德微笑着露出自己坚实的牙齿说。"这有点奇怪，但是'借用'的说法在抵抗小组中是很普遍的。"

我们点点头——这点我们知道。我们小组经常有同志被"借用"，不是这个同志，就是那个同志。弗兰斯审视地端详着我们。

"怎么样？你们不喜欢这个建议吗？你们这里再也不会进行特别重大的战斗，"弗兰斯说，仿佛我们这儿事业无进展，是因为他调到别的抵抗小组。

阿连德看看到现在一句话也没说的鲁朗特，然后又客气地说：

"我认为，首先应该由指挥所的领导作出决定。您认为怎样?"

鲁朗特并不特别高兴地看看他。

"您挑选了我的最优秀的射击手，"他说。"如果事情需要这样，也毫无办法……让姑娘们自己决定吧。"

我们三人一直保持沉默。鲁朗特尖锐的回答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明确的回答。我又推了推安，希望她最终表态。

"我们再想想，"安说。"请您转告你们的领导，暂时我们不

能决定。”

“‘暂时’也不错，”阿连德露出殷勤的笑容说。“至少我感到满意的是你们的领导没有完全拒绝我们……我们愿意给你们时间考虑。我们那儿有你们干的事，无论今天，还是明天或是后天，任何一天都欢迎光临。”

我们与阿连德告别时，弗兰斯显得有点失望，尽管他极力不露声色。

“嘿，还算组织！”威贺尔大声说。“他们有许多人和武器，可还想占我们这些可怜人的便宜！”

“也许，这不是没有意义的，”鲁朗特仍像刚才那样严肃地说。

“至少你们在维耳曾人那儿能填饱肚皮，这一点你们可以指望的！”

“鲁朗特！”我说。“就是说，你认为要‘出借’我们，就是为了一盘多余的汤和牛骨头罗？”

再也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了。而且在以后几天，同志们一字不提维耳曾人及其建议了。

十二月来临了，我们不再听到有关南方战事的消息。

我们哈勒姆小组的工作很少。我们显得太无足轻重了。也许事件的规模对我们来说太巨大了。自从发生党卫军逃兵事件后，警察在城内和城郊的村庄中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警察把男人和青少年们赶到艾瑟尔河岸边的工事线；从那儿传来许多奇怪的和互相矛盾的消息。强征来的人根本无法安排住处，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逃跑，纳粹分子也无法制止。他们重新赶来一百又一百的人，但是这些人中还会发生类似的逃跑事件。

德国人的汽车仍旧来回行驶，有时开出一列载着德国乘务

组的货车。他们把我们工厂的设备运往德国。德国人把我们的大企业抢劫一空之后，又着手拆走铁路设施。起先拆走几个星期前就已停电的电线，然后又拆了变压器，最后把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抢走了。铁路被拆除了，铁路运输也停止了。

鲁朗特和威贺尔算了算，德国人每天运走价值三四百万盾的货物，而且这是从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运出的。有的地方人们都冻坏了，以致大白天把大路旁的树林都砍光了。有的地方一些最野蛮的人钻进空房子，把里边所有木制品都搬走，有的地方一些不太粗野的人，老人和残废人则出高价从投机商那儿购买盗来的木材，——因为这些木材能给他们温暖，他们是多么需要温暖呀。

安、金卡和我仍在用手摇油印机印秘密的《真理报》。我们把印出来的报纸送到各个分配点。坚强、勇敢无畏的小个子金卡有时骑自行车一直到希列哥姆。她在我们这儿是最小的一个，而且比其他所有的人更感到饥饿的痛苦，她随时都想吃，但鲁朗特坚决执行口粮的规定。现在商店里很少能买到食品，我们觉得我们的定量大大减少了。因此饥饿加剧了。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还要长久继续下去，"鲁朗特说。"是的，我们可以不顾一切，马上把储备粮统统吃光，那以后怎么办？……我的孩子们也饿得面黄肌瘦了。公共食堂给的东西甚至不能称之为食品。"

被包围的荷兰到处是饥饿。饥饿偷偷地几乎是毫不察觉地从后门钻进来了。现在它控制了整个国家，放肆地龇着牙，似乎打算还要折磨我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下雪了。寒冷的天气来临了。有时，特别是早晨，我们看到人们在公路上移动，拖着儿童推车或者别的简易板车。他们到

哈勒姆围垦地去，希望在那儿能搞到粮食。我们看到，晚上他们才回家。车子上经常像早上去时一样空空如也。人们勉强地拖着步子。他们那一双双的旧靴子在雪地里发出沙沙的响声。在零下七八度的严寒中，他们躲在肮脏的沟里休息。起先只有二三个人去，后来整群整群的人都去了。最初我们看到他们去哈勒姆围垦地，过后到通阿姆斯特丹的铁路的北边去，以后又去斯帕尔沃乌德和斯帕尔达姆；他们在奥维尔芬和贝内勃鲁克之间的花场乞讨。这是一场由妇女、孩子、老人组成的饥饿大军的远征。男人们不敢去；他们仍躲藏起来，害怕Arbeitsinnsatz①。

开始德国人没有注意那些外出寻找粮食的人们。但是不久他们明白了饥饿的人群给他们减轻了负担。每逢晚上，德国人在大路上等候拖着车，背着背包回来的人们。他们把妇女和儿童赶到一个地方，逼着他们把弄到的食品放成一堆，然后把缴获的东西装上德国军用汽车运走。人们把这极为凄惨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在奔宁斯维尔附近，纳粹分子打死一个姑娘，因为纳粹分子抢走了她那装有赤豆的口袋，她扑向一个纳粹分子不让夺走。

无论什么也无法制止人们外出寻找粮食。每天我们看到一群群新来的人。我们听到有关阿姆斯特丹人和海牙人的情况，他们绕过乌得勒支，越过维柳维，或者进入北荷兰省，直到旧须德海的大坝。他们准备用珠宝、床单、银餐具换一袋小麦，一块猪油。在农村总是能找到一些东西。农民中也有好人和坏人。一些人以早就不再有了的合适的价钱出卖自己的小麦；另一些人则对出卖的食品索取高价；他们自己的箱子里装满了用一口袋土豆或者芜青换来的金银和考究的内衣，而那些土豆和芜青

① 德语：义务劳动。

还不知道是否能顺利地通过德国人的检查站。

一直过着半饥不饱日子的贫穷不幸的人们既没有一文钱买粮食，也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换粮食。他们坐在家里煮郁金香的块茎，这还是像讨饭似地向沙丘旁的花场讨来的。

我们只要一想到郁金香的块茎成了我们的食品，就感到恶心。

我克制着如焚的忧郁心情，这是由于铅灰色的土地，雪天悬挂在头顶上的黑沉沉的乌云和饥饿所引起的。我急忙赶印了一些少有的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来的战斗报道；在斯洛伐克，居民们起来反对侵略者并和俄国人并肩战斗。

但是这些国家在遥远的地方。再过去还有太平洋，英国人回到了马来半岛，夺取菲律宾的战斗正在进行，在菲律宾美国军队一英尺一英尺向前移动。这些地名听起来像神话似的。我竭力想象着遥远的珊瑚岛、棕榈、阳光、白房子，可是我无法把这些同战争联系起来。战争只在这里进行，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变得阴森森的、死气沉沉的、灰蒙蒙的，一切都冻僵了，死去了，在这里我们戴上了铁锁镣铐；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到处充满了阳光。在那里，至少能真正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我渴望工作，安和金卡也是这样。

“让我们去找维耳曾的同志们，”有一次金卡建议说。“印《真理报》的工作对我来说太少了。”

“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信心不足地说，因为我考虑阿连德建议为维耳曾抵抗小组工作的事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多。

“我们找鲁朗特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安建议说。

于是我们商量了。鲁朗特和其他所有同志只是耸耸肩膀。他们明白，我们不能闲坐着了。因此他们对我们说，只要我们认

为合理，自己去做好了。

我们暂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有时我觉得"借用"似乎很可笑；这种说法过去很通用，而且一般说来，完全合情合理。安和金卡显然在等我作出决定——因为我最大。我仍旧犹豫不决；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些事，使我的一切疑虑都消除了。将近十二月中旬，纳粹分子冯·伦斯德指挥的坦克部队开始在马尔梅迪和阿登的森林和丘陵地带进行猛烈的进攻，而且突破了美军防线。

这一次我对于事件的认识相当准确和可靠。我仿佛看到，坏蛋们黑色的坦克冲过布满大雪的森林和河流的缓岸——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地方，因为过去每逢夏天我经常去那里。宁静的村庄此刻陷入恐慌，居民们到处奔跑，大规模的掠夺开始了。那些还不熟悉自己敌人作战方法的美国人惊慌失措，连连撤退。来自前线的消息说，那儿大雪纷飞，烟雾弥漫，美国人的恐慌和迟疑大大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结束了自己的疑虑。

"我们去维耳曾人那儿，"关于德国人意外取胜的第一批坏消息经我们发布后，我就坚决地对安和金卡说。"既然形势变化了……"

我们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弗兰斯。我们请他转达维耳曾的同志们，说我们准备暂时为他们工作。他多谈了几句，我们首次知道了阿连德和他的同志们的指挥所的驻地。

"原来是这样，"金卡说。"我经过那儿好几次了！……"

就在关于德国坦克进攻的消息公开后的那几天，我们按照指定的地点去了。莱克地区的战斗激烈起来。纳粹的报纸自然以这些胜利而自夸。这些胜利对于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遭到失败的德国人应该是一种奖赏。德国人自己怎么认为，我们不清楚；他们似乎真的以为他们能够给盟军设置第二个敦刻尔

克①。他们开始把自己的舰队和"赫尔曼·戈林"师的残留部队集中在胡克范荷兰和瓦瑟纳尔海岬间的海岸线上。这些准备工作已经不能令人恐慌了，不能使所有的人感到沮丧。这种事竟会发生在盟军夏季和秋季强大攻势之后！……我当然注意，尽量不在朋友们面前流露自己的情绪；但是我没有能力无忧无虑地忍受这些失败。可能饥饿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我们的处境比别人好得多呢！

维耳曾人指挥所所在的那幢房子相当大。它座落在通往高炉群的大路的旁边，在一排松树后边。它像一幢也许属于某工厂头头的气派十足的别墅。它看上去那么自然，一点也不显眼。金卡说得对，我们多次从旁边走过，但是从未感到怀疑。在有饰雕的大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刻着字："请走边门"。我们绕过房子——严严实实的窗帘无法看到窗子里面——接着我们按了门铃。我们又按了一下铃，这时那扇虽不太厚实，但很大的边门上终于打开了一个玻璃"小眼"。在双层纱窗后面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这时我们才听到阿连德的声音：

"啊，哈勒姆来的神枪手！"

门开了，阿连德走出来，立刻就拉我们走进房子。他身穿一种带拉链的男上衣；这立刻使我想起休果的皮夹克。我心里发紧，默默地朝阿连德点点头，他依次与我们三人握握手，无忧无虑地笑起来。

"快进来吧……我们这里暖和；鬼天气，又要下雪了……看到你们很高兴！"

我们来到前厅。两个男人在下跳棋。有好几扇门通这里。其中两扇门敞开着。一团团呛人的灰白的烟从那里滚滚涌来。

① 法国北部港口。

浓烟和暖气立刻笼罩着我们。房子里很憋气，但也挺暖和。从开着门的房间里传来了说话声。但是阿连德和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声音一下子就停住了。

"我们这里像士兵的营房，"阿连德开玩笑说。"领导人在楼上，今天正好'军官们'不多……不要以为这是正式的称呼，不，这是我这样称呼他们的……"

他走在我们前面，登上了楼梯，我们在跟他上楼前，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金卡做了一个可笑的动作，这个动作可能意味着："我们这是走到哪里去？"安耸耸肩膀。我心里产生一种不安的疑虑。

阿连德把我们带到一间大房间里，根据窗户我能够判断出这间房间朝着后院。墙上镶着护墙板，地板上铺着贵重的地毯。墙上的画大约是当代的；画的东西我一点看不懂。房顶上挂着螺旋枝形的金属大吊灯。我们面前是一张棱堡式的宽大的红木写字台；写字台上铺着闪光的玻璃。除了阿连德，房间里还有两个人。一个坐在写字台后面，另一个靠在摆着几本红皮书的书橱上。我们走进去时，坐在写字台后面的那个人站了起来。我飞速地环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看了看他。他是个矮个子，肩膀又宽又平，浓密的头发有点白了，给人的印象：他是个坚毅的，毫不动摇的人。他身穿一件深灰色的、缝制考究的制服——在这种日子里，这种打扮很引人注目——和白衬衣；从衣服的翻边里露出钉着块状金属扣子的袖口。他用左手摘下近似黑色的玳瑁眼镜，而把右手伸向我们。我又得和这个圈子的人处熟；如果除了利文斯，那我最近几乎没有碰到过他们。我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个战前上流社会文质彬彬的、停滞于冷漠状态的人。他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只记得，他的声音听起来使人感到亲切。他向

我们自我介绍，他是法学硕士保利。另一个男子我觉得也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他是卡普斯塔特工程师。他穿了一套棕色的、熨得笔挺的西服，一双棕色的厚底运动鞋和一件柔软的棕色针织男式西装背心；引人注目的是嘴边的那道伤疤和右手上那个大得不成体统的带图章的戒指。他们把笨重的皮椅子推到我们跟前，按铃让人送来咖啡，看来这里等级制度很森严。接着保利硕士问我们是否饿了；他说，他们昨天还吃剩下一大块土豆馅饼。我谢绝了这个好意，尽管觉得一大块土豆馅饼很合我的胃口；安和金卡也说，她们现在没有胃口(我想，这不是事实)；不过我们拿了给我们的香烟，接着谈话开始了。

保利话说得最多，卡普斯塔特工程师只是随声附和，而阿连德仿佛是两个上级军官的年轻通信员，规规矩矩地坐在他们旁边。保利硕士说，他们早已知道我们的名字，他们听到过许多有关我们的英勇功绩，对我们同意与他们合作作了高度评价。我们喃喃地说，我们只想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愿望了；我又感觉到平时的那种胆怯，我明白，我离开那种环境太久了，在那种环境里，即使在战争的第四年，人们脚穿擦得锃亮的皮鞋，身穿缝制考究的西服，在地毯上来回走动，并且还保留着律师、工程师之类的头衔……卡普斯塔特工程师问，我们是否整天都有空，我们告诉他，每天早上我们要印刷和分送《真理报》。我看到工程师和保利硕士交换了一下眼色，保利又戴上玳瑁宽边眼镜，然后说：

"我敬佩这一点……我们的秘密报刊比黄金还贵重，而那些印刷和分送报纸的人更可贵。秘密刊物支持了人们的勇敢精神……当然你们看到过英文刊物吧？我指的是我们的《不靠岸的荷兰船长》。"

他朝自己的写字台上弯下身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薄薄的英国飞机空投到荷兰的卷烟纸印的印刷品。有时这种印刷品也落到我们那儿，但最近几期我们没看过。我翻阅了一下，看到上面登载着英国人在马来半岛作战的情况，以及伦斯德进攻的情况。这时我发现一条简讯，我不得不读了两遍，才明白它的内容。在希腊登陆的英国军队卷入与希腊人民解放军国内抵抗军队的战斗。我把《不靠岸的荷兰船长》还给保利，并且说，我们也经常阅读这些材料。

我们又抽了一支烟，喝了咖啡，我不知道，里面是否确实有咖啡，不管怎么样，我们尝到了奶粉的味道。最后我们商量定，我们一星期来两次，以便知道是否有我们的任务。保利又一次朝自己的写字台弯下身子，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纸包。

"这是目前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他说。"纸包是给在哈勒姆的弗里茨。我想你们认识他。"

我承认我认识弗里茨。

"那劳驾了，以阿连德的名义把这包东西交给他。不需要答复，"他说。

"一件轻松的任务，"我回答。

他离开写字台，亲切地挨个儿看看我们三个人。

"以后还有其他任务，"他说。"我看得出，你们属于那些只认准最艰巨任务的人。稍微等等，那时候，会有任务的！"

当我们告辞回哈勒姆的时候，安说：

"天啊！我们从来没想到，在抵抗组织内也有等级！真像阿连德说的，士兵营房在下面，而军官先生在上面！……"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看一下这个营房，"金卡说。"真想知道，那里是否铺地毯。"

“你们对所有这些还有什么说的？”我问道，我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想影响两个姑娘。

“依我看，不怎么坏，”金卡说。

“阿连德好像很讨人喜欢，”安补充说。

“再说，只不过暂时借用我们，”我说，“如果我们没事做，那我们通过鲁朗特把我们要回来。归根结底我们都在抵抗委员会内工作。”

来到哈勒姆后，我“以阿连德的名义”把一卷东西交给了“烟桶”的弗里茨。显然他因为我与维耳曾有关系而感到奇怪，但是他这种奇怪的表情只流露在脸上，没有说出来，只是说谢谢我。回家时我仍旧在想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新关系。

我躺下睡觉时，回想起《不靠岸的荷兰船长》上的一条简讯：在希腊发生了英国登陆部队和希腊国内抵抗部队交战的事件。于是我感到我应该就这件事和自己的同志们谈谈。

残酷的现实

第二天，我忘记了我想在我们指挥所讨论在希腊发生的事件。我和朋友们一起向鲁朗特汇报了我们拜访维耳曾人的情况。

“嗯，原来这样。那是你们的事，”我们的领导有点尖刻地说。“我希望，你们喜欢那里的工作。”

总共过了两天，又传来了英国部队和希腊这个多灾多难的小国家的游击队发生冲突的新消息。一看到机会合适，我就在指挥所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中间谁都明白，英国政府在那里做出卑鄙的不体面的行为。

“这个丘吉尔简直是无耻之徒，”鲁朗特说，“相信我，他正在推行肮脏的政策……你们当然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还用说，”我回答。“唐宁街① 已经担心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自由的希腊政府。”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在政治上不如我们有经验的威南特奇怪地问道。

“你有别的看法吗？”鲁朗特说。“他们把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赶到山上，只是因为希腊人民解放军英勇地与德国人作战吗？……那么你就看吧。只要国家还处在危险之中，共产党员就要流血；而战争一结束，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了。”

“那英国人在希腊究竟要什么？”金卡问。

“要据点，”我迅速地回答，“要通往印度的道路。要屏障、进攻基地、武器供给基地，如果巴尔干其余部分成了红区……”

“真的，好像是那样，”安说。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使自己有时间熟悉一下这种残酷的现实。然后我慢慢地说起话来；我仿佛觉得我突然清楚地明白了许多事情的实质。

“这就是说，情况就是这样……在伦敦、荷兰的内阁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阴谋活动；今天这个部长被撤职，明天那个被撤职。然而他们所有的人只关心一件事：战争结束以后，怎样排挤共产党。他们根本不想与共产党和平共处。消灭了希特勒后，共产党的处境可就难了……”

威南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说：

“你是怎么想象出这种事情来的，人子……共产党受到所有

---

① 唐宁街是伦敦的一条街，为英国外交部等政府机关所在地；此处指英国外交部，也泛指英国政府。

居民的欢迎……”

“对他们来说，这样更糟，”我回答。“受欢迎！受谁的欢迎？受普通好人的欢迎。受你威南特这样的人欢迎……对统治者来说，这又是排挤共产党的一个原因。要知道，对他们来说，共产党比希特勒还坏；希特勒只想统治，掠夺，想帮助自己的种族获得对全世界的统治。而共产党要消除一切统治，包括上述这种统治。他们要使世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论世界本身和人都要变个样……而这是不可饶恕的追求。”

“也许盟军根本不打算结束战争吧？”威贺尔说。

四面八方纷纷响起抗议的呼声。我默默地思索：是的，也许美国和英国当局对和平不很感兴趣，这倒不是因为纳粹分子仍然到处横行霸道，而是因为在东欧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红军部队。这些统治者们首先想把红军化为齑粉。我的同志们仿佛同意我的这种看法。

“再说希特勒好像也没有错待这些国家，”金卡说。“要是他一开始就去东方，那么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立刻会站在他一边……”

“我正好在想这个问题，”鲁朗特说。“要是今后我们不能坚定地进行自卫，那么我们只得经受希腊人民解放军经受的类似境遇……一开始是德国人占领，以后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占领。”

“那我们就继续斗争，”我提出不同看法。

“我们当然要继续斗争！”沉默许久的安大声说。“因为我们是同罪恶的敌人和坏蛋斗争。因为荷兰被侵占，我们必须与侵略者算帐。因为我们的良心——或者随便把这种感情换个别的什么叫法——在支配着我们。”

“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直到不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无论现

在，还是战后都要斗争，”一直在认真细听我们谈话的威南特说。

“我只知道一点，”我说。“人们希望战后荷兰的生活能变得好一些，更公正一些，更友好一些。当希特勒被打垮时，过去人们之间的隔阂也将消除了。”

“瞧你说的，”威贺尔不满地说，“等着瞧吧，我们四十年代的首领呀，只要能做得到，他们就会竭力重新制造这些隔阂。因此在伦敦现在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个统治者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说，胡说什么解放后应该恢复健全的合法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抵抗运动的参加者首先就得规规矩矩，”鲁朗特说，“因为我们做的事是有害的，非法的……”

“所以我们的事业被称为地下工作，”我尖刻地说。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威南特用平静和坚决的口气说。

“我可能不像你们那么懂政治……但是我同意你们说的：我们要继续斗争。要知道正直和正义总会得胜！”

“阿门，”我结束了谈话。

任　务

安、金卡和我开始在维耳曾人那儿工作。我们大致想象出我们的基本工作内容。起先我们不得不分送或收集一包包的东西——有时去阿尔克马，有时去布隆缅达和莱顿各地。第二个星期，安和金卡带着沉重的箱子去海牙，而我的任务是把一封信送给哈尔弗维赫的一个人。阿连德仍旧亲切地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不太明白，保利硕士和卡普斯塔特工程师头脑里想些什么。我似乎觉得，他们的笑，他们彬彬有礼的态度有点虚伪。我们穿着旧上衣、旧风衣和褪成棕黄色的鞋子，骑着快

散架的自行车，给人一个不很好的印象。但是一个真正有身份的人是否应该以此决定自己对人的态度呢？要理解那些处于别墅底层的人们——像阿连德所说的兵营里的士兵——的愿望和情绪不是那么困难的。他们是普通工人和年轻市民，其中一些人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被征集来的；另一些人只是加入抵抗组织后才学会使用武器；但是他们现在都会开枪射击。这是一个不大的小组。它的人员经常变化，有时十来个人，多时达到二十人，尽管在自己的指挥所，他们从来没有到齐过；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也希望周围一些人能同舟共济。他们坐在房子的底层，煮着自称为咖啡的浑浊无味的饮料，打打牌，挑选着上面先生们的烟灰碟里的烟头，等待着偶尔出现的需要他们做的事情。由于参加过反对党卫军分子的讨伐队，我们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开我们的玩笑，像通常男人们和年轻妇女开玩笑那样；安和金卡能立刻作出回报（我对这种事不能随机应变作出回报），我们像对待同志那样看待他们。他们中的两个人老是在厨房里做饭；我们早就发现，这个小组有相当多的储备粮。芜菁、卷心菜、块根做成的菜泥是现成菜，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他们那里，他们总让我们吃，如果炉灶上烧着东西。过了几天，马尔滕、一个脚登短皮靴的年轻炊事员——我们还在走廊里就看到他那洗得很干净的运动便帽——告诉我们，要是我们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先喝上一小杯；楼上的先生们显然有大量的酒精饮料，因此每天早上“士兵们”能把头天晚上他们喝剩下的东西拿来享用。

“要是他们把梅斯费尔特从集中营解救出来的时候，你来就好了，”马尔滕说。“那时候我们每个人得到多少酒啊！那还只是楼上喝剩下的呢！”

“那个梅斯费尔特是什么人?”安问。

马尔滕扬起眉毛:“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个领袖?当然是在战前罗……他曾被关在阿麦斯福特。”

“他们怎么把他救出来的呢?”我惊奇地说。“他们怎么成功的呢?”

“他不是单独一个人,”马尔滕回答说。“我们的老爷人情关系好极了。你很快会看到的。”

金卡把臂肘支在饭桌上,望着马尔滕,毫不拘束地说:

“应当指出,你们这里正在发生一件怪事……首先这些先生们在楼上,而普通的小伙子在楼下。在我们抵抗委员会,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马尔滕往金卡的盘子里放了一勺辣汁菜丁,笑着对她说:

“是的,抵抗委员会!因为这是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对吗?你们当然一切都是平均分配的罗!”

我们笑了起来,然而我不很明白马尔滕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赞成还是嘲笑。

“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战后的世界应该是比较完美的。人们之间没有令人厌恶的等级区别,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等级。”

马尔滕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他耸耸肩膀。

“什么叫‘比较完美’?区别一直存在,当然以后也永远存在……只要各尽其职。只要德国人完蛋。”

“唉,要是事情那么简单就好了,”我叹着气说。

我们谁也不打算进行政治辩论,尽管我想更多地知道关于那个能够被维耳曾人从阿麦斯福特集中营营救出来的人的情况。我想起奥托,想起了我的同志们,他们被抓进集中营,再也

没有音讯。我沉默不语。安、金卡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揭开保利和他的朋友的秘密，我们也不打算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马尔滕和象他那样的年轻人。马尔滕对我们说的，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是其他人的一种信念。他们痛恨侵略者，最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快一些把侵略者赶出国土，别的事他们都不计较。我沉思了片刻，内心有一种模糊的、令人忧郁不乐的情绪……是不是大多数的荷兰人都想生活在较美好的世界？……我不止一次地肯定过这一点，但是现在我感到自己也开始怀疑了。

保罗和混凝土工事

圣诞节临近了。伦斯德在莱克地区的猛烈进攻仍在继续。报纸上登满了胜利的消息，但是他们一字不提俄国人包围布达佩斯，接近奥地利，不提德国护航舰一艘接一艘被英国人击沉。荷兰经受着严酷冬天的煎熬。我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城市哈勒姆这么荒凉，这么肮脏，这么凄惨。谁也没有出来打扫积雪。街道很不干净，路面上覆盖着一层冰，窗户结了冰，有些窗户根本看不到，因为关着百叶窗——谁也没有打开过。走在城内，我们看到一堆堆人，毫无表情地排在廉价的公共食堂前面。他们装在罐头和锅里带走的渣滓不能称作人吃的食物。孩子们在结了冰的运河上溜达，用弹弓打饥饿无力的海鸥。有时我在指挥所能烤一下火，但是在家里，在护士那儿则是一片冰冷。其实，我从没感到温暖过，谁也没感到温暖。炉子里冒出来的一缕缕淡淡的青烟从烟囱里升起，又迅速消散了。大家坐在炉子旁边，往里面添加刨花和木屑，为的是能够稍稍暖暖身子，给自己煮点东西吃。现在大多数居民除了郁金香块茎和甜菜根就没有别的

食物了。他们把郁金香剁成菜泥，煮成汤；把甜菜根熬成糖浆，然后浇在郁金香上面。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孤独的老人，甚至连郁金香和甜菜根也搞不到。他们得了病，默默地躺一二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静静死去。饥饿大军的远征没有停止。有些人就死在远征的途中。

圣诞节到了，纳粹分子欢快地过节，再一次表现出可恶的本质。德寇的汽车络绎不绝，穷苦的居民身旁驶过一辆辆装满饮料的车，木箱子里响起了玻璃瓶子的撞击声。他们拉来了绿色的松树枝，并且到处放声歌唱。从兵营里和掩蔽所内散发出面粉和黄油的香味；四周充满了烤饼的香味——使人想起遥远的过去的那种令人垂涎的香味。孩子们站在台阶上，小脸对着风，闻着风吹来的浓重的食品香味。他们冷得直发抖，极渴望吃到东西。

"你们有任务，"我们在圣诞节前两天来到维耳曾指挥所时阿连德说。"卡普斯塔特工程师已经问起过你们。他在楼上。"

卡普斯塔特一个人坐在那天和保利硕士一起接待我们的那个房间里。他亲切地向我们问候，请我们坐下抽烟。这一次他没有穿棕色的西服，而是穿着十分合身的蓝西服和白衬衣，衣兜里露出白手帕；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现在谁能够洗这些白衣服。他用手摸摸头发，因此他那个带着小图章的大戒指闪了一下，然后他微笑地看了看我们。

"今天我总算有一项很艰巨的……而且危险的任务给你们。"他说，由于微笑，脸上布满了皱纹，以致看不见嘴边的伤疤了。"我知道你们不怕危险……"

他依旧对我们微笑着，我忍不住说：

"请说吧。"

“要从艾梅登的混凝土工事里搞弹药，”他说。

大约我们三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于是他大笑了起来，并且解释说：

“当然，这听起来大概就像我请你们去偷希特勒的皮包……”

“差不多，”安说。“就是说，您指的是德国人的工事……在港湾附近吧？”

卡普斯塔特工程师点点头：“是的，正是这个工事……但是，我应该马上就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现在这个工事由德国舰队占领着。在这群人中间有我们一个极好的联络员。”

他很坚决地，并且有点做作地走到通往旁边小房间的门旁，象魔术师卖弄绝技那样打开了门。我们朝小房间里张望，一个坐在沙发上翻阅英国杂志的年轻人站起身来，并且放下杂志。我看了看杂志的名称，然后又看了看年轻人。他大概二十五岁左右；穿着朴素干净的便服。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嘴唇一动，掠过一丝谦恭的笑容。他的鞋后跟咔嚓一响，行了个礼。

“Hab' die Ehre, meine Damen,” 他说。“Mein Name ist Paul. Bin leider nicht imstande, Familienname dazu zu nennen Kommt hoffentlich auch bald.”①

我们又感到奇怪；眼前这个现实真使我吃惊：在抵抗组织的一个小组的指挥所，我们遇见一个流利地、无可指摘地说德语的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安和金卡不知喃喃说了些什么，回答了保罗，我也默默地朝他点点头。卡普斯塔特工程师走向前去。

① 德语：“不胜荣幸，尊敬的女士。我的名字叫保罗。遗憾的是我不能说自己的姓。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做到。”

“丝毫不要见疑，”他仍然微笑着，但已经用持重的声调说。“保罗是前帝国国会议员自由党人的儿子。他仇恨纳粹分子，准备用任何方法帮助我们。”

“Durchaus，”①保罗回答，显然他精通荷兰语。

“他在港口工事的部队里服役，”卡普斯塔特继续说。“现在他们那里的人不多；现在舰队大部集中在马斯河口和海牙之间。让我们坐下吧，站着商量问题不合适。”我们坐了下来，保罗坐在我们中间。无法想象还有比这个黑发男子更典型的普鲁士人了。一张稍微宽大的脸，高高的颧骨，精心梳理过的近似波浪式的短头发，一张大嘴，方下颏。如果他穿上军装，更是个典型的德国人。现在他穿着便服看上去倒像伪装的。我仍然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于是与安和金卡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毫无疑问，她们也像我一样被这次见面弄得措手不及。

卡普斯塔特工程师坐到旧式写字台后面，然后说：

“保罗建议我们在圣诞节的第一天晚上去工事搞弹药，他将和一个十分厌恶战争的人一起站岗。保罗认为，德国人到时候都将兴致勃勃地去参加节日宴会。”

“Ohne Frage，”保罗一直紧张地听工程师说话。“Man hat uns einen schönen französischen Kognak zugeführt.”②

他说“我们”。我一下注意到这一点。我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又点了一下头。显然他还没有把自己与纳粹同伙完全区别开。也许，他甚至希望，等他站完岗，也能喝“上等法国白兰地”，我想。战利品毕竟是战利品啊。也许在阿登作战的德国士兵为了壮胆此刻正在大吃我们的“上等荷兰干酪”……

---

① 德语：“毫无疑问。”

② 德语：“当然，给我们运来了上等的法国白兰地。”

“不管怎么样，可以料定，”卡普斯塔特工程师说（我看出他一直仔细地注视着我们的表情），“在圣诞节第一个晚上先生们不会表现出应有的警惕性。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我们很需要弹药。保罗知道这一点。”

“Durchaus，”保罗重申了一句。显然这是他爱用的词；依我看，这是最典型的德国话；我突然觉得我周围的空气变得不可捉摸了，模糊不清了，因此充满了危险性。看来卡普斯塔特工程师把我们的沉默看成是无保留的同意。他甚至不问我们是否赞成这个行动，便直接转入对这个战斗任务的讨论。

“黄昏，我们中的一个人领着你们去包装鲱鱼的房子；它离通往海边的大路不远，离混凝土工事总共只有半公里路。中间还有一些板棚和仓库，但是现在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一共多少？”金卡问，同时把自己的脸转向坐在旧式写字台后面的人。

“Fünfzig Kilo Wird's schon sein，”①保罗说，同时高兴地望望金卡那张招人喜爱的激动的脸。

“五十公斤，”我说。“就是说每人约扛十六公斤……嗯，我们的自行车挂包大概对这点东西还是能承担的……”

“弹药吗？”安问。

保罗确认所说的是弹药。他从口袋里掏出记事簿，从上面撕下一张纸，开始用铅笔画出地形略图，并且向我们说明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接近工事。

我拿起纸，把它折起来，然后牢靠地藏在自己身上。谈话显然结束了，于是我们与保罗告别。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要不要把手伸给他。我很不愿意，但是我感到回避握手是不妥的。我伸

① 德语：“约五十公斤。”

手握了握保罗的手，安和金卡也学了我的样。

“Auf Wiedersehen，再见，”保罗说。他高兴地笑了笑，突然把手移至额头行了个礼。这很傻，因为他穿着便服。

回哈勒姆的路上，我们又谈了很久，从各方面讨论这件事，最后仍决定承担起这个任务。也许是虚荣心——用姑娘自己的力量，不用男人参加，来完成任务——促使我们这样！但是，也许在这时起作用的还有在危险面前永不退却的哈勒姆抵抗委员会战士的荣誉感。我们作出这种决定还因为我们又感到有精神上的压力：除了荷兰遭到的可怕饥饿外，扎营在维斯特兰特的纳粹军队在那里的居民中间开始了大搜捕；他们进行了强盗般的袭击，而且把我们的男人们赶去修岸防工事。最近的情报就证实了这一点。

其实，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维耳曾抵抗小组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愿望。圣诞节前夕，在执行搞弹药的任务前，我们听说停泊在艾梅登港口的德国舰队的两艘检查船被击沉。第二天我们来到维耳曾指挥所，那里一片欢腾。我们祝贺他们袭击成功，马尔滕满怀喜悦地多给了我们一份煮熟的褐色菜豆，我们发现里面甚至还有一小块猪肉皮。

这天去艾梅登之前，安、金卡和我互相郑重地许了诺言。我们相当清楚地知道德国人逮捕和拷打受害者的情况。我们听到过，有些被公认为最坚强最可靠的人，经受不住纳粹分子的拷打。我们互相许诺，我们尽管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但绝不允许这样。要是我们大家一起被捕，我们就用自己的手枪互相射击，以免遭到痛苦和耻辱。

当我们在阿连德的带领下朝空无一人的港湾骑去时，我老是在想这个诺言。港湾里仍散发出一种过去鱼行的气味，这种

气味使我产生了伤感的情绪，尽管早先我无法容忍这种情绪。在港湾的一角，一只紧挨一只停靠着一些浅褐色的落满雪的单桅渔船。那边只有一些饿得发出嘶哑叫声的海鸥飞来飞去。天渐渐黑了，海边吹来刺骨的寒风：真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无情的海风刺痛了我的脸腮，而且透过破旧的手套，刺痛了双手。突然我十分渴望看到大海。我算了一下，从一九四二年起我就没见过大海。我想象着海水现在是什么样的——银灰色的大浪，这就是我们冬天的大海。我们的盟军正在欧洲大陆与法西斯败类进行严酷无情的斗争……这大海似乎象征着残酷的现实；我内心感到沉重。想起我们事先的约定，我便从自行车上下来。我仿佛在忐忑不安的忧郁的梦幻中移动；最终安和金卡也骑到了，并且也下了车。阿连德的声音从竖起的皮领子里传了出来，仿佛是从胸墙里传出来的：

"到这里，我要往回走了；其实我们已经在禁区了……你们从这个咖啡馆边过去；再过去有一条小路，它会引你们去要去的地方。你们将遇到一堵木板墙。那里的招牌上写着："维谢尔鲱鱼包装组"，字写得很大，在昏暗中也能够看清……接下去的行动计划你们清楚。祝你们成功！"

阿连德说得越来越轻，越来越快。说最后几句话时，他依次握了握我们的手，而在"祝你们成功"时，他的腿已跨过自行车座了。他回去了。只有我们留在瓦灰色的昏暗之中，瓦灰色的房屋之间，而这时只有瓦灰色的海鸥在天空中飞翔。在不远的大海和我们中间是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工事，这是一种最可怕的防御工事，德国人搞了这些建筑，毁坏了我们海岸地带。就是要从这个棱堡里搞出五十公斤弹药，而我们三个姑娘要把这五十公斤从这里运出去……

我们来到鲱鱼分类和包装处的空房子跟前，我不得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里面一片黑暗，我们不时地碰到一堆堆杂乱无章的箱子。房间里毫无生气的冷空气中充满了鱼腥味，腥味比港湾附近更浓。上面，在折断的屋脊旁，风呼呼地叫着。风是从海上刮来的，我想。我们“自由的水手”在大海里航行，我们的海员在战斗，护送装着弹药的船只，他们心里装着我们的祖国，我们心目中那个秘密的祖国，我们正是为她担忧，正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她。

“你怎么哭了？”突然响起了安的声音。

我这才发现，眼泪顺着我的双颊往下流。

“我……没什么，”我赶紧说。“只是……简直不能相信，今天是圣诞节。”

“你说得对，”金卡说。她的声音显示了一种年轻人不可摧毁的力量和快乐。

“唯一的安慰就是……物极必反。到时候一定会变得好一些。”

“是的，当然，”安肯定说，她坐在我身旁，搂住我的肩膀。“我有这种体会……饿过头了就不知道饥饿。要是你明白了，那么一切痛苦忍受起来都会容易一些了。”

我擤了擤鼻涕，说：“理智上我都明白。但有时……哎，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应该经受得住所有这些。熬过今天和以后所有的日子。正象威南特说的，直到诚实和正派取得胜利……”

“这话说得很对，”安说，“上帝啊，这个板棚里多臭呀……这里已有多少年没见到鱼啦……难道他们维耳曾指挥所就不能为我们找一个废弃的香料厂吗？”

两个小姐妹极力把一切都付之于笑谈，我高度评价她们的

顽强努力。她们说起我早就听说过的有关希特勒过去的奇闻，说起了德国海军和空军的"战功"，这些战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尽管德国水兵和其他逃兵仍在我们国内胡作非为。我钦佩并且感谢安：多少次使我确信，工人阶级内心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显然这两个姑娘经受过艰难的少年时代，比我的少年时代艰难得多。她们投身抵抗运动时的年龄那么小，在这个年龄，我第一次从父亲那儿得到生活费，带着对生活本质的最模糊的概念，搬到阿姆斯特丹的阁楼里，和露伊莎、塔妮娅住在一起。两个小姐妹几乎经受了姑娘在最易受伤害的年龄里可能遭受的命运的所有打击。她们自己保护自己，她们内心是坚强的，此刻在这破旧的棚子里，她们象模糊不清的影子，坐在我身旁，努力使我振作起精神……这是在鼓励我呀——而我曾经发过誓，内心一定要象铠甲那样坚强，直至完成祖国赋予自己的义务。

因此我要使自己穿上铠甲。我知道，一切，所有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绝对必然的——惨景、饥饿、消灭随时遇到的敌人的责任。

……我们开始幻想，就像有时在我们的指挥所里那样，也不光在指挥所幻想。我们配了最丰盛的圣诞节的菜肴。我们把烤好的面包、肉、布丁、核桃、蜂蜜、水果羹、新鲜蔬菜、糖果摆在桌上，我们坐在摆满食物的桌前。这是古怪的，不现实的愿望，这些愿望通常使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们难以忍受。过去我们只是在儿童惊险读物，或者在描写迷途的旅行家和极地考察家的可怕的故事里读到过这种现象……我们幻想得疲惫不堪，昏昏沉沉。我们坐在装过鲱鱼的箱子上，打起瞌睡，安和金卡的话也少了。她俩的说话声仿佛从远处传来，而且时时被风的呼啸声和海鸥的啼声所打断，在这个包装鲱鱼的废弃的房子里听得见的唯有

风声和海鸥的叫声。

教堂的钟当当地敲响了，我浑身一抖，尽管过去经常听到当当的钟声；我看看自己的手表，闪着微光，仿佛褪了色的指针正指在九上。

“到时候了，”我说。

金卡打了个哈欠。显然两个姑娘也打了个盹。我们扎上风衣的腰带，紧紧地裹上头巾，握着枪走出渔棚。

海风顺着大街直吹过来；大街上布满一道道德寇的载重车的车辙，上面是一层冰。往昔，在晴朗的天气，在夏天的蓝天和海滨淡黄色的沙丘的背景上，荷兰公民们穿着鲜亮的衣服就是顺着这条街缓步走向艾梅登的海滨浴场——这已是多么久远的事啊！……我自己不明白，这种痛苦的感伤情绪从何而来。在别的场合我没有注意过这类情景，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接受的任务上。也许这一次感觉暗示我，应该回避这个任务，以此摆脱危险；可能我的内心深处恐惧得要命……因为下雪，看不到星星；乌云低垂着，空气污浊，狂风怒吼。当那些在去工事的路上多少能够遮挡住我们的破旧房屋被抛在身后，我们来到无法躲避寒风的地方时，心里感到很不舒适。

“伟大的上帝！”从我身后传来金卡微弱的声音。“看在上帝的面上，紧紧地拉住我，否则狂风会把我刮走的！……”

安嘿嘿一笑，而我觉得仿佛正在等待我们的可怕的危险的预感也使她感到苦恼。我们一个拉着一个，艰难地往前跋涉。我们无法看到工事。在远处沙丘的上空，我们的左方，突然射出象箭一般的一道细光，然后扩大开来，变成云层上的圆点，接着便消失了。

“他们在搜索英国飞机，”安说。

我们磕磕绊绊勉强拖着步子往前走。探照灯又亮了，它的光束突然改变了方向，似乎打算探清地面。

我觉得这是一种卑鄙的嘲弄。

“这些下流胚，”我小声说。“他们仿佛知道，我们走到这里……同志们，快趴下！”

我们趴在地上，而探照灯射出水平光束，开始探寻。

我们趴着向四周张望：青灰色的夜色中呈现出德寇的炮台，大得象玄武岩的山岭。

“哟，”金卡忍不住爬起来。“哪怕再躺一分钟，我就冻在地上了。”

“我们再等等保罗的信号，”我建议说。

“他早就应该到这里了，”安说。

“他不会忘记我们要来的吧？”金卡问。

“你想得倒美，”安发怒说。

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块儿，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样至少可以暖和些。我根本想象不到我们现在呆在什么地方。也许，我们脚下已经不是路了，而我们沿着混凝土工事旁边的地方瞎碰着走。也许，保罗已经站在我们无法看到他的拐角处，给我们发过信号了。我什么也没对姑娘说，但是想到这一点，我又感到软弱无力，感到恶心。我仿佛听见飞机在某个地方发出嗡嗡的声响，虽然风在四周怒吼，盖过了海鸥的叫声。我又看了看表，发现我们在路上一共才一刻钟，而我觉得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你们听到什么了？”我终于紧张得忍不住问道。

“没什么，”安回答。

“不知道，”金卡说。“好象有人在工事里唱歌。”

“如果这样，”我说，“那就是说，门开着。歌声不可能透过墙

传到我们这儿。”

我们竖起耳朵听。我开始相信金卡说得对。某处响起了人的声音，听不清的德国人唱歌的声音。就在这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在目标近旁了。一道亮光透过缝隙闪了一下，在漆黑的夜暗中出现了闪动的微光，接着传来了几声枪声。枪声在空间发出一种空荡荡的回声，并且迸散出灰白色的火花。

“天啊，是烟火！”金卡大声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幸福的圣诞节，”我回答说。

“太好啦，”安说。“他们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

“优质的法国白兰地！”金卡补充说。

“现在他们朝空中开枪，这没什么，”我说，“只是多耗费了我们一些时间。这些喝得烂醉的坏蛋走掉以后，我们和保罗就可以干我们的事了。”

我们观察和倾听着。黑暗中某处又闪现出浅红褐色的亮光，又是一声枪声。这一次传来了不太刺耳的笑声，可是传来的喊叫声则更响。

“他们所有的人马上要上街打架了，”金卡说。“记得吧，安，那次我们站在巴雷富特斯特拉特大街上的小酒馆后面的时候……”

“嘘，轻点！”我制止她们，“那里出事了。”

喊叫声没有停止，尽管天已经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竭力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终究没弄明白。这种情况继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喧嚷声停了下来。

“这是在吵架，”安说。

“大概喝醉的士兵想上街，他们遭到了训斥，”我解释说。

“事情不好，”金卡说。“他们现在可能会加强警戒。”

"我们还要等吗?"安问。

"暂时没有直接危险……"我回答。

我们继续互相取暖，每个人依次站在中间。我们的眼睛一刻也不离我们面前显得巨大的，由工事形成的阴沉沉的山。不久那里不知什么东西真的闪了一下，那是手电筒的胆怯的光圈，这光圈是那样模糊和微弱，只有我和金卡发现。

"这是保罗的信号!"我们两人同时喊了起来。

"我什么也没看见，"安说。

可能，这时我们三人都闪过同一个念头。要是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圈套，那怎么办呢?可能保罗正在搞弹药，意外地碰到了敌人，敌人逼迫他说出秘密。也许**他们**利用我们在维耳曾商定的暗号，把我们诱得更近些……尽管我们内心疑虑重重，但是仍然没有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们悄悄地一步一步接近工事，紧张地注视着那个很小的光圈出现，然后又消失的地方……当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一个身影时，我们呆住了。这是个身穿短上衣，头戴无檐帽的水兵，他的肩后露出一支短卡宾枪。

"Ihr seid da ja? Komm, komm, alles steht fertig."①

"出什么事啦?"我问。我听出是保罗的声音，感到轻松了。

"Betrunkene…Krawall…Schnell, schnell,"②他一边轻轻地把我们推向前去，一边说。

我们没有反对他把我们推向前，但是我一刻也没有放下手中的枪，并且希望安和金卡也别糊涂。保罗不停地压低声音说道，"快，快，"并且显得很焦急不安，我很理解他，但是尽量不受他的情绪的感染。

---

① 德语:"是你们吗?走吧，走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② 德语:"他们喝醉了……一片混乱……快……快……"

"Die Mädel?"①突然传来了另一个抱怨声；从黑暗中走出第二个水兵。仿佛这是一幕在只有影子的空间演出的戏，这些影子模模糊糊地挺立在夜幕之中。

"Sind da,"②保罗回答。

第二个水兵和保罗一样戴着无檐帽，背着卡宾枪。他张开双手，让我们停下：

"Stehenbleiben! Genau so. Nicht mucksen. Wir bringen euch die Patschdinger schon hier…"③

保罗和另一个水兵往回走去。我们顺从地排成短队站着。我仍然疑虑重重。要是这一切都是暗中安排好的，要是他们回去领人来抓我们，那怎么办？我极力赶走饥饿的肚子所引起的苦恼，并且紧紧握住手枪。

"记住我们的约定，"我说，虽然我很不想说这话。"要是发生什么事……"

但是目前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仿佛觉得已经等了好久好久，实际上保罗和他的同事离开最多不过五分钟。他们肩上扛着黑黑的大口袋回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听到了沉重的喘气声，虽然还没看到他们的人影，于是我立刻想到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在我们把弹药放到我们自行车挂包里之前，我们得扛着它们走到窝棚。

一包沉重的东西坠落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响声，我听到保罗同伴的低低的埋怨声：

"Herrgottssakra! …Du machst ja einen Heidenlärm,

---

① 德语："是姑娘们吗？"
② 德语："是她们。"
③ 德语："原地站着。就这样。别说话。我们把响炮给你们扛来。"

Mensch! Müssen die da drinnen uns hören."[1]

保罗已站在我们面前。

"Konnte nicht mehr…So eine Felsenlast…Die drinnen hören nichts.Die lärmen schon wieder…"[2]

另一个水兵把自己的弹药放在保罗的口袋旁。

"Glück auf mit der Schiessbude,"[3] 他不满地埋怨了一句。说完他立即往回走，并且消失在黑暗之中。保罗没有走，他不好意思地干咳了几下。我们看看口袋，现在安和金卡似乎明白，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小心谨慎地在这陌生的地方扛着这沉重的货物往回走。要步行半公里路……要是突然遇见某个人呢？在这个地带的路上如果有两条腿的动物，那就是德国鬼子。

"Tut mir leid,"保罗说，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很乐观，也不很坚定。"Muss wieder zurück.Damit man keinen Verdacht…Husch!"[4]

说完，他就消失了。我们站在黑暗中，海风里，禁区内，我们脚边还放着五十公斤的货物。金卡恨恨地骂了一句。

"我们怎么办呢？"安问。

"当然扛罗，"我回答，"要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扔在这里，那保罗和另一个水兵就会吃苦头的。"

"好像真是个了不起的损失！"金卡埋怨说。

"不是很了不起，"我同意说。"但是维耳曾的人们正等着这些东西。"

---

① 德语："见鬼，你这小伙子，声音这么响……怕那儿的人听不到吗？"

② 德语："再也扛不动了……这么重的东西……他们在那儿什么也听不到，他们仍在大吵大闹呢。"

③ 德语："祝你们在靶场上成功。"

④ 德语："很遗憾……我该回去了。免得引起怀疑……嘘——！"

安已经跪在这一大堆黑呼呼的东西旁边。她仔细观察了一番，说："是盒子，装在麻袋里……没什么法子，我们必须重新分装一下。分成大袋和小袋。我们一个人背小袋，两个人扛大袋。"

她几乎是用手摸着把货物一分为两。金卡帮助她。我放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工事，留心它的动静。周围一片寂静，伸手不见五指。

"帮我抬起来，"安请求说。她试图把小一些的一袋货物扛在自己背上。我和金卡托起这袋笨重的东西，放到她的背上。她朝我们点点头，沉重的货物使她摇晃了几下，她深深地呼吸了几下，站住了。我从她黑呼呼的身影看出她是多么的费力。

"现在扛我们的，"金卡说。

我们咬紧牙关，喘着粗气，手忙脚乱地想把口袋放到自己肩上。我们弯曲起身子，动作十分艰难。过度的用劲只产生一个良好的结果：过了约两分钟，我们就感到很热。金卡不时冒出几句荷兰海员骂人的粗话。最终我们能够稍微站稳些了。放子弹的口袋背在我们的背上，我们双手在背后交叉着托住口袋底部。我们终于能够上路了。安走在前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往回走。黑暗中一切仿佛都是千篇一律的，染上了同一种颜色——纳粹分子喜欢的深灰色……我们步履艰难，一步一滑，磕磕绊绊，而且互相碰撞。我简直觉得，我的手和背上出现了青紫斑。与现在相比，我们刚才去工事的路上仿佛是一种愉快的散步。是我们自己把这可怕的担子强压在自己身上！我不止一次克制住想说的话："我们把东西放在这里，雪会把它们掩盖住的……"

我没有说出这句话。我不能使这些弹药听其自然而损害自

己的名誉。对我们来说，它们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值得我们遭这么大的痛苦，冒这么大的危险。金卡没来得及向我们说完，她看到了标志艾梅登渔港外部地区的第一排木头建筑物，突然我们又看到前方云层里那明亮的，急遽移动的探照灯的光柱。

“我们只差这个了，”安说。我仿佛觉得，她的嗓音象哭坏了一般。在这之前，她一声不吭，虽然她一个人扛着二十公斤的东西。探照灯熄灭了，然后又亮了。我感到极端恐惧，怕他们又采取横向搜索地面的手段。我的恐惧不是无根据的：一道光柱突然落下来，几乎是刹那间，然后又缓慢地从海面移向陆地深处。

“把东西扔在地上！……”我命令道。“探照灯！快趴下，脸朝下！……”

我本来可以不说这些话。安已经扔下口袋，我和金卡几乎同时放下我们的口袋。两秒钟后，我们挺直身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探照灯寒冷的蓝光就象北极光似的从我们身上掠过。然后触及木棚子和废弃的小作坊，这些作坊后面是包装鲱鱼的房子，我们的自行车就停在那里。我又清楚地记起我们该走的方向。金卡好象抬起了头。

“趴着，趴着，”安小声说。“也许他们发现了什么，还要照射我们的。”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我们满身大汗，贴在象石头般坚硬的地上，趴着，直到寒气又侵入我们的肌体。这时我们费劲地站起来，摸索着寻找口袋。其中一个口袋因掉在结了一层硬壳的土地上，震裂了。二个弹盒散开了；我们绝望地咬紧牙齿，摸索着拾起散落的子弹。一切都无声无息地摸索着进行。我真想哭。为了搞弹药，我们在这禁区内，在伸手不见五指，零下十度的寒夜中，顶着刺骨的寒风进行这次夜行军。就是在地狱也不可能

吃现在这么大的苦。

我们终于又站在一起，手里抓着两只口袋，口袋里的东西我们粗粗地整理了一下；我们把碎弹盒里散落出来的子弹分装在我们风衣的口袋里。

“我再也不扛了，”金卡说。“我的背酸痛死了。”

“那么拖着走，”我建议。

“不，我们不拖，也不扛了。”安反对说。“我们留一个人在这里，看守着口袋。其他两个人去推自行车。这最多花不了五分钟。”

“我们事先怎么没有想到！”我懊悔地说。

“那就走吧，”金卡催促道。从她那模糊的身影和硬纸盒的破裂声中我断定，她坐在装弹药的口袋上。“我留在这里。我恨死德国人了，来一连德国人我都能打退。”

我和安去寻找包装鲱鱼的房子。这也不那么容易。黄昏时那里还能看到维谢尔的姓。而现在是深夜，我们眼前只是一团漆黑。我向四面摸索；在寻找那扇一推就会倒的门的时候，我们碰到墙上。我们闻着空气中是否散发着鱼味，我们摸索每个棚子。我听到安的呜咽声和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声。她显然在克制愤怒和疲劳的泪水。

“以后什么时候还想让我去啊……”她说。

我什么也没回答她，但是心想：安说得对。突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但我立刻就驱除了它。显然这个事情有点不合适。尽管我精疲力竭，感到十分难受，但我心中产生了模糊的疑惑，它执拗地萦回在我的心间。这时我的思路被打断了——我又撞到了一个木棚上，木门已倒在里面。毫无疑问，可以闻到腐烂的鱼味，而且这种气味越来越浓重了。

“安，”我高兴地说。“我们到了！……”

自行车停在木棚的深处，仍旧停在我们原先放的地方。我们把车推到外面，推到街上，这条街只能凭那些被来往的车辆压坏的，结上冰的肮脏和阴森森的雪堆才能辨认出来。我们又慢慢往金卡看守着弹药的地方走去。

“我以为，你们永远不会来了呢，”金卡说，她的牙齿直打战，声音很响，从她那颤抖的声音中我明白，她的神经也坚持不住了，尽管她不久前还让人相信，她能对付德国人整整一个连。

把弹药装在自行车的挂包里，这对我们来说是件习已为常的事，尽管在黑夜里，我们还是很快就把弹药装好了。我们骑在车上，晃晃悠悠从海岸朝艾梅登方向骑去。在我们互相提醒着越过闪着微光，向两边延伸的铁路轨道时，我才突然想到我们是在深夜，悄悄地在居民区骑行……某个地方响起了人的声音，有人在唱歌、叫喊、号哭。在这个地方还有更多的侵略者在欢庆圣诞节。我们越是往前走，传来的人声就越稀少；我已认为，我们现在保证不会遇见任何人，突然在卡捷姆勃罗特斯特拉特大街附近我们遇上一大群赴宴归来的德国人。一转弯我们几乎冲入黑压压的喝醉酒的大喊大叫的人群；我们在远处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风把他们的声音吹向海边。我飞快地从一个侵略者身边骑过，并且轻轻地推开他；他仰面跌倒在地，并且在我身后发出了野蛮人要干仗的嗷嗷叫。大概安和金卡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只是加快速度，避开令人讨厌的障碍——因喝醉酒而说话模糊不清的人。他们的喊声就像空包弹似的从我们后面传过来；不过能够听清一些喊声：

“Halt！Halt！”①

① 德语：“站住！站住！”

"…Verboten!"①

"Stehenbleiben…Wir schiessen!"②

我们把身子低低地俯在自行车车把上，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往前骑着。

我们后面的喊声变成了枪声。子弹从我们身旁飞过，在水面上响起了干巴巴的短促的回声，不过很像是纳粹分子在消遣解闷。他们还多次放空枪，显然是没什么目的；他们醉后的喊声在远处渐渐消失了。

"似乎他们的号叫声没有惊动邻近一些头脑清醒的老爷们，"安说出了我们大家担心的事。

我们慢慢地小心骑着车；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小松树后面的房子旁边，内心一直忐忑不安。只有下了自行车，我才感到累得要命。仿佛我浑身的关节都锈住了，双腿也失去了知觉。当我们用暗语叫开门后，我摇摇晃晃，扶着墙走进屋子。安和金卡跟在我后面，她们也精疲力竭，并不比我强多少。

楼下的房间里有八个人，阿连德也在那里。片刻间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们；仿佛他们惊奇得失去活动能力。过了一会儿他们赶紧在小炉子旁为我们腾出了地方。阿连德帮我们脱下风衣。有一个人跑去准备咖啡。其他的人跑出屋子，从自行车挂包里取出弹药，因为我无力地挥了一下手说："我们再也扛不动了……你们自己去拿吧。"

"也许你们哪怕能稍微感受一下这种滋味也好……"金卡补充说。

"顺便问一下，现在几点了？"安问，她头向后一仰靠在墙上，

---

① 德语："……不准通行！"

② 德语："停下……我们要开枪了！"

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

“正好是半夜，”阿连德说。

我感到惊奇。难道搞弹药来回总共才用了三个小时吗？……我的气力只够喝一个同志给我端来的热汤。我再也记不起什么了，和安、金卡一样坐在椅子上立刻就睡着了……我醒后又有了那种感觉，仿佛嘎嘎响的锈铁代替了我关节里的骨头和肌腱。我使了很大的力气伸直身子。已经是蒙蒙亮的清晨。炉子灭了。从隔壁房间传来了压低的声音。有时听到男人的笑声。廉价烟那呛人的气味钻进我们的房间。我回想起我们夜晚的远征便不寒而栗。我的表停了。我推测，现在应该是八点至八点半。正好一天又开始了。圣诞节的第二天。安和金卡还睡着……我突然感到孤独，感到内心空虚，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恶，这些感觉是那么强烈，这是我过去没有过的。我静静地坐着，免得惊醒两个朋友；除此以外，我很不愿意让我们旁边的男人们发现我没睡。

我就这样坐了很久，迷迷糊糊，若有所失，没有思维，也没有愿望，甚至不感到饥饿，纹丝不动地坐着。我听到某处的钟敲了九下，安和金卡不安地动起来，在不舒适的硬椅子上翻来覆去，眨起眼睛。她们看看四周，看到了我，接着像我刚才那样，发现睡醒之后一点也不舒服……她们刚说起话来，男人们就来看我们……

“醒了吗？”

“大概太需要休息，是吗？”

“昨晚你们的气色非常不好……”

如果男人们由于妇女的气色不好而说出同情的话来，那么她们的气色的确不好了。我高兴的是，昨天晚上我没细想，他们

为什么那样疑惑不解地望着我们。房间里挂着镜子，但是我没有勇气站起来照镜子。我大致可以想象出我的样子：凹陷进去的面颊、发青的眼圈；还有这染过的头发——它们的黑颜色逐渐有了越来越可恨的色差。

维耳曾人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在我们中间放了一张小桌子，给我们端来茶和放在炉子上烤过的面包干；甚至给我们每个人半杯牛奶。我们贪婪地吃着喝着，完全不考虑，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男人的眼里毕竟还是姑娘。只有在阿连德悄悄地和委婉地让男人们离开我们房间时，我才明白我们的样子极不雅观。

我们的肚子有些饱了，身子稍微暖和了些。我们打算回哈勒姆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们这儿，请我们抽烟，并对我们做出的功绩说了许多恭维话。

"这一切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阿连德感兴趣地问。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从我朋友的表情上我明白，我应该回答。

"以后告诉你们，"我说。"现在我们想回去……我唯一想知道的：先生们大概现在不在吧？"

我明显地强调了"先生们"这几个字。阿连德有点窘迫地望了我一眼。

"保利先生和其他人在家过圣诞节……"他显然想极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和自然。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回答。"好了，我们感谢你们，"我较温柔地补充说。

"我好象重新来到世上，"金卡说。

……在哈勒姆我与安、金卡告别，我费力地走到楼上护士的

那个房间，桌子上放着她的一张留条。她度假去斯哈根父母那儿，打算过了新年再回来。小房间又冷又不舒适。我又觉得疲劳了。我收拾好所有的被子，上了床，盖好被子，我感到又冷又虚弱，浑身发抖，就象生大病似的。

会　见

过了圣诞节，我独自一人前往维耳曾，我同安和金卡事先商量好，要去那儿汇报工作。保利硕士和卡普斯塔特工程师两人都在场，他俩的衣着一向是无可指摘的，举止也很得体。在场还有第三个人，头发剪得短短的，嘴巴很宽，一对耳朵与众不同，又大又红，两只小眼睛离得很近。这么丑陋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外表看来他远没有另外两位穿得雅致，但他的衣服质地好，我还发现他穿的皮鞋是硬底的。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没有像我熟悉的两位维耳曾人那样欠一欠身子，于是我痛苦地意识到，我的外貌再也不会使男人们……甚至这样一位长着招风耳朵的陌生丑男人产生良好印象。

“斯女士，”保利硕士把我介绍给他。“而这位是梅斯费尔特先生，斯女士。他的名字您自然是熟悉的。”

“这个人是从阿麦斯福特的集中营里营救出来的，”我心里想。接着我握了握他的手。梅斯费尔特终于从他的皮圈椅里站起身来，官腔十足地握了握我的手。

“应当承认，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说。

梅斯费尔特酸溜溜地笑起来。他的大嘴几乎咧到耳朵旁。

“可我知道你的名字，”他说。“你的父亲是我的同志，从前都是社会民主工党成员。”

“这么说，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啰，”我用最友好的口吻说。保利也哈哈笑起来；脸上带一道伤疤的工程师笑得嘴都歪了。

“斯女士来自哈勒姆抵抗委员会，”他对梅斯费尔特说，仿佛为我缺乏应有的风度表示歉意。“毫无疑问，她来这儿是向我们叙述，她同她的两位女友是怎样从艾梅登的混凝土工事里替我们搞到弹药的。”

“请坐，斯女士，”保利说。

我觉得，我现在坐在他们对面，他们对我的态度，比起我同安和金卡一起来的时候，显得更加殷勤。我在请我坐的椅子上坐下，接过递过来的香烟，答道：

“是的。我来汇报工作。”

保利硕士又一次朝自己写字台的抽屉俯下身子，从里面取出几只高脚酒杯和一瓶贴着商标的名葡萄酒。

“你同我们一起喝一杯，斯女士？”他在我面前举起大肚子酒瓶，说。

我摇摇头：“我不喝酒。”

梅斯费尔特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把自己的杯子挪到保利跟前倒酒。他撇嘴一笑，回答我的话说：

“清教徒的习俗加共产主义，这两样东西似乎是不可分割的……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守旧的老朽。”

他笑起来，嘴撇得更大了，并举起闪闪发亮的小酒杯：“祝你们健康，先生们……为了胜利干杯！”

他们一饮而尽。我静静地坐着，陷入了沉思，眼前纯粹是男人的礼仪。清教徒加共产主义，梅斯费尔特说。这么说，他们已经在说我们姑娘了，“他们究竟是怎么看我们的？”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再次感到烦闷，虽说我认为，圣诞节第一天的行动过

去后我已经平静下来。疑惑和痛苦的预感又一次折磨着我，我预感到这里有点不干净。我本打算详细向维耳曾人叙述，我们吃了多少苦头才把五十公斤弹药顺利送到维耳曾。可是我突然明白：这已不必要了。我们吃苦头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这一点。

虽说谁也没有向我提出请求，可我还是说了，说得简短而又枯燥无味。我们所遭受的痛苦，我避而不谈。在我说的时候，我自己似乎觉得是在叙述别人轻而易举的戏法，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我感到，梅斯费尔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保利两次赞许地点点头。

“勇敢的行动，”他说。“斯女士，我发现，您的汇报，像军人一样简洁，不够详细……可是我理解，一切并不像您叙述得那么顺利……请您实话告诉我们，你们没有遇到德国人吗？”

我的脸涨得通红。为此我生自己的气。我一边回答，一边强令自己逐一把三个男人打量了一番：“遇到过，不过他们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枪法又很差，所以我们没费多大劲就从他们身旁溜了过去……”

保利又笑起来：“我看，您根本不愿意把抵抗运动作为一种‘伊利亚特’① 向我们介绍……但我还是要对您说，我们这里从心底里对您和您的两位战友表示钦佩。我们认为向您表示感谢是自己的职责，对吗，卡普斯塔特？”

工程师点点头。

“甚至万分感谢……同时请您把这种感谢转达给您的朋友，好吗？”卡普斯塔特说。“你们有充分理由接受一个集中营的指挥权，”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更不用说来自盟军方面的奖赏了。”

① 古希腊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

我的脸又刷地一下红了。我一点儿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只想离开这儿，远离这间摆着几把擦得像镜子一般铿亮的圈椅和散发着名酒香味的办公室，远离这些男人。他们的衣服不怕淋雨，也没有那种缺少肥皂洗涤的臭味……

“指挥一个集中营？”我反问，并没有感到特别高兴。

“那当然，”梅斯费尔特说。“等取得胜利后，我们要把法西斯分子及其帮凶们遣送到感化营去。到那时候我们需要一支警卫队看守他们。一支严格和公正的警卫队。”

他已经是第二次提到“胜利”。他似乎对胜利充满信心。我在心里问自己，如果他什么事也不做，嘴上一个劲地谈论胜利，喝喝美酒，听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了解了解盟军和苏军又向前推进了多远，那他怎么去夺取胜利。

“战争一结束，”我仍用冷淡的声调说，“我有别的事情，我不愿为这些卖国贼浪费生命。现在就应该把他们从这里赶走，这是正确的……战争结束后，我的精力要得到更好的发挥……”

“比如说呢？……”梅斯费尔特问。

“在我们的社会里应该整顿好秩序，应该树立起新的道德准则，”我回答。“防止诸如纳粹主义这类丑恶现象重演……”

“我们大家都赞成这一点，”保利由衷地说。“我明白。您，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主动参加抵抗运动，是这样吧？您自然是想完成学业，大概您比其他许多人心里更清楚，必须在荷兰恢复法制和正常的政权……这些话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

“研究法律并不那么重要，”我说。“重要的是必须尽快真正地普及法律……”

我发现梅斯费尔特亲切地点着头。

“的确必须，”他插话说。“为了民主。为的是劝告少数人不

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荷兰人民排斥任何极端主义……在一些落后地区，譬如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极端主义用来解决一些问题也许适用。红色专制是一种特殊形式……就是这么一回事。极端主义在我们这里当然不适用。"

我心里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不相信，梅斯费尔特先生，在座有人能就荷兰问题作出某种断言或者预言，"我说。"我相信，为自己选择和建立起符合自己性格和利益的生活方式，这将是荷兰人民自己的事情。"

保利用拳头朝办公桌一击。

"真是一位法学家！"他赞叹道。"说得精辟，斯女士！请接受我的祝贺……可是，您当然知道，伦敦那边大概进展神速，他们已经制定出不久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在那儿，人们是从一旁观察这儿出现的局势，也就是从客观上去观察。您应当同意，在这一方面任何流亡政府都具有优越性。"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毫不客气地说。"可是，**我们**大家都在这儿，**我们**知道，这儿的人们想什么，盼什么……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工程师卡普斯塔特说，同时怀疑地冷笑着，"除了共同的愿望——驱逐德国鬼子。"

我不再说什么。我感到谈话不会有好结果。他们果然一个劲地诱我说出对那些事的看法。对这些事我宁愿保持沉默，如果要谈看法，也只能同自己的同伴谈。我看了一下手表，感到十分尴尬，我说哈勒姆有人等着我。三个人同时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认真而又彬彬有礼地同我告别。保利再次要我相信，他非常感激我们三位姑娘，接着他问，如果他送我一盒香烟，我不会见怪吧……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是作为奖励，”他解释说。“这样的事是无法付报酬的。这是我对您个人表示的敬意。”

我把香烟放到口袋里，走到楼下房间的门口，我向同志们挥手告别，然后就离开了。

圣诞节后，搜捕更加频繁了。从十五岁到六十岁的男人不敢在街上露面。即使有德国身份证也不管用了。德国鬼子把每一个落到他们手里的人的钱、手表和戒指统统抢走，然后再把人遣送到德国。如果工厂、火车和企业的运行只是靠从四面八方抓来的外国工人的奴隶劳动来维持（因为这样才能把最后一个操纵车床和火车的德国人武装起来，送到前线去），那么不难想象，现在笼罩在德国国内的混乱和灾难临头时的那种凄惶情形到了何种程度。我来到街上，看到的只是一些妇女和孩子。孩子们随身带着小锅和小桶，跌跌撞撞地朝免费的公共食堂蹒跚而去。公共食堂的一份汤已经从一升减少到四分之一升了。这是带点白菜茎、芜菁和甜菜味道的混水汤。这样的食物吃下去能使胃暖和半小时或一小时，往后就只能使人感到更难受。

我反复考虑着自己同维耳曾人的谈话。同我谈话的三个男人，无疑对战后我们国家的命运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老把“伦敦”这个字挂在嘴上。他们自然与海外那个政府保持着接触。能不能反对这种接触呢？当然不能。可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志们从来就没有这种接触呢？我们仿佛是些穷亲戚，众所周知，随时随地都受人欺负……不。我这种想法不公正。保利和卡普斯塔特真诚地感激我，对我们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只有梅斯费尔特一个人毫不掩饰地、粗暴地抨击了共产主义。那又怎样呢？他是属于把工人共产党人看作敌人的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属于那种正在被历史所抛弃的人……

我把在维耳曾指挥所里的谈话告诉了同志们。鲁朗特摆出这样一副表情，好像因为与维耳曾人没有任何关系而感到幸运。同志们抽完了保利送给我的那盒香烟，其实我也不打算留着自己抽。我情绪不佳，甚至比一年前我们小组被剥夺行动的机会时更加沮丧。我回想起，大约就是去年这时候我们收到了塔妮娅从比利时寄来的明信片……说心里话，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想到过塔妮娅。难道我变得那么冷酷无情了吗？难道战争的重担压得我们除了眼前要克服的艰难的道路外，什么也看不到了吗？我问自己，塔妮娅究竟会出什么事。如果她到了瑞士，那她一定会写信告诉我们，在几个月之前，这无论如何是能够办到的。可现在邮政业务糟透了，甚至从阿姆斯特丹往哈勒姆寄封信，也要一个星期……

饥饿的折磨日益加剧。鲁朗特说，他储备的食品快要完了，他打算新年之后减少小组人员及其家属的口粮。这个星期我第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快要死的人。其实，这个人——他可能有六七十岁了——已经死了。一天早上，我发现他躺在布拉威尔斯卡特的一棵树下，他的周围站着好几个人；他们同情他，但都爱莫能助，由于内心的克制而显得冷酷无情。我走上前去，问要不要派人去叫救护车。一个男人睁着一双饥饿的大眼睛，看了我一眼说："他现在已不需要救护车。这你自己也看到了。"

这时我才把躺在地上的男人仔细打量一番。他身上穿着一件旧大衣，一顶破圆帽滑到了他的鼻子上，脸的下半部蜡黄，布满了皱纹。

"也许应该把他从这儿搬走？"我问。

"是啊！"另一个人埋怨地说道。"我们能做的就是去通知警察局。现在经常有人死去。"

我让自己的同胞去通知警察局。我仿佛看到，他们将发黄的尸体放在手推车上拉走了。我以前在自己的故城也看到过穷人。当然以前穷人也挨饿。可是还没有一个人饿死过。现在他们正在死去。这是在富饶的哈勒姆，在荷兰。有好几个德国士兵从树旁、从穿着旧大衣和戴圆帽的死者旁边走过。德国鬼子甚至看都不看死者一眼。就在这个星期里，我碰到好几个警察推着盖着帆布的手推车。那些被警察拉走的尸体十分瘦小，以致使人不能想象，在帆布下面躺着的是人的躯体。在指挥所，同志们常常讲起类似的情况。老人和孩子正在死去。就象“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时期那样，鲁朗特和威贺尔想起了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的情形。在新年到来的前一天，在荷兰的纳粹头目仁慈地宣布，允许西部地区的居民到东部和北部省份收集粮食。这一官方消息是以保护人的激昂的口吻发布的，好象这是给予被占领的荷兰的濒于死亡的人一种极大的帮助。

德国鬼子的人道又一次得到表现……我们想象不出，怎样才能收集到粮食。目前只有一条道是通畅的，那便是水路。英国人就象兀鹫一样在我们领土上空飞翔，随时准备击沉任何运输船只。他们在空中难以分辨，这是给饥饿的荷兰人运土豆，还是德国鬼子给自己运给养。目前未必能够指望我们会发洋财……

就在那天午后，从“西班牙橡树”回来的路上，我发现有一个人步履艰难，从莱德塞法尔特方向走来。他确实拖着沉重的双腿吃力地走着，可是我认出了他。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感到自己是个不幸而又无能的人。我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冬天的景象——光秃秃的树干，灰蒙蒙的雪，像一块块发暗的冰块似的房子，所有这一切在我眼前旋转……我深深喘了一口气，奔上去叫

住这个男人。

“爸爸！……爸爸！……”在我意识到我在干什么之前，压低声音叫着。

父亲朝我转过身来。看到他那张消瘦的、惊恐不安的脸，我大吃一惊。我从来还不曾看到他身体如此虚弱。帽子戴到了他的耳朵根。他的下巴布满皱纹，缩在编结的厚披肩里。我看到他睁大了双眼，他举起一只手，另一只手吃力地拄着拐杖。我环顾四周，街上阒无一人。我鼓起勇气，走到父亲跟前，用一只手拥抱他，把脸贴在他脸上。我顿时感觉到，父亲的脸湿漉漉的。父亲用那只空手拍了拍我的背：

“我的孩子……”他终于说。“我的孩子……你瘦得很啊。”

“爸爸！你也瘦得厉害呀！”

我们彼此笑着，望着，忘记了我们俩都是苍白瘦弱的。我们只知道我们都活着。

“妈妈好吗？”我急忙问。

“你的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尽管她心脏有病，可她像男子汉一样应付着那些不幸……”

“那尤迪菲呢？”我几乎直截了当地问道。

“她在阿姆斯特丹，但愿她一切都顺利，”父亲低声回答。“我们离开这儿，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该在这儿站着。”

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去，顺着运河，朝宰尔斯特拉特方向走去。其实我们再也没有说话。我们为能在一起而感到幸福。当然，我们想提许许多多的问题。可是，主要的话我们都已经说了。父亲从一旁不时地打量我；这时我就紧紧握住他那只握在我手中的手。

“那你呢？”他终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关切地问。“你能行

吗?"

我两次肯定地点点头:"是啊，我能行，我生活在好人中间……我有吃的……你们按时收到口粮了吗?"

"常常收到，这真是太好了,"他说。"我们马上明白，这是你寄来的……或者你的朋友们寄来的。没有这些面粉和菜豆，你母亲和我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

我的心都凉了。忽然我想象到，我的父亲躺在街上，靠着树，已经变僵硬了；或者母亲躺在床上，瘦骨嶙嶙，虚弱已极。他们年岁还不算大，可是自从我最后一次在市立公园见到父亲后，他至少老了二十岁。他的手和肩，摸上去是瘦骨嶙峋的。他遇到我时心情如何？他轻轻地触及我时，又在想些什么呢？……

"你们是不是在为我担心?"我问。

他把自己的一只手——那么瘦小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亲爱的孩子,"他说,"我当然不能说，我们不担心……可是我们知道，你现在所干的，正是你的良心要你干的。既然这样，就不能让我们的处境妨碍你的工作……不过，你大概很困难吧?"

"我干我能干的,"我含蓄地回答。"我应该干的……爸爸，我们要惩罚德国鬼子。而且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在父亲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严厉的口气，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

"事情正在朝那方向进展。毫无疑问,"他断然说道。"俄国人已经进入奥地利领土，开始大规模进攻波兰，这你知道吗?"

"今天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我回答。"太好了……这么说，你们至今保存着收音机罗?"

父亲微微一笑，然而他的微笑就象一把刀子刺痛我的心。

"这是我们的希望和安慰,"他说。

我和父亲在街上走着，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可是所有大街都同样冷清，都令人不快。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解释我们的这次见面的：我又在哈勒姆住下了？……即使他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现在正在考虑别的事情。

“是啊，现在我和你在这儿走着，”他说。“以前，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段时间，我们经常顺着商店的橱窗徘徊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圣诞树。商店里，货物充足——应有尽有！……当时人们心情是快乐的，平静的。一年顺利地结束了……”

他不作声了。那些日子和如今凄凉的状况之间的差别是那么大，那么显著，父亲对此就无须多说了。我说：

“爸爸，再忍耐一下吧……明年我们能够自由地庆祝圣诞节……可能，我们看不到以前那种应有尽有的场面，可是不会有德国鬼子了！”

一个头戴鸭舌帽，帽子上系着头巾的陌生人迎面朝我们走来。他几乎是偶然发现我们，并且看了我们一眼。我觉得，他从背后把我们打量了一番。我立即醒悟过来，我太疏忽大意了。我同父亲若无其事地在哈勒姆漫步。很多人都认识他，他们会认出他；那么也能认出我来。要知道目前正在悬赏缉拿我的脑袋……

我轻轻地把头靠在父亲的肩上，说：

“爸爸，我同你见上一面，这真是太好了……替我多吻吻妈妈……现在我该走了。这儿太危险，对我们俩都太危险。”

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忧愁和理解的神情。

“是啊，”他小声说。“时间太长了，对吗？……亲爱的，我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你真的遇上了好人吗？”

“是的，遇上了非常好的人，”我回答。“哎呀，顺便说一句，

你应该再告诉我一件事情：你是否知道，一个叫梅斯费尔特的人？以前是个社会民主党人？”

“这个人？你也知道他？……嗯……大概，他的第一次演说是在他出生的时刻发表的。要是发表一通谈话能把德国鬼子赶走的话，那我们靠了他早已获得了自由。”

我听到突然对我在维耳曾刚熟悉的人的批评，微微一笑。我再次温柔地抚摩了一阵父亲的脸，这时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这样一个腼腆胆怯的女孩子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做出这样的动作。

“对梅斯费尔特先生根本就没有好的评价，”我说。“再见，爸爸……考虑一下我对你说的：我们一定会惩罚敌人。”

“你母亲一定很高兴，”父亲说，再次握紧我的手。

我明白，他打算做什么。他急着回家告诉妈妈，他见到了我，看来我又住在哈勒姆了。现在他们会不停地说起我——今天，明天和以后所有日子都将谈论我。他们只要想到我活着，我身边有好朋友，就会获得勇气和信心……我发现，我深深地动了感情，泪水蒙住了眼睛；睫毛经冷风一吹，粘在了一起。我绕道回家，一路上思忖着，我在过去的一年里老练了多少，独立活动的能力强了多少，信心足了多少……在路上我又想起了一件事：父亲没发现我把头发染了。我小心地把头发藏在毛线头巾下面……至少这一点使父亲和母亲避免不必要的伤心。

张贴简报

伦斯德指挥下的纳粹分子在阿登地区的进攻突然停止了。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盟军通过多次战役侦察已经查明，德

国人的进攻部队再也没有汽油了。他们同自己的“虎”式坦克一起被卡住了，看来陷入了被包围的境地。他们再也动弹不得了。

“原来如此，”我在指挥所里转述这一消息的时候，说。“现在美国佬可以开始包围这些‘虎’式坦克，把它们碾成粉末了。这么说，这一章已经过去了。”

“不，暂时还没有过去，”鲁朗特忧心忡忡地说。最近，他时常情绪沮丧、悲观。然而我十分理解这一点。他那高大强壮的泥水匠的身躯，因常常填不饱肚子而受苦，他的外貌难看极了。我们大家都瘦得脱了相，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可是我们对此全不在意。这一点在鲁朗特身上就特别明显，他瘦掉了好几磅。

“瑞典人建议把粮食送到被占领的荷兰来……这你已经知道了吧，鲁朗特？”我问。

他点点头：

“只是英国人不要袭击船只。”

“粮食还会从上艾塞尔和弗里斯兰运来，”我补充说。

“连着好多天我都听到这消息，可是粮食在哪儿？”他问。

“有非常好的消息，”我说。“你愿意我再把一切复述一遍吗？冯·伦斯德同他的‘虎’式坦克都陷在阿登的树林里。布达佩斯在燃烧；德国人打算向他的被围部队运送粮食，但没有成功。他们将被消灭……苏联军队到了维斯拉河岸，就要拿下对岸的桥头堡。在斯洛伐克，游击队正在歼灭德国残匪。在荷兰，户口簿正在秘密消失……”

鲁朗特严肃地点点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同样严肃地对我说：

“在多德雷赫特，这些匪徒攫取了从布拉邦特寄来给我们孩子的食品包裹……”

“这是真的，”我证实道，“可是，多德雷赫特的抵抗运动给了他们应得的惩罚：袭击了监狱，解放了八十多名爱国者……”

“可以想象，”鲁朗特说，“现在会得到怎样的报复。”

“最后的报复将由我们来进行，鲁朗特，”我说。

他终于抬起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他好像全身抖动了一下，就像一只从水里爬起来的狗那样抖动。

“你说得对，”他说，“他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坏蛋……忧虑使我烦恼，汉娜。”

“现在大家都为此痛苦，”我说。“可是，我在你身上没发现这一点……”

战报确实是这样报道的，以致我又振作起了精神。谈话又开始活跃起来。金卡心里突然闪出这样的念头：

“如果我们印刷简报，象《真理报》的简报那样，用几句话概括出最重要的消息，怎么样？为那些如今没有收音机或者不能收听消息的人提供消息？”

“对啊，”威贺尔嘲笑地说，打破了自己一贯的沉默，“然后在城里张贴这些简报吗？”

“为什么不能呢？”金卡说，“要是党允许的话……”

“您这不是去冒险吗？”威贺尔问，好像他刚刚才明白，我们胆量过人。

“金卡，”我说，“我们应该亲自去同党的领导谈谈这件事……我认为，你出的主意很好。”

就在那一天，我到西蒙那儿去了一次。过了两三天，在政治学习之后，我问他，关于我们张贴简报的计划，党的指导员说了

些什么，于是西蒙回答：

"会上大家都赞成这计划……当然这要冒很大的危险。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张贴简报——黑夜还是白天都有危险。这类事情的效果难以估计。然而这样做会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支持，这也就是你们的任务……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正在死于饥饿，而今年冬天情况将更加严重。"

"这么说，他们赞成我们的计划罗？"我又问道。"那我们可以酌情处理吗？"

"是的，可以，"西蒙回答。

我们很快搞到了黑油漆和刷子。油漆是我们以前给窃得的自行车重新油漆时剩下的，细刷子是鲁朗特向菲利普·莫年借的。每晚，我们印刷报纸的同时，有一个人准备简报。开始我们搞得不好，字母写得太大，因此纸上只能写下我们想写的报道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怎么也计算不出，每一行应该写多少字。可是，几天以后，我们找到了窍门。我们把简报卷成筒，连同一捆捆的报纸一起放在自行车挂包里。一个人随身带上一罐浆糊和一把刷子。我们骑车来到僻静的十字路口，跳下自行车，随便往什么房子的墙上刷上浆糊，贴上一张简报，用袖子捋平，然后不慌不忙地继续往前骑去。

我们很快找到窍门，学会了迅速而又大胆地张贴简报。两星期后，我们干起来快如闪电，现在我们采用另一种办法：一个人在自行车架子上把简报反面铺开，另一个人迅速地刷上浆糊，第三个人拿起湿漉漉的纸往墙上、往柱子上或者广告栏上一贴——我们想贴到哪里，就贴到哪里。对一些单独来往的行人，我们几乎不去注意。我们胆大起来。有一回，我们当着一个行人的面，在一个警察所侧墙的两扇窗之间贴上了自己的简报。那

个行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当简报突然出现在墙上时，他便走上前去，可是他刚朝它瞥了一眼，转身就跑掉了。另一回，我们把自己的简报贴在德国人的布告上面。从那以后，我们常用一些最新的胜利消息去糊掉德国人的布告、党卫队的招募宣传画、反英漫画和出自纳粹之手的一切招贴，这已成了我们的一种嗜好。

俄国人扩大了在维斯瓦河岸的桥头堡。苏联军队在上西里西亚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在菲律宾，美国人正在向前推进。伦斯德不得不派出自己的一部分部队去增援东线。在阿登，美国人冒着暴风雪正在慢慢地向前推进。

在一月的这些日子里，哈勒姆也常常下雪。如果不下雪的话，大白天我们就不可能那么容易张贴我们的简报。有时，我们贴完一张简报，留在原处，眼睛一眨不眨地观察着行人对我们报道的反应。有些人收住脚步，提心吊胆地环顾四周，看完简报就急忙离去。另一些人勉强拖着步子，从旁边走过，可能连简报都没有看清。偶尔有人低声读着我们的报道，偷偷地笑起来。有一回，在刚贴上去的简报跟前站着一个警察，他慢腾腾地，仔细地从头至尾读完了简报，然后把这张小纸从布告栏上撕下来……我们感到奇怪，我们遇到的困难是那么的少，几乎看不到人们有什么警惕。虽说这给了我们勇气，可是，尽管如此，我们去贴简报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忘记随身带上手枪。死亡的危险随时等待着我们。搜捕仍在继续。德国鬼子利用查户口来找人。在阿姆斯特丹，一些人自愿来到当局，显然是饥饿把他们逼到这一步——他们希望从占领者那里多得到一些食品，他们要求把自己编入服劳役者名册。他们为此受到了惩罚。抵抗战士立即开始跟踪他们。有一回，这伙人刚走出办事处，就响起了一排枪声，十个人倒在了雪地上。现在我们在每一份简报下面写上引

人注目的口号："荷兰同胞们！坚决拒绝到德国去干活！尽最后的可能互相帮助吧！"

大家在挨饿。鲁朗特做出了我们担心已久的那件事，他减少了我们的口粮。人们谈论瑞典运粮船，就象谈论远方的海市蜃楼。饥饿已经到了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程度。只要我们印上半小时的报纸，我们的眼睛就开始冒金星，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前，我们不得不坐下来长时间休息。骑自行车带着一捆捆报纸外出，对我们来说已成了一种折磨。我们稍稍减少了张贴简报的份数，虽说大家仍然认为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要是我们去维耳曾，那么到达指挥所时，几乎已是昏迷状态。他们每次给我们端来一盘食物充饥，可是，食物的质量远不如去年十二月份的。人们常为一个土豆，一小碗莱豆付出昂贵的价钱。现在路旁常常可以看到倒卧的尸体。我们看到墙旁或者路口咽了气的尸体，甚至都不下自行车。死人的皮肤发青，这证明是饿死的。我们看到一个人不自然地蜷着身子躺卧着，我们也就明白，这也是饿死的。

线索断了

跟以前一样，我们经常从维耳曾人那儿接到任务，把包裹和信件送出去。走在弯弯曲曲的和笔直的、好像没有尽头的路上，特别是在下雪天，是极其艰苦的。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休息：在旱桥下，在绿篱旁，在牲畜棚边，甚至在一堆堆的碎石旁，天知道我们在那些地方躺了多久。梅斯费尔特经常到维耳曾指挥所去，而且他总要为我们找些事情干。有时他坚持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去完成任务，他说，两个或者三个姑娘容易引起别人怀

疑。我们送的是什么消息，他从来不对我们说。我们也不问他。可是，有一回，他派安把一个包裹送给海牙一个叫哈泽的人。安按指定的地址去了，找了好长时间她才找到要找的地方。这个人原来是"保安部"的工作人员。安回到我们身边时，一副困惑莫解的样子。

"他们在开什么玩笑！"她生气地说。"与其用蹩脚的德语同一个企图大献殷勤的德国人费口舌，我还不如开枪……"

第二次我们骑车去维耳曾的时候，我对梅斯费尔特交办的任务表示了不满。遗憾的是他本人不在指挥所，可是，我问保利和卡普斯塔特，梅斯费尔特派我们中的一个人去找那个奸细，他有什么意图。卡普斯塔特责备地看了我一眼，而保利硕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关系，斯女士……"

"关系——这是个有吸引力的词，"我说。"我的朋友说：'我还不如开枪……'我也同意她的说法。"

"我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今后的任务既有轻松的，也有比较复杂的，"保利说。

我不由自主地重复了安的话：

"这是开什么玩笑？同德国军队中的人，海军中的人联系……这我还能理解，那里有被迫服役的人。可是，同'保安部'和党卫军分子联系……他们选择职业是自由的。这是一群不共戴天的敌人。"

卡普斯塔特的脸不知怎么拉长了，变得令人讨厌，那道伤疤也发白了。

"斯女士，"他说，"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评价你们的合作的。可是，我们没有任何义务向你们说明我们的意图和动机……因

为这是战争。”

“可我们是士兵，”我声明，稍微强调了“我们”一词。可是，我明白，他的说法是对的。

“恰恰如此，”他心平气和地说，似乎在肯定，我正确地理解了他想说的话。

“你们没有义务要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可我们十分希望你们能事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白白地浪费时间来听您的评论？”

我发起怒来，我感到受到了侮辱，可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离开了。我把同维耳曾人谈话的内容告诉女友们。她们也感到受了侮辱，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工程师的论点是无法反驳的。完成任务，事情也就完了。要不就事先拒绝接受。于是第三次有人说“开玩笑”这个词，这次是金卡说的。

“这些人在开什么玩笑？这与哈泽有什么关系？梅斯费尔特是怎么从阿麦斯福特的集中营里出来的？他们是从哪里弄来保罗的？”

“怎么，什么，为什么……”我说。“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抵抗委员会里就用不着提这一类问题。”

“不过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个子矮小的金卡挖苦说。

我们有一个星期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维耳曾。就在这一星期，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完成了最后的突破，这时候德国乱成了一团。柏林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转折时期来到了……

“他们也称这是‘转折时期’！”我们在哈勒姆的指挥所里愤慨地说。“他们的部队成千上万的被俘虏……缴获的物资不计其数。整个东线实际上正在崩溃。那些还在抵抗的部队，大多是向那些堵塞了所有道路正在溃逃的自己的士兵开枪，很少向

俄国人开枪……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对付俄国人了。俄国人有这样一种大炮，炮弹几乎能飞越半个波兰……这就是德国人说的‘转折时期’！”

就连鲁朗特也快活起来，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把胜利的简报贴到能够贴的各个地方。有一回，一个法西斯保安警察骑自行车追我们。这甚至是很有趣的。金卡开了一枪，把他的轮胎穿了一个洞，于是这个警察倒在雪地上，不过多半是吓的：他大概怕她再开枪。

在第二个星期，我们一起又去维耳曾，阿连德说，他得到命令不许我们再上楼，让我们留在“兵营”；要是有什么事，会通知我们的。

“哦，”我说，把目光从安身上移到金卡身上，然后又移到阿连德身上。“这是对不驯服的惩罚……”

阿连德困惑莫解地扬起了眉毛，于是我简要地告诉他，上一次我曾反对等级，或者更正确地说，反对这里的领导既利用我们的效劳，又对部下采取不平等的态度。

“凡事都应该有个规矩，”阿连德一本正经地说。可我不明白，他是否真这样想的，我似乎觉得，这话听起来太像德国话了。

其实同小伙子们一起坐在下面并不是那么不愉快的。同他们在一起，可以详细讨论军事战报，他们知道我们还不知道的消息：英国人刚刚炸毁了多德雷赫特的导弹工厂。

“可怜的多德雷赫特人，”我说。“开始，他们为怠工遭到了没完没了的辱骂，当时这些可恶的东西不肯起飞……这次的事大概也要归罪于他们了。”

“德国鬼子现在处处看到的是怠工，”一个维耳曾人哈哈大

笑起来。这是一个颧骨突出的小伙子。“也难怪……由于户口簿到处在消失，德国鬼子逮捕了警察局的两百名军官，准备把他们送到别处去。”

“户口簿反正会消失，”有人又说。

“遗憾的是，德国鬼子不能同时把我们人民都运走。”第三个人讥笑道。

“瞧你讽刺的，”阿连德说，“可是，德国鬼子从来没有隐瞒，他们确实想把大部分荷兰人放逐到波兰去，只要一结束战争……作为‘力畜’放逐去的。以便高等人——德国人——能迁居到这里，住进我们的房屋，在我们的土地上作威作福。”

“仁慈的上帝，”我说。“德国鬼子知道波兰，只是因为那儿燃起一场大火，要把他们这个急速膨大起来的庞然大物烧为灰烬……”

“说得好，”阿连德说。

我们又谈起了俄国人的进攻。谈起了苏联军队解放战俘营和死亡营时揭露出来的种种残暴行为。英国广播公司首次报道了党卫军分子为消灭犹太人而在波兰建造的集中营里的情况。要是以前我们对这些集中营中的可怕惨景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象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法西斯的骇人听闻的罪恶阴谋。水沟里埋着成千上万具叠在一起的尸体。毒气室昼夜不停地施放毒气。仓库里摆满了从被害人身上抢来的、按种类分得井井有条的财物。那些裸露着身子和半腐烂的无名尸体遍地都是。一座座实验室里，纳粹医生用犹太妇女进行被认为对大老鼠和猫都是太残忍的试验。大批的儿童被迫列队唱着歌走向毒气室。党卫军分子用早被抓来的犹太人的筋腱搓成鞭子毒打人们。党卫军的狱卒每夜在用犹太人人皮做灯罩的台灯下听古

典音乐。

所有这一切我都知道，而且亲自把消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然而，当我现在听到别人在大声讲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仍感到头晕。愤怒如同凝固了的熔岩，象刺不透的铠甲长时间地保护着我的心。可是，现在我成了一个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的人，开始像安和金卡那样时时沉思起来，而且现在，我感到自己面色苍白。我眼前出现了塔妮娅的身影，从维斯特博克监狱逃出来的那副样子。我本打算请求阿连德，看在上帝的份上谈点别的，突然上面请我们上楼去。

保利硕士、卡普斯塔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那里。没有把他介绍给我们，他忧郁但善意地向我们点了一下头，为此我断定，已经有人向他讲了，我们是什么人。

保利硕士和卡普斯塔特轮流说话，而第三个人边听，边赞许地点着头。原来他们需要我们帮忙，去消灭一个危险人物。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女人。我们彼此看了一眼，却什么也没有说。不过这个女人不是荷兰人，而是法国人，保利强调说。她叫舍瓦尔夫人，她是贝当[①]的拥护者，或者至少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她积极为德国效劳，然而在相当一部分荷兰人中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第三个交谈者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

"嗽，什么贝当希特勒，你们别去管他们……她是一个普通的间谍，一个告密者。"

"无论如何要干掉她。"保利说，"这种女人对我们的地下工作非常危险。应该干掉她，越快越好。"

我们没有吭声。大概我们三个人都在考虑同一件事。我们

---

① 法国民族叛徒，一九四〇年任总理，主持对德投降。

当中谁也没有向女人开过枪，就连在法西斯集中营里野兽般肆虐的女人也没有倒在我们的枪口之下……这么说，她真是一个间谍，一个告密者？

“你们不想说什么吗？”卡普斯塔特问，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

“暂时很难说什么，”我回答。“舍瓦尔夫人，一个法国女人，为德国人效劳的间谍……接下去还有什么？”

我们不认识的那个男人用手指不停地敲打着皮圈椅的边。

“是啊，接下去……”他重复了一遍。“不错。恰恰现在我们失掉了这个女人的线索。不久前她还住在赫姆斯特德。可是，现在看来她偷偷地隐藏起来了。不过我在哈勒姆的同事看到过她好几次，她不可能走得很远。”

“哈勒姆的同事？”我反问，同时装出毫无疑心的样子。我逐渐清楚了陌生人的身份。

“是的，警察局的……我是稽查，”他有点儿生气地说，仿佛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并且为此懊丧。保利和卡普斯塔特听到这样的表白，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们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我心里想：他也是一个警用手枪的供给者……

“要是我们不知道该上哪儿找这位夫人的话，我们还是很难采取行动，”安说。

“你们不是不止一次地跟踪探出了自己的牺牲者嘛，”稽查反驳说，在他的嘴角上出现了几道粗粗的皱纹。显然他很了解我们，而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出现在警察局的通缉名单上。就像那些被我们消灭了的人那样（虽然名单远不够完整）。

“以前我们至少知道，在哪儿开始寻找，”一直保持着沉默的

金卡说。

“我可以把她从前的地址给你们，”稽查说，他从自己的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写好地址，说：

“我一向十分敬重像你们这样的抵抗战士，在追踪敌人时，总有那么一股顽强精神。”

他十分肉麻地说了我们这一大堆恭维话，清楚地暴露出他的虚伪。保利和卡普斯塔特一个劲地点着头。

“我不怀疑，这一次你们也定会得手的，”卡普斯塔特说。他公然持这种态度，仿佛我们已经同意了。

我暗自思忖，是否利用眼前的局面，进行一次小小的“敲诈”，要求给几支新式手枪。上帝作证，我们本来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可是我放弃了这个打算。最后，我为此而感到十分骄傲。

“暂时我们不能说行不行，”我说。

“明天我来找你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你们，”安补充说。

保利硕士用感激的目光看了我们一眼。

“越快越好，”他说。“你们知道情况紧急：这个坏蛋每天都带来极大的危害……她接二连三地向占领者出卖我们的人。”

我们告辞了，每人得到一支老牌子香烟，就动身回哈勒姆，到我那寒冷的房间里去讨论如何答复。

“这么说，这些先生甚至同哈勒姆警察局都有联系，”安说。

“就是这个小伙子向他们提供警用手枪的。”金卡说。

“这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承认。

“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这个夫人？”安问。“要是她出卖他们中的某个人，他们马上就能把他营救出来。或许……”

“看来，他们很想找她算帐，”我说。

“他们完全像是想惩罚从前的党卫军分子，”金卡说。“难道那些人就那么危险吗？”

“他们掠夺荷兰人，”我说。“可是说舍瓦尔夫人是危害社会分子，这我还没有印象。”

“每一个法西斯都是危害社会分子，”安纠正了我的话。

我们就这样反复议论着。最后大家都认为，我们在这件事上追根究底得过分了。在其他场合，当需要消灭叛徒和附敌分子的时候，我们从未拖延和怀疑过。

“我们还是设法先查出她的踪迹，”最后金卡建议。她那年轻人的热情和猎奇心也激励着我们。

“我对自己也毫无办法，”安说。“我不过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罢了。”

我们开始寻找舍瓦尔夫人，方法跟从前跟踪寻找其他人一样。我们在赫姆斯特德找到了指定地址。我们做了一只不露任何破绽的包裹，金卡带着它去敲舍瓦尔夫人住过的房门。人家告诉金卡，舍瓦尔夫人早已搬走了。别人见金卡一副十分失望的样子，于是告诉她，法国女人搬到奥维尔芬的膳宿旅馆去了，可是具体住在哪个旅馆——不知道。

过了几天，我们带着一本膳宿旅馆的册子，骑自行车来到了奥维尔芬，在每一个编入册子的地方都重演了一次简单的包裹把戏。五个旅馆中有四个根本不知道舍瓦尔夫人。在第五个地方，我们听说一个德国军官带走了她，主人还为摆脱了这个外国女人——一个可疑的房客而感到非常高兴呢！

“‘带走’是什么意思？”我们问，“你们是想说，他逮捕了她？”

“大概不是吧，”人家对我们说。“她不是被逮捕；来了一辆汽车，她放上皮箱，高高兴兴地同一个小孩一起上了车。”

“同一个小孩？”我们反问，我们不知道她有一个小孩。

“是啊，她有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那个德国军官带走了母亲和孩子，从此没有人再听说过舍瓦尔夫人的事了。”

这一线索又断了。我们一边送《真理报》，一边窥视四周，有没有外表像那位法国夫人的——按我们的推测，她的外貌应该相当漂亮。我们不敢在维耳曾再露面；维耳曾人无疑已经等得不耐烦，因为我们在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发现眼前是一个谜，于是久久未去那里。

包　裹

纳粹分子对瑞典送来的粮食和人造黄油无法染指。粮食和黄油的分配，由红十字会负责。德国当局能干的，就是发发领取这些东西的票证。一个人半个白面包和半盒人造黄油。这份口粮在严冬饥饿的海洋中算得上是一个暖和的小岛……

寒冷的冬天持续着，仿佛天意真的帮助希特勒把灾难降到诚实的人们的头上。天气越来越冷了。梅斯费尔特委托我们送到海牙去的那只包裹还在我们身边。可是这在目前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坐在指挥所里，围着火光微弱的小火炉，唉声叹息着。在这寒冷的日子里，传来了雅尔塔会议的消息。三国首脑聚集在克里米亚，就跟当年聚集在德黑兰那样，讨论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

“结束了，鲁朗特，你听到这一消息了吗？”我们说，轻轻地推着我们那位老是情绪悲观的领导。他不知嘟哝了一句什么，然后对我们说：

“你们最好往下听。”

英国广播电台对会议作了详细报道，然后广播了在雅尔塔通过的决议。广播员庄严宣告，德国，德国民族将获得返回爱好和平各民族大家庭中来的机会。而德国军国主义自古以来的暴政和自古以来的侵略将要结束。德国军国主义终将消失。同纳粹主义一起消失的还有好战的贵族、武器制造者、将军以及自从德国存在以来旨在侵略欧洲的侵略根源——德国军队。

我们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被占领的欧洲，想着那些绞刑架，被枪杀人身后的墙壁，黑暗的牢房，集中营和毒气车。我们想到了那些因为没有木板做棺材、无法下葬的死者。尸体用块帆布、床单或破大衣一裹，放在带篷的三轮车上或者雪橇上运到墓地去。而那些掘坟穴工人见到死者亲属，常常先向他们索取一个面包、一小袋小麦或者一袋菜豆，然后再把铁锹插入坚硬得像石块的土里去。我们想到，我们被遣送到德国去的同胞的身价上涨了：德国保安警察每抓到一个人现在可得到五个盾。我们想到了那些载粮船，这是我们的同胞从特文特和哥罗宁根调拨到在荷兰的德国人的"要塞"来的，想多少给遭到党卫军分子搜捕和绑架的自己的同胞解除点饥饿……我们默默地坐在小火炉旁。由于严寒，窗户上的玻璃白成一片，变得模模糊糊的。窗外，荷兰的大片土地被厚厚一层积雪和冻结实了的泥泞所覆盖。我觉得，仿佛这一层硬壳覆盖着整个大地，人类在这一硬壳下面英勇战斗和死去，因为充满权力欲的一小撮德国人是这么安排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一个星期里，严寒把我们折磨得够呛，平静的天气总算出现了。虽说天气仍然在零下八度左右，不过风停息了。我们终于决定把梅斯费尔特的包裹送到海牙去；任务没完成，这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苦恼。我们决定这一次三

个人一起去。路上要不断碰到检查和搜捕，在万不得已的情下，得用手里的武器互相保护生命。

我们上路了，可是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走乡间小路，穿过赖亨胡克、莱文霍斯特、赖因斯布尔赫、福尔斯霍顿。我们不停地下车休息，就像我们在路上遇到其他一些骑自行车、推推车、推童车的人那样。不过，他们的人数并不多。

当我们到达福尔斯霍顿附近的弗利特水渠时，我们感到再没有气力往前走了。我们的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停下来，扔掉了自行车，车倒在堤坡上，然后我自己也躺倒了。安和金卡也这么做了。我们用不着开口说话，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心思。我们快要饿死了，对一切都无所谓，我们快绝望了。我躺在路旁，心里想：这么说，事情就是这样……只要你承认自己被战胜了，放下双手，两脚一伸，那么寒冷和饥饿就会完成剩下的事情……我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我真想懦弱地屈服于疲劳。接着我推醒了金卡。

“五分钟……不能再躺了。”我说。

看来金卡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又推醒安。我们彼此看了一眼，接着我又重复了一遍：

“五分钟，不然我们睡着了，我们的自行车就会被人偷走。”

安点了点头，仿佛一切都在点头之中……只是现在我才发现，她的脖子更细了。她那年轻漂亮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黑斑，由于饥饿金卡那张无所畏惧的脸变得更瘦削了。我们说“五分钟”，这就是说：不能屈服于疲劳，不能睡着……安也抬起身子，双手抱着膝盖坐在那儿。她说：

“你知道金卡口袋里的包裹包的是什么好东西吗？它就跟我上次带给‘保安部’的奸细的那只包裹一模一样。”

“这有什么好奇的？”我问。

“嗯……我想……倒是很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可是梅斯费尔特的事，”我说。

“这是抵抗运动的事情，”安更准确地说。

我们彼此看了一眼。金卡从自己的深口袋里掏出包裹。我们从四面打量着它；包裹不重，大概里面装着一只木盒或者一只硬纸盒。

“那好吧，”金卡突然说，“我来把包裹打开。”

“你怎么，疯啦？”安喊道，“不能干这种事情。”

“为什么？你自己也说，这是抵抗运动的事情……我们不是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吗。”

安用手托住腮，微微一笑。“也许你是对的，我当然感到好奇。”

“我也是，”我说。“来，金卡，打开吧，责任我们一起来承担。”

金卡朝手指哈了一口气，开始解绳子。她怎么也解不开。我们轮流朝手指哈气，轮流解绳结。绳结终于被解开了。刹那间我们打开了报纸，眼前出现了一只扁平的小匣子……“二十五支装”，我看到了标签；而在印着金质奖章和五光十色的商标之间写着一行“Flor de Havana”①。

“见鬼！……”安喊道。“是雪茄烟！”

“雪茄烟？”金卡反问，仿佛它们的形状以及木板和烟草那清香根本未能使她醒悟。“为这一点东西，我应当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吗？”

“难道这是抵抗运动的事情吗？向奸细和警察局稽查提供

① 西班牙语：哈瓦那之花。

烟草？”安说。

“这就是所谓的关系，”我嘟囔了一句。“我们维耳曾的朋友们能营救出每一个落入纳粹魔掌的人。他们利用战前的荷兰雪茄烟为自己打通了通向德国仁慈之路……”

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这一次是愤怒的泪水，在我疲倦而冷得颤抖的身子里燃起了以前那种精力旺盛的火焰。

“行了，金卡，”我说，“把一切重新包上吧……我们把雪茄给稽查布列斯肯斯先生送去，然后去找梅斯费尔特，请他作出解释。”

我们谁都不再感到疲倦了，我们又朝手指哈气，同时细心地捆好装雪茄的小匣子。我们继续赶路，拚命地踩脚蹬。抵达海牙后，我们找到了那个人的房子，我决定同金卡两人去找他。我们拿着小匣子，走到梅斯费尔特用卷烟纸写给我们的那间房子跟前。我们按了门铃，等了片刻，一个穿着毛线衣、黑色警裤和靴子的人把门打开了。

“是巴克尔先生吗？”我问。

他用极不信任的目光把我从头至脚审视了一遍，如果不说是瞧不起人的话。

“巴克尔？不是，”他简短地回答。“巴克尔不住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我叫布列斯肯斯。”

“那就对了，”金卡说。“有您的一只包裹，是从维耳曾带来的，您知道是谁给您的。”

这男人把本来只开了一条缝的门开大了，急忙说：“请进。”

我们走进一条很不舒适的、十分明亮的长廊，一些老式、但并不是很陈旧的荷兰房子里都有这种长廊。布列斯肯斯伸出一只手来接包裹。

“请把它给我……你们等一下……我看看，要不要回信。”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彼此看了一眼，开始等着。过了一会儿，稽查回来了，显而易见，他的手指不像我们的手指是冰冰冷的，也许他有一把漂亮的折叠刀。从他的脸色看，他很满意，尽管他竭力不流露出来。

“不用回信，”他说。“那就谢谢你们啦……”

他再次仔细地把我们打量了一遍，仿佛想弄明白，为什么他的那些维耳曾朋友雇用像我们这样衣衫褴褛的可怜的通信员。然后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张一盾的纸币，有些犹豫不决地把它递给金卡。

“也许……”他说，可没来得及把话说完，金卡就立即气愤地打断了他：

“谢谢！我们不收钱，我们是在为抵抗运动工作。”

说完我们就坚决地朝门口走去。我们一句话不说，走到安等着我们的十字路口，她询问地看了我们一眼。

“这个家伙想付给我们一个盾……为一匣烟付一个盾！”金卡说。

“不是，是为效劳而付的……”我补充说。

“不用回信，”金卡模仿警察的口吻，“哈！我们自己到维耳曾讨回信。”

现在，完成任务之后，我才感到虚弱无力。我们把包裹送到海牙，是出于对责任的认识和内心的愤怒。现在，我们站在海牙空荡荡的街上，感到疲乏，饥饿，无力自卫，我们不知所措地彼此看着。

“那个坏家伙还十分诧异，为什么我们的模样那么可怜。”我说。“这是从他眼睛看出来的……我们精疲力尽，却为他以及像

他一类的人送雪茄！现在清楚了，我们送到哈尔弗维赫、莱顿、弗里察去的所有包裹里装的是什么……那是雪茄！大米！香肠！……上帝知道还有什么！”

“我们总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金卡说，“口袋里藏着手枪，而警察却在搜捕我们……”

我们回头朝赖斯魏克，朝弗利特水渠，慢慢走去，我们已经疲惫不堪，心灰意懒，连自行车也骑不动了。

“如果现在保利硕士或者工程师在这儿的话，”安说，“我们会清楚，在哪儿可以放开肚皮吃一顿丰盛的午餐。我想，现在我们只好空着肚子骑车回去了。”

“骑那么多公里路……”我补充说。“不爱惜自己……”

这时，我第一次发现金卡在哭，她几乎无声地哭着，她那窄窄的背脊颤动着，她用一只手捂住自己消瘦发红的脸。

“金卡，金卡！……”我们安慰她。

她仍然捂着脸，压低声音说：

“如果我看到梅斯费尔特或者这帮家伙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就把子弹射进他的脑门里……我会射的，我一定会射的！”

我们安慰了她好久。她终于平静下来了，开始呼哧呼哧地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擤着鼻涕。我们默默地跳上自行车，又顺着弗利特水渠驰去。

天开始暗下来了，这时我们才到达阿顿豪特斯纳尔顿费尔特。休息打盹了多少次，同要命的瞌睡斗争了多少次，我们谁也没法计算。我们慢慢地骑着，好像在机械地完成乏味而又难熬的程序。似乎我们站在原地，而一座座房屋、一堵堵绿篱、一片片伐尽了的树林（上面只剩下些树墩和折断了的小树）慢慢从我们身旁闪过。在纳尔顿费尔特附近，我们听到身后有汽车微弱

的喷气声；煤气汽车就是这样扑哧扑哧喷气的。我们估计，一辆德国小卡车马上就要超过我们。卡车冒着煤烟从我们身旁开了过去；就在它超过我们的一刹那，我们看到在褐色的帆布篷下有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宪兵。他发现我们后，弯下身子，掏出一样东西，扔给了我们。透过发动机的扑哧扑哧的喷气声，能听见这个宪兵的嘲笑声。他朝我们挥挥手，就同卡车一起消失在转弯处。

我们下了自行车，安离那个宪兵扔的东西最近。她俯下身子，捡起面包——一只结实得像块黑砖似的士兵吃的面包。

“上帝啊，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过这种事？”她喊道。

最初的冲动使她举起面包，她要把它扔掉，扔到被冰雪冻硬了的草丛里去。我和金卡抓住她的手。

“你怎么，疯啦？”我气愤地说，“吃的总归是吃的！”

我拿下了她的面包，想把它掰成三块，突然金卡声音古怪地说：“这么说，你们没有看到是谁扔的面包罗……”

我们默默地盯着她。

“这是保罗！”金卡仍然声音古怪地说：“他穿着一套野战宪兵服！”

“保罗？”我们同声问道。安问：“是艾梅登混凝土工事里那个人吗？”

“他可是在海军里服役！”我说。

“我发誓，这是保罗，”金卡说。“除了他之外……野战宪兵队里谁会想到给我们扔面包？”

“看来，他在嘲弄我们，”我说。

“也许，可这只是你的感觉，”安说。

我分好面包，我们就吃起来，心里想解开刚刚提出的谜，结

果白费心思。卡车在远方扑哧扑哧喷着气。我们狼吞虎咽地嚼着，咽着。在最近几个月，我们第一次吃到了这么好的面包。这给我们增加了勇气和力量，使我们能冒着突然下起的小雪走完到哈勒姆的最后一段路。我们最后谈论的话题全都是我们在维耳曾认识的和突然更换制服的那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比斯霍普小姐……

第二天，我们要去领瑞典送来的面包和人造黄油，因此取消了去找维耳曾人的打算——我们本想要求他们就委托我们送一匣子雪茄烟一事作出解释。在指挥所，我们举行了一次类似宴会的聚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以上的食品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整个面包和一磅人造黄油。威南特把自己多得的一份让给了有孩子的鲁朗特，而威贺尔负责把我多得的那份送给我的父母。同时他告诉我，前几天，他给他们捎去了一些劈柴——锯开的铁路枕木。大家情绪高涨，开始我们想把一个白面包分成若干小份，慢慢吃，多吃几天，可是饥饿把我们折磨得苦透了，以致我们一口气就把整个面包都吃完了，连一点渣渣都不剩。特别使我们激动的是，这一天通过地下途径得到消息，两艘装着汽油和石油的船被抵抗战士炸毁了，天晓得这两艘船占领军从哪儿开到乌得勒支来的。在东线，德国军队的士兵大批大批地被俘：几万德国士兵放下武器，跑到俄国人那边。美国人终于把伦斯德的军队赶过莱茵河，挺进到了齐格弗里德一线。然而，同东线的战事比较，他们取得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在远东的同胞向前推进得更快，日本港口已处在美国轰炸机活动半径之内了。

当我们再次去维耳曾的时候，我们因雪茄烟而引起的愤慨的心情稍稍平息了。我们商量好了，暂时不提这件事，看维耳曾人还有什么任务交给我们。这一次，我们在下面等了半小时左右，而当我们来到楼上的时候，看见保利和卡普斯塔特在那里。根据他俩的脸色，我发现，他们有事要告诉我们：他们激动地（如果不是说洋洋得意的话）站起来。

“请坐，请坐，”保利硕士说。看来，为了说这件事，他点起一支节日的大雪茄。

“我们有那个女人的新消息……她叫什么，卡普斯塔特？”

卡普斯塔特不看我们，而看着自己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尖，说：

“舍瓦尔夫人。”

保利硕士继续用刚才那种热情的口吻说：

“舍瓦尔夫人……不错，别人是这样叫她的。不过，她的姓十分有趣，不是这样吗，斯女士？是啊，你们已经成功地探出了一个德国军官把她从一家膳宿旅馆带走了，不对吗？”

我们点点头。他停顿片刻，快活地笑起来，然后说：

“你们当然认为，这个男人……或者换句话说，舍瓦尔夫人是这个德国军官的情妇？错了，我的女士们，错了！根据我们的情报，他是她弟弟。”

他又停顿了一下，让我们尽可能感觉到新消息的意义。

“她的弟弟，”保利重复了一遍。“她原来是个德国人，战争爆发前几年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她姓舍瓦尔，是完全合法的。名字是法国的，而心始终是德国心，你们明白吗？关于舍瓦尔先生，更多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她的弟弟在美丽的城市哈勒姆为自己的姐姐租下了一套住房。他有时办完公事顺便去她那儿休

息。”

他又咧开大嘴高兴地笑起来；卡普斯塔特有点庸俗地咧嘴大笑，仿佛不大相信什么弟弟姐姐的传说，认为这一切全都是胡说八道，而我们尽可能笑得文雅些。至今我在这件事上没有看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这么说，任务继续有效罗？”我说，感到沉默下去会让人不愉快。

“继续有效，”卡普斯塔特承认。现在他端详着自己的手指甲，这些手指甲，我毫不怀疑，修剪得比我的指甲更漂亮。

我继续说：

“您说到您的情报，保利先生……我猜，您是从您的朋友保罗那儿得到的？”

保利和卡普斯塔特惊讶地望了我一眼。

“是啊，”保利拖长声音说。“难道每一次都要说出自己情报的来源吗？……这一次情况确实是保罗提供的……这你们感兴趣吗？”

我们三人都点点头。这两个男人更仔细地看着我们。

安急忙说：

“是的，这我们非常感兴趣……不久前，您把我们介绍给保罗，当时他还在海军服役，至少你们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当时他同水兵们一起在艾梅登的混凝土工事里……而目前，我们又看见了他，他穿着一套野战宪兵队的军服。”

保利和卡普斯塔特交换了一下眼色。卡普斯塔特点燃了雪茄烟，而保利笑得比平时更加亲切友好。

“别多心！我用不着向你们多解释，目前德国鬼子处境困难，人员不足……他们要把大量的士兵派遣到东方！因此他们

不得不——这是真的——把一批水兵派到警察局服役。我请你们相信，保罗立即自告奋勇去那儿。”

“他自告奋勇？”我们几乎同时问道。

卡普斯塔特俯身对我们说：“当然。要知道，保罗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嘛。他是在为我们工作，因此他要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情报。”

他说出这一点显得很不耐烦，好象在斥责我们，甚至带有点警告的口吻，仿佛他想说：你们什么也不应该再知道了。我们同谁合作，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一切都明白了。看来，安和金卡也明白了。

“这么说，是这么回事，”安说。

“是的，”保利承认。他仍然微笑着，不过这笑容好像凝固在他的脸上，已经显得完全不合时宜了。“好吧，现在‘回到我们的公绵羊上来吧’，或者不管怎样回到我们的‘牡马’上来吧……哈—哈—哈！这就是她现在住的小别墅的地址。这件事，我们当然请你们去完成罗。”

“顺便问一句，其他的任务办得怎么样啦？”卡普斯塔特问。“关于艾梅登和德里海斯的破坏者的事呢？这一点你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呀。”

我感到，我的脸涨得通红。我谁也不看，我的朋友也不抬眼睛，我说：“暂时毫无成果……这坏蛋的一条狗毁了整个事情。”

我叙述了我们的不幸、狼狗以及我们始终没见过的狗的主人，保利和卡普斯塔特一直听我说完，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等我说完后，保利说：

“遗憾……非常遗憾。也许你们晚一些时候还要再干这件事。这个人列在名单上，你们也是知道的……可是舍瓦尔夫人

更重要。那个人已经干完自己的事情，而她现在每天都在为害！”

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同我们大家一一握手，祝我们成功——示意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卡普斯塔特跟着他也来了这一套动作。

“我希望，舍瓦尔夫人身边没有一条狗或者一只别的怪物，”他说。

我们垂头丧气，心情沉重地回哈勒姆去了。

“最后那句话工程师当然是可以不说的，”金卡怀疑地冷冷一笑。

“我们只好再次去对付这个人，”安说，“保利说‘舍瓦尔’是个十分可笑的姓，实际上他指的是什么？”

“这个词的意思是‘牡马’①，”我解释说。“这不过是保利的一句平淡无味的笑话而已。”

“可我还以为，我们不用去找这个女人了呢，”金卡叹了一口气。“呸！我反对向女人开枪！”

“当然是这样，”我说。“可是，如果她把好人出卖给‘保安部’呢？”

就在那一天，我们去侦察弟弟为自己姐姐——一个法德双料女间谍安排的那所房子。房子在斯潘亚尔德萨列后面，方向朝着拜登斯帕尔涅；这是一座式样古老的别墅，按瑞士别墅的风格，用高高的柱子建造成的。花园里生长着针叶树和冬青树，有一座芦苇亭子。房子上的窗户解冻了——这对舍瓦尔夫人是很不利的，而且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周围人家的玻璃都冻得雪白的。我们骑车经过房子的时候，发现在通往游廊的梯子旁放着儿童雪橇，我的心紧缩起来。我竭力想尽快忘掉我看见的这架雪

① 法语中，“牡马”一词也念“舍瓦尔”。

橇。

我们在别墅后面的大街上对房子和附近的地形作了侦察。我们发现，从这个方向看，别墅正好被上面插满碎玻璃的石头墙挡住。就连房子前面的花园外界也根本看不到了，花园里有一条狗，但不是狼狗，而是一条牧羊犬。当我们骑车经过的时候，它在里面顺着围墙追赶我们，直到我们走远才停下来。

“根本不用考虑，从这个方向不行，”金卡说。

“四周都有花园围墙，”安补充说。“这位夫人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多好的住处啊！”

“我们去瞧瞧，对面有什么，”我建议。

别墅对面一座名叫“乌鸫”的小别墅；它的式样也是老式的，正面是一排窄窄的窗，侧面是一排法国式的窗。它的前面是一条用条石铺成的黄色小道。房子跟前生长着一丛丛的灌木和被白雪厚厚覆盖着的天蓝色的云杉。在这地方监视舍瓦尔夫人简直太理想了。

“可我们怎么进这所房子呢？”安叹息着。

真想知道，谁住在那儿，我心里想。

金卡那尖削的脸拉得更长了。我们顺着水渠往回骑。金卡说：

“维耳曾人应该帮助我们……”

“用什么方法？”安问。

“他们那个警察局稽查认识哈勒姆的稽查，”金卡说，“他应该设法让我们进入‘牡马’对面的房子。我们希望，那儿住的是正派人。”

我和安把这一建议考虑了一遍，开始我觉得它是不切实际的，可是后来我越想越觉得它是现实的。

“金卡，”安说，“如果这能办到就好了！”

“金卡，”我高声贼道，“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是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金卡谦虚而又自豪地说。

当天再赶到维耳曾去，时间已经太晚了，而且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也不值得。于是我们第二天到那儿去。保利不在；而工程师卡普斯塔特耐心而又仔细地听取了我们的解释。我们凭记忆给他画了一张别墅和那所房子位置的平面图，并且使他相信，监视哨设在“鸟鸫”里是唯一的办法——这将提供消灭女间谍的机会。现在只需一个条件：有人把我们带入这个住所。

卡普斯塔特也说：“很好……那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说出了金卡关于请警察局作中人的计划。卡普斯塔特看了看我们，好像想说，我们胆子真大，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说：

“是啊，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这里也有些困难……当然，今天我不能给你们最后的答复，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同他约好我们来维耳曾指挥所听消息的日期。在指定的一天，我们来了，在楼下只等了两三分钟。保利、卡普斯塔特、梅斯费尔特、还有我们已经认识的警察局的稽查一起坐在楼上。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稽查说，我们提出的计划证明我们机智大胆——这时金卡脸上泛起了红晕……已经同“鸟鸫”的女主人谈妥了。在那座老房子里只住着一个人，她是当地一位十分著名和受人尊敬的医生的女儿。这是一位已过中年的太太，性格有点儿古怪，但精力十分充沛，最主要她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维耳曾的稽查令人相信地说。她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消灭舍瓦尔夫人。从舍瓦尔夫人开始搬来，她就发现，那儿有点不正

常，而比斯霍普小姐决不是一个软心肠的人，特别在一九四〇年之后……

"大有希望，啊？"保利硕士问。

我们肯定地点点头。我问：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那里？"

"越快越好，"稽查瞥了保利一眼，回答。"这件事已经耽搁了……你们先到哈勒姆找我的同事，他知道你们，然后由他把你们带进比斯霍普太太的房子。"

我们商量好了：他怎么把我们介绍给女主人，对战斗行动怎么实行领导。这一次预祝我们成功的是四个人——其中包括梅斯费尔特。他比以往更加平静。我似乎觉得维耳曾人很满意。于是我心里又想：为什么他们这么急于干掉舍瓦尔夫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两天之后的傍晚我们已经进入了"乌鸫"。哈勒姆警察局的稽查这一次穿着便服，他把我们送到那儿。这个瘦削而十分阴险的家伙，似乎对能取笑我们，感到满意。有一次，他对我们说："要知道，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们！"这自然提醒我们，我们的名字列入了警察局的名册，德国鬼子正要抓我们。此后他还说了不少类似这样尖酸的俏皮话，暗示我们张贴过标语，搞过其他应受惩罚的地下活动。他把我们作为"三个著名的预谋犯"介绍给比斯霍普小姐。他狡黠地笑着，好像在暗示，他无论在这儿，还是在那儿，即无论在占领者那儿还是在抵抗运动里都有权力！他离开我们时，显然他对刺激了一下我们的神经感到十分满意。

比斯霍普小姐是个瘦高个儿。我不知道，她是由于吃不饱而消瘦的，还是一向如此。她穿一件深咖啡色的连衣裙，领口别着一枚老式的玛瑙别针。她的上牙是假牙，一说话就喀喀直响。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她戴着假发。两只饥饿的瘦猫偎依在她那穿着厚厚的黑色家常暖鞋的脚旁，呼噜呼噜着，咪咪哀叫不停。她领我们走进房间，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牡马”——这是我们给那位夫人起的绰号——的别墅。

“这么说，你们是抵抗小组的？”女主人问我们。“好，好，好……谁能想到，我们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不幸！就连年轻姑娘也迫不得已开枪射击……竟有这样的事！你们不要认为，我不羡慕你们，听见了吗？我真的羡慕你们。我相信，我父亲，你们知道，他是著名的比斯霍普大夫，你们的父母大概都熟悉这个名字……我说这干吗？对啦，我父亲也会敬重你们，他曾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优秀的爱国者……我记得十分清楚，当时他要我们提防俾斯麦，而对于威廉二世，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小心，从这儿下去，光线比较暗……老式房子都是这个样子：不大方便，但舒适！我决不离开这儿……瞧，就是这个房间……如果你们十分小心吹窗玻璃，那冰会逐渐融化的，从圈圈里你们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就这样吹……你们看清楚了吗？对，她就住在那儿，你们马上就能看到，这是一个品行恶劣的女人，因为她有煤！……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女人……这该怎么说好呢？你们是相当成熟的姑娘，——唉！——自从被占领之后，这种现象司空见惯……”

“一个德国娼妓，”安殷勤地提示道。

比斯霍普小姐忙把自己戴着假发的头扭向一旁，她的假牙又咯咯响了一声。

“您说到这一点，是啊……现在年轻人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惯了，这听起来刺耳，但是这确实存在……唉，这叫什么人！装出一副十分体面的阔夫人的样子，德国鬼子也是偷偷地到她那

儿去。但是，如果你们观察她两星期，你们就能知道相当多……你们应该好好理解我说的话。我不想斥责；但对这个女奸细，而且还是一个接待德国人的法国女人……Sans pitié①，决不宽恕！”

比斯霍普小姐又说了许多话，她认为有人到她家来，这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不仅如此，这是一次给人强烈印象的拜访，爱国主义的拜访，由于这次拜访，她今后能够报效祖国和抵抗运动。我们马上就明白，她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但她心地确实善良，她不害怕，心口如一，尽管老太太常常引用上世纪的事情来说明自己的意见。

舍瓦尔夫人

在冻得发白的厚厚的窗玻璃的冰花上，我们做了一个监视孔，轮流朝窗外观察“牡马”的房子。暮色很快浓重起来；在冬天灰蒙蒙的苍穹中，房屋的尖顶和别墅上的风向标隐约可见。对面房子点起了灯——我们看到，从一扇窗子里射出一条细细的金黄色的光束。几乎所有的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这时，比斯霍普小姐被两只猫围着，戴着腕套，用瓷托盘给我们端来了茶，并且问，要不要遮上我们的窗户。我们回答，那样我们就看不见舍瓦尔夫人屋里的动静了。我们在冰冷的房间里安顿好后，用手摸着从黑暗中依稀可见的硬木家具旁走过去，轮流在上了冻的窗户旁值班。当然，一切依旧。别墅里仍然毫无动静。严寒的街上出现过两三次过路人模糊的影子。我们甚至不敢抽烟，担心火光暴露我们，因为一抽烟就说明“乌鸫”里有人，而平时这儿

① 法语：不必怜悯。

不住人。要想推测"牡马"是不是站在遮住的窗户旁，注视着比斯霍普小姐屋子里正在发生的事，确实是很困难的……我第一个在窗户旁值班，安和金卡用头巾和大衣裹好身子，躺下睡觉了——一个睡在沙发上，另一个睡在几只宽大的矮沙发椅上，无疑这都是已故大夫比斯霍普客厅里的家具……值完班，我也躺下睡了，而天亮醒来后，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古怪的房间里。有镀金镜框的椭圆形镜子，有画，有写字台，织着天蓝色和金黄色的阿拉伯图案的地毯已经用坏了……安在窗户旁值班。我想起了一切，低声问：

"怎么样？"

安耸耸肩膀："当然没什么。她才不会在严寒的夜里出去呢！"

可怕的寒气从地板缝里，从潮湿的糊墙纸上冒出来，从打开的火炉里透进来。手和脸上的皮肤冻得粗糙发硬生痛。我不敢叫醒睡着的金卡。谁睡着了，谁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感受不到痛苦……至少不像醒着的人感到那么强烈。

八点钟，比斯霍普小姐来了，她又端来了茶。我在窗户旁值班的时候，安在比斯霍普小姐的小炉子上煮好了随身带来的两捧小麦米。我们与"乌鸦"的女主人共同享用这些粥……我们打着哈欠。天渐渐亮了。热粥只使我们暖和了很短的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我们打着瞌睡，不时地朝监视孔里看看女奸细的房子。我想到今天《真理报》印不出来了，而且我明白，这件事还不知道会拖延多长时间。

白天，在平时荷兰人吃早饭喝咖啡的时候，比斯霍普小姐敲敲门走进房间。

"你们不想同我一起吃点吗？……我按最好的作法用郁金

香块茎烙了饼……”

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儿不好意思，同时又为这一次能款待我们而感到自豪。我们接受了邀请，去吃她用郁金香块茎做的烙饼，轮流到摆着老式的荷兰椅子和挂着一盏枝形铜吊灯的小饭厅里去。我们用甜菜做的糖浆浇在饼上。我每咽下一块都感到恶心，但我还是一个劲地吃着，一直吃到消除了饥饿感。我看到，比斯霍普小姐吃得津津有味。她摆上了一套祖传餐具，拿出一套祖传银器，摆得整整齐齐。我感到伤心的是，用古老的盘子和贵重的银叉吃的却是郁金香块茎和作饲料用的甜菜。我和比斯霍普小姐还没用完餐，金卡奔过来说：

“她从屋子里出来了！她从屋子里出来啦！”

我一跃而起。比斯霍普小姐用戴着腕套的手按着假发，也跳了起来，急急忙忙跟着我们，而猫跟在她身后……我透过监视孔看了一眼。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正沿着铁灰色的花园围墙在街上走着。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件长长的卡拉库尔羔皮大衣和皮镶边的靴子。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带面纱的皮帽子，因此，实际上只能看到一张嘴——一张嘴唇薄薄的小嘴。她在雪地上小心地走着！

“对，这是她！这是她！”比斯霍普小姐说。她站在另一扇窗户旁，在那儿开了一个监视孔，朝外望着。不过，我没有再看舍瓦尔夫人。我一眼就发现，她不是一个人走着，她拉着雪橇，雪橇上面坐着一个身穿蓝色短上衣，头戴蓝色针织小帽的三岁左右的小男孩。我开口骂了一句，比斯霍普小姐好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突然跳起来。

“比斯霍普小姐，请不要生我的气，”我说，“可是您自己也看到……会毫无结果的。现在不行。”

我离开窗子。安和金卡又贴近我们重新开的一个小小的监视孔。比斯霍普小姐把她那两腮塌陷的长脸朝我转过来，几乎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理解……”她说。“这我没有想到……当然是由于这小孩，对吗？”

我点点头。安和金卡朝我们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

“不，”金卡说，“小孩在她身边的时候，我不愿开枪，孩子没有过错。”

比斯霍普小姐突然坐在老式沙发的边上。

“那该怎么办呢？……”为谈话所吸引的比斯霍普小姐问。

“等她单独一个人出来，”安回答。

她显然也不想开枪。我也感到十分讨厌，即使舍瓦尔夫人不带小孩出来，她仍然是一个母亲。我几乎又要骂出口来，可是朝我们女主人那背有点儿驼的颀长的身材瞥了一眼，我就不吭声了。比斯霍普小姐立刻躲进好不容易暖和起来的厨房里，显然她是不愿打扰我们。我们都避开不看对方的脸。“这个败类什么时候能一个人出来呢？”金卡故意粗暴地大声说。

“如果我们要等这样的机会，那就必须整天在这儿守着……”安说。

“这样她还会出卖别人。”坚定不移的责任感促使我提醒两位女友和自己。

……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闷闷不乐，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我们知道，必须消灭这个女奸细，可我们谁也不想朝“牡马”开枪。

“我们本不应该干这件事，”安埋怨。“我们最好去印《真理报》！”

“这个女人很狡猾，”我说。“她利用孩子作避雷针。请相信，她的居心不良。”

“可能是这样，”金卡同意。“可是无论如何……我本来以为她根本就没有孩子。”

冬天那阴沉沉的日子过得特别的慢。舍瓦尔夫人腋下夹着买好的东西，早已回家。穿蓝上衣的小男孩坐在雪橇上装马车夫，高兴地直嚷嚷，舍瓦尔夫人笑嘻嘻地望着他。这时我不再朝窗外看了。

当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仍坐在一起，显得比刚才更加痛苦和不幸。整整一昼夜过去了。比斯霍普小姐由猫陪同着端着茶又来了，然后我们从口袋里抖出最后一点带来的小麦，给自己煮了晚上吃的粥。夜幕降临了。一辆铅灰色的德军汽车无声地滑到舍瓦尔夫人的屋前。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影子走进围墙门。雪在靴子底下低沉地嘎吱嘎吱响着。那个人敲敲窗子，发出信号。我们没看清，门开了没有，不过德国鬼子的身影不见了。

这天夜里，我们取消了换班观察。当一个德国鬼子留在“牡马”那儿过夜时，值班就毫无意义。清晨，天还没亮，汽车驶离房子的声音使我醒来。我朝自己冻僵了的双手哈气，由于冷得瑟瑟发抖，我把两只冻僵了的脚相互揉了一会儿。然后我又打起瞌睡。当我再醒来的时候，更是冷得受不了，全身都冻僵了。安和金卡已经醒了，坐在那儿，茫然望着。她俩的脸上流露出怀疑的神色。

“我感到十分遗憾，金卡，”我咽下了少得可怜的早点，说。“你的计划很好，然而干起来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这儿只是白白消磨时光……最好回维耳曾去，干脆说这个任务无法完成。”

“我最讨厌干这种事，”金卡说，“为什么偏偏我会想出这种事！”

“今天我们再在这儿等一等，”安建议。“如果情况毫无变化，那么天黑我们回家，这件事我们不干了。”

我们决定再忍耐一天，老老实实地忍受寒冷和失望的折磨。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舍瓦尔夫人呆在家里，而如果出门，就带着孩子，这样就可以躲过我们的子弹。我们仍然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着瞌睡，甚至懒得去监视对面的房子……可是，她没有躲过……第二顿早点我们还是吃那些烙饼，尽管用来做饼的郁金香的块茎本来应该种在荷兰的土地上，让它们发芽。早点之后，比斯霍普小姐奔过来。她确实在使劲奔跑，她身上的一切都飘动起来，滑到后脑勺上的假发也在飘动，那副模样真难看。

“她出门了！”我们的女主人贼道。“就她一个人！我正好从更衣室的小窗里朝外看了一眼，看到她正走着！”

我们相互碰撞着，朝监视孔跑去。正好还能看见舍瓦尔夫人；她还是穿着那件皮大衣，那双靴子，那只短纱面罩。真的，她是一个人。我们彼此对看了一眼，比斯霍普小姐望着我们。显然她在想，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跑到街上，拔出我们的手枪朝正在离去的女奸细的后背射击。可是我们装作没发现她的目光。

“我们该怎么行动？”

比斯霍普小姐举目望天，又悄悄离开，以便让我们自由抉择。

“按规矩办……”安说。“我们占据街的两头，就是说在两头巡逻……因为我们不知道她从哪一头回来。”

我们沉默了片刻。

“我们真的要开枪吗？”金卡终于十分胆怯地问。

“是的，”我回答。两个姑娘看了我一眼。这时，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比她俩年长。于是我故意果断地说：“是的。她是敌人。需要这样做。”

“好吧，”金卡说，同时坚定地紧了紧腰带。

我们同比斯霍普小姐告别。我们说，现在事情大概要成功了，可她无论如何不能呆在窗户旁。我们向她表示感谢，握了握她那只戴着腕套的瘦骨嶙嶙的手。

“我真的给了你们那么一点儿小小的帮助吗？”她用颤抖的声音问，看上去显得苍老而可怜。我们抢着使她相信，她给了非常宝贵的帮助。我们离开“鸟鸫”的时候，两只饥饿的猫偎依在我们的脚旁。

金卡说，她到靠斯帕尔涅的那头去观察，我和安没有反对，留在斯潘亚尔德萨列那一头。我们骑在车上不安地绕着圈子。我们甚至不敢把自行车停靠在树上，以便稍微活动活动身子。尽管街上阒无一人，但是扔下自行车没人照看不行。有时我们看见金卡在街的另一头。我激动不安，浑身颤抖着，感觉到我的心脏像神经质地——时而快，时而慢，时而沉重地跳动着。虽然我自己挑起了这副重担，但是一连串的疑团不停地折磨我。如果打死她，我们是否做对了呢？因此，当过了一个半小时金卡突然出现在两排房子之间，向我们摆摆手的时候，我松了口气。我们骑在自行车上，刚才我们终究还是冒险把自行车在树下放了一会儿。我的手冻僵了，几乎都感觉不到车把。隐隐约约的疼痛压迫着后脑勺……

“我们迎上去，”我好不容易说出来。

安点点头，看着自己前面的大街。我们踩着脚镫，从“鸟鸫”和别墅中间穿过，朝金卡迎上去。金卡奇怪地站在那儿，犹豫不

决，好像不知道往哪儿骑，似乎她想尽快溜掉。然而，她看到我们勇敢地向她靠近，她大概冷静下来了，于是她掉过头去，好像在给我们指路。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舍瓦尔夫人。她走着，把鼻子埋在卡拉库尔羔皮领子里，她踩在冻硬了的雪地上的脚步声响亮而又清晰。我和安在她走的那条街的街角下了自行车，而金卡从她身边骑过去，突然她跳下车。这时，舍瓦尔夫人似乎有所发现，感到不妙。她停下脚步，迅速抬起惊恐的眼睛，看看安，看看我，我们站在那儿纹丝不动，手插在口袋里。然后她把目光移到金卡身上。突然她拔脚就跑。无论是安，还是我都没有动。金卡一蹬脚，掉过自行车。这个穿皮大衣的女人已经夹在我们之间。现在问题在半分钟里就能解决，只要采取一下既定的行动就行了。舍瓦尔夫人第二次停下来。当安和我几乎同时从口袋里掏出手枪的时候，她那张嘴唇薄薄的小嘴可怕地张着。两声沉闷的枪声在屋宇的墙间和斯帕尔涅水渠的冰上回荡。枪声尚未沉寂，紧接着又响起了两声枪响，这是金卡打的。

一切不同往常。平时我们杀人后，总是设法尽快离开。这一次，我们三个人都继续留在原地。我们看到眼前的情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枪响的时候，舍瓦尔夫人不喊不叫，身子朝前倾斜，然后倒了下去。她一动不动躺了一会儿。后来发生了我们谁也没料到的事，并在一瞬间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一切自然规律不复存在了。她站起来连头也不回，朝自己的房子跑去。她越跑越快。她的靴子踩在人行道的坚硬的雪地上的声音，在屋宇的墙壁之间发出低沉的回声。

我们相互凝视着。忽然金卡大声说：

"快走，离开这儿！整个街区的人都站在窗口看着！"

她的声音比其他的东西更快地使我和安从发愣中清醒过来。我们跳上自行车，拐进另一条街，顺着胡同驶过斯帕尔涅，驶过滑冰场，朝哈勒姆公园方向急驰而去。

"你明白吗？"又传来了金卡的声音。"这些该死的子弹都打在她的皮大衣上了！……她一点儿也没伤着，压根儿没伤着！……现在她已经在使劲地给'保安部'打电话呢！"

接着金卡开始神经质地偷偷哭了起来。我明白，她说得对。

"分开撤……"我用嘶哑的声音命令，我上气不接下气，心剧烈地跳动着。"我们明天……再谈！"

我们一越过赫姆斯特德公路，就分头急驰而去。我发现，我骑得慌慌张张，快得不正常……于是我迫使自己骑得慢些。无论是林荫道，树木，还是电车站上蒙上一层雪的候车亭，我都视而不见。眼前只有穿灰色卡拉库尔羔皮大衣的女人的身影浮现，她倒下了，爬起身来，从我们身边逃跑了，尽管她本来应该死掉。在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紧张的神经松弛了，我整个身子都感到十分轻松。

告别饥饿的客人

第二天，我来到唐克尔斯帕尔涅附近我的秘密接头地点，准备将在刺杀舍瓦尔夫人期间未印未送的《真理报》补上的时候，那儿已有一大堆新闻在等着我处理。在放手摇油印机的阁楼上，我碰到了安和金卡。她们的心情也跟我一样——总的说来，都相当镇静，尽管感到有点儿气愤和困惑不解，仿佛这一次暗杀，他们昧着良心把我们骗了。

我们开始整理收到的消息。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德国城市进

行的空袭，现在达到了空前规模。我们读了这些消息后，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差不多半个德国烧毁了。希特勒把自己最后的力量投入了战斗。这种尝试是可怜的，犯罪的，同时又是荒唐可笑的：他组织了民兵，这明显是在模仿英国国民防御的做法。但是，希特勒没有可以组织新的近卫军的士兵了。近卫军中大多数是老头和领养老金的人，像安说的"老爷爷们"。他们接替常驻警卫部队，第一次穿上军装。这些民兵常被叫作"圣诞老人"。他们不适合打仗。至于养老金，则在许多民兵看来只好与它们告别了……我们还收到其他一些我们觉得颇为有趣的消息，我们把它们刊登在引人注目的位置：在特里尔，妇女们举着大幅标语，上街游行，要求尽快结束战争。"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丈夫和孩子！"妇女们高呼道。党卫军分子不敢向她们开枪，就使用棍子驱散游行队伍。

"当然，"金卡说，"目前他们还能用棍子镇压……那些不能回击他们的人。可是这些妇女比他们勇敢。"

"妇女一向勇敢，甚至德国妇女也是，"安说。

当天，我们印完报纸，就回指挥所去了。我一想起舍瓦尔夫人的事，心里就又感到不愉快。这时，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儿不对劲，有一种我根本不喜欢的东西。看来安和金卡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不约而同地到自己的指挥所去，尽管我们应该到维耳曾去汇报，暗杀舍瓦尔夫人的任务完成得不顺利。可是，我们没有到维耳曾去——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象不出；仿佛我们害怕，再次派我们去完成这一任务。

鲁朗特正在把炸药装入铁皮盒子，他说：

"你们怎么不说话？你们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最近你们上哪儿啦？"

“什么都感到不称心，”金卡说。“接连不断的失败。”

“讲给我听听吧，”鲁朗特说。

我们讲了。于是我们感到轻松多了。鲁朗特一边听，一边继续干着活，暂时我们的叙述中没有什么使他感兴趣的。他把炸药盒子放到一旁，挠挠后脑勺，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听到了最后。

当我们结束关于我们的失败以及危险行动的报告时，他说：

“这里面有点儿不对劲……难道不对吗？”

我们相互看了一眼。我急忙问：

“鲁朗特，你也有这种感觉？”

“我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答，“我不能作出解释。可我觉得，这里面有点儿问题。”

“我们应该到维耳曾去……”安开口说。鲁朗特站起来，急忙说：“不，不……你们再等几天。你们就印报纸吧，其他什么事也别干。”

“鲁尔，你要做什么？”金卡问。

他笑起来，又坐下了。

“做我打算做的事，”他回答。“只是现在天还太亮。等天黑了，我可能就走。无论如何我明天回这儿。”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指挥所。鲁朗特收拾起铁皮盒和炸药，把那间寒冷的，落满灰尘的旧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好像这是他个人的住所。这一点我们一眼就发现了。

“鲁朗特，你太客气了，接待我们这么讲究，”我说。“这倒有点新鲜……”

他一点儿也不见怪，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十分遗憾，这不是为你们……我这儿要来客人。”

“真有趣,”金卡说,“鲁朗特,究竟是谁呀？是抵抗委员会中的某个要人吗?”

“这当然是个女人,”我说。“否则他是不会把房间收拾得这么干净……男人想给人一个好印象的时候，总是这么干的。那他们想给谁一个好印象呢？给女人。”

鲁朗特张嘴看着我。

“嘀,你真……机灵,”他摇着头说,“看透了,机灵鬼!”

鲁朗特大为惊讶,一时头脑怎么也反应不过来。他承认,来客是一个女人。

“那么我知道是谁,”金卡说。“是党的指导员。”

鲁朗特点点头，他被我们显示出的侦察员的素质完全制服了。我们那么快就揭穿了他，为此他好像有点儿生气。我同安和金卡有点儿焦急地等待着党的指导员到来。当我们听到，小路上传来脚踩积雪发出的嘎吱嘎吱响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跃而起。鲁朗特已经到走廊上去欢迎客人了。确实,这是安妮。开始我没认出她。她变得十分消瘦。她的两腮确实仍然是绯红的,但那是冻红的。当她摘下头巾和披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脖子竟是这样的细,就像我的两位女友……很可能也像我本人,——我长久没有照过镜子……但是,安妮仍然挺直着身子;她依然那么笨拙和威武。她一开口说话，我终于认出她仍是我最初结识的那个安妮。

我们大家一起坐在桌旁，喝着被鲁朗特叫作茶的一种汤——它的颜色有点儿发绿。可它使人感到温暖，也使谈话轻松愉快——我们一直捧着手中的碗,当谈话中止的时候,就小口小口地喝着。

安妮说，她在维耳曾指挥所里听到一些关于我们遭到不幸

的事，于是我们向她详细地叙述了我们的几次失败，比对鲁朗特叙述得更为详细。她默默地听着，只是把她那严肃的、审视的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我很少遇到能这样认真地听取别人汇报的人……我曾经读到过，列宁具有认真听别人说话的特别的天赋，他几乎不打断别人说话，只提一些最必要的问题。他很尊重别人的人格。

当我们结束自己的汇报的时候，安妮说：

“作为一个抵抗小组，我不能说这个组织的坏话……鲁朗特，你说呢？”

鲁朗特像个学生那样脸刷的一下红了，于是我们大家对他抱有更大的好感。

“要知道，你们三个人都是党员……因此，你们接受我的命令吧——暂时停止……”

她突然笑了起来，显然她发现了我们脸上的表情。而她的脸变得鲜艳而又年轻。

“当然，”安妮接着说，“既然你们那么长时间过着侦察员和复仇者的生活，这一禁止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出乎意料的，甚至是残酷的……我再重复一遍：**暂时**禁止。要知道我不能擅自决定。日内你们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指示。你们暂时印《真理报》……有时我也看到你们张贴的简报……这是一项极好的工作，虽说这是一项十分冒险的工作。”

我们不时咳嗽几下，嘴里哼哼哈哈着，沉默不语。

“可那些维耳曾人怎么办？”当沉默持续着，大家都感到难堪时，安终于问道。

安妮重新把头巾披在头上，慢慢地系着。

“你们去告诉他们一下。向他们汇报最后一次行动的结果，

但不要接受任何新任务。你们的任务是印《真理报》。就这样定了。”

她把披肩系在脖子上，穿上大衣，就同我们告别。鲁朗特把她送到门口。不一会儿，在花园的小路上又传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远的轮胎的沙沙声。

“完蛋了，”金卡说。“现在我们的武器用不着了。”

“鲁朗特，这一点我们多亏了你，”当鲁朗特回到房间后，我挖苦道。

“怎么回事？”他问，尽管他十分清楚，我说的是什么。

“禁止我们开枪呗！”安说。

他严厉地看了我们一眼：

“你们听着。你们进行的所有这些行动，我早就不喜欢了。安妮是完全对的。这应该结束了。为了安全……如果维耳曾人有别的想法，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鲁朗特，你指的是什么？”当他停顿下来时，我问。

“指我说的那件事，”他严厉地回答。“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那我马上告诉你们，我不喜欢这些维耳曾人，因为他们利用你们去干自己肮脏的勾当。我一点儿都不喜欢！”

“我们也不特别喜欢他们，”金卡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可是，这只是……只是一种印象……一种这样的感觉。要知道，他们毕竟是爱国者。”

鲁朗特什么也没回答。他那突然的坚毅的沉默、他那紧蹙的额头使我确信，他不想或者暂时不打算说出那些支配着他的想法。我向安和金卡暗示，让她们也保持沉默。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维耳曾。保利、卡普斯塔特和梅斯费尔特接待了我们。他们请我们坐下，但没请我们抽烟。我征得同意

后，叙述了我们在比斯霍普小姐的客厅里是怎么进行监视的，还有舍瓦尔夫人开始带着孩子来到街上，我们不愿意开枪，等到她一个人出来时，我们拦截了她，我们的子弹射入了她的皮大衣。他们默默地听着；卡普斯塔特嘴边上的一道伤疤微微抽搐着。

我汇报完后，保利硕士说：

"说的同我们已经了解的情况完全符合；你们把事情都搞糟了。整个哈勒姆警察局都警觉了，因为你们让这个女人安然无恙地逃跑了……"

安、金卡和我几乎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

"既然你们不用汇报就知道一切，那为什么你们还让汉娜再叙述一遍呢？"金卡发起怒来。

保利若无其事地看了她一眼，但是目光没有平时那么和善。

"因为我也想听你们的叙述，"他说。"Audi et alteram partem.①我是律师。"

他看着金卡，而不看我。我气得直发抖。

"法律这玩意儿，我多少也研究过点，"我说。"这同听取双方意见毫无共同之处。这是精明强干的律师在办可疑的案子时使用的一种圈套……这不是绅士风度。而对于像你们这样直接从伦敦、从英国接受指示的有身份的先生来说，这是特别可耻的。"

我看到，保利想站起来，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卡普斯塔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那道伤疤抽搐得更加厉害。梅斯费尔特刻薄地说：

"你们也太骄傲了……你们应该好好完成任务。别人让我

---

① 拉丁语：也要听取另一方的意见。

们相信，你们对我们的工作很内行，而你们替我们把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都给搞糟了。”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保利低声含糊地说了一些和解的话。

“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失败，”我说。“我们每一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去干那些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毫无意义的冒险的事……”

“为了雪茄烟！”金卡插嘴道；她的脸涨得通红。

大家都朝她转过身去，安和我也转过身去，梅斯费尔特朝金卡走上一步。

“雪茄？”他重复了一遍。“是的，是这么一回事。”

令人厌恶的，丑陋的笑容使他的脸歪斜了——它好像裂成两半。

“这么说，你们偷看过包裹了，”他说，接着把目光从金卡身上移到我身上。“这与共产党员崇高的清教徒的道德也不矛盾吗？”

“这与抵抗运动崇高的清教徒的道德不矛盾，”我反驳说。“应当知道，你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了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为你们送什么；我们偷偷地通过警察哨所，从法西斯的保安警察和党卫军的关卡旁溜过去，为的是向你们的朋友和熟人提供雪茄以及还有上帝才知道的东西……使三个姑娘，甚至还是女共产党员，遭受这样的危险，这与社会民主党的道德不矛盾吗？”

梅斯费尔特脸上带着怪笑，始终坐在那儿。我一说完，他就讽刺地说：

“斯女士，关于我的道德，您知道什么？您用不着责备我，您是自愿来这里执行我们的任务的。卡普斯塔特工程师有一次在

谈到别的问题时已经对你们说了，我们没有义务向你们汇报我们的打算，向你们解释我们保持那些关系的性质。如果你们害怕，那你们就说害怕。可是，请你们不要发怒，这对你们很不合适！”

现在保利硕士真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朝梅斯费尔特挥了一下手，让他安静下来。梅斯费尔特脸色苍白；唾沫从他的大嘴里飞溅到我身上。我心里想：他曾经指责我，憎恨是共产党员一切感情的基础；可是，现在他就站在这里，充满了憎恨，而且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行动失败了……于是在我的心里又产生了一种忧郁感，我想：“这里有点儿不对劲……为什么他这样残忍地侮辱我们？”

“我们不害怕，而且从来也没害怕过，”一直没有参与谈话的安说。保利打着手势，让大家安静，然而徒劳无功。“可是你们知道，骑着一辆像锈迹斑斑的咖啡粉碎机的自行车，空着肚子在路上走四五个小时，精疲力竭……更主要的是为一匣雪茄烟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意味着什么？”

“问题不在雪茄烟，”卡普斯塔特突然说，他打破了自己不好动的习惯，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们也像我一样，对这一点很清楚。这些雪茄烟证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它能帮助我们，帮助整个抵抗运动……你们应为我们有它们而高兴。如果你们知道，我们利用雪茄烟获得了什么，那你们就会按另一种方式说话了。”

“但愿如此，”我回答。“可我从来还没看到，我们的一个朋友，靠了这些特效雪茄烟从德国鬼子的魔掌中挣脱出来。”

安、金卡和我也站起身来。现在大家都站着。房间好像变成了一座火药库——随时都可能爆炸。保利紧闭起嘴唇。我觉

得，他像练兵场上的教官马上要吼叫了。他没有发作，而是带着一种勉强的、不自然的微笑说：

“女士们和先生们……我想，这间房间里的气氛太紧张了，一些失去理智的话都脱口而出……我建议停止争论。”

“我同意，”我说。“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再说一件事：我曾请求发给我们新式手枪，无论如何质量好的手枪……可是卡普斯塔特工程师说，我们的手枪还完全适用于交给我们干的事。”

“这是对的！”卡普斯塔特用他一惯毫不客气的态度打断话头。

“可能，”我回答。“但是，我认为，若有好手枪，我们已经干掉舍瓦尔夫人了。而这把破手枪这么一点儿距离都不起作用。”

我拿出自己的武器，梅斯费尔特怀疑地看了一眼，尽管看得出，手枪破旧不堪。卡普斯塔特咬紧嘴唇。保利弹响了一下舌头：“斯女士，你们也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汉娜说得完全对，”安说。

“当然，”金卡证实道。“空着肚子，骑着自行车，没完没了地奔跑，此外再加上只适用于打群架的手枪……而你们还等着我们创造奇迹！”

保利看了卡普斯塔特一眼：“工程师，您在想什么？……我们还有备货吗？”

我急忙打断他的话；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的声音听起来很严厉。

“保利先生，谢谢您……这再也不需要了。抵抗委员会暂时禁止我们开枪……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将要去完成另一项工作。”

“怎么？”梅斯费尔特大声说。“在这种时候离开我们？”

他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失望。如果另外两位也感到失望的话，那他们至少做到不露声色。

“我不怀疑，你们说的是实话，”保利拖长声音说，脸上堆满了笑容。“我想，我们还是理解你们的……十分遗憾，我们失去了你们的帮助，尽管像你们说的只是暂时……我也理解，有时休息是必要的。”

“我同意上面所说的，”卡普斯塔特说。“你们完全应该得到休息……而现在，在最近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休息。我希望，你们能很快像从前那样精神充沛地再次来我们这里……我答应你们，我重新考虑手枪的问题。”

接着他尽量殷勤地微微一笑。

梅斯费尔特转过脸去。我听到，他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

保利把我们送到门口，握了握我们的手。然后来到楼梯的平台上，朝下面喊道：

“马尔滕！厨房里准备得怎么样了？还能为我们饥饿的客人找到一小块吃的东西吗？”

我们已经下了楼梯。我觉得，保利硕士最后想用“饥饿的客人”这种说法来报复我们。穷亲戚都是这样被赶出有钱人家的门。在他眼中，我们是自己的组织无法养活的可怜的穷人。我听到，金卡在边上小声嘟囔着：

“他真可恶！”

当我们穿过大厅时，马尔滕从厨房门里探出头来：

“女士们，今天我们这里有剥了荚的豌豆。肉还没有煮熟……”

我摆出一副仿佛没听见的样子，朝门口走去。安和金卡学着我的样，不去理会他。我们从棚子里推出自己的自行车，顺着

松树间的小道骑过去，拐上大路，一句话也没说，回家去了。

混　乱

企图在欧洲建立最残酷最野蛮的体制的反动分子看到，他们正面临着全面的灾难。大火在德国熊熊燃烧。美国人和英国人在陆地上怎么也揪不住德国鬼子的后脖领子，就更加疯狂地从空中向他们扫射。成千上万吨炸弹像雨点似的倾泻到德国城市、枢纽站、工厂。

在德国从事奴隶劳动的工人——现在他们共计有好几万——趁大火燃烧和夜间混乱之际纷纷逃跑，不过也死了不少人。荷兰人也逃跑。他们能够回到祖国——顺着乡间土路，经过沼泽，穿过韦斯特法克泥炭田，沿着我们自己的河流——没有冻死和饿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可他们回到了祖国。鲁朗特和威南特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见过面。尽管他们饿得全身虚肿，生满虱子，患有皮肤病和胃病，但他们的境遇大概仍然算是最好的，因为生命本身是最高的福利。他们的几千兄弟不幸葬身于德国城市的废墟之中了。

整个德国一片混乱，纳粹分子投入了最后的力量防守柏林。

"在把我们拖进深渊之前，他们是不会死心的。"鲁朗特不止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他们也想杀死我们。"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德国人仍在进行招募，并以武力把人们带走，强迫他们为自己干活。他们企图在荷兰也采用这种方法：表示愿意给去德国工厂工作的十四、十五、十六岁的孩子以高薪，尽管那时工厂都已经烧毁或者被炸毁。

荷兰的党卫军头目费尔德梅耶尔拼命帮助德国人进行在荷

兰成了头等大事的搜捕。有时我们看到他们驱赶着人们……头戴钢盔手拿卡宾枪的匪徒押送的都是些突然被抓来的、惊慌失措的孩子和老人。有些被招募者企图逃跑，这时押送者就向他们开枪。从南荷兰省的一些岛屿——德国占领军最远的前哨阵地传来了关于挨家挨户搜查、抓人、严刑拷打的令人断肠的消息。费尔德梅耶尔经常坐着他那辆灰色的德军小车在“党卫军英雄们”中间来回穿梭；他不时跑到海牙，到劳特那儿接受新的命令。盘旋在维斯特兰特道路上空的不列颠的歼击机，发现了费尔德梅耶尔坐的灰色小车。当然他们不知道谁坐在车上，他们只看到那是一辆纳粹分子的小车。于是他们用机枪扫射汽车，并击毙了车里坐着的人。

威南特告诉我：“人子，有一次你问我，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一点也不想帮助英国人……可它惩罚了费尔德梅耶尔。”

我微笑着答道：“我不想渎犯神明，可是一个费尔德梅耶尔不算数……劳特仍然存在……还有拉赫斯，奥斯·德·菲恩捷克，阿麦斯福特的那些刽子手。在阿珀尔多伦有佛兰芒党卫军分子，以及许多其他的人……”

威南特心平气和地摇摇头，说：

“我们不知道，至高无上的主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他向我们证明，最终的权力是属于他的。汉娜，在这一切后面隐藏着深刻的含义。”

我没有反驳。只是自己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这里真的有什么含义吗？最好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错误的结果——野蛮的习俗，无端的杀人。当我读到轰炸的时候，我再也不去想因轰炸而死去的人。我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实在是疲倦了。我们大家都疲倦了，疲倦极了！大概在德国也是这样。刽子手们自

己大概也疲倦了。可是，尽管他们疲倦了，疲倦极了，但是他们继续干着可怕的事情。越来越多被赶去从事奴隶劳动的人从德国逃了回来。他们说，他们宁愿饿死在祖国，这比遭受地狱般折磨要强。德国人自己也生活在地狱里，但他们不断要新花招，更残酷地剥削那些受害者。苏联军队解放了一个又一个集中营。在红军到来前夕，党卫军分子进行了血腥屠杀。他们用机枪扫射囚犯，或者顺路把他们驱赶到离苏联军队尽可能远一些的地方，同时枪杀了那些走不动的人。最近几天，我们听到在德累斯顿附近铁丝网后面遭受折磨的几千苏联战俘建立功绩的消息。他们得知，他们的同胞快要来了，便冲出集中营，夺取武器，杀出一条道路，回到最近的苏联红军的分队里。

我钦佩这些人，并羡慕他们。

不列颠的轰炸机和歼击机继续在荷兰上空盘旋，轰炸每一个德国运输队，连一辆在行驶的马车也不放过。只有在雾天和下雪天——三月已经来临，雾和雪却没有结束，——占领者才能运输点东西。英国人偶然也会犯严重错误：在那不幸的一天，他们彻底炸毁了海牙别久伊丹豪特公园。他们把它当作德国人的工事进行轰炸……占领者高兴得大喊大叫，居民们当然不会跟着叫。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请求荷兰人民原谅这一致命错误。荷兰人接受了这一请求，就像接受饥饿和寒冷一样。消沉、沉默、忍耐笼罩着整个国家。然而，这种毫无生气的沉默时时被抵抗战士们的战斗所打破。

三月初，党卫军将军和警察部队最高首脑劳特带着自己的卫队渡过了维柳维河，到占领军第二官邸的阿珀尔多伦去。在靠近武斯捷胡韦的地方，一群装备精良的人袭击了纳粹头目的汽车。他们向车上的乘客发射了自动手枪的所有子弹，然后躲

进了树林。劳特的大部分随从被打死。在一家地下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古怪的传说。开始报道说劳特也死了。后来查明，他死里逃生，不过受了重伤。有人推测，这场谋杀是一些不满的德国军人干的；据说，他们想无条件投降胜利者，却遇到了党卫军头目这个障碍。而纳粹分子却指责谋杀是荷兰抵抗运动干的。从这一时刻起，德国人在仍然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所有监狱里开始了镇压。在阿姆斯特丹，一队党卫军分子嗷嗷吼叫着，野蛮地从市监狱里拖出四十来个与这次袭击毫无关系的人；党卫军分子把他们赶到维帖林赫公园，包围了这一地区，强迫落到包围圈里的所有大人和孩子都去看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迫害自己的犯人。

这几天，威廉明娜女王来到了荷兰的解放区。英国广播公司向我们报道了泽兰、布拉邦特和林堡的居民们热情欢迎她的情形。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以及后来把它们刊登在我们报上，又读了一遍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仿佛发生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不是在一百来公里的地方。仿佛这发生在别的星球上，人们在那儿挥动着红白蓝三色旗子，载歌载舞，在欢庆的钟声中，他们拥挤在白发女人的周围。她经历了侨居国外的艰辛后，仿佛变得更温柔、更善良、更平易近人了。

我们处在要塞里，像坐牢似的同自己的刽子手在一起。在袭击劳特后的一个星期内，德国人杀害了三百多荷兰人。我们吃的只有甜菜根。我们拆掉家里的门、栏杆、地板，生炉子取暖，以免冻死。这严寒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冷酷无情的白色恐怖，渗透到我们国家的各个角落；那是穿着褐色、绿色和灰色军装的刽子手们制造的恐怖。

第 五 部

红 发 姑 娘

疲 倦

我们最后一次拜访维耳曾后的几天，鲁朗特带着党的命令来到了指挥所，命令重申了安妮对我们姑娘下的指示：不能再开枪了；把武器藏好；只干《真理报》的工作。

我们本来就没有别的指望。可是，命令那正确简练的措词，使我们感到沮丧。特别是因为在这个时候，由于暗杀劳特事件，德国人在周围肆意屠杀。鲁朗特和威贺尔带来了极好的消息。

"我们得到了有趣的情报，"鲁朗特对我们说。

"我们本来想多打听一些你们曾经送雪茄给他的海牙的那个坏家伙的情况……"

"布列斯肯斯！"金卡脱口而出。

"对，是这么个名字！不过，我能为你们高兴——他已经死了。"

"被抵抗战士处决了，"威贺尔说，"他为盖世太保工作……而战前为'Secret Service'①服务，英国情报机关……"

"你们在维耳曾与他十分熟悉，"鲁朗特十分尖锐地说。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自领会着这些消息。

"英国情报机关和盖世太保……"安终于开口说，好像她弄清楚了其中的奥秘。"只不过是从一个情报部门转到另一个情报部门罢了。就好像换上了另一件衣服……而把旧衣服扔到垃圾箱去……"

"衣服是扔了，但是他穿这件'旧衣服'时收集的那些情报可没扔。这些情报牢牢印在了他的脑子里！"威贺尔嘲笑地说。

① 英语：情报机关。

“好在他再也不能害人了，”我轻松地叹息道。

“事情是这样，”鲁朗特说。“可是你们不久前开枪打穿皮大衣的这位夫人……她从双方……知道什么呢？”

“大概她知道许多东西，”安说。

“鲁朗特，”我说，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你把我们的事都告诉弗兰斯了？把我们的一些冒险事也说了？把那些雪茄烟匣以及其他的事都说了？”

他点点头，等了片刻才回答：“我对他讲了这件事，并警告了他。弗兰斯不相信那里的情况有点儿不对劲……他也认为这很奇怪，但他认为我们不一定要过分警惕……”

“弗兰斯是个爱虚荣的人，”我说。

鲁朗特又点点头。

“十分令人气恼的性格，”他说。“这有时使他变得盲目……但他同维耳曾人的关系有点不正常，尽管我还不完全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

“党禁止你们开枪，我很高兴，”威贺尔说。“所有这些任务……现在，在这种时刻，去完成这些任务太危险了。”

“你指的是什么？”我问。

“死的人太多了，”他简短地回答。“有时需要开枪，可有时不得不爱惜人们的生命……这些坏蛋现在那么肆无忌惮，危险性太大了……”

“由于一个劳特，死了几百个荷兰人……”鲁朗特说，“威贺尔是对的。在现阶段首先应该由军人进行斗争。而你们……”他把目光从安移到金卡身上，然后又移到我身上，“你们要利用报纸支持人们身上的勇敢精神……”

我知道，鲁朗特说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是所有为祖

国而战的秘密战士的意见，是那些转入地下但仍然在党身边的人的意见。然而，当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意见后，我心里又提出了抗议。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继续我们的斗争，战斗，战斗……

在这三月的日子里，我总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有时我想：这是一种疲倦。我们都疲倦了。我们来到放着手摇油印机的阁楼，就已经感到了疲倦。而离开放着一捆捆印好的报纸的阁楼，我们感到更加疲倦。我们出去送报，此时觉得灰色的冬天像沉重的货物压在我们的脊背上。我们感到腰酸背痛，酸痛渐渐转变成了经常性的折磨人的疼痛。

我好久没有照镜子了。现在我也不敢照镜子。有时我在窗子上或者门玻璃上捕捉一眼自己的影子：一个消瘦的、忧郁的、其貌不扬的人！……有时我发现，安和金卡看着我。我自己也那样看着她们。带着一种无言的同情。不能流露出我在为她们担心，不能说一句不谨慎的话使她们沮丧。她们同样什么也不对我说，大概她们看到我的状况也感到难过。

三月初，我得悉那当护士的女主人又去斯哈亨了，她说，她暂时留在父母家。我明白了，那儿大概食物充足，可是我们哈勒姆的兄弟只有郁金香的块茎和甜菜根了。总之我与她不经常见面；她呆在医院里长时间不回来，医院里毕竟暖和些。我们谈话就更少，而现在她根本不回家了，我觉得，她让我住的房间显得更加寒冷和空荡荡的。送完《真理报》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躺，我就感到，我完全为各种忧郁的思想所左右。必须摆脱这一点。我去对安和金卡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干些有益的事呢？我可以教你们学英语，这不难。”

她们同意了。在这压抑的、毫无生气的三月，白天我们就坐

在房间里，用大衣把身子裹起来，一直裹到下巴。安和金卡拿着练习簿和铅笔，准备记单词。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仍然在我这儿。我没有按语法体系进行专门备课，而是视情况向姑娘们讲解语法规则。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可行的方法。姑娘们集中了全部力量，但我发现，她们还是感到困难。这倒不是因为她们缺乏才能。她们实在是太疲倦了。疲倦像毒剂那样渗入每一个细胞，它减慢了我们的血液循环速度，使我们的思维变得迟钝。姑娘们背会了许多单词，可是一昼夜后就忘了。偶尔，在朗读的时候，一个姑娘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瞌睡。我也发现，狡猾的瞌睡虫正在悄悄来到我身上，它准备合上我的眼皮。

现在，疲倦比饥饿更使我恐惧。饥饿在我的骨头里，在我的消瘦的身体里已经牢牢扎下了根。饥饿几乎成了我第二天性。但是，我们的精力很快就要耗尽，这正是主要危险。它好像从角落后面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在人最预料不到的时刻，它守候在我身边，千方百计制服我，把我诱入陷阱。我气愤极了。我振作起精神，时时保持谨慎，同这一虚弱斗争着。只要在我送秘密报纸的时候，这种虚弱不来打搅我就行。只要我在哈勒姆的时候，我的思想能保持清醒，注意力不分散就行。

有两三次我发现，曾经把我们带到比斯霍普小姐家去的警察局的那个高个子稽查骑着自行车。他审视地、几乎威胁地看着我，脸上挂着模棱两可的讪笑，招呼也不打，就从一旁骑车过去。好几次我觉得，他像影子似的在监视我，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像在欺骗自己，偷偷把手枪塞进口袋。我已经好多天感觉不到我胯股旁武器的重量了。可能，因此我也就被恐慌和怀疑所左右。当武器又回到平时的地方时，我又获得了信心，坚强起来。不带武器，我再也不出门了。但是，这一点我对谁也没

有说，甚至对安和金卡也没说。我感到有点儿羞愧——一个使用麻醉剂使自己强打起精神的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不过，我不再感到疲倦，我的感觉好像是这样。

保罗转过脸去

盟军在西部开始夺取萨尔和法尔茨的战役的那一天，我从斯帕尔贝格回来了。我突然发现，我平时送报去的那家房门锁着。这一天似乎刚开始解冻。温暖潮湿的天气比起以往冰冻天气要好受些。冷丝丝的细雾不时地从空中落下。日历上已经是三月二十一号了。我记得，一九二九年，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冬天四月底才结束。我把身子低低地俯在车把上，骑着自行车，眼前闪过一块块褐色的湿地。我试图想象，雪真正融化后我们国家的面貌。当冰壳从地面消失，道路两旁一堆堆令人沮丧的垃圾被春雨冲洗干净的时候，当从冰层下面终于冒出一棵草，这棵草确实想重新发绿，就像一棵普通的荷兰草那样发绿的时候……我不停地骑着，骑着，直到我的自行车前面突然出现一个黑乎乎的、一动不动的东西。就在我意识到这个障碍是什么之前，一个干巴巴的声音说：

"Absteigen. Kontrolle."①

这是德语。一个德国人的声音，说这话的是个德国人。

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我从对另一个季节和另一个荷兰的令人神往而又徒劳无益的幻想中回到了今天的现实。我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但是，只是眼睛看到，而事情发生的意义并没有马上意识到。

① 德语："下车。检查。"

原来，我骑车到了扬·海津大桥跟前。道路两旁站着一些身穿制服的军人。在大桥那一头也有这样的军人。他们全都戴着绿色的钢盔。以前我也多次遇到这样的军人。我毫不犹豫地从他们身旁骑车过去。自行车挂包里总是放着弹药，或者一捆捆的《真理报》，或者要送到那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去的包裹。检查经常遇到。但是，我总是想法绕过它，或者干脆悄悄地拐回去。从第一次去寻找食品券以及搞身份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期间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看见了德国人。仅仅一秒钟的时间，我就明白了，这是野战宪兵队。又过了一秒钟，我发现在大桥对面，在靠近学校校园的一块空地上，停着两辆盖着褐色帆布的汽车。汽车之间，一些人可怜地挤成一堆，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只有两三个男人。他们的自行车放在一旁，一个德军士兵看守着。

总共只过了三秒钟。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整个情景——警察、汽车、被捕的人、因湿雾而显得更加灰暗的天空、石头城，城郊街区一直延伸到覆盖着白雪的草地；我朝结冰的河道看了一眼。这副情景强烈而又清晰地印入我的脑海里。在第四秒钟，事情可怕的后果已经渗透到我全身，我充满恐惧。天空破裂了，石头城开始摇晃，警察和人们变得虚幻了……

我明白了：我的疲倦到底把我给害了。不，这再也不是现象，不是痛苦，不是不能摆脱的重负。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疲倦顿时消失了。但是，它仍然无形地留在一旁，并且无情地嘲弄我。

我落到敌人手中了。

第四秒钟过去了，第五秒钟来临了。在第五秒钟里，我想起了：在我的自行车挂包里放着一捆我没送出去的《真理报》，因为

我在那家没有碰到任何人。在第六秒钟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我的风衣口袋里放着手枪。

我从前也经常感到害怕。但是，这种害怕是不能同现在我心里产生的感觉相提并论的。这不是那种隐藏在心灵深处、折磨人、使人思维变得迟钝的恐惧……如今这是一种完全控制着我们的恐惧，在一切可见的东西都变得虚幻的短暂一瞬间，这种恐惧同我们混为一体。我身上的一切都停止了活动，我感到，我脸色苍白。思想停止了。

从敌人要我下自行车，到我踏到地上，别人的一只手落到我肩上那短暂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这一切。

我本来想赶紧逃跑，跳上自行车，疾驰而去，必要的话，我就开枪。可我什么也没做。恐惧束缚住了我。似乎是由于恐惧，我才站住了脚。恐惧也不让我采取什么措施。

我看了一眼绿钢盔下那张胡子拉碴的呆板的脸。这个坏蛋长着薄嘴唇，淡眉毛，一双黄绿色的眼睛。他低头看着我。

"Papiere."①

坏蛋没把手从我肩上拿走。于是我又想，同时心里在说服自己：快采取行动！快动手！开枪！但我什么也没做。那只手摇晃了一下我的肩膀，接着一张呆板的，好像冻僵了的德国人的脸，粗暴地朝我喊了一声：

"Persoonsbewais!"②

我有身份证吗？我一只手松开自行车把，另一只手开始在大衣口袋里寻找证件。在我的高领毛线衣的口袋里有一张身份证。我试图回忆出，上面写着的名字、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但

---

① 德语："证件"。
② 德语："身份证(发音带德国腔的荷兰语)!"

我记不起来。我把证件递给德国人。他冷淡地看了看证件，就还给了我。

“Furagiert?”①

我点点头。他用脚踢了一下我那扁扁的自行车挂包。

“Sitzt wenig drin…Zeigen.”②

当我打开包时，他恩赐似地扶住了我的自行车。他朝包里看了一眼，我把空的部位给他看。他看了我一眼，于是我明白了：他是欺骗不了的。

“我什么也没有，”我用荷兰语说。我曾经发誓决不同德国人说德语。接着我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我什么也没有。包是空的。”

“看看，”他又说。接着他俯身看第二部位。自己说话的声音使我恢复了信心，于是我想：“现在我该采取行动了。”我迅速环顾四周。站在桥对面的第二个宪兵正好到一旁去拦截驶近的一个自行车骑者。如果我朝面前敌人胸部击一拳，跳上自行车，把手塞进口袋，掏出手枪，然后朝后开枪……

在我终于感到我能够并且想自卫的那个时刻，德国人用戴着皮手套的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肘。我看到，他从包里拿出一捆《真理报》，然后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报纸上，又从报纸移到我身上。

“Ach so,”他说。“Das ist interessant.”③

我什么也没回答。他哈哈笑起来。这时他眯起一只眼睛。我觉得，他的另一只眼睛更绿更冷酷。

---

① 德语：“是食品证？”
② 德语：“里面有东西……看看。”
③ 德语：“原来如此，这个很有趣。”

"Das haben Sie natürlich selbst nicht gewusst, was?"①他问。

他当然不需要我回答。他举起一只拿报纸的手，隔着大桥朝那些站在河对岸汽车旁的同伴喊道：

"Kommt mal her! Hier gibt's was! …"②

一个警察立即过了大桥朝我们走来。我发现他的官衔比其他人大。我不知道野战宪兵队的等级。可能，这是一个卫队长。一个什么Rottenführer③或者鬼知道这些骗子是怎么称呼的。我只看到，他老远就仔细打量我，好像他感到奇怪，这个身材瘦削、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可怜的人，为什么使他的部下大声嚷嚷。

这时他已经站在我面前。那个拦阻我，并且继续紧紧抓住我手的军人报告：

"Ueberbringt illegale Zeitungen. Waarhaid."④

棕黄色头发和胡子刮得光光的卫队长比他的部下身材矮一截。他微微眯起眼睛，从警察手里拿过用手摇油印机印刷的报纸，说：

"Ei, ei, ei…De Waarhaid."⑤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也哈哈笑了起来。这是一种残忍的、粗暴的、侮辱人的笑。卫队长把报纸塞进腰带里，腰带上挂着一只装着手枪的漂亮的淡褐色枪套。他用头朝我的自行车一摆，命令部下把车推走。接着他轻轻推了我一下背。我走了，走得很

① 德语："这您自己当然不知道，是吗？"
② 德语："快到这里来！我这里有事！"
③ 德语：连长。
④ 德语："她送秘密报纸.《真理报》。"
⑤ 德语："嗳，嗳，嗳，《真理报》。"

慢，充满绝望，只要我放慢步子，他的靴子就踩我的脚后跟。

当我在卫队长的押送下走近汽车时，所有德国人都哈哈笑起来。只有一些被捕者忧郁无言地打量着我。宪兵们围着我。我把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突然我愣住了，但是，我立即又感到非常激动。保罗在宪兵中间。就是我在维耳曾指挥所里认识的那个保罗，把从艾梅登混凝土工事里搞来的弹药转交给我们的那个保罗。就是他在阿顿豪特附近，靠近纳尔顿费尔特的地方把面包扔给安、金卡和我的！

我听不见宪兵们彼此之间在说些什么。我望着保罗。我立即看到，紧张和不幸的表情停留在绿色钢盔帽檐下面他那张脸上。我瞪大眼睛，扬起眉毛，向他发出恳切的信号，拼命挤眉弄眼，启动自己脸上的所有肌肉。保罗垂下双眼，把脸扭过去，走到其他被捕者那儿去了。好像他不认识我似的。

卫队长轻轻地推了我一下，问：

"Was sonst noch?"①

我死死盯着他，一点也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在我明白他要什么之前，他开始用戴着手套的手摸我。我握紧拳头，打了一下他的手。有人从背后抓住我的手，把我双手反剪到背上，弄得关节都咯咯响。我突然大叫一声。疼痛消失了——我的手被放开了，垂了下来。卫队长从我的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枪。

"Interessant und interessant," 他说。"Kommunistische Hetzwische, und dazu eine Schiesswaffe. Allerhand②."

他把我的破枪翻过来转过去。他打开弹仓，四颗子弹象铁豆子似的挤在弹夹里。他把子弹倒入自己的口袋。然后看了我

① 德语："那里还有什么？"

② 德语："有趣，有趣……共产主义煽动者的作品，而且还有火器。"

一眼。这一次他放声大笑了起来：

“Da hilft kein Verneinen mehr…na?”①他问。

我没有回答。我不去看其他的被捕者用怎样的目光看着我，但是透过讨厌的蒙蒙雨雪，我感觉到他们同情的目光。我只是朝保罗走去的那个方向瞥了一眼。他背朝着我站在一小群人面前。在几步远的地方，另一个宪兵看守着我首次发现的一个年轻人；他冷漠地站在那儿，看来，他完全失望了。

“Abführen,”卫队长命令，同时推了我一下背。“Zu dem mit der Brille.”②

一个站在背后的人跟上我。他推了我好几下，于是我一绊，滑倒在踩实的雪地上。我又环顾四周。如果我现在逃跑，想办法跑到学校菜园或者菜园后面的运动场，那又怎么样？……我明白，在一瞬间他们会追上我。他们不像我那么虚弱，而且他们有卡宾枪。他们会残酷地枪杀所有无法活捉的人……我朝前面保罗站的地方看了一眼。他第一次回过头来。看得出，他显得很不自然。我走过去，同呆呆地站在一旁的那个年轻人相齐了。他穿着厚呢子大衣，优质皮鞋，戴一副眼镜，一副富家子弟的模样。他大约十八九岁。那个推我背的宪兵——我只听到，他的靴子在我背后嘎吱嘎吱响——把我朝青年人那儿一推。我没有屈服。突然我听到有人喊道：

“Du, Paul…Komm mal'rüber!”③

看守青年的宪兵空虚而又冷淡地瞥了我一眼。大概他在想另外一码事。可能在想自己在德国的家。保罗朝我们走来。我

---

① 德语：“现在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了……啊？”

② 德语：“带走……带到戴眼镜的人那儿去。”

③ 德语：“喂，保罗……到这儿来！”

看到，他十分不高兴。他躲避着我那询问的目光，好像他没发现，我又在不停地使眼色。他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

“保罗……”我压低声音说。“你可是认识我的……”

他丝毫没有动。他那张紧闭着嘴唇的宽阔的脸完全像块石头。我朝保罗走近几厘米。

“保罗，”我又说。“在路上放了我……你知道我是谁。”

他不看我。只是轻轻地在雪地上跺着靴子。我再没有什么可说。戴眼镜的年轻人抬起头，发现我在同保罗说话。

“您认识他？”他抱着希望低声问。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抓。我等待着保罗停止跺脚。当他的脚不再动的时候，我用最迫切的口吻对他说：

“保罗，到……你知道找谁。去告诉他们，把我救出去。你应该清楚，他们把我带到哪儿去。”

年轻人走近我。他的眼睛噙满泪水。他戴着圆形软帽和椭圆形镜片的眼镜，显得天真而又软弱无能。

“看在上帝份上，”他说。“您问问他，他或者他的同事是否同意在路上放我……要是他肯放我，他可以拿走我的金表……”他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发出一声尖叫，声音里含有极端的恐惧：“我不想到德国去！”

保罗转过脸去。他既不想看，也不想听。这时，一直站在那儿，一双呆滞的眼睛凝视着空间的那个宪兵，开始采取行动。他把年轻人从我身旁拉开，并用只有德国法西斯才有的声调吼叫起来，使我像受冷一样浑身起鸡皮疙瘩。

“Schnauze halten! Hier wird nicht geredet! Wer sich noch einmal muckst, dem hau ich eine übers

Maul!"①

年轻人身子摇晃了一下。他又喊起来，这一次已经是幼稚而凄惨的大喊：

"我不要到德国去！我不要到德国去！"

看押他的那个宪兵，握紧拳头，使劲往他脸上一击。我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我忙转过身去。我听到年轻人跌倒在地的声音，还有玻璃破碎的轻微的响声。我想这是眼镜。一片寂静。我站在保罗身旁。于是我碰了他一下手。

"帮帮我，"我说。"帮帮我！最后一丝希望在你身上！"

他什么也没回答，转过脸去。

卫队长（或者是别的什么长）走到我们跟前。他那张刮得光光的脸胀得发紫。我不知道，他是否发现我在同保罗说话。他把短短的胖手一挥，喊道：

"Sofort abführen, die beiden! Zum Leutnant!"②

我看到，他们猛地把年轻人从地上拖起来。他满脸是血，一双近视的大眼睛看着宪兵，他用手擦干脸。揍他的那个宪兵，把他推到就近的一辆汽车跟前。保罗抓着我的一只手，拉着我跟在年轻人后面。然后他们掀开帆布，命令年轻人上车。年轻人不会爬车，而且动作笨拙。押送他的那个宪兵用卡宾枪的枪托顶着他的屁股推了他一下，于是他又跌倒了，跌倒在车厢里。我抓住汽车后面高高的拦板，想自己爬上去，可是没有成功。力气实在太小了。我感到，有人用粗野下流的动作推着我。两个人中间到底是谁推的，我不知道。由于受到了侮辱，泪水涌上我的眼睛。似乎这些德国士兵的手的触摸，在我的身上留下了耻辱

① 德语："闭嘴！这里不许说话！谁再说一声，我就揍谁耳光！"
② 德语："把这两个人立即带走！送到中尉那儿去！"

的污点。

保罗同其他宪兵一起爬进了帆布篷下。他们靠着汽车后面的拦板坐下，把卡宾枪夹在两膝之间。年轻人在车厢前面，远远地躲在阴影里。当汽车低沉轰响，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时，我紧抓住拦板。我看了保罗一眼。他一个劲地躲避着我的目光。车厢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汽油味。汽车行驶了不长时间，然后开始加速。它在结了冰的雪地上不停地颠簸和打滑。他们把帆布篷扣得严严实实。一束暗淡的光线从云母做的小窗里投射进来。保罗的脸看起来只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浅色斑点。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时间。气味难闻的发动机不停地颤抖和喧闹着。

我紧紧抓住拦板，而背靠驾驶室坐的年轻人，跌倒了好几次。

当我们终于停下来，帆布篷被掀开的时候，我认出到了哈勒姆公园。前边树丛下有一幢灰色的大楼，那是野战宪兵队的司令部。我十分熟悉这个地方。保罗嘭地一声，放下了高高的后拦板。我第一个跳下卡车。我再次绝望地附着保罗的耳朵低声说：

“保罗！……”

他那张宽颧骨的脸毫无表情。另一个宪兵把青年从车厢里拖下来，他的脸上仍在流血，那双模糊的眼睛从一个目标移到另一个目标，看来他什么也看不清。从司令部大楼里出来两个武装宪兵，其中一个抓住年轻人，另一个抓住我。我站在台阶上，再一次回过头去。

我看到那辆卡车开走了。不知谁的一只手急忙放下帆布篷。

我沉默不语

我们被推进了一条有许多门的、墙壁抹成黄色的走廊。走廊里亮着一盏脏灯。我想环顾四周，就感到被推了一下。似乎处处都有一些无形的拳头在等着我。

“Nase an die Wand,”① 一个男人说。我闻到一股典型的男人身上才有的酒精味和强烈的烟草味。我脸朝墙站着。我听见我身后不知什么东西发出低沉的响声——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一片寂静。看来，他们在踢年轻人，强迫他站起来。

我站在墙跟前仔细听着。我听到，年轻人在咳嗽，鼻子呼哧呼哧地响着，我想，他大概在默默地哭泣，在咽着嘴里的血，用鼻子大声吸气。

在一扇门后面隐隐约约传来打字机噼噼啪啪的敲打声，间歇传来含糊不清的喃喃声——看来有人在口授。突然钟敲了四下。我甚至都不能思想，我没有去抵抗连续不断产生的种种印象，只是消极地接受。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好。确切地说，我感到害怕。而且害怕到不能完全认识自己恐惧的程度。我估计，本来现在已经赶到我们在“西班牙橡树”的指挥所了。安和金卡大概已经在那儿了。她们将等着我。她们今天在那儿碰不到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不是每天在指挥所里碰头的。如果她们想学英语，她们一定会到我住处去。她们只是到明天早上才会感到奇怪。那时我没有去放着手摇油印机的阁楼，白天也不见我去。她们再到我住处去，发现我不在那儿过夜，就一定会感到奇怪。

① 德语：“脸朝墙壁。”

我忍受着疲倦，设想他们将会怎样做。我已经觉得，仿佛关进监狱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我想象两个姑娘在寻找第三个姑娘的情景。第三个姑娘失踪了——突然而又神秘地失踪了……我看到，姐妹俩骑着自行车到各处去寻找，打听，到西蒙那儿，到维耳曾人那儿，拜访弗兰斯……然而哪儿也不见第三个姑娘的人影。

我突然好像被电击了一下：要知道这第三个姑娘，就是我自己！我汉娜·斯像一头被追捕的动物，那么荒唐地落入了陷阱，落到野战宪兵队的手里！这使我的同志失去了我……难道这只是……

我的思想继续飞驰着。也许，那么无情而又冷漠地对待我的保罗现在正全力以赴采取行动，帮助我获得自由。也许，他今天晚上就到哈勒姆警察局或者到维耳曾人那儿去……也许，他现在正在打电话。因此不排除今天晚上我被释放的可能。

钟敲了一下。这就是说，现在是四点半。四点半了，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过也不算太晚。这是白天疲倦地向晚上接近的时候……疲倦……年轻人鼻子又轻轻地呼哧呼哧起来。

各种想法无力地飞向四面八方，像海水泡沫那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法遏止。我把发烫的头吃力地靠在冰冷的墙上，额头很快就冻得麻木了。

打字机停止了敲打。再也听不到含糊不清的喃喃声了。这时，一扇门打开了。一个人用德语喊道：

“Häftlinge hierher！”①

我抬起头，转过身去。在一只挂钟和电灯下面站着一个宪兵，那是一个卫队长或者是个士官，他朝我挥了几下手。年轻人

① 德语：“把被捕的人带到这儿来！”

同我一起朝他走去。我朝年轻人斜睨了一眼。他满脸伤痕，而且布满紫血斑。眼睛浑浊，没有光泽。

他们命令我们站在走廊尽头。一个宪兵用拳头强迫我们拐进另一条走廊。这些坏蛋似乎不放过任何一个使用拳头的机会。我看到包着厚厚铁皮的浅灰色大门，就立即明白，他们送我们进牢房。

长凳上还坐着一个宪兵。当把我们推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站起身来。

"Stehenbleiben!"①他嗓音很尖。他的头顶全秃了。显然，他是在应该穿着便鞋和坎肩，坐在火炉旁取暖享受的年龄被强制动员入伍的。

我们停下了。宪兵用一把大钥匙打开了牢房，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游览过的中世纪城堡。宪兵把年轻人叫到跟前。年轻人顺从而又几乎无声地走到他跟前，接着他在打开的牢门后面消失了。我再也没看到他。

第二间牢房等着我。看守把我放进去，他那张积满污垢的脸皱起细细的皱纹——也许他想对我表示一下同情。

"Pech gehabt, was?"②他问。

我没有回答他，就走进了牢房。门在我身后紧紧地关上了。锁甚至都不响一下。我们处在最黑暗的中世纪的环境里，噢，是啊！然而，锁擦了油，保养得很好。现时宗教法庭的仆人做事可是更精细了。

阴暗的牢房几乎是空空的。墙壁发白，因而黑暗稍微缓和些。一张小桌子钉在墙上，对面是一把椅子，那景象简直像是在

---

① 德语："站好！"
② 德语："很不走运，是吗？"

寺院里。高处有一扇小窗——灰色的圆点。天空……突然我意识到，这就是哈勒姆公园的上空，这一小块天空像一张顶盖罩在哈勒姆上面。哈勒姆就在那儿。可是，同时，哈勒姆似乎离这儿十分遥远。我就这样坐着，似乎有所期待……一双手放在小桌上，头俯在手上。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不知是谁用力敲了一下桌腿，刺耳的敲击木头的声音在我的颅骨上产生了疼痛的感觉。我仿佛从睡意蒙眬的黑暗中落到地上。天花板下亮着一束细细的电灯光。秃顶老头看守站在我面前。我认出了他，但是，在最初一瞬间，我竟想不起来以前在哪儿见到过他。

"Steh auf, steh auf!"他嗓音很尖地说，一边奇怪地扮着鬼脸。"Es gibt Verhör!"①

我站起身，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眼睛直冒金星。腰部习惯性的隐痛加剧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当一个穿着高帮靴子的人走进牢房，转眼站在我面前，用一双淡色小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清醒过来。

我朝他看了一眼。这个德国人穿着一身宪兵军服，别着一枚野战宪兵队的徽章，胸前佩戴着好几枚勋章，头发剪得很短，几乎不到一毫米，一双手很大。这时，我完全清醒了，可怕地意识到了怎么一回事。尖嗓子秃顶退到一边——他站在牢房门口。淡色眼睛的人用大手向我打了一个手势，让我站到墙跟去，他自己却在长凳上坐下来。"Papiere her,"他说。"Alles her, was Sie bei sich tragen!"②

他问起证件，我全身都凉了。我想起，我还不知道我身份证

---

① 德语："起来，起来！要审讯了！"

② 德语："把证件拿过来。把您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

上填的是什么姓。这真是可怕的疏忽！我绞尽脑汁，可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疯狂的星期二”后，我回到抵抗小组，搞到了一张新的身份证。但是，此时此刻，面对着淡色眼睛的匪徒，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身份证上写着什么，就象在扬·海津大桥旁宪兵检查我的证件时那样。

“Wird's noch?”①宪兵嘟囔了一句。

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一点儿东西全掏出来放在他面前的小桌子上。有身份证，手表，梳子，手帕。他立即命令我把手帕拿回去，他把两张旧的面包券从桌子上吹掉了。

军官仔细而又认真地察看着我的身份证。然后问我：

“Name?”②

我没有回答。他又问了一遍。我沉默不语。

“Versteht kein Deutsch,”③看守在门口尖声说。

军官不满意地看了他一眼。

“Unsinn…Die will nicht.Nicht wah? Sie sollen gar nicht antworten?”④他对我说。

他那最初听起来似乎也是平淡的声音，开始变得生硬，带有威胁性了。

我反复对自己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说。”

宪兵军官站起身来。他对着我的脸挥舞起他那双大手，好象要卡我的喉咙。

“Dämliches Luder,”他刻薄地说。“Läuft mit bolsc-

---

① 德语：“您还有什么？”
② 德语：“名字？”
③ 德语：“她不懂德语。”
④ 德语：“胡说八道……她不想回答，不对吗？您根本不想回答？”

hewistischen Zeitungen und Revolvern herum und versteht kein Deutsch…”他挥了一下手。“Na. Schön. Dich wird man schon irgendwo anders klein kriegen…”①

说完他用手把我所有的东西搂到一起，只有面包券留在地上。接着他朝门口走去。带着中世纪钥匙的满脸皱纹的看守老头又讨厌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锁上了门。过了一会儿，我头顶上那盏小电灯熄灭了。

我又陷入了阴暗之中。现在牢房似乎显得更加黑暗和肮脏。小窗子里那一小块天失去了光泽，仿佛一块雪云悬在公园上空。某处的钟敲了七下。

我又开始感到疲倦。有一个问题使我感到不安：七点之后怎么样？七点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走到小桌子跟前，坐了下来。我凝视着前方。头又耷拉到手上，耷拉到桌子上。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一心想着：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早。死人般苍白的光线照亮了发白的墙壁。我揉着手和腿，一直揉到不再麻木。我在牢房里来回走动。我又开始期待……

九点钟左右，来了一个宪兵。他冷淡地说：

“Mitkommen！”②

我跟着他走过了整个走廊。那盏脏灯已经熄灭了。清晨寒冷的空气从上面的小窗子里钻进来。我看到，那个理着短发和有一双大手的军官站在门口。他用那双淡色眼睛把我从头至脚打量了一下，淫荡而又令人可怕地笑道：

① 德语：“糊涂的家伙。她带着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手枪到处乱跑，好像不懂德语似的！……那好吧，换个地方会让你听话的。”

② 德语：“跟我走！”

"Sie gehen zur nächsten Stelle. Wo man den Leuten das Schweigen gehörig austreibt."①

我没有回答。他站在我对面，提高声音说：

"Das Schweigen und das Sichverstellen! Verstehen Sie?"②

我没有回答。他朝紧紧抓住我手的宪兵转过身去，喊道：

"Abfahrt."③

一个在门内值班的卫兵打开了门。宪兵把我推到前面。迎接我的是一个阴沉沉的雪天，接着我闻到了一股朽木气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台阶下面停着一辆德国小汽车。一个德军士兵走到汽车跟前，打开车门。宪兵把我推进汽车。

我环顾四周，能否在哪儿见到保罗。哪儿也不见他的人影。我把身子靠在已经裂口的漆布蒙面的靠枕上。汽车开动了。那个宪兵坐在我身旁。他望着前方，表情好像很冷淡，几乎要打瞌睡，我只能看到开车的士兵的背和脖子。

我心里想：我把门一拉，打开门，接着就往下跳。我会跌倒，可能，我会摔断一条腿。也许，我能站起来……在自己的故城，我要比这两个坏蛋熟悉所有的路……我看了看我们在哪儿行驶。这是克莱涅·豪特韦赫，坎珀尔费斯特……马丁大夫的诊所在这些道路后面稍远一些的地方，巧妙地隐没在鳞次栉比的小屋宇和纵横交错的小街之间。我就是摔倒，跌伤的话，在那儿也会得到可靠的保护。只要我走到他家就行了。

我把手伸向车门上的钢插销。就在这时候，坐在我身旁打

---

① 德语："您要到别处去了。那儿会有办法让人开口的。"
② 德语："人们不敢沉默和装聋作哑。您明白吗？"
③ 德语："带走。"

瞌睡的那个宪兵打了我一下手，于是我痉挛地缩成一团。我忍住没喊出声，只是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开车的士兵笑了起来。宪兵附和着他也笑起来。他几乎是和善地笑着。但是，那是一种骇人的和善——它带着死亡。我的手麻木了，无可奈何地放在膝盖上。

"Schön brav sitzen, Mädel,"警察说。"Sonst regnet's wieder."①

司机又嘿嘿地一笑。宪兵跟着他也傻呵呵地、幸灾乐祸地嘿嘿笑起来。

我闭上眼睛，甚至准备捂住耳朵。我想缩成一团，陷入沉思，像只蜗牛躲进自己的小房，或者像只牡蛎缩进自己的壳里。疲倦和饥饿帮了我的忙。疲倦和饥饿已经不是那种折磨和损害肌体的痛苦了。疲倦和饥饿变成一种近似于令人难受的梦魇。我打算就这样睡过去。但是，令人难受的是我不能真正入睡，哪怕稍微休息一下。我仍旧睡不着。我终于明白不能入睡的道理：我想知道这些暴徒打算怎样对付我。

当我们驶到赫伦辛盖尔衢路渠时，我明白了，我被带出了哈勒姆。现在去哪儿很容易猜到了。我们驶过阿姆斯特丹门。一条笔直的长长的大道，上边留下笔直的长长的灰褐色的车辙，通向哈尔弗维赫。前不久，我受卡普斯塔特的委托去送包裹，还从这儿经过。维耳曾人，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我没发现维耳曾人有任何行动。保罗到他们那儿去过吗？他们知道我出事了吗？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带到阿姆斯特丹去呢？

我心里充满孤独和绝望，但是我坚强地克制住了它。

当然，指望他们进行干涉为时还太早。谁也不会这么快就

① 德语："好好坐着，姑娘……否则我们又要揍你了。"

来帮助我。首先要摸清一些人的情况，作些工作，进行说服。可能，过五天或者一个星期，我会听到他们的消息……可能，维耳曾人会通过弗兰斯或者警察局的稽查委托安和金卡把一只不大的包裹转交给某个人，去软化那个人的心。

我又想起了淡色眼睛的那个人，他的那双大手，他那可怕的微笑。这样的人能软化吗？我缩在汽车角落里。后来我打起了瞌睡。

……宪兵打了我一下，仍然是那么凶狠和粗暴。

"Aussteigen!"①

我看到，我们停在了阿姆斯特尔芬谢维赫。中央监狱那座灰褐色的大楼，高高的窗子拦着格栅，监狱面前是一座堆满雪的小公园。"保安部"那个坏蛋把我拉到大门口，他按了一下门铃。一个穿普通看守制服的人打开门。宪兵推开他，往里走去。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朝那间用玻璃和铁栅栏隔开的小房间走去，里边坐着一个狱吏，他打开小窗。

宪兵仍拉住我，说：

"Das Mädel, worüber wir aus Haarlem angerufen haben…Spricht nicht. Ihr soll schon ausfinden, wie und was."②

狱吏站起身来，走出小屋子。他同宪兵笑了起来，而我两腿发软，因此宪兵只好扶住我。我心里想：他们在笑，然而别人有种种理由哭。他们高兴，然而别人遭殃了。

"Ausfinden werden wir's schon,"狱吏说。"Was habt

---

① 德语："下车！"

② 德语："我们从哈勒姆打电话给您说的那个姑娘……她什么也不说。您必须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Iht auf ihr gefunden?"①

宪兵把一封公函交给他，然后放开了我。我身子摇晃了一下，使出浑身力气才使自己站稳脚跟。狱吏又笑了起来。我觉得，他张嘴只是为了让我看到他的牙齿。他抓住我的领子，推着我往前走。

"So ein kleines Terroristenschweinchen."②他说。

他把我赶到一间灰暗的空房间里，那儿挂着绿色的窗帘，在铺着绿呢子的桌子跟前，摆着几把包着褪了色的绿帆布的坐椅。房间里只有一件新的东西——一张淡黄色的现代木制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男人，头发梳得十分光洁，身上穿着一套笔挺的绿呢子军服；制服真漂亮，上面别着好多勋章，好像要去参加阅兵似的。"这样的人在哪儿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不知怎么我心里想。我瞪大眼睛，想集中注意力，但是，看来饥饿完全使我失去了气力。

押送我的宪兵敬了一个礼，于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把他叫到跟前。宪兵让我在原地站着，自己走近办公桌，机械地呈上公函。我两腿发软，耳朵嗡嗡直响。我已经不再注意他们谈些什么。我把一把椅子挪到自己跟前，跌坐在上面。显然，两个男人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发音不准地朝我吼叫起来：

"Was soll das? Stehenbleiben! Bis Befehl zum Sitzen folgt!"③

他哈哈笑起来。另一个也跟着笑起来。"他们总是笑，甚至

---

① 德语："我们会弄清楚的……你们在她身上找到了些什么？"
② 德语："好一个讨厌的小恐怖分子。"
③ 德语："怎么回事？站起来！现在没有命令坐！"

在他们的城市燃烧的时候也笑，”我心里想，一边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们在笑，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多蒙元首的关照，也许已经被盟军的炸弹炸成了碎块。”我仍站立着。

“Setzen!”①发音不准的人说。

我对他那迅速的让步感到惊奇。我也想坐。但我刚坐下，就听到：

“Aufstehen!”②

我惊奇地朝他看了一眼。他重复了一遍，同时用手指的关节敲着办公桌：

“Aufstehen!”

我站了起来。他笑起来。押送者也笑了起来。

“Setzen!” 军人重复了一遍。只是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继续站着。

“Setzen!…” 头发梳得光光的人高声吼叫起来。我还是站着。我的虐待者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又笑了起来。他笑着打了我一个耳光。

“Setzen!”

我抓住椅背，坐了下来。

“Aufstehen!”他命令道。

我站起来。

“Setzen!”他紧接着命令。

我摔倒在地上。于是我躺下了。不知是谁朝我的肋骨处踢了一脚。

“So was dämliches,”传来了发音不准的声音。“Geschi-

---

① 德语：“坐下!”

② 德语：“站起来!”

ckte Schausplerin ist sie auch…Ruf die Auguste."①

我继续躺着，紧闭着眼睛。接着我听到，押送我的人出去了。很快他又回来。他身后跟着靴子着地的笃笃声。我透过睫毛看了一眼，看到来了一个女人。她穿着靴子、裙子和带骷髅标志的党卫军分子的上衣。

"Heil Hitler,"②她说。她的声音像破钟，不过仍然保持着抑扬婉转的余音。她在年轻时代大概长得很招人喜欢。但是，现在她的胯股极大，脸盘宽阔而又虚肿。

"Wo ist das? …Aha."③

"Mach nur,"④发音不准的军官说。

我握紧拳头。如果这个女人当着两个渴望看戏的男人的面对我动手的话，这可是一种新的侮辱，于是我向自己保证，我要抓瞎她的眼睛。但是，我错误地估计了力量的对比。她只是抓住我的领子和腰带，用力一拉就让我站了起来。她比我强壮十倍。现在我可以看清她的脸了；满脸雪青斑，似乎她经常喝酒。似乎她过去一直放荡不羁，享乐无度，可能现在也是这样。要不然，现在她大概只是嗜酒如命。当然还是一个暴虐狂。

"Na!…"她说着，轻轻地擦了擦手，好像在拂去手上的灰尘。"Was wäre noch gefällig?"⑤

她说着朝我转过身来，仿佛在开玩笑。可是谁也没有笑。头发梳得光光的军官命令：

"Einzelzelle."⑥

---

① 德语："瞧，这该死的……她还是一个挺有才华的演员呢……叫奥古斯塔来。"
② 德语："海尔希特勒。"
③ 德语："她在哪儿？……啊哈。"
④ 德语："动手吧。"
⑤ 德语："就这样！……还需要干什么？"
⑥ 德语："单人牢房。"

女党卫军分子抓起我的手，把我拖出了房间。我们穿过了一条大走廊。我觉得，这是连成长长一排带门闩的钉满钉子的黑门——真正的要塞门。奥古斯塔目不旁视。她拖着我一直往前走，从“保安部”其他工作人员身旁走过去，从一个肩上搭着一条灰口袋的看守——他拿着一件脏衬衣——身旁走过去。看来奥古斯塔无所畏惧，就连我都不由自主地有这种印象。不过，有一点我确实羡慕她，那就是她那健壮的身躯里这股傻力气。她的手像把钳子牢牢地抓住我的手。她走起路来，铁器都震得哐啷哐啷直响。

穿过楼梯，我们走到高走廊的尽头。她朝一个看守挥了一下手，吩咐打开牢房。然后她就把我往里一推。我摔倒在瓷砖地上，一头撞在一只木桶上。木桶里冒出一股刺鼻的石碳酸味，尽管我的嗅觉迟钝，可我还是闻到了。我扶住木桶，正要站起来，这时奥古斯塔又把我拖起来。她脱去我的风衣。她那双粗糙的手从我的腋下滑到胯股，然后滑到膝盖窝。我想抬起膝盖，击她一下，可她揍了我一下下巴，于是，我又摔倒了。她随手抓过我的风衣走了。我听到，门紧紧地关上了，锁咔嚓一声，一把保养得多好的锁。原来这里的锁也保养得很好。

我朝床铺爬去。这是一只塞满海草和蒙上一件马衣的口袋。我穿着裙子和高领毛线衣直挺挺地躺在上面。我再也不感到冷了。我只想着一件事：睡觉。我刚躺下，就听到一声特有的咔嚓声。牢门上一个铁的监视孔打开了。奥古斯塔用颤抖的声音朝我喊道：

“Aufstehen! Verboten am Tag auf den Betten zu liegen!”①

① 德语：“起来！白天不准躺在床上！”

我什么也没说，就从床上滚到地上，躺在瓷砖地上。我闭上眼睛。又听到门上可恨的、响亮的咔嚓声。我进入了梦乡。

我打破沉默

……整整一个星期，“保安部”没有惊动我，奥古斯塔我也只是偶尔见到。我的牢房是用灰石灰抹的，下半部用油漆漆成黑色。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用湿刷子打扫牢房。旧海草散发出一股酸臭味，在我之前，上面已经睡过不计其数的犯人。角落里放着一只破柜子，有两层搁板，上面什么也没有。一张小桌子钉在墙上，就跟我在哈勒姆住过的牢房一样。桌子上方挂着牢房条例，我没细看，甚至两天之后我感到恢复了体力，开始寂寞的时候也没有去看。

牢门一清早就打开了。我把自己的木桶放到走廊里。我从来没看到过的那些人，把木桶拿出去，拿回来时已经刷得干干净净。一个穿连衫裤工作服的矮个子端来一小脸盆清水。水冷彻骨。我洗完脸，用手帕大小的毛巾把脸擦干。毛巾也有一股酸味，就像浸透汗水的海草垫一样。水倒掉了。半个小时后，看守来了，他递给我一块两英寸厚的面包。第一天，我反复打量着面包。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塞给我的是毒药。要不然他们为什么给我面包？接着我用牙咬起面包，把它全吃了，就像当时我们吞下瑞典白面包那样——一口气就把面包吃得一点不剩。不去愁今后怎么办。每天早上，我都盼望送来面包，像遇险的船员盼望着远处出现轮船那样。我每天都感到高兴和惊奇，因为他们又给我面包了。

这天早上，我站在窗下，听着从街上传来的声音。在附近的

运河里，有时小火轮鸣笛。这些声音听起来是那样微弱，好像这座大城市的机体已经虚弱不堪，并且打起了瞌睡。只有海鸥仍像以前那样在飞翔。但它们也饿得直叫。

我常常躺在草垫上——每天早上我照常把它抖干净，这是按规定的方法做的。看守几乎不用开口很快就教会了我这一点。我躺在床上休息。我觉得，我摆脱了要求我使出全部力气去做的千百件事情后应该休息。有时，门上的监视孔猛地咔嚓一声打开了。奥古斯塔不止一次地嚷嚷着，白天不准躺在床上。等监视孔一关，我又躺下了。有时，奥古斯塔一天要把我从草垫上赶下四五次。

这天早上，门又打开了。看守让我到走廊上去。囚犯们从六间牢房里走了出来。只有几个人穿着囚衣。大多数被捕者是二十至三十岁的人，他们穿着普通衣服，没穿大衣。我是唯一的女人。男人们都惊奇地看着我。我们拖着步子，从铁梯下面穿过走廊来到出口处，走廊在这里分为六个方格。我们每个人走进一个长方形的栅栏里。我们在这里呼吸新鲜空气。我不知别人感觉如何。开头几天，我冷得浑身蜷缩成一团。每一块石头，每一块楔入石头里的铁都冒出一股寒气。

在这些栅栏里歪歪斜斜地刻着名字。然而，牢房的灰泥墙上的题词更多。锚，十字架，一些我不理解的符号。有一首用铅笔写的诗，我很快一字不漏地背下了。其实，这只是诗的开头：

> 生活多么艰难，躯体备受摧残，
> 然而精神能压倒这罪恶的世界。
> 面对恶行处处的大地，
> 精神唯有冷眼笑看。

精神获胜的日子必定到来，
我们将奋起去把自由迎接……

诗到这里结束了。我反复思考着，如何把诗续下去。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打算写诗。可我不会押韵。大概这首诗的作者的情况也是这样。

快到中午时，我饿得难受极了。我焦急不安，盼着锁里响起钥匙轻轻的转动声，看守拿着食物走进来的时刻。每次我都感到惊奇，我又得到了食物。这是一种像汤一样的食物，里面浮着类似大麦粒一样的米粒，一点土豆加上一些菜茎。汤稍微有点温。我狼吞虎咽地吞下了它。

开头几天，我什么也不想。我完全切断了自己的思路——我感到，要恢复自己的精力，这是唯一的机会。我的身躯在努力战胜疲倦。身体正在静养，吸收食物，它不允许任何思想和念头去妨碍恢复精力。只是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我才开始想起时间在流逝。我用汤匙把在墙上刻上日期。我计算出，已经是三月二十五号了。突然恐惧在我心里开始活动起来。我开始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我想到，外边正在发生一连串的事件，而我却再也不能参加了。只是现在我才彻底认识到，我完全退出了斗争，退出了反对敌人的积极行动。我的斗争结束了。

我听说，人被单独监禁后会发疯。开头几天，我觉得很幸运，我一个人关一间牢房。现在我才感觉到需要同人交往。我渴望知道世上正在发生的事。我直截了当问晚上给我送汤的看守：

"外面情况怎么样？"

他疑惑不解地看了我好几秒钟，当着我的面把门砰的一声

关上了。

有一天早上，我们走出牢房放风时，我低声问走在我前面的人：

“有什么消息？”

他头也不回，耸耸肩膀。有人从走廊里用德语喊道，不准相互交谈。突然有一个人快步朝我们跑来，这是奥古斯塔。

“Du also wieder!”①

接着她给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摔倒了。她把我拖回牢房。这一天，我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给我单独放风。

早晨不再给我面包了；只是晚上我才得到一份用碎米和菜皮做的稀饭。我二三十秒钟就吃完那一小盆。我手握着铝制的汤匙，心里想：

“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难道他们在外边不知道我关在这里？以往我们的人被捕了，我们大致当天就能得知此事。这样的消息传起来很快。保罗通知维耳曾指挥所了吗？”

“维耳曾，”我想，“德里海斯，布隆缅达……”所有一切老是出现在我眼前：蒙上白雪的房屋，覆盖着一层厚厚积雪的花园，毁坏了的道路。后来我想起人们。我们的指挥所……突然，被我久久压在心底的那股充满绝望的湍急的暗流涌上我心头，我所极度害怕的回忆被唤醒了。我准备呼喊，我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同志。

我坐在小桌子旁哭泣，我为我被关进牢房哭泣，为同志们，为父母，为自己孤立无援哭泣。

我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

① 德语：“这又是你!”

保罗根本没有通知维耳曾人，他们不知道我被捕了。当他转过脸去，不理睬我时，就已经证明，他根本不管我的事。

然而，维耳曾人不通过保罗也能知道我被关在这里。他们有许多关系。哈勒姆警察局就可以把我的事通知他们。弗兰斯，或者安和金卡也会通知他们。他们有几十种方法，能打听到我在哪里。

我驱赶着越来越顽固地回到我身上的想法。英国情报机关和盖世太保……我觉得，仿佛我在窃听我心里的各种声音。他们扔掉旧衣服、穿上新制服……但是秘密情报仍留在头脑里。有些人知道双方的秘密太多了。他们应该消失……维耳曾指挥所知道消灭人的各种方法，虽然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把一个犯人从监狱里救出来。他们完全知道，应该怎么救！他们也完全知道，应该救谁，而不救谁。“他们真的在开什么玩笑？”我听到一个姑娘愤慨的声音。三个青年女共产党员从来没学过开这样的玩笑。她们只是帮维耳曾人做这种事，却不明白他们在耍什么把戏。由于思前想后，我在监狱里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事情确实如此：我反对的想法，不仅仅说明了一切，还打破一切希望。

第二天，我在放风的栅栏里踱来踱去，我看到在一堵石墙旁有一个极小的纸卷儿放在碎石上，纸卷一半被湿雪盖住了。这是一张卷烟纸。

我马上用脚踩住它。接着谨慎地环顾四周。我站在那个地方，从墙上的窗子里和缺口里都看不到我。我俯下身子，把纸卷儿塞进袜子。

我回到牢房，背朝着门，背朝监视孔，打开小纸。上面用像针一样细的铅笔写着什么。我费力地看完了纸条，上面写着：

“俄国人正在朝维也纳推进。英国人在韦塞尔附近渡过了莱茵河。伦斯德已由凯塞林①接替。美国人出现在日本水域。英国人又夺取了曼德勒。”

我不知道，曼德勒在哪儿？是在马六甲半岛还是在缅甸？但是问题不在这儿。这是一些消息。纸条带来了一线光明。不知是谁把它送来的，把他知道的东西传出来。

我开始背这五行字。我朗读了一遍，而后又默诵了一遍。我把纸条扔进了木桶，可是后来我想：我有权拿走纸条并把它毁掉吗？也许应该把它放回原处——留给别人看？我一想到刚刚得到的那些最新消息，就忘掉了从昨天起就老是纠缠着我的那个可怕的念头。那是我不能忍受，但必须忍受的念头……

忧郁的阴影就要湮没我的理智。疑虑之害虫咬啮着我的心。但我不允许自己屈服于它。

我想尽办法，使我的思想转到其他方面去。我想证实一下，我是否还记得民法典中的许多条款。我想起了我在阿姆斯特丹车站私下应考时，我的老教授提的一些问题。我朗读了所有我还记得的海涅的诗。我给自己出了一些数学题进行解答，同时进行复杂的论证。

第二个昼夜过得很慢很慢。

每天我到用石块和楔入石块的铁条垒成的栅栏里去呼吸新鲜空气时，我总先看看有没有从外边传来新消息。

可是，什么也没有。

种种不祥的想法控制着我：那个放纸条的人已经被带走了。可能甚至已经被处决了。这是由于劳特遭到袭击的缘故，或者由于对纳粹头目进行一连串我还不知道的新暗杀的缘故。

---

① 凯塞林，德国陆军元帅。

战争接近尾声。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俄国人进入了奥地利，正在进攻柏林。西方盟军到达了莱茵河。这是事实。

燃烧着的房屋每天都可能倒塌，每天……

我又开始在墙上刻自己的日历。我没来得及把日历刻完，奥古斯塔和值日兵来到我身后。他们又把我带到上次那个头发梳得光洁、胸前佩戴勋章的军官坐的那间令人沮丧的绿房间。军官现在也坐在那儿，好像他没从这儿离开过。

我看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我所熟悉的东西。一捆从我身边夺去的地下报纸，一支手枪，旁边是从手枪里退出的几颗子弹，还有一张身份证。

德国军官朝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走近些，并且指了一下站的地方——办公桌旁边。一盏电灯直接照着我的脑门和眼睛。奥古斯塔站在我身后，这是我根据她那被军服绷住的胸部发出的沉重的呼吸声听出来的。

军官仔细察看着我的身份证。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这几天里，我能吃，能休息，能睡。以前的那种疲倦不堪的感觉在我身上消失了，使人丧失气力的饥饿也消失了。我感到，我能反抗了。可我就是不知道，这张身份证上填的姓名和年龄。在牢房里我不止一次地竭力回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这始终是个空白。我只好奉行以前的那条路线。

“Name?”①军官终于问道。

我沉默不语。

“Name?”他重复了一遍，首次把目光从身份证上移到我身上。他发音很不清楚，两道眉毛在鼻梁上连在一起。他那一头梳得光洁的头发，彬彬有礼的外表，显得更加虚伪。我什么也不

① 德语：“姓名?”

说，接着我感到肩胛骨之间遭到奥古斯塔有力的一拳。

"Wie heissen Sie?"①军官问。

我沉默着。奥古斯塔朝我的背又打了一拳，两拳，三拳。然后往下直接对准腰部打，打得疼极了。军官把放在办公桌上的我的那些东西翻动了一会儿，然后说：

"Die Komödie mit dem Schweigen hat Keinen Zweck. Sie reden jetzt, oder ich lass Sie zum Reden bringen."②

我什么也不回答。军官朝奥古斯塔看了一眼。他的嘴微微一撇。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突然奥古斯塔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她把我的头发往后猛地一拉，另一只空着的手使劲打我的耳光。我不知道，她打了多少下。我的头开始旋转起来，身子也摇晃了。血涌到了脸上。我挣脱出来，弯起胳膊就往后打去，甚至打中了奥古斯塔。这下女党卫军分子就越打越厉害了。我听到，她气喘吁吁——既粗重又不均匀，看来她马上要野兽般的吼叫起来了。我再次往后击去。她回了我一下，把我打晕了。我只感到，有一个人用靴子朝我肋部踢了一脚，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过来时，我坐在椅子上，身子靠在一侧。军官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令人可憎而得意地冷笑着，当时我不明白这种笑是什么意思。奥古斯塔站在我身旁。她那红肿的脸也变形了，好像她也在笑。她手里抓着我的一绺头发。这时，我感到浑身湿透，好像被人用水浇过似的。我的牙齿打战，头发也是湿的。只是现在我才明白，军官和奥古斯塔为什么笑。奥古斯

---

① 德语："您叫什么？"

② 德语："演这种沉默的喜剧，是没有好处的。你马上就说，还是我强迫你说。"

塔手里的一绺头发像烟子一样黑，然而透过这黑色清清楚楚地露出了棕红色。

“Erholt sich schon,” 奥古斯塔说。“…Na, stumme Liese, wie wäre es, wenn wir dir mal schön die Haare wüschen?”①

“Sofort machen,”②军官说。

奥古斯塔一把将我拉起来。她一只手抓住我的领子，把我从房间里拉出去，像上次那样，拖着我走过走廊。她吩咐看守打开我的牢房，把我往里一推，接着她就不见了。但是不到五分钟她又回来了。我靠在小桌子上，不知道想什么，做什么。我再同奥古斯塔斗，她又会把我打昏过去，反正她现在可以对我随心所欲。

奥古斯塔端着只脸盆回来了，脸盆里倒满了热水。她还拿来了肥皂和毛巾，她把肥皂和毛巾放在小桌子上，然后放下脸盆。她那张红肿的脸上仍然流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Haare waschen,”她说。“Dalli, dalli, dalli.”③

她决定自己动手，卷起我的袖子。我推开了她。她冷笑了一下。她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敲着小桌子，看着我脱下高领毛线衣，把肥皂拿在手里。我开始洗头，洗得很慢很慢，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感觉——既有温暖的香皂沫淹没我的头而带来的惬意，也有女党卫军分子强迫我执行她的命令而带来的痛苦和屈辱。

奥古斯塔几乎要跺脚。

---

① 德语："已经醒过来了……那么，哑丽泽，我们好好替你洗洗头发，将会怎么样？"

② 德语："快洗。"

③ 德语："洗头……快，快，快。"

"Dalli, dalli."她重复着。

我开始用她递给我的厚厚的大毛巾擦干头发，她默默地注视着我。

潮湿、温暖的头发暂且无精打采地往下垂着。当我把头发擦干梳平后，我曾经熟悉的绺绺棕红色的头发，完全恢复了湿润的红光。

"Wasser abspülen,"①奥古斯塔说。

我把脸盆里发黑的脏肥皂水倒入了木桶。接着我穿上高领毛线衣。

"Mitkommen,"②她说。

我们回到了走廊，我的体内涌起了一种痛苦的、温暖而又清新的幸福感，同时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难受的忧郁感——恐惧，前所未有的真正的恐惧！

我又变成了一个红发姑娘。警察局的登记簿上写的就是红发姑娘。他们就要认出我，这我丝毫也不怀疑。现在清楚了，黑头发至少保护了我整整一星期——我要说这是安宁的一星期。但是，现在失去了保护，伪装消失了。

奥古斯塔把我带到军官跟前。她仍然像上次那样站在我背后。军官开始仔细打量着我，暂且还看不出什么。湿头发零乱地垂在脸上。但是，从他仔细打量我这一点来看，我感到，我的外表起了变化。

他慢慢地从自已的椅子上站起来，手指头按在办公桌上，说：

---

① 德语："把水倒掉。"
② 德语："跟我走。"

"Das sind Sie also nicht,"①他拿起身份证，举到眼前。"Hier steht, dass Sie schwarze Haare haben. Allerdings hatten Sie die vor einer halben Stunde. Es werden aber auf Identitätspapiepen keine Vermummungen verzeichnet, aber richtige Daten…Und wer diese Daten fälscht, macht schuldig an einem schweren Verbrechen…wissen Sie das?"②

最后几句话他照例又是吼出来的。他那冷酷光洁的脸庞突然变了样，上嘴唇翘起来，就跟一只发怒的狗的嘴唇一样。

我沉默不语。

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这一次他没把打我耳光的权利让给奥古斯塔。他赶忙来打我。我深信，他那干瘪的、被军服紧裹着的身体，比起女党卫军分子的长满脂肪的肌肉来，显得更硬实，更无情。他朝我使劲一击，打得我一头撞在墙上，然后倒在地上——我喘不过气来。

"Du hundsföttische Terroristensau!"他发音不清，气喘吁吁地骂了一句，好像泡沫在他的喉咙里咕嘟咕嘟翻滚。"Wirst du jetzt sprechen?"③

我站起来。我觉得脖子、背脊和腰都折断了。我舒展开双肩，接着挺直身子。我透过潮湿的、刚刚洗过的头发看了军官一眼。慢慢地摇了摇头。我等待着他第二次更残酷无情的暴怒。我看到，奥古斯塔的手急不可耐地抖动着。军官深深地喘了一

---

① 德语："这么说，这不是您。"

② 德语："这里写着，您的头发是黑的。不管怎样在半小时之前是黑色的。证件上没有指明任何伪装物。上面只有准确的材料……而那个伪造这些材料的人，犯有重罪……这您知道吗？"

③ 德语："歒，你这卑鄙的恐怖猪！……现在你说不说？"

口气。

“Abführen，”①他命令。

他朝电话机走去，而奥古斯塔把我朝门口推去。当我走到门口时，军官出人意外地咯咯叫起来，好像他突然想出了办法，可以对我进行野兽般的惩罚。

奥古斯塔用力把我推进牢房。

我躺在床上哭着，抑制不住地痛哭着。我哭是因为疼痛，因为受到了侮辱，因为恐惧再次牢牢控制住了我，就像当时宪兵逮捕我时那样。牢房里仍然散发着一股我用香皂洗头留下的浓烈的香味。

我哭，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种保护也同头发上的颜色一起消失了。我亲自在最近的我——坚如铠甲、久经锻炼、守纪律的人——和以前红头发的我之间建造起来的墙轰隆一声倒塌了。我成了一个无力自卫的人，一个普通的汉娜·斯。我看到自己在海滨沙丘间的小径上走着；我那棕红色的头发轻轻地在耳边飘动着；有一个人迈着灵活细短的腿走在我身旁，默默地看着我的脸。

我躺在床上，手里握着头发，激动而又贪婪地抚摩着自己的头发，仿佛我，一个遍体鳞伤和无以慰藉的人，终于自己回想起了这段往事，痛苦地享受着我以前从不允许自己享受的回忆。

暮色降临了；这是三月里的一个寒冷的、阴沉沉的傍晚；外面传来了海鸥的惨叫。

看守敲了敲门，我从他手里接过饭钵，把它放到一边。我不感到饿。我谛听着饥饿的海鸥的叫声。在外边挨饿受冻总比关在牢房里要好受些。铁窗把我同外界仍然生存着和反抗着的一

① 德语：“带走。”

切都隔开了；同时铁窗好像把我在外面丢失的东西全都归还了我。往事像一个喝得酩酊大醉、幸福之极的人出现在我眼前！似回忆，似有魅力的幻想，似失去了的幸福的幻影。

我在床上躺了两昼夜，陷入沉思，陷入痛苦。我不吃，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也不感到冷。我躺在草垫上，望着窗子的砖拱，被种种回忆所左右。谁也不朝监视孔里张望，谁也不再向我喊"白天不准躺在床上"。

头发干了。松散的头发遮住了我的头，披在肮脏的马衣上；头发微微鬈曲着——我又有了一种感觉，这是我的头发涂上粗糙的黑颜料后不曾有过的。我闭上眼睛，心里想着半倒塌的混凝土工厂，想着牲畜棚，想着我们在树林里的安身之处，想着散发着苦味的高大的蕨类植物、帚石南和草地。那时我也是这样躺在草地上，我的头埋在柔软的、厚厚的、松散着的头发里。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当时显得那么丰富，那么充实，那么舒适。我不再哭了。我就这样躺着，感到我的心情变得轻松了，我几乎能笑了。

两昼夜……

后来奥古斯塔来了——她同值日兵一起来的；当他们带我去受审时，值日兵总是走在我的左边，我看不到他的脸，只听到他靴子踩在监狱走廊瓷砖地上发出的声音。我被带到"保安部"的那个军官那儿，于是我又产生了一种印象，好像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这里，白天黑夜都坐在这里审问和折磨人。

他朝奥古斯塔做了一个手势。她把我往前一推，推到刺眼的灯光直接照着我眼睛的那个地方。我低下头，避开耀眼的光线。奥古斯塔的胸部在我身后可怕地起伏着，随着一起一伏，她身上的衣服沙沙作响。

我朝办公桌那儿看了一眼，还是像上次一样，上面摆着我那可怜的财产。

接着我看了军官一眼。他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仿佛我的突然出现使他措手不及；一瞬间，这使他变得像一个虚弱不堪的人。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说：

“So sehen Sie also aus…”接着他更加刻薄地补充说，似乎他已经战胜了他认为不可饶恕的感情。“…Hanna S.!①”

我死死盯着他。他哈哈笑起来。这是一种不自然的佯笑，是猎人终于捕获野兽后的洋洋得意的笑。

他从办公桌上拿起身份证，戳到我脸上。

“Falsch, natürlich. Verbrechen gegen die Besatzungsbehörden!”②

然后他把证件扔在桌子上，拿起一捆秘密《真理报》，递到我面前。

“Illegale Zeitungen. Verbreitung von Feindespropaganda…Feindeshilfe, Kurzum.”③

他拿走了报纸，看了看手枪，接着又笑了起来，尽量笑得含蓄、阴险，带有挖苦的味道。

“Und zum Schluss: bewaffneter Terrorismus. Da braucht man nichts hinzuzufügen. Was?”④

我沉默不语。他又哈哈笑了起来。

“Natürlich schweigen Sie. Wollen Sie diese Fakten

---

① 德语：“原来是您，这么说，看来您是汉娜·斯。”
② 德语：“当然是假的，是反对占领者当局的一种罪行。”
③ 德语：“秘密报纸，进行敌对宣传……简单说就是助敌。”
④ 德语：“结论：武装恐怖，对此没什么补充吗，啊？”

etwa verneinen?"①

他指了指手枪、报纸和身份证。

我沉默不语。军官耸耸肩膀，然后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印好的表。我马上认出了它：警察局的通缉单，上面登着我的照片和告大众书——尽快把我（最好是活的）交到占领当局手里。他把表翻过来，使我能看到，上面写着什么，接着他用铅笔尖指着我的照片。

"Das sind Sie…Oder nicht?"②

我沉默不语。

"Wir wissen alles，"然后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说。"Sie können ruhig alles gestehen…"③

他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情，又刻薄地微微一笑：

"Hier irren wir uns nie. Hier entwischt uns keiner."④

我什么也不说。他抬起头。接着向值日兵做了一个手势。

"Frau Wemeldinge hierher…"⑤他命令道。

值日兵出去了。我听到他在隔壁房间说话。很快他同另一个人一起回来了。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他带来的人。我看到了一个艳装粉面的人。我顿时觉得她有点儿眼熟，尽管我不能判断，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我竭力回忆着。我那贫乏的、疲惫不堪的记忆竟然出现了那么多的空白点！

---

① 德语："当然，您不会开口……您也打算否定这些事实吗？"
② 德语："这是不是您？"
③ 德语："我们全都知道……您会心平气和地承认一切……"
④ 德语："在这里我们从来不会弄错。在这里谁也瞒不过我们。"
⑤ 德语："叫韦梅尔丁格夫人到这里来……"

“Sehen Sie die Dame an!”军官发音不准地说。“Damit sie sich Ihre Fratze besehen kann!…”①

然后他又朝那个女人转过身去，口气完全变了，一副普鲁士人奴颜婢膝而又彬彬有礼的样子，讨好地问：

“Na, Frau Wemeldinge…was ist Ihr Eindruck?”②

“就是她！”女人说。她伸出一只白皙的、微微颤抖的手指着我。“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她和另外两个姑娘……她们用自行车挡住路，毫无道理地阻拦我……我说，抓不到杀人犯简直可耻……她们装作什么也不明白……”

“Bitte,” 军官说。“Dies Mädel war also betätigt beim Attentat auf den Scharführer Obbe Schaaf?”③

他发“斯哈弗”这个名字时，好像在说德语单词“Schaf”④。

“她是否参与这件事？”女人吼叫起来。“仁慈的上帝啊！……要知道，她是整个匪帮中最恶劣最不可救药的一个。”

我死死盯着女人：奥别·斯哈弗的情妇。我生平只见过她一次，她也见过我一次；当时她穿着一件火红色的睡衣，而我穿着风衣，那时我的头发染成了黑色。我耸耸肩膀，转过脸去，不去看她，可她还在继续吼叫：

“不许把脸转过去，杀人犯！你说过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无论如何你是一个同谋者！”

军官举起一只手，阻止女人就要脱口而出的一大堆脏话。

“Sie haben das Mädel von der Photographie erka-

---

① 德语：“您看看这位太太……她能认出您的面目。”
② 德语：“那么韦梅尔丁格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③ 德语：“好吧……这么说，这位姑娘曾经卷入暗杀奥别·斯哈弗下士事件罗？”
④ 德语：绵羊。

nnt, nicht wahr?"①他给她看警察局的报纸，说。

"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叫道。"她当时还对我说，为我打电话到警察局去！"

我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偷偷地笑起来。她根本没有认出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关于打电话的话是安说的，而不是我。军官一下子朝我转过身来。

"Warum lachen Sie?"②

我没有回答。

他又朝韦梅尔丁格夫人转过身去，对她表示感谢，然后他做了个手势，请人把她送出去。接着他站起来，从我身边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他打开门，接着我听到身后他的声音。

"Bitte, bitte sehr··· liebe, verehrte Frau Cheval···"③

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时，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我朝前面办公桌腿之间铺着的旧地毯看了一眼；看来军官有一种把脚放在地毯上的习惯。我听到一阵碎步。一股淡淡的法国香水味朝我飘来，我被香气淹没了，刺得粘膜痒痒的，我差一点儿打喷嚏。我紧紧眯起眼睛忍住了。我重新睁开眼睛，看到舍瓦尔夫人站在我身旁，不过她已经是穿着另一件大衣，戴着另一顶皮帽子；面纱也掀掉了。她的脸圆圆的，就像洋娃娃的脸似的，毫无任何表情，一双眼睛凸出，嘴唇薄薄的。军官站在她身后，似乎他亲自把她领到我跟前。他在她的背后深深地鞠了好几个奇怪的躬，而她则用自己洋娃娃似的朱红的嘴朝他微微一笑。她垂着眼帘，站在那儿，一直到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

---

① 德语："您是不是根据照片认出姑娘的？"
② 德语："您为什么笑？"
③ 德语："请吧，请吧……亲爱的，尊敬的舍瓦尔夫人……"

他把两手的指尖合在一起，温和地说：

"Ihre Aussage, liebe Frau cheval!"①

舍瓦尔夫人看了我一眼。只是在这个时候，她脸上才流露出一种表情：她的嘴唇上流露出嘲弄的、复仇的讥笑，弧形的眉毛拧在一起，眼睛发暗。这使她同时像人又不像人，至少在她身上那股洋娃娃的味道已经一点都没有了。她从涂着口红的嘴唇里慢慢地挤出话来：

"Das ist sie. Ohne Zweifel. Hab sie sofort wiedere-rkannt. Würde sie und die zwei andern überall und so-fort wiedererkennen. Hat wenigstens drei, vier Mai auf mich geschossen…"②

她挺直身子，她的眼睛闪烁着仇恨和鄙视：

"Ich lebe noch!.."③

她朝我看了一眼，好像现在该我说话了。我转过身去，不去理睬她，保持沉默。

"Na, Hanna S.?" 军官问。他仍然温和地说着，不过已经带着讽刺的口吻："Haben Sie nichts zu erklären? Zu verneinen vielleicht?"④

我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又走到舍瓦尔夫人跟前。我不知道，他向她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亲自（这是我听到的）把她送到门口。回来时他步子迈得很快。他坐到办公桌后面自己的位子上。他显然十分气忿，用铅笔敲敲桌子，

---

① 德语："您的证词，亲爱的舍瓦尔夫人！"

② 德语："是她，毫无疑问。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无论在哪儿我都能认出她和另外两个人……她至少向我开了三枪或者四枪……"

③ 德语："我还活着！……"

④ 德语："那么，汉娜·斯，您没什么要说？也许您想否认？"

说：

"Der Polizei-Inspektor hierher!"①

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又好奇地朝那个人看了一眼。一个身材高大、外表暴躁的人走到跟前，站在我身旁。这是警察局的稽查。就是喜欢说些恶毒无聊的双关语，曾经把安、金卡和我带入"乌鸦"去的那个稽查。这一次，他脸上没有流露出讥笑。他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愁眉苦脸。我再次瞥了他一眼。心怦怦直跳……

"Herr Inspektor…Haben Sie die Verhaftete jemals gesehen?"②

"Niemals," ③稽查回答。

军官不耐烦地用铅笔敲了敲桌子。

"Bitte. Sie haben sie kaum angesehen. Sehen Sie sich das Mädchen sehr genau an. Schärfen Sie Ihr Gedächtnis…"④

稽查冷漠地瞥了我一眼，喉结在他那军服的蓝领子上面慢慢地活动着。

"Na? ..Was sagt Ihr Gedächtnis?"⑤ 军官追问。稽查按军人的姿势朝他转过身去。

"Tut mir leid, Herr Oberscharführer. Hab sie niemals gesehen."⑥

---

① 德语："让警察局的稽查到这里来！"
② 德语："稽查先生……你以前见过这个被捕的人吗？"
③ 德语："从来没有。"
④ 德语："您瞧。您几乎没看她，好好看看姑娘，集中您的记忆力……"
⑤ 德语："怎么样？记忆力提醒了您什么？"
⑥ 德语："我十分遗憾，中士先生，我从来没见过她。"

军官再次朝办公桌俯下身子。

"Sie wissen das bestimmt?"①

"Bestimmt,"②稽查回答。

军官紧闭着嘴唇，默默地坐了片刻，看来他十分不满意。然后他抬起眼睛。

"Dann danke ich Ihnen, Herr Inspektor…Sie können gehen."③

稽查敬了个礼。军官高呼"海尔，希特勒"。他等到稽查走出房间，又站起来，用教训人的口吻发音不准地说：

"Der Inspektor hat Sie nicht wiedererkannt, weil Sie jetzt wieder Ihre rote Haare haben. Aber die Damen haben Sie sofort erkannt. Sie wissen wahrscheinlich selbst, dass die Frauen über ein viel ausgeprägteres Beobachtungsorgan verfügen als Männer. Es fällt ihnen erstaunlich leicht, Personen selbst nach langjähriger Frist ohne Zögern zu identifizieren."④

我没有回答。可是，听到这种荒唐的结论，我平静地、嘲弄地、若无其事地微微一笑。我的微笑使得他勃然大怒。我举起一只手，保护着脸，因为他已走到我身边。

"Du bist die Hanna S.!.."他发音不准地说。"Alle deine Schuftigkeiten sind uns ganz genau bekannt! Da

---

① 德语："您能肯定吗？"

② 德语："肯定。"

③ 德语："那么感谢您，稽查先生……您可以走了。"

④ 德语："稽查不认识您，因为您现在又是红头发了。可是太太们一眼就认出了您。大概您自己也知道，女人比男人更善于观察。她们即刻就能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一个人，即使过了许多年。"

hilft kein schweigen! Wir wissen alles! Du dämliches holländisches Flintenweib! Du gehörst nicht unter anständige Leute! Du gehörst zu den Tigerinnen von Stalingrad!..."①

我看了他一眼，挺直身子说：

"这是莫大的恭维。"

他死死盯着我看，好像他不能相信，我真的开口说话了。我听到身后有响动。我感到，我的刽子手奥古斯塔马上就要打我一个响亮的耳光了。接着我重复了一遍：

"对一个抵抗运动的姑娘很难想出更好的恭维话了。"

军官半张着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的话。可能，他精通荷兰语。但是，看到他脸上那种惊慌失措的愚蠢表情，可以作相反的推测。突然他后退了一步，猛地拉平自己的制服，发音不准地命令奥古斯塔：

"Abführen!.."②

恐　惧

从这一刻起，难以忍受的恐惧开始折磨我。它并不是萌生于我心灵的某一个角落，而是以可怕的力量又一次从头到脚地占据了我全身。我时时感到恐惧。吃饭时，老是把钢精汤匙放在一边；我在牢房里踱来踱去，突然停下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卡

① 德语："你就是那个汉娜·斯！……你的一切卑鄙的行径，我们完全清楚！在这种时候沉默不起作用，我们知道一切。咳，你是一个可恶的穿裙子的士兵！好人中间是没有你的地方的，你的地方应在斯大林格勒的母虎们的旁边！"

② 德语："带走！"

住了我的喉咙；我躺在草垫上都不敢入睡。恐惧甚至在梦中都不放过我。我睡着时，常常梦见掉进了漆黑的深潭。当我醒来时，恐惧也伴随我一起醒来。我身上仿佛有第二个汉娜。

敌人知道了我是谁。但是，这不是最可怕的；他们反正早晚会知道这一点的。我期待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怎么也不露面。我把墙上的日历刮掉了。四月来到了。

敌人不来打扰我了，表面看来似乎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总让我安静的。他们在疯狂地活动，想法用最后的蛛丝来捆住我。

我坐在牢房里，没有人从外面给我送来消息，给我发信号，也没有人来鼓励我一下。唯一真正帮助了我的人，是哈勒姆警察局的那个曾经令人讨厌的稽查。我过去把他看作敌人，看作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人。看来他的心无论如何和我属于一个阵营——祖国。

在审问我并同他对质之后最初一段时间，我想，这一下这个稽查会到自己的朋友那儿，告诉他们在哪儿遇到了我。维耳曾就可以知道此事。而这消息再从维耳曾传到我的同志们那儿，如果他们至今什么也不知道的话，那么现在已经知道一切了。现在他们就要做一切……

在以后的日子里，恐惧把这一点儿希望也给破灭了。我完全孤独了，伴随着我的只有恐惧。

我被带到外面的栅栏里。我发现，石块之间和铁栅栏旁的水泥膨胀开来，并从那儿冒出一股温暖潮湿的气息。这么说再也不会下雪了。土地变得松软，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浸透了融雪和春水。

冬天确实结束了。

一想到冬天结束了，我就欣喜万分，如果能到外面走走就好了。

恐惧甚至污染了我呼吸着的春日的空气。春天来了，明媚的春光和蔚蓝色的天空笼罩着监狱。就连十分昏暗和阴森的牢房，忽然充满反射进来的光线。它们闪烁变幻着，隐隐约约，让人感到舒适，好像天空在向我使眼色。我仿佛听到了阳光在胆怯地喃喃自语；在这些光线里，我看到了窗玻璃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灰尘，而窗外是清晰的栗树枝杈。

恐惧老是对我悄悄耳语着：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世上发生了某些变化，那么这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与你无关。

我心里想："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我在心里反复说着这句话，直到它失去任何意义。没有人同我在一起，谁也不到我这儿来，只有一个看守，一个像机器般的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一个零。当我问他"情况怎么样？"时，他甚至连回答我半个字的勇气都没有。

我望着春天的天空。外面风在怒号，而我甚至没想到，这样的天气有利于开展军事行动。

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这么长时间不来提审我。这一事实本身进一步加剧了我的恐惧。我在墙上刻上日历：四月九号，十号，十一号……有时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阻止了战争的结束。

也许德国人到底同西方盟军单独媾和了……难道纳粹分子把他的军队从西方统统撤了回来，从而堵住了俄国人通往柏林之路吗？也许，也许……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些古怪的念头。我好像觉得，我周围的东西在挤眉弄眼，用嘲笑的目光看着我，

在黑暗中我仿佛看到了它们的闪光。

奥古斯塔和值日兵来到我身后。跟往常一样，他们都是突然出现的。我发现，恐惧帮了我倒忙。我沿着一条条铁走廊，从包着铁皮的黑门旁走过，但是我身上却缺乏以前那种坚定信心。我预感到了一场新的审讯，但是他们将问我什么，对我说什么，却一无所知。

奥古斯塔把我推进那间绿房间。军官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过了一两分钟，他令人摸不着头脑地朝我挥了一下手。看来奥古斯塔明白了这个手势。

"An die Wand,"①她命令道。

我走到墙跟，背朝墙站着。她狠狠地抓住我的一只手，把我转过去，并气喘吁吁地说：

"Weg mit der Schnauze, du!"②

我转过身去，背朝房间站着，我不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什么。

根据奥古斯塔那健壮的胸部粗重的喘息声，我感觉到，她就站在或者坐在我身后。我听到，军官写字的声音和笔尖划破纸的声音。一束耀眼奇怪的亮光闪着暗淡的金光，在失去光泽的糊墙纸上滑过。一只苍蝇在光束里飞过。我注视着它。我吓得浑身不敢动弹。

时间在流逝，可是一切仍然照旧。突然我听到外边响起了汽车的声音。不知什么砰的一声关上了，发出很响的撞击声，接着传来了含糊不清的、压低了的说话声。这些声音好像顺着一条细小的链子传遍整幢大楼。显然能感觉到一种不安的气氛，这

① 德语："站到墙那儿去。"

② 德语："把嘴脸转过去，哎，你！"

不安的气氛似乎就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汽车声越来越近，一声呼喊结束了汽车的响声。

"Achtung!.."①

椅子腿吱地响了一下；我明白军官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我觉得，奥古斯塔的喘息加快了。

有人打开了门。几乎同时响起两个男人的声音——一个是军官的声音，另一个是陌生人；传来了响亮的致敬，其中包括站在我身后奥古斯塔的："海尔，希特勒！"

门砰的一声关紧了。有一个人走进房间，不慌不忙地朝我走来。他在我身后站住了。接着就再也听不到什么了；看来，这个人在仔细打量我。我咬紧牙关。不一会儿我感到自己的肋部被拐杖或者皮鞭轻轻的触动。

"Drehen Sie sich um,"②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

我转过身去。接着我朝军衔高的党卫军分子那张蜡黄狭长的脸看了一眼。他没戴制帽，可我看到他的领子上有镀银的骷髅标志；在他制服的黑色袖口翻边上也有这样的标志。在左上衣口袋上佩戴着一枚带有饰物的铁十字。饰物大概是剑和橡树叶，我心里想。另外，他的胸前挂着不少银质勋章和奖章，从锁骨一直挂到肚子上。靴子跟腰带和枪套一样是用淡褐色的软皮制作的。我又朝他的脸看了一眼。我在哪儿见过他。他冷淡地、但仍然仔细地看着我。一双眼睛是灰绿色的、模糊的，尽管他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正是这种不坚定不集中的眼神表明了他的内心虚弱，尽管他千方百计想装成一个毫不动摇的人。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时，我甚至觉得，他变得更矮小了，而

① 德语："注意！"
② 德语："转过身来。"

我自己却高大起来。

“Das ist sie also,”党卫军分子说。“Das Mädchen mit dem roten Haar.”①

“Jawohl, Herr Sturmbannführer,”我的军官那么心甘情愿、奴颜婢膝地回答，这使我明白这个总带着审视的目光的黄脸人是法西斯匪帮的一个大头目。“Es ist die Hanna S.”②

“Sieht aber ganz harmlos aus,”少校（这个爵位是什么意思，我一无所知）说。“Unglaublich.”③

他把一只手塞进上衣口袋里，掏出单片眼镜。然后把它放在右眼窝上；在他那只保养很好的细细的手上戴着一只很大的宝石戒指，在浅色的蛋白石上刻着骷髅。党卫军分子仔细地打量了我好一会儿，好像单片眼镜帮助他弄清了我的内在特性。然后他又一次重复道：“Unglaublich。”

军官用手势请党卫军分子到办公桌那儿去——没有一个奴才能比他做得更道地的了——并说：

“Wenn Herr Sturmbannführer belieben sich setzen zu wollen?”④

少校挥了一下手，拒绝了。他一撇嘴，嘴唇上面好像出现了一撮淡淡的小胡子，看上去像在笑一样。他看着我说：

“Danke. Ich stehe gud. Den Damen gegenüber soll man sich galant benehmen. Nicht war, Fräulein S.? Besonders wenn sie so grosse Tiere sind…”⑤

① 德语：“这么说，这是她……红头发姑娘。”
② 德语：“是的，少校先生，这是汉娜·斯。”
③ 德语：“然而，她看上去完全像个无辜的……不可思议。”
④ 德语：“少校先生是否需要坐下来？”
⑤ 德语：“谢谢。我站着很好。对女士们应该有礼貌。不对吗？斯小姐？特别是当她们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时。”

我发现，他挺着胸膛，双手叉腰，手里确实拿着根短马鞭，尽管他是坐汽车来的。他俯身对我说：

"Ich irre mich doch nicht? Sie haben, sozusagen, die ganze illegale kommunistische Partei in der Tasche?"①

我什么也没说。他不出声地笑了起来。

"Ach ja…Ich vergass. Sie sind die grosse Schweigerin. Die bloss einmal den Mund geöffnet hat. Als man Ihnen sagte, Sie seien den Tigerweibern von Stalingrad ähnlich…"②

他又挥了一下手。

"Alles Wurst, alles Romantismus… Wir sind nüchterne Leute. Wir stehen zwischen Leben und Tod, Fräulein S… Wir wäre es, wenn sie die Tasche umkehrten und mir auf der Stelle, ganz einfach, die Namen Ihrer kommunistischen Kameraden aufzählten, samt den Stellen, wo man sie finden kann?"③

我什么也不回答。

"…Damit man Ihnen den Weg zum Leben offen hält?.."④党卫军分子追问。他的声音仍然是那种冷淡的官腔。

---

① 德语："我没有搞错吧？整个地下共产党，可以这样说，都在您口袋里吧？"

② 德语："对啦……我忘了。您是伟大的沉默者，只有一次说您像斯大林格勒的母老虎时，您才开了口……"

③ 德语："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浪漫主义……我们是清醒的人。您的生与死掌握在我们手里，斯小姐……如果您能翻过口袋，直截了当地向我说出您的共产党员同伙，同时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他们，怎么样？"

④ 德语："从而为自己打开生活之路？"

仿佛他指出的是一些颠扑不破的、纯理性的、人人皆知的真理。他的声音比起毒打、威胁和军官的那些愚蠢问题更使我感到恐惧。

我没有回答，少校朝军官伸出一只白净的戴着宝石戒指的瘦手，干巴巴地说：

"Die Dokumente."①

情报员急忙把一沓案卷递给他。少校朝后退了两步，翻阅着案卷。

"Eine gehörige Liste," 他开口说。"Sabotage, Mord und Mordversuche, Grossverbrechen gegen das deutsche Reich, Feindeshilfe…"他笑了起来，并且看了我一眼。"Fast grossartig, wenn es nicht so ganz durchtrieben und kriminell wäre… Sagen Sie, wie kamen Sie eigentlich dazu, eine bolschewistische Agentin zu werden? Sie waren doch früher Studentin, Anständig, Selbst sozial-demokratisch!.."②

他透过单片眼镜看着我。我看着他那张蜡黄的、瘦长的脸，一字一顿地强调说：

"我捍卫自己的祖国，反对德国法西斯。更正确地说，反对政治强盗行为。"

党卫军分子迅速地动了动眼窝上的肌肉，扔掉单片眼镜，说：

---

① 德语："证件。"

② 德语："罪状不少啊……暗中破坏，杀人，杀人未遂，反对德国政府的重大罪行，帮助敌人……几乎都是过分的，如果不说是非常阴险和不能容忍……请老实告诉我，您是怎么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奸细的？要知道，您以前是个大学生，一个诚实的人，甚至还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呢！……"

“Ein Mirakel.Das Fräulein S.hat aufs neue gesprochen.Und so wunderschön.Wie wenn es gedruckt stände.”①

我接着说，仿佛我真的想向他解释是什么支配着我这样干的：

“政治强盗行为正在遭受失败，到处都在遭受失败。绞杀希特勒德国的绞刑架已经竖起来了。我感到幸福的是，为加快实现这一判决，我做了一些工作。”

少校又把单片眼镜放在眼窝上，又把我仔细打量了好一会儿，尽管他站得离我很近，用肉眼看我更清楚。

“Sagen Sie mir etwas, was ich nicht weiss,” 他向我建议。“Damit wir zu vernünftigen Sachen kommen. Wo sitzt der illegale kommunistische Parteivorstand?”②

我没有回答。他问：

“Mit wem haben Sie zusammengearbeitet? Sagen Sie mir die Namen.Lass uns einen kuhhandel machen. Ganz grob und ohne Umstände. Sie erzählen mir etwas, und ich lohne es Ihnen.Sie sind jung.Sie wollen leben.Also. Rücken wir heraus mit den Informationen.”③

我微微一笑。我发现，两颗不显眼的红斑在他那干燥蜡黄的皮肤下闪现。

---

① 德语：“真是奇迹．斯小姐又开口说话了．说得太好了．就跟刊物上印的一样。”

② 德语：“您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吧……以便我们能够谈得更为明智一些．地下共产党的领导在哪儿？”

③ 德语：“您同谁合作？告诉我名字。让我们来进行一笔现货交易．直截了当，不用客气。您告诉我一些事情，我就奖励您。您年轻，您想生活．那么，我们就来说些情报？”

“我不否认我是汉娜·斯,”我终于说。“我也不否认您加在我身上的罪责，因为这是我干的。我为此而感到自豪。至于说到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则任何力量在这儿都帮不了您的忙。我和我的同志们促进纳粹主义加速崩溃。这就足够了。”

“Sagen Sie, wo die zwei Mädel zu finden sind, die mit Ihnen geschossen haben?”①党卫军分子问。

“德国正处在崩溃的前夕,”我回答。“可能，红军已经包围了柏林……现在战争不会长久持续下去。也许，明天一切都会结束。”

我发现，他脸上的红斑越来越大。他用短皮鞭朝淡褐色的靴子抽了好几下。

“Uebe Vernunft,” 他一字一顿地说。“Schwindeln Sie sich selbst keinen Heroismus vor.Sagen Sie ganz ruhig und unsentimental, was wir wissen wollen. Wir haben Haftbefehle,aber auch Entlassungsscheine.”②

“可能,希特勒德国还能维持几天,”我反驳说，并朝党卫军头目脸上的亮斑看了一眼。“它的灭亡以及对它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最后一个纳粹分子未受到正义的惩罚，全世界正直的人都不会平静。”

“Meinen Sie?” 他问，并看了看自己漂亮的金手表。“Es ist jetzt zwo Uhr vierundvierzig. Mein Angebot bleibt von Kraft bis drei.Aussage,Protokoll und Uuterschrift noch heute Nachmittag. Und wenn Sie wollen——Ihre

① 德语:“您说,在哪儿能找到两个同您一起开枪的姑娘?”

② 德语:“您要放聪明些……不要逞英雄。您完全可以平心静气,不动感情地说出我们想知道的一切。我们有逮捕的命令,同时也有释放的证明。”

Freiheit."[1]

我耸耸肩膀。

"用不着多说了，"我说，"至少我和我的同志们干的事，用不着多说了。我只是想说几句关于德国的话，对您的国家，我没有仇恨。当然，您是不明白这一点的。"

"Dreizehn Minuten,"[2]党卫军分子斜视了一下手表漂亮的小表盘，说。

"您着急了，"我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催促着你们，不仅催促纳粹分子，而且催促德国人民。现在人民就要知道，咬断无辜的人们的喉管意味着什么。人民成了一些人的罪行的牺牲品。可是，一个新的德国正在诞生。你们不会生活在里面。这将是一个消灭了穿着军装和各种制服的暴君的德国。因为在地球上只要有一个穿这种可耻衣服的德国人，德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国家，而且整个世界也不可能成为幸福的世界。"

单片眼镜掉了下来，碰到铁十字，发出清脆的声音，落到党卫军少校的脚边，摔成了碎片。我看到自己战胜了坏蛋，感到十分得意，甚至十分激动。他那高傲的冷静，沉着，他那空虚的傲慢都是装出来的；它们就像他的单片眼镜化为乌有了。他脸上的红斑通红，他气得全身直发抖。

"Du unterstehst dich, die SS-Uniform zu beleidigen!"党卫军分子叫喊着，他的声音变得生硬而又刺耳，就象爱吵嘴的泼妇的声音一样。"Was das rote Gesindel sich nicht erlaubt! Wir kennen dich doch, du Aas! Brauchst dich

---

① 德语："您是这样想的吗？现在是两点四十四分。我的建议有效到三点，口供、记录和签字今天就要。如果您想的话，这是您的自由。"

② 德语："十三分钟。"

nicht mehr zu zieren! Bist ja nichts anderes gewesen als eine…"①

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像鞭子抽我一样。我大为震惊。

休果，我心里想。党卫军分子说的这句话不仅是说我，而且也是说休果。党卫军分子们凌辱躺在墓中的休果，就像休果临死前躺在床上时，他们挖苦他那样。他们把"英国飞行员"的字条挂在他的腕关节上，让他顶替另一个人。纳粹分子把人所具有的真正的人的高尚感情简单说成行为不端的本能，任何真理经他们一解释都会变成谎言。

我在党卫军少校面前踮起脚，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感到，再也没有恐惧了。

梦

奥古斯塔和军官轮流毒打我。打得我跌过来倒过去。一个人打累了，另一个人接着打。我全身蜷缩成一团，陷入沉思。我想：我胜利了。我听到皮鞭呼啸着，打伤了我的皮肤。忽然，不知什么东西被扯破了，折断了，热血涌了出来。我用一只手护着脸；他们把我的手甩开，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党卫军头目像一个绿色的幽灵；他还在用手帕擦着自己的脸。紧接着我又挨了一下。我倒在地上，接着就觉得好像有整整一队士兵从我身上走过，用靴子踩我。我更深地躲进自己的躯壳里。疼痛跟随我钻到了里面。但是，疼痛只是像箭的箭镞在扎我。在我心灵深处有一个攻不破的避难所。我微微一笑，接着就失去了知

① 德语："你胆敢侮辱党卫军的制服！这个红色的混蛋什么都干得出！我们本来就知道你，卑鄙可恨的人！你再也用不着去想象了！你只不过是……"

觉。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自己牢房的草垫上了。

我惊讶不已，惘然若失，伤痕累累，浑身发热。我想起了发生的一切。我遭到摧残，但仍然没有屈服。我从床上起来。在装着饮水的盆子里洗了把脸。我一瘸一瘸地走到牢房的窗前，朝窗外看了一眼。栗树的树枝在大风中来回摆动。我仍然觉得自己在微笑。如果我的脸上没有流露笑容，那么笑意就埋藏在我心灵深处。这微笑使我整个身子充满了惬意的甜蜜感。

我揉着被打伤的地方。我手里握着自己的头发，慢慢地把头发绕在手指上。我让头发能照到光线。头发泛出棕红色的光泽，像红木的颜色一样，那么温暖，富有生气。我的头发那么稠密，那么富有光泽，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的头痛得要裂了，无数红肿的伤口烧得我全身发烫。

傍晚，我又被带了出去。这一次只有一个军官押送。我等待再一次的毒刑拷打，可是这没有发生。军官把我带进侧面的一条小走廊。在一间只挂着一张日历和一块党卫军的招募布告牌的房间里，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从外表看，他像是一个公证处的办事员。

“请坐，”他对我说。

我感到惊讶：他说的是荷兰话，仿佛同纳粹分子毫无共同之处。他把一叠案卷移到自己跟前，找出他需要的东西，接着问：

“您是汉娜·斯？”

我回答说是。

“您好好听着，”他说，“如果您有什么异议，就发表意见。”

他开始念材料。这里汇集了我在最近两年里所做的一切。我又一次感到惊讶，德国人知道得那么多。从我同休果一起开

始斗争那个时刻起就知道。

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是怎么躲过一次次被捕的。有些事实以假设或者疑问的形式列举的。公证处的办事员透过眼镜片看了我一眼，问：

“符合事实吗？”

“全都符合，”我回答。

他继续念下去：密谋，袭击，对一些团体和个人进行暗杀。德国人确实知道得很多。他们把一切全都归咎于我——偷自行车，偷食品，这些事都与我毫不相干，但是有许多事情却根本没有提到。我知道，这已经失去意义。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根本区别不出谎言和真理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回事情。但是，对于严格区分谎言和真理的我来说，纳粹的假设和解释根本不值得多考虑。

公证处的办事员念完了，又一次问道：

“全都符合吗？”

“全都符合，”我回答。

“请签字，”他说，同时把笔递给我。他朝我俯下身子，刹那间我朝他的脸上直视了一眼。这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小市民的脸，目光短浅，十分胆怯，是一个卖身投靠德国人和甘愿听从他们发号施令的蠢人。但是，除了目光短浅外，他看着我的时候，在他脸上隐约流露出另一种表情；它是什么意思，是高兴、尊敬还是同情，这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忽然他小声急语：

“特文特和阿赫特豪克解放了。”

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他迅速把目光移到一边，用迟钝的手指敲了敲记录，大声而又生气地说：

“请在这里签字……”

我签好了字。他用吸墨纸把我的签名吸干，啪的一声合上案卷，走出房间。我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一时没明白办事员说的话。

门口出现了军官，他向我做了一个手势。他把我押回了牢房。

我躺在马衣上，监狱的大楼隐没在一片绿荫荫的、不安的暮霭之中。我手上和腿上的伤口又痛起来。但是，在这种疼痛下面，惊喜之激情犹如烈火在我心中燃烧。特文特和阿赫特豪克……

盟军终于又开始向前推进了。春暖天气确实加速了解放的到来。他们力求包围德国人，切断德国人回国的退路。我把脸埋在马衣里躺着，痛哭着，因为紧张的心情缓和了。

……阳光在海滨沙丘上闪烁变幻。我熟悉这条小径。它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我也从来没有走得那么快速，那么轻松，好像一个没有分量的人！我甚至觉得，我不是在走，而在滑行。真奇怪，我心里想。可是，后来我明白了：风吹着我的背，把我向前推去。我在海滨沙丘间的洼地里看到了一些砖房；看到了温室的玻璃上泛出淡淡的虹霓。这时我才发现房屋上有一样我过去未看到过的东西——上面挂着荷兰旗帜。

我笑着朝这些旗帜挥手。后来我听到了孩子们热烈的欢呼声。我已经走完了海滨沙丘间的那条小径，我从一座座村庄旁边飞奔过去。村庄里一片节日的欢乐景象。老人们笑着，笑得直咳嗽，而沿海围垦地的那些严肃的居民，那些男人和妇女也都搂抱在一起坐着，喜滋滋地望着孩子们。孩子们跑到街上，拿着五彩缤纷的花辫，象拉手风琴那样拉得长长的；他们往空中抛着

一条条长长的五颜六色的彩带，只见一段段的彩带在排水管上和乡村广场四周的树枝上飘着……我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又进入了菜园地带。我想回过头去看看。可是真奇怪：我的头一动不动地架在肩膀上，我只能朝前看。我觉得，一座比菜畦稍短的小土岗耸立在一片宽阔的绿色田野中间。我想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的头不能动弹，于是菜园落到后面去了。我不知不觉走到一条乡间大道上，路上铺满碎石，我在上面跑了很久，直到远处有一个人朝我迎面走来。我站在道路中间，等着，望着。我看到，迎面来的是辆套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的两轮马车。两轮马车的轮子绘饰成黑色和金黄色的；太阳慷慨地把自己的光洒遍四面八方。这时我才突然发现，是谁坐在马车上。这是休果。他微笑着。他一身弗里斯人的装束：短裤子，白袜子，带银扣子的皮鞋，宽前襟的常礼服和高帽子。他勒住马，向我伸出一只手。

"休果，"我说，"多么古怪的服装；不过你穿着挺合适。"

他抱起我，让我坐在他身旁。

"要知道我是弗里斯兰西部的人嘛！"他说。"我的父母出生于斯哈亨。我的妹妹是个护士。"

休果朝后俯下身去，不知寻找什么东西。他从放下的皮车篷的皱褶里掏出块古式的带花边的大披巾来。接着他小心地把它披在我肩上。然后他又俯下身去，掏出一只戴在帽子下面用的金饰物，把它递给我。

"如果你戴上它，那你看上去就跟我的祖母一模一样，"他说。

"休果，"我表示反对，"这就更古怪了。披巾真美，我从来没看到比这更漂亮的……可金发箍呢？难道我会把自己的头发藏

在它下面吗？你祖母怎么戴的呢？”

他看了我一眼。他那张聪明的脸晒成了金黄色，一双蓝眼睛，稍稍流露出惊慌的神色，但仍然含着笑意。

“对啦，真见鬼，”他说。“我的祖母总是把头发剪得短短的……”

他朝我的棕红色的鬈发看了一眼，小心地伸出一只手，开始抚弄它们。然后他朝我俯下身子，我摘掉他头上的帽子。他的脸隐没在我的头发里。

“你想让我也剪掉吗？……”我温情脉脉地问。

他摇摇头，更近地依着我。我把他的头紧紧搂在自己怀里。

“我们走吧，车夫，”我终于说。“不能老站在道路中间……马上要来人了。”

他挺直身子，满脸喜气。他问：

“我的帽子在哪儿？”

我把帽子还给他，他戴上帽子。然后他从套子里取出一根很花哨的鞭子，在马背上啪的抽了一下。

“不错，”他说，“今天是解放的节日……向前，向前！”

马起步了。我紧握住休果的一只手。他微微一笑，用自己有力的双手拉紧缰绳。他驾驭着，同时合着马奔跑的节奏，不时弹响舌头。马车在长满嫩草的草地上越走越快，我们已经来到村边，从菜园边上隆隆地驶过。突然我想起在那边看到的一座小土岗，样子奇怪，像一根截短了的木杆。我觉得，土岗上长着一棵树，投下了一片阴影，因此我最多只能看到半个土岗……我使劲想把头转向那一边。

“向前看，向前！……”休果喊道。我们辘辘地从一旁驶过去。帽子从休果头上飞掉了。他那栗色的短发在阵阵急风中摆

动。我也感觉到，风吹拂着我那棕红色的鬈发。

“多美啊，休果！”我赞叹道。“我们上哪儿？”

马在奔驰。两轮马车颠簸着，发出辘辘声。休果笑着，更高地举起缰绳，看来他想快马加鞭。我更紧地抓住他的手。突然我好像觉得，我开始逐渐变成休果。是的，一点儿也不错。我好像正在融化，同休果融为一体。我觉得缰绳在自己手里。现在两轮马车上只有一个乘客——汉娜，而汉娜就是休果，休果即是汉娜，我穿着带银扣子的皮鞋，而头发仍然是棕红色的，棕红色的鬈发像旗帜迎风飘动。响起了马蹄声，又传来了孩子们的热烈欢呼声，悠扬的钟声响了……

钟声齐鸣。

天色已晚。牢房昏暗，像张蜘蛛网似的笼罩着我。我听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我仍然脸朝下躺在灰色的马衣上。我在梦中梦见的那些欢呼声渐渐远去，消失了。我又明白了，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我翻了个身，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我的心平静下来。

我明白，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在敌人想干的某个时候。

沙　丘

死亡。眼前这个怯生生的春天的太阳也显得死气沉沉。我的周围处处是死亡；死亡在一个个沙丘上，在划破我脚的野麦丛里，在我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呼吸的大海之中；死亡在轻风吹拂的平静中，在我正顺着斜坡慢慢朝上攀登的云层里。死亡在我背后：四个挎着手枪和自动枪的法西斯。当向我宣布，我又要到哈勒姆去受审，而我们没在哈勒姆停下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一

点。在靠近滨海公路的地方，当一个“保安部”的坏蛋拿着一把铲子上车，用铲柄碰了我的膝盖时，我就完全确信无疑了。不，这一点我早就明白了。还在奥古斯塔把我带出牢房，强迫我穿上大衣，把我带到汽车跟前的时候，在汽车驶出院子，而我左右都坐着看守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他们把我带出牢房去迎接我的死亡。他们本身就是死亡的产物。他们那腐恶的面孔总是敌视生活的。他们把我带到这里，带到这些沙丘上，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子弹射入我的胸膛。如果生活想变成一个巨人，他们只要能够做得到，甚至在他们自己灭亡的这一时刻，他们也会欣然把子弹射入生活这个巨人的！他们只要与他们自己的死亡同在。

我突然想到：我不应该像他们那样去考虑问题。面前的杀人犯和我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从自己腐烂的内脏里吐出了死亡，并把死亡撒在我们的沙丘上，我们的土地上，就像沼泽把它那可以置人死地的毒气散向四面八方。他们想把我扼杀在这块沼泽里，就像他们已经扼杀了许多人那样。现在我知道，沼泽就在他们身上，不在我身上，也不在我的周围。我将死去，可是春天和太阳仍将闪耀着光辉。荷兰将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荷兰。这用不着等多久了。我曾同我的祖国和我的同胞在一起。现在我仍然与他们共生存，同呼吸。我走着，我的双脚踏在这里，踏在这任何沼泽都吞没不了的荷兰的土地上。不久我将变成荷兰的泥土，而杀人犯再没有权利来管我。休果，爸爸妈妈，安和金卡，我的同志们，我在大声呼唤你们，呼唤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法西斯就要熄灭我的目光，停止我的呼吸，我的身体将躺在草丛里。我曾在这块土地上所拥有的一切——人的身躯和人的名字都将留在这里；现在向自己的毁灭走去的一切都要留在这里，因为德国法西斯是这么要求的。我

要告诉大家，我拒绝这种死亡，因为我是被迫从他们手里接受死亡！我尽力回忆着一切——自己的爱和自己的恨，每走一步我又重新获得我曾认为失去了的东西：瞧，那儿是一片村庄和城市，沙丘连亘——它们依然存在。法西斯追捕了那么久的红发姑娘，不久就要离世了，可是杀人犯不明白，我已经躲避了他们，在这一时刻我摆脱了他们，摆脱了他们的死亡，永远将自己同我身后依然存在于人间的、心爱的东西融为一体，同即将出现的事物融为一体，同法西斯永远不能据为己有的一切融为一体。

沙丘的这一面高低不平，攀登起来很吃力。我最后一次走在沙丘之间的时候，沙丘上还覆盖着雪。如今沙丘摆脱了冬天的枷锁。我想起了我少年时代的那些沙丘。尾与头渐渐连接上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在这些沙丘上漫游。我同父亲也许就在那儿，在沙坑附近休息过。当时我完全是个小孩子，大概四五岁。时间一长，我就坐不住了，开始绕圈子奔跑，玩耍起来。我走得远远的。突然我看见一只被套索套着的兔子。我用手触动了它一下。我吓了一跳，好像我的手被什么东西扎破了。兔子已经僵硬，一动不动，没有气了。这是我看到的，用手触动过的第一只死动物。风戏弄着它那灰白色的毛。当时我哭得非常伤心，哭那么长时间，也是少见的。父亲听到我的哭声，不安地跑过来，把我从地上抱起来，迅速离开那地方。回到家里，给我糖果和一只实际上为我生日买的新玩具。可是任何东西都安慰不了我。我一句话也不说。甚至在梦里也哭。

不久我就要长眠，但不会流泪，尽管我仇恨那些为我们设置死亡套索的人，我恨他们比恨那个用套索套住兔子的恶人更深。

我走到半山坡。草被风吹得不断向我点头。应该停下来，看看周围——这是最后一次了。大概，他们发现我那不由自主的

停顿。不知什么东西擦着我的头呼啸而过。我迅速抬手护住擦破的地方。血从耳朵里流出来。我转过身去，看到四个男人伸长脖子站在我后边，其中一个拿着铁锹。他们脸上呈现着空虚与胆怯，目光里流露着失败后的颓丧，当然仍充满虐待的欲望……枪是那个嘴唇苍白的高个子开的。这是我从他举着自动枪的手，从他惊慌的眼神中看出来的。他们害怕了，害怕所有的一切。我蔑视地笑着，说：

“我枪打得比你们好。”

我继续往前走着。我觉得大海一直延伸到这里，沙丘间的洼地灌满了含沙的海水。太阳从云端里射出耀眼的光芒，照得我的头开始旋转起来。突然我全身充满了阳光和激动。可是，这继续了没多久。沙丘下面有人在叫喊。这是德国话，是卑鄙的、刺耳的和侮辱人的声音。我那颗激动不安的心击退了喊声，像大海驱赶一段朽木那样驱赶着它们。光线刺痛我的眼睛，并且无情地灼烧着，光线变成了疼痛。我不得不停下来，可是光线已经消失了。

再也听不到喊声。只有从自动枪里射出的法西斯的子弹。我浑身被这些发疯的子弹穿透。我倒下了。

我是否喊出了亲爱的名字？我再也没有任何感觉，疼痛和土地都在我的身下。我想看太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欢迎太阳。

太阳，向我致敬吧！

太阳再也没有了。

疼痛再也没有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红发姑娘
作者＝（荷兰）特恩·弗里斯著　　姚龙宝译
页数＝６７８
ＳＳ号＝１１１３１１２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８月第１版

目　录

恐惧
梦
沙丘